主编

沈志华

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

中苏关系

第十一卷

1964.12—1969.6

中国出版集团 東方出版中心



主编

沈志华

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

——中苏关系——

第一卷 1945.1—1949.2
第二卷 1949.3—1950.7
第三卷 1950.8—1951.8
第四卷 1951.9—1954.1
第五卷 1954.2—1955.7
第六卷 1955.8—1956.9
第七卷 1956.10—1958.3
第八卷 1958.4—1959.10
第九卷 1959.10—1962.12
第十卷 1963.1—1964.11
第十一卷 1964.12—1969.6
第十二卷 1969.7—1991.12

主编
沈志华

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

中苏关系

第十一卷

1964.12—1969.6

中国出版集团 東方出版中心

目　　录

№16678，库兹涅佐夫与帕夫洛夫斯基谈话记录：关于向中国提供武器
1964 年 12 月 12 日 …… 13
№20776－1，安德罗波夫致苏共中央函：关于向毛泽东祝贺生日的方式
1964 年 12 月 15 日 …… 14
№20776，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祝贺毛泽东生日
1964 年 12 月 23 日 …… 15

1965 年

№20777，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苏中关系正常化的措施
1965 年 1 月 14 日 …… 17
№20778，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给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信
1965 年 1 月 14 日 …… 21
№25559，契尔沃年科与刘晓会谈纪要：关于苏联参加第二次万隆会议问题
1965 年 1 月 14 日 …… 25
№20779，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与中国领导人会谈
1965 年 1 月 28 日 …… 25
№25767，谢苗诺夫与张德群谈话纪要：关于纪念中苏同盟条约问题
1965 年 2 月 6 日 …… 30
№11466，苏联代表团的报告：访问越南民主共和国活动情况
1965 年 2 月 10 日以后 …… 31
№13866，柯西金与毛泽东会谈记录：中苏关系及国际形势等问题
1965 年 2 月 11 日 …… 33
№25648，费留宾与金炳稷会谈记录：介绍苏联对中国的抗议照会
1965 年 2 月 12 日 …… 45
№25679，契尔沃年科与余湛会谈纪要：中国的游行示威无助于反帝斗争
1965 年 3 月 16 日 …… 46
№25950，沙里波夫等与陈毅会谈备忘录：介绍阿拉木图的经济情况
1965 年 3 月 22 日 …… 47
№25681，契尔沃年科与刘晓会谈纪要：关于援助越南的政策
1965 年 3 月 23 日 …… 48

№08116，苏斯洛夫在苏共中央全会的报告：共产党和工人党协商会议的总结
1965 年 3 月 26 日 …… 52
№20826－3，苏共中央全会决议：关于三月协商会议的相关问题
1965 年 3 月 26 日 …… 61
№23049，梅夏采夫致苏共中央报告：北京广播电台对苏联进行歪曲宣传
1965 年 3 月 29 日 …… 62
№25685，契尔沃年科与科尔特等会谈纪要：途经中国向越南运送苏联武器
1965 年 4 月 …… 64
№25682，契尔沃年科与余湛会谈纪要：希望恢复中苏之间的友谊
1965 年 4 月 5 日 …… 65
№25684，契尔沃年科与伍修权会谈纪要：坚信中苏友谊是永久的
1965 年 4 月 8 日 …… 66
№25686，契尔沃年科与陈毅会谈纪要：团结的前景总是存在的
1965 年 4 月 10 日 …… 66
№25687，契尔沃年科与周恩来会谈记录：中苏关系、越南问题等
1965 年 4 月 13 日 …… 67
№25778，外交部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中国的宣传活动及应对办法
1965 年 4 月 20 日以后 …… 78
№25688，契尔沃年科与刘少奇、邓小平会谈记录：中苏关系不会轻易分裂
1965 年 4 月 21 日 …… 80
№25689，契尔沃年科与哈拉斯会谈纪要：中苏对越南的援助问题
1965 年 4 月 23 日 …… 89
№25757，关于在中国举办新兴力量运动会的报告
1965 年 4 月 27—29 日 …… 91
№25690，拉宾与刘少奇会谈纪要：中苏关系及其恢复
1965 年 4 月 30 日 …… 91
№25691，拉宾与朱德会谈纪要：世界大战与中苏团结
1965 年 5 月 8 日 …… 94
№25692，拉宾与周恩来会谈纪要：中苏关系若干问题
1965 年 5 月 15 日 …… 95
№23050，谢米恰斯内致苏共中央函：中共通过邮件系统对苏联进行敌对宣传
1965 年 5 月 18 日 …… 99
№23052，齐赫文斯基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中国的经济状况
1965 年 5 月 24 日 …… 100
№16679，莫斯科市委致苏共中央报告：基层党组织讨论苏共中央公开信

1965 年 5 月 27 日 …… 104
№25693,拉宾与陈毅会谈纪要：关于越美和谈问题
1965 年 5 月 31 日 …… 106
№24354,布拉托夫的报告：关于邀请苏联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问题
1965 年 6 月 2 日 …… 107
№25655,苏联驻朝鲜大使馆的报告：关于中朝关系新情况
1965 年 6 月 4 日 …… 110
№24353,苏共中央决议草案：给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苏联代表团的指示
1965 年 6 月 17 日 …… 113
№24351,苏共中央给驻外大使的指示草案：第二次亚非会议涉及的主要问题
1965 年 6 月 18 日 …… 123
№24352,苏共中央的决议：批准关于苏联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的指示草案
1965 年 6 月 18 日 …… 128
№11467,托克马科夫与阮曼卡谈话记录：越南议会代表团访苏
1965 年 7 月 27 日 …… 130
№25754,中国外交部的声明：关于中苏边界问题
1965 年 9 月 7 日 …… 131
№25695,拉宾与王炳南会谈纪要：请求与周恩来举行会谈
1965 年 9 月 14 日 …… 131
№25696,拉宾与伍修权会谈纪要：关于印巴冲突问题
1965 年 9 月 19 日 …… 132
№25697,拉宾与郭沫若等会谈纪要：中苏科技合作有所改善
1965 年 9 月 21 日 …… 133
№24368,谢米恰斯内致苏共中央报告：加强苏蒙边界接触和协同动作
1965 年 9 月 27 日 …… 133
№24330,扎哈罗夫致苏共中央报告：印度尼西亚发生政变
1965 年 10 月 1 日 …… 134
№24355,齐米亚宁致苏斯洛夫函：印尼政治形势与中国的处境
1965 年 10 月 16 日 …… 135
№24357,对外政策情报局的报告：中国阻止苏联参加亚非会议的企图失败
1965 年 10 月 18 日 …… 138
№24358,对外政策情报局的报告：亚非各国对苏联参加亚非会议的态度
1965 年 10 月 18 日 …… 140
№25698,拉宾与伍修权会谈纪要：印巴冲突与中国的政策
1965 年 10 月 19 日 …… 142

№24356,葛罗米柯致苏共中央函：给亚非会议苏联代表团的指示草案
1965年10月28日 …… 143
№25699,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回信：反驳在苏联援越过境物资问题上的谣言
1965年11月5日 …… 158
№25700,拉宾与赵毅敏会谈纪要：苏联援越物资过境问题
1965年11月6日 …… 159
№24370,叶皮谢夫致苏共中央报告：苏联红旗歌舞团在华巡回演出的情况
1965年11月6日 …… 159
№25631,拉宾与彭真会谈纪要：建议恢复莫斯科与北京的交流活动
1965年11月9日 …… 160
№24333,外交部致驻印尼大使电：采取措施搞清印度尼西亚的局势
1965年11月27日 …… 161
№21167,卡拉布霍夫与唐坦义会谈记录：中国留学生的专业安排等问题
1965年12月20日 …… 162
№24334,苏达利科夫与金炳稷会谈纪要：朝苏关系发展态势良好
1965年12月20日 …… 164

1966年

№24381,葛罗米柯致苏共中央报告：1966年度苏联外交行动规划局工作计划
1966年2月1日 …… 165
№24376,阿尔奇莫维奇等致勃列日涅夫联名信：关于为斯大林平反的现象
1966年2月14日 …… 170
№25972,伊斯坎达罗夫的报告：香港和澳门问题及苏联的立场
1966年2月16日 …… 172
№23022,苏共中央全会速记记录：关于中苏关系的一些问题
1966年2月19日 …… 175
№20282,勃列日涅夫与黎笋谈话记录：越南战争与苏联的援助
1966年4月11日 …… 177
№16680,齐米亚宁致勃列日涅夫函：苏联记者关于阿穆尔河地区局势的呈文
1966年4月20日 …… 184
№10401,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加强开展对中国和越南的无线电广播
1966年4月20日 …… 187
№12825,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给予各国共产党的经济援助
1966年6月24日 …… 187
№25563,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中央全会报告：与金日成讨论如何对付中国

1966 年 5 月 27 日 …… 188
№25473,中国外交部致苏联驻中国大使馆照会：关于无线电广播宣传
1966 年 6 月 27 日 …… 189
№25953,外交部远东司的报告:“九三〇”事件后中国与印尼的关系
1966 年 7 月 8 日 …… 190
№11469,外交部提供的背景资料：关于向越南派遣志愿人员
1966 年 7 月 9 日以后 …… 194
№11468,巴卡耶夫致苏共中央报告：海运部向越南运送物资问题
1966 年 7 月 18 日 …… 196
№25952,外交部东南亚司的报告：关于越南局势的问题
1966 年 7 月 20 日 …… 198
№25949,外交部远东司的报告：苏共二十三大和中共的立场
1966 年 7 月 25 日 …… 201
№11783,外交部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朝鲜战争及停战谈判
1966 年 8 月 9 日 …… 208
№10254,伊瓦舒京致苏共中央联络部报告：美国人认为越战对苏联有利
1966 年 8 月 23 日 …… 212
№25716,伊利切夫与张德群会谈纪要：抗议苏联驻华使馆遭受中国人围攻
1966 年 8 月 26 日 …… 214
№10402,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关于加强对中国的科学研究
1966 年 9 月 1 日 …… 214
№25474,中国外交部的照会：关于使用北京—莫斯科航线
1966 年 9 月 21 日 …… 217
№25470,外交部东南亚司的报告：越南劳动党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态度
1966 年 10 月 17 日 …… 217
№25951,外交部远东司的报告：蒙古与亚非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1966 年 10 月 21 日 …… 218
№25717,苏达利科夫与张德群会谈纪要：苏联使馆遭到围攻和侮辱
1966 年 10 月 27 日 …… 226
№25475,中国外交部的答复照会：关于苏联大使馆周围的反苏骚乱
1966 年 11 月 1 日 …… 227
№25482,马耶夫斯基致苏达利科夫函：关于中国中苏友协代表团的访问
1966 年 11 月 26 日 …… 228
№25546,谢尔比纳致杰米切夫函：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和红卫兵组织的比较
1966 年 11 月底 …… 229

№25705,1966 年中国官员关于苏联和苏共的一些言论
1966 年 12 月 …… 229
№25471,波诺马廖夫的报告：匈牙利驱逐中国留学生
1966 年 12 月 1 日 …… 231
№25547,苏达利科夫与安致远会谈记录：《中国画报》发表的反苏文章
1966 年 12 月 2 日 …… 232
№25668,苏联驻朝鲜大使馆的报告：中朝关系发生了实质性变化
1966 年 12 月 2 日 …… 233
№25548,梅夏采夫致苏共中央报告：在苏联放映关于中国"文革"的纪录片
1966 年 12 月 6 日 …… 236
№25472,希特罗夫的报告：罗马尼亚与中国的关系
1966 年 12 月 12 日 …… 237
№20834－1,苏共中央全会会议记录：勃列日涅夫关于苏中关系的报告
1966 年 12 月 12 日 …… 238
№22988,苏共中央全会会议记录：库纳耶夫关于中国在新疆反苏活动的发言
1966 年 12 月 13 日 …… 283
№22989,苏共中央全会会议记录：乌苏巴里耶夫关于中苏边界问题的发言
1966 年 12 月 13 日 …… 289
№22986,苏共中央全会决议：苏联对外政策与苏中关系
1966 年 12 月 13 日 …… 293
№25980,香港邮寄商品公司致外交部函：希望与苏联建立贸易关系
1966 年 12 月 20 日 …… 294
№25554,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报告：关于中国对苏广播的规模
1966 年 12 月 24 日 …… 295
№25555,邦达连科致苏共中央报告：西方广播中的"文化大革命"与苏联
1966 年 12 月 26 日 …… 296
№10403,苏共中央政治局决议：加强对中国无线电广播的措施
1966 年 12 月 28 日 …… 297

1967 年

№25718,外交部远东司的报告：关于 1966 年的中美关系
1967 年 1 月 10 日 …… 299
№25478,国防部的报告：关于中国对社会主义国家武官的态度
1967 年 1 月 12 日 …… 300
№25484,外交部远东司的报告：关于大批中国驻外机构人员被召回国

1967 年 1 月 20 日 …………………………………………………………… 300
№25704,中国大使馆的照会：关于中国学生在列宁墓附近的遭遇
1967 年 1 月 25 日 …………………………………………………………… 301
№25721,谢米恰斯内致葛罗米柯报告：关于中国留学生在列宁墓附近的活动
1967 年 1 月 25 日 …………………………………………………………… 301
№25975,外交部远东司的报告：苏联在香港问题上的立场
1967 年 2 月 3 日 …………………………………………………………… 302
№25707,苏联政府的声明：抗议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受到围攻
1967 年 2 月 4 日 …………………………………………………………… 303
№25738,费留宾与越南等国驻苏代表会谈纪要：通报苏联驻华使馆被围攻情况
1967 年 2 月 4 日 …………………………………………………………… 304
№25710,拉兹杜霍夫发自北京的高频电报：中国外交部的重要通告
1967 年 2 月 6 日 …………………………………………………………… 305
№25959,萨姆萨利耶夫致吉尔吉斯党中央函：加强中苏边境地区军事教育工作
1967 年 2 月 15 日 …………………………………………………………… 305
№25962,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决议：加强对华无线电宣传的措施
1967 年 2 月 16 日 …………………………………………………………… 308
№25723,苏联驻中国大使馆整理的材料：1967 年 1—2 月中国的反苏运动
1967 年 2 月 25 日 …………………………………………………………… 309
№25483,外交部远东司的报告：关于中国的“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
1967 年 3 月 1 日 …………………………………………………………… 312
№25961,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决议：加强中苏边境地区的群众性保卫工作
1967 年 3 月 2 日 …………………………………………………………… 313
№25677,外交部远东司的报告：朝鲜与中国关系开始疏远
1967 年 3 月 7 日 …………………………………………………………… 316
№25974,丘季诺夫的报告：香港的政治经济状况
1967 年 3 月 14 日 …………………………………………………………… 318
№25976,纳西诺夫斯基致苏达利科夫函：在澳门的华人难民问题
1967 年 3 月 22 日 …………………………………………………………… 322
№25726,外交部远东司的报告：现阶段中国的对外政策及领导人的对外活动
1967 年 3 月 28 日 …………………………………………………………… 325
№25977,别谢金致利哈切夫函：与香港国泰航空公司进行商业合作
1967 年 5 月 …………………………………………………………… 325
№25978,利哈切夫复别谢金函：同意与香港航空公司进行商业合作
1967 年 5 月 29 日 …………………………………………………………… 326

№25979,阿扎鲁什金的报告：关于香港骚乱事件
1967年6月10日 …… 327
№25982,丘季诺夫的报告：香港事件的发展态势及英中关系
1967年8月3日 …… 329
№25620,诺维科夫与李周渊会谈纪要：中国对朝鲜的供应急剧减少
1967年9月25日 …… 333
№25729,外交部远东司的报告：中国的对外关系陷入困境
1967年11月5日 …… 334
№25719,利哈乔夫致费德林函：驻华使馆收集中国情报遇到困难
1967年11月20日 …… 335
№25720,利哈乔夫致多勃雷宁函：加强对中国情报的收集和分析
1967年11月20日 …… 335
№25728,外交部远东司的报告：加强对中国情报收集和反宣传工作
1967年11月28日 …… 336

1968年

№10686,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关于针对中国问题的宣传措施
1968年2月28日 …… 338
№10404,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与兄弟党协调关于中国问题的宣传和研究
1968年3月12日 …… 339
№10257,苏共中央给驻外使馆的指示：加强援越反美的舆论宣传工作
1968年4月5日 …… 340
№22993,苏共中央全会会议记录：勃列日涅夫关于中国问题的发言
1968年4月9日 …… 343
№22994,苏共中央全会记录：格里申关于勃列日涅夫报告的发言
1968年4月9日 …… 346
№22991,苏共中央全会决议：国际局势与国际共运的团结问题
1968年4月10日 …… 349
№25772,外交部致中国大使馆照会：在越南的苏联专家受到中国军人迫害
1968年5月12日 …… 351
№25771,李强给拉兹杜霍夫的通报：苏联援越物资转运任务全部完成
1968年7月22日 …… 351
№10405,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关于出版和发行王明的著作
1968年12月4日 …… 352

1969 年

№10406,苏共中央政治局决议：七国兄弟党中央国际部代表讨论中国问题
1969 年 1 月 21 日 …… 353
№01843,切谢夫与巴杜拉谈话记录：越南局势和中国对柬埔寨的帮助
1969 年 1 月 23 日 …… 355
№10256,佐林与春水、陈宝剑谈话纪要：越美和谈的进展和前景
1969 年 2 月 21 日 …… 357
№10282,苏联政府致兄弟党政府的情况通报：中国在珍宝岛的军事挑衅
1969 年 3 月 8 日 …… 360
№22892,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中苏边界冲突及越南和谈问题
1969 年 3 月 11 日 …… 362
№25956,梅尔库洛夫致吉尔吉斯党中央报告：加强边防军战斗准备的问题
1969 年 3 月 24 日 …… 366
№10463,苏联政府致中国政府照会：关于苏联援越物资过境问题
1969 年 4 月 …… 367
№10277,苏联政府致中国政府照会：中国为苏联援越物资过境设置障碍
1969 年 4 月 …… 368
№22894,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巴黎会谈及中美关系
1969 年 4 月 2 日 …… 369
№25955,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决议：加强中苏边境地区的政治教育
1969 年 4 月 3 日 …… 373
№25957,吉尔吉斯奥什州委决议：落实在中苏边境地区加强政治教育的决议
1969 年 4 月 16 日 …… 375
№10407,苏共中央政治局决议：加强中国学的研究队伍和科研工作
1969 年 4 月 28 日 …… 376
№10408,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关于巩固苏联在香港阵地的一些措施
1969 年 5 月 13 日 …… 378
№22347,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宣传措施计划
1969 年 5 月 28 日 …… 378
№22895,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越南问题及中苏冲突
1969 年 6 月 11 日 …… 385
№20841,苏共中央全会会议速记：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报告和决议
1969 年 6 月 26 日 …… 393

第十一卷(1964. 12—1969. 6)

目　　录

№16678,库兹涅佐夫与帕夫洛夫斯基谈话记录：关于向中国提供武器
1964 年 12 月 12 日 …… 13
№20776－1,安德罗波夫致苏共中央函：关于向毛泽东祝贺生日的方式
1964 年 12 月 15 日 …… 14
№20776,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祝贺毛泽东生日
1964 年 12 月 23 日 …… 15

1965 年

№20777,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苏中关系正常化的措施
1965 年 1 月 14 日 …… 17
№20778,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给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信
1965 年 1 月 14 日 …… 21
№25559,契尔沃年科与刘晓会谈纪要：关于苏联参加第二次万隆会议问题
1965 年 1 月 14 日 …… 25
№20779,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与中国领导人会谈
1965 年 1 月 28 日 …… 25
№25767,谢苗诺夫与张德群谈话纪要：关于纪念中苏同盟条约问题
1965 年 2 月 6 日 …… 30
№11466,苏联代表团的报告：访问越南民主共和国活动情况
1965 年 2 月 10 日以后 …… 31
№13866,柯西金与毛泽东会谈记录：中苏关系及国际形势等问题
1965 年 2 月 11 日 …… 33
№25648,费留宾与金炳稷会谈记录：介绍苏联对中国的抗议照会
1965 年 2 月 12 日 …… 45
№25679,契尔沃年科与余湛会谈纪要：中国的游行示威无助于反帝斗争
1965 年 3 月 16 日 …… 46
№25950,沙里波夫等与陈毅会谈备忘录：介绍阿拉木图的经济情况
1965 年 3 月 22 日 …… 47
№25681,契尔沃年科与刘晓会谈纪要：关于援助越南的政策
1965 年 3 月 23 日 …… 48

№08116,苏斯洛夫在苏共中央全会的报告：共产党和工人党协商会议的总结
1965 年 3 月 26 日 …… 52
№20826-3,苏共中央全会决议：关于三月协商会议的相关问题
1965 年 3 月 26 日 …… 61
№23049,梅夏采夫致苏共中央报告：北京广播电台对苏联进行歪曲宣传
1965 年 3 月 29 日 …… 62
№25685,契尔沃年科与科尔特等会谈纪要：途经中国向越南运送苏联武器
1965 年 4 月 …… 64
№25682,契尔沃年科与余湛会谈纪要：希望恢复中苏之间的友谊
1965 年 4 月 5 日 …… 65
№25684,契尔沃年科与伍修权会谈纪要：坚信中苏友谊是永久的
1965 年 4 月 8 日 …… 66
№25686,契尔沃年科与陈毅会谈纪要：团结的前景总是存在的
1965 年 4 月 10 日 …… 66
№25687,契尔沃年科与周恩来会谈记录：中苏关系、越南问题等
1965 年 4 月 13 日 …… 67
№25778,外交部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中国的宣传活动及应对办法
1965 年 4 月 20 日以后 …… 78
№25688,契尔沃年科与刘少奇、邓小平会谈记录：中苏关系不会轻易分裂
1965 年 4 月 21 日 …… 80
№25689,契尔沃年科与哈拉斯会谈纪要：中苏对越南的援助问题
1965 年 4 月 23 日 …… 89
№25757,关于在中国举办新兴力量运动会的报告
1965 年 4 月 27—29 日 …… 91
№25690,拉宾与刘少奇会谈纪要：中苏关系及其恢复
1965 年 4 月 30 日 …… 91
№25691,拉宾与朱德会谈纪要：世界大战与中苏团结
1965 年 5 月 8 日 …… 94
№25692,拉宾与周恩来会谈纪要：中苏关系若干问题
1965 年 5 月 15 日 …… 95
№23050,谢米恰斯内致苏共中央函：中共通过邮件系统对苏联进行敌对宣传
1965 年 5 月 18 日 …… 99
№23052,齐赫文斯基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中国的经济状况
1965 年 5 月 24 日 …… 100
№16679,莫斯科市委致苏共中央报告：基层党组织讨论苏共中央公开信

1965 年 5 月 27 日 …… 104
№25693,拉宾与陈毅会谈纪要：关于越美和谈问题
1965 年 5 月 31 日 …… 106
№24354,布拉托夫的报告：关于邀请苏联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问题
1965 年 6 月 2 日 …… 107
№25655,苏联驻朝鲜大使馆的报告：关于中朝关系新情况
1965 年 6 月 4 日 …… 110
№24353,苏共中央决议草案：给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苏联代表团的指示
1965 年 6 月 17 日 …… 113
№24351,苏共中央给驻外大使的指示草案：第二次亚非会议涉及的主要问题
1965 年 6 月 18 日 …… 123
№24352,苏共中央的决议：批准关于苏联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的指示草案
1965 年 6 月 18 日 …… 128
№11467,托克马科夫与阮曼卡谈话记录：越南议会代表团访苏
1965 年 7 月 27 日 …… 130
№25754,中国外交部的声明：关于中苏边界问题
1965 年 9 月 7 日 …… 131
№25695,拉宾与王炳南会谈纪要：请求与周恩来举行会谈
1965 年 9 月 14 日 …… 131
№25696,拉宾与伍修权会谈纪要：关于印巴冲突问题
1965 年 9 月 19 日 …… 132
№25697,拉宾与郭沫若等会谈纪要：中苏科技合作有所改善
1965 年 9 月 21 日 …… 133
№24368,谢米恰斯内致苏共中央报告：加强苏蒙边界接触和协同动作
1965 年 9 月 27 日 …… 133
№24330,扎哈罗夫致苏共中央报告：印度尼西亚发生政变
1965 年 10 月 1 日 …… 134
№24355,齐米亚宁致苏斯洛夫函：印尼政治形势与中国的处境
1965 年 10 月 16 日 …… 135
№24357,对外政策情报局的报告：中国阻止苏联参加亚非会议的企图失败
1965 年 10 月 18 日 …… 138
№24358,对外政策情报局的报告：亚非各国对苏联参加亚非会议的态度
1965 年 10 月 18 日 …… 140
№25698,拉宾与伍修权会谈纪要：印巴冲突与中国的政策
1965 年 10 月 19 日 …… 142

№24356，葛罗米柯致苏共中央函：给亚非会议苏联代表团的指示草案
1965 年 10 月 28 日 …… 143
№25699，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回信：反驳在苏联援越过境物资问题上的谣言
1965 年 11 月 5 日 …… 158
№25700，拉宾与赵毅敏会谈纪要：苏联援越物资过境问题
1965 年 11 月 6 日 …… 159
№24370，叶皮谢夫致苏共中央报告：苏联红旗歌舞团在华巡回演出的情况
1965 年 11 月 6 日 …… 159
№25631，拉宾与彭真会谈纪要：建议恢复莫斯科与北京的交流活动
1965 年 11 月 9 日 …… 160
№24333，外交部致驻印尼大使电：采取措施搞清印度尼西亚的局势
1965 年 11 月 27 日 …… 161
№21167，卡拉布霍夫与唐坦义会谈记录：中国留学生的专业安排等问题
1965 年 12 月 20 日 …… 162
№24334，苏达利科夫与金炳稷会谈纪要：朝苏关系发展态势良好
1965 年 12 月 20 日 …… 164

1966 年

№24381，葛罗米柯致苏共中央报告：1966 年度苏联外交行动规划局工作计划
1966 年 2 月 1 日 …… 165
№24376，阿尔奇莫维奇等致勃列日涅夫联名信：关于为斯大林平反的现象
1966 年 2 月 14 日 …… 170
№25972，伊斯坎达罗夫的报告：香港和澳门问题及苏联的立场
1966 年 2 月 16 日 …… 172
№23022，苏共中央全会速记记录：关于中苏关系的一些问题
1966 年 2 月 19 日 …… 175
№20282，勃列日涅夫与黎笋谈话记录：越南战争与苏联的援助
1966 年 4 月 11 日 …… 177
№16680，齐米亚宁致勃列日涅夫函：苏联记者关于阿穆尔河地区局势的呈文
1966 年 4 月 20 日 …… 184
№10401，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加强开展对中国和越南的无线电广播
1966 年 4 月 20 日 …… 187
№12825，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给予各国共产党的经济援助
1966 年 6 月 24 日 …… 187
№25563，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中央全会报告：与金日成讨论如何对付中国

1966 年 5 月 27 日 …… 188
№25473,中国外交部致苏联驻中国大使馆照会:关于无线电广播宣传
1966 年 6 月 27 日 …… 189
№25953,外交部远东司的报告:"九三〇"事件后中国与印尼的关系
1966 年 7 月 8 日 …… 190
№11469,外交部提供的背景资料:关于向越南派遣志愿人员
1966 年 7 月 9 日以后 …… 194
№11468,巴卡耶夫致苏共中央报告:海运部向越南运送物资问题
1966 年 7 月 18 日 …… 196
№25952,外交部东南亚司的报告:关于越南局势的问题
1966 年 7 月 20 日 …… 198
№25949,外交部远东司的报告:苏共二十三大和中共的立场
1966 年 7 月 25 日 …… 201
№11783,外交部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朝鲜战争及停战谈判
1966 年 8 月 9 日 …… 208
№10254,伊瓦舒京致苏共中央联络部报告:美国人认为越战对苏联有利
1966 年 8 月 23 日 …… 212
№25716,伊利切夫与张德群会谈纪要:抗议苏联驻华使馆遭受中国人围攻
1966 年 8 月 26 日 …… 214
№10402,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关于加强对中国的科学研究
1966 年 9 月 1 日 …… 214
№25474,中国外交部的照会:关于使用北京—莫斯科航线
1966 年 9 月 21 日 …… 217
№25470,外交部东南亚司的报告:越南劳动党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态度
1966 年 10 月 17 日 …… 217
№25951,外交部远东司的报告:蒙古与亚非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1966 年 10 月 21 日 …… 218
№25717,苏达利科夫与张德群会谈纪要:苏联使馆遭到围攻和侮辱
1966 年 10 月 27 日 …… 226
№25475,中国外交部的答复照会:关于苏联大使馆周围的反苏骚乱
1966 年 11 月 1 日 …… 227
№25482,马耶夫斯基致苏达利科夫函:关于中国中苏友协代表团的访问
1966 年 11 月 26 日 …… 228
№25546,谢尔比纳致杰米切夫函: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和红卫兵组织的比较
1966 年 11 月底 …… 229

№25705,1966 年中国官员关于苏联和苏共的一些言论
1966 年 12 月 …… 229
№25471,波诺马廖夫的报告：匈牙利驱逐中国留学生
1966 年 12 月 1 日 …… 231
№25547,苏达利科夫与安致远会谈记录：《中国画报》发表的反苏文章
1966 年 12 月 2 日 …… 232
№25668,苏联驻朝鲜大使馆的报告：中朝关系发生了实质性变化
1966 年 12 月 2 日 …… 233
№25548,梅夏采夫致苏共中央报告：在苏联放映关于中国"文革"的纪录片
1966 年 12 月 6 日 …… 236
№25472,希特罗夫的报告：罗马尼亚与中国的关系
1966 年 12 月 12 日 …… 237
№20834－1,苏共中央全会会议记录：勃列日涅夫关于苏中关系的报告
1966 年 12 月 12 日 …… 238
№22988,苏共中央全会会议记录：库纳耶夫关于中国在新疆反苏活动的发言
1966 年 12 月 13 日 …… 283
№22989,苏共中央全会会议记录：乌苏巴里耶夫关于中苏边界问题的发言
1966 年 12 月 13 日 …… 289
№22986,苏共中央全会决议：苏联对外政策与苏中关系
1966 年 12 月 13 日 …… 293
№25980,香港邮寄商品公司致外交部函：希望与苏联建立贸易关系
1966 年 12 月 20 日 …… 294
№25554,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报告：关于中国对苏广播的规模
1966 年 12 月 24 日 …… 295
№25555,邦达连科致苏共中央报告：西方广播中的"文化大革命"与苏联
1966 年 12 月 26 日 …… 296
№10403,苏共中央政治局决议：加强对中国无线电广播的措施
1966 年 12 月 28 日 …… 297

1967 年

№25718,外交部远东司的报告：关于 1966 年的中美关系
1967 年 1 月 10 日 …… 299
№25478,国防部的报告：关于中国对社会主义国家武官的态度
1967 年 1 月 12 日 …… 300
№25484,外交部远东司的报告：关于大批中国驻外机构人员被召回国

1967 年 1 月 20 日 ········ 300
№25704,中国大使馆的照会：关于中国学生在列宁墓附近的遭遇
1967 年 1 月 25 日 ········ 301
№25721,谢米恰斯内致葛罗米柯报告：关于中国留学生在列宁墓附近的活动
1967 年 1 月 25 日 ········ 301
№25975,外交部远东司的报告：苏联在香港问题上的立场
1967 年 2 月 3 日 ········ 302
№25707,苏联政府的声明：抗议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受到围攻
1967 年 2 月 4 日 ········ 303
№25738,费留宾与越南等国驻苏代表会谈纪要：通报苏联驻华使馆被围攻情况
1967 年 2 月 4 日 ········ 304
№25710,拉兹杜霍夫发自北京的高频电报：中国外交部的重要通告
1967 年 2 月 6 日 ········ 305
№25959,萨姆萨利耶夫致吉尔吉斯党中央函：加强中苏边境地区军事教育工作
1967 年 2 月 15 日 ········ 305
№25962,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决议：加强对华无线电宣传的措施
1967 年 2 月 16 日 ········ 308
№25723,苏联驻中国大使馆整理的材料：1967 年 1 -2 月中国的反苏运动
1967 年 2 月 25 日 ········ 309
№25483,外交部远东司的报告：关于中国的“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
1967 年 3 月 1 日 ········ 312
№25961,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决议：加强中苏边境地区的群众性保卫工作
1967 年 3 月 2 日 ········ 313
№25677,外交部远东司的报告：朝鲜与中国关系开始疏远
1967 年 3 月 7 日 ········ 316
№25974,丘季诺夫的报告：香港的政治经济状况
1967 年 3 月 14 日 ········ 318
№25976,纳西诺夫斯基致苏达利科夫函：在澳门的华人难民问题
1967 年 3 月 22 日 ········ 322
№25726,外交部远东司的报告：现阶段中国的对外政策及领导人的对外活动
1967 年 3 月 28 日 ········ 325
№25977,别谢金致利哈切夫函：与香港国泰航空公司进行商业合作
1967 年 5 月 ········ 325
№25978,利哈切夫复别谢金函：同意与香港航空公司进行商业合作
1967 年 5 月 29 日 ········ 326

№25979,阿扎鲁什金的报告：关于香港骚乱事件
1967年6月10日 …… 327
№25982,丘季诺夫的报告：香港事件的发展态势及英中关系
1967年8月3日 …… 329
№25620,诺维科夫与李周渊会谈纪要：中国对朝鲜的供应急剧减少
1967年9月25日 …… 333
№25729,外交部远东司的报告：中国的对外关系陷入困境
1967年11月5日 …… 334
№25719,利哈乔夫致费德林函：驻华使馆收集中国情报遇到困难
1967年11月20日 …… 335
№25720,利哈乔夫致多勃雷宁函：加强对中国情报的收集和分析
1967年11月20日 …… 335
№25728,外交部远东司的报告：加强对中国情报收集和反宣传工作
1967年11月28日 …… 336

1968年

№10686,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关于针对中国问题的宣传措施
1968年2月28日 …… 338
№10404,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与兄弟党协调关于中国问题的宣传和研究
1968年3月12日 …… 339
№10257,苏共中央给驻外使馆的指示：加强援越反美的舆论宣传工作
1968年4月5日 …… 340
№22993,苏共中央全会会议记录：勃列日涅夫关于中国问题的发言
1968年4月9日 …… 343
№22994,苏共中央全会记录：格里申关于勃列日涅夫报告的发言
1968年4月9日 …… 346
№22991,苏共中央全会决议：国际局势与国际共运的团结问题
1968年4月10日 …… 349
№25772,外交部致中国大使馆照会：在越南的苏联专家受到中国军人迫害
1968年5月12日 …… 351
№25771,李强给拉兹杜霍夫的通报：苏联援越物资转运任务全部完成
1968年7月22日 …… 351
№10405,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关于出版和发行王明的著作
1968年12月4日 …… 352

1969 年

№10406,苏共中央政治局决议：七国兄弟党中央国际部代表讨论中国问题
1969 年 1 月 21 日 …… 353
№01843,切谢夫与巴杜拉谈话记录：越南局势和中国对柬埔寨的帮助
1969 年 1 月 23 日 …… 355
№10256,佐林与春水、陈宝剑谈话纪要：越美和谈的进展和前景
1969 年 2 月 21 日 …… 357
№10282,苏联政府致兄弟党政府的情况通报：中国在珍宝岛的军事挑衅
1969 年 3 月 8 日 …… 360
№22892,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中苏边界冲突及越南和谈问题
1969 年 3 月 11 日 …… 362
№25956,梅尔库洛夫致吉尔吉斯党中央报告：加强边防军战斗准备的问题
1969 年 3 月 24 日 …… 366
№10463,苏联政府致中国政府照会：关于苏联援越物资过境问题
1969 年 4 月 …… 367
№10277,苏联政府致中国政府照会：中国为苏联援越物资过境设置障碍
1969 年 4 月 …… 368
№22894,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巴黎会谈及中美关系
1969 年 4 月 2 日 …… 369
№25955,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决议：加强中苏边境地区的政治教育
1969 年 4 月 3 日 …… 373
№25957,吉尔吉斯奥什州委决议：落实在中苏边境地区加强政治教育的决议
1969 年 4 月 16 日 …… 375
№10407,苏共中央政治局决议：加强中国学的研究队伍和科研工作
1969 年 4 月 28 日 …… 376
№10408,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关于巩固苏联在香港阵地的一些措施
1969 年 5 月 13 日 …… 378
№22347,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宣传措施计划
1969 年 5 月 28 日 …… 378
№22895,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越南问题及中苏冲突
1969 年 6 月 11 日 …… 385
№20841,苏共中央全会会议速记：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报告和决议
1969 年 6 月 26 日 …… 393

№16678

库兹涅佐夫与帕夫洛夫斯基谈话记录：关于向中国提供武器

（1964 年 12 月 12 日）

摘自 B. B. 库兹涅佐夫的工作日记
1964 年 12 月 12 日
第 03525/ГС 号

绝　密
文本第 6 份

与捷克斯洛伐克驻苏大使帕夫洛夫斯基同志的谈话记录

1964 年 12 月 12 日

应 O. 帕夫洛夫斯基同志的请求接见了他。

大使说，大使馆受布拉格委托，通报关于在莫斯科咨询捷克斯洛伐克武器供应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

接着，大使告知如下：从 1955 年开始，捷克斯洛伐克供应给中国军用物资和军事装备，其中包括米格－15 战斗机、伊尔－14 运输机及其他武器，和供这些军事装备用的备件。从 1961 年开始，捷克斯洛伐克供应给中国军事装备，除了备件外，其他已中断。

目前，中国人除了关注苏联方面早先通知捷克斯洛伐克供应他们的 T－55 型坦克外，已转向要求供应他们普通的射击武器(步枪、冲锋枪、机关枪等)。由于自 1961 年起，捷克斯洛伐克不再供应中国这类武器，所以捷克斯洛伐克同志要向苏联政府咨询中国的这个建议。

在谈到解决这个问题时，大使要求考虑目前捷克斯洛伐克出售射击武器给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如奥地利、阿拉伯东方国家、非洲国家等。如果正面解决中国的要求，中国人准备提供给捷克斯洛伐克目前在资本主义国家购买的原料。

询问大使，从捷克斯洛伐克供应武器给中国有多大规模的问题。

大使回答说，关于这个问题迄今未知。

大使答应立即将这个问题报告政府。

参加谈话的有苏联外交部第四欧洲司二等秘书Я. Ф. 波列佩契诺夫同志。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В. 库兹涅佐夫(签名)

АВПРФ，ф. 5，оп. 30，п. 107，д. 451，л. 163

№20776－1

安德罗波夫致苏共中央函：关于向毛泽东祝贺生日的方式

(1964年12月15日)

苏共中央同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部关于向毛泽东贺寿的报告

1964年12月15日

机　密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

1964年12月26日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志71岁生日。

在毛泽东65岁和70岁生日之际，苏共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给他发了问候。贺词刊登在苏联的报刊上。

1960年和1962年驻中国苏联大使，受苏共中央委员会委托，被容许拜访毛泽东并转达苏共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对他的口头形式的祝贺。

在当前的情势下，以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共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名义给毛泽东同志发去祝贺其生日的简短问候是适宜的。

这件事在报刊上是不可能报道的，特别是在中国没有纪念领导人生日纪念日的，并且在报刊上没有刊登过任何这方面的情况。

附送上苏共中央委员会决议草案、贺词和给苏联大使的指示。[①]

苏共中央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部部长

Ю. В. 安德罗波夫

РГАНИ，ф. 3，оп. 16，д. 593，л. 61

---

① 参见以下文件№20776。——编注

№20776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祝贺毛泽东生日

(1964年12月23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4年12月23日会议

第183号记录第61项

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向毛泽东祝贺其生日”的决议

1964年12月23日

绝 密

(决议的准备和起草人是Л. И. 勃列日涅夫、А. Н. 柯西金、Ю. В. 安德罗波夫、А. А. 葛罗米柯。)

一、同意给毛泽东同志的贺词(见附件)。

二、同意给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的指示(见附件)。

附件一:

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志

北京

亲爱的毛泽东同志:

在您生日到来之际,苏共中央委员会谨向您致以热忱的祝贺,祝愿您健康长寿。我们真诚地祝愿伟大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新的胜利,实现国家的繁荣昌盛。①

我们希望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苏联和中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之上,及在莫斯科会议的宣言和声明的基础之上,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致以党的崇高的问候!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Л. 勃列日涅夫

① 此处在校订贺词时删去了下面的一段话:“我们非常高兴地注意到您的多次讲话——为了不让帝国主义者对我们的分歧感到高兴而有加强团结的必要性,主要的是我们是团结一致的。”(РГАНИ,ф. 3,оп. 16,д. 539,л. 59)。——原注

附件二：

北京

苏联大使：

请在12月25日拜访毛泽东同志，并把生日贺电转交给他(或是他所指定的其他人)。

如果您受到毛泽东亲自接见，则在会谈时请说出消除分歧和苏中关系正常化的希望。请强调指出，对于毛泽东同志近来的多次关于为了不让帝国主义者对我们的分歧感到高兴而有团结的必要性和关于主要的是我们是团结一致的讲话，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此非常重视。请说出尽管形势复杂了，考虑到条件的变化，但还是可以一步一步地朝着改善我们两党和两国关系的道路迈进。

请呈报完成情况。

РГАНИ，ф. 3，оп. 18，д. 309，л. 67，119，120

1965 年

№20777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苏中关系正常化的措施

（1965 年 1 月 14 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 1965 年 1 月 14 日会议
第 187 号记录第 65 项

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关于苏中关系正常化措施”的决议

1965 年 1 月 14 日
绝　密

（决议的准备和起草人是 Л. И. 勃列日涅夫、М. А. 苏斯洛夫、Ю. В. 安德罗波夫、Б. Н. 波诺马廖夫。）

1. 赞成外交政策委员会根据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上所说的意见而提出的建议，并以此为基础来探讨、研究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具体措施（见附件）。

2. 认为由 Л. И. 勃列日涅夫同志和即将参加华沙条约政策咨询委员会大会的兄弟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在谈话中就同中国关系正常化形成的有关措施同他们交换意见。

附件：

苏共中央外交政策委员会关于苏中关系正常化的报告

1965 年 1 月 7 日
绝　密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

苏共中央委员会 10 月中央全会之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使中苏两党之间和中苏两国

之间的关系正常化(停止在苏联报刊中的公开争论、建立同中国共产党代表的联系、就国家间一些个别问题做出有益的决定)。

然而，在1964年11月间，苏共和中共代表团之间举行的会见和谈话中，中国的代表没有对改善同我们党和国家的关系有任何准备，回绝了我们关于停止公开争论的建议，拒绝讨论与召开起草会议和共产党与工人党会议有关的问题，也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克服分歧的建议。

中国领导的下列行为(刊登《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的文章，转载来自阿尔巴尼亚、印度尼西亚和其他来源的反苏联的材料，中国代表在国际组织中的党团活动)表明这一时期中国领导人是不会尽力利用新的形势来改善同我们党的关系。所有迹象表明，赫鲁晓夫同志下台和中国原子武器试验成功之后，中国领导人试图"以实力"处理同我们党和国家的事务。

中国领导人对苏联共产党施加压力，来迫使我们重新审视我们的内外政策的原则基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要使苏联和美国及其他西方强国的关系尖锐化，尽管他自己巴结一系列资本主义强国。同时，他们还极力离间苏共和其他社会主义兄弟党的关系，所有这些是为了自己的目的，即尽力利用一些党的调和政策的态度来最终把自己的路线强加于共产主义运动。

但是，彻底的两国政治路线关系的正常化和逐步调整同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分歧的方针，显然应该是当前我们对中国政治关系的主要方针。在10月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会之后进行的、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接触的尝试说明，在克服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困难和苏中两党关系正常化的斗争中，不能认为存在一下子解决所有问题的可能性。所以，在近5—7个月时间内，以合适的方式，实施一系列措施来达到掌握主动权并逐步得到缓和同中国共产党关系的紧张状况和苏中关系正常化。当然，实现这些措施需要加强苏共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西欧、亚洲、非洲、美洲资本主义国家的统一工作，以便不给中国领导人利用我们改善苏中关系的意愿的机会来动摇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性。

就我们意见来说，考虑到中共中央委员会的观点，在现今不应集中注意这样的问题，即我们的分歧所导致的尖锐性问题，而应强调在为和平而斗争和反对资本主义的基础之上的共同任务。同中国共产党国家的关系(互相交流信件、会谈、会见)适当表现出主动性、提出改善经济和科学技术合作，提出国家间关系正常化，同时就这些问题一个接一个地提出具体的建议。

如果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接受我们的建议，这将符合两国人民和所有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如果这些建议被拒绝，则在所有的共产主义运动面前表明，中国领导人将承担分歧和加深共产主义运动的困难的责任，显示自己的观点的软弱无力。

这些步骤甚至允许苏共巩固自己同那些试图担当"调停人"(罗马尼亚工人党和其他党)作用的共产党的关系中的地位。我们在表现出改善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良好愿望的同时，要使把我党变成克服共产主义运动困难的敌人的企图变得困难，要阻止把加深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的责任强加在苏共身上的企图。

当然，有关我们改善同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的步骤应当通报给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共产党运动的领导人。为此，可以利用即将在1965年1月召开的华沙条

约组织政策咨询委员会代表大会(的机会同他们)会面。

加强同那些摇摆不定的共产党的关系,甚至加强我们同支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那些共产党关系的措施都具有特别意义。这些党的领导人在苏共中央委员会10月中央全会之后,表现出利用已经形成的局势来改善同我们党和国家的关系的很大兴趣。同这些党的关系的正常化甚至能为克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困难提供有力的帮助。

提出建议后,同时制定出措施,来反对中国领导人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及在国际组织中建立的集团和采取的分裂活动。另外有必要在我们党内进行解释性的工作。

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决议草案见附件。

M. 苏斯洛夫
Ю. 安德罗波夫
Б. 波诺马廖夫
Л. Ф. 伊利切夫

附件:

苏共中央对外政策委员会关于苏中关系正常化措施的建议

1. 苏联政府应致信中国政府,提出在1965年的1 2月间在北京或者在莫斯科举行政府首脑会见的建议。信中可以建议讨论苏中政府间的关系,其中包含发展经济、商贸、科学技术和文化关系,甚至可以就我们两国政府在国际舞台上的行为达成最大限度的一致,从而达到更加有效地反对帝国主义者的侵略行径的目的。

引证在莫斯科的11月的会见是有益的,并在此过程中,双方都承认逐步使苏中关系正常化是必要的。苏中两国领导人的会见将可能是朝此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

委托苏共中央委员会联络部和苏联外交部起草信件文本。

2. 依据第一点在实施过程中所得到的结果,提出恢复1963年7月[1]中断的关于党的路线的双方会谈的建议,从而有机会讨论消除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

3. 不管中国政府对于我们提出政府首脑会见和进行双方谈判的信件如何答复,我们都将继续实施以恢复苏中关系为目的的步骤:

(1) 根据苏联外交部的路线,简短地向中国方面通报葛罗米柯同志和约翰逊与腊斯克会谈的内容。[2] 利用这些机会,向中国方面建议恢复交换外交政策信息的做法,甚至可以提

---

① 1963年7月5日,中苏双方在莫斯科开始举行关于计划讨论两党关系问题的会谈,但是最终北京和莫斯科交换的《公开信》,双方口气异常尖锐,导致谈判失败。经过两周后的相互指责,7月20日根据中共代表团的提议,双方对此发表了一项联合公报,谈判中断。此后,双方在党的路线方面没有再重新恢复谈判。——编注

② 这里所谈的是苏联外交部长 A. A. 葛罗米柯同美国总统 Л. Б. 约翰逊和美国国务卿 Д. 腊斯克的谈判的背景即是在越南的军事冲突在扩大。给自己亲近的同盟者通报有关苏联外交政策的实践是苏联共产党政府的 ·个政治特点,这是从1950年后半期开始的。从1963年开始,莫斯科把北京从得到上述情报的名单中剔除。——原注

出两国政府在国际舞台上就一些重要问题采取一致行动的建议。

(2) 在苏中两国1965年缔结有关商贸、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方面合作议定书和计划的谈判之时，责成外交部、苏联对外贸易部、苏联部长会议国家经济联络委员会、苏联部长会议国家科学研究工作协调委员会、苏联部长会议国家文化联络委员会发展和扩大在这些领域内的苏中关系的事务。

供应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商品、军事物资和提供非公开选题范围的文件资料，在任何情况下都需要得到苏共中央委员会的特别同意。

在1965年我们两国之间商品流通的议定书谈判期间，提出扩大流通重要性的建议，其中包括这是长期协议的基础。委托苏共中央与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合作部和苏联对外贸易部向苏共中央委员会提出在1965年发展苏中贸易的意见。

在1965年1—2月举行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会议，在会上提出扩大苏中科学技术联系的重要性的建议。

(3) 现在不要在中方面前坚持尽快解决边界线划定问题，而应加强谈判的准备工作。为此，委托苏联外交部、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防部一起，再次仔细研究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所存在的边界线问题，确定边界可能性的方案。

(4) 以苏联最高苏维埃的名义向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在1965年双方议会代表团互访的建议。

4. 既然克服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分歧直接触动了兄弟党，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党的利益，那么就有必要在举行同中国共产党领导谈判前举办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的咨询会，以便使他们完全理解我们的观点。这可以通过相互交流信件的方式进行，甚至也可以在1965年1月的华沙条约组织的政策咨询委员会的工作会议上进行。

5. 苏共中央委员会国际部研究我们在国际组织中的代表所准备行动的措施，也就是防止同中国代表在这些组织中发生不希望发生的公开冲突的可能性。在反对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政策的斗争中、在一起公开发表维护世界和平与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宣言中采取一致行动。如果中国代表对苏联的外交内政进行攻击，则应该平静地以多种方式对这些攻击的实质给予回击。

6. 委托苏共中央国际和意识形态部，向中央委员会准备并提交刊登在中央报刊的文章，在文章中，根据实际计划表明我们在论战中所持的基本的理论和政策方面的观点。

这些资料的精神今后将刊登在中央报刊(《真理报》、《共产党人》)上，限制其他报纸从这些出版物中转载。

要有系统地在苏联的定期刊物和广播中刊登、播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内生活和外交政策。这些情况应纳入情报计划中。

7. 中苏关系的恶化使我国研究中国的工作萎缩了，甚至刊登中国的作品也大大减少了，不能认为这是正常现象。应该委托苏共中央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部与意识形态部共同研究，如何改善研究中国的工作和保证出版中国书籍的有效措施。

8. 鉴于1965年2月14日是《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15周年纪念日，因此委托苏共中央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部和苏联外交部，在1965年1月向苏共中央委员会提出关于值此周年纪念时机所要采取措施的建议，并预先制定一定高规格的措施。

9. 委托苏共中央办公厅向苏共中央委员会报告党组织准备和提供公开的苏共关系状态的信息，报告苏共中央委员会及苏联政府为这些关系正常化所着手实施的措施的信息。

10. 在实施苏中关系正常化措施的同时，应该调整同朝鲜劳动党和越南劳动党的关系。委托苏共中央办公厅在1965年1月就此问题提出具体的建议。

11. 我们在公共线路上恢复同阿尔巴尼亚联系的尝试，到目前为止没有得到效果。但是，不要放弃积极的行动，要在两国政府间寻找同阿尔巴尼亚关系正常化的途径。应该邀请阿尔巴尼亚代表实际体验在苏联所实施的各种不同的国际主义措施(文化的、科学的、体育的，等等)。

甚至还可以通过驻阿尔巴尼亚的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向阿尔巴尼亚政府提出双方互换外交代办的可能性问题，以作为苏阿关系正常化的第一步。委托苏联外交部提出合适的建议。

12. 在近期向蒙古人民共和国派遣一个以中央委员会书记为首的党务工作者代表团来交换经验，加强我们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是必要的。

蒙古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曾在1957年访问苏联，而我方至今没有回访，虽然蒙古的同志多次提出这个问题。

委托苏共中央办公厅和苏联外交部在1965年1月就此问题准备好建议。

第187号记录第65项

РГАНИ，ф. 3，оп. 18，д. 316，л. 22，31 - 34；оп. 16，д. 610，л. 116 - 118，120 - 123

№20778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给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信

(1965年1月14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5年1月14日会议

第187号记录第65项[1]

① 记录是由领导苏共中央总务部的B. H. 马林整理。——原注

1. 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同志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同志的信以及柯西金同志给周恩来的信的草案。

关于柯西金给周恩来的信。

波德戈尔内同志：未必有必要寄送。

勃列日涅夫、谢列平、柯西金、苏斯洛夫同志：赞成寄送。

寄送柯西金给周恩来的信。

关于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同志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同志的信

从华沙回来之后进行的讨论。①

柯西金同志：我赞成派遣党政代表团去中国。

关于起草委员会——取消赫鲁晓夫所期望的在国际运动中的羁绊，例如，中国依赖自身的力量，而这对我们来说是不好的。

召开会议以代替起草委员会，这对我们的威信没有任何打击。如果召开起草委员会会议则只能讲讲某某规则——我们没有表现出自信心。期待在我们党内有真正的联系。

给代表团这种权利以支持华沙会议。

米高扬同志：关于3月1日(会议)② —如果我们取消，则涉及我们的威信，会造成我们是在发号施令的印象。

我想，3月1日照常举行，同时指出——应当停止公开争论并要求(提出)专业意见。

我们使中国人处于自我保护的境地。

这时代表团出访的问题变成了另外一个计划，即两党代表在此会见的计划(在1965年的5月或稍晚的时候)。

不必派遣党政代表团。或者政府代表团。也不要派遣勃列日涅夫同志前往。

苏斯洛夫同志：有关3月1日会议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不能再失去朋友了。在1964年10月就曾出现过困难，之后我们通过大量的工作才克服这些困难。

我们将坚持还是放弃我们自己的观点。如果我们将起草委员会会议改期，那么我们将会处于困难的境地。

寻求同中国改善关系，但不能(为此)失去更多的朋友。

建立起草委员会是否合适——不合适。但这对我们有压力。召开、讨论，就如同正常那样做，目的就是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参加到会议中来。那时就不对所有的党提出建立起草委员会和听到来自所有党的呼吁。而提出建议——停止公开争论。

代表团——党政代表团就不要派遣了。

波德戈尔内同志：建立同中国的友好关系不是靠降低我们的威信来得到的，不仅赫鲁

① 所指的是苏联代表团出席1965年1月19—20日在华沙举行的华沙条约组织政策咨询委员会会议。——原注

② 括号内的文字均为俄国公布该档案时编辑所加。下同。——编注

晓夫执行这条路线,我们也同样。

仅仅是取消召开会议的呼吁。我们会失去很多朋友。

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指柯西金),请你重新评估一下我们同中国关系问题所引起不安的所有的内容。

应当在华沙谈谈如何更好地进行会议。

关于政府代表的到达——大概不早于3月1日是合适的。

关于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同志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同志的信。

勃列日涅夫同志:召开起草委员会对我们是有害的,但问题却是存在的。

分歧直至起草委员会的和其他分歧的存在,多年来,他们觊觎远东沿海地区,他们在党内实施分裂路线。中国人的快速侦察在1964年10月时曾有过:他们可不可以推翻(苏共)代表大会的决议。

如果进一步深入,则问题所引起所有不安的内容——并没有改变我们的路线和我们对中国的关系,我们也没有做出让步。

难道你们没有看到(中国人的)目的?

中国人能够(进行)欺骗,利用(这些)来达到离开共产党。

寻求同中国改善关系,但不要以让步为代价。

关于代表团——估计不会得到成功,相反我们会打自己的嘴巴。

这里要小心。

不要接受任何决定。

限制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交换意见。

关于代表团去越南民主共和国[①](勃列日涅夫同志、米高扬和波利扬斯基)。以柯西金同志为首的代表团在途经中国时进行停留。

谢列平同志:26个党的"起草委员会"名称本身是来自赫鲁晓夫的称呼。

在很多方面我同意波德戈尔内、苏斯洛夫和米高扬等同志的意见。

波诺马廖夫同志:3月1日(的会议)召集所有愿意来参加的人,来准备给81个党的准备会议提出呼吁。延期——不理解。

波利扬斯基同志:而如果只有40个党来,则把代表分开来准备会议。

安德罗波夫同志:主要的区别是——召开3月1日(的会议)将不进行资料的准备工作而是进行会议的准备工作。

延期3月1日(的会议)不是那么简单。

---

① 苏联代表团去越南两个主要的目的是:政治、经济的积极民主化和在军事冲突扩大以及美国积极参与其中的条件下支持河内的局部战争,改善党际之间的关系,因为越南劳动共产党这些年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许多问题都一直申明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策。6—10日访问越南,同时在去河内的途中和返回途中的2月5—6日和10—11日在北京做了停留。柯西金A. H.同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进行了谈判,但却无果而终。——原注

格里申同志：中国人将反对会议(无论是17个党、26个党，还是38个党召开的会议)。改变是不可能的。我们想改善关系，他们想在我们拒绝自己的观点的基础之上来改善关系。3月1日(的会议)——这不仅仅是我们的问题。

谢列斯特同志：改善关系不依赖原则性的观点。召开3月1日(的会议)，3月1日之前不去北京。

基里连科同志：派遣党政代表团，就是解决起草委员会和三月会议这个绊脚石的问题。

在我们这一方确实如此。

今天，考虑到新的方案，并让柯西金同志进行分析审查。

柯西金同志：交换意见是有益的，问题使党的每个成员感到不安。

关于派遣政府代表团——3月1日之前不会出发。

柯西金同志：不要取消党政代表团问题。

每一次的谈判——就是一次让步。我不同意。

分歧是存在的，没有任何人认为他们不存在。

不同意赫鲁晓夫所期望的一切都是不可动摇的，所有的都没有变化。这方已经发生变化了。

任何人都没有意见即是党是支持我们的。

州委还在等待什么？(波德戈尔内)

柯西金同志：等待在原则问题上的让步还是丧失威信——从来没有人这样考虑过。

我没有看到召开起草委员会的好处。

我赞同勃列日涅夫同志的建议。

谢列平同志：既然说毫不让步，我不反对召开3月1日(的会议)，但我不同意的是，为什么会在代表大会上提出阿尔巴尼亚问题[①]？

关于专家问题——尽快召回。

为什么我们不想承认？

我赞同勃列日涅夫同志的建议。

勃列日涅夫同志：我们进行了讨论这个很好。我们的这次会议同赫鲁晓夫时期的会议是有区别的。赫鲁晓夫在外交方面做了很多有害的事：阿尔巴尼亚问题、莫洛托夫集团和有关斯大林问题。

柯西金同志的关于给北京的信从议事日程中取消。

关于去越南，由柯西金同志在去(越南的)路上准备到北京会见的材料。

原则上赞同有起草委员会发出给兄弟党的信。

РГАНИ，ф. 3，оп. 16，д. 949，л. 22－25об

① 这里所谈的是1961年十月苏共二十二大提出讨论的苏阿关系问题的Н.С.赫鲁晓夫的决议。这个事实是Н.С.赫鲁晓夫没有征求任何人意见而遭到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领导人在其“党内”代表大会上的尖锐的公开的批评，这引起了多数共产党的抗议，并建议不能用这种方式来解决出现的问题。

№25559

契尔沃年科与刘晓会谈纪要：关于苏联参加第二次万隆会议问题[1]

（1965 年 1 月 14 日）

刘晓向契尔沃年科 C. B. 递交了中国政府对 1964 年 11 月 21 日苏联照会的答复。

……亚非国家代表大会是亚非国家领导人的大会，而正如大家都承认的，苏联是一个欧洲国家，而不是一个亚洲国家或者非洲国家，因此它没有任何根据参加亚非国家首脑会议。

……接着照会中讲到其他国家也反对苏联参加大会，因为苏联不是 1955 年的代表大会参加国，“预先决定苏联无权参加亚非国家代表大会”、“我们的立场是一贯的不可改变的”。

照会中又说，苏联的立场变化多端，即过去不想参加，而现在想参加：

“我们有资格问一下，苏联政府采取这样的立场，怎能取得大家的信任？”

“苏联无权参加，这是一个原则问题。”

契尔沃年科指出，苏联是一个亚洲国家，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刘晓说：“我们认为，如果苏联真正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反帝斗争，不一定要参加这次代表大会，还有支持斗争的其他机会，并且我们认为，如果苏联继续提供这样的支持而不参加这一会议的话，会更好一些。”

在这一问题上，刘晓解释说，他谈论的是他个人的意见。

……

АВПРФ，ф. 0100，оп. 58，п. 516，д. 5，л. 14－19

№20779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与中国领导人会谈

（1965 年 1 月 28 日）

绝　密

……[2]

①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② 档案以上内容未公布。——原注

5. 委托代表团利用可能的机会，在北京会见周恩来或其他中国政府领导人，来交换有关苏中关系中的一些问题和国际局势的意见。这些主要依据 1964 年 12 月 3 日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所通过的，关于苏中关系正常化问题的记录中的意见、说明(附件四)。

附件四：

同中国政府领导人就两国政府关系问题交谈的材料

绝　密

应该指出的是，1964 年 11 月在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访问期间，苏联领导人和中国代表团之间进行了有意义的关于一些重要问题的意见交换。正如我们所了解的那样，双方都意识到，有必要努力使苏中关系逐步正常化。

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认为，为克服我们两党之间的分歧所做的和将要作出努力的同时，现在重要的是讨论促进改善苏中两国政府关系的措施。

在同周恩来或其他中国政府领导人谈话过程中，试探他们对新的更高一个层次的会谈的态度。这是为了讨论恢复苏中两国政府间的关系问题，甚至是为了交换国际形势问题的意见的问题。

通知中国同志，有关苏共中央委员会关于贯彻苏共 10 月中央全会和 11 月中央全会决议的行动。谈谈有关苏共中央委员会所采取的关于联合工业和农业州委党的措施，有关准备采取完善国民经济的管理和提高农业经济生产的措施。通报有关苏共中央委员会所采取的，克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困难的措施、有关工作和华沙条约政策咨询委员会的决议，甚至还可以通报有关近期苏联所采取的重要的外交政策战略。

通报中国同志，有关苏联代表团去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目的，使他们产生对印度支那半岛局势问题的思考的兴趣以及对将来社会主义国家共同努力奋斗，反对美国对这一地区的侵略问题思考的兴趣。

一、我们可能主动提出的问题

关于贸易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关系

我们认为近几年来苏中的贸易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关系交流严重减少是不正常的。接下来应当说明存在的一系列的严重缺陷，在实践中存在的那些不足，这些活动是在国家间协商所得的结果。这种情况不符合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利益。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在 1959 年我们两国的贸易额为 18.5 亿卢布，而在 1964 年同期为 4 亿卢布，也就是说下降了 3/4 多。对比这两组数据就非常清楚地表明，在我们两国之间的经贸关系领域的事务进行得令人很不满意。像这样的经贸联系的缩减不仅不符合我们两国发

展经济的任务,而且也不能不对全世界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体系造成负面影响,并给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带来额外的好处。毫无疑问,在最初的完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发展我们的经贸联系,是我们两个政府间关系中的一个迫切任务。

当然,在近几年商品外贸结构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都发生了变化,建立同第三世界国家这样或那样的经济联系,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对我们国家另外的要求。但在双方的意愿下,是能够找到很大的可能来尽快恢复苏联和中国广泛的商贸关系的。

1965 年中苏两国在莫斯科开始了商贸谈判。我们希望根据两国利益,尽最大可能的方式增加贸易额。

例如,无论是苏中缔结普通的长期商贸协议,还是某一类商品贸易协定,都将在发展商贸联系中具有重要意义。在这些协议中可以预见以后几年的相互供应的广阔前景,从而为后来发展贸易建立更加牢固的基础。

在国际资本主义市场协调我们两国的商业活动和交换对外经济信息是发展我们经济合作的重要措施。苏联一方应该提出合适的建议,或许我们值得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苏联方面准备研究苏联与中国在相互发展的基础上扩大科学技术和文化合作的问题。至于在这些领域内的扩大合作问题的具体计划,可以在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的定期会议上进行研究,我们提议,在 1965 年 1 月开始这项工作,也就是在即将举行的 1965 年文化交流计划谈判时进行研究。

根据情况,允许代表团同中国领导人谈话时谈及中国政府以前所提出的关于向中国提供 T-55 型坦克请求的问题。可以告诉他们,苏联政府没有改变以往的希望扩大同中国进行合作的愿望,现在准备考虑向中国提供 T-55 型坦克的问题。

有关在国际舞台上协调苏中之间的行动

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反对由帝国主义发动的世界大战的威胁和为世界和平事业的胜利而奋斗的努力是必要的,并且共产主义也要求我们两国在国际政治领域采取一致行动。

以前,苏联和中国政府广泛地协调各自的国际政策战略,在国际舞台上相互支持。在我们之间存在着就重要的国际问题相互协商和正常的信息互换。所有这些在社会主义国家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维护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

然而,近几年来,在国际舞台上和在国际民主组织中,我们之间的行动协调遭到了破坏,咨询和交换信息实际上是停止了。由于这样,苏联和中国在国际事务中采取的行动往往不能协调一致,这给我们的共同事业带来了很多的损害并可能削弱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革命运动。

我们认为,由于我们共同事业的利益而有必要采取保障协调我们两国在国际政治领域行动的措施,并为此目的在苏中友好、联盟、互助条约框架下恢复实际的咨询和相互交换信息的措施。这样的咨询将会及时预防发生许多误会和将会大大促进我们两国关系的改善。

有关不容许有相互攻击的公开论战和言论

如果在同中国代表交谈中涉及有关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论战问题,则说,工人阶级的国

际主义利益、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特征和苏中友好、联盟、互助条约的精神都要求我们两国不容许有相互反对对方的公开论战和言论。苏联方面将采取措施，不采取这样的行动，不刊登这样的言论。

我们再一次建议达成有关不容许有攻击对方的公开论战和言论的协议。这将改善苏中关系整体氛围，有利于巩固我们的团结。

有关苏中高层代表的会见

可以高兴地指出这样的事实，即最近几个月来，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活动家之间的联系已经恢复。我们认为，1964年11月，苏共和苏联政府领导人与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党政代表团成员之间所进行的意见交换是有益的。我们当时提出了有关进行双方高层会见的建议。中国代表团对此原则上持积极态度。

在1964年11月形成的扩大交流的意见中，我们建议你们举行苏中双方高层代表会见，以便探讨涉及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和合作等问题。

会见将可以作为相互理解的成果的一个良好基础，并逐步推动我们两国之间友好的同志关系的恢复。如果中国方面原则上同意，则这样的会见可于近期在莫斯科或者北京举行。

二、可能由中国方面率先提出的问题

苏中关系中存在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由我们首先提出未必合适。同时，中国方面也有可能提出这些问题。如果这些问题被提出，则在交谈中可以根据下面表述来进行。

有关召开起草委员会和兄弟党会议

如果在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的谈话过程中涉及起草委员会和兄弟党会议时，则像同周恩来在莫斯科会见时所谈的那样，甚至可以根据1964年11月24日所转交的信件作出表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准备继续向中国和其他兄弟党的同志就准备会议的形式和方法等相关问题征求意见。对中国同志来说，我们把即将在3月1日举行的、同兄弟党代表的会晤看作是协商会议的准备工作。我们所指的是，在这次会晤中可能要求所有兄弟党积极参与到会议的准备工作中来。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还是一如既往地希望中国同志能为召开兄弟党的国际会议的准备事宜作出自己的贡献。

有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原子爆炸装置

我们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具有原子武器是一个积极因素，这一因素将巩固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国防。

我们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召开世界主要国家讨论完全禁止和彻底销毁原子武器问题的会议的主张，是非常有价值的建议。苏联政府，正如众所周知的那样，支持召开这样的会议的思想，并指出苏联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样的会议能够召开并以积极的成果结束。

应该指出的是，1965年1月19—20日在华沙举行的华沙条约组织国家政策咨询委员会

会议表示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建议。

有关中印冲突的苏联立场

如果在交谈中涉及有关中印或苏印关系问题时,则应指出,苏联政府同印度发展关系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原则上的,即如同发展与印度尼西亚、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这就像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印度尼西亚或巴基斯坦等国家建立关系一样。我们认识到,我们同这些国家进行合作的任务是帮助它们巩固政治自由和经济独立,尽快结束过去殖民主义的遗产,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对它们的多种形式的压迫,帮助它们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

苏联政府多次采取措施,以促使印度政府采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中印边界争端。为此,还同印度政治活动家举行了相关会谈。苏联积极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 1962 年 10 月 24 日所提的建议方案,即以谈判的方式来和平调整冲突。

应该指出的是,按照我们的意见,当时就此问题所进行的咨询,可以在我们两国关系中预先防止发生不希望发生的误会。

如果中国代表团提出向印度提供苏式武器的问题,则说,给印度提供一些种类的苏式国防武器也不可能改变中印之间的力量对比,相反,它们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印度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接近。如果我们不给印度以武器帮助,那么美国在很大程度上会帮助它。我们的拒绝将可能会促使印度进一步同西方,首先是同美利坚合众国建立联系,这将会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造成损害,其中也包括中国的利益。

有关苏中边界

苏联政府的根据是苏联和中国之间没有领土问题。苏中边界是历史形成的,长期以来在我们两国之间边界是友好的和合作的,并且这种状况应该保持下去。

基于国际主义的立场,涉及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与边界安置相联系的问题不能成为它们之间争吵的对象,也更不能成为它们关系恶化的理由。而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应该以兄弟合作的精神来进行调整。

有关提供成套设备

如果中国方面提出有关要苏联恢复完成有关援建 68 个企业[①]的 1961 年 6 月 19 日协议的义务的问题(根据中国方面的倡议,完成这些义务的期限被延期了两年,至 1964 年。如果中国方面不提出恢复供应或延期完成的问题,则苏联方面也不正式提及这些义务),则可以不给以明确的同意,如果中国方面有这样或那样的关于提供成套设备的愿望,则指出,苏联方面准备研究这方面的问题。

有关 1962 年大批新疆居民迁移到苏联

关于 1962 年中国大批居民迁移到苏联的问题非常复杂,对苏联来说是令人不愉快的。所谈的问题涉及几万人的命运,普通劳动者和他们的家人——妇女、老人和孩子,已经来到

---

① 原文如此。根据 1961 年 6 月 19 日中苏协定,苏联援建中国的企业和其他项目共 66 个。——编注

了苏联。他们中的大多数是从俄罗斯或苏联出去的苏联公民。

从那时起，过了两年多时间，这些人来到了苏联。在这期间他们已经分别安顿居住下来，得到了住房，也被安置了工作，他们的孩子上了苏联的学校，很多年轻人已经和苏联公民结婚了，等等。在这样的条件下，提出让所有人回到从前的国家的问题——这就意味着要求我们对这些人采取强制性的措施，而这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将会引起不良的反应。

同时，我们不止一次地申明，现在也将申明，我们准备提供所有的措施，帮助那些表示愿意回到中国的人。现在表示愿意回中国的大约有1 000人左右。中国方面同意接受这些公民，将可能为逐步解决这些返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的问题创造一个良好的开端，这也是那些人所希望的。

有关叛逃者和未回国者

如果在谈话中，中国方面提出有关中国公民在完成学业之后拒绝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者有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叛逃到苏联的人的问题时，可以这样回答，苏联政府从来没有赞同过也不会赞同这些中国公民的行为。这些人没有被容许享有政治庇护，也没有被接受为苏联公民。苏联政府机关经常做解释性的工作来说服他们返回祖国。结果是他们中的一部分返回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目前采取的一切措施就是为了避免发生类似的现象。

第187号记录第65项

РГАНИ，ф. 3，оп. 16，д. 610，л. 110，116－123

№25767

谢苗诺夫与张德群谈话纪要：关于纪念中苏同盟条约问题[①]

(1965年2月6日)

2月6日我接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临时代办张德群。

我向他通报了庆祝《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15周年的活动。

……说“打算广泛隆重地庆祝条约签订15周年”。

2月12日在工会大厦圆柱大厅举行隆重的报告会。如果潘自力大使和中苏友协代表团

①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团长想在大会上发言,我们将提供这种机会。张德群表示感谢,说这是"大好消息"。声称大使馆工作人员一定参加活动。

据我们所知,与外国友好和文化交流协会联合会和苏中友好协会向中苏友好协会的中央理事会建议互派代表团。苏中友好协会列宁格勒分会也有意提出与友好城市上海互派友好协会代表团的建议。

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准备组织庆祝条约签订15周年活动。

张德群也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也要举行庆祝条约签订15周年的活动,正在发出邀请函。

АВПРФ,ф.0100,оп.57,п.510,д.7,л.13

№11466

苏联代表团的报告:访问越南民主共和国活动情况

(1965年2月10日以后[①])

苏联代表团关于访问越南民主共和国活动情况的报告

1965年2月6—10日

应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邀请,由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同志率领的苏联代表团,于今年2月6-10日对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了友好访问。

苏联代表团的成员有: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Ю.В.安德罗波夫,苏联民航部长Е.Ф.洛吉诺夫,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В.В.库兹涅佐夫,苏联国防部副部长、空军主帅К.А.韦尔希宁,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副主任Г.С.西多罗维奇上将和苏联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И.С.谢尔巴科夫。

1965年1月31日,苏联报刊关于苏联代表团访问的消息一发表,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报刊、电台和官方宣传立即开始广泛报道关于苏联和越苏人民友谊等方面的各种材料。

2月6日,苏联代表团抵达越南的当天,所有中央级的报纸都在通栏标题"热烈欢迎由

---

① 所收集的档案未标明文件时间,这里是根据文件内容推断的。——编注

A. H. 柯西金同志率领的苏联代表团访问越南"(用越南文和俄文写的)下，发表了社论，柯西金同志的照片、简历和其他材料。

数千名河内居民的代表，来到装扮一新的嘉林机场，与范文同、黎笋、长征和国家其他领导人一起欢迎苏联代表团。范文同和柯西金先后发表了讲话。

在从机场到苏联代表团下榻的主席官邸，沿途有首都10万居民欢迎代表团。到处都挂着苏联和越南的国旗，欢迎苏联代表团访问和两国人民友谊的标语和口号。

代表团到达驻地后受到胡志明的接见。

当天晚上，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为欢迎苏联代表团举行了盛大招待会。

2月7日，为庆祝苏联代表团来访，河内中央广场举行了首都8万人的群众大会。参加大会的有胡志明、黎笋、范文同、长征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其他领导人。河内市长陈维兴向代表团致欢迎词。A. H. 柯西金同志在大会上发表长篇讲话。

当天早晨，由A. H. 柯西金率领的苏联代表团向英雄公墓献了花圈，参观了革命博物馆，浏览了河内市容。

2月7日下午，由柯西金和胡志明同志分别率领的苏联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举行了会谈。会谈在2月9日继续进行，最后签署了苏越联合声明(1965年2月10日)。

越南方面参加会谈的有：黎笋——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长征、范文同、武元甲、黎德寿、阮维桢、黄文欢——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文进勇——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阮文镜——越南民主共和国驻苏联大使；黄文进——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

2月8日，代表团参观了河内郊区的合作社，并在那里举行了一个不大的群众集会。A. H. 柯西金同志和县委第一书记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

K. A. 韦尔希宁及其陪同人员当日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国防部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国防部长武元甲举行了会谈。

2月8日晚上，苏联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在苏联代表团下榻处举行了盛大招待会。胡志明、黎笋、范文同、长征及越南民主共和国其他领导人出席了招待会。

2月9日，代表团部分成员参观了河内机械厂。

越南少先队员在主席官邸拜会了苏联代表团。胡志明也参加了拜会。

晚间苏联代表团会见了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官员，此后胡志明设晚宴。

2月10日，早晨签署了苏越联合声明。此前柯西金与胡志明举行了长时间的告别会见。

在嘉林机场举行了盛大的欢送苏联代表团仪式。范文同、黎笋、长征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其他领导人出席。

苏联代表团在越南民主共和国逗留期间，范文同一直陪同代表团。胡志明出席了所有招待会、会见和音乐会。

企业集体、社会团体和一些公民向苏联代表团发来100多封贺信、贺电。

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阮友寿为苏联代表团访问越南民主共和

国向柯西金同志发来电报。A. H. 柯西金复电阮友寿。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 17 卷，第 4285—4287 页

№13866

柯西金与毛泽东会谈记录：中苏关系及国际形势等问题

（1965 年 2 月 11 日）

绝 密

柯西金和毛泽东的谈话记录

1965 年 2 月 11 日

这次谈话在位于北京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大楼里举行。

毛泽东一边同柯西金打招呼，一边说，苏联代表来到东方是很好的。东方是独一无二的，是应该来看看的。

柯西金：您说得对，但有一天您也应该来西方看看。

毛泽东：没有人邀请我们去。

柯西金：我们现在就邀请您。

毛泽东：这样的话就可以去了。接下来，当谈及他的工作，毛泽东说，他是党的领导人，但是现在很少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了，他也很少参加中央全会的工作了。他说他很老，快死了。

柯西金回答说，所有现在活着的东西，都是有生死的；这就是生存的辩证法。很难说，哪个会先行一步。然后他说，毛泽东肯定在关于建党和建国的理论问题以及辩证法和其他重要理论问题上给予了很多关注。这些工作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是无法避免的，没人能够逃避。

毛泽东：您说得对。我对辩证法尤其感兴趣。我对不以人民、党派和政府意志为转移，甚至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进程感兴趣。事件的过程都是被生存的客观法则所决定的。

举例来说，越南人中，有哪个愿意和美国人打仗？但是面临的情况逼得他们不得不打。在 1954 年日内瓦协定之下，法国人从越南逃走了；他们撤离了军队，大概有 20 万人。然而吴庭艳开始杀人了。这些血腥的镇压引起了仇恨，结果民族解放阵线形成了。有时候，南越

人民试图进行政治斗争，那时游击战扮演了补充的角色。然而现在很清楚了，只通过一场政治斗争并不能获得所有东西。有些人认为必须同时进行政治和军事斗争，这显然不对。谁能说事情的发展是依赖于人的意志呢？

柯西金：美国人想到处移植资本主义，我们希望到处都是共产主义。只有愿望是不够的。特定条件和客观条件是必需的。

毛泽东：现在越南的主要问题是游击战，政治斗争成了次要角色。战争范围越来越大。现在美国人开始轰炸北越了。但是，这又怎样？死掉一些人又有什么可怕？今晚我们得到消息说在南越的游击队空袭了位于14度以南的防御区，摧毁了3个伪军连，还杀了几名美国人。

柯西金：这是个好消息。我们支持越南人民的斗争。我们提供的援助是很有效的，包括提供武器。关于向北越提供地空导弹，我们与越南同志达成了协议，用来防御河内和其他地区遭受美国人空袭。我们还打算提供大炮、坦克、鱼雷艇和许多其他武器。显然越南人在使用这些武器方面会遇到困难，我们还打算在必要的时候派出我们的军官去训练他们的士兵。虽然我们与越南没有共同边界，但是我们认为不能将越南抛在一边是社会主义者的责任。

毛泽东：一个人必须吸取经验。飞机现在毫无用处。

柯西金：在和周恩来谈话时，讨论了在越南问题上我们协调行动的问题。我们也和越南人谈了这一点。我们感到在这件事上我们意见一致。至于美国人，他们逞强和挑衅的方式只能是软弱的信号，而不是强大的信号。

毛泽东：他们有什么强大？现在13艘航空母舰里有4艘在南海。1958年我们开始炮击美国人占领的岛屿时，他们派了更多的航母来。我们继续打炮，他们甚至派了部分地中海的第六舰队来，甚至后来旧金山的第一舰队也来了。可是，当他们来到南海，我们已经停止打炮了，他们无所事事。水手们在新加坡休息了两周，就回母港基地了。现在中国拖住了第七舰队这支最强大的舰队。

柯西金：苏联军队在德国遏制着美军。我们不得不在欧洲保持强大的军队，就像亚洲这边，也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前沿阵地。只要稍有松懈，帝国主义马上就会抓住机会。

毛泽东：那么，你们照看好西方的阵线，我们在亚洲这边保持斗争。是美国人迫使我们协调行动。

柯西金：我们的敌人只有一个，我们的军队必须联合起来。

毛泽东：美国军队遍布世界。他们总共有270万，其中欧洲和亚洲就有100万。

柯西金：他们不得不分散兵力，这不会增加他们的实力。

毛泽东：他们只有18个师，其中一半部署在国外。

柯西金：从人数上说，美国的师是我们的两倍，但是在技术上比不上我们。比如，美国的师装备的坦克比我们少，大炮比我们多。

毛泽东同志，我想问问您，有一次您通过我们的大使询问赫鲁晓夫，我们是否有机会坐下来讨论一些成熟的问题。您那时说如果是最高层的会谈，两个小时就能解决许多一般会谈几年都解决不了的问题。现在是不是这个机会？

毛泽东：我还说了其他的话，那就是，我不赞同你们的方法。我说如果继续公开论战，天也塌不下来。我说过，现在也讲，天塌不下来，树照长，鱼照游，女人照样生孩子。这些都跟我们的论战没关系。毕竟，公开论战就是用钢笔、毛笔和纸的方式进行的斗争，死不了人。就是说，我（毛泽东继续讽刺地）喜欢你们的公开论战。我不赞成停止公开论战。谁知道什么时候会停下来！我和罗马尼亚同志们谈过。他们问我这个问题时我回答说：大概再过15年，因为在公开论战过程中很多问题都会弄清楚。你们到什么时候开始说必须停止论战，不允许分裂活动，到时候我们再出价。我们现在说所有这些都要再持续一万年——少一点都不行。

至于所谓的分裂活动，既然我们是教条主义者，那么我们当然愿意支持你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排除的一些共产党人。当前，许多国家纷纷成立新的共产党，比如澳大利亚、斯里兰卡、印度、比利时、巴西和其他国家。你看得出，他们都是站在教条主义立场上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教条主义者无条件支持他们的原因。这就是我们所做的事，我们只有一件事没做，就是你们指出的（分裂）活动。不用比较也知道，你们会更积极地支持你们的马列主义政党。

现在也有很多人支持你们。至于我们，并不是很多。有人说，100个党派里面62个站在你们一边，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少数派。而且，我必须指出即使在我们党内也有人站在你们一边。比如，陈毅、周恩来——他们就站在你们一边。他们敦促你们不要在3月1日召开会议。我个人赞成你们开这个会。刘少奇、邓小平、康生和我，我们这些顽固不化的教条主义者赞成你们开这个会。你看看，我们这里也是有派系的。他们总是督促你们，我认为一个人说服不了你们。将会期从12月15日改在3月1日没有必要。毕竟，这对你们不利，会削弱你们的权威。我认为也没必要改掉会议的名字。比方说，不叫起草委员会，叫协商会晤？你们最好用原来的名字。你们总是改来改去，这样不好，毕竟你们是伟大的列宁的党。这就是为什么我站在你们这边。我尊重你们，认为你们应该开这个会。是周恩来和陈毅反对你们。

柯西金：毛泽东同志，你说的树啊、鱼啊、女人啊都是正确的。毕竟，进化的客观规律是存在的，这不会改变我们之间继续公开辩论的事实。这不是我们担心的问题。问题存在于另一面。作为决定性革命力量和同帝国主义斗争的力量，我们共产党的团结很重要。我们党赞同用一切力量来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同中国共产党的团结，这是我们党和人民非常珍视的。

毛泽东：当然，对这一点，我毫无异议。

柯西金：我并无讽刺之意。这个话题是很严肃的，我说的是问题的实质，不是出于客套。当我说对中共的尊重时我没有违心。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团结。这样我们就获得了十倍的力量。您说钢笔和纸杀不死人，但是它们是意识形态，比任何武器都厉害，可以在人们中间造成巨大影响。您应该是知道这一点的。另外，当我们谈到与你们党的代表会谈，消除我们分歧的时候，我们遵从的事实是情况在改变，形势在改变，和平讨论和解决问题的时机已经到来。当然，一些事情的解决需要更多的时间；我也认为解决它们需要在一个理论

框架里进行研究。但是毕竟很多问题是次要的事情。我们应该从中解脱出来。论战也可以发生。但是必须是一种从科学的角度进行的论战，必须是踏实的，以一种友好的精神进行，而已经存在的分歧必须通过科学的，建立在列宁的国际主义原则之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式来讨论。

毛泽东：您所说的这些论战，没有任何意思。我倾向于你们在7月14日的来信和你们1964年2月的大会上所进行的那种论战。

柯西金：您以为我们不害怕公开论战？我们的确不害怕。但是当人们斗嘴的时候，至少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在争吵什么。我举一个例子：现在我们正和你们进行一场争论，有关依靠自己的力量，你们谴责我们说苏联违反了这一点。是的，这是一场制造出来的争论。毕竟我们所有人都在依靠自己的力量。我们还能依靠谁？也许你们认为我们在依靠美帝国主义？这不是正是我们澄清这些故意制造出来的分歧，会见并探讨一些问题的时候吗？我们现在没法达成一致的问题可以放在一边。你说要把它们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推到一边，推迟一万年。如果这对我们的党和国家有益的话，我们可以把它们推迟两万年。然而，革命运动存在，而我们正在这场运动之中，我们应该一同走出来，而不是相互反对。我们要把我们团结在一起的力量超过把我们分开的力量。

毛泽东：应该推迟一百年。

柯西金：可以顺其自然地推，比如说，X年。但是这将会损害我们共同的事业。有一次我在一个欧洲国家会见一群西欧共产党人。他们一直在说，中共和苏共的分歧正在把他们的运动引向反面，使他们不再解决主要矛盾。他们在做地下工作，在那样的情况下他们必须在反对剥削者、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将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拉开，来考虑谁在争论中会取得最后的胜利：中共还是苏共？他们问我一个问题：如果帝国主义可以在一系列问题上达成共识，为什么共产主义国家不行？我相信整个共产主义运动，整个社会主义世界，我们两国的人民——他们正在等待我们解决分歧的看法。这些分歧现在没办法解决，但是可以通过一种理论的角度进行讨论。甚至可以创造一份理论报纸。

至于理论上的争论，可以不损害我们的团结而进行，在我们任何一份理论报纸的专栏里。

毛泽东：你们在布拉格已经有这种报纸了。

柯西金：它叫做《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但是那不只是我们的报纸，而是所有共产党的报纸。

现在说说3月1日的会议。我们不打算召开这次会议，但是一系列共产党都希望召开。是通过咨询的形式还是通过起草委员会见面的形式召开这次会议有着很大的差别。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方式。您反复说在现有条件下有必要召开一次由81个共产党参加的国际会议。

毛泽东：我们在过去说过，要准备一次会议，我们需要4到5年，而现在，显然，需要8到10年或者更多。毕竟，争论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见面？你们，比方说，

还在支持范燕东。你们派遣了一个代表团,由波诺马廖夫带领,去参加他们的大会。对印度共产党的第二次大会我们没有派遣一个代表,我们甚至没有送给他们一个电报。在斯里兰卡也是这样。我们提供不充足的支持,而你们提供了全部支持。

柯西金:正因为这样他们在北京访问了你们。这没有改变问题的实质。

毛泽东:时间会流逝,到时候会有接触,多边和双边协商。

柯西金:3 月 1 日的会议正是一次想要讨论这个问题的各党进行多边协商的会议。

毛泽东:这就是为什么我赞成这次会议。请开会吧,别改日期也别改名称。把 26 个党的代表叫到一起;只有少数人不会来。毕竟你们看不到这样做有什么不好。

柯西金:但是请解释一下,为什么您反对几个党见面商讨何时以及如何召开一次 81 个共产党参加的大会?您认为这会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什么害处?如果有人想要为将来的会议出台某些统一政策,又是另一回事。

毛泽东:在你们 7 月 14 日的来信以及后来 11 月 24 日的来信中说道,如果我们不参加,你们就会无视我们继续开会。

柯西金:您应该考虑到在 10 月中央全会后莫斯科的新情况和形势。毕竟,你们不想这样。

毛泽东:我们看到了一些。

柯西金:我们正在想办法让你们适应,像同志们之间做的那样,我们对你们是尊重的,我们正在报刊上发表关于中国情况的客观报道。

毛泽东:不一定。你们在报纸上不会发表我们的文件。

柯西金:我们正在发表一切对我们来说合适的文字。我们已经发表了周恩来同志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报告的详细内容。但是,没有提到这是来自苏联最高委员会的报道。

毛泽东:这说明我们犯了个错误。但是你们打算对阿尔巴尼亚怎么做?毕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就谈不上开会的问题。另一方面,这个问题只能在阿尔巴尼亚和你们之间解决。绝不能折磨阿尔巴尼亚这个小国;那样是很不好的。我们很高兴你们会恢复之前的关系。

柯西金:你们没有注意到吧,在 10 月的大会之后再也没有发表过关于阿尔巴尼亚的负面评价了。当(华沙条约)的政治协商委员会在(1965 年 1 月)华沙举行的时候,阿尔巴尼亚代表也是被邀请了的,但是他们对此的回复是一封侮辱性的回信。无论如何,这次会议的参与者没有回应这些谩骂,并且和阿尔巴尼亚人沟通,表示这个邀请依然有效。告诉你们的同志们准备好所有材料,看看是不是在 10 月的会议之后再也没有一个声明是针对阿尔巴尼亚的,再来和阿尔巴尼亚那一次说的话比较一下。我们愿意恢复和他们的外交关系,但是阿尔巴尼亚人把所有写给他们的派遣书都原封不动地退回给我们。你们对此怎么评论呢?

毛泽东:首先,我会建议你们把之前所有对阿尔巴尼亚所做的事情放在一边。很有必要让你们意识到这一切都是一个错误。毕竟,你们在你们党的大会上公开地批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你们破坏了和这个国家的关系。那么,必须宣布这些都是错的。但是你们更想不

再讨论过去的事情。

如果你们希望我们参加这次会议，那么宣布7月14日的来信和你们2月的会议都是错误的，把它们废除。我们反对你们的纲领。

柯西金：您很清楚，这是不可能的。如果你们真的赞成减少分歧，如果你们想找到解决的办法，那么我们应该会面。如果要严肃地讨论这些分歧的事情，以特定的方式，实实在在地谈，那么结果就是你们将不得不否定你们过去所做的很多事情。当你们谈到阿尔巴尼亚，你们说的不准确；你们显然依据的是不真实的消息。不是我们破坏了与阿尔巴尼亚的外交关系，而是阿尔巴尼亚中断了与我们的外交关系。

彭真：那么你们在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是怎么攻击阿尔巴尼亚的呢？

毛泽东：我就是在攻击二十大和二十二大。我不同意这些会议的纲领，说斯大林如此的坏，还有某种个人崇拜。而现在你们说赫鲁晓夫也有自己的个人崇拜。很难搞清楚到底在搞什么。你们说赫鲁晓夫是个好人，那么你们为什么要把他赶下台？我们都没有拿掉他的画像，他的著作还在传阅，但是告诉你们实话，不幸的是没什么人看。

我们从没有撤掉斯大林的画像；我们还支持个人崇拜。赫鲁晓夫有什么感觉？

柯西金：应该去问他。

毛泽东：我同意。我通过您向他发个邀请。让他来访问我们。我要和他进行论战。

柯西金：当然由您自己决定和谁进行论战。赫鲁晓夫既不代表我们党，也不代表我们政府。至于为什么我们要让他从他的位置上下来，我们已经在周恩来同志访问莫斯科的时候详细地告诉他了。

毛泽东：但是他过去是代表。毕竟赫鲁晓夫做过许多好事。他是个伟大的领导人；他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另一方面，我们，全都是教条主义者，教条主义者里不缺乏马克思主义者。另外，我们是好斗的人。这也是正确的描述。首先，我们是教条主义者；其次，我们是好战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的名声不好。他们在世界各地抨击我们。他们叫我们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教条主义者。这样的话，为什么还要邀请我们去开会？你们应该巩固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要团结教条主义者？

我们的确是好战的人。和你们不同，我们不相信广泛和彻底的裁军。在现实中，以我们的观点来看，广泛和彻底的裁军正在世界各处发生。因此，你们尽可以继续会面讨论广泛和彻底的裁军。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世界各地，广泛和彻底的裁军正在发生。如果你们的同志看重广泛和彻底的裁军这样的幻想，这两种不同的观点怎么能够接近？

柯西金：您真的相信你们比我们更多地进行了反帝斗争？

毛泽东：无论如何不比你们少。

柯西金：我们对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但是我们并没有指责你们没有怎么进行反帝斗争。同时，事实是没有我们的参与，反帝斗争在哪里都不可能进行。这些斗争到处都有我们的贡献，有我们的武器和我们所冒的风险。然而，我们在任何地方都没有看到你们特有的好斗，除了言论。言论根本没有反映现实，光是言论在反帝斗争中是不够的。

毛泽东：我们两党可能在10年之后再聚在一起。客观的形势会逼着我们团结。帝国主义者正在采取违背人民意愿的行动；他们对你们和对我们一样，都不会客气。

柯西金：这就是为什么不能把我们的团结推到一万年之后，而必须现在就团结。

毛泽东：我们会在10到15年之内团结起来。紧张气氛会减缓。毕竟，紧张关系还没有放松；这也是一个幻觉。你们每天都在做关于减少紧张气氛和裁军的宣传，而这全都是谎言。在某些情况下，帝国主义会同意任何条件。他们会支持一个协议吗？比如，他们可能重视波茨坦公告吗？

柯西金：他们也不会重视日内瓦协定。

毛泽东：这就是为什么帝国主义和反动分子要走他们自己的路。他们不仅要吞掉我们，还要吞掉你们。

柯西金：我们，在军事上最强，应该是第一，帝国主义仅有想法是不足以发动战争的——我们的团结是发动一场新的战争道路上很大的阻碍。

毛泽东：他们最可能先攻击我们。毕竟，我们只有手榴弹。我们没有原子弹这样的武器；我们还只是在实验。另外，我们不相信原子弹，那只是一种吓唬别的国家的办法。还是得依赖传统武器。我们已经打了25年的仗了，我们对此很了解。

柯西金：每个人都打过仗或者见过打仗。我们国家已经受够了战争，已经到了忍受的边缘。

毛泽东：但是帝国主义还没有被消灭。为什么你们要带来一个元帅或者将军？很显然文官已经没法解决问题了。必须依靠军队，主要是正规军。在这种情况下，不应该让军队和国家失望。在你们党内以及我们党内都有些修正主义者。他们写小说，他们拍电影，一点不鼓舞士兵的战斗精神。他们减弱了士气。很不好。必须准备战争。如果我们能够保证10到15年的和平，将会是很有益的。我们反对世界战争，但是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有所准备。这是为什么我说在10到15年内，当帝国主义举起手反对你们，或者反对我们，我们必须团结在一起。战争会把我们团结在一起。我们为什么争吵？因为我们活在和平的环境下。如果帝国主义用你们"和平竞赛，和平共处，广泛和彻底的裁军"之类的口号武装自己，那是很糟糕的。现在美国和苏联的口号没有很大的差别。美国和苏联正在决定世界的命运。请尽管决定吧！但是在10到15年内，你们不可能决定世界命运。命运掌握在世界各国的手里，不在帝国主义、剥削者或者修正主义者手里。

柯西金：既然您提到这全人类生死攸关的重要问题，也就是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以及与帝国主义斗争的问题，我要说，我不懂您提到加强军队和积累武器的必要性的目的是什么。您真的以为我们不是在做同样的事情？

毛泽东：我刚才说的是到处，包括我们，都在全面而彻底地进行军备。

柯西金：进行军备的确正在你们国家和我们国家进行着。我必须说，如果我们要比较国民收入中用了多少进行军备，很显然苏联比你们国家要多。我们国家在军备上承担着更

大的负担。而且，我们正在将20亿卢布用于和安全相关的教育中，成千上万的工程师正在苏联进行安全问题上的工作。我不是要炫耀，只是为了回答您说的武装的必要性的问题，好像我们自己不懂这一点一样。

毛泽东：我所谈论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那些关于全面而彻底裁军的言论——那只是一个说法，是为了骗人而说的。自然，他们甚至可以欺骗美国人，但是，这些幻觉也会对他们自己的国家造成很坏的影响；他们会解除自己的武装。

柯西金：您说——"必须武装"。我们说，我们正在这个方向上已经做到我们所能做的一切。

毛泽东：你们预算中百分之多少用于军事目的？

柯西金：我不会说这个数字，因为它不能完全反映我们在安全上的支出。但我重申，我们在这方面正在做所能做的一切。如果谁要在安全上花费得更多，那会制约他自己国家的经济发展。

毛泽东：近年来你们在军事支出上减少了500万卢布。

柯西金：我不会具体谈减少花费是什么意思。至于您的话，毛泽东同志，里面有矛盾的地方。您一边说10到15年没有战争是好的；另一方面又说要发动战争。

毛泽东：在接下来10年到15年内没有战争是很好的。

柯西金：谁都会同意这点。我深信，在现实中，您是反对世界大战的。

毛泽东：我们反对世界战争，但是我们赞成目的在于推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战争。

柯西金：我想在场的中国同志们没有一个是赞成世界战争的。我相信这一点。

周恩来：但是如果帝国主义对我们发动战争，那么就应该打仗。

柯西金：那还能怎么样？1941年德国帝国主义者对我们发动战争，占领了最重要的工业区，我们的国家没有投降，没有把手举到空中。我们向帝国主义发动了残酷的战争，最后赢得了战争。

毛泽东：那时候苏联打得好。

柯西金：如果帝国主义发动新的战争，苏联会打得更好。关于革命战争，我们也觉得应该支持这样的战争。你们一定知道我们向进行这样战争的国家提供了多大的帮助。

毛泽东：我们知道。

柯西金：那么为什么您要公开地提出这一点？

毛泽东：你们对南越只帮了很少一点。

柯西金：我们在地理位置允许的条件下帮助到这一步。现在美国已经轰炸了北越，不是越南南边。不幸的是，我们在那里没有能够和美军基地进行反击的空军力量。只有你们可以做到，但是你们不做，你们没有以适当的方式驱逐美帝国主义，虽然你们可以做到。为什么？显然这里面是有些原因的。我们早就看到这一点，也没有指责你们不去轰炸在南越的美国人。有人会认为你们最熟悉那里的情况而你们有自己不去的理由。

毛泽东：南越的人民没有我们也会战斗得很好，他们自己会把美国人赶出去的。

柯西金：可是美国人已经在轰炸北越了。

毛泽东：这对美国人来说是很愚蠢的。他们的轰炸没造成什么伤亡。

柯西金：我们深信必须要赶走美军。现在我继续说刚才说的。您说如果我们在未来10到15年里获得和平的机会，是很好的。同时您说只有战争才能团结我们。这两点是有矛盾的。

毛泽东：美帝国主义不会给我们这个时间的。

柯西金：我并没有提出这个时间表，是您提出的。

毛泽东：我刚才提到这点是因为一些人来向我们提议结束公开论战。我们回答说我们不能同意。但是随着时间，帝国主义会逼着我们同意结束论战。我们正在接受敌人的教育，但是我们自己有很好的老师，比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之后还有斯大林和赫鲁晓夫(他提到赫鲁晓夫的名字时毫不掩饰讽刺之意)。

柯西金：还有毛泽东?

毛泽东：我不属于这个圈子。我们是在蒋介石的血腥镇压下成长起来的。

柯西金：既然说到这个，我们要提起尼古拉二世。

毛泽东：我们是跟着日本人长大的，接着又是帮助蒋介石以及在朝鲜打我们的美国人。总之，我们有很多老师。

毛泽东：你们有14个国家的加入。你们国家两次卷入世界大战。德国两次侵略你们的领土。所有这些都是让你们骄傲的历史。当你们国家的工人群众武装起来的时候，他们推翻了在那时有着最先进武器的政府。您多大了，柯西金同志?

柯西金：我马上61岁了。

苏联人深知战争是什么样的。至于您刚才说武装力量必须在比较高的层次维持以及必须支持革命斗争以及民族解放斗争，我们之间都没有分歧。当您说，你们是好斗的民族而我们不是，不能同意这样一个比较。我们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你们一样好斗。

毛泽东：我们是教条主义者。

柯西金：也许你们已经注意到，我们最近没有再将你们称为教条主义者。然而你们却经常叫自己为教条主义者，而显然你们认为我们是修正主义者。我们认为必须同时与教条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作斗争。这是列宁教导我们的。

毛泽东：可以得出结论说，在这件事上我们之间没有矛盾。必须对偏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作斗争。

柯西金：在河内召开的一次群众大会上，我在我的发言中说，我们反对修正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这样来说，我们对于评价武装力量和反帝斗争这些问题上都没有不同意见了。但是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愿意做任何事情来延长和平的环境，不制造战争的局面。我们采取这样的政策并不是因为我们害怕战争，尽管有些人会这样解释。至于对帝国主义，我们也不怕他们，但是我们反对制造战争的形势。

毛泽东：必须创造革命战争的形势。

柯西金：每个民族的人民会表达他们自己，当他们起来反抗压迫者和为了他们的目标进行斗争的时候。具体情况和客观因素在这里起作用。

毛泽东：但是我们应该鼓励人们进行这样的斗争，应该支持。

柯西金：在这件事上我们没你们做得多吗？

周恩来：你肯定是搞错了。

毛泽东：我们认为你们在支持革命斗争方面做得太少了。

柯西金：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不同的看法。

邓小平：如果您不带外交辞令地这样说，显然你们害怕一场革命斗争。

柯西金：如果我不带外交辞令地说，那么你们在帮助进行革命斗争上比我们做得少。你们只是说空话，不做事。

毛泽东：你们帮助印度的空军，你们给他们装备武器来对抗中国。就这个问题你们和周恩来有过冲突。

柯西金：毛泽东同志，两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总理之间没有任何冲突。最多，发生的只是意见不一致。

毛泽东：你们的大使契尔沃年科刚一来访问我们，周恩来就和他争吵起来。很显然是有事情要争吵。比如，刚果问题。你们投票让联合国军进入刚果。

柯西金：我们过去和现在都反对派联合国军进入刚果。

毛泽东：这是后话，但是刚开始你们投票赞成派联合国军进入刚果。

库兹涅佐夫：当问题在联合国提出的时候我正在纽约。苏联一直都反对派联合国军进刚果。

毛泽东：现在您看到你们已经面临了一场广泛的战争。

柯西金：这不是一场战争，而是在讨论一个问题。当这样的问题被讨论的时候，必须要提供真实和具体的信息，而周恩来同志给了错误的信息。我们从不赞成联合国干预刚果。

康生：但是你们也不支持在刚果进行自由斗争。

柯西金：现在，我回答康生同志的问题：我们的飞机正在刚果，全都由苏联的驾驶员操作。有了这些帮助，苏联的武器可以从阿尔及利亚和埃及运到刚果。我们在那里的任务是帮助刚果人民操作这些武器。我们绝对支持刚果民族的斗争。我们正在动员公众舆论。除了这些，在您看来，我们还要做什么？

周恩来：是的，你们的飞机正在刚果飞，但是我们正在为这些飞机交租金，我们交了不少。

柯西金：周恩来同志，您为什么要扭曲事实呢？您为什么要故意使讨论升温呢？毕竟，你们不是在为我们现在说的这些飞机交租金，你们一分也没有付，而你们和这些飞机一点关系都没有。如果你们愿意，我可以让本·贝拉总统将相关消息发给毛泽东同志，如果你们不愿相信我们的话。你们把两件事都搞混了。周恩来同志建议给阿尔及利亚 4 架安－12 飞

机,以礼物的形式,你们的政府让我们把这些飞机卖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然后送给阿尔及利亚。我们马上就同意了。是你们在扭曲事实。当我们收到这样的询问后,我们马上指示外经贸部立即卖掉这些飞机。但是我们现在讨论的是不同的飞机。我们谈的是正在非洲由我们的驾驶员操作的飞机,他们正把武器运给刚果反叛组织。因此你们说的和事实不符。给人的印象是有人为了挑拨的目的在散布谣言,并制造文件作为证据,以便把我们之间的,你们和阿尔及利亚之间的关系搞复杂。我很了解阿尔及利亚那些飞机的事情,因为我自己在莫斯科就负责这件事。

毛泽东:周恩来也在负责这件事。你和他之间有一场战斗,你可以取得这场战斗的胜利。

柯西金:我不想赢周恩来,我觉得他也不想赢我,因为我们在为同样的理想而斗争。

毛泽东:不不,应该攻击他。他有很好的借口;他想成为赢家。

柯西金:我不认为周恩来同志想这样。

毛泽东:你太小看周恩来同志了。

柯西金:我已经认识他很长时间了。

毛泽东:是的,毕竟,你在莫斯科就见过他。的确,真理就在争论中产生——针锋相对——就像你和他进行的那样。如果只是谈论天气,那么这样的对话毫无帮助。

柯西金:我们只在北京待一天,我们没有时间谈论天气。在您看来,应该从我们的对话中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应该如何总结呢?

毛泽东:今天进行了一场真的战斗。对于一些事情的共同观点已经很明显了。对于世界大战来说,必须尽力保证在未来10到15年不会发生。我们之间的争吵本质上是我们为相同目标而奋斗的一种途径。为了在争吵中解释谁是对的谁是错的,需要整个时代来做这件事。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这样或那样的观点不是在争端中证明的,而是在实践中证明的。

柯西金:您认为我们之间的见面和联系是有益的?

毛泽东:见面和联系总是有用的。我们不隐藏我们的观点。我们不考虑外交。

柯西金:那您肯定已经注意到了,我们也是坦率地说我们的想法。对我们这边,我们认为,我们两党和国家代表之间的见面和谈话是有用的。我们同意应该更多见面,我们认为应该比一万年要早一点解决争议。

毛泽东:可以缩短期限。

柯西金:那么就让我们这么做吧。

毛泽东:如果从10 000年里减去9 000年,就还剩1 000年。这是最大的让步。

柯西金:最好能够从1 000年里剪掉三个零。

毛泽东:在帝国主义的帮助下把期限减少至10到15年,甚至7到8年,都是可能的。如果帝国主义发动一场新的战争,我们又会在一起了。我们现在也没有完全分开。我们接受你们,但是我们不接受美帝国主义。我从来没有接受过英国代办。不久前这里还有英国

的贸易部门，我拒绝接受他们。

柯西金：如果是您，周恩来同志，作为我们在莫斯科的客人，我们不会做出这样的对比。

毛泽东：为什么？

柯西金：如果你们来访问我们，我们会说，我们很高兴见到你们，并准备和你们像共产主义者之间进行的一样讨论所有问题，我们不会把你们和帝国主义世界的代表作对比。

毛泽东：我经常唱高调。我是个好斗的人，一个教条主义者。而且我已经得罪了苏联政府的总理。

柯西金：我们不是爱生气的人。

毛泽东：不。你们应该被得罪了。还有，我们的情况不同；你们还和美英保持正式的外交关系，而我们没有。

柯西金：你们和法国保持着外交关系。

毛泽东：的确是。

柯西金：你们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时候会到来的。

毛泽东：但是不会这么快。当时赫鲁晓夫劝我们加入联合国。我们回答说我们要考虑一下，我们过去想，现在想，没什么理由要加入这个组织。

柯西金：我们在这件事上不想强加任何立场。

毛泽东：我们在联合国以外有更多的自由。只有帝国主义才想加入联合国。

柯西金：我们相信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情。就继续做你们觉得合适的事情吧。

毛泽东：我们瞧不起联合国。最好能摆脱整个组织，然后建立一个新的国际厨房。

柯西金：最好能立刻除掉所有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这是最好的办法。然而就算到那时也会有人想出点事情造成我们之间的争论。

毛泽东：会有争论，也会有停战。你们会看到没过多少年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改善了。10到15年　　这是一个确定的时间表，只有教条主义者才会这样提。你们做不到。

柯西金：您喜欢“教条主义者”这个词。

毛泽东：是你们把这个帽子戴在我们头上的。事实上在冬天我既不戴帽子也不穿大衣。昨天在巩固越南团结的集会中我们就没有穿大衣，我们也没有感冒。你看我们是如何磨炼自己的——一下冷，一下热。

柯西金：我在西伯利亚待了6年。在那里人们折磨自己更甚：他们在浴室里取暖，然后直接进入雪地，然后再回到浴室。这是为什么西伯利亚人是强壮的人民。周恩来同志在机场接我们的时候，他也没有穿大衣，他说他在磨炼自己。但是我选择另一种方式磨炼自己。陈毅在我们住的地方安装了很好的浴室，我先洗热水澡，再洗冷水澡。

毛泽东：您为什么不带着胜利离开呢？最主要的事情是您赢了周恩来。

柯西金：这可不是我的目标，我怀疑这不现实。整个世界都说周恩来是个伟大的政治家。现在他们会因为我们的会面而推测。

毛泽东：应该采取适当的反帝措施了。就这件事，我们都坚持我们自己的观点，也没有

什么奇怪的。可以允许共产主义者之间大的差异。不同国家的共产党都不一样，就如同帝国主义国家也都各有差异一样。

之后，毛泽东同志表示对安德罗波夫同志以及其他代表团同志的简历资料感兴趣。

这次谈话持续了两个半小时，到此结束。

谈话快结束的时候，周恩来指了指自己的手表，提示毛泽东该结束谈话了。不过很显然，毛泽东看上去并不着急。

参加此次谈话的还有，苏方：Ю. В. 安德罗波夫、Е. Ф. 洛吉诺夫、К. А. 韦尔希宁、В. В. 库兹涅佐夫、Г. С. 西多罗维奇、С. В. 契尔沃年科，中方：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贺龙、康生、陈毅、罗瑞卿、刘晓……①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7卷，第4288—4299页

№25648

费留宾与金炳稷会谈记录：介绍苏联对中国的抗议照会②

（1965年2月12日）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费留宾与朝鲜驻苏联大使金炳稷会谈记录

1965年2月12日

费留宾向大使介绍了苏联外交部给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有关“中国公民在今年3月4日游行时暴行”的照会内容。

金炳稷听完通报后说，他个人认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大使馆前组织游行，在报刊和广播上号召集会，在报纸上刊登挑拨性的文章是错误行为。大使接着说道，如果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存在分歧，那么应该在安静的氛围中去解决。像中国同志那样利用报刊和广播轰动了整个世界，让共产党员们看到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有分歧，这是不正确的，不是按共产主义的方式。金炳稷然后表示想知道是否会登载照会。

答复是肯定的。

① 所收集的文件系俄国档案的英译本，这里的人名标示为Jian Chen-yu，不知何人。很可能是英文翻译时出现了拼写错误。——编注

②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金炳稷表示刊登照会是一个很严重的步骤。

在向大使解释了刊登照会的必要性后说道，正如大使十分公正地指出的那样，中国人刊登了旨在反对苏联的挑拨性文章，试图将公众舆论引入歧途。正义需要还原真相。

金炳稷无论怎样也无法作答，但在谈话结束时"表示想知道能否将自己的孩子安排到音乐学校。我表示答应帮助他解决这个要求"。

……

АВПРФ，ф. 0102，оп. 21，п. 105，д. 2，л. 15－16

№25679

契尔沃年科与余湛会谈纪要：中国的游行示威无助于反帝斗争[1]

(1965年3月16日)

余湛转交了中国外交部对苏联外交部1965年3月12日照会的答复照会。

契尔沃年科不接受认为"苏联政府在美国人面前有些卑躬屈膝"的说法。

契尔沃年科指出：中国方面围绕游行示威在宣传上开展的喧嚣活动无助于调整苏联与中国之间的关系，中国人并没有选择在与美帝国主义斗争所应该采取的方式。要提醒注意的是，苏联领导人在与中国领导人会谈时建议讨论具体的计划，制定与帝国主义斗争的联合行动，正是在这里需要寻找一致的行动，而不是像在莫斯科所做的那样搞挑衅。

契尔沃年科着重强调，围绕中国人自己在莫斯科挑起的事端而在中国报刊上掀起的喧嚣和其他行为是旨在反对苏联与中国之间的友谊，无助于我们两国人民在与美帝国主义斗争中的团结。

余湛要求刊登中国的照会并在苏联报刊上进行报道。

АВПРФ，ф. 0100，оп. 58，п. 516，д. 5，л. 33－36

①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25950

沙里波夫等与陈毅会谈备忘录：介绍阿拉木图的经济情况

（1965 年 3 月 22 日）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前往喀布尔期间在阿拉木图作短暂停留的备忘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及其陪同人员于莫斯科时间 3 月 22 日 6 时 15 分乘专机抵达阿拉木图。

陈毅同志会见了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外交部长 A. 沙里波夫同志、阿拉木图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 E. 杜伊谢诺夫同志、外交部秘书长 Г. 卡尔扎乌巴耶夫同志、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部长会议办公厅副主任 H. 费多托夫同志以及其他政府官员。

A. 沙里波夫同志代表哈萨克斯坦政府在政府官邸欢迎了陈毅同志及其随行人员并招待了早餐。

中方出席早餐的有陈毅同志，其随行人员(11 人)，中国大使馆参赞张德群同志，二秘王荩卿同志及工作人员唐世嘉(Тан Ши Цзя)同志。

苏方出席早餐的有阿拉木图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 E. 杜伊谢诺夫同志、外交部秘书长 Г. 卡尔扎乌巴耶夫同志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外交部和部长会议其他相关工作人员。

早餐期间，陈毅同志对哈萨克斯坦，其中包括阿拉木图地区的经济情况，哈萨克斯坦的州的数量，以及与哈萨克斯坦接壤的其他共和国的情况，都表示出了兴趣。

A. 沙里波夫同志对陈毅同志感兴趣的所有问题都给予了详细的回答。

早餐结束前，陈毅同志举杯祝愿全世界人民的和平与友谊。

早餐在温暖融洽的气氛中进行。

前来迎接的官员随后送别了陈毅同志。

临行前陈毅同志再次感谢 A. 沙里波夫同志，祝其身体健康并请他转达对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第一书记、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热情诚挚的招待的谢意。

哈萨克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部礼宾领事司司长

Г. 别尔德古洛瓦(签名)

哈萨克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部一等秘书

Д. 拉马扎诺夫(签名)

1965 年 3 月 31 日

ЦГАРК，ф. 1955，оп. 2，д. 282，л. 49－50

№25681

契尔沃年科与刘晓会谈纪要：关于援助越南的政策①

（1965 年 3 月 23 日）

摘自契尔沃年科的工作日记
1965 年 4 月 17 日
第 199 号

绝　密
文本第 1 份

契尔沃年科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晓的会谈纪要

1965 年 3 月 23 日

按照中央的指示拜会了刘晓并向他作了口头声明(参阅库茨涅佐夫 B. B. 同志 1965 年 3 月 20 日的电报指示)。

听完口头声明后，刘晓说，对苏联方面针对他在今年 3 月 10 日按照中央和中国政府指示所作声明的回复，他表示十分遗憾，该回复中的指责都是没有根据的。他说，苏联政府不仅没有改变自己行动的立场，从当前的局势和越南人民的斗争利益出发这种行动是不利的，反而对"中国政府今年 3 月 10 日的答复提出完全没有根据的和荒谬的指责，那是无中生有"。

为了弄明白，刘晓提出了如下问题："苏联政府是否打算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派遣武装力量　　武装人员？你们是否打算在中国建立空军基地和空中走廊？"

我回答，从今天所作的口头声明中无法得出结论。因为中国方面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是否定的。这本身实际上就给尽快向越南民主共和国调拨防御物资造成了阻碍。因为在现在这个声明中，中国方面反对实施上述步骤，苏联将不再提出这个问题，而是指出确实存在的事实。

刘晓接着说道，"尽管我们有详尽的根据说明目前不应采取这样的军事行动计划，可你们认为我们是不愿意进行协助"，这样的情况让中方感到非常遗憾。随后他开始长篇大论地谈到了这个方面："中国方面永远赞成以军需物资帮助越南民主共和国，中国甚至表示愿意尽快调拨并将物资运往越南民主共和国。"刘晓强调中国方面是按进度表来执行运输计划，

①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并且部分物资已经运到了越南民主共和国。他还强调,“尽管还没签署任何正式的议定书,可2月25日后我们就预先准备好尽快将军需物资运送至越南民主共和国”。按刘晓的话说,“有几批物资已经运抵指定地点”,“我们同样也将在4月按进度表规定的运送物资”。刘晓继续说道,“从这点可以看到中国是在竭尽全力协助运送指定给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苏联物资,这样的协助对运送武器起到卓有成效的作用。您根据什么理由说,我们是在拖延运送并给运输制造困难?”刘晓接着说道:“中国方面从各种渠道得知散布的谣言,说中国好像在给越南运送苏联武器上制造各种困难,说中国把运输价格搞得太高了等等。”刘晓肯定地说:“在有些国家甚至普通人都知道苏联做的这些秘密事。”同时刘晓企图归罪于苏联方面,他肯定地说:“除了故意利用这些谣言达到反华的目的外,不可能有其他可解释的了。”他说,3月10日中国的答复中表示,中国方面不同意未经协商而采取未经详细考虑和轻率的军事行动计划,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方面对援助越南制造阻碍。他继续说道:“由于突然提出与特别计划相关的问题,对此我们的看法是,这不符合保密原则,有损于越南人民的利益。我们依旧坚持我们在3月10日答复中所表述的论据,我们认为这些论据是正确的。这是我们的立场,而有关协助向越南民主共和国运送特需物资的问题完全是不同的问题。”

刘晓说,苏联的建议似乎有点突如其来,A. H. 柯西金同志和周恩来在北京会面时没有就这个问题进行过协商。他肯定说:“苏联一方面对越南进行军事援助,而另一方面为进行和平谈判积极活动,这只能迫使我们得出在今年3月10日的答复中所表述的结论。”刘晓援引资产阶级报刊肯定地说,苏联方面正准备和平谈判,对此官方和非官方人士在新闻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了声明,塔斯社对此也作了报道。

刘晓继续说道:“如果你们要说我们不应该相信资产阶级的报刊,那为什么苏联不出面反驳呢?在新闻记者招待会上,一名苏联大使甚至没有提到要美国人从越南撤走自己的军队。苏联领导人和苏联报纸都在宣传以和平谈判方式解决越南问题。为什么要如此仓促地急于实施军事行动计划?”刘晓强调说:“应该考虑到越南和中国政府的看法,而后再采取某些措施。”他又问道:“当美帝国主义继续对越南进行轰炸、搞战争升级并扩大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略时,当敌人在威胁而试图使我们投降时,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不采取‘针锋相对’的立场?”同时刘晓还说,必须动员国际社会将美国赶出越南,迫使他们严格遵守日内瓦协议,现在不是谈论和平谈判的时候,必须坚决地要求美国停止侵略并从越南撤出自己所有的军队。他试图指责苏联方面“在向越南提供如此不多的援助时,却大肆宣扬自己的计划,不遵守保密原则,为了自己能控制局面而背着中国和越南与美国人进行有关越南问题的谈判”。他肯定地说,苏联方面所做的并不都考虑越南方面的看法,并举例说,越南同志不同意苏联派遣4 000名军事人员,不要求派米格-21PF战斗机,他们想要越南的飞行员能在苏联接受训练,只要米格-17飞机,还要求派遣地对空导弹装置的专家。刘晓表示,“奇怪的是苏联方面请求在昆明划分出一个机场,因为按这批飞机的技术特点看来,它们的活动半径无法在越南境内完成飞行”。他也否认是由于中国人拖延解决具体问题的原因而导致几批急需

的武器未能及时运抵越南民主共和国以及越南人民因此遭受了损失。同时刘晓还表示："中国方面对苏联的军事援助给予了应有的评价，可认为还不够，如果你们能提供更多的援助，中国方面将感到高兴并将全部及时地运送。"当越南人民面临来自美帝国主义的威胁时，仅靠军事援助是不够的。必须采取"针锋相对"的方针。在越南与美帝国主义斗争的决定性因素是越南人民，他们决定着事业的成败，而我们的援助能鼓舞他们的斗争精神，所以不应该说服越南人去跟帝国主义者进行和平谈判。

在谈到中国对越南的援助时，刘晓说，中国人采取"坚决支持越南人民的立场"，"实际上已经做好准备并尽一切所能去支持和援助越南"。刘晓表示："如果需要的话，你们可以相信，我们将像在朝鲜与朝鲜人那样肩并肩地同越南人站在一起。"他着重指出，中国的方针是要孤立美帝国主义，"我们反对越南在美国人的武力威胁下前去参加谈判"，只有"一些人故意试图离间中国与越南的关系，宣称好像我们中国人只是在口头上而不是在行动上支持越南，使我们惊讶的是这样的想法也出现在你们的答复中"。刘晓证实，3 月 10 日的声明中阐述的中国立场是正确的，充分答复了苏联大使口头声明中所触及的所有问题，中国方面保留在仔细研究苏联声明后再作补充答复的权利。

对于我们的问题：中国方面是从哪里得到谣传说中国过分地提高了军用物资的运输费，刘晓没有给出具体的回答，他表示，"你们自己知道从哪儿得知的。我们到处都能得知这些谣传"。刘晓说，世界上有许多谣传和诽谤在流传，政治就像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不能以此为基础。

……我表示，苏联确实向在与美国侵略者进行斗争的越南人民提供了实际上相当可观的援助，如果像 A. H. 柯西金同志与周恩来会见时建议的那样，我们联合的行动协调一致并得到中国方面的理解，那么毫无疑问将会更加有效。中国方面以各种借口开始阻挠苏联加快援助物资的运送，这就降低了苏联向越南人民曾经打算提供的援助和现在正在提供援助的效果。同时我指出，即便不是军事专家也该明白，当美帝国主义者采取进攻性的轰炸时，当越南普通人的鲜血在流淌时，一种是按作战程序将飞机运到指定地点，另一种是将飞机拆散，然后用火车运走。

但是，苏联方面在表示已经准备好立即援助的同时并没有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想法，它严格遵守的出发点是中国是一个主权国家，只有它的政府才能决定与其国内相关的问题，它有权按它认为需要的去做。苏联方面以前和现在都很重视这点。

对于刘晓提出的关于苏联方面在建议将昆明市作为基地时没有考虑到飞机能否利用的问题，我说，刘晓的这些话不能不让人感到奇怪，因为这不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要是中国方面认为昆明不适合作为这一用途的机场，就应该提出更合理的方案，而不要对提出的机场方案适当与否进行抨击，因为中国人更清楚地知道该如何为指定用途在自己境内部署航空兵部队。我说，难道那些伸出兄弟般的国际援助之手真心想帮助斗争中的人民的人是这样做的吗？还补充道，如果对每一种立场都进行这么具体的研究的话，那么中国方面自己对这件事情的态度就已经降低了苏联能够对越南进行援助的效果。这些是事

实,是任何泛泛而谈和长篇大论所掩盖不了的。对于所有的人来说,已经很清楚谁确实正在战斗和想去战斗,谁只是在口头上和谁实际上在提供援助。我们认为,越南人自己是明白这些的。

刘晓认为,苏联背着越南和中国推行与美国和平谈判的方针,我坚决地对这一推断进行了驳斥,指出中国方面无法否认对任何人都显而易见的事实:在 A. H. 柯西金同志的北京和越南逗留期间、在苏联政府的正式声明和我们报刊的文章中、在苏联的各种集会和劳动者大会上,都曾表示过而且现在也在表示:将坚决抗议国际反动派的头子美帝国主义者的行径,揭露它是日内瓦协议的破坏者;以前主张现在仍要求停止侵略,美军从南越撤出,以及应该由越南人民自己而不是由某些美国人来决定越南自身的命运。我着重强调说,在中国和越南没有支持苏联方面以协商方式提出的诉求后,苏联方面没有在任何地方背着越南民主共和国和中国进行和平调解的工作。

我坚决地拒绝了刘晓有关苏联以自己的行为似乎竭力要将中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置于自己控制之下的表示,指出:我们没有从越南同志那里听到过这样的指责,也没有从他们那里听到说苏联将越南不需要的东西派送给他们。

我说,由于与苏联无关的原因,非常遗憾,我们这些国家不能在同一支队伍中与美国在越南的侵略势力作斗争。美国人正竭力利用这点,这只能使无论是中国与苏联之间的关系,还是反美斗争的共同战线遭受损失。但不管已经形成的局势如何,苏联将走自己的路,将继续向与美国侵略势力进行斗争的越南人民提供必要的援助,将诚心诚意地履行自己的国际义务。

所有人,包括越南人,都能看到苏联在全世界劳动人民面前诚心诚意地履行自己的国际义务。不管你们说多少写多少,在这方面你们无法遮掩住苏联真诚的、明朗如同太阳般的面貌。

会谈结束时,我请刘晓认真地思考一下我们的口头通报并加以研究。中国方面将看到里面有事实可证明的每一行内容都表明苏联公正的国际立场。

……"中国领导人建议苏联领导人改变一下对帝国主义和对召开 3 月 1 日会议的策略,可苏联领导人并没有倾听这些建议。我们怎么会走在统一的队伍中?如果这样下去的话,苏联明朗的太阳将走向落日",刘晓这样说道。

……

АВПРФ,ф. 0100,оп. 58,п. 516,д. 5,л. 45 - 54

№08116

苏斯洛夫在苏共中央全会的报告：共产党和工人党协商会议的总结

（1965年3月26日）

同志们！

正如诸位所知，今年3月1—5日，在莫斯科举行了有19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参加的协商会议。这一会议，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争取共产主义运动队伍，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团结起来的斗争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莫斯科会议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关键时期举行的。评价1960年会议以来世界事件的进程，应该肯定，尽管共产主义运动中存在严重的困难，但它还是大大地前进了。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实力增长了。苏联顺利地进行着共产主义建设。人民民主国家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民族解放运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以建设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新获得独立的国家越来越多。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识中，反对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的斗争倾向越来越大。许多共产党的人数不断增长。国际形势变得越来越有利于社会主义，有利于和平力量。

但不能不看到，以美帝为首的世界反动派在许多情况下越来越活跃，企图加剧世界各地区的紧张形势，采取旨在反对社会主义国家、反对摆脱了殖民主义统治的国家、反对人民解放运动的侵略行动。

美帝国主义扩大它在印度支那的武装侵略。美国空军对民主越南的野蛮轰炸激起了全世界的极大愤怒。对革命的古巴、对老挝和刚果人民不断进行挑衅。事实表明，帝国主义者企图利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实现它的侵略目的。

在目前的形势下，捍卫和巩固社会主义国家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斗争具有特别的意义。近年来共产党员队伍中十分尖锐的分歧给我们的共同事业带来了很大的损失。所以，苏共中央在其10月中央全会之后，认为最重要的是制定具体的措施以促进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巩固，促进克服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困难，促进共产主义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在分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形势之后，苏共中央得出了必须对一系列对巩固国际共产主义团结具有第一位意义的重要问题，采取新的态度的结论。

自然不能轻视现实的形势，即在共产党员中、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对许多重要的原则问题存有严重的分歧。但在这种条件下最坏的方法是互相要求对方投降。我们坚决抛弃这种强迫和把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强加给其他党的做法。解决现有困难的立场原则在于，尽管存在分歧，应集中精力探索途径，以便把所有共产党团结起来，共同制订和实施反对共同

敌人——帝国主义、保卫工人阶级利益、支持人民解放运动、防止新的世界战争、实现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原则的统一行动纲领。列宁教导说:“政党内部的和政党之间的分歧通常不仅靠原则的辩论,而且靠政治生活本身的发展来解决。”(《列宁选集》,俄文第9卷,第125页。)自然,指望短时间内克服现有的困难是幼稚的。重要的是逐渐地、坚定地、一步步地沿着这个方向前进,首先理顺所有共产党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必须统一行动的各领域里的合作。各共产党的紧密团结为当代各主要革命力量——社会主义大家庭、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紧密团结创造着基础,而这对于顺利地开展反帝斗争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本着这一考虑,我党在10月中央全会之后,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巩固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的实际步骤。最近几个月,我们同许多兄弟党代表团举行了会议和座谈。其目的是探索新的解决共产主义运动中分歧的途径和方法。

今年1月举行的华沙条约成员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显示了社会主义国家团结一致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建立多边核力量的计划,而且也是对加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团结的贡献。

最近,我党和政府积极地同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及其政党进行接触。同志们知道,以柯西金同志为首的苏联政府代表团访问越南民主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从发表的河内谈判和平壤谈判共同声明中可以看出,在许多共同的政治问题上,我们这些党的立场是一致的或接近的。

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为同中共中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作出了新的努力。还在去年11月,在同周恩来同志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会谈时,我们就提出了一系列新建议,要求在国家生活方面和克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方面调节关系。

10月中央全会之后,中央主席团认为,为准备共产党国际会议必须采取新方法。其他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也有这种想法。问题是:准备国际会议是否还用老办法,是否还像以前那样,必须借助起草委员会,还是采用新的方法?我们党和大多数其他兄弟党一样,主张采取新的努力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起来,主张探索新的方法和形式准备会议。

在这方面提出了关于改变3月共产党会议的性质和任务的建议。其实质在于,参加3月1日会议的各共产党代表团不再担负起草委员会的职能,不从事起草未来国际会议的文件草案,不确定未来会议召开的期限。这次会议的目的是相互协商,呼吁参加1960年会议的所有兄弟党集体努力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加强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行动。

苏联共产党、保加利亚共产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波兰统一工人党、德国统一社会党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代表在华沙会议时概括地讨论了3月1日会议的新方法,并表示同意。澳大利亚、阿根廷、巴西、德意志、印度、叙利亚、美国、芬兰、法国、蒙古共产党的代表也同意这些建议。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的领导人同意参加协商会议具有重要意义。古巴的同志们对我们的邀请好长时间没有给予回答,直到会议前不久才决定参加,在会议过程中积极捍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立场。意大利共产党同意参加3月1日会议,虽然他们认为召开的不是时候。在这个问题上曾动摇不定的是英国共产党的领导,但后来它的代

表团还是来到了莫斯科。关于3月会议的新特点通知了罗马尼亚工人党的领导，但它没有表示希望参加会议。

出访越南和朝鲜的苏联代表团在北京逗留期间，把拟定的3月1日会议的特点通报给了中共中央。中共领导人坚决拒绝参加这次会议。同时他们没有提出任何准备召开会议的协商建议。而且，毛泽东同志还改变了以前的态度，说，国际会议不仅4—5年内开不了，再过8—10年也不能开。中国领导人继续坚持所有兄弟党必须无条件地接受他们在1963年6月14日著名的中共中央复信中所阐述的所谓的总路线(“二十五条”)。

苏联代表团还把3月1日进行会议的新建议向越南和朝鲜的同志们作了通报。越南劳动党的领导人声明，说在苏共中央代表解释了3月1日会议的性质之后，“他们没有看到任何不好”，但还是不能参加。朝鲜劳动党的领导人也不同意参加3月1日会议，理由是中共代表不参加会议。

苏共中央还把自己改变3月会议性质的建议及时通告了参加过1960年会议的所有兄弟党的领导。

在这种情况下，3月1日协商会议开幕了。

协商会议的工作贯穿着完全民主、真诚自由交换意见的精神，贯穿着友好和团结的精神。在会议中各兄弟党表示出了多为共同事业作贡献的愿望。实际上所有党都很积极，他们的代表都给公报提出了自己这样或那样的意见。

众所周知，与会的各党代表一致通过了两个文件：关于越南事件的声明和会议公报。

在对当前形势看法和反帝斗争问题上，与会者表示了完全一致的意见。他们一致表示声援英勇的越南人民和越南劳动党，声援同帝国主义侵略进行斗争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

协商会议表明，尽管各党与会代表之间在观点上还有分歧，但他们都有在原则基础上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共同意愿。能一致通过公报，这证明，在态度灵活和考虑各种意见的情况下，可以就重要问题通过共同决定。

与会各党强调，当前所有革命力量的团结对顺利开展反帝斗争具有决定的意义。这一团结的利益坚决要求加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正如公报中指出的：“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求所有共产党表现出对自己国际主义责任的理解，为反对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和垄断资本统治，为积极支持解放运动和保护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各族人民，为争取建立在尊重所有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基础上的普遍和平而团结起来。”

与会者坚信，“使所有共产党团结起来的因素大大超过了现在使他们分离的因素”。公报还指出：“在为共同目标而斗争的过程中，即使在政治路线和许多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上存在分歧，也能够而且必须做到统一行动。”

在克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困难的方法问题上，也表示了共同的意见，即共产党和工人党在争取共同目标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共同行动——这是克服现有分歧的最可靠的道路。与会者同时强调，必须积极地为兄弟党国际会议的召开创造有利的条件。

遵照1960年声明的原则,参加会议的19个党的代表一致指出,在当前条件下,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国际会议是相互交换意见和经验,通过集体努力丰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为争取共同目标的斗争制定共同立场的有效形式。遵照完全平等和每个党独立的原则召开这些会议,可为克服分歧和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加强共产主义运动团结服务。所以,与会者认为,积极和全面地准备并在适当时候召开新的国际会议完全符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

所有党的代表团都一致承认,现在必须真正做到改善兄弟党之间的关系。同志们指出,必将改善各党关系的重要手段是进行双边和多边会议。

19个党的代表关于采取最民主的集体方法准备全世界会议的愿望,在公报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众所周知,3月会议的参加者们主张,为了讨论新的会议的召开问题,想进行预备会议,参加者是参加过1960年会议的81个国家的党代表。他们承认,不宜确定81个党预备会议召开的期限以及确定它的具体任务。关于解决这一预备会议的召开问题和确定它的任务需同所有党协商。

在新的会议召开的期限问题上,协商会议参加者们反对两种倾向:反对过于匆忙,反对在为新会议召开创造条件问题上无所事事。

为了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创造有利的气氛,19个党的代表们主张停止不友好的对兄弟党带有侮辱性质的公开论战,同时指出,他们认为采用同志们式的方法,不进行攻击,继续对共同关心的当代重要问题交换看法是有益的。会议参加者呼吁严格遵守1957年和1960年会议确定的各党之间的相互关系准则,谴责一些党干涉其他党的内部事务,这也具有原则的意义。

这样,可以确定地说,苏共中央在10月中央全会之后提出的克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困难的新方法,得到了19个党的完全支持。当然,在这方面的一些具体问题上也有不同意见。

在3月会议期间,意大利和英国共产党的代表在国际会议问题上持有某些不同的立场。意大利的同志们坚持这样的观点,即现在只应该提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为未来国际会议的召开创造有利的条件。可以感觉到,他们实际上不同意召开新的共产主义国际会议,尽管他们说原则上同意。这引起了所有代表团的坚决反对,他们强调,不能放弃召开这一会议的想法,不能把它推到遥远的将来。这一立场在公报中也有反映。

意大利的同志们还对公报中提及的1957年和1960年莫斯科会议的宣言和声明持保留意见,说这些文件的某些原则现在已经过时了。

英国共产党的代表坚持这种观点,认为克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困难和准备召开国际会议的最重要的条件,是苏共和中共举行会议和关系正常化。他们主张,在公报中不要有关于所有兄弟党会议组织准备的任何原则。同时应该指出,英国共产党的代表积极参与了公报草案的审订工作,毫无保留地接受了最后的文本。

同志们!苏共中央主席团把莫斯科会议的成果看作是向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团结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是对反帝事业的重要贡献。会议的基本成果是,会议的参加者表示该党决

心为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在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确定的路线基础上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做出自己应做的一切。

莫斯科协商会议的目的和意义在于，在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基础上，为兄弟党的接近和加强他们之间的团结开辟了新的前景。它取得的成果受到保加利亚、匈牙利、民主德国、联邦德国、蒙古、波兰、法国、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共产党和工人党领导机关的赞许。意大利共产党政治局完全同意协商会议的结果，但对通过的公报保留某些意见。英国共产党执委会也对会议结果保留一定的意见，实际上它还想"纠正"自己会议代表的立场。

古巴、阿根廷、乌拉圭、哥伦比亚、智利、印度、黎巴嫩和其他许多国家的共产党报刊都积极评价会议的结果。会议中提出的建议还继续在兄弟党中研究。应该指出，越南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报刊没有反对莫斯科会议和它通过的文件。罗马尼亚报刊也与此一样。

所有对反帝斗争感兴趣的人都把莫斯科会议看成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和一切革命力量团结事业的重大贡献。同时也应该清楚地看到，向预定的目标前进——从协商会议达成的统一到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这还是遥远的事。在这条路上还有不少困难。中共领导人仍在继续努力，企图把国际社会舆论的注意力从协商会议的积极成果上引开，努力贬低它的影响，歪曲所通过的文件实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领导人也疯狂地攻击会议。对会议参加者提出的建议持否定态度的还有印度尼西亚和日本共产党的领导机关。

特别应该提到的是中共领导的立场。中共领导针对协商会议大发文章，竭尽恶毒攻击之能事，似乎会议导致分裂，尽管每一个认真阅读过会议文件的人都清楚，文件中，除了殷切关心在反帝斗争和争取民族解放、争取和平、民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斗争中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团结和共产主义队伍的统一之外，其中没有提到任何别的东西。

为了理解中国党和政府领导的立场，我们特意举出这个例子——他们拒绝进行协调行动保卫越南。中国同志否定我国代表团关于苏联、中国和越南共同发表声明揭露美国违反日内瓦协定(该协定是越南民主共和国独立和安全的保证，其中规定外国军队撤出印度支那)的建议。他们还拒绝了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关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个问题上共同行动的建议。

中国领导人摇唇鼓舌，把自己描绘成反帝的斗士，描绘成越南人民利益的捍卫者。但我们不知道中国援助越南的实际步骤。而中国领导对苏联援越的态度却十分令人震惊。一方面，它千方百计贬低苏联对越援助的意义，另一方面又尽力妨碍这一援助。

应越南同志们的请求，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立即做出援助越南巩固国防，尤其是对空防御和海岸防御的决定。越南总理范文同同志在3月11日的信中写道："我以越南劳动党中央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名义，我们向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表示真诚的感谢，感谢援助我国巩固国防。"

由于尽快掩护北越城市免遭美国空军袭击至关紧要，我们请求中国当局允许载有军事

技术装备和必要数量军事专家的苏联运输机穿越中国领空。但中国政府拒绝了这一请求,理由是苏联飞机在中国上空飞行可能被敌人发现,从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没过几天,中国领导人又想出了新的十分可笑的借口。他们把苏联航空兵部队经中国飞往越南的建议完全看成了“想控制越南和中国”的企图。他们竟不为这种荒诞的论断害羞,似乎待在越南民主共和国边境地区的几百人“可以控制”有6.5亿人口的中国。

由于中国领导人的这一立场,尽管美国在越南的侵略行为不断加剧,我们给越南提供的必要的军事技术装备(主要是防空装备)只能用铁路运输,这需要很长时间。不过,由于我们的努力,部分苏联装备还是运到了越南。

与努力贬低苏联对越军事援助意义的中国领导人不同,越南的领导同志强调指出,苏联的军事援助对越南来说是十分必要的,而这一援助的友谊性质、援助的巨大数量和效果是“毋容置疑”的。他们“深深地真诚地感谢苏联所给予的援助”。

正如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范文同同志所通报,“根据他掌握的情况,苏联以前提供的装备基本上都运到了越南”。

3月22日,胡志明和范文同同志在同来到河内的苏联军事代表座谈时说,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军队的装备中,基本上是苏联的武器和战斗技术装备。新提供的这些装备大大加强了他们的力量,使他们建立了现代化的正规军……他们高度评价苏联人民的国际主义义务,他们让我们放心,他们一定能掌握这些装备,这些装备将操纵在可靠的人的手中。他们将不辜负信任,与美帝作殊死的斗争。

越南的同志们就是这样评价我们的援助的。这种援助还在继续。苏联一定完成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这方面任何人都不能怀疑。

至于中国方面给予越南的实际援助,我再重复一遍,我们不清楚它的援助数量。但是,据以上所说,不能不令人生疑:中国领导人所说的大话未必与他们的实际行动相符。

中共领导人最近又活跃起来,接连不断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攻击我党和我党中央。从去年11月初开始,中国报刊广泛刊登从外国拣来的诬蔑我党和我国的材料。1964年11月21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编辑部文章,大加歪曲苏共10月中央全会决议。这之后又是新一轮的中共领导正式代表们的行动——直接或间接攻击反对苏共。为了攻击我党的总路线,中国领导人甚至利用人大例行会议的讲坛。看来,为了给新一轮反苏浪潮制造国内舆论,中国报刊从2月底开始加紧散布谎言,似乎苏联正在进行“疯狂的反华运动”,尽管众人皆知,我国已有5个多月没有发表同中共论战的材料了。

3月22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的题为《评莫斯科三月会议》的文章表明,中共领导想在报刊上展开比以往更加激烈的反对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斗争。① 这篇文章被电台用多种语言,其中包括俄语广播。这篇文章对19国党代表协商会议进行了恶毒攻击。文章对兄弟党充满了侮辱性词句,指责他们是“修正主义”、“叛徒”、“两面派”,等等。

---

① 《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于北京时间1965年3月23日发表《评莫斯科三月会议》。——译注

中国领导人完全否定协商会议公报中所包含的一切积极建议。它彻底反对同兄弟党一起行动反对帝国主义，扬言根本谈不上同苏共和其他党“共同对敌和统一行动”。下述事实也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中共领导为了追求自己超级大国目标完全轻视人民的意志——共同反对在世界各个地区加紧活动的帝国主义。

中国领导人还拒绝关于召开81个党的预备会议和兄弟党代表的国际会议的建议。他们首次公开宣称，召开这样的会议至少还得8—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文章公然煽动公开论战，说“要停止公开论战是不行的，一天也不行，一个月也不行，一年也不行，一百年也不行，一千年也不行，一万年也不行”。中共领导不仅公开支持兄弟党的宗派集团，而且扬言“今后必须大大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中共领导把同苏共和其他党的分歧说成是“两个敌对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分歧”，所以他们拒绝关于改善我们两党关系的一切意图。

最后，中共领导人完全丧失了理智，他们向我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提出了“最后通牒”。他们要求我党的不是别的，而是让我党承认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决议中和苏共纲领中集体提出的总路线是错误的。

中国领导人最近这篇文章的基本方面就是这样，它只能被看作是想重新发动激烈的反对苏共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冷战”。

苏共中央，我们全党，全体苏联人坚决批驳对我党和我们国家的这种蛮横态度。中国对协商会议批评的调子完全在整个共产主义运动面前暴露了中国领导的虚弱立场，它找不到一点儿像样的论据反对这一会议，于是乎走上了诬蔑和谩骂的道路。一些兄弟党的报刊(如意大利《团结报》、捷克斯洛伐克《红色权利报》)已经开始批判《红旗》杂志这篇文章了。

中国领导人不仅企图给苏中关系正常化制造困难，而且公然允许对我国进行挑衅。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就是他们那次完全不能容忍的行动——在莫斯科美国大使馆门前的抗议侵略越南的学生游行示威活动。苏联外交部在给中国政府的照会里指明了这一行动的实质。必须强调指出，这次我们碰到的是有计划的精心策划的挑衅行为。中国的“示威者”全都装备了匕首、铁棒、铁拳套，这说明他们绝不是准备进行政治游行反对美国人和“同帝国主义作斗争”，而是准备同苏联警察打架，以便为新的反苏行动找借口。的确，北京报刊已奉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苏运动，指责苏联政府“镇压”莫斯科反美游行示威。中国领导人竭尽全力利用中国留学生挑起的事件以便在中国掀起空前的反苏歇斯底里。只举一个例子便够了，3月6日，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这样的事件：在苏联驻中国大使馆门前爆发了所谓的抗议“殴打莫斯科中国留学生”的示威游行。

苏共中央主席团认为，再出现类似的反苏挑衅事件时，看来我们不得不采取必要的报复措施，同时把情况通报全国。与此同时，真诚希望共产主义运动形势正常化。中央主席团认为，必须耐心地，不受挑衅事件的影响，改善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共的关系，自然，必须在原则的基础上。要向中国人民表明我们同他们友好相处的真诚愿望。我党将坚定地捍卫自己的总路线，彻底地为和平事业和社会主义事而斗争。

本着千方百计团结社会主义大家庭和援助我们兄弟党的愿望,我们认为必须一如既往给越南提供援助。我们将继续努力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其中包括中国和中共,共同行动,支持越南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斗争。

同志们!莫斯科19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协商会议是争取共产党人反帝行动统一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巩固和团结的重要步骤。

苏共中央主席团建议同意会议通过的文件。中央主席团认为,必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决议以及我党纲领的基础上,继续彻底贯彻加强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大家庭团结的路线。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将广泛地实行多边和双边会议,发展同兄弟党和社会主义国家一切形式的合作。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在所有活动中,我们党的出发点是:加强这一运动团结和影响力的最重要条件,就是我国顺利地沿着共产主义道路前进,不断加强苏联的经济实力,提高它在国际舞台上的威望。

列宁的党和她的中央委员会,所有共产党员和全体苏联人将不遗余力地把共产主义事业顺利地推向前进!

会议主席波德戈尔内同志:还要讨论苏斯洛夫同志所作的报告吗?

出席者:不需要。

会议主席波德戈尔内同志:对报告有没有意见?没有?

出席者:没有。

会议主席波德戈尔内同志:中央主席团拟定了苏共中央全会关于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议(1965年3月1—5日)总结决议草案。如果没有反对意见,就请你们审核草案。现在请波诺马廖夫同志宣读草案。

波诺马廖夫:《苏共中央3月中央全会关于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议(1965年3月1—5日)总结的决议》。

苏共中央全会听取了苏斯洛夫同志所作的关于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莫斯科协商会议(1965年3月1—5日)总结的报告,完全同意会议通过的文件——会议公报和关于越南事件的声明,同意苏共代表团的行动。

全会认为,该会议是为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民族解放,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从而在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会议总结表明,与会的共产党充满了坚定的信心,决心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在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所确定的路线的基础上,为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做出自己应做的一切。

苏共中央全会完全同意会议参加者的意见,即加强团结的主要途径就是每个共产党提高自己的国际主义责任心,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支持民族解放斗争,反对垄断资本统治,采取普遍和平和实现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争取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等共同斗争。现在,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共产党、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和民主力量,为反击美帝国主义侵略越南、保卫越南民主共和国和保卫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人民而共同行动

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为此，会议参加者通过的关于越南事件的声明具有重要意义。

苏共中央全会认为，为继续援助和支持越南人民的英勇斗争，为加强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国防能力反击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苏共中央主席团所采取的同越南劳动党领导相协调的措施是正确的，对此表示完全同意。

中央全会完全同意公报中所包含的意见和看法。我们党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促进这些意见和看法得到实际的体现，从而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基础上加强团结。

苏联共产党同意会议参加者的结论，即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削弱了它的团结，给世界解放运动和共产主义事业带来了损失。我们党同参加会议的党一样，认为在当今形势下，特别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克服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困难，恢复它的队伍的统一。

中央全会支持会议参加者在完全平等和相互尊重所有党的意见的条件下制定的关于加强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提案，提案规定：在争取共同目标的斗争中共同行动，通过集体努力改善各党之间的相互关系，利用双方会议和多方会议以及其他的政党之间相互联系形式，停止相互攻击和非同志们式的公开论战。同时还应该提倡就当代最重要的问题交换意见，在交换意见时，要采取同志式的方式，严格遵守1957年和1960年会议所确定的政党相互关系准则。

在适当的时候举行参加过1960年会议的81个党的代表的事先协商会议，符合加强兄弟党团结的利益。这种会议是能够以最民主的方法，确定新的共产党代表国际会议准备的途径和方式。积极而全面地准备新国际会议并在适当时候召开这一会议，符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协商会议参加者的这一结论得到了苏联共产党的完全支持。

苏共中央全会同意中央主席团在10月(1964年)全会之后所采取的加强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友谊和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措施，其中包括同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系和合作的措施。

苏联共产党将一如既往坚定地贯彻反映在苏共纲领、莫斯科会议宣言和声明中的列宁的路线，坚定地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与其他共产党一起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民族解放、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实现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所有当代革命力量的团结。

主席波德戈尔内：是否可以通过这个草案？

出席者：可以。

主席波德戈尔内：可以？

出席者：完全可以。

主席波德戈尔内：有没有意见和补充？

出席者：没有。

主席波德戈尔内：现在对决议草案进行表决。谁赞成这一提案请举手。谁反对？谁弃权？一致通过。

我们认为，需要在报刊上公布这一中央决议。有反对意见吗？

出席者：没有。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 17 卷，第 4300—4327 页

№20826－3

苏共中央全会决议：关于三月协商会议的相关问题

（1965 年 3 月 26 日）

1965 年 3 月 26 日苏共中央全会通过的决议

苏共中央全会听取了 M. A. 苏斯洛夫同志关于 1965 年 3 月 1—5 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议结果的报告，一致同意此次会议上所通过的文件——关于越南事件的公报和声明以及苏共代表团的活动。

全会认为，此次会议是通向以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民族解放、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胜利为宗旨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大团结的道路的重要步骤。

会议结果表明，与会的各共产党组织都在以彻底的坚定决心在马列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1957 年（莫斯科会议）宣言和 1960 年（莫斯科会议）声明所确定路线的基础上，竭尽全力地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苏共中央全会完全同意这次会议与会者们的意见，即加强团结的主要方式——提高每个共产党组织自身的国际主义责任感，以联合行动的方式积极完成如下总的斗争任务：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支持民族解放斗争，反对垄断资本，为争取世界和平而确立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当前，世界所有国家的共产党和所有爱好和平、民主力量在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越南，捍卫越南民族共和国和保护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各民族的斗争中的联合行动也同样具有特殊的意义。在这方面，会议与会者作出的关于越南事件的声明具有重大意义。

中央全会认为，中央主席团为加强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防御力量和反击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根据与越南劳动党领导人达成的协议所采取的援助越南人民英勇斗争的措施是正确的，并完全赞同这一做法。

中央全会完全同意公报的观点和思想。我们党单方面使用了一切必要的手段，以便它们得以落实并进而在马列主义原则基础上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苏共与会者所得出的结论，即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在削弱了自身团结的同时，也会对

世界解放运动和共产主义事业带来损失。我们党和其他与会的兄弟党均认为，在当前形势下尤其有必要采取切实措施以克服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困难和恢复其队伍的团结。

中央全会支持与会者在完全平等和相互尊重各党派意见的条件下所提出的关于加强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方式的建议。这些建议具体包括：在为了实现共同目标而斗争的过程中联合行动，通过集体努力的方式来改善各党派之间的关系，利用双边、多边会谈和党的其他联系渠道，禁止包含有诋毁内容和采取非同志方式的公开论战。与此同时，我们还应弘扬以同志式的方式就当代一些重大问题交流意见的做法，严格遵守1957年和1960年(莫斯科)会议所确定的党际关系模式。

如期举办的、由参加了1960年(莫斯科)会议的81个政党代表的预备协商会议起到了加强兄弟党团结的作用。这次会议使我们能够以更加民主的方式来确定筹备新的共产党代表国际会议的方式和模式。积极而全面地做好新的国际会议的准备工作并在恰当的时间举办这次会议符合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协商会议与会者的这一结论得到了苏共的完全支持。

苏共中央全会赞成中央主席团在(1964年)10月中央全会之后所实施的加强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友谊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的举措，其中包括为进一步发展与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关系、友好团结而采取的举措。

今后，苏共仍将继续坚定不移地贯彻在苏共党纲、莫斯科会议宣言和声明中所规定的列宁路线，坚决捍卫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并与其他共产党一道团结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所有马列主义政党和所有当代革命力量，共同参与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为争取民族解放、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而奋斗。

РГАНИ，ф. 2，оп. 1，д. 786，л. 41об－55об

№23049

梅夏采夫致苏共中央报告：北京广播电台对苏联进行歪曲宣传

(1965年3月29日)

绝　密

致苏共中央：

我们的通报内容是，北京对苏无线电广播在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协商会议期间和之

后越来越多地充满针对苏共和苏联政府、国内政策，尤其是苏联对外政策的诬蔑性诽谤。必须指出的是，此类造谣中伤如今主要集中在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身上。

在今年2月下旬，北京无线电广播27次全文播报了在中国出版的《赫鲁晓夫发言稿第三卷》的绪言，并多次播放了已在《人民日报》刊登了的名为《赫鲁晓夫的幽灵并未消失》的报道。

今年3月，北京广播电台节目单中每天播放的材料也都具有上述倾向：3月1日，转播了新华社就 Б. Н. 波诺马廖夫主编的《工人阶级的国际革命运动》一书所作的报道文章；3月2日——《人民日报》报道，题目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苏联无处不在》；3月3、4和5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从苏联报刊上有倾向性地挑选出来的材料，题目为《请看，苏联报刊最近都在宣传什么》；3月4、5和6日——关于从中国报刊中节选而成的文章集合的出版报道《关于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问题而发生的论战》。

尤其激烈的攻讦主要包含在北京广播电台关于"3月4日在莫斯科镇压外国大学生反美示威游行"的材料中。期间，该电台多次重复了中国就这一问题给苏联外交部的照会以及给"受伤"中国大学生的慰问电和《人民日报》于3月15日发表的评论《最强烈的愤慨，激烈的抗议》。

与此同时，北京广播电台还在自己的节目中广泛采用了从日本和澳大利亚分裂主义者报纸上所刊登的文章。例如，3月10和11日，便转载了《赤旗报》于2月26日所载的文章《季莫费耶夫和美帝国主义》；3月11日——来自《澳大利亚共产党人》杂志第12期上的一篇文章《关于为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立场而斗争》；3月12和13日——《赤旗报》于2月25日所载的一篇文章《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现代修正主义者幻想的破灭》。

今年3月下旬，北京广播电台转播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议的宣传资料。3月19和20日，转播了《人民日报》刊载的一篇报道，题目为《苏联领导人制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裂的重大步骤》；3月20和21日——《人民日报》刊载的针对一些协商会议与会者所发声明的评论以及资产阶级报刊对这次会议的反应；3月22日——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关于莫斯科三月会议》。3月26日，北京广播电台开始详细报道来自阿尔巴尼亚报刊的一篇文章《3月1日的修正主义分裂会议——反对马列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大阴谋》。

所有这些和其他事实均证明，中共领导人正积极加紧宣传和极力再次把苏共拖入论战，而不这样的话，中国领导人便无法在自己国内和国外实施自己的众所周知的图谋。

国家委员会主席①

Н. 梅夏采夫(签名)

1965年3月29日

第172cc号

РГАНИ，ф. 5，оп. 30，д. 462，л. 26－27

① 原文如此。梅夏采夫时任苏联部长会议广播电视委员会主席。——编注

№25685

契尔沃年科与科尔特等会谈纪要：途经中国向越南运送苏联武器[①]

(1965 年 4 月[②])

与民主德国驻华大使科尔特、匈牙利驻华大使和波兰驻华临时代办斯塔霍维亚克的会谈纪要

契尔沃年科："如已得知的那样，中国官方人员在与社会主义国家大使馆代表以及中立国家代表的会谈中竭力歪曲事情真相，利用中国政府向越南民主共和国通过中国铁路运送特需物资的协议和今年 3 月 30 日签署的相关议定书，以掩盖自己在加速向越南民主共和国转运各种合适的有效武器问题上拒绝苏联的丑陋事实。"……

科尔特说，刘晓在 3 月 29 日与他的会谈时说："越南人民的斗争同样也是对民主德国与西方帝国主义斗争的支持。"

刘晓接着说道，如果美国人在越南扩大战争的话，这将使美国方面遭受更大的损失，而这也将导致美国力量的削弱，美帝国主义会被更多更长久地陷在这个地区。刘晓继续说道，当然，如果美国人开始扩大军事行动，这不管对越南民主共和国还是中国来说都将是件不容易的事情，中国方面也好，北越方面也好，都将做出很多的牺牲，但中国人在此面前不会停止不前，他们将派遣自己的人员，因为南越的斗争被他们认为是与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的国际阵线。

然后，在预先声明想利用他们之间纯粹同志间的关系，想对科尔特通报一些已不算官方范围里的信息后，李强开始讲述有关通过中国运送苏联武器的问题。首先他说外界有些传言，说中国好像在阻挠向越南运送苏联武器。他强调说，这是不正确的。归根结底这是对中国的诽谤。刘晓接着说道，我们一直在说，苏联方面对斗争中的人民的援助还不够，我们赞成苏联扩大援助，关于这一点已经对 A. H. 柯西金同志开诚布公地说过，当时他在北京。……至于通过中国用铁路运送武器，中国政府同意这点，至于空运航线，问题还不明确。

刘晓接着说道，在签署议定书之前，从今年 3 月上旬通过中国境内经铁路开始发送装有武器的专列。为了更顺利地发送这些专列，中国政府决定成立运输委员会，授命解决与此相关的所有具体问题。刘晓重又回到了有关空运航线的问题，说苏联曾打算向越南民主共和

---

①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② 该档案未标明文件时间，这里是根据内容推断的。——编注

国运送45架飞机及相应的技术装备,可美国人可以完全公开这个秘密,因为他们对此有足够的手段。正是从这观点看来应该全面地斟酌这样向越南民主共和国运送武器性质的合理性……

刘晓而后通报道,近日就将与苏联代表签署有关通过中国境内运送武器的议定书,中国人将全力以赴,比能够通过空运航线更快地通过铁路运送各种合适的武器。

刘晓与匈牙利大使举行了类似的会谈。

АВПРФ,ф. 0100,оп. 58,п. 516,д. 5,л. 78 - 93

№25682

契尔沃年科与余湛会谈纪要:希望恢复中苏之间的友谊[1]

（1965年4月5日）

……

余湛说:"要是向前看的话,可以充分相信我们两党和两国将会友好相处,因为这符合双方的利益。共产主义将在全世界取得胜利,但要达到这个目标,我们两党和两国必须要团结。在漫长的时期内我们两党和两国都珍惜团结,这使我们有理由认为我们关系中出现的困难是暂时的现象。我们之间的争吵绝不可能使我们感到快乐,所以他和中国外交部的其他同志都愿意为恢复苏联与中国之间的友谊尽自己一份力量,更何况这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愿望,也同样是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愿望。"

……

АВПРФ,ф. 0100,оп. 58,п. 516,д. 5,л. 63 - 67

---

①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25684

契尔沃年科与伍修权会谈纪要：坚信中苏友谊是永久的[1]

（1965 年 4 月 8 日）

……

伍修权说："我们党、党中央、老党员们过去认为，现在仍然认为，中国与苏联之间的友谊是永久的和牢不可破的，这点我们坚信不疑……应该去克服我们两党之间在相互关系上出现的困难……它不会自行消失。"

伍修权说："我们明白，苏共中央采取的措施有真诚的地方，但我只想表示，苏共中央领导人还有更多应该做的事情。"

……

АВПРФ，ф. 0100，оп. 58，п. 516，д. 5，л. 70－71

№25686

契尔沃年科与陈毅会谈纪要：团结的前景总是存在的[2]

（1965 年 4 月 10 日）

……

契尔沃年科提出，葛罗米柯和柯西金邀请陈毅访问苏联。

"陈毅对邀请他访问苏联表示感谢。他答应在万隆会议回来后再答复，那时将能看到情况如何……陈毅表示谈一谈总有益处。"

"然后陈毅说，我们之间的关系前景是明朗的。归根结底我们将联合一致，因为我们国家的人民希望这样，帝国主义逼迫我们团结起来，尽管现在有许多很难解决的问题。那么，

①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②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我们就等。"——陈毅说道

"之后陈毅强调说,他相信我们彼此团结的时刻会来到的,这会发生在帝国主义,要么在欧洲,要么在这里,开始发动更大攻击的时刻。"

陈毅还说道:"可为什么我们应该等待别人的进攻?尽管存在许多分歧,但团结的前景总还是存在的。必须要竭力追求团结,而不取决于帝国主义的进攻。"

"陈毅接下去说道,大使提出可以从具体的问题开始。这是个很好的主意。在主要的问题上没得到协商的结果时,而在小问题上达成了协议(文化合作、贸易往来)——这也很好,这也是向前的一步。"

"陈毅提出,如果这次(黎笋对莫斯科的秘密访问)苏联向越南提供更大的援助就好了。中国人没有想过、没有理由甚至没有权利阻挠你们援助越南。陈毅说,这种援助更多更大,中国人将更高兴。毕竟,那里是在打仗,规模和范围正在扩大。陈毅重复说道,我们真诚地希望这次苏联和越南劳动党之间能达成协议。毕竟越南人是在最前沿,我们的责任就是帮助他们。"

……

АВПРФ,ф. 0100,оп. 58,п. 516,д. 5,л. 84-89

№25687

契尔沃年科与周恩来会谈记录:中苏关系、越南问题等

(1965年4月13日)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1965年4月20日
第212号

机　密
文本第2份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契尔沃年科同志
与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会谈记录

1965年4月13日

1965年4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邀请即将离任的苏联驻中国大使

契尔沃年科同志共赴晚宴。晚宴设在人民大会堂，在晚宴前在周恩来建议下举行了一次交谈，这次会谈持续了两个多小时。(注：据我们观察，整个会谈过程都用录音机记录，能听到录音机磁带的沙沙声。在结束自己的发言时，周恩来不止一次地好像特意地重复了几句毛泽东反复提到的经典语录。)

苏联方面参加会谈的有：苏联驻中国贸易代表斯拉德科夫斯基同志及夫人、大使馆参赞兼公使莫丘里斯基同志、大使馆参赞雷索夫同志、甘申同志、杜波罗夫斯基同志、克里夫佐夫同志及各位夫人、大使馆三等秘书加利诺维奇同志。

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罗瑞卿、陆定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伍修权，中央委员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晓，中国对外贸易部副部长李强，外交部苏联和东欧国家司司长余湛，外交部礼宾司代司长葛步海，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中苏友好协会总会代秘书长李琦涛，中国国防部办公室主任肖向荣中将，中国外交部官员李凤林和刘莎等。一些中国同志偕夫人参加。

周恩来：您打算什么时候离开，大使同志?

契尔沃年科：如果没有接到其他的指示，我打算 4 月 24 日离开。

周恩来：我们那时就不会在这里了。您是一个人离开吗？其他同志会留下来吗?

契尔沃年科：是的，他们会留下来。不久，新大使拉宾[1]同志会抵达中国。

周恩来：他什么时候来?

契尔沃年科：如果没有什么变化的话，他不会晚于 5 月初来中国。

周恩来：那时我们都已经回来了。然而，在印度尼西亚的整个假期期间，有 10 天我们都会在雅加达。

契尔沃年科：最近您一直非常忙碌，得去其他很多国家进行访问。

周恩来：这些访问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在欧洲、亚洲、非洲的(人民)不了解这里的情况，尤其是越南的情况。在西方报纸上，不少文章都是有关越南的，然而这些西方国家没有收到充分的关于亚洲国家情况的资料，特别是越南的。有时会发生这种事情：同一个出版物，一份报纸的同一页上，有来自越南民主共和国和美国报纸的文章。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无法辨别哪一方说的是真话。

在我访问过的这些国家里，(人们)对越南斗争的残酷性、英雄主义和越南人民斗争的坚定性，都没有清楚的认识。因此，我们认为这些访问都是很有必要的，在访问期间，我们有机会提起并谈论这些事件时，将对此予以澄清。

我们拿阿尔及利亚举个例子。阿尔及利亚人取得了与法国侵略者长期斗争的胜利。阿尔及利亚人也关注越南人民的反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他们接受美国人正在压迫越南人民的看法。阿尔及利亚人的这种关注也是由于他们接受这样一种看法：面对轰炸，越南可能会选择谈判。当我们在阿尔及利亚的时候，我们告诉阿尔及利亚人说，在越南南方的形势和当

① С. Г. 拉宾，1965—1967 年任苏联驻中国大使。——编注

时阿尔及利亚是一样的。毕竟,阿尔及利亚人也抗击了法国殖民者80万的强大军队,但他们并不畏惧。而越南比阿尔及利亚的人口多。仅仅越南南方就有1 400万人,越南北部还有1 700万人。因此,越南总人口超过了3 000万。人们应该看到这一点,越南人民对在反侵略的斗争中充满了决心。在我们的交谈之后,阿尔及利亚人对越南的情况有了更清楚的了解。

他继续说,我们还告诉阿尔及利亚人,现在在越南南方,常规军和半常规军加起来不超过50万人。而现在那里有大约3万美军。当我跟本·贝拉[1]谈话的时候,我说,那里大概不会超过2万。越南南方蔑视美国侵略者,他们将会继续斗争,即使新的部队抵达越南。

最近,胡志明主席说,即使在越南南方的美军士兵达到了数万人,他们也要继续斗争,将战争进行到底。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起初是政府一些成员主张妥协,主张谈判,但主要领导都主张抵抗,将斗争进行到底。结果,这部分领导在那天获得了胜利,阿尔及利亚人在战争爆发7年之后进入了谈判并取得胜利。如果在阿尔及利亚战争的开始时那些主张议和妥协的人赢得了胜利,就不会有战争的胜利了。阿尔及利亚的胜利,完全要归功于阿尔及利亚目前的领导人。这个问题是非常清楚的。

我上一次在阿尔及利亚时,本·贝拉本人告诉了我这些情况。这一次,我告诉他南越正处于阿尔及利亚人民数年前同样的斗争阶段。我建议本·贝拉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他们过去被法国侵略者压迫;而越南人民过去也被法国侵略者压迫,现在他们正在被美国侵略者压迫。越南人民怎么可能不会取得反对美国侵略者斗争的胜利?我们还告诉阿尔及利亚人,越南同志们相信,如果一个人谋求妥协,它会造成比斗争到底更多的伤亡。当本·贝拉听到我的解释时,他明白在越南的情况并且得出结论,如果越南停火并进行谈判,就会对南越造成很大的伤亡,而他们那时是无法实现独立的。

然后本·贝拉说,他觉得他在贝尔格莱德参加不结盟国家会议是个错误。如果有了这样的关系,当17个不结盟国家呼吁他签字时,他就不会同意。

我把这些都告诉了纳赛尔总统,他也承认自己签署17个国家的呼吁是一个错误。

这一呼吁显然是由铁托编造出来的。是谁欢迎它?是约翰逊!这不是支持越南人民,这是在帮美帝国主义的忙。这是我想说的第一件事。

第二件我想说的事归结到一点。几天前,约翰逊发表讲话中谈到他无条件谈判。这根本是无稽之谈。毕竟他实际上已经提出了条件。在这些条件下怎么能进入讨论?

首先,他不打算从南越撤军,而事实上这是写在日内瓦协议上。他也不会同意以任何形式把他的部队撤出南越。

谈判甚至还没开始,约翰逊就已经提出了条件。这说明了一个事实,他不遵守日内瓦协议。毕竟法国按照日内瓦协议撤出了部队。而约翰逊非常明确地表示,即使达成协议,他不会在任何情况下撤军。

---

① 本·贝拉,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总统。——编注

其次，约翰逊宣布他要求南越独立。这意味着他要阻止南北越统一，这也违反了日内瓦协议。因此，约翰逊要将越南的南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约翰逊的第三个条件相当于是他希望防止南越被侵略，这个侵略指的是北越的侵略。这简直是一个荒谬的条件！这根本就是强盗逻辑。原来不是美国人在侵略，而是越南民主共和国正在侵略南越。

可以看出美国总统约翰逊提出的条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改变，也不打算讨论。这是强盗逻辑！最近，越南民主共和国人民大会发表了对约翰逊声明的有力回绝。

此外，我想说第三件事。美国正试图把越南问题拖到联合国去解决。可是越南的问题是在日内瓦会议上就解决了的，和联合国拉扯到一起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而你们苏联，是日内瓦会议的主席国之一。通过试图将越南问题拖到联合国，吴丹[①]通过阿尔及利亚询问中国的意见。我曾通过本·贝拉总统向吴丹表示，我们坚决拒绝他这个意向。我们拒绝联合国介入这个问题的解决。我举一个例子，还是阿尔及利亚，那时联合国也准备干预。幸运的是，法国人反对。如果联合国干预，美国最终将也要影响阿尔及利亚。我举了这个例子后，本·贝拉说："这是完全正确的！"并且三次重复说："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

因此阿尔及利亚认识到，如果联合国干预，越南的情形会变得和刚果、塞浦路斯、韩国、马来西亚一样糟糕。

但是当本·贝拉将我们的意见转达给吴丹，我们的立场在联合国就被扭曲了。记者们甚至开始报道，无论是中国还是越南民主共和国都开始准备支持谈判的想法。因此，我们不得不针对吴丹发表了一篇社论。越南同志们也多次表示，他们不支持谈判。越南报纸写道，美国在对本地区的侵略中花费了40亿美元。约翰逊怎么还能指望用1亿美元就收买东南亚呢?

然后我们谈到另一个和本·贝拉有关的事情。当阿尔及利亚进行反侵略的决定性斗争时，阿尔及利亚最近的邻居——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对阿尔及利亚提供了有效的支持。因此到现在为止阿尔及利亚和阿拉伯还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于越南民主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越南人民正在进行着一场斗争，我们不会坐视不管，尤其是当美国帝国主义准备侵略越南的时候。

我举出这些例子是为了告诉您，当我们在访问中向这些民族主义国家领导人解释，基于他们自己反帝国主义的斗争经验，他们为什么必须要了解情况。我们的解释促使他们对情况有更深的了解。

现在越南人民的反美斗争，无论在南方还是北方都呈上升趋势。您可以从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报道和我们的报纸上知道这一点。越南的同志们需要我们尽力来传播他们决心取得斗争胜利的真相，尽力来揭露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他们一边进行残酷的战争一边还在玩花招，让人们认识到他们谈判只是阴谋。我们必须进行宣传和解释所有这一切，使得局势在世界各国人民面前更加清楚。

---

① 吴丹，1961—1971年任联合国秘书长。——编注

越南人民，当然，需要物质支持以及更多的我还不能说的支持。

我为什么要在大使您离任的时候告诉您这些事情呢?

您可能还记得，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同志途经北京时，我们彼此谈到了对国际问题的看法。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告诉您什么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我想请您向柯西金同志转达我说过的这些话。您还可以从我们的报纸上了解这一切。我们还会在这方面采取相应的外交措施。

然后周恩来转向苏联大使，问:“也许您在这方面有些看法?”

契尔沃年科：您提到了一个重要问题，这涉及中国和苏联，涉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一切革命国家以及世界上所有进步的民族。美国人对越南南方人民的强行侵略，粗暴地违反了日内瓦协议。结果他们遭到了越南人民的英勇抵抗。我们当然完全同意您的看法，越南人民展现了勇气，并树立了斗争的榜样。越南人民用他们的勇气激励着正在进行反帝斗争的其他民族。

周恩来：而且(从其他民族的斗争中)汲取力量。

契尔沃年科：这是毋庸置疑的。对于越南爱国者进行这种斗争的技巧，甚至我们的敌人和对手阵营都不得不承认越南爱国者的战术技能以及在这场斗争中越南人民的顽强不屈。

当然，我们认为您刚才谈话中对越南的局势和情况的解释，对整个事件给了一个完整的概括，是非常有用的，我们认为，接触本·贝拉、纳赛尔和其他国家领导人，让(他们)更好地了解越南的情况以及更好地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场，都具有重大意义。

如果要总结一下您刚才所说的，最终都归结为一个主要问题——解决越南问题的方法。这个方法应该是：政治的或军事的——这自然是一个具体问题。我认为您和越南同志们，和我们都希望通过和平方式解决越南问题。但美帝国主义在越南南方进行了广泛的军事行动，包括轰炸，现在真正威胁到越南民主共和国，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独立和主权。美帝国主义从而加强了对北越的军事行动。在这方面我们的立场是明确的：我们坚决支持越南人民的军事斗争。苏联自身，如你所知，在过去以及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有军事斗争的经验。当敌人入侵我国领土，苏联人民就摧毁他们。我们坚持着原则：如果敌人不投降，其必将被摧毁。这是苏联不会改变的一贯立场。这就是为什么苏联人民不仅同情英勇的越南人民，也在实践中帮助越南爱国者，通过援助武器，或者其他手段，而且如果需要的话，还有人力。苏联这些援助是真实的，在此之后也会继续提供。

至于约翰逊的讲话、及其与美帝国主义沆瀣一气的那些人，我们对待他们的态度建立在原则的基础之上，这个原则就是我们认为美帝国主义是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死敌。我们以同样的方式对待约翰逊，把他看作是美帝国主义的代言人。您，周恩来同志，集中谈论了约翰逊的讲话。约翰逊在苏联被看作是煽动分子，但约翰逊的煽动并没有能混淆视听，他不能迷惑任何一个苏联人。

同时，我认为，也不应该放弃用和平方式解决越南问题，因为在某些情况下，和平方式是可以接受的。最终，任何战争都是以谈判和一个和平协议告终的。而您，周恩来同志，在谈

话中提到的阿尔及利亚的光辉榜样，而且如你所知，军事与和平的方式也都使用了。如果是谈论越南事件，问题是：在谁的条件下和平解决问题才能实现？我们坚决反对在约翰逊的条件下解决越南问题。但是，如果说问题可能得到和平解决，这也只能是越南的爱国力量提出的条件，对越南南方人民解放阵线的条件，对社会主义阵营是可以接受的。我们只支持这条路。因此，可以进行谈判，但决不能在敌人提出的条件之下进行。

你们中国的同志们也许知道的具体情况比我们多。因此，当苏方向你们提出建议时——或许可以召开一个印度支那会议(这次以协商的形式进行)，你们说，现在不是召开这样一次会议的时候，在莫斯科的时候你们的意见得到了理解。

你们认为目前对于解决越南问题，从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来说，继续使用军事方法是更有利的。苏方高度重视和对待你们的发言。此外，苏方还向你们建议，越南民主共和国可以和苏联一起协调(他们)与越南事件有关的行动。

您，周恩来同志现在主要是说，国家领导人之间的交往是非常有益的。那么为什么，当敌人站在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门口时，当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受到侵略者的威胁时，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人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没有聚集在一起协商？这项工作必须首先由3个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苏联进行。为什么这些国家的代表没有聚在一起讨论和协调它们的行动，并与美帝国主义在越南的阴谋斗争到底？

任何级别的会议都可以仅仅是一个协调会，如果条件不成熟，不足以批准任何文件，我们可以只是简单地进行协商，交换意见。当然，最好的情况是这样的会议上可以批准一个文件，一个协调行动的成熟计划。

显而易见的是，所有这些事件的逻辑和国际主义的感情都能够且必然决定这样一个会议的必要性，共同讨论此问题的必要性。

我和所有的苏联同志们非常认真地听取了您刚才描述的局势的特征。这是很有益的，对我们非常重要。感谢您，周恩来同志。我会向苏共中央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人转达您所说的一切。

所有这一切对我们的领导人都将是有益的，因为他们一直在关注着越南发生的事件，并思考如何使苏联能够快速和有效地援助英勇的越南人民。

周恩来：刚才我提出的事实，只涉及我们的立场和我们的外交步骤，因为我想让您将这些传达给你们的政府。

您谈到了一个会议的问题，但是这已经涉及了中苏关系。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澄清这些问题了。这些问题得由刘少奇同志和余湛同志具体处理。但是，作为总理，我不能不回答这些主要问题。

就在刚才，大使关切地表达了苏联人民对越南人民的同情。我认为苏联人民的这些感受是真诚的。

大使同志谈到了伟大卫国战争的问题。这场战争，是在斯大林同志的领导下进行的，是正义的战争，震撼了整个世界人们的思想和心灵。苏联在那场战争中失去了1 000万人。中国同

志们始终高度评价这场战争。并不是中国人低估了战争的意义,或者是斯大林和他的领导。何况,并不是中国人在扭曲和污蔑他们。如果坦率地说,这都是赫鲁晓夫主义者干的。

第三,你谈到了越南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军事方法是由美国人强加的。从 1954 年开始,美国人违反日内瓦协议已经超过 11 年了。战争是政治的最高形式。人们不应该反对政治和战争。

南越的民众被迫拿起武器,奋起抵抗美帝国主义,现在不会有和平的方式。我们必须继续战争,以迫使帝国主义投降或彻底消灭他们。

在卫国战争期间,当德国逼近莫斯科、列宁格勒和斯大林格勒的时候,谈判还有可能吗?当然是不可能的。只剩下一种方式,就是继续战斗,直到最后的胜利。卫国战争是这种情况,中国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也是这种情况。朝鲜战争还是这种情况。我们胜利后,谈判才是可能的结果。就那么简单。

如果这样说是对的,那么问题正是当柯西金同志途经北京时,我们当时谈到了越南问题,而您,大使同志,也在场。柯西金同志表示同意我们的意见。之后他在越南民主共和国以及两国联合公报发表的时候,也表达了同样的立场。

回到北京后,柯西金同志告诉我们,你们愿意向越南提供军事援助。毛泽东同志在谈话中说,你们提供的援助越多越好。

然而,当柯西金同志返回莫斯科后,形势发生了变化。在 2 月 16 日你们告诉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你们希望与美国人进行谈判。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答复说,现在不是一个能参加谈判的时候,此时谈判就意味着投降。

在同一天你们告知我们,你们决定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提出一项建议,也告知我们打算进入谈判的意向。我们说我们会与越南民主共和国磋商后给予答复。

然而,不顾越南政府的反对,也不等我们的答复,苏联政府在 2 月 23 日通过驻在巴黎的大使与戴高乐接触并且进入谈判。作为这些接触的结果,你们宣布苏联和法国的意见是一致的,甚至完全一样。

然后,法国政府以一个文件的形式确认了他们与苏联政府意见的一致。你们在法国的大使告诉我们的大使说,法国政府的意见和苏联政府是相同的。

团结在哪里?这正是在达成无条件谈判和无条件停火的协议。但越南的同志们大声疾呼坚决反对这个!

20 天之后,我在北京会见了法国驻华大使,他告诉我同样的事情。我们断然拒绝了这一切。

就这样,背着中国和越南,不顾越南同志们的意见,苏联政府和戴高乐保持着接触,讨论和美国人谈判的事情。这还不是恶意?这还不是空头支票?

我认为举这个例子足够了。至于苏联一面和英国,一面和美国接触,你们接触的内容,没有告诉我们,我们保留在适当时候进行评论的权利。

其次,你们笼统地告知我们打算援助给越南民主共和国武器的种类和数量。我们曾经同意当这些武器到达我们领土上的时候,会尽快通过铁路运输这些武器。然而,从 2 月 25

日的消息内容来看，情况发生了变化。(这个消息)没有谈及一般意义上的军事援助。你们打算出兵越南民主共和国和中国。你们心里打算让4 000名士兵到越南民主共和国，500名来中国昆明，那是你们选定的一个机场所在地。

这一切的目的是通过派出两个营的防空部队和一个中队的米格-21来控制中越边境。

此外，第二，在2月27日你们突然提出45架安-12飞机要飞越中国上空的问题，以便向河内运送75架防空机枪和18个37毫米高炮连。

我们拒绝了这两项建议，因为第一个超越了一般军事援助的范围，相当于一次军事行动，对此你们并没有与我们和越南协商，第二个造成了一种越南同志无法接受的情况。

你们传递给我们的建议，有关消息立即泄漏到西方，通过西方机构散布谣言，说我们妨碍了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武器援助。

在达成(武器的)运输协定之后，根据这项协议，从4月到10月，我们将根据你们的日程安排允许大约60列列车通过。

这也被泄露给西方，有人说，中国在帮助越南民主共和国。

想想看，大使同志，我们之间还有什么秘密可以谈论？你们不但不保守秘密，还在诽谤我们。

第三，第十九届联合国大会正在以一种丑陋的方式继续进行，而你们却一定要把赫鲁晓夫提出的建议拖到联合国。特别是，有关建立联合国军队的建议以及在联合国创建一个维持和平的特别委员会。

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联合国常规军队。现在只有临时(部队)，人民已经不能再忍受他们了。这是在朝鲜半岛的情况。在联合国军的名义下，军队残酷地镇压刚果人民，现在他们仍然保护以色列，还停留在塞浦路斯。现在，你们想创建一个永久的、合法的联合国部队。这样做的目的是建立一个美国和苏联的联合军队来共同统治世界。

吴丹的计划是派遣联合国部队到越南，以加强美国在这个国家的地位。

现在您能看到，仅仅因为越南问题有多少事情发生。我们怎能相信柯西金同志在这里说出的话？

至于你们建议的三个国家代表参加的高级别会议，我们以中共中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的名义对此建议已经给出答复。因此我不会再谈这个。

我们已经解决了我们与越南民主共和国之间存在的问题。如果像这样的问题再出现，我们将直接与越南同志们协商解决。

如果苏联需要征求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意见，那么我们建议你们举行双边会晤。越南已经同意本次会晤，也已经访问过你们。就中国而言，你们当然必须先获得我们的同意，而我们认为现在还不是时候，没有必要开一个三国或三个政府的会议。

起初我希望告诉您，希望把我在一个声明中所说的话转达给你们的政府。但是，你挑战我，让我做了第二个声明。我不得不就这个问题做出声明。

论战可能围绕这些问题会继续下去，但我建议将这些问题留给你们的新大使和代办以及我们外交部的工作人员来讨论。

余湛：莫丘利斯基[1]同志已邀请我在大使离境后进行一次5小时谈话。

契尔沃年科：我不敢再耽误您更多的时间了。的确还存在许多问题，因为我现在是向您告别了，我不希望纠缠这些问题。我只想用一两句话说明以下要点：

我不知道苏联大使和戴高乐之间谈话的性质，也没有在北京与法国大使进行交谈，因此我不能对您今天说的做出评价。

至于我们对越南方面的立场，是明确的和不变的。

至于援助的具体问题，这些问题的答复包含在苏联政府的声明中，在您出访期间我已经转达给刘晓同志了。现在您，周恩来同志，亲自描绘了苏联为越南提供援助的美好途径，并列出了所有苏联政府希望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运送到越南的东西。

至于您说苏联想控制中国的意图，这当然是很可笑的。500名士兵怎么可能控制6.5亿人口呢？

苏联政府已经为你们允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之上运送苏联武器到越南表示感谢。我们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帮助越南。苏联人民对此予以了高度评价。但是，这没有给你们权利诽谤苏联人民，说他们没有给予什么帮助。柯西金同志给中国政府的来信对越南的紧急援助提出了具体的问题。苏联政府将与你们磋商如何更好地提供援助。如果苏联没有和你们讨论，没有征得你们的同意，不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运送任何东西。苏联政府愿意更快地运送更多的武器。现在您批评说应该向越南提供更有效的援助。苏联政府与越南人商讨过并运送了越南所需要的东西。您说你们要派志愿人员，但只有当越南需要的情况下才这样做。苏联要派4 000名专家到越南民主共和国，他们可以被称为志愿者，或者任何称呼，这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本质是什么。

周恩来：这些问题的提出不是有关志愿者的。越南同志并没有要求这些，你们也没有把这件事告诉我们，这不是你们的建议，你们告诉我们的只是一些设备的清单。

契尔沃年科：您告诉我们，你们反对派遣飞机，反对在你们的(领土)上停留500个专业人员　就是飞行员，而我们没有这样做。你们是一个主权国家。我们与你们商讨之前不能做任何事情。这个问题是很清楚的。

因此我们坚决反对指责苏联，尤其说它企图控制中华人民共和国。

至于吴丹，我们不会回应他或者他的行动。我们也批评了联合国，并认为它必须重组。当试图指责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我们都不该使用资产阶级的资源。

您，周恩来同志，提出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只能说明应该会见和坦率地进行讨论，这是共产党人应该做的。我们正在谈论越南人民的命运，人们正在那里死亡，消失。有什么理由能拒绝一个关于召开会议和协调行动的建议？

我们认为，柯西金同志和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之间的会见，是有益、坦率和直接的。这不会伤害任何人。现在为什么不能会见并讨论与美国帝国主义斗争的具体问题，讨论防

---

[1] Φ. B. 莫丘利斯基，时任苏联驻华使馆顾问。——编注

止挑衅越南民主共和国关系的问题？

周恩来：可是，回到莫斯科之后，柯西金的表现是完全相反的。

我举出了一些例子，您无法推翻我的例子。

4 000 人和 3 000 万越南人相比是少数，但是在他们控制下有 2 个营的防空武器；毕竟，你们的人决定如何使用这些武器的问题。

契尔沃年科：但这些都是苏联人民，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而不是美国人。

周恩来：但你们在古巴的导弹都没有使用。现在有一种"地空"导弹营在古巴，但他们也没有使用。

500 人在昆明机场，当然无法控制整个中国，但是他们可以控制昆明。12 架米格-21 飞机本来已经驻扎在那里。他们可以控制中越边境。越南没有要求你们做这些。在这个阶段，越南飞行员不能驾驶这些飞机。在昆明有一个军事基地，米格-21 飞机不能覆盖河内，因为它们的飞行半径到不了河内。如果你想用这 12 架飞机培训越南飞行员，你在苏联，在越南民主共和国也可以做到，不一定非要在中国。至于要保护中越边境，12 架飞机将不会发挥重要作用。此外，你从来没有就此征询我们的意见，而我们也没有要求你们这样做。为什么，怀着什么样的目的，你把这些(东西)搞到设备清单里来？难道这些不是赫鲁晓夫之前的主张？

问题仍将继续存在，但因为这是一次告别访问，也许我们不应该进入论战。

契尔沃年科：我同意。

周恩来：这种情况下，如果美国帝国主义真正开始在世界范围内的战争，无论是发生在西方还是东方，我们国家的人民都会站在一起。在与柯西金同志的谈话中，毛泽东同志将这个提法反复说了几次。

我们相信，伟大的苏联，伟大的苏维埃共产主义者，苏联人民都保持着光荣的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

我们再次重申，与美国寻求一项协议和妥协的意图——目前你们党的一部分领导同志们所主张的——是不可能实现的。

契尔沃年科：我不想继续争辩下去，但我坚决不同意您，周恩来同志，对苏联政府立场的说法。

周恩来：我知道，作为大使，您不同意。这次讨论是您提出来的，我不得不给出回答，这样您可以转告你们政府。

契尔沃年科：您让我对您的发言作出评价，我就这样做了。我们将把您今天所说的一切都转达，如果苏共领导认为有必要，将会回复给你们声明。

周恩来：没关系。我们并不害怕讨论。

契尔沃年科：我们希望进行洽谈。

Л. С. 契尔沃年科(苏联大使夫人)：我，作为一个苏联公民，与所有在座的苏联妇女一样，听取了很多我们所不知道的事情。我感到很生气。为什么这么不信任苏联？

周恩来：这不是不信任你们，而是你们的领导人。

在场的苏联同志们回答说,我们并没有这样的分歧,我们同苏联政府是一致的。

契尔沃年科:您,周恩来同志的这些话,把我们置于一个尴尬的位置上了。

斯拉德科夫斯基[1]:我是个老党员,周恩来同志,但我不能告诉苏联人民您今天在这里所说的,因为这将造成极大的愤慨。

周恩来:我不会责备你们中的任何人。我和我们的领导人,我们对苏联新领导人真的非常不满。

斯拉德科夫斯基:我们的领导人是我们的人民选出来的,我们人民的党。我们不是在国外选出来的。

余湛:也许,您本人相信苏联领导人,但不是所有的苏联人民都相信。

契尔沃年科:太糟糕了,你们正在把这件事变成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争吵。

罗瑞卿:在你们的报纸上发表我们的看法吧。

周恩来:我们敢(发表你们的)。

罗瑞卿:你是老共产党员,我们也不是年轻党员。

陆定一:请向贵国政府转达,要求他们停止与美国以共同统治世界为目的的合作。

鲁索夫:这是诽谤。

契尔沃年科:只有不现实且对自己说的话不负责任的人才会这样谈话。

周恩来:赫鲁晓夫多次指出这一点。目前的苏联领导人给美国人的电报中表达了同样的立场。

契尔沃年科:我们尊重您,周恩来同志,但同时,我坚决拒绝同意您的看法。我们坚决抗议您的那些关于苏联和苏联新领导人的发言。我们没有给您任何理由这样做。我们不允许对贵国政府的指责,虽然我们也要讨论其政策。您允许自己关于苏联政府的指责。我们抗议。你们试图分裂苏维埃政权、我们党中央和苏联人民。你们不会得逞的。

周恩来:您问为什么我们不同意举行会谈。我们的反应是有理由的。此外,我还没有谈及3月的分裂会议。因为我们以政府名义有一个接待部门,我还没有接触到本次会议的事情。1965年3月中国没有出席的那次莫斯科会议,聚集的都是共产党的领导人,而不是政府的领导人。我只能阐述我们的看法和外交行动,但是你挑起了这些讨论。我们总是对苏联人民在世界革命中的作用作出合适的评价。起初,我们也将希望放在苏共新领导人身上。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我会去参加纪念活动,为什么我们还建议邀请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结果和我们的预期相反。新的领导人继续赫鲁晓夫的政策。没有丝毫差别。在3月的分裂会议上证实了这一点。

我们还寄望于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有合作的可能,特别是越南问题,与柯西金同志在这里说过的有关的那些问题。刚才我是在我们对新领导人感到不信任的基础上提出那些观点。我要对你们的抗议表示抗议。我宣布抗议你们的挑衅。我们应就此结束去吃晚饭。

---

① М. И. 斯拉德科夫斯基,苏联经济学家。——编注

谈话持续了约两小时，然后在人民大会堂由周恩来总理宴请苏联大使和他的妻子，领事和他们的妻子。

在晚宴上祝酒的时候，周恩来特别指出：尽管我们进行了讨论，我们有信心如果帝国主义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我们会站在一起。虽然我不信任柯西金，我也不喜欢他，但他在访问北京的时候表达过同样的想法，即认为，如果美国摧毁中国，苏联也将受到影响，反之亦然，如果他们摧毁苏联，中国也不会存在。契尔沃年科同志说，现在我们共同的死敌是美帝国主义。它会试图强加战争，它会使局部战争升级。所以我们说如果帝国主义发动战争我们会站一起。正是这点昭示着我们两党团结的光明前景。

周恩来举酒向苏联大使，他的妻子以及晚宴上所有苏联同志的健康祝福。

接下来是契尔沃年科同志祝酒……

注意到，周恩来看上去非常疲惫，在谈话过程中有时当他缺少论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时会表现出紧张；在他身上感觉不到他对自己所说内容的一种内在的坚强信念。他一直在控制自己，这一次他并非情绪低落，而是为某些事情感到难过。

当苏联大使祝酒的时候，他(周恩来)鼓了2—3次掌……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契尔沃年科(签名)

АВПРФ，ф. 0100，оп. 58，п. 58，д. 5，л. 101－127

№25778

外交部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中国的宣传活动及应对办法[①]

(1965年4月20日以后[②])

……

供应给古巴的主要书籍主要是西班牙语、汉语和英语版的毛泽东和其他中国领导人的小册子。

除此以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将装帧非常精美的汉语、英语版的书籍免费分送给各

①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② 该档案摘录时漏掉文件时间，这里是根据文件内容推断的。——编注

团体……(必须指出,目前英语版的书籍在古巴很少见到,而许多古巴人都懂英语)

目前《新华文摘》是宣传分裂的主要武器,除周日外每天都出版。

1963 年 11 月中旬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科学工作者阿拉杰涅斯邀请中国大使去他那里,向他通报了古巴社会主义革命党领导人关于缩减《新华文摘》的印量的决定。古巴社会主义革命党免费接受《新华文摘》的确定的个人和团体比以前减少了。与此同时,塔斯社的文摘印量也减少了(200 份)。

古巴人不太愿意接受中国的文艺影片,主要是因为这些影片文艺水准太低。电影院的上座率很低,观众经常中途离场。报纸的电影广告中一般不注明影片的名称,只注明放映中国影片。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有分歧的问题上,至少在对外关系方面持中立立场。

宣传鼓动工作人员持这样的立场可以解释为古巴领导人尚未公开表明自己对分歧问题的立场。

在目前条件下,如果我们不进行公开的争论,最好保持一种平静的心情,宣传中多做些解释工作。可是我们还是要加强正面的反宣传,重点放在宣传民族解放运动、和平共处、解释民族解放运动与和平共处给进行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斗争的人民带来的益处,解释现代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害处。除此以外,还应该强调工人革命运动和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社会主义国家成就的国际意义、联系为亚非拉国家提供的援助、苏联的武装力量在保卫社会主义成果的作用以及许多具体的问题。

1964 年 5 月 4 日,苏共中央收到了《真理报》特派记者 M. 多莫加茨基赫和 Л. 波奇瓦洛夫关于印度、缅甸、泰国、日本和香港之行的汇报,主要是收集中国共产党在东南亚进行破坏活动的材料。

这次东南亚之行可以得出什么结论?

从与那里的政治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记者、苏联大使馆工作人员的交谈中,我们觉得,亚洲正在经历的过程应该反映在我国的对外政策上面。有一点是肯定的,中国定期去那里积极活动,把苏联作为世界第一号敌人。

记者们建议:加强苏联在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的影响,碍于自己在东南亚的地位他们不敢反抗北京的大国沙文主义计划。

与泰国实现关系正常化;

不要反对马来西亚;

扩大泰国的记者人数,以收集情报;

在东南亚组织当地语言和华语的广播宣传;

在东南亚出版一些杂志,宣传我们的思想;

加强苏联驻东南亚国家大使馆的工作;

在东南亚的中国殖民地中散发中文版的苏联书籍;

在中国看中的国家中发行群众性的报纸；

对中国反苏的积极活动必须给予有力的回击；

……

РГАНИ，ф. 5，оп. 58，р. 7745，ед. хр. 116，л. 75－142

№25688

契尔沃年科与刘少奇、邓小平会谈记录：中苏关系不会轻易分裂

(1965年4月21日)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1965年4月26日

第225号

机　密

文本第3份

与中国国家主席、中共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刘少奇和国务院代总理、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的会谈记录

1965年4月21日

因苏联驻中国大使契尔沃年科将离任回国，1965年4月21日刘少奇和邓小平接见了他。

会见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从下午3时45分到下午5点30分。

中国方面参加会见的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康生，外交部副部长、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刘晓，中国外交部苏东司司长余湛，中国外交部礼宾司代司长葛步海，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工作人员阎明复，中国外交部工作人员李霍林(Ли Хой-линь)、李凤林、陈广才。苏联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大使馆公使衔参赞 Ф. В. 莫丘里斯基同志、参赞 Г. А. 甘申同志、一等秘书 А. А. 勃列日涅夫同志、二等秘书 Ю. М. 加利诺维奇同志，以及译员 Р. Н. 列别金斯基同志。

刘少奇说，他们说您这几天就要回国了。

契尔沃年科同志说，可以回苏联的时候已经到了。我在中国已经有5年半了。时间不短了，可我对同志们说，为研究像中国这样如此伟大的国家，可以住上10年，甚至更多时间。

邓小平(问刘晓)说，你在莫斯科待了多长时间?

刘晓说，7年。

刘少奇说，论工作时间您比刘晓少啊。

契尔沃年科同志说，总的说起来不止5年半。我是从1959年9月开始与中国直接打交道，当时来这里参加中国国庆10周年。

刘少奇说，您已经在这里5年多了。您当然对中国有个完整的概念。但是中国的情况非常复杂，特别复杂的是中国的历史。要很详细地了解中国，5年当然是不够的。

契尔沃年科同志说，我刚刚说了10年也不够的。

刘少奇说，并且这是在我们双方之间产生问题的5年。当然，谁也不希望出现这么些问题。我们本来就没有在意识上准备与苏联争论、吵架，与苏联共产党争辩，我们从来没想过这些。但既然这些问题已经产生了，既然是已经客观存在了，有什么办法?我们只有像对待客观存在那样去面对它们。我们相信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将是永存的。两个如此伟大的国家、如此伟大的人民之间的关系不会轻易分裂。我们深信出现的分歧只是暂时的现象，它们只会存在于某一段时期，将来我们的关系一定会得到改善。

接着刘少奇谈到了自己在1920年代的莫斯科之行。他讲述了自己如何在1921年去莫斯科学习，还是在列宁活着的时候。从那时候起，也就是1921年，我就留心所有苏联发生的和在报纸上报道的情况，因此我能肯定对苏联、对苏联人民、苏联共产党员的情况有一定的认识，刘少奇着重说道。我们可以对长时期进行比较，比较不同的时期。当发生了你们的十月革命，我们对苏联就产生了同情和友好的感觉，我们的目光投向了莫斯科，所有人都想去莫斯科。可没人能够去那……

1920年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去准备那次旅行。然后绕道从上海到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可当我从船上下来时，就发现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都是日本人，而我无法找到那里的苏维埃布尔什维克。所幸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住着许多中国人，那里，可以说甚至大部分居民都是中国人，那里出版中国报纸。我们住在中国宾馆。我们向中国报纸的主编打听，如何才能找到我们想见到的布尔什维克。他说大概能找到他们。然后他领我们去了秘密接头处，在那里遇见了一个布尔什维克。他给我们写了推荐信，于是我们5个人去了哈巴罗夫斯克。那里已经有红军了。

当时日本人没有特别注意在这条线上乘坐列车的中国人。火车上甚至有专门的车厢，上面写着“中国人专用”。那里只有中国人乘坐，不管俄罗斯人，还是日本人都不能去那。日本人仅仅朝车厢里望望，就走了，根本不注意我们。我们在包间里找到了位子，从日本人身边悄悄地溜过。

我们在哈巴罗夫斯克住了约一个月。那儿有座桥毁坏了，所以我们无法继续坐火车了。从哈巴罗夫斯克我们一伙人坐渡船到了布拉戈维申斯克，从那坐火车到了赤塔。

路上我们遇见了一位姓卡拉达什的红军将军。他乘坐的是专列，他的司令部也在这列火车上。他的部队中有一至两个朝鲜人组成的师，和一个中国人组成的旅，也就是说除了俄罗斯人，那里还有这些兵团。

这个中国旅的旅长见火车上有5个知识分子模样的学生，就想把我们留在他身边。我说我们是去莫斯科，可他劝说我们留下。最终我们同意留下。可为了留下我们5个人，中国旅的旅长只得去向指挥官报告，于是他将我们带往那列专车。我对指挥官说，我们想去莫斯科学习，我们5个人都是我们青年组织的共青团员，现在中国旅的旅长请我们留下。

而卡拉达什说，你们最好还是去莫斯科。他可以说是个更为冷静的人。他决定了，战争已经接近尾声，而我们在部队里也没什么可干。他是个非常诚挚的人。

契尔沃年科同志说，可见卡拉达什看得很远。他预见到您将与中国革命休戚相关。

刘少奇说，他为人很诚挚，对中国年轻人的到来感到非常高兴，对我们又是接吻又是拥抱。他拨出一节专车，将车厢挂上列车，于是我们就继续出发了。就这样我们到达了伊尔库茨克。在伊尔库茨克以东的这些东方地区，一路上，不管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那里住的都有中国人。他们还在商店里工作。那时中国人在那里还可以做生意。当时那里还没实行共产主义原则。

在赤塔我们去了当地党委员会。那里给我们开了去莫斯科的介绍信。

我们一到伊尔库茨克就看到那里的情况不一样。那里的商店里什么东西都没有，那里已经开始实行社会主义了。

就这样我们一步步地到达了莫斯科。从伊尔库茨克到莫斯科，一路上我们用了3个月，第四个月就到了莫斯科。一方面我们看到了革命后苏联人民面临巨大的困难；另一方面，我们深信工人、农民、布尔什维克和红军的巨大热情。这种热情唤起了我们深厚的情感和同情。

也许，在最困难的时刻会产生最牢固的友好关系，正是在这样的时刻能考验人们之间的关系。当时苏联的共产党员、布尔什维克、干部和列车长正处于非常困难的处境中。我们作为外国人势必就更困难一些。当我们没有面包时，当我们没什么吃的时候，他拿自己的面包与我们共享，而他自己却饿着肚子。幸亏于此我们才顺利地到达莫斯科。我们来到莫斯科后，情况开始好转，可面包还是不够。我们住在一个很大的宾馆里，那有很大的餐厅，可我们明白怎么回事，我们明白这些困难。我们亲眼看见并对工人、农民、劳动者、红军和苏联共产党员这样的精神状态确信不疑。我们与他们所有人都接触过，我们深信这样的国家、这样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这些困难都是暂时的，都能被克服。所以当时我们就决定加入共产党。

此后，我去了苏联好几次。不管领导人有哪些变化，人民依旧没变，工人和农民没变。

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关系中这种令人不愉快的状态会尽快消除。

邓小平说，有可能，需要帝国主义方面的帮助，特别是美帝国主义。

契尔沃年科说，您提到的问题，当然也感动我们的党，这也就是我们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问题。我现在很高兴，在我告别拜会时，您回忆起了自己去我们国家的经历并提到了当时

在十月革命后最初时期的情形。当然,您完全正确地觉察到在当时,革命初期,就让您注意到了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怀有极大的好感。在更晚一些时候,在中国革命已经胜利之后您也到过苏联。

刘少奇说,是的。

契尔沃年科说,当然,这是中国与苏联关系发展中全新的时期。这个时期与中国革命的胜利紧密相连,产生了极大的历史作用。它扩大了十月革命的突破口。

最近的5年,我不由地成为中国与苏联关系以及我们两党之间关系的亲自参与者。我还记得您,刘少奇同志最近一次去苏联访问,当时您带领党政代表团在1960年访问了苏联一些加盟共和国和城市,重新认识了莫斯科。这是在1960年兄弟党会议之后。我有幸与苏联领导人一起参加了中国代表团周游祖国的行程,我经常回忆这次旅行。

您,刘少奇同志,看到了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是多么的热爱和友好,我们的党对中国共产党有多么友好。

所以,我们越是更多地深入到过去,更多地回忆我们两国之间的互访和会晤、具体的事情和各种关系,就越感到所有这一切只能证实一个结论:我们拥有所有使我们两国的党和人民一起走在最前列的基础。我们的党和人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人、苏联政府高度评价毛泽东同志在过去和前不久发表的声明,特别是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15周年所说的,我们的分歧很小,但团结更牢固。今天,您,刘少奇同志同样好像证实了这个议题,在开始会谈时就表示,尽管我们之间存在困难,但都是暂时的,困难将被克服,我们两党和两国人民将团结起来。

从我自身的角度我想强调,这一点是主要的。我们党、我们的人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我们现今的领导人认为在自己的外交活动中主要的方针是团结、是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这是我们党、我们中央委员会的总方针。

在这里,邓小平同志反驳一句,说帝国主义者能帮助我们团结。大家都知道,帝国主义是我们共同的敌人,我们,苏联共产党员,想必有信心将和中国共产党一起与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但是也许我们不应该去等待帝国主义向苏联或中国进攻的最为紧要的关头,而是现在就该坚持不懈地和坚定地去克服苏联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关系之间的困难,我们的团结之日就将提前到来,在帝国主义者对我们国家进攻之前就去做,在极其危险的局势出现之前就去做。

我想强调的是,我们两个国家各自发展的客观过程本身,两国关系的发展、国际社会主义体系共同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及国际社会主义体系形成后出现的新现象,即出现了由年轻的民族主义国家组成的更为广泛的阵线,这些国家在倾向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同时建立起广泛的反美阵线,所有这些新的情况让我们毋庸置疑地有权利说,我们拥有一切基础以使我们团结起来、让我们两党和两国人民在一起。

所以我想真诚地表示,相信不管有多难,不管我们两党和两国关系之间出现多么复杂的情况,最终这些都将被克服。我们希望我们团结起来的时刻将不再拖延,而是尽快到来,这

样的时刻不仅符合我们的人民和党的利益，而且符合整个国际社会主义体系、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

刘少奇说，当然，如果我们的关系很快就能得到改善，如果我们的困难会被克服，这就很好。这是我们共同力求达到的目标。

团结需要基础，需要共同的基础。这共同的基础，首先就在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其次在于对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支持，最后是在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平等合作和相互帮助。只有忠实地遵循这三个条件或这三点，才有可能建立团结的条件。还是在1960年81国共产党会议上我们就提出过这个问题。但在当时你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声明，你们对外政策的总方针是和平共处。我们说不能仅仅局限于和平共处。我们认为总方针应该包含上述三点：第一，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实现合作与相互帮助；第二，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第三，赞成不同国家和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和平共处并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政策作斗争。但当时你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并不愿意同意这个想法。你们就是只坚持和平共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更进一步发展了这条路线，并表示国际问题可以通过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合作来解决。

今天您表示，你们的总方针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在这种情况下，我必须要问您，那过去你们党的总方针怎么办？你们党是放弃了总方针还是没有？它还有效吗？

我认为只有以上述三点可以概括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方针。

在你们以前的总方针依旧不改变的情况下，我们看不到团结的共同基础。

利用您回国的机会，我想请您向勃列日涅夫同志、柯西金同志和中央委员会的其他委员同志转告我们的看法，你们与美帝国主义的合作将得不到任何好处。我想让您将这样的看法转告给你们的领导。

诚然，与对外政策总方针问题并存的还有关于革命原则的问题、关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忠实问题。缺少这个基础，关系就很难得到改善。

至于我们对此的信心，我们从来就没有失去过。

您说到我在1960年的莫斯科之行，那时，在访问期间，我不仅有机会与各机构的领导同志，而且与工人和农民群众进行接触。我很熟悉，了解群众的情绪。

出访结束启程回国的前一天，我回到了莫斯科并与赫鲁晓夫同志进行了私人会谈。我对赫鲁晓夫同志说，在我们两国、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方面，不管是中国人民还是苏联人民都绝不允许有任何有损于我们两国人民、有损于我们两党和两国之间牢固友谊的行为。当时，赫鲁晓夫同志赞同我的看法。对此他还补充说道，不仅是我们的人民和国家，而且是整个世界人民，所有革命人民不允许有这样的行为。

所以在伊尔库茨克的最后一次讲话中，我讲述了这些。我是在与赫鲁晓夫同志会谈后，在他表示同意我的看法之后作了这个发言。可是，在伊尔库茨克的一次接待中我作了讲话后，我的发言被刊登在伊尔库茨克的报纸上，而莫斯科的报纸却没有刊登我的发言。事情就是这样的。我们两国和两党之间的关系不好引起中国人民的不安。我认为我们两国之间关系不好也会在你们人民中引起不安。无疑，你们的人民为此担忧。可对中国人民而言，情况

与你们的有些不一样。我认为原因在于我们将有关我们两党和两国关系方面的所有重要事件的情况、你们批评我们的所有文章,以及回应你们批评的文章都刊登在报刊上。这样我们的人民就能从自己的需要去弄明白情况。

你们却是相反。你们刊登的只是你们批评我们的文章。你们不刊登我们的文章,也不呈报给你们的党。我认为,在那种情况下苏联人民的心情不可谓不沉重,要么他们不理解为什么你们领导人要反对中国,不明白我们的错误在哪里,不知道归根结底我们到底犯了哪些错误。你们不向苏联人民讲这些,苏联的人们不可能安心。所以我们这边的情况比你们那边更好。

至于你们的情况,依我的看法,在你们的领导人中和人民中的情况不太好,因为你们没有对人民说我们犯了哪些错误,中国真正的情况如何,我们真正的观点和看法是什么。这些你们都不对人民讲,只给你们的人民一些单方面的情况报道;我表示怀疑,建立在单方面报道情况的信念能维持多久。不告诉人民事情的真相,是无法让人民信服的。有些明显的事实是白的,而你们却要硬说是黑的。比如说,在莫斯科大街上你们的人殴打了我们的学生。许多苏联人都是目击者,看到他们是如何遭到殴打并受伤。一些医院和学校都知道这件事。而你们却声明他们没有遭到殴打。可是那些看到你们是如何对待学生的人们(路过的行人、学生等),他们怎么还能相信你们呢?!

甚至当你们强迫医生和其他医务工作人员签字声明,说中国学生没有受伤时,毕竟这些医生和医务工作者的做法是违背自己的良心!甚至如果知道事情真相的目击者在数量上是少数,可真相还是在尽管是少数的人这边。

如果党和国家,如果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不能在真相面前、在千真万确的事实面前俯首听命,不听从真理,不正视这样的事实,那就很难说他们的地位就会牢固。

如果你们的对外政策总方针不改变的话,那就很难在国际舞台上实行合作。这里起特别的作用的就是你们与美帝国主义建立密切关系的方针,通过密切与美国合作的方式解决国际问题的方针。这个方针将导致你们自己深受其害。

契尔沃年科说,我不认为现在应该对提及的问题作进一步地深入,因为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已经多次就此交换过意见了。但我想简要地说说以下几个方面。

有关和平共处的问题可以放在第一、第二和第三的位置,尽管这是有意义的,有时还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们是这样看待和平共处问题的:和平共处原则是列宁主义原则,也曾得到你们的赞同。在1957年的莫斯科宣言、1960年的声明、万隆会议宣言,说起来还有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都有记载。这是个不应放弃的原则。与其他我现在所说的有关原则一样,我党将遵循和平共处原则。

第二点,和平共处原则与您所说的有关与美帝国主义的合作没有任何关系。这也是个客观的范畴。我们一直希望今天美国就被无产阶级革命所推翻,可无论是我们还是你们都无法做到。必须要考虑到美帝国主义的存在,必须要寻找与其相处的方式。在与美帝国主义的合作问题上,苏联政府不允许任何有损于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革命运动合作的行为。

我还记得在您的正式报告中，也就是您，刘少奇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中，您说你们国家将对包括美国在内的不同社会体制的国家实行和平共处的方针。再说，当我们两党之间展开激烈的辩论之后，这些立场最近也已经作过表示。这个问题很明确了。

第三点，说到公开的辩论，柯西金同志在与毛泽东同志会谈时，当时您、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其他中国领导人都在场，他重新详细地阐述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立场：我们党不想继续公开辩论，因为苏联共产党非常珍惜与中国共产党的友好关系，这就是我们党认为没有必要继续公开辩论的主要决定性原因。你们抱着另一种观点。而我们不想教导你们。中国是个主权国家，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你们自己解决问题。我们表示我们不同意，但我们不想教导你们。

第四点，至于我们国内的情况，我们认为，从您这方面来说，刘少奇同志，来充当好像是我们的人民、我们党方面的裁判是不合适的。苏联政府、苏联共产党自己决定他们怎么做。可我想告诉您，我们国内的情况并不像您所说的那样，并且还将更好。中央委员会和党、苏联政府和人民将更团结。还想补充一句，我们深信这种团结将成为与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和团结改善特别重要的因素。

说到总方针，既然您提到了这个问题，那我想说生活会表明怎么样的方针是正确的。列宁不止一次地说过，而我们一直听从列宁的，归根结底问题在于什么样的立场是正确的，与其说不仅仅是要靠辩论本身，不如说是由具体的实践、生活来解决。让我们拭目以待。

我们党现在不要求你们领导人改变你们的总方针。可以将有些问题暂搁一边，我们解决一些具体的问题，在我们的共同点的基础上而团结，我想再次强调，不管有什么样的暴雨，什么样的狂风，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方针就是与中国共产党团结，与中国人民团结。

刘少奇说，生活与事实、实践的确将指明这点。这是正确的。对我们而言实践同样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与帝国主义的斗争实践中我们将团结起来。我们永远不会去做对帝国主义有益的事情。

邓小平说，说到事实，我们见得多了，不用说远的，就在眼前。例如，你们不久前重复了赫鲁晓夫原来的立场，你们在建立“联合国部队”的问题上证实了他的立场。美国人“双手”赞成这项提议。这项提议是什么意思？为谁派遣这些部队？是反对美国、苏联、英国、法国、民主德国、日本吗？我想不是。

事实上这意味着在帮助美国建立国际宪兵以镇压各国的革命运动。赫鲁晓夫从政治舞台退出后，这个事实表明了你们的实质：继续赫鲁晓夫的路线。你们已经做出了这样的事情。联合国部队已经被调往刚果，而你们在联合国投票赞成派遣部队去刚果。柯西金同志对我们说，事情不是这样的，而是被否决了。我们查了一下，不得不确信我们的消息得到了证实。就这样当着我们的面撒谎！一方面，你们表示强烈反对美帝国主义，另一方面，事实上与它共同建立国际宪兵。

还有个例子,是你们对西柏林的态度。以西德的总理艾哈德为首的几百名西德议员坐美国飞机到西柏林,你们怎么看待这个事实?毕竟这就在你们边上。这事直接关涉民主德国的主权。当时勃列日涅夫同志和柯西金同志正好去波兰出访。就此事他们表示了什么?没有一个字提到美帝国主义。赫鲁晓夫还能做点什么,尽管放的是空炮,可你们这次甚至连空炮都没放一发。

你们在越南问题上掀起了轩然大波。你们在到处叫喊,说中国不让你们通过中国境内向越南运送你们的物资。我们对此还没有进行正式的反驳。可时间到来的时候,我们会向全世界人民说明事情真相。如今时间还没到,我们也还没说,因为你们还没有说出所有一切。最好在你们将所有这一切完全说出来的时候,我们再说。围绕你们承诺向越南提供物资的问题,你们掀起了一片叫嚣。但是,甚至拿你们承诺提供的所有物资,包括在苏联最后一次会晤时答应的,也构不成是难以置信的重要物资。你们对离你们那么远的事情议论纷纷,而对你们身边的事情却沉默不语。关于这点我们也打算纷纷议论起来。你们说谁教导谁。我们不想教导任何人,可提到对待帝国主义、反动派,对待现代的修正主义,我们不会沉默,我们会作出自己相应的评价。你们说自己支持越南人民的斗争,为什么今年4月3日在列宁格勒要镇压支持越南的人拥护者的集会?那里没有可以朝它扔石块的美国大使馆。多少越南拥护者都受伤了!甚至撕破了越南的旗帜。也正是在那个时候你们声明,你们是最革命的,你们坚决与帝国主义作斗争。那就要问了,为什么你们要采取类似的行动。你们希望要在行动和事业中团结起来,而我要说的是,这就是你们做出的事情和行为。

刘少奇说,正因为你们这样的行为我们看得多了,所以我们表示对你们的怀疑和不信任。对你们明确指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步骤,我们将永远表示赞成。

刚才您否定苏联与美帝国主义之间存在合作,但是你们的领导同志刊登在报刊上的无数发言,尤其重要的是你们在这方面(邓小平插话:新的)具体的行为就是这种合作的证明。我们遵循的是相反的方针。这里所说的不是指需要与美帝国主义保持和平共处的关系。我们也不将与美国开战。我们也是这样做的。问题在于你们想以与美帝国主义合作的方式解决国际问题。越南问题是这些国际问题中的一个。你们想通过与美国的合作解决越南问题。这不会成功,也不会造成什么好的结果。

契尔沃年科说,想引起你们注意,当艾哈德和其他西德军国主义者在进行挑拨离间时,苏联方面在揭露这些不仅反对民主德国,而且反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挑拨离间的同时,正式并坚决地表示坚决反对西德帝国主义者的这些行为。至于具体的事情,你们很清楚民主德国与苏联之间的条约,以及不久前苏联与波兰之间签订的条约的价值,所有这些事情都旨在反对复仇主义的主要实际力量——西德军国主义。你们中国领导人很清楚有多少苏联部队在民主德国,他们用的是什么装备。这些部队面对的是最危险的和现代帝国主义最好的武装力量。可以列举出许多其他的事实,你们也知道的。

你们说得对,越南问题具有国际意义。你们也很清楚苏联领导人多次正式向你们呼吁就这个问题交换意见和协调行动。至于与美国的谈判,苏联政府就该问题没有与他们进行过也

不会进行任何谈判，只要求一点：美国军队从越南南部撤出和停止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轰炸。苏联领导人建议与之进行会晤和谈判的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而不是与美国。

对苏联是如何履行自己国际主义义务的，越南同志知道得很清楚，关于这点刊登过一系列越南领导人的发言讲话，其中包括最近苏联与越南的公报。所有这些都是不可忽视的事实。

我想重新强调，尽管我们之间存在分歧，现实迫切需要寻找通向团结的道路。需要讨论具体的问题，为此需要我们两党和两国不同层次和级别的代表更经常性地会晤。领导们的会晤是必要的。在这方面，我们觉得特别是现在存在极大的必要性。在这些会晤过程中许多问题都会更清楚，许多误解也会消除。

我在这里已经有5年半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尽管远远不能说完全了解你们的国家、你们的党和人民，我非常珍惜在中国度过的时光，尽管它曾经，很遗憾，是复杂的和困难的，我们的关系也曾经是非常尖锐的。许多有关你们的国家、中国的成就、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印象将随我而去。你们用15个年头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其中有许多是非常重要和珍贵的，遗憾的是如今我们两国之间各个不同领域中广泛开展经验交流做得还不够。我相信中国将进一步发展并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取得伟大的胜利。我看到了党的活动能力和中国人民那种紧张而又近乎自我牺牲的劳动。值得钦佩。为此我衷心祝愿中共中央委员会、你们党和政府的所有领导人和全体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更多新成就。我对中国共产党、中国和中国人民生活的认识使我相信我们两党和两国之间的困难将被克服。你们现在也说到了这点。将来，不管我在哪里工作，我的力量和微薄的工作都将以中国和苏联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团结利益为目标。

我要感谢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邓小平同志和其他中国领导人，以及中国政府在这段时间所给予我的关怀与厚待。祝你们大家身体健康。请转告毛泽东同志和所有领导同志，为了在你们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为了我们两党和两国人民的团结，为了整个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团结，祝你们身体健康。

刘少奇说，我们之间没有个人的恩怨、仇恨和敌意。我们之间出现的分歧，是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是涉及方针和政治、涉及这类问题的分歧。我们把这些问题放在一边的同时，应该(而且我们也这样做)保持对你们的领导人、领导干部、共产党员和苏联人民的友好之情。

我认为，不管是我们、还是你们，还是世界上所有追求革命的人，都是不会对帝国主义者宽容的。

契尔沃年科说，这是肯定的。

刘少奇说，让我们在与帝国主义斗争的具体事业中团结起来。

契尔沃年科说，我们赞成。

刘少奇说，我认为这样的事情会出现，类似这样的情况将不断地发生。我们不会失去信心，因为苏联是个伟大的国家，因为苏联人民是伟大的人民，因为有许多苏联人和我们怀着同一个希望。将来在具体的事业中将证实我们两国、我们两国人民将走在一起。

请在回国之际向勃列日涅夫同志、柯西金同志、米高扬同志和其他苏联领导同志转达我们的问候并祝他们身体健康。

您作为大使,这些年里过得不容易。请转达我们对您和使馆全体工作人员的友好之情,我们不想让他们受到损失。至于辩论,这是意识形态问题,政治和方针问题。是另一码事。就这些问题也可以在将来进行争论。

当然,在辩论之时,在一定时期内所有人都不会轻松,但如果进行了辩论,无论我们是否同意谁或者不同意谁,都应发展友好的关系。

邓小平说,感谢您在发言最后部分对我们的人民和我党的评价。祝您在新的工作岗位中取得成就。

契尔沃年科说,我一定向勃列日涅夫同志、柯西金同志、米高扬同志转达你们的问候。

新任大使拉宾同志不会晚于5月初来到北京,也可能在5月1日之前到来。

刘少奇说,我将向毛泽东同志转达您的祝愿。我们很高兴新任大使的到来。

会谈到此结束。

刘少奇、邓小平表面上保持平静,尽管有时给人的印象是他们准备跨出限度,可能会展开激烈的争论。

康生在整个会谈过程中一直沉默,全神贯注并若有所思。

从我们这方面来说,考虑到是告别性的访问,我们努力避免发生激烈的争论。

会谈记录:加利诺维奇同志、列别金斯基同志。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C.契尔沃年科

АВПРФ,ф.0100,оп.58,п.516,д.5,л.133-152

№25689

契尔沃年科与哈拉斯会谈纪要:中苏对越南的援助问题[①]

(1965年4月23日)

绝密

……

①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哈拉斯先讲述了自己与叙利亚驻中国大使会谈的情况以及对中国与叙利亚关系问题的一些看法。而后他把话题转到了在4月23日当天同余湛举行的会谈。

余湛说到越南问题：如果我们……关注目前越南的局势，将看到这(显然是指慕尼黑的历史教训)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大家都知道约翰逊"提议无条件谈判"。余湛着重指出，接受约翰逊的这些条件就等于出卖和平。

约翰逊今年4月7日的讲话证明美国的政策是孤立的，它受到来自世界舆论的压力，可这项政策终究还是没有改变其侵略的性质。

今年2月15日，余湛继续说道，柯西金同志回到了莫斯科，而2月25日送交给了我们一份物资清单，是苏联打算发往越南的物资。3月10日中国方面答复准许转运越南人民急需的所有物资，这也是根据越南同志的要求做的。

按余湛的话说，当3月1日在莫斯科举行共产党协商会晤时，会晤时所说的是好像中国方面在苏联援助越南民主共和国一事上制造了些困难。事实上……情况不是这样的：2月28日中国方面提出了解决该问题的方式，可直到3月8日之前苏联没有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派送任何急需的物资。

然后苏联向我们表示……想通过中国向越南转派4 000名苏方人员，可不管是在曾北京逗留的柯西金同志，还是越南同志都没有提起过这个问题。按照余湛的看法，转运数量如此庞大的人员意味着真正的干涉。作为对中国人的答复，越南人表示至今还没提起过有关这4 000名人员转运的话题，不需要这些人员。所以我们……不赞成上述提议。

随后余湛讲到了有关苏联请求中国方面在离昆明不远处安排一个机场，用来停放12架米格-21飞机和500名人员，从空中对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掩护。经研究后该项请求同样遭到拒绝，因为米格-21的作战半径无法掩护越南民主共和国。

如果苏联的想法是认真的，为什么谈的只是12架飞机，而当时美国几十架飞机在对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空袭。

苏联同样还打算向越南发运导弹……这里提到的导弹长度约15米。用飞机无法运送，苏联请求用铁路进行运输，对此中国方面在3月15日表示同意。4月7日第一批导弹运抵中国，也就是差不多经过了一个月，但是……不能将这么长时间的耽搁归罪于中国。

余湛说，那时苏联通过法国为和平谈判牵线搭桥，"苏联请求向越南运送武器。造成一种印象……这些关于运送武器的请求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和平谈判而'支付大量的预付款'"。

……

АВПРФ，ф. 0100，оп. 58，п. 516，д. 5，л. 153－165

№25757

关于在中国举办新兴力量运动会的报告[①]

（1965年4月27—29日）

……

1965年4月27　29日在印度尼西亚举行新兴力量运动会执委会紧急会议，因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拒绝进行1967年在开罗举行的第二届运动会。根据先前签订的条约，运动会应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因此，4月12日体育协会和组织联盟中央委员会副主席Л.尼古拉耶夫写信给中央。信中写道："新兴力量运动会第二届运动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可能会引起国际体育局势尖锐化，因为中国许多体育团体退出了大多数国际联合会，而且在比赛中会忽视传统的国际竞赛规则。"尼古拉耶夫请派一个苏联代表团维护苏联的观点。

4月17日B.斯纳斯京、A.舍夫利亚金和K.鲁萨科夫建议中央派代表团为了：

1. "采取……防止国际体育运动可能产生分裂的措施"；

2. "支持国际比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的建议，但提出必须遵守传统的国际竞赛规则的意见"。

РГАНИ，ф.5，оп.58，р.7748，ед.хр.126，л.60－62

№25690

拉宾与刘少奇会谈纪要：中苏关系及其恢复[②]

（1965年4月30日）

在递交国书后会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进行了1小时10分钟。

参加会谈的有：中国方面是外交部副部长刘晓，外交部苏联和东欧国家司司长余湛，代

---

①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② 该档案系摘录自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括弧内为摘抄者归纳的内容。——编注

理中国外交部礼宾司司长的葛步海，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工作人员阎明复，外交部工作人员李霍林、陈广才；苏联方面有苏联驻中国贸易代表斯拉德科夫斯基、大使馆参赞兼公使莫丘里斯基、大使馆参赞雷索夫、武馆罗曼诺夫、大使馆三等秘书加利诺维奇。

C. Г. 拉宾说，勃列日涅夫同志让我转告您，说他很高兴回忆起曾和您一起去列宁格勒、明斯克和伊尔库斯科的情形。

刘少奇说，对！对！很久以前我就与勃列日涅夫同志成为朋友了。

……(刘少奇重又讲述自己在1960年的苏联之行，说他的发言没有刊登。)

81国党代表会议后我们的确想改善我们的关系。总之，从我们这方面讲这样的举动有两次。第一次是在1957年会以后，当时取得了一致，我们竭力要改善我们的关系。第二次是在81国党代表会议之后，在这次会议上同样也取得了一致，我们力求取得改善。

但是没过多久我们的关系就开始恶化。

对此我们没有准备，我们甚至没想到我们将要跟苏联共产党展开争论。但面对一些情况，我们不得不进行争论——

拉宾说，……我想指出的是从那个时期到现在这段时间开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0月全体会议。在到达这里之前，我与勃列日涅夫同志、米高扬同志、柯西金同志谈过。他们让我转达我们新领导层对巩固与中国友好关系的真诚祝愿。我们的人民希望这样，这也是我们党和中央委员会以及政府的愿望……

我们非常高兴，今天有报道说签署了我们两国的1965年商品贸易协议。这是很好的一步，我们希望进一步扩大我们的贸易联系。

中国方面建议在新的基础上进行新的经济合作……如果能实现这样的合作并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我们将感到非常高兴。

我们希望不久将在北京签署我们两国在1965年的文化合作计划。

……有发展我们两国友好关系的一切基础。当然，我们之间还存在一定的意识形态上的分歧。看来将以某种形式继续就这个问题交换意见，但不管如何，作为与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不管在哪里出现，进行共同斗争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能够并应该发展友好的邻邦关系。

勃列日涅夫同志和柯西金同志让我转告，我们将非常乐意向中国领导人提供任何有关我们对内和对外政策问题的情况……(请求经常会晤)

刘少奇说，这很好。今后我们能够并将会这样做。

对于苏联同志……我们没有个人恩怨，我认为我们事业的基础是与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是坚决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而后，刘少奇谈到了周恩来1964年11月的莫斯科之行，说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因赫鲁晓夫被撤职而不想说出真实情况"。刘少奇说，同时也清楚了，我们两党之间的分歧依旧跟以前一样，情况没有变化。

刘少奇说，可为什么，是因为哪些原因使我们以前非常好的关系变得不好，开始恶化?

不消除产生这些分歧的原因，就无法消除分歧，无法停止出现分歧。这也是我们的肺腑之言，我认为在莫斯科签署对外贸易议定书，以及我们提出的涉及发展我们两国经济联系的建议，这都是很好的基础，是建立在平等互利原则上的基础。我们要发展这样的关系。我们的出口超过70%都是出口到社会主义国家，其中包括苏联，超过50%。为什么现在急剧缩减？应该是有一些原因的。

所以我现在认为，发展我们之间的经济关系还是可以的，可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搞。在保留和存在政治分歧、意识形态分歧、理论分歧的情况下，经济关系还是需要发展的……

同样也有可能在我们两国人民之间进行接触和文化交流。政治关系问题依旧不明确。

刘少奇说，政治问题方面的看法很难取得一致……

刘少奇说，如果你们方面有意愿讨论这些问题，我认为在合适的时候可以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我这里指的当然是内部讨论。

……您刚才强调苏联方面准备向我们转达有关对内政策的情况。从我们这方面来说，我们也可以向你们通报我们的内部情况，有关我们实施的各项指令……

刘少奇说，如果已经谈到了这点，而我指的当然是我们之间存在的同志般的关系，那我们对你们的内部指示也产生了某些看法。我们可以就这个问题谈谈。可因为我们两国之间产生了不是太好的关系，所以我们与你们谈的，主要涉及对外政策问题，我们认为能够公开地跟你们谈对你们内部政策看法的时机还没到……

拉宾说，要消除我们意识形态上的分歧需要许多时间……我非常赞同您说的这点。至于政治上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对外政策，我感觉对这些问题可以看得更乐观一点。

我们两国正与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后者既威胁到你们，也威胁到我们国家。

(接着拉宾谈了苏联的国内情况和提高农业的必要性。)

……我向您提一个个人请求。我想在五一节之际或以后与毛泽东同志认识一下并拜访他。刘少奇说，尽管毛泽东同志现在不在北京，节日之前可能不回来，可今后您肯定要会见他的……

我们很高兴看到苏联向越南提供援助。提到向越南提供援助的问题，所有这些事情都是我经手，我直接处理这些问题。所以，我知道在不同时期你们对这个问题采取的是什么处理方式，什么时候你们开始或多或少地积极提供援助，数量是多少。就越南问题我们也有对你们的不满。过去和现在也都存在一些不满。

……

АВПРФ, ф. 0100, оп. 58, п. 516, д. 5, л. 166－179

№25691

拉宾与朱德会谈纪要：世界大战与中苏团结[①]

(1965年5月8日)

……拉宾再次请求会见毛泽东。

拉宾说：诚然，我们两国之间存在一定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但是按照苏联领导人的看法，必须在所有可以做到的领域——经济关系、对外贸易、文化合作、科学技术合作领域巩固我们的关系。

(朱德并不支持这个谈话方向，而将话题转到了分歧问题。)

朱德说，而现在，正如您，大使同志，所说的那样，是时候不让这些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影响我们在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关系发展……

我们应该使这些关系仍旧与发生分歧之前一样。

但是，我们的分歧涉及马克思列宁主义，只有在消除了这些分歧的情况下，只有到那个时候我们才能使我们两党和我们两国团结起来。只有当基本问题解决以后，那时剩下的问题就不难解决……

我希望您能够在这里比您的前任更好地完成自己的使命。这就是我的个人愿望。

……

拉宾说，可我们主要的目标是支持英勇的越南人民。这使我们有责任更多地去关注这个问题的具体方面。据我所知，现在运送武器的军用列车很快将通过中国境内前往越南民主共和国……

在与周恩来同志进行会谈时，柯西金同志说了"我们不是赫鲁晓夫分子"。他还说我们10月全体会议(1964年)的意义远比第一眼就能想到的要深远得多。

(朱德谈有关越南人民的英勇斗争。)

朱德："这场战争会引起新的世界大战吗？这个问题涉及对革命的评估。越南人现在正取得胜利，消灭美帝国主义的军队，这样一来就延缓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我们应该不只是向越南提供具体的物质援助，还需要提供政治精神上的支持，揭露帝国主义分子的凶恶、揭露美帝国主义的政策、提高人民的觉悟、鼓舞人民起来与美帝国主义作斗争。这比用步枪和武器援助所起的作用更大。"

……

朱德说："……当帝国主义向我们发动战争时，我们将团结起来……"

拉宾说，我认为要是我们团结起来的话，帝国主义者将不敢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

---

① 该档案系摘录自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括弧内为摘抄者归纳的内容。——编注

(谈起第二次世界大战。)

朱德说,反对斯大林,这意味着反对列宁主义的正确路线。所以,你们应该恢复斯大林实现的列宁主义正确路线,应该放弃修正主义路线、放弃赫鲁晓夫路线。

如果你们这样做的话,那时你们的威信就将提高到20年前的高度。

……现在正是给予美帝国主义毁灭性打击的时候,而我们能够战胜它。

……

拉宾说:"说到斯大林的作用,我可以告诉您,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中央委员会和我们的政府自己会认识清楚,对斯大林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作用会给予应有的评价。"

АВПРФ, ф. 0100, оп. 58, п. 516, д. 5, л. 180-190

№25692

拉宾与周恩来会谈纪要:中苏关系若干问题[1]

(1965年5月15日)

会谈开始时谈到了周恩来与契尔沃年科的最后一次会谈。周恩来坚持认为,是契尔沃年科自己挑起争论的。而后拉宾说,最近在发展苏联和中国关系方面采取了一些有益步骤,如经济合作、向越南运送武器、情况交流。

周恩来说:"我认为在任何会谈时都会产生两个问题:我们如何发展国家之间的关系,该发展什么样的国家之间关系;第二个问题是我们之间存在哪些分歧。

……只是有关友谊的抽象会谈无助于事业。"

周恩来谈了他与柯西金讨论的具体办法:"柯西金同志请我的翻译记下这些问题,并将这笔记转交给他。"

第一个问题,周恩来表示可以发表"庆祝苏中条约签订15周年"的贺电和祝词。

柯西金说:"让我们来个君子协定吧。"

可是,周恩来说,苏联报刊刊登的是苏联不同意的部分(反帝国主义斗争)。

周恩来接着说到苏联和中国的条约,说条约旨在反对日本,而日本身后站的是美帝国主义。"如果要庆祝我们签订结盟条约周年纪念,如果有准备要证实这次谈话还继续有效,那

---

① 该档案系摘录自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怎么可能不揭露美帝国主义?"

第二个问题，贸易关系。"必须说的是现在这个领域的事情进行得还顺利，但我们当然不该满足于这个。所以我们提出了增补必须在平等互利原则上签署的有关附加长期关系的建议。"

第三个问题，苏联援助的项目建设。周恩来说，未完成的项目必须建设，以及在某些情况下将没有建设完的要建设完。

第四个问题，"至于有关文化合作的协议，这样的协议过去履行得不好。我们希望今年将会更好"。首先谈到的是有关友好协会方针方面的措施。

第五个问题，有关学生的问题："我们打算派遣我们的学生去你们那学习……我们也将接受你们的学生，如果有这方面申请的话。"

第六个问题，有关旅游。周恩来表示希望履行签订的协议。

"我说这些是为了表明在两国关系方面还能做许多事情，因为我们两国的人民要求发展和巩固这些友好关系。"

"应该说中国人在两国关系方面一直是说话算数的。我该说我们的政府说话也是算数的。"

"我向柯西金同志提出了更重要的问题。两句话：'交流情况，行动一致。'"

"我当时说，根据《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我们应该就最重要的问题交换情报，只有通过交换才能发现一致行动的可能性。甚至当发现不可能一致行动的时候，通过情报交换我们就能够知道我们与你们的分歧在哪里。"

周恩来说，正因为这样，所以他给契尔沃年科讲述了自己与本·贝拉和其他人的会晤情况。

拉宾说，苏联本来就与美帝国主义斗争。

"美帝国主义是侵略与战争的主要力量。他开始成为国际宪兵。对它不能采取绥靖政策……没有任何我们背着越南、刚果以及其他人民进行的谈判。"

周恩来答道，尽管我们之间不只在意识形态方面存在分歧，还在一些政治问题和国际问题上存在一些原则性的、严重和深刻的分歧，但苏联和中国应该竭尽全力团结起来。

说起有关党的路线，"应该说的是，三月会议是苏联共产党新领导人在我们两党之间设置的新的几乎是无法克服的障碍"。

接着周恩来批评柯西金就有关印度支那问题召开国际会议的提议。

"当苏联代表在4月16日与范文同会谈时，范文同直接就表示现在不能进行谈判，这意味着屈从于敲诈。"

而后周恩来再次指责苏联与法国的合作。

拉宾答道，这是"误会"。话题谈到的是呼吁戴高乐，"要法国政府反对侵犯越南主权"，当时没有涉及谈判的话题。

周恩来说："既然你们呼吁法国政府协助制止对越南的轰炸，那就无法想象同时不涉及

南部越南的中立化问题。”

拉宾说:“没有,我们没提出这样的问题。”

这个问题只是在1963年提出过,“但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提起过”。

周恩来还是重又回到了2月23日的事件:“向法国政府呼吁的事实本身说明你们是赞成谈判。”

周恩来谈到苏联与美国的接触:“你们的外交官们一句厉害的话都没说,而美国的国务卿则表示,会谈和接待是友好和很有意思的。”

“给人的印象是:在那个时刻,当美帝国主义者正在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时,在屠杀我们的兄弟时,你们的大使却与美国人维持着隐秘的关系,苏联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就好像我们这里常说的‘如胶似漆’。”

接着周恩来说到了葛罗米柯在自己的声明中没提到越南南部的民族解放阵线(在出访法国巴黎时)。

周恩来说:“如果美帝国主义者扩大战争,中国不可能不参与。如果美国将战争扩大到印度支那,我们将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我们声明,如果美国人将战火烧到中国,那我们这一关对他们来说将是无法逾越的。”

周恩来随后谈到了他出访印度尼西亚时所做的事情。

1.“我说了,劝说越南同志屈服于美帝国主义者的恫吓是错误的。”

2.“第二点,只要越南战争一旦扩大就将成为世界大战,我驳斥了这种观点。

如果美国人甚至连中国人都应付不了,他们怎么能够将越南战争扩大为世界大战……他们在实施升级战术,也就是逐步地一级一级往上升的战术。

只有脑子最迟钝的失败主义者才会这样扩大战争。”

接着,周恩来谈到了美国全球“扩军”的错误军事战略。

“所以,如果他们要进一步这样做的话,那他们就无法应付中国,也谈不上扩大战争。我们不会发动世界大战。(印度支那战争)不能成为世界大战。”

周恩来补充道:“现在不必害怕爆发核战争。”

3.“我们说了,如果他们要扩大战争,我们不会回避自己的国际义务,但我们不会将苏联拖入战争。”

拉宾说:“谈判的时机反正应该是越南同志自己决定的,而不是我们,也不是其他同志的,这点我们完全同意。”

拉宾谈到苏联领导人:“他们不是赫鲁晓夫分子。他们希望我们两国友好和相互谅解。”

周恩来继续说到越南武装斗争的必要性,批评苏联没有对印度的提议进行批评(有关亚洲和非洲部队在两个越南边界驻扎的提议)。批评苏联对印度的援助。

“我不是外交家。我是军人,我在战争中得到锻炼。也许我也好战。”

拉宾说:“我们的根据是,应由越南人民去解决和平调解的问题。他们在战斗,在进行谈判,那是他们的事情。而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是援助越南人民。”

周恩来："可你们应该在你们的外交活动和宣传方面做这些事情。"

周恩来："美帝国主义者是各国人民的敌人。你们能否定这点吗?"

拉宾："从来没有。"

周恩来："既然你们不否定这点，那你们的外交活动就应该旨在孤立和批评美帝国主义。"

拉宾说："我们就是这样做的。"

周恩来问道，那么为什么不反驳有关你们与美帝国主义合作的传言?

拉宾答道："那只得经常不断地进行反驳。我们顾不上做这些。我们要建设共产主义。"

周恩来说，赫鲁晓夫在4月的艺术展览会上表示，"越南南部是件很小但伤脑筋的事，可要是不制止它的话，它会转变为世界大战。这事怎么讲?"

拉宾说："赫鲁晓夫已经退休了。"……

周恩来说："这一切是一场计划好的有人指挥的闹剧。我们明白你们和我们的体制是如何运作的。"

拉宾说："看来是我们的体制也运转不规律。"

周恩来还是在说苏联与美帝国主义的友谊。

拉宾说："我希望，您不会是想要我们与美国断绝外交关系吧?"

周恩来问，那如果美国人想断绝与你们的关系，你们将如何对待?

拉宾说，如果美国人打算这样的话，如果他们要干涉我们的事业，这点大家知道的，我们会有所准备，时刻准备作战。

周恩来说："现在进行战争也还靠舆论。要去进行揭露，这样别人才会正视你们。现在根本没把你们当回事，别人也不怕你们。"

对美国"你们应该保持更冷淡一点，不要搞隐秘关系"。

接着，周恩来与拉宾开始谈论关于多米尼加共和国和苏联在联合国的工作问题。

拉宾说："也许我们的代表有必要相互见面并讨论一下社会主义国家对联合国的策略。"

而后说到了有关柬埔寨问题。周恩来呼吁支持西哈努克，以便将有关柬埔寨问题会议与老挝和越南问题会议分开。周恩来说，必须邀请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参加有关柬埔寨问题的会议，而不是西贡政府。"如果你们这样行事的话，那你们就将开始抵抗美国和英国。"

……

АВПРФ，ф. 0100，оп. 58，п. 516，д. 5，л. 191－227

№23050

谢米恰斯内致苏共中央函：中共通过邮件系统对苏联进行敌对宣传

(1965 年 5 月 18 日)

机　密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
第 1094 - c 号
1965 年 5 月 18 日
莫斯科市

致苏共中央：

兹报告：中国当局，继续大量以私人名义，通过邮政渠道，从中国向苏联公民发送诬蔑性小册子《关于莫斯科三月会议》。

目前判断，上述小册子已进入苏联绝大多数地区。

根据截至今年 5 月 17 日的情况来看，国家安全委员会已查明并没收了带有此类小册子的信函和邮包近 2 000 件。多数小册子都被发往莫斯科、列宁格勒、新西伯利亚和伏尔加格勒诸州以及乌兹别克、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诸共和国。

除了通过普通信封投递外，通过大量事实，我们还发现中国人在这方面所采用的狡猾手段：将小册子夹带在外国和苏联出版的科学、艺术和儿童书籍里，隐藏在本子的封皮里，艺术明信片的装饰里，保价包裹里，等等(实例参见附录)。在很多情况下，这些小册子都是通过带通知单的挂号信的方式交给收信人。

与此同时，我们还发现并没收了 1 000 多封带有敌视性的阿尔巴尼亚资料的信件，它们均发自欧洲各社会主义国家。

国家安全委员会将继续对中共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通过邮政方式发入苏联的敌视性资料进行监控。所发现的资料均将予以没收和销毁。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B. 谢米恰斯内(签名)

РГАНИ，ф. 5，оп. 30，д. 462，л. 47 - 48

№23052

齐赫文斯基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中国的经济状况

（1965年5月24日）

苏联科学院

机 密

苏联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研究所关于中国的经济状况(现阶段的状况和发展前景)给苏共中央报告①

1965年5月24日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M.M.……同志：

兹发送给您“中国经济状况”札记——内容涉及……是由苏联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经济研究所历史分部，根据相应工作计划编制的。

其中，分析了中国近十几年以来，尤其是1963—1964年间的工、农业经济的发展和现状。

由于“大跃进”，截至1962年，中国的工业生产几乎比1960年下降了30%。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年)所确立的任务……只是到了1965年，国家工业才可能接近1962年所计划的产品实际增长指数。1962年，工业生产总量才达到1957年水平的100%。农业方面所情况尤其严重：不仅没有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任务，而且连“1956—1957年间中国农业经济发展……”都无法落实。1964年的中国农业生产总量，在经过1961年的严重下滑后能够重新达到1957年的水平。

国家的工业发展极其缓慢：1958—1962年间的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速度……即比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经互会成员国的工业增长平均速度还要低，也比全世界工业增长平均速度要低。在近代以来中国的工业……正如不发达国家……中国的农业生产发展速度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964年粮食生产数量人均比1957年少了15%以上。近3年以来所生产的粮食几乎被所增长的人口消耗殆尽。

当前，工业和农业增长速度的不协调成为了国家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生产的增长速度相比，1962—1964年间农业生产的恢复速度较为缓慢。新的一系列严重自然灾害导致农业生产得不到保障，从而可能使国家陷入极其困难的境地，甚

① 该档案复印件有多处字迹模糊，无法辨认，均以省略号标注。——编注

至达到了崩溃的边缘。

农业的不良状况也对工业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无法为工业提供大量的资本积累和从事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在最近四年以来,中共和中国政府在农业领域所采取的各种措施只是在某种程度上稳定了国内的粮食状况,而向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家购买粮食倒是在这方面发挥了更为重大的作用。必须进口粮食——此举更加限制了中国资本积累和向外国购买设备的可能性。

中国的顺利发展,主要取决于如何能够迅速地使国家的农业生产获得稳定的增长;而后者在相当程度上又取决于技术改造和生产集约化的速度以及采用先进的农业技术。

中国虽然在技术改造、生产集约化和引进现代农业机械等方面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具体实施的进程却相当缓慢。原因在于,国家工业暂且无法保证向农业供应所需要的技术和化肥。例如,根据在农业生产中所使用的拖拉机的增长总数来看,1958—1964年间新增加的15马力的拖拉机共有95 000台,其中50 000台是通过进口获得的,只有45 000台——来自国产。1958—1964年间所生产的15 000台拖拉机只有6 000—7 000台被列入拖拉机增加总额,其余——用以替换报废车辆和其他领域。以这种生产速度,中国要达到自己所需要的100万台拖拉机总量可能得经过140年的时间。与此同时,国家工业所产生的产品在质量上都非常低下。

还有另一制约农业现代化发展速度的因素,即集体经济在一些最重要类型产品的生产上缺乏物质利益的驱动。现存的工业产品和农产品的价格比例关系以及与生产投入相比显得低廉的农产品采购价格,均阻碍了农业的顺利发展。目前,寻找资金以扩大再生产是农业生产队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这就是说,农产品的采购价格无法补偿农业生产的损耗。可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领导人仍钟情于与多种经营市场联系微弱的集体经济(根据"自力更生"的方针),指望通过集体经济来发展各种副业和渔业。

最后,农村没有文化和广大农民群众的文化、技术水平增长极其缓慢——这些都是阻碍中国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因素。

1963—1964年间,中共和中国政府在农村政策和措施上的积极内容具体如下:1. 在一些数量不多但自然条件好和农产品商品率相对较高的地区,集中力量提高农业生产。他们首先在这些地区兴建了水利工程,运送了农业机械、工具和器材,向这些地区发送了占国家生产总量99%的化肥。2. 组织农民参加夜校教育,建立学校,从而使农民可以用一部分时间参加劳动,一部分时间——用来学习。不过,所有重大的举措暂时都是在生产队和公社的基础上进行的,而且必须归国家机关直接领导。3. 在农村越来越多地感受到国家组织的影响力:出现了国家的灌溉经济,增加了机修场的数量。农业技术站也开始培养农业干部,以掌握运送到农村地区的农机工具和器材。这些举措,虽然不足以解决农业生产发展中所遇到的所有问题,但毕竟可以对促进生产发挥一定的作用。

通过分析农村灌溉设施建设、农业电气化、机械化和所谓农业生产的半机械化以及农业化肥供应的发展和现状表明,中国暂时在农业生产现代化的所有这些方面都进行得极其缓

慢。通过研究中国在这方面的前景规划表明，中国在农业技术水平方面为自己所确定的任务是相当简单的，与苏联的现有水平相差20—25年。不过，即使要实现这样一个计划，中国仍必须相应地大量增强自己的工业(生产)能力。

近四年来，在整个重工业一系列主要部门生产增长速度急剧缩减，甚至停滞的情况下，中国为了首先确保农业生产而对工业生产重新定位，无疑是一项客观的正确举措，从而有助于纠正在编制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所出现的失误和偏差。当前，中国重工业落后于经济需求已演化为国民经济的一个严重问题。其甚至导致为农业服务的工业部门的生产能力出现了严重(普遍)不足的情况。

为了确保各重工业部门——尤其是矿山采掘、电能、黑色和有色金属等——的振兴，就必须投入大量的资金和培养更多的懂技术的熟练骨干。但中国在这两方面都欠缺。而在没有来自国外——尤其是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有力帮助的情况下，中国将无力在一个长期的时间段内确保社会生产的高速增长。

中国依靠自有资金增加基本投资的重要储备可能有以下几个来源：首先，降低对军事工业、原子武器和其他军事研究方面的拨款。目前，与其他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相比中国在上述目标上所花费的资金规模相当大。其次，通过改变“自力更生”的政策可能腾出大量资金以用于基本投资，因为这一政策导致中国不得不在极短的时间内生产国家所需要的各类型产品，从而花费大量目前对中国来说极其宝贵的时间。其三，放弃以零星投资的方式建设大量在技术和经济方面已明显落后的小手工业和半手工业企业的政策也是增加基本投资资金的重要储备之一。最后，(在经济投资和生产增长方面)采取坚决措施，以便以最快速度提高工业品的质量——这也是增加基本投资资金的一个重要源泉。

上述分析表明，中国工业品的质量是极其低下的，并在多数情况下都导致扩大生产规模显得缺乏效率。而产品的低质量是由现行政策所衍生的生产组织本身以及缺乏足够的技术骨干等因素所预定的。近年来，大规模扩大产品种类导致个别的、小批量生产大量和普遍出现，从而恶化了企业工作的技术、经济指标。

1963—1964年间，国家在提高企业的产品质量上下了很大工夫，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可是，在未实现向大规模和大批量生产模式全面转变，未实现深入的社会化、合作化和引进现代技术，未能迅速提高工人文化素质的情况下，企业的生产组织只能是相当简陋的，而且更关键的是改进的速度极其缓慢。与此同时，不论是生产的专业化和合作化，还是发展夜校教育，目前暂且都是个别企业和地方政府机关积极主动的结果。这些措施仍没有成为党和政府经济政策的组成部分，虽然其意义和可能产生的结果将远远超出了主动精神的范畴。

至于生产的增长速度问题，中国工业的现状表明，近期其可能出现一些加速发展的趋势。出现这一趋势的主要因素如下：1. 中国工业生产的负荷能力的增长(这主要取决于重工业主导部门的增长速度和消除各部门发展的比例失调)；2. 生产专业化和合作化的深入发展(这方面将主要取决于原料和能源工业部门的增长速度)；3. 众所周知的群众政治激情的促进作用。近期，生产的一定增长，粮食状况的稳定和其他一些因素都有利于提高人们的

劳动积极性。1964年,一些企业已出现了劳动竞赛再次兴起的征兆。

最近几年,中国工业生产的增长主要取决于及时和正确的决策(当然,农业生产的稳定增长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而确保重工业各主导部门——矿山采掘、煤炭和电力、黑色和有色金属、机器制造和工业建材等——生产的高速增长就成为一个主要问题。

在关注以上所述的同时,我们认为在解决苏中关系问题时还应对从中国经济现状中所表现出的以下诸方面予以重视:

——现在和今后很长时期内,中国在经济和技术方面需要得到工业发达国家的帮助;

——国家粮食状况的稳定和劳动者生产积极性的提高均允许中国略微加快工业发展速度;

——目前,中国关注的重心必然是重工业——尤其是那些直接或间接决定着为农业提供必需商品和产品的重工业部门的增长速度和规模的发展问题;

——最近几年间(包括1965年在内),中国将有能力从国外获得总价值不低于1.25亿美元(以1964年的汇率水平计)的成套工业企业,而如果在农业方面不发生大规模的自然灾害的情况下,这一价值总额还存在逐渐增长的趋势;

——在许多年内,中国仍将不得不继续从国外购买粮食;

——中国(在偿还了欠债之后)仍存在继续向外国寻求借贷的条件。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当考虑中国政府对外经济政策的如下特点:

其一,在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中极力构建自己的对外政策,在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购买商品和设备,在必要情况下也会利用外贸作为对(贸易)伙伴施加政治和经济压力的手段。

其二,极力支持和扩大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

其三,为了建立和加强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关系,中国会同时利用互惠贸易和政治支持手段,如动用(推动、维持和加强等)手段来加剧两个世界体系之间的紧张关系,继续对苏联、苏共,以及其他兄弟党和国家实施攻讦。中国领导人不会反对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紧张关系的加剧,但与此同时他们又会极力使中国置身于上述两个敌对阵营的冲突之外,以维持和扩大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关系。这一立场就是所谓的“……”政策,而这也正是西方目前对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正试图采取的立场。在继续攻击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同时,中国领导人在对自己有利的时候也不会反对扩大与这些国家的贸易往来,甚至还会试图以帮助为手段确保自己对个别国家施加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压力。

附原文共计115页。

第мп085号

机密

苏联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经济研究所历史分部负责人

C.齐赫文斯基(签名)

РГАНИ,ф.5,оп.30,д.481,л.1-125

№16679

莫斯科市委致苏共中央报告：基层党组织讨论苏共中央公开信

（1965年5月27日）

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关于莫斯科市党组织就苏共中央的秘密信件《苏共为巩固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而斗争》而开展的组织工作的情况报告

在莫斯科市基层党组织中，进行了关于《苏共为巩固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而斗争》秘密文件介绍的党组织会议。到1965年5月27日止的情况是：已有7 690个组织召开了会议，与会共产党员人数达510 042人。

在所有的组织会议上，共产党员一致赞同苏共中央在10月会议(1964年)之后就加强社会主义联合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而进行的活动。

首都的共产党员们完全支持二十大、二十二大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提出的党的总路线以及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情况正常化而采取的措施。

在党的会议上，赞成苏联具体帮助越南民主共和国，全面支持兄弟的越南人民在其反对美国侵略的正义斗争中采取的行动以及为改善苏联、越南民主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之间关系所做出的新行动。

莫斯科的共产党员们能深刻认识和积极支持苏联共产党为消除分歧、巩固共产主义运动团结而进行的活动。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团结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领域里表现出来的坚定、始终如一的积极活动，全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所以获得了来自整个莫斯科市党组织的热烈支持。

701邮政信箱的企业党组织在讨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秘密文件时，工长雷奇科夫同志声称："我们单位的共产党员和我个人一致支持和拥护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加强和巩固社会主义友好合作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做实际活动的政治路线，我们谴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列宁主义行动。他们要霸居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地位，在兄弟党之间将自己的意见强加给大家，这是不能容忍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原则问题上不让步是完全正确的。"

红色十月工厂车工杰明同志说:“我们一致拥护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团结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采取的措施。

中国的宣传中伤我们的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说,我们的党,好像已没有人民的信任。但是,这些可怜的理论家们必须张开眼睛看看我们的实际。在我们车间党组织里仅仅一年就有12人入党。这些人一辈子把自己的生命与党联系在一起。这难道不证明党和人民的团结?我们是工人,希望中国人民自己出来说话,并加入到工人阶级友好的国际大家庭中,为和平团结奋斗。”

368邮政信箱的单位技术科学博士、教授、国家奖金获得者杜勃诺夫这样表示自己的意见:“我以单位所有共产党员的名义宣布,我们完全拥护和支持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旨在加强各国人民的交往、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友谊的行动。我们的党,对朝鲜共产党表示巨大支持,我们共产党员们一致同意协商会谈,同意苏联政府宣布帮助越南民主共和国及其反侵略英勇斗争的公报文件。”

其他党组织也反映了上述相似意见。

对于中国领导重新开展反对我们党和我们政府的政治斗争,试图冲击共产主义运动,偏离由莫斯科会议制定的总路线,莫斯科的共产党员们深为愤慨。在共产党员的会议上发言者说道,中共领导人提交给我们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最后通牒”侮辱了我们。我们都“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分裂活动的愤怒”——第五纺织厂工长加里宁同志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最近几年来用其危险的把戏,不仅在党性上越过了界限,而且简直不懂礼节。他们顽固地不理睬、不答复我们党以及其他兄弟党停止公开破坏的创议。在中国领导人那里无不证明其进行蓄意的分裂活动。他们的唯一武器是对我们党进行下流的诽谤。所有这些都激怒了我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完全支持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团结各兄弟党、各民主和爱好和平力量所采取的措施。”

戴尔别涅夫斯基化工厂工艺师叶廖明同志说:“中国领导人极力设法在共产主义及工人运动中打入楔子,但是,这不会成功。中国领导人拼命地要用别人的手打击美帝国主义者来说明他们‘帮助’越南民主共和国。他们已处在叛变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路上。他们的活动应予指责。”

所有会议都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注定要失败……

党的会议提出了下列问题:

中国对越南做出了什么样的帮助;

非洲国家怎样对待中国领导人在亚非会议上反对苏联代表出席;

赫鲁晓夫同志与中国共产党领导形成的分歧中起了什么作用;

什么时候召开工人党和共产党会议;

目前是否允许支援越南用的苏联军用辎重经过中国领土;

中国的报刊电台公开进行反苏宣传,我们为什么停止公开讨论。我们必须给他们坚决反击,揭露中国领导人的真实面目;

在苏联共产党与意大利共产党之间原则性的分歧是什么，采用什么方法来消除它们；

苏联共产党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之间消除分歧有无什么进展；

是否全部中国领导人支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反列宁主义分裂政策；

苏联是否帮助中国建设工业企业；

罗马尼亚工人党的立场如何；

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是否给越南军事援助；

在我们那里是否居住着越过边境的中国人；

我们党与罗马尼亚工人党之间在乔治乌-德治死后的相互关系如何；

目前，首都的共产党员们正在继续熟悉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秘密文件。

苏联共产党莫斯科市委书记

……①(签名)

1965年5月27日

第ИСХ58号

АВПРФ，ф. 5，оп. 30，п. 110，д. 461，л. 42－45

№25693

拉宾与陈毅会谈纪要：关于越美和谈问题[②]

(1965年5月31日)

在就一些问题进行礼节性的谈话之后，拉宾讲述了自己随外交使团一起的中国之行。陈毅评述了中国的情况。

陈毅说："非常需要和平的环境，可是这取决于美帝国主义者是否给我们这样的和平环境。"

接着谈话提到了以前的战争。讲到了越南。

陈毅说："当斗争达到一定阶段时，当美国人再也无法进一步推进时，当美国人只能撤走自己的军队时，看来到那时谈判的条件就成熟了。"

"世界上没有一场战争超过100年的，而要是有这样的战争，那到第101年就开始谈判

---

① 此处的手写签名字迹潦草，无法辨认。——编注

②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了;曾经有过持续30年的战争,可到了第31年就进行谈判了。"

"而我们暂时还认为谈判的条件还没有成熟。"

拉宾证实谈判是越南人民自己的事情。

"近日我们将葛罗米柯同志与腊斯克和斯图尔特的会谈记录转交给了你们,那上面讲的就是这个(越南)问题。葛罗米柯说,苏联不打算就越南问题与任何国家进行谈判,苏联在所有问题上都支持越南政府的立场,必须立即停止侵略并将军队撤出越南。"

陈毅说:"要中国与美国合作,也许再过20到30年。但目前不可能改善关系,因为美国人占领着我们的领土台湾,对越南进行侵略。有关这些我在内罗毕与腊斯克、哈里曼以及美国内务部长都谈过。"

告别时,拉宾问陈毅:"还能称您为元帅同志吗?"陈毅回答,还有半天可以这样称呼他,但过了6月1日就该称他为"战士同志"了。[①]

……

АВПРФ,ф. 0100,оп. 58,п. 516,д. 5,л. 228-235

№24354

布拉托夫的报告:关于邀请苏联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问题

(1965年6月2日)

机　密
文本第4份
1965年6月2日
第217/уви号

一、关于会议邀请程序

1964年4月,应印度尼西亚的倡议,第二届亚非会议筹备会议在雅加达召开,22个国家的外交部长参加了会议。在会议公报中说"决定邀请"如下国家参加会议:

1. 参加过万隆会议的29个亚非国家;

---

① 中国宣布自1965年6月1日起取消军衔。——编注

2. 非洲统一组织的非洲成员国；

3. 第二届亚非会议召开前将会取得独立的亚非国家；

4. 蒙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南朝鲜、塞浦路斯、科威特、西萨摩亚、安哥拉临时政府。

关于苏联参加会议的问题，会议公报中说："向会议提交了邀请苏联的建议。一些代表团支持该建议，一些代表团反对。一些代表团表示，他们需要与本国政府商量。经过讨论，这个问题没能达成一致意见。一些代表团持这种意见：这个问题应该在第二次亚非会议上转交给国家或政府首脑们去研究。另一些代表团反对这个意见。因此，这个问题未能达到一致意见。"

众所周知，关于邀请苏联参加会议的问题是在印度万隆会议上提出来的，同时还表示邀请马来西亚参加会议。中国政府反对该项建议，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柬埔寨和几内亚支持中国的意见。

中国政府方面尝试这样解释这件事，似乎在雅加达会议上关于邀请苏联的问题被否决了。

在 1965 年 1 月中国向一些亚非国家分发的备忘录中说："在这次会议上(说的是雅加达会议)没能就这个问题达成一致意味着关于邀请苏联的建议被否决。这样，关于邀请苏联的问题就不会再出现了。"

从去年 10 月阿尔及尔会议开始，由 15 个亚非国家代表组成的筹备委员会就开始定期召开会议。按照阿尔及尔会议的代表声明，最终确定参加会议的成员组成不在委员会权限范围内。按照他们的话说，外交部长会议没有讨论关于邀请苏联的问题，将提交给政府首脑会议研究。我们是从印度人那里得到这个消息的。

5 月末，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向亚非各国发去了参加今年 6 月 29 日晚上 5 点召开的会议的邀请信。随信寄发了雅加达外交部长会议的决定。

二、亚非各国对邀请苏联的态度

最近几个月，赞成邀请苏联参加亚非会议的国家数量出现了令人满意的增长。其中对苏联政府近期声明的反应证明了这一点，声明中阐述了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据今年 6 月 1 日收到消息，可归纳为如下内容：

在同我国大使会谈时，阿富汗、加纳、印度、伊朗、埃及、老挝、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坦桑尼亚、突尼斯、乌干达、锡兰政府对邀请苏联的问题给予了明确和坚定的回答。在这个问题上，印度在其中做了许多工作，尽管印度仍继续提出在邀请苏联的同时也邀请马来西亚的问题。除了印度，只有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发表声明支持苏联参加会议。

更为明确地表示准备支持邀请苏联的国家有：约旦、喀麦隆、肯尼亚、刚果(布拉柴维尔)、利比亚、尼日尔、叙利亚、苏丹、中非共和国、赞比亚。

在雅加达筹备会议上，几内亚同中国一起反对苏联参加，现在外交部长贝阿沃吉对苏联大使表示，为了能让苏联参加会议，几内亚将在这方面做些工作。

摩洛哥在给一系列亚非国家的照会中说，摩洛哥政府决定支持苏联参加会议。

土耳其外交部长伊谢克在今年 4 月末对苏联大使说,土耳其政府无法想象没有苏联参加的亚非会议,将据此出发在这个问题上确定自己的步伐。

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在去年就表示,阿尔及利亚政府认为苏联参加会议是符合愿望的。但是,在本·贝拉访问苏联发表的公报中,应阿尔及利亚方面的要求没有提及这个问题。今年 5 月 29 日,外交部长布杰费里卡对苏联代办说,阿尔及利亚政府当时认为,阿尔及利亚作为会议参加国,在邀请苏联的问题上如果不事先表明立场会更好。按照布杰费里卡的话说,阿尔及利亚人在同友好国家会谈时都表达了赞成苏联参加会议。

马里总统莫迪博·凯塔在今年 5 月 27 日听了苏联政府的声明后,表示担心由于一些国家立场不同可能会导致会议夭折。按照他的观点,会议筹备委员会应该格外谨慎,通过决定时应该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和事务合作的利益。

缅甸、索马里、埃塞俄比亚不反对苏联参加会议,同时声明说,它们将遵从大多数意见。

伊拉克、也门、科威特和黎巴嫩支持邀请苏联,它们声明说,它们的立场要在阿拉伯国家首脑开罗会议后才能最终明确,那时将会就此问题进行意见交换。会议将于今年 5 月 30 日闭幕。

柬埔寨和尼泊尔领导人在今年 5 月末对苏联大使说,他们原则上赞成邀请苏联参加会议,不会发言反对这一邀请。同时他们还表示,他们也不准备发言支持这一邀请。

很明显,越南民主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巴基斯坦也持类似立场,尽管这些国家政府拒绝直接答复这个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反对苏联参加会议,尝试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以便阻碍邀请。苏联驻摩洛哥大使馆的消息值得注意,5 月末,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访问该国,似乎向外交部长本西马表示,中国默认多数与会者的意愿,如果他们同意邀请苏联的话。

根据印度尼西亚、泰国和日本的声明来判断,不排队这些国家对邀请苏联一事持反对态度。菲律宾就公开反对苏联参加。

大部分国家(加蓬、冈比亚、西萨摩亚、利比里亚、毛里求斯、马拉维、沙特阿拉伯、塞拉利昂、乍得、南越、南朝鲜)完全不表明自己对苏联参加会议的态度,要么避免就此问题发表意见。

象牙海岸、布隆迪、上沃尔特、达荷美、刚果(利奥波德维尔)、马达加斯加共和国、尼日尔、卢旺达、塞内加尔、多哥表示,它们不打算参加会议。

这样,根据这些资料,50 个可能的会议参加者中有 24—26 个国家准备支持邀请苏联参加会议。可以期待,还会有一些国家倾向于这个观点。

苏联外交部对外政策情报局负责人

A. 布拉托夫(签名)

РГАНИ,ф. 5,оп. 30,д. 480,л. 122 - 126

№25655

苏联驻朝鲜大使馆的报告：关于中朝关系新情况

（1965年6月4日）

1965年上半年朝鲜与中国关系的一些新情况①

……

从1964年年底到1965年年初在朝鲜与中国的关系中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总体上可以说是朝鲜领导人在试图摆脱一味地跟随中国。

这个过程始于10月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之后，当时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代表团访问了莫斯科并参加了十月革命47周年庆祝活动，特别是在1965年2月以A.H.柯西金为首的苏联代表团访问朝鲜之后。

众所周知，1964年中期朝鲜在热烈地宣传中国领导人的观点。尽管劳动党试图把自己的宣传显示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纲领"独立的方针"、竭力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统一，而实际上是以中国共产党所谓的"总路线"、中国领导人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为基础的。所有的攻击都是反对苏联共产党和它的内外政策。

中国的宣传可以在朝鲜民众之间广泛地传播。朝鲜的报刊登载了《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所有主要的论战性的编辑文章。

1964年朝鲜《国际生活》杂志第1、3、8、15、16期曾经刊登了那些中国文章"和平共处政策中的两条对立路线"，"苏共领导人——当代最大的分裂分子"，"无产阶级革命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等等。

宣传中首次开始强调的论题是朝鲜和中国之间的友谊在与"当代修正主义者的"共同斗争中得以巩固，是以各民族革命人民的思想统一为基础的。见1964年10月25日《劳动新闻》社论《以鲜血凝固的牢不可破的战斗友谊》。

可到了1964年年底，朝鲜领导层开始更清楚地感觉到自己一味跟随中国给朝鲜带来的所有不利后果。

由于1964年劳动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广泛接触，对于朝鲜领导层而言，他们更清楚地意识到中国领导人在自己计划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并建立以北京为中心的亲中国政党联盟方面让其所扮演的角色。与中国领导人一样，朝鲜领导层将分裂集团认作"独立的马列主义党"。所有这些从北京来到平壤的集团的领导层都受到最高层次的接待。可所有这一

①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切都使朝鲜领导层开始明白,尽管有中国领导人的巨大努力和他们巨额的财政援助,可分裂集团越来越暴露自己。看来,朝鲜领导层越来越深信与这些集团的"亲密接触"并不能增加劳动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威信。

朝鲜领导层不能不警惕中国领导人明显的大汉民族主义和政治冒险主义,而发现自己与中国人单独相处时,这样的前景只会让朝鲜人感到不安。

朝鲜也考虑到这样的事实,即中国领导人为在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建立联盟的宣传造势运动并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更何况中国领导人在10月苏共中央全体会议后对苏联共产党的愚蠢攻击反使他们自己陷入了更大限度的孤立。比如,1965年5月在与苏联大使进行会谈时,金日成承认,仅仅只有日本和印度尼西亚的共产党还跟着中国领导人,依旧支持公开辩论。(参阅我们的1965年5月7日第70号电)

片面地向中国靠拢导致了朝鲜与苏联和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和经济联系的恶化。而这本身也成为了朝鲜经济严重困难的原因之一。

在那些迫使朝鲜领导调整自己的政策,尤其是调整朝鲜与中国关系方面政策的原因中,由于美国入侵和扩张造成越南局势的恶化,朝鲜半岛三八线可能爆发严重冲突以及事件如此发展对朝鲜造成的后果,都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在继续支持进一步巩固朝中友谊的同时,朝鲜领导人对在朝鲜传播中国领导人的观点作了些限制。

他们重又开始特别强调有关劳动党独立政策的论题。

而且在朝鲜领导的各种声明中现在已经表现出有关独立的论题,好像试图以间接的方式在承认自己政策上的一些错误。因此,金日成在今年5月3日与苏联大使谈话中所作的解释具有一定的意义。金日成在抱怨朝鲜推行独立政策遇到的困难时说,考虑到朝鲜与两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中国以及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日本交界,因为苏联与中国之间的公开辩论不得不执行这项政策。

与中国领导人相比,在关于兄弟党三月协商会议方面,朝鲜领导人采取了另一种立场。劳动党领导人和中国人一样不同意参加会议工作,但与中国人不同的是他们不再攻击这次会议工作的结果。

最近,劳动党领导人甚至开始对继续进行肆无忌惮的反苏运动的中国领导发表批评意见了。

金日成在今年3月与苏联大使的谈话中说:"我们不同意目前继续公开论战的一些人的观点。"(参阅1965年5月7日第70号电)

在朝鲜领导层活动家的发言中已多少有些以新的方式发出巩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统一和团结的号召。如果以前朝鲜领导对统一的理解仅仅就像无条件承认中国的"总方针"那样,那么现在由于朝鲜的宣传中去掉了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口号,而以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援助民族解放运动为统一的基础。

过去朝鲜领导人无条件地支持中国在种族基础上建立联盟并在中国人的帮助下努力扩

大自己与解放了的非洲国家之间的联系。

将注意力集中在亚非国家的政策取到了一定的成果。1964年朝鲜与7个亚洲和非洲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在关于亚非团结的问题上，现在朝鲜领导人已经不总是支持中国人了。朝鲜领导人支持所有反美力量，包括苏联、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亚非拉美国家的联合行动。

在对待越南事件和帮助民主越南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问题上，朝鲜领导人现在更多的是以批评态度评价中国领导人的分裂行为。

朝鲜领导人不可能不明白，中国领导人竭力追求的越南局势进一步尖锐化有可能导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与大韩民国之间的分界线的局势更加复杂化……

根据劳动党领导人的声明来看，苏联向战斗中的越南人民提供的援助没有被中国领导人诽谤。金日成在与苏联大使的会谈中说道："有些人试图减少对越南的援助，我们不相信这样的宣传。"(参见我们的1965年5月7日第70号电)

朝鲜领导人向参加斯德哥尔摩和平理事会特别会议的朝鲜代表团下达指示，在讨论援助越南的所有问题上不能支持中国的决议草案。

在讲述这件事时金日成对苏联大使说："中国人硬要我们接受他们的决议草案，可我们没同意。"(参阅同上)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今年5月第四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工作期间，朝鲜报刊在叙述中国代表团发言时没有刊登其所有的诬蔑造谣的言论："有些人不帮助正在战斗的越南"，并与美帝国主义讨价还价，竭力推行和平共处。

……

中朝关系中出现的一些新的特点的一定的标志是，朝鲜报刊今年2月6日对中国代表在阿尔及利亚举行的经济研讨会上面所作报告进行阐述的性质。朝鲜报刊没有刊登他所有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攻击的内容以及关于"现代修正主义"的内容。(《劳动新闻》，1965年2月26日)

(在这种情况下)值得关注的是，金日成在雅加达社会科学院作讲座时讲的如下一些话："坚决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我们将根据我们的现实、根据自己的判断和信念来进行这场斗争。"(《劳动新闻》，1965年4月17日)

……

口头上继续紧跟中国人表示反对"大国借口'经济合作和国际分工'遏制其他国家独立综合发展的倾向"，也看到"修正主义者"通过经济合作竭力将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依附于自己，朝鲜领导人实际上正在采取措施扩大合作，同时在此情况下利用一些批评作为"独立"判断的标志、作为有利于获得更优惠的经济援助的政治压力杠杆。(《劳动新闻》，1965年4月17日)

……

朝鲜与中国军事合作的规模是两国严格保密的，这方面的问题看来对朝鲜与中国在其他问题上的接近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1962年12月以内阁副首相金光侠为首的朝鲜军事代表团从莫斯科回来后，紧随其后发

生的一些事件表明，中国领导就利用这点开始着手扩大与朝鲜的军事合作。可以根据在此之后的二年里大批中国军事代表团去朝鲜、朝鲜和中国联合军事演习、朝鲜军人去中国军事学校学习以及中国武器装备供应等方面去判断合作的规模。

这一切让劳动党领导有机会认真地了解中国国防工业的状况。(在以崔庸健为首的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代表团 1963 年夏天去中国时，让他参观了很多的军事工厂。)

此外，朝鲜领导人仍旧妒忌地注视苏联对古巴、印度尼西亚、民主越南和其他国家的军事援助。1964 年朝鲜军事代表团对这些国家的访问看来证明了苏联援助相对于中国援助的优势，而东南亚局势的复杂化、美国坚决持续地试图促使日本与韩国的关系正常化、它们在东方建立新的侵略集团的努力、美国对韩国军队军事援助的规模——所有这些都迫使朝鲜领导人在继续扩大与中国合作的同时，寻找重新获得苏联军事援助的理由。

最近朝鲜与中国关系中出现的新情况从整体上说具有积极的意义。它们为改善苏联与朝鲜两国的关系创造了客观的先决条件。这个过程的强度明显直接取决于来自苏联方面对朝鲜的各种援助的总量。

同时，朝鲜领导看来将继续表现出自己与中国的特殊友谊，还将避免对所有可能来自中国的援助的性质和总量产生的影响。

苏联驻朝鲜大使馆第一秘书

A. 博鲁诺夫

苏联驻朝鲜大使馆随员

B. 戈罗沃伊

АВПРФ，ф. 0102，оп. 21，п. 106，д. 20，л. 14－27

№24353

苏共中央决议草案：给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苏联代表团的指示

(1965 年 6 月 17 日)

机　密

文本第 1 份

致苏共中央：

鉴于今年6月即将召开亚非会议，现提交给苏联代表团的指示方案，在苏联受邀请参加会议工作的情况下使用。

附决议案。

请研究。

1965年6月17日

第1957rc号

机 密

文本第1份

草案

苏共中央关于给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
苏联代表团的指示草案的决议

批准给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的苏联代表团的指示草案(附件)。

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

附件：

机 密

文本第1份

草案

给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的苏联代表团的指示

代表团在会议期间的活动应致力于实现如下主要目标：

1. 利用会议团结广大亚非国家在相互协商或与苏联协调行动的基础上，致力于清除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维护各国的主权和独立，清除由于美国现今的侵略方针引起的战争策源地，巩固世界和平。

2. 促使会议参加者以某种形式表达对正在战斗着的越南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如果情况允许，促使讨论美国在印度支那的侵略活动。

坚持巩固亚非拉人民反帝斗争统一战线的思想，揭露和谴责美国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武装干涉和旨在反对民族解放运动的"约翰逊主义"。

3. 对业务合作要表现出沉着冷静和有备而来，利用苏中共同参加会议的机会协调双方在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反击美国在越南侵略问题上的立场和行动。

4. 利用会晤及会谈建立并扩大苏联与参加会议的亚非国家政府之间的联系以及解释苏联在主要的国际问题上的立场。

（一）

在讨论会议议程上的问题时，代表团应遵循如下方针：

1. 对"万隆十项原则"的立场

指出，苏联会议拥护万隆会议和积极支持会议的十项原则，苏联未来10年的外交活动与这些原则没有分歧。

要表达在会议文件中再次重申万隆原则，以便在现形势下维持原则的重要性。重要的是重申作为上述原则统一体的一些原则，包括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不容侵犯，禁止干涉其他国家内部事务和禁止侵略活动，各国有权自由选择自己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以及和平共处和支持联合国这些内容。要让与会者特别注意亚非国家协调和联合行动，以使万隆十项原则成为国际形式的准则，并得到实现。

2. 非殖民化和反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斗争

利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机展示苏联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列宁主义路线，和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的无私和多方面兄弟般的援助，动员与会国联合行动反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压迫政策。

(1) 努力在会议的决定和文件中强调在苏联的倡议下联合国通过的《关于赋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的宣言》的重要意义，对葡萄牙和其他一些殖民国家拖延执行宣言进行谴责，要求立即执行宣言。如果有人提出批准在联合国框架内成立的"二十四国委员会"对宣言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那就支持这一建议。

在讨论清除残存的殖民制度问题时坚持如下立场：

关于葡萄牙殖民地。支持亚非国家关于对葡萄牙进行国际制裁的要求，广泛组织开展揭露葡萄牙殖民者及其保护人在安哥拉、莫桑比克和"葡属"几内亚的罪行的国际运动。据此出发，在目前条件下清除葡萄牙殖民地事实上将在整个南部非洲清除殖民制度。在目前条件下，在同友好国家协商后，策划在二十届联大会议上提出关于对葡萄牙采取必要的警告措施的建议，以便解放它奴役的国家和人民。

关于南罗得西亚。支持非洲国家关于立即准许南罗得西亚在公民权和选举权完全平等的基础上获得独立。

关于南非共和国。支持非洲国家关于对推行殖民压迫和种族隔离政策的南非共和国进行严厉制裁的要求。

在同友好国家代表团会晤中讨论会议通过致美国、英国、联邦德国和法国宣言的可能性，要求停止对葡萄牙和南非共和国的一切援助，执行联合国有关葡萄牙和南非共和国的决议。

(2) 努力使反新殖民主义斗争成为会议工作的中心议题。

表达让会议决议中记录的所有独立亚非拉国家享有如下权利的意见：放弃强加给他们

的使他们失去主权和损害他们民族利益的不平等条约和协定；归还殖民国家在殖民夺得的领土或建立的军事基地；无限制的掌握自然资源；外国企业和银行国有化；清除外国军事基地和外国军队撤出。谴责新殖民主义变体，如破坏国家领土边界、界河和领空；组织经济和军事封锁；帝国主义国家组织和策划反合法政府的密谋；利用现存资本主义体系和市场关系对亚非拉国家的人民进行剥削和压迫。

(3) 非殖民化问题，也就是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清除殖民主义的经济、政治和精神后果，支持阿尔及利亚、加纳、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和其他一些进步国家的建议，表示苏联准备在上述方面同亚非国家进行具体合作。鉴于此，要利用苏联克服沙皇时期遗留下来的民族和人民不平等的经验的材料，利用苏联阿塞拜疆共和国经济、国家和文化建设方面的材料，以及培训民族干部工作的材料。

(4) 吸引与会者注意，目前正在发生的科技革命和生产力的巨大进步会使这些任务的解决变得更容易，只有为了自己巨大的垄断利益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反动派才不允许落后国家进入现代文明和达到先进国家水平。如果没能实现经济独立和根本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发展中国家实现民族独立只能是一句空话。

为了解决这些复杂又困难的任务，根据苏联的经验来看，首先必须动员国内人民的力量，依靠本国民族资源和自然财富，在提高人民的经济和文化生活方面做艰苦和系统的工作。在解决这一主要任务时，其他反殖民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力量会团结在自己的一方，巩固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平等、互惠合作，发展中国家可以在现有条件下，在目前这一代人仍健在的时间内成功消除从资本主义那里继承下来的落后经济局面。

(5) 如果会议出现了有利形势，代表团应提出含有今后反殖民主义和反新殖民主义斗争纲领的宣言草案，上述阐述的内容以及亚非拉国家提出的要求和任务应该成为方案的基础，这些内容在不结盟国家会议(贝尔格莱德和开罗)、非洲统一组织会议(亚的斯亚贝巴和开罗)、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日内瓦会议)的决定中都能得以体现。

3. 人权

支持旨在根除种族歧视和隔离的建议以及支持反对任何形式的种族灭绝政策的言论(南越、刚果、安哥拉、南非共和国、南罗得西亚、多米尼加共和国)。

考虑到一些亚洲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存在着对实行种族灭绝行动的指控(印度、中国、伊拉克)，进一步讨论种族灭绝问题可能会出现不符合愿望的局面，所以应让会议集中讨论帝国主义国家实行的种族灭绝行动，在决议中应该反映这一点。

4. 普遍和平与裁军

考虑到亚非国家的迫切利益，阐述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合适的，要突出适合巩固和平、民族解放斗争和裁军任务的内容。

使用不结盟国家开罗会议(1964年10月)通过的《维护和平与国际合作纲领》，这个纲领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立场基本是一致的。

(1) 据此出发，苏联首先关注在国际监督下实现普遍的、全面的裁军。同时，苏联准备

讨论旨在缓和国际局势和限制武装冲突的部分措施(清楚外国军事基地和从其他国家领土撤军;禁止核试验;成立无核区;缩减军事开支,等等)。

强调苏联的所有建议关于裁军的建议首先涉及军事大国。在表达裁军意见的同时,苏联同情年轻的独立国家巩固自己的国防,防范帝国主义军事威胁的加强。

(2) 在禁止所有形式的核试验和氢弹试验问题上要声明说,苏联多次表达过就禁止地下核试验达成协议,条件是借助本国的设备进行监控。

如果印度,或者其他国家提议会议对中国进行核试验进行谴责,或者就这个问题表达自己的意见,那么,此时苏联最好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不支持任何一方。

(3) 在核和热核武器不扩散问题上的出发点是,苏联反对扩大拥有核武器国家的数量,反对核国家通过直接转让的方式向非核国家扩散核武器,也反对通过军事集团、国家联合的途径,或者其他渠道,其中包括通过成立多方的,或者北约大西洋核武装力量的途径扩散核武器。北约成立核武装力量的计划是解决防止核扩散问题的主要障碍。

这里需要指出,不结盟国家开罗会议的决定对我们来说是合适的,该决定号召大国放弃有利于核扩散的“各种各样”的政策,因为不结盟国家的这个建议事实上指向了西方国家成立北约多边核力量的措施。

(4) 发表声明——苏联多次提出关于普遍禁止和全面销毁各种形式的核武器的建议。苏联赞成中国就此问题的建议。缔结关于核国家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国际协定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苏联既支持不结盟国家关于召开国际裁军会议的建议,也支持中国关于召开各国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的建议。

(5) 在讨论裁军问题时强调指出,实现全面和彻底裁军的纲领将能释放出大量的物质资源,其中很大一部分可用于亚非年轻国家的经济发展。因此,争取裁军的斗争,也就是反对经济落后和殖民主义遗产的斗争。

5. 关于和平解决国际纠纷和在国际关系中禁止使用武力威胁或直接使用武力

坚持这样的立场——国家间的纷争应该通过和平手段来解决,不能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联合国宪章、万隆会议、贝尔格莱德会议和开罗会议、不结盟国家(1961 年和 1964 年)首脑会议的决议都对此作了规定。

(1) 依据会议形势,对近来美国出现的观念进行有根据的批评,证明美国对亚非拉独立国家随意运用武力或进行武力威胁。强调让会议在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纠纷的原则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一致性和坚定性,因为这个问题与巩固年轻共和国的独立和捍卫领土不容侵犯是直接相联系的。

对帝国主义国家反驳各国人民的解放权和革命权的尝试作出相应的评价,援引和平解决国家间纠纷的原则捍卫独立。强调人民有权摧毁殖民主义制度,争取本民族解放和独立发展,任何人也不能剥夺他们的这个权利。

(2) 如果某国与会者提出签订关于不使用武力解决领土纠纷和边界冲突的协定的建议,那就积极对待这一思想。如果中国或其他与会者对苏联关于领土纠纷的建议持批评态

度，为了避免发生直接争论，就声明说，这些建议符合联合国宪章、万隆会议和其他一些多数亚非国家参加的会议的决定。

(3) 在讨论与会国政府提出的建议时，不要把领土问题和其他一些成为亚非国家之间冲突根源的问题提交到会议上来，指的是为了能让会议取得成绩，要避免出现这种情况——会议因这些不是本次会议主要任务的问题成为亚非国家冲撞的场所。如果大多数与会国要让会议表达对因塞浦路斯引发的阿以冲突的意见等问题时，不反对这样做。

巴勒斯坦问题。考虑到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立场存有分歧，不适合就此问题表现出主动性。如果在讨论过程中需要苏联阐述立场，代表团应按如下意见去做：

苏联支持阿拉伯国家关于巴勒斯坦难民返回故居的正义要求。苏联谴责以色列在与阿拉伯人的边界纠纷中发动侵略战争，谴责以色列在不久前单方改变约旦河流域水源管理制度的行动，这给阿拉伯国家造成了损失。

塞浦路斯问题。如果有必要阐述苏联的立场，那就遵照苏联早先的官方声明。

刚果问题。发言批评帝国主义国家的反对刚果共和国独立和主权的密谋。强调指出，这个对于整个非洲来讲都是个重要问题，它的解决不能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应该由刚果人民依靠自己的非洲朋友的支持，独自解决自己的内部事务，建设自己的国家。指出，苏联站在刚果爱国的、民族解放力量一边。

如果讨论关于刚果问题的决议方案，代表团应同部机关协调苏联的非洲国家立场。

(4) 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可能尝试着手解决一些引起非洲国家之间冲突的棘手问题，并在会议期间同一些相关国家建立直接接触。在这种情况下，代表团应遵循如下方针：

也门问题。苏联应发言谴责英国和沙特阿拉伯为了也门君主势力对也门内部事务进行干涉，表达我们对共和国制度的支持态度。如果在会议过程中，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也门和沙特阿拉伯努力在相互接受的基础上解决自己的分歧，相应地，代表团应表达对这种努力持正面态度。

印中边界冲突。苏联政府赞成在没有附加条件的基础上，通过双方友好谈判尽快解决印中冲突。如果这样做合适，代表团就可能在不触及中国和印度争论的实质和相互要求的情况下，表达有利于双方尽快解决冲突的意见。

马来西亚问题。苏联发言支持北加里曼丹民族解放力量，谴责英国和美国为了保存自己在东南亚的势力利用马来西亚的企图。

同时，马来西亚问题的和平解决也符合苏联的利益。

最好制止把对马来西亚看作是一个共和国的批评性言论。

遵循这些意见，在会议合适的时候安排相关方面代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进行会谈。

6. 加强联合国

利用研究与联合国活动相关问题的时机，吸引亚非国家站到我方的立场上。此时应考

虑到.亚非国家制度的路线在很大程度上为即将召开的第二十届联大会议营造了形势。

(1) 强调苏联支持在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基础上加强联合国,联合国宪章是联合国组织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和发展国际合作活动的基础。

近年来,由于一系列新独立的亚非国家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内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这有利于联合国完成它所面临的任务。苏联完全支持亚非国家关于扩大它们参与安理会、经济与社会理事会名额的合法要求。苏联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成员中第一个批准对联合国宪章进行相应修改的国家。

(2) 关于联合国武装力量的使用问题指出,这里有两条基本路线。苏联认为,必须排除使用联合国武装力量用于殖民主义目的的可能性.已经存在这种情况了,例如刚果,干涉其内部事务、破坏它的国家主权和独立。联合国武装力量应该只能用于维护和恢复和平的利益,帮助侵略的受害者,帮助人民摆脱殖民主义统治。联合国宪章中现有内容允许在这种精神指导下解决这个问题,其中最主要的任务是宪章把维护和平的责任委托给安全理事会。另一条路线是帝国主义国家坚持的,它们想在联合国旗帜的掩护下使主权国家及其人民从属于自己。这里,它们企图绕开联合国宪章或阉割它。

(3) 要让与会者注意,美国旨在破坏联合国的路线是与美国强化对外侵略的方针相联系的。为了阻碍联合的活动,美国人为地制造出所谓的联合国“财政危机”问题,要求对苏联和其他一些国家使用宪章第19条,不想对联合国在刚果和中东的非法活动承担责任。

至于目前的联合国财政困难问题,苏联坚定支持亚非国家1964年12月30日提出的建议。

(4) 如果会议提出了关于召开全体会议研究改组联合国和重新修订宪章的问题,回答说,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和反帝国主义战线的国家在联合国范围内的合作,这是符合苏联和其他一些爱好和平的国家的利益的,这些国家坚持和平、民族独立和自由的立场。恰恰是在这条路上需要消除联合国活动中的不足。

7. 经济发展与合作

使用苏联对外贸易部和苏联部长会议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的材料。

8. 文化合作

使用苏联部长会议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的材料。

9. 和平共处

从这样的情况出发,大多数与会者的立场可能会出现不仅认同1955年万隆会议通过的关于和平共处问题的决议,同时还会进一步明确和发展和平共处原则,这符合苏联的立场。在面对这个问题时,代表团可以依据不结盟国家贝尔格莱德会议(1961年)和开罗会议(1964年)的决定。

……①

① 档案原文复印件此处字迹不清,无法辨认。——译注

……新的国际机关与联合国相对抗，不支持该建议。如果多数与会国表示反对建立常设秘书处，那就遵从多数人的意见。如果多数人倾向于建立常设秘书处，或类似机关，那就要限制该机关的功能，不能使其成为中国和印度尼西亚追求的破坏联合国的目的。

（二）

必须采取措施让会议关注目前国际局势问题，如越南问题，禁止使用武力干涉其他国家内部事务，欧洲安全与和平解决德国问题，尽管上述问题不一定会列入会议议程。如果这些问题列入会议议程，那就努力在会议过程中进行实际研究。

在此从如下原则出发：

1. 越南问题

在发言和会谈中谴责美国对越南的侵略，指出，目前这一地区的紧张局势是美国破坏日内瓦会议关于印度支那的决议、美国军队对南越进行干涉活动和武装侵略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土的结果。要让会议格外关注美国狂妄的侵略行动，及美国尝试把其他国家拖入越南战争，这给东南亚和整个世界的和平造成的威胁。

(1) 强调帝国主义集团尝试镇压越南民族解放运动，为人民争取社会和经济解放的运动设定发展命运。在这种情况下，亚非人民团结一致行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支持蒙古朋友提出的会议通过《致世界人民书》的思想，呼吁在反帝国主义斗争中加强统一和团结，争取和平和国际合作。帮助蒙古代表团实现这一思想。

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建立日常联系。

(2) 号召与会者谴责美国在越南的侵略行动，表达自己声援和支持越南人民的态度。依据会议形势和越南同志对这件事的态度，推动会议通过关于越南问题的特别决议案，表明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支持。如果多数代表团倾向于借助会议发出和平解决越南问题的呼吁，或者应阿尔及利亚以及其他一些友好爱国的倡议，在会议之外就解决的条件进行意见交换，例如，本·贝拉总统通过秘密渠道提出的计划(成立由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下的临时政府，由该政府与美国进行谈判，美军撤离，在南越举行选举，等等)，那么，代表团在明确自己的路线时应考虑到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立场。

(3) 在美国侵略越南问题上要表现出苏联的强硬和原则性立场。声明我们完全支持越南人民——既包括北越，也包括南越——的正义斗争，由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提出和平解决的条件。苏联准备向越南民主共和国进一步给予军事、政治、经济和其他方面的援助，用于反抗美国的侵略，直到越南问题得到公正解决。

(4) 如果中国代表或其他国家代表提出似乎由苏联同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就越南问题进行某种谈判时，对此予以驳斥，声明说，苏联以前没有，今后也不会就解决越南问题进行任何“谈判”。我们的出发点是，越南问题的解决，首先是越南人民的事。

2. 关于禁止使用武力干涉其他国家内部事务的问题

为了能让会议研究这个问题，建议把这个问题列为个别条款，或者在讨论议程第4条款

“普遍和平与裁军”,或者第5条款“在国际关系中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纠纷和拒绝使用武力或威力威胁”时,提交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案(附件)。

(1) 使用具体材料(刚果、越南、多米尼加共和国)指出,美国、英国、比利时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最近一段时间越来越经常地使用武力,企图镇压民族解放运动,迫使主权国家接受自己的意志以及应该在什么样的经验之谈和政治条件下生活,迫使它们推行有利于殖民主义政府的对外政策,等等。

(2) 要特别强调目前美国政府推行的对外政策方针的危险性,强调其轻视国际权利准则(破坏了按照联合国宪章美国应该承担的责任和同其他国家之间的条约,等等),不把其他国家的权利和利益放在眼里,不顾国际社会舆论。

指出,反动的“约翰逊主义”号召创造某种意识形态理论,用以镇压民族解放运动和对某个国家的内部事件——其中包括国内战争,美国人把它与国家之间的战争等同看待的干涉进行辩护。作为干涉的借口可以引用几句典型的话:保卫外国公民及其财产的需要,未经协商就进行内部改革,等等。为了对其他国家争取社会进步力量的镇压,美国要求拥有选取手段的充分自由,以引确保美国的利益凌驾于国际法之上。

(3) 吸引会议关注一些地区性组织(类似美洲国家间组织),或者军事集团以及利用一些傀儡制度的雇佣军等从事的侵略活动。指出,在其他国家领土上的军事基地和帝国主义国家的军队,这些国家对其他一些国家的内部事务的武装干涉,是现在国际局势紧张、民族自由与和平的威胁的根源之一。

(4) 指出,面对美国及其仆从国的侵略政策,必须联合所有争取和平和根除殖民主义的力量,以便对干涉主权国家内部事务和殖民主义复辟的企图予以必要的打击。捍卫各个国家和人民的主权,坚决要求清除外国军事基地和外国军队从其他国家领土撤走,反对对其他国家内部事务进行武装干涉,第二届亚非国家会议将对民族解放运动提供极大的帮助,必将为巩固和平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

3. 欧洲安全与德国问题调解

吸引与会者注意这个问题,指出它的重要政治意义以及考虑德国朋友的相应要求。提醒说,德国军国主义在筹备和发动两次世界大战中起了主要作用,这两场战争给亚非许多年轻的国家和人民带来伤害。在欧洲两大军事集团对抗的条件下,拥有大规模杀伤武器两大军事集团一旦发生冲突,可能就会爆发世界核大战,必将给整个大陆造成难以计数的牺牲和破坏。

(1) 在评价欧洲局势时,要格外关注联邦德国——欧洲唯一一个没有对二战的后果认罪的国家,它向邻国索要领土,致力于拥有核武器,联邦德国军国主义政客和复仇主义集团是保障欧洲安全道路上的障碍,是现在国际局势紧张的根源。

指出联邦德国帝国主义的新殖民主义政策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和平政策之间的差别,指出民主德国在争取维护欧洲和平斗争中的重要作用,和民主德国始终不渝地支持亚非民族解放运动的意义。

(2) 如果某个亚非国家代表在波恩的压力下，利用民族自治权的口号在德国统一问题上支持联邦德国的政策，那就发言揭露西德统治集团是在利用这些口号掩盖自己的复仇主义方针和吞并民主德国的侵略企图。

(3) 强调亚非国家将会为巩固和平事业作出巨大贡献，如果坚定地支持欧洲现有边界，包括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之间的边界稳定的原则。发言支持关于德国不能装备核武器的建议，关于欧洲禁止核武器和成立无核区的建议。如果可能，要让会议文件，或亚非国家政府的声明中以某种形式反映出两个主权德国存在的事实，和对联邦德国政策的谴责。

(三)

1. 在会议上同中国代表团发生论战和争论不符合我们的利益，因此，最好能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应该努力使我们之间的立场不出现分歧，在可能的条件下同中国代表团就会议上出现的某个问题进行协调。应该向中国和其他国家代表解释，我们反对会议成为中苏论战的舞台，争取使此次会议加强反帝国主义和反殖民主义力量团结的场所。尽管如此，如果中国代表团对苏联的对外政策进行攻击，那么，苏联代表团将在必要的情况下对这些论战予以平静的驳斥。要让与会者看到，不是我们，而是中国人是论战和使会议中断的肇事者。我们要努力促成会议通过会议任务所需的建设性决议。

在全面阐述我们对某个问题的立场时，要以积极的形式去做，集中精力关注同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迫切任务，关注团结一切民族解放运动力量的重要性。要具体阐述苏联坚定的反帝政策，我们对亚非国家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援助，反对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原则和不妥协的斗争。用事实揭露中国代表团把个别国家(刚果、多米尼加共和国、越南等)民族解放运动不成功和出现的困难归咎于苏联的企图。

2. 使用如下策略安排会议工作是合适的，要尽可能更多地让不结盟国家参与到会议围绕反帝和反殖斗争问题的政治讨论中来。代表团应该借助友好国家或者相关国家实现我们的意图，要让不结盟国家在会议上积极发表关于反对目前美国在越南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危险方针，反对帝国主义国家干涉各国内部事务和镇压民族解放运动的企图的演说。

3. 要特别重视蒙古人民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阿尔及利亚、缅甸、印度、加纳和其他一些对我们友善的国家的代表团。同他们商量我们关于个别问题、会议工作程序、会议决议案和对美国支持的国家的发言进行答复等问题的路线。

4. 考虑到会议将涉及许多随后召开的第二十届联大会议要研究的问题，要利用同各代表团的接触以及会议分组委员会的工作，弄清楚亚非国家的立场并同它们就我们的行动包括联合国的活动问题进行协商，这对于扩大苏联对外政治活动的效果非常重要。

5. 利用同亚非国家代表团会谈之机，按照苏共中央的决议和指示同这些国家就我们双边关系问题进行会谈。

附件：

关于禁止使用外国武装力量干涉其他国家内部事务的决议

第二届亚非国家会议格外关注使用外国武装力量干涉其他国家内部事务的事实。

会议据此出发，各国人民有权独自制定自己的政治方针，自由组织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为了本国利益自由使用国家的自然资源和财富，这些权利不容抹杀。限制主权国家的意志和阻挠其独立发展，通过使用外国武装力量，或使用武力威胁以及在违反有关国家意志的情况下保留或建立外国军事基地，或者使用其他方式侵犯各国不容侵犯的领土，或者为各国人民摆脱殖民主义压迫的解放斗争制造障碍，这些企图是对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的严重践踏，给各国人民的民族自由和世界和平造成了威胁。

亚非国家会议

1. 谴责使用外国陆军、空军和海军，或以使用军事威胁来干涉其他国家内部事务，不管其出于什么样的动机。

借口保护外国公民及其财产和利益的需要，借口一些国家内部正在进行社会、政治和经济改革或变革，借口出现或正在兴起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其他任何类似的借口都不能成为干涉其他国家内部事务的理由。

2. 采取警告措施，其中包括武力警告，在国际关系中只能依据联合国宪章通过的决定，并按照该组织的目的和原则进行。

3. 为了保障各国和民族主权和巩固国际和平与安全，支持清除在独立国家或所谓独立国家建立的军事基地，和外国军队撤出民族国家边界。

РГАНИ，ф. 5，оп. 30，д. 480，л. 98 - 120

№24351

苏共中央给驻外大使的指示草案：第二次亚非会议涉及的主要问题

(1965 年 6 月 18 日)

机　密

批准苏联外交部提交的给苏联驻亚非国家大使(中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越南

民主共和国除外)的指示，责成他们同各国(政府)首脑就第二次亚非会议议程的主要问题进行会谈(附件)。

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

附件：

机　密

文本第1份

……安卡拉、阿尔及尔、安曼、……巴格达、巴马科、……达卡尔、……突尼斯、乌兰巴托、喀土穆①

苏联大使馆

副本：纽约

致苏联代表：

拜访国家(政府)首脑或副职时说，您受委托通报苏联政府对阿尔及尔第二届亚非会议(阿尔及尔)拟打算讨论的问题的意见。

1. 第二届亚非会议是在国际局势极其紧张，对一切自由民族、对全世界构成威胁的条件下召开的。帝国主义反动派格外嚣张。美国协同一些西方国家推行越来越具有侵略性的对外政策。该政策的锋芒不仅指向正在争取民族解放的殖民地人民，也指向获得独立的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

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协定遭到严重破坏，美国扩大并强化了在南越的武装侵略，继续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领土。老挝和柬埔寨的领土也遭到轰炸。多米尼加共和国也开始成为帝国主义侵略的牺牲品。对刚果(利奥波德维尔)内部事务的干涉也没有停止。正在组织对取得独立的古巴共和国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武装干涉。

在越南、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在刚果，帝国主义力量企图对整个民族解放运动进行打击，压制人民追求社会和经济进步的努力。如果今天亚非国家同其他追求和平与自由的力量，不齐心协力地对帝国主义分子的侵略活动予以还击的话，那么，明天他们将变得更加嚣张，将会尝试使用武力反对其他一些亚非拉独立国家。

今天，帝国主义分子已经开始公开抛弃公认的国际权利准则，提出各种形形色色“学说”，号召建立起某种意识形态的基础，用以镇压民族解放运动和干涉某国发生的内部事件，其中包括国内战争，把国内战争与国家间的战争等同看待。作为进行干涉和侵略的借口，可以摘引几句殖民主义者的经典：保卫外国公民及他们财产的需要，不赞同内部改革。这样，国际权利就会被专横和不法行为取代。

为了有效地开展反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的斗争，爱好和平国家力量的团结和统一

① 此处列出约48个亚非国家首都，复印件字迹不清。——译注

行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阿尔及尔会议的召开为巩固这种统一,为制定旨在坚决摧毁帝国主义侵略和武装干涉的有效措施提供了可能。

毋庸置疑,会议将坚决谴责帝国主义的侵略思想和实践,论证对越南人民、多米尼加共和国人民和正在从事民族解放斗争的人民提供全面援助是一件正义、合法和庄严的事业。至于苏联,它一直站在为争取本民族独立、捍卫自己主权的人民一边,这种立场是始终不渝的。

2. 苏联政府把反殖民主义和反新殖民主义斗争列入会议议程,赋予其特别重要的意义。

尽管民族解放运动取得了一些显著成绩,帝国主义压迫和殖民剥削仍是许多民族肩上的沉重负担。

爱好自由的国家有权严厉谴责那些消极执行联合国关于赋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取得独立并准许他们立即清除殖民主义制度的宣言的国家。

苏联政府坚决拥护清除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认为对南非共和国适用最严厉的国际制裁的条件已经成熟了,有必要组织国际运动揭露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和南非种族主义者的罪行,以揭露他们的保护人萨拉查和维沃尔德在这些罪行中的不光彩角色。

必须继续努力迫使英国政府尊重南罗得西亚土著居民的自由权利,立即准许该国在公民权利平等和全国大选的基础上独立。苏联强烈谴责南罗得西亚种族主义者想让被他们霸占的权力永垂不朽和在国内建立类似目前南非共和国制度的企图。

苏联政府完全赞同阿拉伯国家会议旨在援助南阿拉维人民反英国殖民主义者的解放斗争的决议。

取得独立的亚非各国政府和人民在消除过去殖民主义统治的后果的过程中遇到了困难,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帝国主义国家新殖民主义政策造成的。因此,反抗新殖民主义的斗争在目前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亚非国家正在采取有效措施不受限制地使用本国的自然资源,对外国银行和企业收归国有,清除外国军事基地,让外国军队撤军,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协定。它们越来越坚决地同新殖民主义现象——破坏它们的主权,帝国主义国家组织和军事封锁,从事反合法政府的密谋——进行斗争。它们支持改变纵容帝国主义者压迫和剥削亚非拉人民的经济和贸易关系体制。

向大会报告这一斗争的经验,制定组织发展中国家反新殖民主义压迫的广泛纲领,毫无疑问,这将给亚非拉人民提供有效的帮助。

3. 亚非会议打算抽出精力关注裁军问题,这是现代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

众所周知,苏联是关于在国际监督下进行普遍和全面裁军问题的倡导者,并为达成相应的协定进行了积极斗争。与此同时,苏联准备就制止武装冲突和缓和国际局势的个别措施——消除外国军事基地和外国军队从他国领土撤军,禁止使用核武器,建立无核区,缩减军事开支等——达成协议。

裁军措施首先涉及的是军事强国,因为年轻的独立国家在裁军之前被迫需要巩固自己的国防以防范来自帝国主义国家方面的日常威胁。

苏联支持禁止任何形式的核试验，多次表示赞同对禁止陆地、太空和水下核试验的莫斯科协议进行补充，达成关于禁止地下核试验的协议，利用本国核查设备对核禁试情况进行监控。

为了各民族的利益，要防止核武器扩散，各国人民反对核武器扩散，既有防止以直接途径由核国家向无核国家转让核武器，也要防止以军事集团、联盟或其他途径，其中包括成立多边核力量，或北约大西洋核力量，转让核武器。北约组建核部队的计划是进一步解决防止核扩散问题的主要障碍。苏联赞同不结盟国家开罗会议关于大国停止造成核扩散的"形形色色的政策"的呼吁。

苏联政府支持在地球一些地区成立无核区的建议，积极评价不结盟国家开罗会议的关于成立无核区的决定。苏联准备承担责任尊重无核区，如果其他核国家也承担这些责任的话。

苏联多次提出关于全面禁止和销毁核武器的建议。签订关于禁止使用核武器，或者拒绝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国际协定将具有重要意义。苏联积极对待其他国家就此问题的建议，其中包括埃塞俄比亚和其他一些亚非国家提出的建议。

实施裁军可以释放出大量物质资源，现今许多资源都被用在了军事冲突上。这样，节约出的开支可以用在年轻的亚非国家经济发展方面。因此，争取裁军的斗争——这也就是反对经济落后的战争，争取尽快克服殖民主义学生后果的斗争，争取快速进步的斗争。

苏联支持不结盟国家开罗会议关于召开世界裁军会议的呼吁，也支持中国关于召开世界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问题的建议。

众所周知，关于召开由世界所有国家参加的世界裁军会议的建议在今年6月得到了联合国裁军委员会的支持，该委员会建议联合国大会在第二十二届联大会议上研究这一建议。

4.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和平共处的问题也将列入会议议程。苏维埃共和国从诞生之日起就坚决拥护每个民族都应该是自己家里的绝对主人，本国现存政治制度不容许外在任何力量的干涉。

和平共处原则得到大多数被压迫民族的认同，被看作是现今世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相互关系的基础。在联合国宪章里也记录了这些原则。在万隆会议通过的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宣言中得到最鲜明的反映，和平共处原则在目前保持着自己的生命力，而在亚非国家参加的其他会议的文件中也可以找到这种反映。

亚非人民依据自身经验确信：和平共处政策不仅不会削弱民族解放运动，相反，为民族解放运动取得新的成绩创造了有利条件。

维护和巩固和平共处原则目前非常迫切，因为此时帝国主义分子在世界一些地区正在从事侵略活动和干涉独立国家的内部事务。为了使那些诉诸武力践踏他国主权和领土的人能够严格遵守和平共处原则，全体爱好和平的力量需要积极行动起来。苏联准备从自己这一方为了使国家间关系能够建立在牢固的和平共处原则基础上作一切必要的努力。

依据和平共处原则，苏联过去和现在都支持和平解决国际纠纷，支持在国际关系中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同时，毫无疑问，各国人民拥有不可剥夺的摧毁殖民主义制度、争取自己解放和独立发

展的权利。任何人都不能剥夺。

5. 爱好和平的世界各国人民不可能对欧洲局势无动于衷。德国帝国主义筹备和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不仅给欧洲各国人民，也给许多亚非国家的人民造成了重大伤害。这就是为什么各国人民关切欧洲能建立稳固的安全保障的原因。

今天还没有建立这种稳固的保障。的确是这样，西德复仇主义力量再次积极活跃起来，他们阻碍德国问题和平调解，向邻国索要土地，为此目的，急切地想拥有核武器。西德在亚非推行新殖民主义政策，慷慨地向葡萄牙和其他一些殖民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供应武器，帮助东方阿拉伯人民的敌对势力。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政策完全追求另外的目的，该国反对重新研究现存欧洲边界，支持两个德意志国家放弃拥有核武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与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作斗争的各国人民团结一致，始终不渝地支持亚非民族解放运动。

在欧洲存在两个都拥有大规模杀伤武器的军事集团对立的条件下，如果欧洲出现军事冲突，就可能爆发世界核战争，这将在整个世界造成前所未有的牺牲和破坏。

亚非国家可以为防止欧洲事业向危险方向发展和巩固世界和平做出自己的努力。从两个德意志国共和国共存这个事实出发的政策就是该目的的体现。

6. 苏联支持加强联合国，作为重要的和平和国际合作的工具，它建立在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基础上，联合国宪章仍是联合国活动最好的基石。

20 年的经验表明，当联合国依据宪章进行活动时就是富有成效的，当帝国主义国家把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决定强加给联合国时，该组织不仅失去了自己的效果，同时它的活动对各国人民来讲甚至具有了危险性质。

由于许多年轻的独立亚非国家加入了联合国，在这一组织内开始出现了新的形势，有利于联合国完成它所面临的任务。苏联完全支持亚非国家关于允许它们在安理会和经济与社会理事会设立代表处的要求，苏联是安理会成员国中第一个批准对联合国宪章作相应修改的国家。苏联政府坚定支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安理会的合法席位，支持赋予该组织真正的广泛性质。

但是，不得不看到，帝国主义国家现在向联合国发动了攻击，它们想摧毁联合国的基础。恰恰是基于这个目的，美国人为地提出了所谓的“财政危机”问题，事实上这是以非法的程序把联合国卷入刚果和中东的结果。

现在，关于使用联合国武装力量的问题非常迫切，在这个问题上明显存在两条路线。美国和其他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努力破坏联合国宪章，绕开安理会。它们想用联合国的旗号掩饰自己旨在使主权国家屈从自己的行动。与此相反，苏联认为，必须杜绝任何出于殖民主义目的，去干涉一些国家的内部事务，破坏它们的独立和主权，而不顾联合国宪章就使用联合国部队的可能。联合国只有按照联合国宪章，出于维护和恢复和平目的，为了帮助侵略的受害者，保卫一些民族摆脱殖民主义者的横行时才能使用联合国部队。按照联合国宪章，安理会有权通过关于联合国维护和平行动和财政拨款的决定。

加强联合国而不是重新审查宪章符合爱好和平力量的利益，正相反，应该严格遵守联合

国宪章，站在和平、自由和独立的立场上国家应该加强在联合国范围内的合作。只有在这条路上才能克服联合国活动中的严重缺点。

至于克服联合国财政困难的问题，苏联政府支持亚非国家1964年12月30日提出的建议，全体会员国在自愿缴费和取消关于使用宪章第19条的问题的基础上解决联合国的财政问题。

7. 苏联政府赞同亚非国家关于第二次亚非会议必须抽出更多的精力关注经济合作与发展问题的意见。去年在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上，在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倡议和密切合作下，会议通过了“明确了贸易关系原则和促进发展的贸易政策”以及其他一些重要决定，这些是在成立新的和正义的国际经济关系道路过程中迈出的第一步。

当前，发展中国家和一些支持它们的目标和努力的国家共同努力，毫无疑问，将能促使日内瓦会议的积极成果变成现实，并得到进一步发展。看来，首先应该集中精力实现旨在根除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国家强加的经济和贸易关系体系，摆脱它们对发展中国家资源的垄断以及实现旨在满足亚非国家经济发展的具体需求的协定。

现在，亚非国家正集中力量争取在有生之年和凭借下一代的力量消除殖民主义给它们造成的经济落后局面。自然，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在经济关系中的后果和表现消除的越快，这一任务实现的时间也就越快。

苏联政府期待亚非会议能就经济合作与发展问题通过具体的协定，这将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在它们争取经济独立的斗争中的团结，更快地发展民族经济和提高居民生活水平。从自己方面来讲，苏联政府准备在这场斗争中援助它们，巩固和发展同亚非国家的经济合作。

本消息文本留给交谈者。

电告执行情况。

РГАНИ，ф. 5，оп. 30，д. 480，л. 81－92

№24352

苏共中央的决议：批准关于苏联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的指示草案

（1965年6月18日）

机　密

文本第1份

副本

苏共中央决议
关于给苏联驻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和古巴的大使
就即将召开的第二次亚非会议下达的指示

批准上述就此问题的指示草案(附件)。

中央委员会书记

附件:

机　密

华沙、布拉格、柏林、布加勒斯特、布达佩斯、索菲亚、贝尔格莱德、哈瓦那
苏联大使馆:

拜访外交部长或副外长,说受委托通告如下内容:

众所周知,第二次亚非会议将于6月29日在阿尔及尔召开。苏联打算参加这次会议,如果收到相应邀请的话。根据收到的情报,多数亚非国家表达了有利于邀请苏联参加阿尔及尔会议的态度。在此,它们强调了我国对亚非民族解放运动作出的突出贡献,苏联为民族解放运动积极提供的全面援助。

一系列国家在认同苏联参加亚非大陆代表会议的权利时,打算纠正多数国家的立场,放弃目前坚持的路线,不想同中国人商量,或者受对中国的某种诺言的束缚。

这样,事实上只有中国,加上菲律宾和一两个亲美国家反对我国参加会议,它们提出了一些杜撰的理由(如苏联不是亚洲国家,因为它的首都在欧洲)。①

根据各种情况判断,关于苏联参加会议的问题可能近期在与会国外交部长会议期间决定。从自己一方来讲,我们做了必要的准备工作,向亚非国家政府解释了我们对即将举行的会议的立场。如果我们未被邀请,我们致信给会议,阐述我们对提交给会议研究的主要问题以及目前国际局势的立场。我们认为,就算是以这种形式支持会议也将会促进亚非国家在反对美国对殖民地民族和人民的政策,争取独立的斗争中的团结,这也是符合社会主义国家利益的。

考虑到你们以前表达的关于有必要就重要国际问题交换意见的愿望,莫斯科认为向你们的政府通报上述内容是合适的。如果你们能同我们交换关于第二次亚非会议的计划,我们将表示感谢。

电告结果。

РГАНИ,ф. 5,оп. 30,д. 480,л. 94－96

---

① 括弧内的文字被手写划掉。——译注

№11467

托克马科夫与阮曼卡谈话记录：越南议会代表团访苏

（1965 年 7 月 27 日）

与越南驻苏联大使馆一等秘书阮曼卡的谈话记录

1965 年 7 月 27 日

1965 年 7 月 27 日，根据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的请求，我在苏共中央联络部与阮曼卡谈了话。他告诉我，越南民主共和国议会代表团已经结束访华，7 月 25 日已经到达平壤，在那里逗留 6—7 天。然后开始访问蒙古，也在那里待 6—7 天。8 月 9 日至 10 日将到达莫斯科。

大使馆认为，代表团在苏联访问期间，除了莫斯科之外，最好能访问第比利斯、里加和列宁格勒。代表团团员也有这个意见。阮曼卡说，代表团领导对会见苏联国务活动领导人没有特别的愿望。越南将解决这个问题留待苏方考虑。

阮曼卡受大使委托，要我转告希望给予越南大学生迎接代表团的机会。如果代表团乘飞机到达，那么将由 500 名大学生迎接，如果乘火车，这个数字还要增加。阮曼卡同时说，当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到达莫斯科时，“数百名莫斯科劳动者们代表”曾与越南大学生一起欢迎。

阮曼卡在谈话结束时说，大使馆请求在代表团访问莫斯科时，考虑安排会见即将访问城市的社会各界代表。如果会见（群众集会）能在工会圆柱大厅或者克里姆林宫举行则更好。阮曼卡说，大使馆很关心这个问题，因为“越南问题是当前全世界注意的中心问题”。

我告诉阮曼卡，我将把他提出的所有愿望和要求转告苏联最高苏维埃的领导。

谈话持续 30 分钟，苏共中央联络部顾问 В. Д. 谢尔巴德赫同志参加了谈话。

苏共中央国际部高级顾问

Б. 托克马科夫（签名）

АВПРФ，ф. 79，оп. 20，п. 22，д. 16，л. 9

№25754

中国外交部的声明：关于中苏边界问题[①]

(1965年9月7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对边界问题的声明
(答复苏联外交部1965年8月17日的照会)

1. 边界条约；
2. 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的两国边界；
3. 关于1963年的条约；
4. 关于边界争论问题。[②]

"我们认为，目前两国应该首先保持现有的边界线，避免发生边界冲突，而不是双方为边界条约的立场而争论……为了达到这些目的，两国应该严格遵守已经签署的条约的规定，交换各自的意见，取得一致的看法。"

……

АВПРФ，ф. 0100，оп. 58，п. 516，д. 5

№25695

拉宾与王炳南会谈纪要：请求与周恩来举行会谈[③]

(1965年9月14日)

……

1965年9月6日拉宾休假后回来，请求与周恩来会面，但是这个请求遭到拒绝，因为周

① 该档案系摘录自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② 以上四点为档案摘抄者的归纳。——编注
③ 该档案系摘录自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恩来“非常忙”。9月14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王炳南会见了拉宾。

拉宾说，他受到了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的“亲自委托”，他希望他本人与周恩来进行一次会谈，同时还要与“一些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举行会谈。（看来首先是要与毛泽东举行会谈。）

他没有告诉王炳南所受委托的实际内容，只说“我的问题可以等到周恩来同志什么时候有时间了再谈”。

……

АВПРФ，ф. 0100，оп. 58，п. 516，д. 5，л. 242－245

№25696

拉宾与伍修权会谈纪要：关于印巴冲突问题[①]

（1965年9月19日）

拉宾转交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5年9月18日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有关印度与巴基斯坦冲突的问题）。

……

伍修权说，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立场“与是非不分的苏联有原则性的分歧”。

……中国立场的出发点是，印度是侵略者，而巴基斯坦是侵略者的牺牲品。

伍修权……坚持试图重新回到有关“苏联与美国勾结”的话题。

拉宾说，他“不打算听到对苏联政府的诬蔑言论。并表示希望中国方面抛开检察官式的和侮辱性的口吻方式谈论苏联”。

……

АВПРФ，ф. 0100，оп. 58，п. 516，д. 5，л. 250－252

① 该档案系摘录自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25697

拉宾与郭沫若等会谈纪要：中苏科技合作有所改善[1]

（1965 年 9 月 21 日）

1965 年 9 月 21 日 C. Г. 拉宾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郭沫若和林枫进行了会谈。

这次会谈的特点是双方看法显而易见的完全一致。拉宾赞扬中国人打下了美国飞机。说美国人“只认武力”。

拉宾确认“与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合作交流在今年得到了改善”。并说，夏天苏联的医疗工作者、铁路员工、煤矿工人去了中国，“在中国获得了很好的经验”。

郭沫若说：“这很好。从我们方面来说这没有任何困难。”

林枫说：“的确，中国与苏联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在人民的心中扎下了深根。没有人能够动摇这种友谊。以前当我们说这样的友谊牢不可破，这不是简单地加以修饰形容，它的确就是这样的。”

拉宾单方面表示希望议会代表团能开始互访。

……

АВПРФ，ф. 0100，оп. 58，п. 516，д. 5，л. 253 - 261

№24368

谢米恰斯内致苏共中央报告：加强苏蒙边界接触和协同动作

（1965 年 9 月 27 日）

机　密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

① 该档案系摘录自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1965年9月27日
第2214－с号

近几年来，蒙古人民共和国边防代表就防卫苏蒙国家边界时加强接触和协同动作的问题多次致信苏联边防代表。

今年8月10日，第……①边防部队(达斡里亚哨所)首长同蒙古边界代表乔日巴兹中校举行了会谈。后者主动介绍了蒙中边界形势，表达了蒙古边防军人广泛学习苏联边防守卫经验的愿望。

考虑到这一情况以及西部与社会主义国家为邻的边防守卫积极经验，安全委员会认为有必要邀请蒙古边防军人代表团(由3人组成)于1965年12月至1966年1月期间访问莫斯科，同他们讨论关于苏蒙边境守卫措施的协调问题，进一步完善两国边防部队的协同，以交流边防业务的经验。

苏联外交部对此表示同意。

请予批准。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谢米恰斯内

手写批注：

同意。

……②

РГАНИ，ф. 5，оп. 30，д. 482，л. 110

№24330

扎哈罗夫致苏共中央报告：印度尼西亚发生政变

(1965年10月1日)

机　密

致苏共中央：

---

① 此处档案原文复印件字迹模糊，无法辨认。——译注

② 此处有4个手写签名，但字迹潦草，无法辨认。——编注。

我报告：

1. 据美国电讯社记者发自东京的消息，今年10月1日，印度尼西亚革命委员会宣布，他们掌握了国家最高权力。革命委员会命令印度尼西亚政府各部部长在组建新内阁之前继续履行自己的日常义务。

10月1日10时(莫斯科时间)，革命委员会发布了第一条指令，宣布解散苏加诺政府和成立由45人组成的印度尼西亚革命委员会。任命翁东上校为委员会主席。前第一副总理苏班德里欧、空军副司令奥马尔·达尼、海军少将马尔塔季纳塔，以及警察部队首长和第二副总理，进入了革命委员会。剩下一些进入委员会的人的姓名暂时还不知道。

2. 根据谍报材料，今天美国开始紧急应召15万名预备役军人。

M. 扎哈罗夫[①](签名)

1965年10月1日

第136540号

РГАНИ，ф. 5，оп. 30，д. 479，л. 67

№24355

齐米亚宁致苏斯洛夫函：印尼政治形势与中国的处境

(1965年10月16日)

苏斯洛夫同志：

向您提交驻印度尼西亚记者舒雷金关于1965年9月30日事件发生后印度尼西亚的形势的报告。

编辑部于今年10月16日收到这份报告。

《真理报》主编

齐米亚宁

1965年10月16日

分发：勃列日涅夫、杰米切夫、安德罗波夫、波诺马廖夫

① M. B. 扎哈罗夫，时任苏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兼总参谋长。——编注

附件：

致《真理报》编辑部：

关于1965年9月30日事件后的印度尼西亚的政治形势

形势变得越来越明显，现在国内，或者至少在雅加达，出现了两个政治中心。

第一个是由纳苏蒂安和一些将军领导的雅加达中心，第二个是由苏加诺领导的茂物中心（总统的郊区宅邸）。前者努力利用目前局势争取彻底击败自己的主要政治对手——共产党，但是打着苏加诺的旗号这样做的，因为总统的威信有助于更轻松地完全这一过程。此外，纳苏蒂安明显感到自己还没有强大到可以反抗苏加诺的程度。同时，在他的将军拥护者——苏哈托和其他一些人——中的许多人都要求杀掉陆军中将亚尼，而由苏加诺本人正式接任这一职务。

所有的伊斯兰政党都支持该集团，其中最大的政党是"伊斯兰联盟"，自然，重新活跃起来，而被解散的"马斯美友党"和"印尼社会党"的残部还未组织起来。

该集团现在控制了首都的实际权力，通过广播和报纸在爪哇岛各大城市就此事发表评论。其他几个岛得到的消息只是说那里发生了武装冲突和维持"原状"。的确是这样，马来西亚广播的消息是，在苏拉威西和亚齐（苏门答腊北部）发生了反共游行。

最终，该集团控制了中央报刊和广播。现在雅加达有13份报纸出版，都是反共的。

第二个是苏加诺领导的茂物集团，他们努力在协调的基础上解决冲突，以确保总统能重新推行平衡政策。关于苏加诺本人在"九三〇"事件中的作用，还有许多地方没有弄清楚。例如，为什么总统的私人卫队团长倡议逮捕将军们，私人卫队不从属于他本人，却能以他的名义活动么？为什么10月1日苏加诺说"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到了哈利姆军事机场，按照他的话说"可以随时前往雅加达"？空军司令达尼意外出现在那里是否是偶然的，根据10月1日的命令，他实际上是支持翁东的。最后，为什么10月1日深夜逮捕和杀害将军们恰恰发生在哈利姆军事机场。那里是对来自共产党青年和妇女组织中的志愿者进行培训的地方。

按照外国记者的观点，如果考虑到这个"将军委员会"确实存在，那么就不排除苏加诺对"九三〇运动"至少是持欢迎态度的。因此，现在向军队投降就等同于他失去了任何实际权力。

所有亲近共产党的人都聚集在茂物。据可靠资料，空军司令奥马尔·达尼也在那里。该集团的力量主要是借助苏加诺的威信。弱点是孤立、分散。如果总统的私卫队是承担独立宫内部守卫的，那独立宫的外面就是由陆军来守卫的。苏加诺没有发表广播讲话的可能，也许是他暂时不想这样做。10月6日，他在内阁会议上的讲话由苏班德里约透露给报刊记者，被称为"公开讲话"，雅加达广播站只是在有利于纳苏蒂安的时机才播放这次讲话。

现在，雅加达的报刊和广播充满反共运动的叫嚣。在军队的明显纵容下，游行示威、抢劫猖獗。所有这一切其目的都是向苏加诺施加压力，迫使他向纳苏蒂安投降，作为印度尼西

亚共产党的祭物。为了让苏加诺更容易接受这个要求,采取措施成立了新的共产党组织。关于这一情况,"伊斯兰联盟"控制下的晚报报告了这件事。

按照我的观点,如果没有某种外部因素影响的话,这里我指的主要是美国和中国,那么,这种对抗将会以协调方式结束,在很大程度上这符合共产党的利益。

谈几句关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事件中的作用的话。根据各种来源的消息得到这样一个印象,共产党的领导层把党的命运完全而彻底地寄托在苏加诺身上,期待他能挽救党。注意到,党在坚定行动时表现出令人吃惊的慌张和无丝毫准备。现在,当雅加达大规模逮捕共产党人时,没有在被逮捕时进行武装反抗的消息,甚至是传闻。

对事件进行分析后,看不到有关共产党在夜里1点和10月1日事件中起到积极作用的证据。仔细研究翁东的声明和采取的具体措施,也无法证明共产党是9月30日事件的组织者和鼓动者。在现形势下,共产党人不可能"忘记了"苏加诺加入了"革命委员会"。他们不可能不发表关于反对美帝国主义、支持越南人民战争的声明,而可能谩骂"修正主义者"。

研究"革命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是由具有像翁东那样政治眼光的军队营级指挥官组成的混合体。

最后,共产党不能"忘记"对官僚政客的谩骂,而只是局限于对将军的批评。

暂时很难解释10月6日鲁克曼和尼奥托出现在内阁会议现场以及艾地没有出现在这里的原因。关于艾地在哪里,现在有一些说法在流传。最普遍的一个说法是说艾地同翁东一起在爪哇中心。还有一种解释,说他被捕了,或者在中国大使馆里。但是,任何一种说法暂时都没有足够的事实来证明。由于最显而易见的原因,现在同共产党积极分子会见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上述内容令人萌发出一个想法:很有可能共产党人策划了类似"9月30日"的事件,他们想把苏加诺和亲近他们的空军拉入这个事件里,但是,由于某种原因,事件的过早发生令他们措手不及。同时,在危急时刻,领导层内部出现了分裂。触动事件如此发展的诸多原因之一,可能是苏加诺的健康状况在1965年10月1日夜里急剧恶化。完全有可能,在这种情势下,翁东中校决定扮演布迈丁的角色。当然,此时我所讲的只是我个人的意见,很遗憾,暂时还没有足够的证据。

关于新的共产党的问题,它组建的消息能被宣布出来么?问题在于,关于这件事的初步消息是来源于报纸,而这份报纸是共产党敌对力量的刊物。事实上这是反共斗争的手段。与此同时,他们还广泛利用共产党领导层的亲中国方针,来证明其非民族性质。因此,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来到这里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的健康力量,他们对印尼共产党领导层的亲近中国,事实上是反对苏联的方针不满。因此,必须指出,按照我的观点,可以期待印尼共产党中的一些假共产党分子——他们努力把右翼力量拉入党内,和党内的健康力量之间建立某种对比关系,正好是对成立这种组织的一个事先反应。显而易见,尽管从一开始,领导层就没有强调党的亲苏方向。

还有一些对外政治方面的因素。

中国人在这里感觉极不舒服。在人群中流行一个传言,他们以新兴力量会议大厦的建筑材料为幌子为共产党人运送武器。10月5日,中国记者没有出现在5位将军的灵柩前。

一系列报纸对此表示不满，中国外交代办处也没有为将军被害事件降旗。雅加达的广播和报刊对沙列赫率领的代表团在中国签署的公报闭口不谈。各建筑物的墙壁上随处可见到书写着"解散印度尼西亚的中国人组织"。

在印度、巴基斯坦冲突问题上，雅加达和先前一样站在巴基斯坦一方，谴责印度进行侵略。

今天，马来西亚广播播放了阿布杜尔·拉赫曼给苏加诺的信，号召利用目前形势清除国内的共产党人。

所有这些就是我想同您交流的关于印度尼西亚局势的想法。当然，雅加达不是整个印度尼西亚，但现在想去哪里都不可能了。

《真理报》记者

舒雷金

1965年10月10日

РГАНИ，ф.5，оп.30，д.480，л.134－141

№24357

对外政策情报局的报告：中国阻止苏联参加亚非会议的企图失败

(1965年10月18日)

机　密

文本第1份

关于亚非国家对邀请苏联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的态度

(1965年10月18日报告)

今年8—10月期间，根据苏联外交部的指示，苏联驻亚非国家大使馆和苏联驻纽约外交代表机构做了亚非国家政府代表的工作，促使这些国家政府更坚定和积极地支持苏联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

这项工作开展的条件是，当时中国政府领导层向亚非各国施加压力，迫使它们改变自己对邀请苏联参加会议的正面态度。除了使用外交渠道外，中国政府这一时期还安排陈毅出

访阿尔及利亚、几内亚、马里、叙利亚、阿富汗、巴基斯坦,对乌干达、索马里、缅甸、柬埔寨国家首脑做工作,邀请他们在这一时期访问中国,等等。在这一方面,印度尼西亚政府继续向中国领导层提供了必要的帮助。

根据苏联外交部得到的情报,亚非国家对邀请苏联参加定于今年10月18日召开的亚非会议的态度如下:

1. 有32个国家的政府(阿尔及利亚、布隆迪、加纳、几内亚、赞比亚、也门、印度、约旦、伊拉克、喀麦隆、塞浦路斯、科威特、老挝、黎巴嫩、利比里亚、马拉维、摩洛哥、蒙古人民共和国、尼泊尔、尼日利亚、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卢旺达、塞内加尔、叙利亚、索马里、苏丹、塞拉利昂、突尼斯、土耳其、锡兰、埃塞俄比亚等)再次确认说,它们打算支持邀请苏联参加会议。

由于苏联方面做工作的结果,公开发表声明支持邀请苏联参加会议的亚非国家的数量快速提高。如果说在今年上半年就此问题发表公开声明的只有5—6个国家,那么,到现在发表这样声明的国家已经达到了13个(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印度、尼日利亚、卢旺达、苏丹、约旦、塞浦路斯、土耳其、赞比亚、索马里、摩洛哥、利比里亚、塞内加尔)。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其他一些亚非国家的政府在同其他亚非国家代表会谈时开始更为明确地表示支持苏联参加会议。

应该指出,像阿尔及利亚(布迈丁政府)、阿富汗、几内亚、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等一些国家的政府,在对中国人的压力做出答复时直接声明说,它们不同意中国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它们将支持邀请苏联参加会议。

2. 有5个国家(阿富汗、刚果〔布拉柴维尔〕、伊朗、乌干达、肯尼迪)的代表在今年1—6月期间多次声明说,他们的政府支持邀请苏联参加会议。最近一段时间,没有发表新的这种性质的声明。目前还没有关于上述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态度改变的材料。

缅甸、马里、坦桑尼亚、中非共和国政府通报说,它们在邀请苏联参加会议问题上的态度将追随多数亚非国家的意见。

毛里塔尼亚和乍得政府声明说,自己对邀请苏联问题的态度稍后些时间再确定。今年10月5日,毛里塔尼亚外交部长穆罕默德·乌尔德·谢赫在听取了葛罗米柯关于苏联参加会议的相应解释后,对他说:苏联参加会议是积极因素,毛里塔尼亚政府在就这个问题做出决定时会注意到这一点。

3. 一些国家的政府持回避态度。柬埔寨政府再次声明说,对苏联参加会议的问题不会投反对票,但考虑到与中国的关系,也不可能投"赞成"票。不排除西哈努克在拒绝了苏联政府访苏邀请后,可能会改变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向对苏联不利的方向发展。

今年8月24日,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声明说,巴基斯坦政府支持邀请苏联参加会议,如果多数国家支持的话。同时他解释说,巴基斯坦很难公开发表关于自己支持苏联的声明,如果这个问题将通过投标来表决的话。

据日本和菲律宾代表的消息,这两个国家的政府早先对苏联参加会议一事持反对态度,

现在正在重新研究自己的立场。

泰国政府声明说，支持关于苏联参加会议的建议的条件是，如果苏联在亚非会议上对泰国不采取不友好态度的话。

4. 越南民主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向苏联大使保证，它们仍坚持自己先前的立场，即苏联最好不参加会议。

5. 加蓬、冈比亚和上沃尔特驻联合国代表通告说，这些国家还没有确定要参加会议，稍晚些时候都能决定，这取决于非洲马尔加什联盟和非洲统一组织的立场。至于他们对邀请苏联参加会议的态度，他们对此表示赞同。

南越、南朝鲜、刚果(奥波德维尔)、新加坡、马尔代夫半岛和马来西亚政府没有表达就此问题的态度，因为关于邀请它们参加会议的问题还没有最后解决。

尼日尔、多哥、马尔加什共和国、达荷美、象牙海岸政府还没有明确自己对苏联参加会议问题的立场，它们声明说自己准备拒绝参加会议。到目前为止，西萨摩亚还没有表达自己参加会议的愿望。

苏联对外政策情报局

РГАНИ，ф. 5，оп. 30，д. 480，л. 192－195

№24358

对外政策情报局的报告：亚非各国对苏联参加亚非会议的态度

(1965 年 10 月 18 日)

公开发表声明支持邀请苏联出席第二次亚非会议的国家

(1965 年 10 月 18 日报告)

1.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纳赛尔总统两次向报刊和广播代表发表关于想邀请苏联参加会议的声明。在今年 9 月的苏联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谈判公报中指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政府声明说，苏联参加即将召开的会议将有助于会议完成任务。"

2. 印度。印度政府代表多次公开发表关于苏联必须参加会议的声明。1964 年 8 月 21 日，印度外交部长辛格在新德里记者招待会上说："印度仍坚持苏联应该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的立场。"1965 年 4 月初，印度周刊《闪电》刊登了总理沙斯特里的讲话，他指出，如果中国

和印度尼西亚成功地做到让俄国和马来西亚不能参加会议，那么，印度可能会离开会场。今年8月末，印度政府在致阿尔及利亚政府的官方复信中重申了印度在苏联和马来西亚参加会议问题的立场。

3. 尼日利亚。1965年6月2日，尼日利亚外交部长巴马利在机场同苏联外交副部长马立克会谈期间对记者表示："尼日利亚支持苏联参加会议。我们的立场是明确的，对我们来讲，这不是问题。"

4. 卢旺达。今年10月9日，外交部长 Л. 姆帕卡尼耶向苏联大使转交了一封今年10月8日致阿尔及利亚外交部长的信，信中指出，卢旺达共和国政府决定无条件支持苏联参加会议。

5. 苏丹。今年6月，总理马赫古卜对喀土穆新闻通讯社表示，按照新政府制定的外交政策，苏联支持苏联参加会议。

6. 约旦。今年9月11日，路透社记者转告来自阿曼的消息说："约旦外交部代表图坎对报刊表示，约旦支持邀请苏联定于11月5日在阿尔及利亚召开的亚非会议。图坎是今天同苏联大使斯柳沙林科会谈后谈到这个问题的。"

7. 塞浦路斯。据塞浦路斯外交部长的消息，今年10月，塞浦路斯外交部在致筹备委员会的信中含有塞浦路斯政府有利于苏联参加会议的声明内容。

8. 土耳其。今年6月，土耳其报刊援引土耳其外交部及外交部工作人员的话说，土耳其支持苏联参加会议。

9. 赞比亚。今年5月28日，赞比亚外交部长卡普韦普韦对苏联外交部副部长马立克说，赞比亚已经确定了自己对会议工作的态度，我们向自己的非洲朋友以及亚洲的一些朋友——印度、中国、日本和其他一些朋友表示，苏联同赞比亚一样，有权参加会议。

10. 索马里。今年6月19日，外交部长杜阿勒向苏联大使通报说，索马里政府决定公开支持苏联。外交部长还向新闻报刊通报了这一消息。

11. 摩洛哥。1965年5月，摩洛哥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在给苏联和一些亚非国家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的照会中说，摩洛哥政府决定支持苏联参加会议。9月16日，副外长绍尔菲对苏联大使说，参加卡萨布兰卡会议的摩洛哥代表团在讨论关于第二次亚非会议问题时再次表达了自己支持邀请苏联参加会议的立场。绍尔菲说，我们不仅支持苏联，而且还要让其他国家相信苏联参加会议的必要性。

12. 利比里亚。1964年中，杜伯曼总统在新闻记者招待会上答复问题时指出，如果苏联政府认为自己必须参加会议，那么就没有任何可阻碍的理由。今年10月，利比里亚驻联合国代表在同苏联代表会谈时确认说，利比里亚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不会改变。

13. 塞内加尔。今年9月23日，在第二十届联大会议共同讨论期间，塞内加尔外交部长杜杜·蒂亚姆声明说，他的政府支持苏联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

注：在上述清单中不包括这样一些国家，其政府在同外国官方代表(苏联和其他一些国家)会谈时，和在阿拉伯国家和其他一些亚非国家形式的会谈上讨论这个问题时，表达了自

己的积极态度。

苏联外交部对外政策情报局

РГАНИ, ф. 5, оп. 30, д. 480, л. 196－198

№25698

拉宾与伍修权会谈纪要：印巴冲突与中国的政策[①]

(1965 年 10 月 19 日)

伍修权送交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65 年 10 月 18 日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65 年 9 月 18 日信件的复函。

……

拉宾说："众所周知，中国的对外政策遭受了一个又一个的失败，很难说这是什么样的政策，它的方向是哪里。"

有关巴基斯坦和印度的冲突："中国同志看来对军事行动的停止很不满意，并且对苏联进行了各种指责。这样的政策不会给中国增加朋友的。"

……

附件：

1965 年 10 月 18 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

……

……提出的论据是："印度是侵略者，而巴基斯坦是侵略的牺牲品。"

……你们(苏联)在印度、巴基斯坦冲突的问题上给自己戴上了中立的假面具，而事实上与美帝国主义共同支持印度侵略者。

在信中你们想要中国共产党跟你们"立场一致"……这是否意味着你们想要我们与你们一起执行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和平竞赛"的路线？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就成为像你们那样的修正主义者了。亲爱的同志们，这是永远不可能的！

① 该档案系摘录自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致兄弟般的问候!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АВПРФ,ф.0100,оп.58,п.516,д.6,л.1-4,5-11

№24356

葛罗米柯致苏共中央函：给亚非会议苏联代表团的指示草案

（1965年10月28日）

致苏共中央对外政策委员会：

我提交给参加亚非会议的苏联代表的指示草案供你们研究。

葛罗米柯

1965年10月28日

分发：苏斯洛夫、安德罗波夫、波诺马廖夫、谢米恰斯内

附件：

机　密

致苏共中央：

鉴于第二次亚非会议即将召开，我们提交为苏联代表团准备的指示草案，在苏联受到与会邀请时使用。

附决议草案。

请审阅。

苏斯洛夫

安德罗波夫

波诺马廖夫

葛罗米柯

谢米恰斯内

舍夫利亚金

1965年10月__日

附件：

机　密

苏共中央关于给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苏联代表团的指示的决议

批准给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的苏联代表的指示(附件)。

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

附件：

机　密

给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的苏联代表团的指示

代表团在会议期间的活动应致力于实现如下主要目标：

1. 利用会议团结广大亚非国家在相互协商或与苏联协调行动的基础上，致力于清除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维护各国的主权和独立，清除由于美国现今的侵略方针引起的战争策源地，巩固世界和平。

2. 促使会议参加者以某种形式表达对正在战斗着的越南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如果情况允许，促使讨论美国在印度支那的侵略活动。

坚持巩固亚非拉人民反帝斗争统一战线的思想，揭露和谴责美国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武装干涉和旨在反对民族解放运动的“约翰逊主义”。

3. 对业务合作要表现出沉着冷静和有备而来，利用苏中共同参加会议的机会，协调双方在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反击美国在越南侵略问题上的立场和行动。

4. 利用会晤和会谈建立和扩大苏联与参加会议的亚非国家政府之间的联系以及解释苏联在主要的国际问题上的立场。

(一)

在讨论会议议程上的问题时，代表团应遵循如下方针：

1. 对“万隆十项原则”的立场

指出苏联会议拥护万隆会议和积极支持会议的十项原则，苏联未来10年的外交活动与这些原则没有分歧。

要表达在会议文件中再次重申万隆原则,以便在现形势下维持原则的重要性。重要的是重申作为上述原则统一体的一些原则,包括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不容侵犯,禁止干涉其他国家内部事务和禁止侵略活动,各国有权自由选择自己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以及和平共处和支持联合国这些内容。要让与会者特别注意亚非国家协调和联合行动,以使万隆十项原则成为国际形式的准则,并得到实现。

2. 非殖民化和反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斗争

利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机展示苏联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列宁主义路线,和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的无私和多方面兄弟般的援助,动员与会国联合行动反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压迫政策。

(1) 在会议的决定和文件中,努力强调在苏联的倡议下联合国通过的《关于赋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的宣言》的重要意义,对葡萄牙和其他一些殖民国家拖延执行宣言进行谴责,要求立即执行宣言。如果有人提出批准在联合国框架内成立的"二十四国委员会"对宣言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那就支持这一建议。

在讨论清除残存的殖民制度问题时坚持如下立场:

关于葡萄牙殖民地。支持亚非国家关于对葡萄牙进行国际制裁的要求,广泛组织开展揭露葡萄牙殖民者及其保护人在安哥拉、莫桑比克和"葡属"几内亚的罪行的国际运动。据此出发,在目前条件下清除葡萄牙殖民地事实上将在整个南部非洲清除殖民制度。在目前条件下,在同友好国家协商后,策划在二十届联大会议上提出关于对葡萄牙采取必要的警告措施的建议,以便解放它奴役的国家和人民。

关于南罗得西亚。支持非洲国家关于立即准许南罗得西亚在公民权和选举权完全平等的基础上获得独立。

关于南非共和国。支持非洲国家关于对推行殖民压迫和种族隔离政策的南非共和国进行严厉制裁的要求。

在同友好国家代表团会晤中讨论会议通过致美国、英国、联邦德国和法国宣言的可能性,要求停止对葡萄牙和南非共和国的一切援助,和执行联合国有关葡萄牙和南非共和国的决议。

(2) 努力使反新殖民主义斗争成为会议工作的中心议题。

表达意见,让会议决议中记录的所有独立亚非拉国家享有如下权利:放弃强加给它们的使它们失去主权和损害它们民族利益的不平等的条约和协定;归还殖民国家在殖民夺得的领土或建立的军事基地;无限制地掌握自然资源;外国企业和银行国有化;清除外国军事基地和外国军队撤出。谴责新殖民主义变体,如破坏国家领土边界、界河和领空;组织经济和军事封锁;帝国主义国家组织和策划反合法政府的密谋;利用现存资本主义体系和市场关系对亚非拉国家的人民进行剥削和压迫。

(3) 非殖民化问题,也就是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清除殖民主义的经济、政治和精神后果,支持阿尔及利亚、加纳、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和其他一些进步国家的建议,表示苏联准备在上述方面同亚非国家进行具体合作。鉴于此要利用苏联克服沙皇时期遗留下来的民族和人民

不平等的经验的材料，关于苏联阿塞拜疆共和国经济、国家和文化建设方面的材料，关于培训民族干部工作的材料。

(4) 吸引与会者注意，目前正在发生的科技革命和生产力的巨大进步会使这些任务的解决变得更容易，只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反动派，为了自己巨大的垄断利益，才不允许落后国家进入现代文明和达到先进国家水平。如果没能实现经济独立和根本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发展中国家实现民族独立只能是一句空话。

为了解决这些复杂又困难的任务，根据苏联的经验来看，首先必须动员国内人民的力量，依靠本国民族资源和自然财富，在提高人民的经济和文化生活方面做艰苦和系统的工作。在解决这一主要任务时，其他反殖民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力量会团结在自己的一方，巩固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平等、互惠合作，发展中国家可以在现有条件下，在目前这一代人仍健在的时间内成功解决清除从资本主义那继承下来的落后经济局面。

(5) 如果会议出现了有利形势，代表团应提出含有今后反殖民主义和反新殖民主义斗争纲领的宣言草案，上述阐述的内容以及亚非拉国家提出的要求和任务应该成为方案的基础，这些内容在不结盟国家会议(贝尔格莱德和开罗)、非洲统一组织会议(亚的斯亚贝巴和开罗)、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日内瓦会议)的决定中都能找到相应内容。

3. 人权

支持旨在根除种族歧视和隔离的建议以及支持反对任何形式的种族灭绝政策的言论(南越、刚果、安哥拉、南非共和国、南罗得西亚、多米尼加共和国)。

考虑到一些亚洲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存在着对实行种族灭族行动的指控(印度、中国、伊拉克)，进一步讨论种族灭绝问题可能会出现不符合愿望的局面，所以应让会议集中讨论帝国主义国家实行的种族灭绝行动，在决议中应该反映这一点。

4. 普遍和平与裁军

考虑到亚非国家的迫切利益，阐述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合适的，要突出适合巩固和平、民族解放斗争和裁军任务的内容。

使用不结盟国家开罗会议(1964 年 10 月)通过的《维护和平与国际合作纲领》，这个纲领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立场基本是一致的。

(1) 据此出发，苏联首先关注在国际监督下实现普遍的、全面的裁军。同时，苏联准备讨论旨在缓和国际局势和限制武装冲突的部分措施(清楚外国军事基地和从其他国家领土撤军；禁止核试验；成立无核区；缩减军事开支，等等)。

强调苏联的所有建议关于裁军的建议首先涉及军事大国。在表达裁军意见的同时，苏联同情年轻的独立国家巩固自己的国防，防范帝国主义军事威胁的加强。

(2) 在禁止所有形式的核试验和氢弹试验问题上要声明说，苏联多次表达过就禁止地下核试验达成协议，条件是借助本国的设备进行监控。

如果印度，或者其他国家提议会议对中国进行核试验进行谴责，或者就这个问题表达自己的意见，那么，此时苏联最好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不支持任何一方。

(3) 在核和热核武器不扩散问题上的出发点是,苏联反对扩大拥有核武器国家的数量,反对核国家通过直接转让的方式向非核国家扩散核武器,也反对通过军事集团、国家联合的途径,或者其他渠道,其中包括通过成立多方的,或者北约大西洋核武装力量的途径扩散核武器。北约成立核武装力量的计划是解决防止核扩散问题的主要障碍。

这里需要指出,不结盟国家开罗会议的决定对我们来说是合适的,该决定号召大国放弃有利于核扩散的"各种各样"的政策,因为不结盟国家的这个建议事实上指向了西方国家成立北约多边核力量的措施。

(4) 发表声明——苏联多次提出关于普遍禁止和全面销毁各种形式的核武器的建议。苏联赞成中国就此问题的建议。缔结关于核国家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国际协定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苏联既支持不结盟国家关于召开国际裁军会议的建议,也支持中国关于召开各国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的建议。

(5) 在讨论裁军问题时强调指出,实现全面和彻底裁军的纲领将能释放出大量的物质资源,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可用于亚非年轻国家的经济发展。因此,争取裁军的斗争,也就是反对经济落后和殖民主义遗产的斗争。

5. 关于和平解决国际纠纷和在国际关系中禁止使用武力威胁或直接使用武力

坚持这样的立场,国家间的纷争应该通过和平手段来解决,不能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联合国宪章、万隆会议、贝尔格莱德会议和开罗会议、不结盟国家(1961 年和 1964 年)首脑会议的决议,都对此作了规定。

(1) 依据会议形势,对近来美国出现的观念进行有根据的批评,证明美国对亚非拉独立国家随意运用武力或进行武力威胁。强调让会议在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纠纷的原则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一致性和坚定性,因为这个问题与巩固年轻共和国的独立和捍卫领土不容侵犯是直接相联系的。

对帝国主义国家反驳各国人民的解放权和革命权的尝试作出相应的评价,援引和平解决国家间纠纷的原则捍卫独立。强调人民有权摧毁殖民主义制度,争取本民族解放和独立发展,任何人也不能剥夺他们的这个权利。

(2) 如果某会与会者提出签订关于不使用武力解决领土纠纷和边界冲突的协定的建议,那就积极对待这一思想。如果中国或其他与会者对苏联关于领土纠纷的建议持批评态度,为了避免发生直接争论,就声明说,这些建议符合联合国宪章、万隆会议和其他一些多数亚非国家参加的会议的决定。

(3) 在讨论与会国政府提出的建议时,不要把领土问题和其他一些成为亚非国家之间冲突根源的问题提交到会议上来,指的是为了能让会议取得成绩,要避免出现这种情况——会议因这些不是本次会议主要任务的问题成为亚非国家冲撞的场所。如果大多数与会国要让会议表达对阿以因塞浦路斯的冲突的意见等问题时,不反对这样做。

巴勒斯坦问题。考虑到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立场存有分歧,不适合就此问题表现出主动

性。如果在讨论过程中需要苏联阐述立场，代表团应按如下意见去做：

苏联支持阿拉伯国家关于巴勒斯坦难民返回故居的正义要求。苏联谴责以色列在与阿拉伯人的边界纠纷中发动侵略战争以及谴责以色列在不久前单方改变约旦河流域水源管理制度的行动，这给阿拉伯国家造成了损失。

塞浦路斯问题。如果有必要阐述苏联的立场，那就遵照苏联早先的官方声明。

刚果问题。发言批评帝国主义国家的反对刚果共和国独立和主权的密谋。强调指出，这个对于整个非洲来讲都是个重要问题，它的解决不能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应该由刚果人民依靠自己的非洲朋友的支持，独自解决自己的内部事务，建设自己的国家。指出，苏联站在刚果爱国的、民族解放力量一边。

如果讨论关于刚果问题的决议方案，代表团应同部机关协调苏联的非洲国家立场。

(4) 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可能尝试着手解决一些引起非洲国家之间冲突的棘手问题，并在会议期间同一些相关国家建立直接接触。在这种情况下，代表团应遵循如下方针：

也门问题。苏联应发言谴责英国和沙特阿拉伯为了也门君主势力对也门内部事务进行干涉，表达我们对共和国制度的支持态度。如果在会议过程中，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也门和沙特阿拉伯努力在相互都接受的基础上解决自己的分歧，相应地，代表团应表达对这种努力持正面态度。

印中边界冲突。苏联政府赞成在没有附加条件的基础上，通过双方友好谈判尽快解决印中冲突。如果这样做合适，代表团就可能在不触及中国和印度争论的实质和相互要求的情况下，表达有利于双方尽快解决冲突的意见。

马来西亚问题。苏联发言支持北加里曼丹民族解放力量，谴责英国和美国为了保存自己在东南亚的势力利用马来西亚的企图。

同时，马来西亚问题的和平解决也符合苏联的利益。

最好制止把对马来西亚看作是一个共和国的批评性言论。

遵循这些意见，在会议合适的时候安排相关方面代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进行会谈。

6. 加强联合国

利用研究与联合国活动相关问题的时机，吸引亚非国家站到我方的立场上。此时应考虑到，亚非国家制度的路线在很大程度上为即将召开的第二十届联大会议营造了形势。

(1) 强调苏联支持在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基础上加强联合国，联合国宪章是联合国组织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和发展国际合作活动的基础。

近年来，由于一系列新独立的亚非国家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内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这有利于联合国完成它所面临的任务。苏联完全支持亚非国家关于扩大它们参与安理会、经济与社会理事会名额的合法要求。苏联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成员中第一个批准对联合国宪章进行相应修改的国家。

(2) 关于联合国武装力量的使用问题指出,这里有两条基本路线。苏联认为,必须排除使用联合国武装力量用于殖民主义目的的可能性,已经存在这种情况了,例如刚果,干涉其内部事务、破坏它的国家主权和独立。联合国武装力量应该只能用于维护和恢复和平的利益,帮助侵略的受害者,帮助人民摆脱殖民主义统治。联合国宪章中现有内容允许在这种精神指导下解决这个问题,其中最主要的任务是宪章把维护和平的责任委托给安全理事会。另一条路线是帝国主义国家坚持的,它们想在联合国旗帜的掩护下使主权国家及其人民从属于自己。这里,它们企图绕开联合国宪章或阉割它。

(3) 要让与会者注意,美国旨在破坏联合国的路线是与美国强化对外侵略的方针相联系的。为了阻碍联合的活动,美国人为地制造出所谓的联合国"财政危机"问题,要求对苏联和其他一些国家使用宪章第 19 条,不想对联合国在刚果和中东的非法活动承担责任。

至于目前的联合国财政困难问题,苏联坚定支持亚非国家 1964 年 12 月 30 日提出的建议。

(4) 如果会议提出了关于召开全体会议研究改组联合国和重新修订宪章的问题,回答说,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和反帝国主义战线的国家在联合国范围内的合作,这是符合苏联和其他一些爱好和平的国家的利益的,这些国家坚持和平、民族独立和自由的立场。恰恰是在这条路上需要消除联合国活动中的不足。

7. 经济发展与合作

使用苏联对外贸易部和苏联部长会议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的材料。

8. 文化合作

使用苏联部长会议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的材料。

9. 和平共处

从这样的情况出发,大多数与会者的立场可能会出现不仅认同 1955 年万隆会议通过的关于和平共处问题的决议,同时还会进一步明确和发展和平共处原则,这符合苏联的立场。在面对这个问题时,代表团可以依据不结盟国家贝尔格莱德会议(1961 年)和开罗会议(1964 年)的决定。

利用会议发言和讨论时机解释列宁的和平共处思想,把大多数与会者团结在我们的立场上来。

强调指出,和平共处原则得到大多数被压迫民族的认同,把它看作是现今世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相互关系的基础。在联合国宪章里也记录了这些原则。在万隆会议通过的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宣言中得到最鲜明的反映,和平共处原则在目前保持着自己的生命力,而在亚非国家参加的其他会议的文件中也可以找到这种反映。

指出,和平共处政府不仅不会削弱民族解放运动,相反为民族解放运动取得新的成绩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限制了帝国主义分子的活动自由,促进了世界和平的巩固,也为和平共处原则成为所有国家相互关系的基础创造了有利条件。毫无疑问,各国人民拥有不可剥夺的摧毁殖民主义制度,争取自己解放和独立发展的权利。任何人都不

能剥夺。

关于遵守和巩固和平共处原则的问题目前极为迫切，现在帝国主义分子正在世界各个地区发动侵略和干涉独立国家的内部事务。所有爱好和平的力量需要团结起来，争取让那些使用武力粗暴地干涉他国主权和领土的国家严格遵守和平共处原则。

关于禁止干涉他国内部事务，关于它们的独立和主权得到保护的问题。这样做，要让会议接受第二十届联大会议关于禁止干涉他国内部事务的宣言，关于保障它们的独立和主权——该方案已由苏联提交联合国大会研究，或者赞同这一方案的主要内容。

使用具体材料指出，美国、英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近段时期越来越频繁地干涉他国内部事务，诉诸武力，企图镇压民族解放运动，迫使主权国家接受自己的意志，它们应该在什么样的经验之谈和政治条件下生活，迫使它们推行有利于殖民主义政府的对外政策，等等。

指出，反动的"约翰逊主义"号召创造某种意识形态理论，用以镇压民族解放运动和对某个国家的内部事件——其中包括国内战争，美国人把它与国家之间的战争等同看待——的干涉进行辩护。

吸引会议关注一些地区性组织(类似美洲国家间组织)，或者军事集团以及利用一些傀儡制度的雇佣军等从事的侵略活动。指出，在其他国家领土上的军事基地和帝国主义国家的军队，这些国家对其他一些国家的内部事务的武装干涉，是现在国际局势紧张、民族自由与和平的威胁的根源之一。

指出，面对美国及其仆从国的侵略政策，必须联合所有争取和平和根除殖民主义的力量，以便对干涉主权国家内部事务和殖民主义复辟的企图予以必要的打击。发言捍卫各个国家和人民的主权，坚决要求清除外国军事基地和外国军队从其他国家领土撤走，反对对其他国家内部事务进行武装干涉，第二届亚非国家会议将对民族解放运动提供极大的帮助，必将为巩固和平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

10. 关于成立常设秘书处以促进亚非国家有效合作的问题。

考虑到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会提出关于建立常设秘书处的建议，它们努力用新的国际组织对抗联合国，不能支持该建议。如果多数与会国表示反对建立常设秘书处，那就遵从多数人的意见。如果多数人倾向于建立常设秘书处，或类似机关，那就要限制该机关的功能，不能使其成为中国和印度尼西亚追求的破坏联合国的目的。

（二）

目前形势最重大和迫切的问题有越南问题、欧洲安全与德国问题，这些问题在拟定的会议议程中没有出现(如果这些问题列入会议议程)，那就遵循如下方针：

越南问题

1. 如果越南民主共和国没有向会议派遣自己的代表团，那就反对把越南问题列入会议议程，主要基于如下考虑：

(1) 如果某个代表团提出了关于把越南问题列入会议议程的建议，那就反对该提议，持

这一立场的原因是：利益直接相关的各方——越南民主共和国、南越(民族解放阵线)——没有派代表参加会议以及研究越南问题应按照 1954 年日内瓦会议确定的特殊国际机制进行。

(2) 但是，如果越南问题最终被列入了会议议程，那就在讨论这个问题的过程中阐述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遵循第 2 项内容。

(3) 如果多数与会者坚持通过关于越南问题的决议案，那就争取让该决议案的内容符合苏联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立场。如果这样做办不到，那就投票表示反对，或者对于我们反对该决议案提出保留意见。

2. 如果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出席会议以及越南朋友在会议讨论越南问题时表现出关切，那就在发言和会谈中谴责美国对越南的侵略活动，指出，目前这一地区的紧张局势是美国破坏日内瓦会议关于印度支那的决议、美国军队对南越进行干涉活动和武装侵略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土的结果。要让会议格外关注美国狂妄的侵略行动，及美国尝试把其他国家拖入越南战争，这给东南亚和整个世界的和平造成的威胁。

(1) 强调帝国主义集团尝试镇压越南民族解放运动、为人民争取社会和经济解放的运动设定发展命运。在这种情况下，亚非人民团结一致行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2) 号召与会者谴责美国在越南的侵略行动，表达自己声援和支持越南人民的态度。依据会议形势和越南同志对这件事的态度，推动会议通过关于越南问题的特别决议案，表明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支持。如果多数代表团倾向于借助会议发出和平解决越南问题的呼吁，或者应一些友好爱国的倡议，在会议之外就解决的条件进行意见交换(停止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轰炸，承认四方协定作为未来解决问题的基础，举行谈判，美军撤军，在南越组织选举，等等)，那么，代表团在明确自己的路线时应考虑到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立场。

(3) 在美国侵略越南问题上要表现出苏联的强硬和原则性立场。声明我们完全支持越南人民——既包括北越，也包括南越——的正义斗争，由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依据日内瓦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协定提出和平解决的条件。苏联准备向越南民主共和国进一步给予军事、政治、经济和其他方面的援助，用于反抗美国的侵略，直到越南问题得到公正解决。

(4) 如果中国代表，或其他国家代表提出似乎由苏联同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就越南问题进行某种谈判时，对此予以驳斥，声明说，苏联以前没有，今后也不会就解决越南问题进行任何“谈判”。我们的出发点是，越南问题的解决，这首先是越南人民的事。

(5) 对某些代表团谴责越南民主共和国“侵略”、“渗透”和“干涉”南越内部事务的任何尝试要予以坚决驳斥。还要驳斥那些可能在发言中把越南民主共和国和美国看作是一丘之貉，同样是干涉南越内务事务的言论。在此要指出，这种看法事实上意味着对侵略者的纵容，美国破坏了 1954 年日内瓦协定，粗暴地干涉越南人民的内部事务，美国才是侵略者。

(6) 在讨论越南问题时，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日常接触与合作。

欧洲安全与德国问题调解

吸引与会者注意这个问题，指出它的重要政治意义以及考虑德国朋友的相应要求。提醒说，德国军国主义在筹备和发动两次世界大战中起了主要作用，这两场战争给亚非许多年轻的国家和人民带来伤害。在欧洲两大军事集团对抗的条件下，拥有大规模杀伤武器两大军事集团一旦发生冲突，可能就会爆发世界核大战，必将给整个大陆造成难计数的牺牲和破坏。

1. 在评价欧洲局势时，要格外关注联邦德国——欧洲唯一一个没有对二战的后果认罪的国家，它向邻国索要领土，致力于拥有核武器，联邦德国军国主义政客和复仇主义集团是保障欧洲安全道路上的障碍，是现在国际局势紧张的根源。

指出联邦德国帝国主义的新殖民主义政策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和平政策之间的差别，指出民主德国在争取维护欧洲和平斗争中的重要作用，和民主德国始终不渝地支持亚非民族解放运动的意义。

2. 如果某个亚非国家代表在波恩的压力下，利用民族自治权的口号在德国统一问题上支持联邦德国的政策，那就发言揭露西德统治集团是在利用这些口号掩盖自己复仇主义方针和吞并民主德国的侵略计划的企图。

3. 强调亚非国家将会为巩固和平事业作出巨大贡献，坚定地支持欧洲现有边界，包括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之间的边界稳定的原则。发言支持关于德国不能装备核武器的建议，关于欧洲禁止核武器和成立无核区的建议。如果可能，要让会议文件或亚非国家政府的声明以某种形式反映出两个主权德国存在的事实和对联邦德国政策的谴责。

4. 代表团要根据会议形势，相机使用上述内容(在会议的公开声明中，在同其他亚非国家代表的会谈中，等等)。

(三)

1. 关于我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态度问题应遵循如下方针：

(1) 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拒绝参加会议，苏联代表要坚持我们的原则路线，绝对维护中国领导层的错误立场，在实施自己的行动路线时不要使会议成为苏中分歧的舞台，并使之进一步复杂化。

苏联代表团首长在自己的主要演说中要强调指出，苏联坚定地支持亚非人民在反帝国主义和反殖民主义斗争中的团结和统一，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会议必将促进反帝力量的团结。如果一些国家的代表团提出关于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呼吁信的建议，那就予以支持。我们自己不要主动提出这个问题。如果一些国家的代表团提出关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拒绝参加会议进行谴责的建议，那就要反对类似的提议。

如果一些代表团在会议上的发言中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行诽谤，或者对中国的对外政策立场直接进行批评(进行核试验、印中边界冲突、印巴关系、印度尼西亚事件)，那就发

言反对这种性质的尝试和建议。考虑到印度的强烈倾向性,苏联代表团应该在会议开始前就找个理由,要通过信任渠道让印度人明白,苏联代表团不仅不支持反对中国的攻击和建议,同时将会发言反对,因为这不符合会议的主要目的。

在会议上要再次谴责美国对中国推行的侵略政策,支持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揭露美国所谓"两个中国"的谰言,捍卫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益。

在与亲近我国的代表团进行信任交谈时,必须指出中国领导层对苏联内外政策的诽谤是站不住脚的,要以事实揭露他们把个别国家(越南、刚果、多米尼加共和国、印度尼西亚)民族解放运动没有取得成功,或遇到的困难归罪于苏联的企图。

(2) 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会议,我们的出发点是,在会议上同中国代表团发生论战和争论不符合我们的利益,因此,最好能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应该努力使我们之间的立场不出现分歧,在可能的条件下同中国代表团就会议上出现的某个问题进行协调。应该向中国和其他国家代表解释,我们反对会议成为中苏论战的舞台,争取使此次会议成为加强反帝国主义和反殖民主义力量团结的场所。尽管如此,如果中国代表团对苏联的对外政策进行攻击,那么,苏联代表团在必要的情况下对这些论战予以平静的驳斥。要让与会者看到,不是我们,而是中国人是论战和使会议中断的肇事者。我们要努力使会议通过会议任务所需的建设性决定。

在全面阐述我们对某个问题的立场时,要以积极的形式去做,集中精力关注同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迫切任务,关注团结一切民族解放运动力量的重要性。要具体阐述苏联坚定的反帝政策,我们对亚非国家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援助,反对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原则和不妥协的斗争。用事实揭露中国代表团把个别国家(刚果、多米尼加共和国、越南,等等)民族解放运动不成功和出现的困难归咎于苏联的企图。

2. 考虑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已经决定不参加会议,我们的代表团应发言谴责美国对朝鲜人民内部事务的干涉,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关于美国从南朝鲜撤军的正义要求,美国在南朝鲜驻军是朝鲜在和平与民主的基础上实现统一的主要障碍。

3. 使用如下策略安排会议工作是合适的,要尽可能多地让不结盟国家参与会议围绕反帝和反殖斗争问题的政治讨论中来。代表团应该借助友好国家或者相关国家实现我们的意图,要让不结盟国家在会议上积极发表关于反对目前美国在越南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危险方针,反对帝国主义国家干涉各国内部事务和镇压民族解放运动的企图的演说。

4. 要特别重视蒙古人民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阿尔及利亚、缅甸、印度、加纳和其他一些对我们友善的国家的代表团。同他们商量我们关于个别问题、会议工作程序、会议决议案和对美国支持的国家的发言进行答复等问题的路线。

5. 考虑到会议将涉及许多随后召开的第二十届联大会议要研究的问题,要利用同各代表团的接触以及会议分组委员会的工作,弄清楚亚非国家的立场,同它们就我们的行动包括联合国的活动问题进行协商,这对于扩大苏联对外政治活动的效果非常重要。

6. 利用同亚非国家代表团会谈之机,按照苏共中央的决议和指示同这些国家就我们双

边关系问题进行会谈。

附件：

未来几年反对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斗争宣言(样稿)

在阿尔及利亚召开的第二次亚非会议展现了亚非人民在万隆会议后在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斗争中取得的令人深受鼓舞的巨大成绩。与会各国对这段时间摆脱了殖民制度取得独立的36个新共和国表示敬意。亚非国家在巩固国家独立和经济自主的过程中已经做出了许多努力。团结、相互支持和共同行动是亚非国家取得这些成就的基础。

但根除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殖民主义国家齐心协力地继续奴役亚非大陆近3 000万人民。对许多独立的亚非国家推行新殖民主义政策。

保存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与公认的人权不相符，它们与大量的和平与安全受到破坏的现象联系在一起。世界上正在兴起的科学技术革命为在短期内消除殖民主义的经济、政治和精神后果提供了客观条件。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大型垄断公司，为了维护自己的私利，不允许落后国家走上现代文明，达到先进国家水平。这阻碍了世界经济发展和全世界的进步。哪怕只要有一个民族还没有实现自由，那所有的民族都不会认为自己是自由的。

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这是现代人类的耻辱。所有国家和民族都有责任扫除地球上的殖民主义耻辱。

会议规定了近期在这方面联合行动的任务：

(一)

会议庄重地宣布拥护1955年通过的万隆决定，首先是确定现代世界国家间关系的十项准则。

与会国证实了自己执行万隆会议决定和完整而毫不拖延地招待联合国关于赋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的宣言的坚定性。

会议对正在为本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而开展斗争的国家(安哥拉、莫桑比克、肯尼亚〔比绍〕、亚丁、阿曼、南阿拉维、西南非洲、南罗得西亚、法属索马里、巴苏陀兰、斯威士兰、贝专纳、英尾圭亚纳和其他一些殖民地国家和地区)表示问候。会议要求殖民国家立即停止殖民战斗、镇压和恐怖，取缔殖民制度。

会议对取得独立的非洲国家和非洲统一组织旨在为在非洲大陆殖民地国家开展的民族解放运动提供全面援助的努力表示支持。

会议承认殖民地民族有争取自己解放，包括使用武器进行斗争的权利，会议号召与会国向这些民族给予各种援助。

与会国认为必须对拒绝履行联合国关于赋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的宣言的国家进行

严厉制裁。

遣责葡萄牙敌视各民族的政策，会议号召所有还没有这样做的与会国立即中断同葡萄牙的外交和领事关系，采取有效措施停止同葡萄牙的一切经贸关系。他们号召其他国家能以此为榜样。

会议要求葡萄牙在北约的盟国——它们继续向葡萄牙政府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立即停止这种活动。

如果葡萄牙政府继续推行自己的殖民主义政策，会议建议与会国将全力援助葡萄牙殖民地的爱国主义力量开展争取本民族解放的武装斗争。会议号召所有和平与民族自由的拥护者、亚非所有的朋友，开展广泛的国际运动反对葡萄牙萨拉查政府在殖民地的实施的强暴活动。

会议号召与会国和其他一些国家援助阿拉伯各国，它们联合行动支持亚丁、阿曼和其他阿拉伯半岛其他地区的阿拉伯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

（二）

谴责一些国家仍存在对尼格罗人、印度人、阿拉伯人、中国人、印度尼西亚人、马来西亚人和其他一些人种实行种族和民族歧视和隔离的事实，会议一致支持联合国关于根除任何形式的种族歧视的宣言。会议要求无条件地、毫不拖延地中止任何种族和民族歧视现象，取缔一切与此要求相悖的法律和规定。

会议宣布，推行种族隔离和种族主义政策的南非共和国维沃尔德政府和南罗得西亚史密斯政府，在人类面前犯了罪，它们不受法律保护。

会议号召与会国和其他一些国家拒绝向南非共和国供应任何武器、弹药和石油，中断与其外交和领事关系，采取相应的措施停止与南非共和国的贸易活动。

会议强调了南罗得西亚殖民主义者使用的手段对非洲国家和人民造成的严重威胁，那里少数白人掌权，企图建立一个种族主义共和国。

与会国家要求英国对那里的形势承担主要责任，保证释放所有政治犯，取缔 1961 年反民主的宪法，宣布 1965 年 5 月的选举不具有法律效力，召开有非洲组织参加的会议，讨论成立一个保障多数居民权利和利益的独立的南罗得西亚国家的问题。

如果在少数种族控制的条件下宣布南罗得西亚独立的话，那么，会议将建议与会国和其他一些国家不承认这样的南罗得西亚共和国，并研究对其采取国际制裁的问题。

与会国坚决反对南非种族主义者旨在把巴苏陀兰、斯威士兰和贝块纳合并到南非共和国的要求和计划。

（三）

从联合国关于赋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的宣言出发，会议坚持让殖民主义国家放弃保存殖民统治时期或依附时期在发展中国家建立的关系和制度保存的尝试，严格遵守这些

国家的主权和领土的不可侵犯性，尊重其人民的民族尊严。

与会国一致谴责帝国主义对亚非拉各国内部事务的干涉，尝试使它们从属于自己的意志和使用武力或其他方式把有利于帝国主义者的制度强加给它们的企图。会议断然拒绝任何国家按照自己的意愿干涉亚非拉独立国家内部事务的要求。

会议坚决要求美国政府尊重1954年日内瓦协定，立即停止对南越的武装侵略活动，从那里撤军，不阻碍南越人民自主地决定自己的命运。会议谴责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军事进攻，要求立即停止这一侵略活动。美国应该停止对老挝内部事务的干涉，和对柬埔寨主权和领土的破坏。

会议表示同多米尼加人民团结在一起，要求美国停止对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武装干涉。

会议吁吁所有与会国和其他国家向帝国主义侵略的受害国提供政治和物质支持及军事支持，帮助他们解放。

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活动对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与会国认识到，形势要求它们必须通过独立的或集体的程序采取相应的措施反击侵略。

会议坚定反驳新殖民主义置联合国宪章于不顾，破坏一些主权国家边界、界河或领空，进行外交或军事封锁的现象。

隆重宣布发展中国充分享有自己的主权和独立推行内外政策的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会议号召与会国在实施抵制各种形式新殖民主义的政策时想到援助，其中包括：

——重新审查和取缔殖民主义国家或大国强加给它们的双边或多边条约，协定或某些义务，直接或间接违背解放国家的主权、经济或民族利益的东西；

——返还解放国家的领土，这些领土是这些国家的组成部分，却被殖民国家以某种借口夺取，和目前仍处于殖民地状态或未独立的领土；

清除在解放国家的外国军事基地和据点，外国军队和军事人员从那里撤出；

——同帝国主义国家推行的实施的秘密活动、组织、财政和反政府密谋煽动和恐怖活动作斗争；同官僚买办作斗争；同间谍和破坏活动作斗争。

（四）

会议满意地指出了亚非拉人民在争取建立新的和正义的国际经济秩序，反对经济关系中的各种新殖民主义现象，争取快速消除殖民国家遗留给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状况的共同斗争中表现出来的团结。

会议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和支持它们目标而努力的其他国家联合努力的结果，1964年在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问题会议通过的一些重要决定是制定新的正义的国际经济政策道路中迈出的第一步。会议批准了“促进发展的贸易关系和贸易政策的原则”以及一系列关于具体经济问题的积极建议。

会议号召与会国和其他一些国家采取措施无条件地使联合国贸易和发展问题会议决定中包含的决定和建议付诸实施，和共同筹备1966年第二届贸易和发展会议。

会议再次重申了所有摆脱了殖民制度的国家拥有因殖民经济剥削给它们造成的损失而损失补偿的权利。会议认为那些过去有过,或现在仍进行殖民统治的国家,有道义有责任向发展中国提供大量的、无偿的援助,帮助它们快速发展经济和提高居民生活水平。

认为,根除经济和贸易领域的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是保障解放国家主权和独立以及成功地发展经济的主要条件之一,会议号召与会国在反对殖民主义国家利用现存世界经济和贸易体系限制和压迫发展中国家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包括在如下几个方面进行努力:

——不受限制地支配自己的一切自然资源和财富;

——对所有的外国银行和合资银行、金融和保险公司、工业企业、公共服务业、交通和商业企业、农牧场实行国有化,它们的活动与这些国家的独立、主权或民族利益不相符;

——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国家利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困难,在提供贷款时附加某些政治条件,签订商业和其他经济协定的斗争;

——提高自己在本国领土上的外国和合资公司、银行、企业、农业企业、贸易和其他企业利润中的份额以及限制外国所有者把利润拿走;

——反对帝国主义国家实行的经济封锁、抵制、破坏签订的协定和其他经济惩罚手段。

强调根除文化和思想领域存在的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现象的必要性,会议号召与会国采取必要的措施捍卫解放国家的民族文化,发展国民教育、培养专业化的民族干部队伍。

(五)

会议高度评价万隆会议后欧洲和美洲的议会、政府、人民、政党、组织和个人,对亚非民族解放斗争和新独立国家的组建过程中提供的支助和帮助。会议以亚非各国人民的名义对此表示真诚的感谢。

会议期待,在亚非争取民族自由和独立而斗争的新的历史阶段,这方面力量对亚非各国和人民的有力支持不会减少,甚至会加大,这符合新时代的条件。

快速清除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以新的形式和在新的领域——首先是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建设领域——提供援助,将有利于在全世界确立正在兴起的自由、平等和各国人民兄弟般的团结的原则,巩固世界和平。

会议号召所有与会国全面援助和支持其他大陆的解放斗争,这是时代和保障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需要。

让世界上的全体反帝国主义和反殖民主义力量的团结与合作日益巩固、统一!

让世界处处充满真理、正义、民族自由与和平!

РГАНИ,ф.5,оп.30,д.480,л.142-176

№25699

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回信：反驳在苏联援越过境物资问题上的谣言[①]

(1965年11月5日)

(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5年10月21日有关越南问题一信的回复)

……

……你们到处传播……各种各样的谣言，诬蔑性地断言，好像是我们对你们过境运往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物资加以阻挠。

……

在8月26日的信中，苏联方面请求中国方面按照补充方案解决1965至1967年度发往越南物资的过境运输，包括：

10个军事技术修配厂

40门高射炮

在1965年10月23日的信中，苏联方面指责中国耽搁了这批物资。

……但是，在收到你们的请求书后，我们通过中国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朱其文在9月2日将此事告知了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并询问了越南方面有关转运的想法。9月17日我们请求越南方面尽快答复。9月27日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告知我们说，确有其事，但对有关转运的事情没有答复。所以，10月7日我们再次请求越南方面尽快答复……但是直到目前我们仍旧没有得到答复。而且十分自然也很清楚，越南方面无法对组织安排两年多的物资转运作出迅速的答复。

……上述两项物资耽搁的责任在于苏联方面，因为在得到越南同意转运后，中国在1965年10月12日建议苏联方面以单独协议的方式办理他们的转运。

……发往苏联与中国边境的货物没有提前30天的预先通知，这给中国的运输系统带来了问题。

……如果中国的确是在阻挠，“为什么你们不利用自己众多的海运船来运输你们向越南提供的军需物资”?

……“提出过境运输这个话题是为了制造反中国的阴谋”。

……

АВПРФ，ф.0100，оп.58，п.516，д.6，л.17-25

---

① 该档案系摘录自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25700

拉宾与赵毅敏会谈纪要：苏联援越物资过境问题[①]

(1965年11月6日)

……1965年11月6日С.Г.拉宾与对外联络部(兄弟党)副部长赵毅敏举行了会谈。

……在谈到关于中国领导人坚持硬要我们用海运方式向越南运送武器这一企图时，我说，这个问题，大家都知道，已经研究过了，而且我们都很明白在这个问题上中国领导人有自己特别的用意。

赵毅敏说……中国人的目的在于把更多的武器尽快运往越南，无论是陆运还是海运。不能说……陆地运输是唯一的方式。

我说，中国方面同意苏联飞机过境，从河内运送受伤和死亡的苏联专家回国，而无需提前5天预先通知，这是一件积极的事情。我表示，希望中国方面在其他问题上能在相互谅解和国际主义方式的基础上表现出合作的意愿。

……

АВПРФ, ф.0100, оп.58, п.516, д.6, л.12－16

№24370

叶皮谢夫致苏共中央报告：苏联红旗歌舞团在华巡回演出的情况

(1965年11月6日)

机　密

文本第1份

致苏共中央：

① 该档案系摘录自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兹报告我们从苏联驻中国武官罗曼诺夫同志那里获悉的、关于(苏联)红旗歌舞团在中国巡回演出的情况。

歌舞团的表演进程一切正常。在天津表演了4场。11月1日，在北京举行了首次表演。届时到场观看演出的有周恩来和陈毅，后者在演出休息期间接见了歌舞团全体成员。

11月2日，出席表演会的有郭沫若，中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任张奚若及其副手丁西林。

11月3日，歌舞团为北京卫戍区军队作了一场表演。到场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贺龙、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以及承担着各军种指挥任务的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们。

歌舞团表演的反响情况并不一样，而这一反响只是根据歌舞的内容和名称，而非取决于表演质量。观众只是根据约定的信号来鼓掌。最受欢迎的是那些内容反映苏联内战和伟大卫国战争时期的歌舞节目。

尽管该歌舞团浏览了许多地方，但演员们却不允许与中国民众接触。中国报刊在报道关于该歌舞团演出的情况的同时，仍继续刊载反苏内容的文章。

在苏联演员下榻的宾馆到处都充满了针对苏联的污蔑性标语。

我歌舞团全体成员都表现出了高度的警惕性和政治觉悟。

随后，我仍会依照相关程序通报这方面的情况。

A. 叶皮谢夫(签名)

1965年11月6日

РГАНИ，ф. 5，оп. 30，д. 482，л. 116

№25631

拉宾与彭真会谈纪要：建议恢复莫斯科与北京的交流活动①

(1965年11月9日)

……

总的来说彭真没谈到苏中关系。会谈大部分时间都在谈论中国的农业问题。彭真也谈到了有关“大分散小集中”的政策和目前中国共产党正竭力紧缩城市居民以防范核战争的情况。

① 该档案系摘录自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帝国主义者们为你们和我们准备了氢弹。所以我们对城市和工业都进行了分散。

拉宾也建议恢复莫斯科与北京之间互派代表团的交流活动。

彭真表示接受这项建议,说将来有可能实现。

……

АВПРФ,ф.0100,оп.58,п.516,д.6,л.26－32

№24333

外交部致驻印尼大使电:采取措施搞清印度尼西亚的局势

(1965年11月27日)

机　密
文本第1份
草稿

致苏联驻雅加达大使馆:

从大使馆收到大量关于印度尼西亚事件的情报,这些情报考虑了应对印度尼西亚事件采取相应的步骤。但是,考虑到这个国家的形势依然复杂,很多问题还未弄清楚,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我方应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以使印度尼西亚的局势朝我方需要的方向发展。

莫斯科注意到,苏加诺因确定原因不准备同您会谈。只能通过军事联络途径进行军事专家层面的联络,无论是纳苏蒂安还是苏哈托,暂时都未与苏联代表会晤。

有鉴于此,您是否可以借口您受委托要与总统进行会谈,再次尝试一下利用某种可能性同苏加诺进行一次会谈? 按照您的意见,如果现在不能指望同苏加诺进行会晤,那是否可以以苏联领导人的名义给苏加诺去一封信?

在复杂的条件下,由经济联络委员会派遣代表前往印度尼西亚可能行得通,还可以派遣负责向印度尼西亚供应武器的军人前往,名义上讨论供应军事物资问题,事实上是向印度尼西亚相应的领导人阐述苏联政府关于发展苏联、印度尼西亚合作,以及联合开始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斗争的观点。但此时应该看到,这些代表在印度尼西亚能否被接见,他们能否同苏加诺和纳苏蒂安举行会谈。

我们提出这些问题，是想与您商量，考虑到印度尼西亚事件的进展情况；我方可以采取什么新步骤去支持左翼力量，相应地影响这个国家的局势。

您必须想想这些问题，同我们的军事人员商量一下，把自己的看法向中央汇报。考虑过程中要解决关于我们对印度尼西亚采取进一步措施的问题。

当然啦，从您那里得到的依据近来关于印度尼西亚局势提出的建议非常重要。必须弄清楚，苏加诺的阵地稳固到什么程度，苏加诺和军人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简言之，印度尼西亚近期的局势发展前景如何。

1965年11月17日

第3553/гс号

РГАНИ，ф. 5，оп. 30，д. 479，л. 77－78

№21167

卡拉布霍夫与唐坦义会谈记录：中国留学生的专业安排等问题

（1965年12月20日）

摘自И.Г.卡拉布霍夫的工作日记

1965年12月21日

第927/де-не号

与中国驻苏联使馆一等秘书唐坦义(Тан Тэн И)的谈话记录

1965年12月20日

应唐坦义的请求，我于10点30分接待了他。

1. 唐坦义说，他在此之前便曾提出过关于以М.И.卡尔什名字命名的列宁格勒政治技术学院的（中国）研究生唐俊飞(Тан Цзюнь-Фэн)的问题。该生至今仍未按最初确定培养计划投入学习，而是被建议学习另一课题："金属切削机床的稳固和震动"。

唐坦义继续道，我们请求按照最初制定的培养计划，即根据原定研究课题"金属切削机床上的精确走刀"来安排唐俊飞的学习。

2. 根据今年12月17日苏联高等与中等教育部信件第3865c号，唐坦义说，从今年7月

至9月,苏联驻北京使馆,已向中方递交了51名苏联大学生和科技工作者的工作计划,这些人都是准备派往中国高校学习和进修的。截至目前已得到中方同意接受的进修生共计22名,其中18名目前已到了中国,2人将于1965年2月1日前往中国。总之,关于29名进修生的接收问题目前还未得到中方的答复。中国方面已答应将会向苏联驻中国使馆通知关于自己是否接收其余29名苏联进修生的决定。然而,至今仍未收到中方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结果。

唐坦义请求(我们)就接收其余苏联进修生问题向北京方面询问。

依照既定惯例,所有与派遣中国大学生、研究生和进修生相关问题均由中国驻莫斯科使馆决定,而所有与派遣苏联大学生和进修生相关问题均应由苏联驻北京使馆决定。唐坦义建议苏联驻中国使馆就这一问题向中国职能部门咨询。

他还说,我们抛开惯例把这一请求直接上报北京相关组织。

3. (唐坦义)说,鉴于苏联高等与中等教育部今年12月11日第4143号和12月18日第4789号信件,我们根据苏联高等与中等教育部的请求向中国使馆作了如下汇报:

1. 据列宁格勒国立大学通报,被派来苏以"常用微分方程式的恒定理论"为课题接受研究生学习的中国公民唐诗因(Тан Ши-ин),由于专业修养不足和俄语知识欠缺无法准备和进行论文答辩。

列宁格勒国立大学校长建议将她转为进修生,为期一年。

2. 自1963年10月5日起,在莫斯科国立大学化学系火棉胶化学教研室的接受研究生教育的中国公民孙曼林(Сунь Мань-лин),在研究生学习开始阶段便不具备相应的化学基础知识修养,再加上他毕业于建筑学院,因而也没有在物理和火胶棉领域从事研究工作的实际经验。

苏联高等与中等教育部,曾以1963年11月20日第BC-10855号备忘报告的方式,向苏联使馆通报了如下情况:由于缺乏相应的专业训练,孙曼林无法在规定期限内进行学位答辩。可是,中国使馆仍然以1963年12月19日第C-202/63号备忘报告的形式请求(苏方)将孙曼林作为研究生来培养并保证说,他(指孙曼林)完全可以在规定期限内完成自己的论文。

可如今根据莫斯科国立大学校长的报告,尽管研究生孙曼林能够吃苦耐劳,但仍不可能在既定期限内完成答辩。

唐坦义指出,所有中国研究生和进修生,在被派往苏联(留学)之前,均要经过严格的考试,他们都具备扎实的语言功底。

至于上述两个实例,唐坦义答应,将向他们本人了解情况并随后做出答复。

同时参加会谈的还有:苏联外交部远东司随员B. M. 穆拉托夫和中国使馆工作人员金庆方(Цзинь Цин-фань)。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一等秘书

И. 卡拉布霍夫(签名)

给中央的文件共6份，分送：B. B. 库兹涅佐夫同志、B. П. 叶留金同志、O. Б. 罗满宁同志、总书记处、苏联驻中国使馆和档案室

1965年12月20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21卷，第20—22页

№24334

苏达利科夫与金炳稷会谈纪要：朝苏关系发展态势良好

（1965年12月20日）

机　密

今天同金炳稷举行了会谈。

大使说，他刚刚从平壤回来，他回去了半个月。参加了朝鲜劳动党中央全会。在朝鲜期间，他同金日成会谈了三次，他向金日成报告了自己在苏联的工作情况。他详细介绍了我们莫斯科营造了形势和苏联方面为改善苏朝关系的氛围所做的努力。

按照大使的话说，金日成对他说，劳动党中央认为，苏共10月中央全会后，朝苏关系发展态势良好，为进一步改善苏朝关系开辟了前景。金日成在自己的谈话中对莫斯科怎样解决同朝鲜进行经济合作和进行援助的问题很关心。朝鲜领导人平壤热电站建设中出现的不和情况很紧张。

在大使返回苏联之前，金日成责成他请求勃列日涅夫接见他本人。

大使强调说，他想在年前同勃列日涅夫会见，因为他知道，勃列日涅夫同志要去蒙古，他有金日成的委托，他想在1966年1月1日能完成金日成的委托。

我告诉大使，会将他的请求予以报告。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

苏达利科夫

1965年12月20日

РГАНИ，ф. 5，оп. 30，д. 479，л. 79

1966 年

№24381

葛罗米柯致苏共中央报告：1966 年度苏联外交行动规划局工作计划

（1966 年 2 月 1 日）

机　密

文本第 1 份

致苏共中央对外政策委员会：

苏联外交部提交 1966 年度苏联外交行动规划局的工作计划。

计划对下列最为重要和迫切的问题进行了研究：苏美关系、削弱北约的问题、核不扩散问题、南亚和东南亚局势，拟订了我们在这一地区的政策的建议，苏联同非洲和东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分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第三世界的外交行动和计划，进一步发展苏联和法国之间关系的一些问题。

考虑到制定远景外交行动的重要性和复杂性，事先规定苏联外交行动规划局在准备材料时可以利用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国防部、财政部、对外贸易部、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相应各部门的情报，并进行咨询，以及吸收苏联科学院社会科学各研究所参与工作。

请审阅。

葛罗米柯

1966 年 2 月 14 日

附件：

机　密

1966 年度外交行动规划局工作计划

一、苏美关系问题

美国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以及美国同亚非拉主要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

这些客观因素决定了美国对外政策的目标和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方向。

美国在发展美苏政治、军事和经济关系问题上的观念和美国统治集团中在与苏联和平共处问题上的力量对比。评估约翰逊行政当局在苏美关系领域的定位和实际举措。今后5年苏联同美国之间在军事、经济和科学领域竞赛的前景，这种竞赛对美国统治集团在与苏联和平共处问题上的观念的影响。

在构想苏联对美国外交政策总方针时要考虑最大限度地利用美国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以及美国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

涉及美国和苏联的国际关系中的主要问题；分析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共同利益在哪里，分歧在哪里，冲突在哪里。

构想我们对美国的方针时应从如下几个国际问题出发：

欧洲问题。美国在西欧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目标，美国同欧洲国家和我们之间的矛盾和解决这种矛盾的可能性。

美国对联邦德国推行军事化政策背景下的德国问题；西德想拥有核武器的问题。

法国削弱美国在欧洲作用的政策。

美英关系；美英矛盾和利用此矛盾来削弱美英军事政治同盟的可能性。

美国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破坏和削弱它们与苏联合作及它们彼此合作的企图。对我们采取措施制止这种企图的考虑。

远东和亚洲问题。美中关系。分析美中关系进一步发展最为可能的步骤，及我们对每一步骤的立场。

美日关系，未来几年的发展前景（日本关于返还冲绳岛的要求；美军撤离和清除在日本领土上的美军基地；发展美日经济关系，等等）。

分析美国对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土耳其的政策中涉及苏联利益的方面，考虑我们进一步削弱美国在上述国家的影响应采取的可能性步骤；为此目的利用美国在印巴冲突中的处境。

非洲和阿拉伯国家问题。分析美国对非洲大陆的总体政策，对非洲部分地区和个别国家的政策。构想我们就某些问题和在出现紧张形势和威胁和平的那些国家积极开展反对美国政策的措施。

巩固古巴共和国的问题。美国对社会主义古巴采取敌对行动的可能性方案，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采取保障古巴共和国在和平条件下和平发展的措施。

国际关系问题。分析美国对普遍和彻底的裁军的一系列问题（总体的和部分的）的立场。未来几年同美国就这一问题中的个别问题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在同美国政府就这一问题进行讨论时我方可能采取的策略方针。

联合国。关于苏联和美国在联合国框架内就维护和平问题进行合作的可能性，考虑到该组织的力量对比和力量进一步变化的前景。

苏美双边关系。构想苏联采取旨在发展美苏经济、贸易、科学技术和文化往来与合作的

可能性措施。

准备苏联采取积极措施发展同美国的双边关系,指的是我们感兴趣的最广泛地发展,首先是对我国经济有益处的经济和科学技术往来的材料。

这些关系的发展和文化交流对于我们对美国的社会舆论施加影响和在最大程度上消除美国对苏联政策目的的敌视将产生有益影响。

期限:在1966年10月15日前准备好。

二、北约组织和我们削弱它的措施

评估北约集团存在期间在政治、军事和经济领域的活动。北约组织的活动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利益,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利益产生的负面结果。18年来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几个主要西方国家(美国、英国、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实力的变化,以及在北约政策的反映。

分析北约内部,以及北约同未加入该组织的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分歧,为了进一步削弱北约,揭示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暴露出来的薄弱环节:

在政治领域:北约成员国的一些国家(法国等)为削弱美国在这一组织中的领导地位的斗争;联邦德国、法国、英国在加强自己在北约中的影响和地位的努力之间的分歧;北约组织成员国在德国问题、西欧联合问题、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态度,以及在其他的主要国际关系问题上的分歧;土耳其和希腊之间在塞浦路斯问题上的分歧。

在军事领域:联邦德国、法国和英国争取削弱美国在北约武装力量中的领导作用和争取扩大自己影响的斗争;一些国家和北约成员国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出的防止欧洲战争和保障欧洲安全(华沙成员国与北约成员签订互不侵犯公约、在欧洲一些地区成立无核区等)的建议的态度。

在经济领域:北约欧洲成员国家及它们追求经济统一的努力与美国之间的矛盾;欧洲共同市场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之间的矛盾;北约成员国中在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经济往来问题上的矛盾。

北约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之间在政治、军事和经济问题上的矛盾,北约与未加入北约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

鉴于1969年为北约组织成立20周年,任何一个国家都可能宣布退出北约,一年后宣布废除这一条约,此时美国和其他北约成员国对该集团的前景计划。

构想未来2—3年苏联和其他华沙条约成员国利用北约组织中的离心力削弱北约的可能性措施。

期限:1966年9月1日。

三、核不扩散问题

分析西方国家在核不扩散问题上的立场。它们在这个问题上,其中包括对成立多边核力量部队和大西洋核部队计划的立场。美国提出了成立"麦克纳马拉委员会"作为吸收西德参与解决北约使用核武器的相关问题的可能性方式之一。该计划与上一个计划是有区别

的。与目前的地位相比较，在“麦克纳马拉委员会”成立的条件下，联邦德国将拥有更多的优势。关于西方国家解决联邦德国核武器要求的其他可能性方案。

构想我们在核不扩散问题的下一步立场，出发点是必须为联邦德国装备原子武器制造障碍。苏联与法国和北约其他一些对西德装备原子武器持否定态度的国家进行协调的可能性。

在北约通过关于吸收联邦德国加入“麦克纳马拉委员会”的决定的情况下，我们表明在签订核不扩散条约问题上的立场。

我们拒绝签订核不扩散条约时可能出现的后果。联邦德国在直接或间接拥有核武器的情况下，沿华沙条约路线应采取的可能性应对措施。

期限：1966 年 5 月 15 日。

四、东南亚局势和制定我国对这一地区政策的建议

地区的主要问题：争取消除经济和文化落后及贫困——长期殖民统治的后果的斗争，反对新形式的经济削弱和帝国主义国家的扩张；农业问题、粮食问题、成立民族工业、培训民族干部、保障居民需求。

地区国家在解决上述问题的过程中将会遇到的困难。这些国家内部围绕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道路问题的斗争。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前景。

南亚和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对外政策、经济贸易和财政联系。

这一地区国家的相互关系性质、争议问题。中立主义的作用和性质。

地区国家政府对美国、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日本、英国、法国、联邦德国追求的利益和目的。

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对南亚和东南亚表现出关心的性质。这一地区的军事公约和外国军事基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这一地区国家的计划和活动。

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同南亚和东南亚国家在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和军事领域合作的基本成果；合作过程中出现的不足和困难；达到相应水平的成果所需的努力和开支。

构想我国对这一地区国家政策的主要方面时，要考虑到对苏联的政治、军事战略和经济效果，同他们进行合作的各种可能形式和某些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分量。

期限：1966 年 11 月 1 日。

五、苏联和亚非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

分析目前非洲和东方阿拉伯国家的形势和发展趋向，此时要考虑到这些国家在政治和社会经济特征的区别，它们的经济潜力，以及军事战略意义。

帝国主义国家在非洲和东方阿拉伯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战略意义和立场(资本投入的范围及其规模、原料剥削和市场、军事基地)。前殖民主义国家，其他帝国主义国家，首先包括美国和联邦德国对这些国家的新形式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影响(贷款、无偿援助、参与知识分子培训、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宣传)。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非洲和东方阿拉伯国家的矛盾，为了苏联的利益，构想利用这些矛盾采取可采取的措施。

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同非洲和东方阿拉伯国家在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和军事领域

开展合作的主要成果;合作中的不足。

构想促进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同非洲和东方阿拉伯的不结盟国家就主要的国际关系问题进行政治合作的措施,既可以在联合国的框架内,也可以在该组织之外。

确定要集中我们的精力与之开展全面合作的非洲和东方阿拉伯的具体国家,此时要考虑这些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经济发展趋向和前景,它们在削弱帝国主义阵地中的作用,以及战略地位。构想关于我国向这些国家提供经济、科学技术和军事援助,以及同它们进行贸易的主要方面和规模,此时要注意到我国1966—1970年5月计划的现实财政和物质水平(贷款总规模、设备的品种和数量、机制、材料和专家),还要考虑到,从苏联的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确定向这些国家提供经济援助最适合的方式,以便巩固和扩大我国同他们的长期合作(例如,由我国的企业供应设备原料,再把这些企业的产品运往苏联,等等)。

期限:1966年7月1日。

六、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第三世界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外交活动和计划,鉴于此我国的外交任务

分析现阶段以及近几年来中国在国际关系体系中的地位、角色和意义,此时要考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和军事潜力。

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重要的国际问题上的立场,并明确:

第一,中国的立场在哪方面符合或接近苏联的立场和利益;

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立场与苏联利益的根本分歧在哪里,这给国家的社会体系带来哪些危害;

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场同苏联的立场区别在哪里,其中包括历史发展的特点、国际关系特点和中国的内部局势。

指的是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下列问题的立场:

1. 对待美国(包括台湾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苏美关系的反应;美国帝国主义集团对苏中分歧的利用;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

2. 对待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法国、联邦德国、日本(包括香港问题、中日关系接近的可能性)。

3. 对待亚非拉国家(政治、经济立场和中国在这些国家的影响、中国侨民的作用、中国同这些国家的共同点和矛盾,首先是与中国毗邻的国家,中国在亚非合作问题和三个大陆团结问题上的立场)。

4. 对待联合国及其专门组织(包括远东经济委员会)。

5. 对待裁军和禁止核武器问题。

制定我们对抗中国领导层追求霸权主义的努力、制止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对苏联的敌对行动和增强苏联的影响的措施。

期限:1966年11月15日。

七、进一步发展苏法关系的一些问题

1. 苏法在保障欧洲和平与安全问题上进一步发展合作的前景。

分析戴高乐"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观念，从利用这种观念的视角来考察削弱美国在西欧的影响和不允许进一步强化联邦德国的军事政治实力。苏法合作对其他西欧国家的可能性影响，指的是削弱它们参加北约的念头。弄清楚法国目前的对外政策在多大程度上为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同西欧国家围绕保障欧洲和平与安全问题发展关系开辟了前景。关于苏法在这一领域开展合作的构想，此时要考虑到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立场。

2. 在法国目前对亚非拉政策背景下的苏法关系。

分析目前戴高乐有关致力于巩固法国实力及其在发展中国家影响的方针。

研究利用法国对这些国家推行的相对比较灵活的政策的可能性(提供经济和科学技术援助，同时强调尊重民族自觉和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在很多情况下对一些非洲国家对外政策倾向的影响)，以便对抗美国向非洲的渗透，削弱美国在拉丁美洲的影响和巩固这些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独立。

3. 评估未来2—3年法国对外政策的发展前景，提出我方在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领域发展苏法关系的采取可能性措施的建议，指的是强化法国独立于美国对外政策的自主倾向。

期限：1966年5月10日。

第453/ГС号

РГАНИ，ф. 5，оп. 30，д. 489，л. 32-42

№24376

阿尔奇莫维奇等致勃列日涅夫联名信：关于为斯大林平反的现象

(1966年2月14日)

敬爱的列昂尼德·伊利伊奇(勃列日涅夫同志)：

近期，在一些社会言论和报刊文章中出现了这样一些倾向，其目的实际上就是试图部分地或间接地为斯大林平反。

随着党的二十三大的临近，我们还不清楚上述倾向究竟会得到多少人的支持(拥有多么牢固的基础)。但是，即使这些倾向只是部分地涉及关于重新审视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会议决议的问题，也会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不安。鉴此，我们认为有责任把自己对这一问题

的看法报告给您。

在此之前,从我们所了解的情况来看,没有任何事实和证据能够使我们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即谴责个人崇拜有什么错;相反,我们很难对被两次党的代表大会决议所确认的、关于斯大林的大部分令人震惊的、可怕的犯罪事实的真实性和绝对正确性持怀疑态度,虽然这些事实尚未公开。

问题还在于,我们认为,任何为斯大林鸣冤叫屈(平反)的企图都潜藏着这样一个巨大的危险,即导致苏联社会的严重分裂。斯大林不仅要对大量无辜民众的死亡,苏联国家对战争的准备不足以及背离列宁的党和国家生活原则等承担责任,而且还以自己的犯罪和错误活动歪曲了共产主义理想。斯大林所做的这一切是永远也不会得到人民原谅的。我们的人民不会理解,也不会接受这样的做法,即使是部分地背离(党的代表大会做出的)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决议。

而在这方面所作的任何尝试,都只会导致我们内部各阶层民众在思想上的普遍混乱和分歧。例如,我们坚信,为斯大林平反必将在知识分子中引起巨大的骚动,并导致我们青年一代情绪的严重复杂化。与整个苏联社会舆论一样,我们也对青年的成长而担心。任何解释或文章都不能驱使人们再相信斯大林,而相反只会激发人们的混乱和愤怒。鉴于我国经济和政治的复杂形势,这样做显然是危险之举。

为斯大林平反还存在着另一个也相当严重的危险。要知道,它不仅只涉及我们的内政,而且也是一个国际问题。在为斯大林平反方面我们所采取的任何步骤,都无疑会导致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面临又一次分裂,即我们与西方共产主义党派之间的分裂。此类举措将会被后者首先认定为:我们对中国人的投降,而在任何情况下西方的共产党人们都是绝不会这样去做的。

这是一个具有极其重大意义的、我们不能不考虑的因素。当前的(国际)形势是:我们一方面受到美帝国主义者和西德复仇主义者们的积极威胁,另一方面则是(与我们搞分裂的)中共领导人,因此我们与西方兄弟党派的分裂,即使关系的复杂化便意味着冒险,至少也是极其不明智的举动。

为了不浪费您的精力,我在以上所述中只涉及一个问题,即反对采取任何为斯大林平反的举措。因为这样做首先存在两个分裂的危险。这里,我们还未涉及如下一些危险,即任何背离二十大决议的举动都会在相当程度上导致我们文化活动家们的国家交流局面的复杂化,其中包括对我们在为争取和平而斗争和国际合作诸领域所取得的成果构成危害。

还有一点,这里我不能不再加一句。显而易见的是,苏共中央关于这一问题的决议不能被认为是其日常工作中所做出的一个普通决议。要知道,在任何情况下这一决议对我们国家的命运均具有历史性的意义。我们希望,这一点能引起(国家领导人)足够的重视。

签名者姓名及其身份:

Л. А. 阿尔奇莫维奇——科学院士,列宁和国家奖金获得者。

О. Н. 叶夫列莫夫——《当代人》剧院总导演。

П. Л. 贾丕才——科学院士,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国家奖金获得者。

В. П. 卡塔耶夫——作家协会会员,国家奖金获得者。

П. Д. 科林——苏联人民艺术家,列宁奖金获得者。

М. А. 梁托维奇——科学院士，列宁奖金获得者。
И. М. 麦斯基——科学院士。
В. П. 涅克拉索夫——作家协会会员，国家奖金获得者。
Б. М. 涅缅斯基——艺术家协会会员，国家奖金获得者。
К. Г. 帕乌斯托夫斯基——作家协会会员。
Ю. И. 皮缅诺夫——俄罗斯联邦人民艺术家，国家奖金获得者。
М. М. 普利谢茨卡娅——苏联人民演员，列宁奖金获得者。
А. А. 波波夫——苏联人民演员，国家奖金获得者。
М. И. 罗姆——苏联人民演员，国家奖金获得者。
С. Н. 罗斯托夫斯基(艾伦斯特·盖林)——作家协会会员，沃罗夫斯基奖金获得者。
А. Д. 萨哈洛夫——科学院士，三次荣获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列宁和国家奖金获得者。
С. Д. 斯卡斯金——科学院士。
Б. А. 斯卢茨基——作家协会会员。
И. М. 斯莫克图诺夫斯基——影业协会会员，国家奖金获得者。
И. Е. 塔姆(院士)——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列宁奖金、国家奖金、诺贝尔奖金获得者。
В. Ф. 坚德里亚科夫——作家协会会员。
Г. А. 托夫斯托诺戈夫——苏联人民演员，列宁奖金和国家奖金获得者。
М. М. 胡齐耶夫——功勋卓著的俄罗斯联邦艺术家。
С. А. 崔可夫——苏联人民艺术家，国家奖金获得者。
К. И. 丘科夫斯基——作家协会会员，列宁奖金获得者。

1966 年 2 月 14 日

РГАНИ，ф. 5，оп. 30，д. 487，л. 40－44

№25972

伊斯坎达罗夫的报告：香港和澳门问题及苏联的立场

(1966 年 2 月 16 日)

1966 年 2 月 16 日
第 92 号/дв-нс

香港和澳门

（简报）

香港是被英国占据的中国东南海岸的领土。香港由殖民地和“租借地”即所谓的新界构成。殖民地领土包括香港岛(83 平方公里)、九龙半岛上不大的一块地方(距离香港岛 800 米)和一些小岛(面积为 124 平方公里)组成。在九龙半岛上的“新界”及其附属一些岛屿(面积为 888 平方公里)。面积总共有 1 012 平方公里。居民有 369.2 万人(1965 年末),主体居民是华人(98%)。

香港是在 1839—1842 年英中战争期间被英国人占领的。这场战争的结果是 1842 年《南京条约》强加给了中国,香港成为英国的殖民地。1856—1860 年英法中战争的结果是英国从中国抢占了九龙半岛的南端,并把它与香港合并。1898 年强迫中国签订租借协定,租借九龙半岛的另一部分和一些附属岛屿,与香港合并,租期 99 年。

根据 1842 年 8 月 29 日签订的《南京条约》(第 3 条),“因大英商船远路涉洋,往往有损坏须修补者,自应给予沿海一处,以便修船及存守所用物料。今大皇帝准将香港一岛给予大英国君主暨嗣后世袭主位者常远据守主掌,以便立法治理”。

在英国书籍中把香港的司法地位明确为“英吉利王国所有的殖民地”。1964 年 4 月英王签署任命了现任香港总督的委任状,其中谈到“任命的是我们的香港殖民地及其附属领土的总督和总指挥”。

香港由英国总督、总督任命的执行委员会和司法委员会来管理。殖民地设有城市委员会、警察、地方武装力量,以及驻扎在那里的英国海、空军殖民军队。

香港是一个开放口岸,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贸易中心。有 700 多家外国银行、公司在这里建立了分支机构,其中包括 4 家美国银行分支机构。每年城市接待外国游客近 100 万人次。许多国家在香港建立了领事馆,其中包括: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日本、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阿根廷等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香港经济中占有极大的地位,它在香港拥有许多各类企业。据英国报纸《星期日电讯报》的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香港设有 5 家银行,管理 9 家其他银行,3 家医院,8 家大型贸易康采恩,其中 3 家是与当地商人联合创办的,31 家百货公司、食品厂、电影制作和发行公司、出版社和 4 家大型报社(塔斯社,1956 年 4 月 26 日,第 33—ДЮ 页)。

香港作为贸易代办处和同资本主义国家贸易往来的中转站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具有重要作用。例如,消息中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每年从香港获得的自由货币达 50 亿美元(联合企业的收入,华侨的兑换、同香港的贸易顺差)。据香港资料,1965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同香港的贸易顺差达到 224.95 亿港币(近 40 亿美元)。

澳门是南中国海海岸的中国领土,位于香港西部。葡萄牙人控制着澳门半岛及其两个

附属岛屿(凼仔岛和路环岛)。总共面积16平方公里。居民25.5万华人和1 080名葡萄牙人。

1557年葡萄牙人向中国租借了澳门用来作为海外商站，条件是中国保留对这块领土的主权。但是，从1843年起，利用中国在对英战争受到削弱之机，葡萄牙拒绝支付租金和拒绝承认中国对澳门的主权。1874年，葡萄牙迫使中国放弃了对这一块领土的主权，把它变为自己的殖民地。

澳门行政权力掌握在葡萄牙总督手里。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和澳门的立场

中华人民共和国否认香港和澳门的殖民地地位，把它们看作是被英国和葡萄牙从中国强占的领土。把这些领土问题列为历史遗留问题，等条件成熟时再解决。

中国政府在解放香港和澳门问题上的立场，在《人民日报》1963年3月8日文章《关于美国共产党的声明》中找到反映。文章中说："至于尚未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我们一直坚持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待条件成熟时再解决，而在条件成熟前维持现状。""例如，香港问题就属于这类问题"，"中国人民完全没有必要在香港和澳门问题上展现自己的武力"。

中国政府反对在联合国把香港问题和澳门问题列为"殖民地问题"进行讨论，认为在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前，该组织"没有权力"讨论与中国相关的问题。

由于香港被用来作为美国侵略越南的供应基地，中国政府曾两次照会英国政府(1965年9月1日照会和1966年2月1日照会)。在最后一次照会中，中国外交部指出，1965年出现过300余次参与越南战争的美国军舰，包括核潜艇进入香港口岸的事件。照会要求英国政府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制止美国在香港进行任何形式的军事准备。

苏联的立场

在第16届联大会议讨论"香港华人难民"问题时，苏联代表团发言反对讨论这个问题，表示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的联合国机构无权讨论这个问题，这是中国内部事务问题和在这一地区生活的中国公民的问题。

在第19届联合会议讨论特别委员会关于赋予殖民地国家和民族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的报告时(在1964年11月召开的特别委员会会议上)，苏联代表提醒说，苏联代表团的立场在1964年4月20日召开的特别委员会第245次会议上的声明中阐述过，其中说：

"自然，某些小块殖民地领土存在的条件千差万别，这些领土现今仍被殖民主义者占领，但毫无疑问这些领土是另一个独立国家的组成部分，例如，香港和澳门。这些脱离其母国的领土应予归还，就像印度和达荷美收回其固有领土一样。"

同时苏联代表认为，在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前，联合国的任何一个

机构都不能研究香港和澳门问题。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三秘
P. 伊斯坎达罗夫(签名)

АВПРФ,ф. 0100,оп. 53,п. 226,д. 25,л. 2－6

№23022

苏共中央全会速记记录：关于中苏关系的一些问题

（1966 年 2 月 19 日）

苏共中央全会 1966 年 2 月 19 日第 22 次 讨论苏共中央关于中国问题的信函及一些农业经济问题 勃列日涅夫主持

会议主席勃列日涅夫同志：按照约定，请允许我们就此结束辩论。有人坚持继续辩论吗？

众人道：没有。

会议主席勃列日涅夫同志：柯西金同志放弃致闭幕词。

建议就我们所讨论的问题通过如下决议：

“中央全会决议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关于 1966—1970 年间苏联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的指令草案。

1. 赞成《苏共二十三大关于 1966—1970 年间苏联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的指令》草案。

2. 在报刊上公布苏共中央草案：《苏共二十三大关于 1966—1970 年间苏联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的指令》。

3. 将苏共中央草案《苏共二十三大关于苏联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的指令》提交各级党组织和劳动者会议讨论并见报。

大家对这个问题还有什么意见吗？

众人道：没有。正确。

会议主席勃列日涅夫同志：那就让我们表决吧。赞成该决议草案的，请举手。请放下手。有人反对吗？没有。有人弃权吗？没有。决议一致获得通过。

我们建议责成中央政治局，参考会议期间同志们所提出的相关意见，对五年计划指令草案进行最后编辑整理，并打算在明天的报纸上公布该草案全文。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们将照此办理。

同志们，下面让我们简单谈一下，关于党内讨论苏共中央就中共领导人的分裂方针和苏中关系问题所发秘密信的情况。正如各联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各边疆区和州党委和许多来自地方的领导干部向我们所报告的那样，这次讨论是在健康的环境下进行的。以我们在处理与中共关系过程中所采取的平和的路线，党员们能够正确地认识信中所提出的问题并完全赞成苏共中央的政策。显而易见的是，我们党中央在国际政策和共产主义运动中所执行的方针是正确的，因而得到了全党的支持。如今我之所以要谈这个问题，就是为了再次证明一点，即我们的行动是正确的。

众人道：正确！

勃列日涅夫：我依据的是各州委书记、联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部长会议主席和军队干部们从各地方发来的报告，从这些报告可明显看出，苏共中央所执行的方针得到了所有党组织的赞扬。

众人道：正确！

勃列日涅夫：鉴于所有这些情况，我们认为在本次大会上不应当再进行与中国领导人的辩论。我们所执行的克制而平和的路线，在相当程度上已满足了此次与会的我们一些客人们的愿望。我们应当继续坚持我们的既定方针，虽然这样做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必要时不会采取坚定的立场。

同志们！我们已打算在全会闭幕后再就农业方面的一些问题交流意见。其中，最为尖锐的问题之一，便是关于粮食采购的问题。在中央9月中央全会上我们已经提请中央委员们关注在粮食采购问题上所采取的片面态度，即对在提高价格的情况下可能导致超计划采购粮食的问题估计不足。今天，柯西金同志在自己的报告中也对该问题给予了相当的关注。从原则上说，我们并没有对3月中央全会的决议作任何的改变。粮食采购计划依然是稳定的。不过，我们必须按照提高的价格和以需要的规模完成粮食的超计划采购。如今，重视这一问题对我们具有重要的意义。必须考虑到，由于气候条件比较差，我们尚有500万公顷的土地播种不足，虽然还可以补种。我们必须认真思考春播准备工作中的所有问题：其中包括如何更好地利用为春播作物所保留的土地，如何更好地使用矿物质肥料——是否不对某些作物使用这些肥料或将之用于秋播作物。在这方面尚存在许多需要我们现在必须着手解决而不能拖延的问题。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现在就必须开始思考，如何在五年计划中筹划所有与农业发展相关的问题。关于完成农产品，尤其是粮食作物和粮食采购计划的问题，始终是我们最应关心的问题，我甚至可以说，这是我们党为了粮食而进行的一场斗争。而我们是否能够成功地解决这一问题将决定着其他所有问题的解决。

这就是为什么中央认为有必要把弗洛连季耶夫和马茨凯维奇等同志的报告分发给所有党组织的原因。这两位同志向中央报告了，关于在俄罗斯联邦和整个国家集体农庄和国营

农场范围内农业生产计划方面,所存在的一些错误倾向。正是因此,我请求大家再次全面地看一看在各共和国和州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内农业生产五年计划的发展方向是如何制定的,应当如何对其中的一些偏差进行纠正。这些偏差可能表现为个别农业领导干部片面地执行苏共中央3月中央全会所制定的路线。

而我们之所以要把这一请求只局限于全体中央委员范围内,我认为,就是希望这方面问题能够在实际工作中得到重视。

我们的工作已进入实践阶段,苏共中央全会,就五年计划所通过的指令性草案,已列入各联盟共和国共产党大会和党代会的议事日程。我想这一次我们就要按照这个指令来做。在各州和边疆区党的会议上,我们的首要问题,就是要对我们的工作作一总结,第二个问题——通报一下关于上述指令的情况。这样做是否正确?

众人道:正确。

苏斯洛夫: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将分发到基层。该决议将更加详细地阐明关于指令性草案在各级大会、会议和报刊上进行讨论的程序问题。

众人道:这样做很好。

会议主席勃列日涅夫同志:如果同志们对全会的进程没有其他问题或意见,那么全会工作到此结束。有问题和意见吗?

众人道:没有。

会议主席勃列日涅夫同志:宣布全会闭幕。

РГАНИ,ф. 2,оп. 1,д. 816,л. 90-93

№20282

勃列日涅夫与黎笋谈话记录:越南战争与苏联的援助

(1966年4月11日)

绝 密

谈 话 记 录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与越南劳动党代表团于1966年4月11日在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谈话。

参加谈话的有政治局委员、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黎笋，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兼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长阮维桢，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越南民主共和国驻苏联大使阮文镜，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人民》报总编黄栋。

黎笋：首先请允许我代表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所有越南人民向苏联人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苏联政府给予我们的援助和支持表示诚挚的谢意。这种支持特别体现在苏联共产党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上。

勃列日涅夫：您在大会上听到了，大部分发言的代表和几乎所有兄弟党的代表在自己的发言中这样或者那样提到了越南人民的战斗。这具有非常大的意义，不仅是动员我们国家的人民加入到团结和支持越南人民的实际过程中去，而且也是从世界进步舆论的角度，加强反对美国在越南的侵略。

黎笋：我想指出，道义上的支持对于我们的斗争是至关重要的。当然，我们需要物质支援，但是对于北方和南方我们的人民来说，更大的意义是来自我们的苏联朋友和世界所有朋友的道德以及政治援助。

借此机会，我想告知您越南形势的总体特点。

我们反对美国侵略战争战略路线的主要方针是：1. 使美国在越南取得失败；2. 限制现在的战争在南越范围之内，不允许它扩张到印度支那半岛和东南亚的其他区域；3. 以最小的损失获得胜利。

在南越的侵略行动中美帝国主义者试图依靠三种主要力量：1. “战略村”；2. 傀儡制度及其武装力量；3. 南越城市。他们在越南行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美国的太平洋第七舰队。但是这个因素起的是辅助作用。美国人主要寄希望于上面提到的那三种力量。但1965年证明，这些力量已经不再是美国在南越政治依靠的希望了。比如，已经在1965年初，南方被消灭了四分之三的“战略村”，尽管我们建议先在这个时间内消灭一半。傀儡军队处在完全瓦解的状态。城市中也不安宁，情况让人联想到起义前的气氛。

根据对南越形势的分析，我们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在1965年初得出了结论，南方可以在2—3年内取得胜利。但事件比我们想象的发展得更快。面临西贡体制彻底崩溃的危险，美帝国主义者向南越派去了军队，把人数从1964年底的3万增加到去年年底的20万。

坦白说，在最初的时期我们处境困难，因为不知道以怎样的方式针对美国军队进行行动。但是我们知道一点，他们一定要被打败。作为尝试，我们派了正规军的1 000人分队到岘港和丘莱(Чулае)美军的重要基地。美国为此派来了8 000士兵和军官。战斗在万道(Вантьюнг)附近激烈展开。结果我们消灭了800名美国军人，我们损失了50人。这个战役的尝试说明，我们不仅可以同美国人打，而且能够打败他们。

到目前,美国在南方有美国和仆从国的6个师。但在反对前线力量的战斗行动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第一空运师。当然,美国在南越的武装力量用最新的军事技术装备。但是美国士兵的精神和战斗能力是极度低下的。正因为如此他们接连失败。

西贡体制试图在美国的帮助下在南方施行"安抚"的政策,也就是说,用经济许诺和收买的方式来吸引人民向着自己一边,并削弱民族解放战线。但这样的政策没有在西贡和美国得到预想的结果。

南越今年年初的形势是火奴鲁鲁召开会议的原因。[①] 我们的评价是,这个会议没有给出任何新的东西,也没有指出美国方面以及他们在南越的傀儡任何新的行动。

在我们看来,美国人现在正想走出不能消灭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力量的状态。他们确信,我们不会在南越给他们决定性的打击。不排除因为这点,美国将在南越扩张自己武装力量的人数,以使南方的局势对自己有利。他们可能增加到30万—40万人或者50万人。

勃列日涅夫:您谈了傀儡军队的崩溃。这说明什么?这个军队的很多士兵都投降"阵线"了吗?

黎笋:西贡军队大量的临阵脱逃。仅在1965年,根据美国的数据,南越军队的逃兵就有11万人。他们基本上都回到自己的家了。我们暂时还很少利用这些人来补充越南南方民族解放战线的武装力量。解放阵线地方机关分给了这些人土地。

勃列日涅夫:我想应该积极地和这种人工作,因为他们是你们武装力量的后备军。给他们土地,很好。但是让他们的妻子在这块土地上工作,男人应该去战斗!

黎笋:我们去做这方面的工作。有过这样的情况,傀儡军队的整个分队都投降到"阵线"这一边。比如不久前,加入到我们力量中的南越武装力量装甲运输车团。

勃列日涅夫:南越的爱国武装力量人数有多少?

黎笋:如果加上正规军、游击队和当地的自卫队,人数为60万。敌人力量(美国和傀儡军队的武装力量)和我们的力量对比是1.3∶1。

勃列日涅夫:您想过给前方供给所有必需品的困难吗?"胡志明小道"发挥作用了吗?从北方走向南方是否有其他的途径?

黎笋:关于给在南部的省份,也就是在南越的南部行动的武装力量的供给,保证粮食和弹药的问题已经解决。他们拥有所有的必需品。比如,那里协调了弹药生产。给泰昆(Тайнгуен),也就是和老挝接壤的、南越西北部的力量供给更难一些。这些地区的货物是通过你们的"胡志明小道"得到的。道路起着作用,但是遭到严重的轰炸。我们需要一些高射炮,掩护这条小路不被空袭。这条小路,众所周知,相当长的距离是通过老挝的那些由巴特僚力量控制的地区。

南越,我们面前有敌人的军队80万。我们想在2—3年的时间里挫败敌人。为此我们

---

① 1964年5月在火奴鲁鲁(夏威夷岛)举行了美国高级将领关于南越形势的会议。——原注

需要消灭敌人尽可能多的有生力量。今年，越南南方民族解放战线的武装力量面临的是消灭8万—9万美国军队和15万—20万傀儡军队。在已经过去的1966年的三个月里，我们的力量消灭了4万以上的美国军队和傀儡武装。

可以说，我们想让美国人吃败仗。同时我们也想在政治和外交领域取得胜利。

近来，美国的统治集团经常在政治领域对我们让步。如果以前他们是满口声称不退出南越，而现在则是说，准备好从那撤出自己的军队。不久前他们无论如何都不愿意承认越南南方民族解放战线，现在他们给越南南方民族解放战线的代表参加谈判的机会。我们认为，在某种形势下，美国可能会同意将军队撤出南越。但是他们希望一定要在南方留下永远忠实的傀儡体制。我们无论如何都不会同意在南方存在这样的体制。可以建立一个有个别亲法和亲美人士参加的政府。但是这个政府不应该依赖美国。

我们明白，面临相当长的战斗。为了让美国人做出下一步的让步，我们还需要时间。整个过程将是多长时间，取决于我们的斗争规模，同时也取决于西贡制度内部和美国内部发生的危机。不管怎样，我们都将与美国接触，不会回避这样的接触。

勃列日涅夫：这些接触以什么方式实现?

黎笋：美国驻仰光大使在缅甸与我们的代表见面。在莫斯科也有会见，是我们的临时代办与美国大使的谈话。这样的接触我们将在未来继续维持。

我们的总结是，美国可能会针对北越加强自己的行动。从自己的角度，我们自然希望限制实现这种行为的可能性，希望减少美国空袭给北越造成的损失。但是显而易见，南方爱国者的战斗越是积极，美国则越会加强对北越的空袭。我们不排除美国飞机袭击河内和海防的可能性。

同时我们看到了美国人遇到的困难。除了对他们侵略的谴责，美国越来越处在政治孤立的位置上，美国不得不处理一些具体问题，其中包括在南越供给部队的问题。很清楚，他们为自己的士兵供给必需品有困难。在不久的将来，当我们大规模使用“格拉德”大炮去打击美国在南越的主要基地和最大仓库时，这些困难会更加突出。

勃列日涅夫：谢谢您的信息。我们希望越南人民取得彻底的胜利。消灭南方的美国人将是最好的结局。至于我们，我们现在会帮助、今后也会帮助越南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正义战争。有关1966年提供货物的义务我们努力按时完成。如果可以与中国方面达成协议，那么我们将很快给你们三个导弹团，就是我这几天和您说的。我们认为，向越南派遣的这些导弹团将进一步促进越南民主共和国国防能力的加强。利用这些补充团，你们可以更有效地与侵犯北越领空的美国空军交战。此外，在我们看来，苏联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援助同时也是对南越爱国者的援助。

黎笋：我们通知了河内、苏联给了我们三个补充的导弹团。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委托我们感谢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做出这样的决定。我们希望，上面提到的团将派到越南来，并像已经在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导弹团一样被使用。这样，和中国同志们达成协议，通过中国领土将这些导弹团运送过来将会更容易。

勃列日涅夫：给你们提供补给的导弹团，他们必须尽可能快地在战斗中使用。我和您说过，和导弹一起我们将给你们相应的掩护。和这些团一起派往的还有一个最新的地面掩护设施，使用它必须对军事人员进行培训。现在在越南民主共和国没有一个专家可以在实践中使用这个设施。因此，我们觉得，应该派苏联专家和教官过去，以便教会你们的人使用这种新式武器，同时也是为了在必要时候应用。

黎笋：我们希望，所有的有关派遣上述三个导弹团的具体问题都将在两国的国防部长之间得到讨论。

勃列日涅夫：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也同意在任何时间举行这样的谈判。

在政治层面，我们完全支持你们。我们在越南问题上的立场是清楚的；我们不会做与越南朋友的看法和立场相矛盾的事。让所有关于我们在越南的挑拨和流言都留在那些作者的良心里。

我们为你们的成绩高兴。美国不仅在南越处于困境，而且在欧洲，严重的分歧动摇着北约。需要注意的是，消灭南越的美国军队，现在说是 22 万人，而您说了很快将是 30 万—40 万，也许这么快不可能。这需要时间，需要力量。战争可以带有长期的性质。北约的分歧对我们是有利的，另一方面，这个过程将让美国在越南处在更强硬的位置。为了不在南越失败，美国会不惜一切，否则他们的盟友，包括北约，就会停止信任他们。这是需要注意的。

很显然，美国人面临给南越供给军队的困境。但是美国是个富裕的国家，有很多机会。因此，美国看来要越过这些困难。而我们也有不少的困难。

黎笋：我们从自己的方面全力以赴战胜目前的困难。

勃列日涅夫：在我们看来，必须保护北越的经济免受破坏。当前在国际舞台上应该有这样的积极因素，就是反对美国在越南侵略的广泛运动。这个运动要在整个世界活跃起来。运动将因为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以及世界的进步力量得到开展。

也许现在需要想想，在军事行动的同时，使国际舞台上的政治斗争活跃起来。政治斗争对我们的共同利益有利。美国不会在南越的战争中胜利，他们是知道的。也许应该帮助他们离开南越。就让他们保留自己的权威，但是要离开。可能美国会在越南停留一段时间，因为要他们立刻离开有些不现实。关键是必须彻底拔掉傀儡体制的根源。解决越南问题的原则应该是 1954 年的日内瓦协议。

黎笋：就是 1954 年的协议。就让美国人严格执行这些协议的条款吧。

勃列日涅夫：我们认为，你们支持与美国接触的路线是正确的。这对我们是有利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美国人自己正在寻求接触。这证明了你们的力量和你们立场的正确。美国由于在南越的艰难处境不得不寻找某种形式的接触。

黎笋：现在我想陈述一些具体的请求和有关具体问题的想法。

我们感谢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我们的“格拉德”大炮，促进了南越爱国者战斗的成功。今年 4 月我们结束了向南方运送和集中所有的大炮和炮弹。我们请求苏联共产党中央

委员会为我们提供同样数目的大炮和炮弹，就是给我们与已经在南越安放的数量一样的炮弹。

勃列日涅夫：我会将您的请求向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报告。我们研究一下，再考虑一下，在这方面可以做些什么。当然你们知道，这样的大炮我们实际上是专门为南越的爱国者生产的，因为对于我们的武装力量来说，它们是不合适的。

黎笋：我们同时请求苏联同志研究，如果美国包围河内并且阻止其他国家的船只进入港口，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

勃列日涅夫：我们会让有关部门去研究这个问题。也许，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给你们海防炮。

黎笋：我们很高兴，在代表大会上您的报告中，早些或者在别的发言中，听到您关于社会主义阵营的统一团结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必要性很好的论述。达到这样的统一，特别是在苏联和中国之间具有非常大的意义，首先是对于我们。我们支持统一。在这方面，作为措施，为了减小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分歧，我们希望，在我们之间，越南和中国方面之间，通过中国领土向越南运输苏联的货物援助的所有问题将通过谈判的方式解决。我们认为，中国同志会比苏方更容易协助我们解决这类问题。

勃列日涅夫：同意。您知道，我们真诚地渴望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统一和团结，同时也渴望与中国恢复良好的关系。如果在返回的途中，您还将和中国的同志们见面，那么可以对他们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我们，都希望苏中关系有所好转。同时还可以说，如果毛泽东同志同意，我准备好了在任何时间，以任何的形式，官方的、非官方的，与他见面，迫切地希望听到中国领导人的观点并乐于回答所有问题。在我们看来，苏联和中国关系的改善是加强与帝国主义斗争道路上有效的一步。

黎笋：如果我在中国有会见，那我一定向中国同志转达您的话。

当我们飞往莫斯科参加代表大会时，我们在北京有一个与日本共产党代表团委员的见面。您知道，这个代表团不久前访问了越南民主共和国。我们可以说，日本共产党领导人执行的是独立路线。现在，日本共产党内笼罩着恐怖和镇压的威胁，这些有可能使日本共产党人被日本当前的政府攻击。苏联共产党帮助日本共产党与国内的反动派斗争是有用的。日本共产党的代表团还对我们说，党的领导试图通过战争建立广泛的反帝战线，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舞台上。我们认为，建立这样的战线，包括亚洲和世界的进步力量在内，对活跃反对帝国主义的战斗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我们希望苏联共产党正面看待日本同志的这个想法。

在与我们交谈的过程中，日本共产党的领导人说，如果他们得到邀请，他们准备好到莫斯科与苏联共产党的领导见面。

勃列日涅夫：根据我们的总路线，我们希望改善与日本共产党的关系。考虑到越南和朝鲜同志们的意见，我们在最近的时间里采取了具体的行动。不久前，作为苏联大使的客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 B. B. 库兹涅佐夫访问了东京。他

被委托与日本共产党代表见面。但是,很遗憾,不是因为我们的原因,见面没有举行。我们给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了邀请,请他们派代表团参加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但是,众所周知,代表团没有来。

我们认为,我们还可以为苏联共产党和日本共产党的关系正常化采取措施,同时支持日本同志面对反对党的威胁。不能不提到印度尼西亚的教训,据目前的数据,牺牲了多于20万共产党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对反对党的进攻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

还想补充几句关于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问题。我们已有一年半的时间对中国同志表现出忍耐,对他们的攻击不予回击了。这一点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也可以证明。我可以和您说,接下来我们还将克制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辩论。当然,我们不高兴每天听到中国的报刊和电台对我们的侮辱。但我们没有回应这些侮辱。我们遵照的是,当前最主要的是团结一致与帝国主义斗争。而其他的问题可以放在一边。

黎笋:再次感谢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邀请我们的代表团参加你们党的大会。胡志明同志非常遗憾,不能来参加这个大会。但他一定会找到机会访问苏联。在送我们来莫斯科时,胡志明同志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看到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和团结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勃列日涅夫:请带我们向胡志明同志、范文同同志和其他越南同志们转达兄弟般的问候。请转达,我们邀请他们和您——黎笋同志,到我们这里来休息疗养。

黎笋:我们一定会到您这来,也包括休息。我们在苏联的时候,实际就是精神休息。我们也希望勃列日涅夫同志能到我们国家去,当越南统一的时候。

勃列日涅夫(开玩笑):为什么不早些呢?

黎笋:您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访问将是全越南人民的喜事。而现在的情况并不安全。我要说,因为您不仅在苏联,而且在国际舞台上占有这么高的位置。

勃列日涅夫:想和您说几句关于在河内举办不同国家进步知识分子代表的国际会晤。苏联的代表团将参加其中的工作。据我所知,一些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也要派自己的代表团来河内参加会晤。我们认为,采取这样的措施对在动员国际社会支持战斗中的越南会起到正面的作用。

最后还想强调,关于越南问题,我们以后也会支持你们的立场。同时,我们认为应该更为关注政治上的斗争。

黎笋:完全同意您的意思。鉴于去年10月您和范文同同志谈的意见,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政治和外交的行动。1966年1月24日胡志明主席给政府和国家首脑的信函就是实现您想法的具体步骤。

谈话由苏联外交部东南亚司二等秘书 P. Л. 哈米杜林记录。

АПРФ,ф. 3,оп. 83,д. 284,л. 6-20

№16680

齐米亚宁致勃列日涅夫函：苏联记者关于阿穆尔河地区局势的呈文

(1966年4月20日)

机　密

致勃列日涅夫同志：

呈上《真理报》记者曼科、切斯诺科夫、波奇瓦洛夫同志关于阿穆尔河地区范围内的远东局势的秘密信函。

《真理报》总编

M.齐米亚宁(签名)

1966年4月20日

《真理报》编委的呈文

目前，远东的局势是这样的，这个辽阔的边区引起了特别的关注。广袤的哈巴罗夫斯克和滨海边区领土上人烟稀少，这里很少有城镇及居民点，公路铁路数量微不足道。这个蕴藏无数宝藏及有远大前景的地区，占有它就注定有经济利益。此外，还有迅速掌握该地的其他原因，这些原因常常具有政治及军事性质。

远东与中国有漫长的边界。这个边界上的局势年复一年地变得越来越令人担忧。如同苏联边界政府告知我们的那样，近来中国人经常企图挑起边界上的武装冲突，袭击苏联哨所，组织中国农民在割草期临时抢夺，并在苏属阿穆尔河的岛屿上进行捕鱼。在边界官员会谈时中国官员常常声称，不仅是黑龙江上的岛屿，而且沿江两岸所有土地以及乌苏里江边区均应属于中国。当地的中国居民也坚持这种想法。特别引起警惕的是，中国一方明显地增加了军人数量，边界区内建造公路，居民军事化。

想来，如果可以从我们远东未来的战略点来说，那么，这些事实理应严重注意。这个遥远的边区经济上要大大加强，要建造良好的交通线，首先要住满居民。

虽然近几年来远东移民显著，但人口密度，例如哈巴罗夫斯克边区，几乎是国内中部地区的七分之一以下。人们在此滞留不了。人员大量流动。有几个原因：气候条件恶劣，最低生活费比国内西部地区高，缺少按地区差别率津贴规定给各类专家、工人、职员，没有年限奖励工资补贴。

由于远东林场人员流失，在冬季不得不从欧洲国家地区组织招募2 000左右的工人

及达3 000人的季节工。通常他们是哪里来就返回哪里。实际上,这对国家来说,显然是不利的。

只在哈巴罗夫斯克边区新林场就要1.1万个家庭。比较合理的是方法是不组织招募,建议有序移民。到1957年止,已实现将工人家庭转入哈巴罗夫斯克边区林业。这些人员已固定,成了常住者。虽然,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移民和组织招募工人局认为移民阶段已成过去,但我们不同意这样的结论。

哈巴罗夫斯克企业及建筑工地和滨海边区的劳动力流动十分巨大。在1964年,原来远东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企业劳动力流动是28%,符拉迪沃斯托克建设局的建筑工地为37%。其中青年工人流动特别明显。

在哈巴罗夫斯克边区,干部、教师和医生的轮换是毁灭性的。如果当年实行附加工资20%,那么,离开哈巴罗夫斯克每年平均为3位教师,而现在每年平均为300位。教师说,在共青团城教18课时所得100卢布,而在梁赞也能得到。对医生来说,在工资方面,远东地区也不免税。人们离开了,甚至丢弃造得很好的住宅。近三年来,离开共青团城的医生有150位。人员离开,而医疗单位治疗网却发展,每位医生的治疗负担就加重。近2—3年来,在哈巴罗夫斯克的许多区医生大换班,现在边区的医护配套人员只是68%。

这些远离国内中心区的劳动者,像滨海和哈巴罗夫斯克的劳动者,直到现在劳动工资比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西部地区的工人及职员并无更多。在滨海地区,大多数轻工业及食品工业单位的工人职员、教育工作者、保健人员以及其他直接为居民服务者,均无地区补贴工资。只有40%的边区劳动者享受了这个补贴。

在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的报告里曾提到,将提高国内边远地区工人及职员的工资和规定其免税。这无疑会大大促进人们向远东流动。但是,还要做很多事,要认真巩固来自国内西部的外来者。

逻辑上说,哪里发现人手缺少,哪里就应该改善生活条件。否则,人员留不住。生活的物质基础,居住条件是不能不考虑的。出路在哪里?通常,哈巴罗夫斯克边区的林间村落常被忽视,起码的方便设施,如浴室、洗衣房、医院、俱乐部,那里的居民都没有。哈巴罗夫斯克边区的林间村落十万平方米的住房已不适用,实际上应修缮了。这些住房,2—3年内应该换以新的。

是否以新城阿穆尔斯克为例,这里有外来建造的纤维板联合工厂。但是,因为这里没有任何物质奖励,住房不足,来了多少人,离开的也是多少人。这里是共青团城建筑工地,多数为年轻人,显然,要建立年轻的家庭,但年轻夫妇不能住在一起,因为没有住房。现在439对年轻家庭,男的住在宿舍里,而妻子住在另一宿舍里。通常的最终结果都只有一个:人们都离开了。

在滨海边区,住房保证做得也十分糟糕。1965年1月1日住房总数是680万平方米,每人6平方米。根据边区工会理事会资料,有75 800个家庭在等候获取住房,其中符拉迪沃斯托克为42 147个家庭。

公共设施方面,滨海地区比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平均指标落后,代表性的数据是:

住宅总数保证百分比：

	滨海地区	俄罗斯联邦共和国
给　水	26	46
排　水	25	44
中央采暖	27	42
热　水	2	13

要给约 2.5 万名孩子建幼儿园和托儿所。

在边区几乎三分之一学校是 2—3 班工作。在滨海有伐木者居住的林间村落中总计 4 所中学上课。在富津(Фудзин)林场中央的农庄有 3 000 人左右，但这里没有中学。

边区里少有俱乐部和图书馆，最近六年建造的企业没有一家有俱乐部。

滨海地区的食品国家牌价大大高于国内中央地区，集体农贸市场中的价格也高。

在远东，国民经济的一个主要部门是渔业，约 15 万人从业人员，这里主要由年轻人工作，大量的部队和舰队退伍人员补充进来，这些人都未成家，出海归来，每个人有 70 到 80 昼夜休息(休假＋超时补休＋节假日)。何处给年轻的渔夫休假？没有一个地方。在远东，渔夫没有任何落脚处(类似任何供膳宿的公寓)。船舶修船时渔夫不能住在船里，但他们没有住宅。这样，小伙子离开到其双亲居住的地方，或者到能够很快找到居住的地方。

符拉迪沃斯托克城市里居住着约 4 万名渔夫，但这里对他们甚至一个偏僻的俱乐部、运动场和体育馆都没有。

渔夫的学习组织得不好。在整个远东只有 1 所远方渔业高等专科学校(2 000 名大学生)、3 所中等职业学校，分别在纳霍德卡、彼得罗帕夫洛夫斯克和涅韦尔斯克。这就不难看到，太平洋沿岸的渔业，实际上是没有任何培养一般海上作业人员的基地。从堪察加半岛到滨海的广大地区总共有 3 所不大的厂属综合技术学校。1965 年学校毕业 930 位海员，而这个时期渔业船队需要补充的海上作业人员 7 000 人左右。出海人员临时匆忙培训。其中许多人未培训好，经受不住残酷的考验(6 小时工作、6 小时休息、常受暴风骤雨、长期离岸)而离船和远离远东。

对人民的休闲生活，在远东组织得很差。疗养所和休假处在这里也少。去西部休假远非每人都有可能。如果乘火车，路上就要半个月。飞机票的价格十分贵，来回要 250 卢布。显然，这对国内远东的固定人员不利。

最终，看来解决了人员固定问题之后，我们才能开始密切掌握和改造我们的远东。

E. 曼科

K. 切斯诺科夫

Л. 波奇瓦洛夫

РГАНИ，ф. 5，оп. 30，д. 489，л. 197－203

№10401

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加强开展对中国和越南的无线电广播

（1966年4月20日）

苏共中央书记处1966年4月20日会议第2/18г号记录

第18项　关于向蒙古人民共和国出租无线电台，以便向中国和越南进行无线电广播。

一、责成苏联邮电部与蒙古人民共和国邮电部进行谈判，并签订租赁发射机和通讯线路的必要的协定，以便向中国和越南进行无线电转播。为此目的，允许邮电部向蒙古人民共和国派出两名负责人员，期限为10天以内。

二、批准苏联部长会议国家无线电广播电视委员会，关于把对中国和越南的无线电广播各增加2小时的提议。

三、责成苏联财政部在苏联通信部年度外汇计划中，规定出必要的外汇拨款，用于租赁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无线电技术设备以及自1966年起，补充拨给苏联部长会议国家无线电广播电视委员会资金，用于支付节目制作和苏联邮电部租赁的无线电台、通讯频道的费用。

ЦХСД，ф. 4，оп. 19，д. 426，л. 7

№12825

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给予各国共产党的经济援助

（1966年6月24日）

致波诺马廖夫、谢米恰斯内等同志

1966年6月24日

摘自苏共中央政治局1966年6月24日会议第8号记录

绝　密

特别文档

苏共中央国际部的问题

1. 1966年给予财政援助

波利维亚共产党——数额3万美元

(乌拉圭共产党)——数额30 000美元

波利维亚民族解放阵线——数额20 000美元

马达加斯加独立斗争党——数额8 000美元

苏丹人民民主党——数额10 000美元

塞拉利昂全民党——数额500美元

2. 上述资金委托国家安全委员会(谢米恰斯内同志)转交。

中央委员会书记

资料应在24小时内返还，苏共中央(总务部一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第08/54号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7卷，第4331页

№25563

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中央全会报告：与金日成讨论如何对付中国[①]

(1966年5月27日)

……

近来，勃列日涅夫说，我在滨海边疆区非正式地接见了金日成。

……金日成强调说，经过多次的政治局讨论，他们深信，他们离不开苏共中央和苏联人民的深情厚谊。

……关于越南，他们高度评价苏联的援助和我们的一切政治举措。他们清楚地知道关于武器、建设项目和资金，大家都知道我们都做些什么。他们反对、谴责中国的诽谤性的政策，中国人说什么我们的援助微不足道，效力低下，要我们给予更大的帮助。还污蔑我们与美帝国主义勾结在一起包围中国。

……金日成主要是说，要使北越免受轰炸，想出一些关于我们应该怎样对付日益加强的

① 该档案系摘录自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括号内的文字是摘抄者归纳的内容。——编注

空中挑衅的方法，就是派遣飞行员。特别是当前越南朋友已向朝鲜提出这方面的请求，他们也在招募支援者飞行员派遣到越南去。但这件事并不仅限于派遣人员。这里已经形成了一种观念——如果那边有朝鲜的志愿者，也会有其他国家的志愿者。他请我，也请其他人想一想，怎么对付中国的立场，中国人推行的政策是要使朝鲜[1]只象征性地驻有一些外国军队。

金日成同时也直截了当地说，我们需要理解目前越南在对华关系方面的困境，越南靠近中国，中国对它有很大的影响。

……(勃列日涅夫向金日成提起了朝鲜报刊上出现的一些反苏文章。)金日成表示，今后不再刊登这类文章，并说，近两年来他没有与中国领导人会过面。

……(接下来谈论了日本共产党的问题。)金日成请求我们采取措施处理好与日本共产党的关系。

……金日成还说：日本共产党也不同意中国领导人最近采取的政策。

不久前的意见交换以及对立场、通报和观点的总结使我们相信，日本共产党也明显的感到了危险……它想与我们接近，与我们会晤。我们也应采取相应的步骤配合日本共产党，改善与他们的关系。

(在谈到朝鲜、越南和日本共产党的时候，勃列日涅夫指出：)这三个党已经看清，中国共产党在执行大国沙文主义的政策上走得是多么的远，沙文主义的狂热是多么的严重，他们需要与苏联共产党统一观点，需要更加全面地孤立中国共产党的雄心勃勃的挑衅政策。

但是，这三个党由于众所周知的客观原因不能公开地反对中国，我们应该理解这一点。

……

РГАНИ，ф. 2，оп. 3，д. 13，л. 77－89

№25473

中国外交部致苏联驻中国大使馆照会：关于无线电广播宣传[2]

(1966年6月27日)

1966年6月27日中国外交部就苏联外交部1966年5月11日关于中国无线电广播宣

① 原文如此。看内容这似乎应该是“使越南……”。——编注
② 该档案系摘录自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传问题照会的答复照会：

……

世界各国无线电广播电台的工作频率是每个国家自己的事情。

……仅任凭自己随意占据频率，而禁止别人使用，这难道不是百分之百的大国沙文主义？中国外交部想要提醒苏联政府，还是在赫鲁晓夫时期你们就借口说北京广播电台"侵占"了额外的广播波段的频率，对所有频率的中国无线广播进行了疯狂的蓄意干扰。但这丝毫不能阻止真相的传播，即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传播……

АВПРФ，ф. 0100，оп. 59，п. 525，д. 2，л. 15－17

№25953

外交部远东司的报告："九三〇"事件后中国与印尼的关系

（1966年7月8日）

秘　密

文本第85份

1966年7月11日

第2055/ГС号

哈萨克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部

阿拉木图市

发送，供参考。

苏联外交部秘书长

Д. 茹科夫（签名）

"九三〇"事件后中国与印尼的关系

近年来，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之间在中国领导人及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所持民族主义和霸权主义观点的基础上建立并发展了密切合作的关系。中国领导人致力于利用印度尼西亚来强化自己在东南亚的影响，破坏苏联以及印度的阵地。印度尼西亚政府也对接近同中国的关系感兴趣，为了实现自己的民族主义计划——企图在东南亚居于领导地位，把印度逐

出这一地区,苏加诺把中国看作是可供依靠的主要力量。在这场游戏中,苏加诺和北京起了重要作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领导权转到就当代的主要问题持亲中立场的人手中。

在强化自己在印度尼西亚的影响时,中国领导人支持印尼统治集团的民族主义要求。在中国人的影响和压力下,印度尼西亚实质上放弃了不结盟政策,在和平共存的问题上持前后不一致的态度。由于苏加诺政府及其拥护者的冒险行动,造成国内经济形势急剧变坏。印度尼西亚尝试运用中国自力更生的经验没能取得积极成果。中国支持苏加诺的“新兴力量”(НЕФО)思想,反对苏联参与该地区事务,鼓励马来西亚所谓的“对抗”政策。苏加诺在推行这项政策时,没有考虑到本国的现实力量及可行性,结果导致印度尼西亚退出了联合国。中国和苏加诺政府竭尽全力推动组建雅加达—金边—河内—北京—平壤轴心,以实现其构想。

中国政府和印度尼西亚政府就联合努力筹备第一届亚非会议一事达成协议,其中中国极力督促印度尼西亚反对苏联参加会议。在印巴冲突期间,印度尼西亚支持中国的立场,站在巴基斯坦方面,把印度评价为“侵略者”。苏加诺和共产党发言支持中国试验核武器。印度尼西亚报纸发表了对中国进行第二次核试验的评论文章,强调这一事实对亚洲人的“重大意义”——亚洲国家能够生产核武器。

印度尼西亚和中国之间越来越积极和广泛地互派代表团交流。1965 年周恩来访问了印度尼西亚,陈毅、彭真和全国人大代表团等两次到印度尼西亚访问。1965 年,苏加诺(两次)、临时人民协商会议主席沙列赫,以及主要是来自左翼组织的代表团到中国访问。应注意到这样一个情况,在“九三〇事件”前夕,中国人邀请了近 600 名印度尼西亚活动家访问(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6 周年活动)。其中包括 6 位部长、40 位副部长、15 位将军等。

至于经济往来,从 1954 年到 1964 年近 10 年期间,印尼与中国的贸易额增长了 5 倍多。1965 年中国、印尼之间签订了关于航运、经济技术合作和 5 000 万美元贷款协定。在 9 月 30 日政变前夕,在北京签订了关于经济计划合作的协定,根据该协定,中国将在 10 年内向印尼提供总额为 1 亿美元的无息贷款。根据中国贷款义务,到 1965 年末将向印度尼西亚提供 2 180 万美元贷款。但是,中国对印度尼西亚的援助实施得非常缓慢。只是在 1964 年才着手建设一些工程,而这些工程早在 1961 年就应依靠中国贷款建设了。(现在由于印度尼西亚的复杂形势和中国-印尼关系现状,中国停止了对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和技术援助。)

中国领导人选择印度尼西亚(拥有 300 万名共产党员和“右翼”总统)作为论证自己关于推动亚非拉国家革命的狂妄观念的“正确性”。近年来,中国领导人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中散布自己的左倾机会主义观点。他们毫无根据地论证说,印度尼西亚的“革命形势”似乎已经成熟了,并把这样的政治方针强加给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利用前往印度尼西亚访问的中国代表团来广泛宣传中国的特殊观点(例子之一是 1965 年 5 月彭真在阿利亚哈姆科学院的讲演)。中国的积极宣传支撑着艾地的所有行动,其中包括他向苏加诺总统建议武装

1 500万工人和农民。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利用自己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影响来破坏苏联的阵地，削弱印尼同苏共和其他兄弟党之间的联系。这就注定了“九三〇事件”期间的形势的不可避免性。

1965 年之前，印尼共产党领导人最终站到了中国领导层怂恿他们在国内制造革命形势的立场上。作为第一步，决定对军人集团中的右翼进行打击，以便在行动时让使其中立。根据所有情况来判断，中国领导层准备好了政变方针。如 1965 年 10 月下旬中国政府副总理陆定一在同民主德国部长会议副主席泽弗林会谈时表示，中国人考虑了印度尼西亚发生事件可能性，期望印度形势在进一步复杂化的情况下能出现国内战争。

在“九三〇”政变失败后的第二天，雅加达居民收到了中国特务机构通过为新兴力量会议大楼工地运送建筑材料时秘密运输武器的消息，而运送建筑材料无需检查，从 9 月 30 日到 10 月 1 日，这些武器分发给支持翁东中校的青年团体(中国方面没有提出反驳这些消息的论据)。印度尼西亚的许多报纸都谈到中国参与了“九三〇事件”。其中谈到，在大学生进入印度尼西亚外交部时找到了陈毅和苏班德里欧签署的秘密文件，在这份文件中谈到中国方面唆使苏班德里欧及其团伙揭露印度尼西亚军队中一些将军的密谋活动。1956 年 4 月 25 日，印度尼西亚报纸《武装力量报》开始刊登系列文章，论证中国领导人直接领导了政变的尝试，似乎去年毛泽东在同艾地会谈时建议用其他人来取代苏加诺，对反动派军队进行毁灭性打击。

到目前为止，印度尼西亚领导人在自己的公开讲话中都避免触及上述涉及中国参与“九三〇事件”的问题。

军事集团掌握印度尼西亚的政权后，乘机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及国内的进步力量进行镇压，沉重打击了中国的势力。蓄意挑起居民心中存在的强烈的反中情绪和印度尼西亚人对在印度尼西亚经济中占有重要势力的华侨怀有反感的传统，随后，反动力量开始在国内大规模地开展反中运动。右翼政党在煽动反中游行示威过程中，当局直接纵容攻击中国大使馆、贸易代办处和领事馆，开始屠杀和追捕华侨，号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断绝外交关系，没收华侨的财产和把他们驱逐出印度尼西亚。1956 年 3 月 25 日，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通报了关于“临时关闭”新华社雅加达分社的消息，全面关闭华人学校，开除各机关中的亲中分子。

政变失败后，中国持观望态度。只是到了 1965 年 10 月 20 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标题为《印度尼西亚局势发生剧烈变化》的消息，明确指出支持“九三〇运动”追求的目标。在报道中援引了《人民日报》(Хариан ракъят)[①]对运动的评价：“是一次爱国的和革命的运动，毫无疑问，人民将会继续支持这一运动。”

在催促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人在没做好准备的条件下就发生政变后，中国领导人处于观望态度，当时在镇压政变后开始在国内追捕进步力量，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遭到了一系

①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机关报。——编注

列沉重打击。正如稍后西方媒体所说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人请求中国对印度尼西亚事件进行干涉,以便停止对共产党人的迫害,但这一要求没有得到答复。

中国媒体直至今年3月才对迫害华侨提出抗议,而没有关注印度尼西亚右翼力量的牺牲和损失。

中国递交了20多份抗议印度尼西亚当局行动的照会。在中国外交部1966年4月12日的照会中中国方面表示:"印度尼西亚政府应义不容辞地维护中国侨民的权利和利益","有义务允许那些受到迫害,同时表达了返回祖国愿望的侨民回中国"。照会中还要求印度尼西亚政府"立即提供船只运送那些希望回国的中国侨民返回中国"。

中国政府多次警告印度尼西亚政府,印尼方面的行动可能破坏中国与印尼外交关系,所产生的一切后果均应由印度尼西亚方面负责。在1956年4月15日的照会中,鉴于中国驻雅加达大使馆受到冲击,中国外交部声明:"印度尼西亚政府所做的一切将导致两国关系的完全破裂。"

在对印度尼西亚事件持观望态度半年之久后,中国领导人期待能防止印尼-中国关系恶化,在某种程度上维持自己在这个国家的势力和保护中国侨民的利益。但是,在印度尼西亚局势持续恶化和因印度尼西亚当局的行动造成印尼与中国关系复杂化的条件下,中国持更为坚定的立场。

中国媒体开展了直接抗议印度尼西亚新政府领导人,抗议迫害和杀害共产党人的运动。

在1956年5月11日的中国和阿尔巴尼亚联合声明中指出:"双方强烈谴责印度尼西亚右翼军官的法西斯暴行,他们篡夺了印度尼西亚政权,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和其他进步活动家进行血腥镇压,强烈谴责印度尼西亚右翼力量攻击中国和迫害中国侨民的暴行。"在中国媒体上出现了一系列文章和评论,把印度尼西亚事件评定为"左翼军官集团在美国的支持下通过政变的形式夺权行动",而新的印度尼西亚领导人被评价为"印度尼西亚的右翼军事集团","忠于美帝国主义的间谍","反动的军事制度"的行动"甚至比希特勒法西斯分子和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行为更为恶劣",等等。在《北京日报》和《工商日报》中把纳苏蒂安评价为"印度尼西亚军事集团的匪首",而苏加诺被评价为"沾满印度尼西亚人民鲜血的刽子手"。看来,此时中国领导人尝试采取措施为自己在"印度尼西亚事件"中的投降路线平反。正是这里应该看到中国尝试把印度尼西亚的悲剧归罪于苏共和苏联共产党。在关于印度尼西亚问题的材料中,中国媒体把苏联报刊介绍印度尼西亚事件的消息评价为论证"印度尼西亚右翼力量的行动"的正确性。在中国报刊刊登了新西兰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会议材料,摘自阿尔巴尼亚的文章,和其他一些报纸谈到"关于现代修正主义分子支持和声援印度尼西亚法西斯军官集团"的文章。今年5月14日,《工商日报》刊登了标题为《苏联修正主义分子全力扶植印度尼西亚法西斯军事集团》的文章,强调苏联对印度尼西亚的军事援助,指出:"苏修不仅不反对印度尼西亚右翼军事集团的血腥罪行,同时还把杀害印度尼西亚人民的纳苏蒂安称之为'革命领导人'。"

事实表明,印度尼西亚事件是对中国最为沉重的打击,是中国去年外交战线的巨大失

败，导致中国领导人对印度尼西亚期望的破灭。鉴于目前印度尼西亚右翼集团正在国内大规模开展反中运动，极有可能采取改变同中国关系性质的方针，中国领导人开始制定新的对印度尼西亚策略。

至于印度尼西亚右翼集团，正如事件所显示的，他们不想公开从事进一步恶化中国、印尼关系的活动，不想承担中国、印尼外交关系破裂的责任，他们担心中国会走上直接支持国内反对派运动的道路，动员转入地下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开展武装斗争。今年4月18日，印度尼西亚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阿达姆·马利克表示："和以前一样，印度尼西亚希望保持同中国人民的友好关系。"

但此时印度尼西亚人明白，北京—雅加达轴心不复存在了，印度尼西亚应该采取独立于中国的立场。印度尼西亚右翼集团已经在修正苏加诺的外交方针——开始同马来西亚就协调关系问题进行谈判，采取措施让印度尼西亚重返联合国，印度尼西亚政府极为重视巩固同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以便得到新的贷款，等等。

同时不能不指出，印度尼西亚国内关于未来印尼、中国关系的观点争论得越来越激烈。如果说苏加诺总统及其拥护者支持维持和进一步发展印尼同中国之间的关系，那么，右翼政党则要求重新审视同中国的关系，以便调整对外政策，加强同西方的联系。中国、印尼今后关系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印度尼西亚内部政治力量的对比情况，以及中国领导层对这个国家将会采取的政策。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

1966年7月8日

Мб－3750/гс

第843号

ЦГАРК，ф. 1955，оп. 2，д. 295，л. 214－217

№11469

外交部提供的背景资料：关于向越南派遣志愿人员

（1966年7月9日以后）

7月4日，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范文同在同苏联驻河内大使谈话时说，根据越方的意见，希望能将下述条文写入华沙条约成员国政治协商委员会声明：

华沙条约成员国声明,自己准备派遣志愿人员去越南以共同反对美国的侵略,如果越南人民表示同意的话。

范文同认为,这一条文可以这样写:

应越南的请求,华沙条约成员国准备派遣志愿人员以共同反对美国的侵略。

范文同在说明这一建议时指出,关于志愿人员的问题并不是新问题,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都曾发表过声明。由于前不久美国空军对河内郊区和海防郊区的空袭,志愿人员的想法现在具有特殊的意义。

如同以前一样,他继续说,主要是指政治目的:以最有力的形式显示社会主义国家的战斗团结——声明准备派遣志愿人员。至于这一点的实际实行情况,那么我们正在考虑这个问题,并在必要的情况下准备同其他兄弟国家讨论这一点。

关于可能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派遣志愿人员的问题,Л. И. 勃列日涅夫 1965 年 3 月 23 日在红场庆贺宇航员的群众大会上讲话时最先说过。Л. И. 勃列日涅夫声明:"我们的中央机构收到不少苏联公民的呼吁,表示准备参加越南人民争取自由与独立的斗争。我们很理解苏联人在这些呼吁中亲自表达的兄弟团结和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的感情。"

后来,这一思想在 1965 年 4 月 17 日苏越联合公报中也得到了反映:

"如果美国强化反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略。苏联政府在必要的情况下,在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请求时同意苏联公民前往越南,因为他们遵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情感,表达了为越南人民的正义事业,为保护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社会主义成果而战斗的愿望。"

苏联最高苏维埃 1965 年 4 月 29 日在答复越南民主共和国国会向世界各国议会的呼吁时也有类似的话。

在此后大约两年的时间里,在苏共和苏联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中以及苏方的官方声明中,关于派遣志愿人员去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话题再也没有提及。

在最近几个月里,这一问题又提了两次:苏联陆海军总政治部主任 A. A. 叶皮谢夫,在苏共第二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和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呼吁书提起过。

比如 A. A. 叶皮谢夫在苏共第二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言时说:"为了回答美国黩武主义的强盗行径,有数千人及一些部队的人员都要求:随时准备作为志愿者去越南,为灾难深重的越南人民的自由而战斗。"

苏联列宁主义共青团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致苏共中央的呼吁书中指出,"代表大会以苏联青年的名义声明:如果需要,苏维埃国家、十月革命国家的千百万志愿者决心挺起胸膛同越南兄弟肩并肩地保卫人民的神圣权力,保卫社会主义的成果"。

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如古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保加利亚政府也发表声明,准备派志愿人员去越南。例如,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访问保加利亚的联合公报(1965 年 9 月)指出:"……如果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提出要求,保加利亚人民准备派遣志愿人员同越南兄弟并肩战斗,反对侵略。"

无论是越南领导人的讲话，或是越南政府及外交部的声明，一般都未提及外国志愿人员的话题。与此同时，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无疑经同河内协商后，不止一次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例如，1965 年 3 月 22 日提出有名的 5 点建议的阵线声明指出："如果美帝国主义者，继续派遣美国及其仆从的作战部队到越南南方，并继续将战火扩展到越南北方和老挝，那么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将呼吁各国人民派遣青年和军人来越南南方，同南越人民一道消灭共同的敌人。"

1965 年 6 月，以"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名义发表的声明强调指出："由于美国政府的擅自授权，命令美国军队参加在南越的军事行动，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也就有权在必要的时候，呼吁北越和各友好国家派志愿军来南方抵抗美国的侵略。"

关于派遣苏联志愿人员去越南的问题，主要是在苏联党和政府代表团谈判过程中，按照越方的倡议，曾不止一次地秘密进行过讨论。越南同志的观点基本上是：他们首先需要的是军事技术装备和军事技术物资方面的帮助，至于人力资源，越南并不缺。有人曾向越南劳动党领导人提示过：在紧急需要的时候，越南方面可以请求派志愿人员。

苏联外交部东南亚司

ЦХСД，ф. 5，оп. 58，д. 262，л. 82 - 85

№11468

巴卡耶夫致苏共中央报告：海运部向越南运送物资问题

（1966 年 7 月 18 日）

致苏共中央：

根据苏联大使从海防发来的第 690 - 691 号电报，海运部将报告海上航行的态势和海防港的工作条件。

海军部未曾中断从苏联各港口派遣装载货物的苏联船只开往越南。约有 20—22 艘船只连续不断地从事向越南的运输活动，这不仅为从苏联对外的运输，而且也为北越同其他各国的外贸联系提供保障。截至 7 月 18 日，向越南运输的形势特点如下：在越南各港口停泊有 8 艘船只，载货总量约 4 万吨。正在开往越南各港口的船只有 8 艘，载运各种货物约有 5 万吨。在苏联各港口正在装货运往越南的有 3 艘船只，货运总量有 2 万—2.5 万吨。有 4 艘船只在从越南返回时，部分运载碎石，另一部分运载越南的货物开往日本。

根据苏联船长们的通报，最近 10—15 天以来形势仍在迅速地复杂化，在轰炸时，苏联船

只越来越处于危险的海域。例如：7月7日，“苏维埃茨克”号轮船停泊在码头附近，正处于直接轰炸的区域，有一枚炸弹在离船350米的地方爆炸，而敌机用机枪从离船舷只有100米远的地方对停泊在距“苏维埃”号不远的越南军用快艇进行点射。在“共青团”号油轮停泊区不知从何处投下了5个金属物。几乎所有进入东京湾的苏联船只都遭到飞机的侦察和驱逐舰的跟踪。比如：7月13日，当“印古尔”号冷藏船开出东京湾的时候，一群飞机在其60—80米高的上空直接进行长达20分钟的观察飞行和俯冲。在中国的海南岛和越南的海岸间，在东京湾的入口处有2—3艘航空母舰在值勤。一艘巡洋舰和6—8艘驱逐舰在围绕着这些航空母舰连续不断地航行着。苏联船只实际上是被迫在飞机连续不断地观察和舰艇不断跟踪的情况下，通过被航空母舰、驱逐舰和飞机从空中封锁的海域的。

通过对苏联船只最近在海防地区工作条件的分析，海运部认为必须报告如下情况：

1. 越南海军当局人为地拖延苏联船只卸货，认为在海防港地区苏联的船只越多，该港口的形势就越安全。因此，6月25日就已抵达海防的“古利阿”号轮船实际上是7月12 13日才开始卸货；运载1万吨汽油的“共青团”号油轮自6月20日起就停泊在海防海域，至6月28日仍未卸完货，自6月28日至7月5日卸了3 500吨货，7月5日起再次未卸货并停在泊地，说是卸完货不会早于7月底。

其他船只的情况也是如此。

2. 苏联船只停在危险地区的旁边，比如防空岸炮连旁，显然是说，由于其旁边有苏联船只而使美国人放弃对这些炮连的轰炸，也可能是根据某些人士的愿望来构成一种被迫的局势，使苏联的船只被炸毁。

3. 在空袭时，军用快艇就靠向苏联船只的船舷并从苏联船只的船舷下开火，这样就可能使美国飞机的火力指向苏联船只；还有停在旁边的中国船只用自动步枪开火的情况。

4. 在 -次空袭时，-些不明物从美军飞机上被投到海防水域。可以认为这是深水水雷。我们请求越南朋友进行检查。越南朋友对我们的请求非常冷淡，实际上并未很好地检查。同时7月10日越南引水员引导中国船只绕过危险水域，而7月11日却有意让苏联的“车里雅宾斯克”号轮船直通过危险水域，显然是想用这种方法检查是否真有这种深水水雷。这明显地使苏联的船只置于危险之中。越南引水员并未通知苏联的船长有否危险。

美国的海军和空军实际上已经封锁了进入东京湾水域的国际航道。这显然是美国的侵略行动，它粗暴地破坏了世界各国公认的公海自由的准则。美国的这种侵略行动和军事挑衅行动对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国家的贸易安全构成威胁。

考虑到美国并未正式向苏联宣战，上述水域还不是军事行动的水域。

海运部认为采取以下措施是适宜的：

1. 通知越南朋友：苏联方面将不会停止向越南各港口派遣满载货物的船只，同时提请

越方注意必须不让海运当局和港口当局延误苏方船只并对他们构成威胁，同时采取必要措施最大限度地加快苏联船只的卸货和装货。

2. 委托对外贸易部和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向越方讲明，在当前战争条件下那些不可能使用的货物是否可以暂时停止运送，以便减少海防港不必要的负担。现在，从苏联运来的大量货物堆放在海防市内的公园里、街道上，并没有被利用。

3. 鉴于美国正不断加强通往北越的海上通道的侵略行动，或者通过专门的照会，或通过联合国要求美国停止在海上贸易航道上的军事挑衅行动，以便把美国这个无端不宣而战，在法律上处于被告地位的国家，置于世界舆论面前。

海运部长

B. 巴卡耶夫

ЦХСД，ф. 5，оп. 58，д. 262，л. 38－41

№25952

外交部东南亚司的报告：关于越南局势的问题

(1966 年 7 月 20 日)

绝　密

文本第 22 份

1966 年 7 月 21 日

第 2162/ГС 号

哈萨克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部

阿拉木图市

发送，供参考。

苏联外交部秘书长

Д. 茹科夫(签名)

关于越南局势的问题
(情况报告)

越南局势的发展向着更危险的方向转变。这涉及不仅是北越的局势，也包括南越。美

国加强了对越南人民的侵略,并计划把军事行动扩散到老挝和柬埔寨的领土之上。

虽然苏联政府给了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大量军事援助,首先是在组建防空力量方面,这使北约的一些主要地区免受轰炸。但是美国人的空袭给越南民主共和国仍然带来了严重的损失。大量的工业企业、桥梁、道路遭到了破坏,交通部门和工业企业陷入极度困难的境地。社会主义国家通过铁路与河内的联系也经常中断。事实上,北越的所有大城市,除了河内和海防都遭受了严重的破坏。最近美国人扩大了对北越城市的轰炸范围,飞机轰炸已经接近了河内和海防。实际上,从6月底到7月初,大量的空袭都针对河内和海防附近的油库。

美国飞机对北越的空袭造成了大量物质上和人员上的损失,同时也引起了越南民主共和国居民中某些意志薄弱者的悲观主义情绪。

南越的局势持续恶化,美国人和西贡政权顺利地、有步骤地发动了针对南越民族解放阵线的战役。爱国者的根据地经常遭到大规模的空袭。为了避免损失过多的有生力量,阵线领导人把一定数量的正规武装撤到与南越交界的老挝人的区域里,以便他们能够得到休整。南越民族解放阵线的控制区域在逐渐缩小,尽管在官方宣传中越南朋友仍然坚持说,爱国者控制了南方4/5的领土。

目前,美国人显然没有坚决的采取军事行动反对南越的爱国者力量。他们尽量增加自己在南方的军事力量,到1966年底将达到28万人,而根据美国媒体的消息,则要达到35万—40万人。到越南的雨季结束,在越南的美国人,大概就将对南越的爱国者发动更大规模的战役了。

近几个月,在西贡政权控制的地区政治局势相当紧张,但是不应该对这种政治局势有过高估计。阮文绍、阮高其军事集团在美国人支持和帮助之下仍然控制着南部,越南同志在越南劳动人民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上承认这一点,并指出,傀儡军队共计有60万人,他们还保有实力来镇压南越居民。

越南劳动人民党领导人从这样的观点出发,解决越南问题可以走这样的道路,那就是要进一步的发展武装力量来反对美国人和西贡政权。

同时越南的同志们提出了别出心裁的对越南问题的政治解决方案,如果美国接受它的话,可能会为实现越南人民斗争的基本目标提供保障。

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态度在1965年4月8日著名的范文同的四点纲要中表现出来。

这些要点所表达出的观点反映了对和平的兴趣,这是讨论在越南政治调停的首要基础。但是,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领导人并没有补充其他的一些条件,也没有在政治调停方面做任何实际的工作。除此之外,做出了一系列十分坚决的官方声明。这些声明事实上已经否认了在现阶段政治解决越南问题的可能性。1965年底到1966年初,越南民主共和国和美国政府有过非正式的接触,但是越南方面仅仅局限于四点纲要的表述,拒绝对对方的提议进行讨论。

最近越南民主共和国对政治调停的态度更加严苛。例如,胡志明对越南问题的态度,他在今年7月17日河内的一次公开讲话中提到,越南人民准备战斗5年、10年、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河内和海防等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城市都有可能被毁灭,宣布在越南北部进行局

部动员，也就是说，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导人倾向于走武装斗争的道路解决问题。

越南同志似乎反对把越南问题交给联合国来讨论，他们不接受纳赛尔、吴丹和其他人提出的所有有关调停越南冲突的计划和建议。

越南同志们主要表达了这样的意思，这同时也是越南方面可以接受的问题(美国停止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进攻，美国和他的盟友们从越南撤军等)，还包括了这样的条件，在南越实现“停火”。

除此之外，越南同志反对亚非国家提出的任何有关解决越南问题的提案。在另一方面，他们希望这些国家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发言强烈反对美国侵略者。结果是许多亚洲和非洲国家都不再积极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

越南的军事政治环境越来越糟糕，亚非国家和国际舆论开始对越南问题失去兴趣，显然，越南劳动党领导人不能不认真考虑与越南政治调停的可能性有关的这些问题。

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成立了以中央政治局委员长征为首的(其中包括黎笋、范文同、武元甲、阮基石)特别委员会，该委员会被授权全方位地研究越南的战争与和平问题，考虑兄弟党的建议，对越南劳动党今后的路线做出自己的判断。

有消息称，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黎笋提出了和平谈判的原则，根据他的意见，目前，他们的条件并不好。这就造成了这样一个印象，越南劳动党领导人对待调停路线的意见并不统一。

对近期事件的分析可以证实，美国政府将重新审视越南问题，并考虑采取措施增强美国在南越的军事力量，美国对越南的政策将更加严厉。

尽管美国人继续说准备在越南实现“和平调停”，希望“谈判”等。但是美国官方代表一贯认为，他们能够在越南取得军事上的成功，并用“朝鲜模式”来解决越南问题。这实际上就是要把越南问题拖延下去，把越南的统一纳入不确定的时间。

英国政府支持美国在越南的侵略政策。尽管他们不完全赞同美国侵略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某些具体的方式。事实上，威尔逊并不同意不久以前美国飞机轰炸河内和海防附近的油库。

英国官方认为，不能用军事手段解决越南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必须召开一次有关越南问题的会议或者签订某项条约。根据英国人的意见，召集一次类似 1954 年那样的国际会议，英国人认为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因为约翰逊也表达了在没有先决条件的前提下和越南进行谈判的意思。

法国政府认为，在越南恢复和平的主要方式是通过政治活动。根据法国人的意见，解决这个问题应该回到 1954 年日内瓦会议的道路上来，但是现在和那个时候的情况不一样，军事斗争还没有结束。

法国官方承认，在未来的谈判中，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作为一方，没有他们参与不可能解决越南问题，但是民族解放阵线在未来会谈中的参与不应该作为一项先决条件，阵线代表在会议开始之初可以被邀请来参加会议。

范文同的态度(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四点纲要),如果他们接受这些(指四点纲要)作为谈判的基础,那么,根据法国人的意见,这将不作为召开会议的先决条件。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苏越关系的改善十分不满。同时,他们担心战火烧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报纸仍然反对任何寻求在越南进行政治调停的途径。中国人目前在越南问题上的立场就是由这些因素决定的。实际上,中国在越南冲突中采取的路线可以表述如下:中国人在极力展示从越南局势中退出的意图,如果美国人不对中国领土构成现实威胁的话。

越南问题被中国报纸所利用,首先是对苏联和苏联共产党进行诽谤性的指控。

客观地说,中国现阶段在越南问题上的立场是在迎合美国人,会使美国人轻松地实现在越南的侵略活动。

苏联外交部东南亚司
1966 年 7 月 20 日
Мб-3947/гс
第 895 号

ЦГАРК,ф. 1955,оп. 2,д. 295,л. 183-185

№25949

外交部远东司的报告:苏共二十三大和中共的立场

(1966 年 7 月 25 日)

机 密
文本第 32 号
711/дв
1966 年 7 月 27 日

苏共二十三大和中共的立场
——对苏联驻华大使馆 1966 年第二季度政治信函的评述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力于团结的方针,在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统一行动的实施不

仅为苏中关系和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改善提供了可能，而且为中国共产党克服民族主义和其他已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障碍的现象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在由勃列日涅夫署名的、苏共中央委员会1965年11月28日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信中讲道："我们深信，苏联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苏联人民与中国人民，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全体人民一样，在与帝国主义作斗争、反对剥削和压迫、争取民族解放、建设共产主义社会摆脱殖民压迫中有着共同的目标。"

但是，1966年1月7日中共中央在致苏共中央的回信中支持了1965年11月11日《人民日报》和《红旗》的分裂立场，以侮辱性的口吻提出了荒谬的最后通牒，即"真正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思想，彻底结束你们在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期间以及在赫鲁晓夫离任后犯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错误，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道路上来"。

1966年1月以A. H. 谢列平同志为首的苏联代表团经越南对北京进行了访问，这次访问为苏联和中国领导人在代表大会前夕进行个人之间的接触提供了另一次机会。然而中国人示威性地不肯利用这次机会，而仅限于对代表团进行礼节性的会见。

为了向中国共产党显示诚意，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邀请信，邀请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领导人携家人来苏联休假。此信并未收到回复。

3月1日向中国人转交了1966年2月24日由勃列日涅夫同志署名的致中共中央委员会及毛泽东的信，信中邀请中国代表团出席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中共领导人在3月22日对这封友好来信作了回复，他们不仅拒绝了邀请，还诽谤性地指责我们党及其领导人。中国人在这封信中声称所谓"苏共的领导已经变成了当代修正主义的中心"，苏共中央似乎将自己放在了"反对美帝国主义人民阵线的队伍之外"等。这封信中尤其要注意的是，结尾部分提到，当遭到来自帝国主义的侵略时，苏联如果"进行坚决的抵抗"，中国将会和苏联肩并肩共同与敌人作斗争。①

中国的领导人已经试图着手在国际国产主义运动中建立反对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的某种阵营。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缅甸、马来亚、泰国、日本和新西兰的共产党拒绝向我们的代表大会派出代表。

虽然在关于处理与苏共二十三大关系的事情上中国人成功地拉拢了那些抱有指责态度的党派，但是总的来说，他们的努力并未在这个方向达到预期的效果。中国人不仅未能扩大自己盟友的数量，而且也无法阻挠那些当时拒绝参加1965年莫斯科协商会议的党派来参加苏共代表大会。越南劳动党于1966年1月在以A. H. 谢列平同志为首的苏联代表团在河内停留期间宣布向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派出代表团，这一决定严重打击了那些分裂分子们。虽然中国人继续向河内和平壤施加压力，然而他们并未能防止除阿尔巴尼亚外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派出党的代表团参加代表大会。根据已经掌握的消息，最后就连中国人向越南领导人提出的哪怕降低越南劳动党代表团的级别的要求都没有达到。

---

① 下划线为原文所有。——编注

苏共代表大会前夕,中国人安排了以总书记宫本显治为首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团对中国的访问。宫本显治在这里受到了政府首脑级别的招待。中国对此次日本代表团访问大肆宣传,试图欺骗自己的人民,蒙蔽他们的意识,让他们以为在同苏联共产党的斗争中中国有很多盟友。然而,虽然宣布了要进行正式的"谈判",但宫本显治对北京的访问没有发表任何阐述共同立场的协议。根据报刊消息,宫本显治返回日本后证实,北京并未迫使日本共产党拒绝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代表大会。

同时,具有典型意义的是,缅甸、马来亚和泰国的共产党对于拒绝派代表出席苏共代表大会并未说明原因,在他们的回复中并未包含任何对苏联的攻击。

中国为反对苏共二十三大进行了很多大规模的宣传活动,企图向中国人民证明中国共产党的分裂主义领导的正确性,在自己的拥护者面前展现自己反对苏联方针的决心和必要性,给自己的兄弟党派施加压力。中国的宣传开始声称,正是中国共产党继承了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的经验,他们成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旗手",毛泽东思想是我们这个时代唯一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所以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想法都是与革命利益和人民利益相敌对的,因此应该视为"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对象。

中国的宣传试图毫无根据地向干部和平民暗示,苏联开始走向了"恢复资本主义"的道路,"90%的苏联人民想要革命"。对此,中国的报纸不停地进行愚蠢的(包括致苏联领导人的署名文章)的攻击和恐吓。比如《人民日报》1966 年 2 月 2 日写道:"全世界人民永远不会原谅他们。苏联人民也不会原谅他们。他们逃脱不了历史的惩罚。"他们还对苏联经济建设经验和苏联对中国提供的援助进行变本加厉的辱骂。

尤其是在代表大会前夕和召开期间,中国大肆宣传对苏联对外政策的攻击。苏联政府几乎所有的关于巩固和平和全世界合作的对外政策都遭到了抨击。很明显,通过歪曲这些政策,中国的宣传希望把此作为"中国包围"的一个手段,并且宣称苏联共产党代表团在蒙古"干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塔什干的谈判"是美苏合作的成果","是亚洲和非洲地区反帝国主义的削弱",今年年初,一些苏日协议(关于航线等)的签署是"对日本反动派的妥协",是"苏美合作在苏日关系中的扩大"等。

中国还试图中伤苏联对越南人民提供的帮助。1965 年 12 月 30 日,陈毅在日本记者的采访中说,苏联的帮助似乎"存在着特殊的目的",并非发自内心,而是企图"控制越南,以此将越南问题的解决拉到美苏合作的轨道上"。陈毅说,苏联给予的帮助"无论是在质量还是在数量上都与苏联的实力不符"。带着明显的教唆目的,他说道,苏联的军事装备"可以通过海上运输",苏联可以"采取多种手段牵制美国,但是苏联领导人并未这样做"。

怀着所有类似的想法,中国人认为苏联共产党和苏联的目的是"与美国一起占领全世界"建立"包围共产主义中国的包围圈","与美帝国主义组成反对中国,反对社会主义解放运动,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神圣同盟'"等。

中国领导人向党和人民隐藏了苏共二十三大的材料和决议。在官方报纸上甚至没有刊登代表大会开幕和闭幕的消息,没有提到外国代表参加会议的内容。

并且，通过半公开报纸《参考消息》不断发布关于苏联，苏联共产党和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的虚假报道。

中国领导人拒绝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并且还暗示自己的人民和全世界社会，声称这并不会把中国和革命力量隔离开，中国拥有全世界广泛的支持，处于“政治进攻”的状态。为了制造这种有利的假象，中国人采取了一系列吸引人们注意力的手段。二十三大召开前期，他们派刘少奇访问巴基斯坦。中国举行了很多大会(尤其是在以宫本显治为首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团来访期间)“支持美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在这些大会上宣布中国共产党是革命的党，世界革命人民站在他们这一边，不是中国人被孤立了，而是“当代的修正主义者”被孤立了。

中国领导们想出来了一个作为对苏共二十三大的回答的政治举动，那就是邀请以谢胡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在中国庆祝五一劳动节。这次访问被称为“对苏共二十三大之后修正主义的严重打击”。它导致了中阿的反苏好战主义。1966 年中国的五一劳动节有史以来第一次打起了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口号。现在中国高层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也已经开始了肆无忌惮的反苏讲话。他们不断重复中国对苏联和苏联共产党的虚假宣传，似乎在争相毁谤我们的党和党的领导。

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一直在重复关于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不可分割性”。邓小平在上海的一次大会的讲话中阐明了毛泽东关于建立“唯一的反对美帝国主义阵线”的“革命”口号的反苏内容。邓小平说，这个阵线应该“不是狭隘的，而是最广阔的”(中国人去年还说不会拒绝与“许多民族主义国家的上层阶级代表”和西方“部分资产阶级垄断者”隔绝)。他还说，这个阵线应该是“真正的，而不是虚假的”，“由苏联共产党领导的集体……当然不能进入这个阵线”。

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在中国期间，中共领导人对苏联共产党的威胁通过“力量的展示”得到了加强。5 月 9 日胜利日这一天，中国进行了“含有聚变材料的核爆炸”。在官方的“公告”中宣称，这次爆炸是“为了反对美国在与苏联的勾结中实现的核垄断和所有被压迫人民和民族革命斗争受到的核爆炸威胁”。同时还刊登了巴基斯坦报纸《黎明报》采访周恩来的文章，文章强调，中国不会主动发起对美国的战争挑唆。

在访问中国期间，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谢胡、凯莱齐、卡博对自己的主人随声附和，谈到了“对抗意识形态系统的不共戴天的斗争”，并声称斗争将持续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最终战胜修正主义，等等。

阿尔巴尼亚人非常愤怒地指责那些持“中立”立场的党派(显然首先指的是越南劳动党和朝鲜劳动党)，向所有党派证明他们必须确定站在斗争的哪一边的必要性。

5 月 15 日发表的中阿联合声明充斥着反对苏共二十三大和苏联领导的言论，这些言论来自中国和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在访问期间的讲话。声明的作者要求“以双倍的努力将”反对苏共的“斗争进行到底”，“毫不放松”，决不妥协，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答应停止“辩论”和党派斗争，“在政治上、意识形态上和组织上要划清界限”，“无论如何绝不走统一行动”的道路，

等等,完全公开地表明了颠覆苏联事业的企图。声明还说道:"中国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确信,修正主义在苏联的统治是暂时的现象,并相信伟大的苏联人民具有不可估量的革命力量。"两党宣称"对苏联人民兄弟般的帮助是崇高的责任"。

大使馆认为,拒绝派代表团参加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是特定时期出自维持国内政治秩序的考虑。

在"调整"时期,中国的领导成功地清理了国家经济建设中的许多冒险主义实验的严重后果,使工业状况趋于规范化,恢复了农业生产,保持了金融系统的稳定性,等等。

然而经济快速稳定发展的任务仍然没有完成,没有弥补"大跃进"时期浪费的时间。根据我们的评估,1965 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大约是 1 770 亿—1 800 亿人民币,也就是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 年)指标的 83%—85%。其中工业产值低于 90%,而农业产值大约为 75%。1965 年在工业上的投资额不到 1958 年的一半。居民生活水平还很低。第二个五年计划预计将工人和职员的工资以及农民的收入增加 25%—30%,实际上在过去的 8 年中,工人和职员名义上的平均工资仅仅涨了大约 3%—5%,而他们的实际工资以及农民的收入甚至只是持平。粮食问题则尤其严重。人均粮食产量由 1957 年的 282 公斤下降到 1965 年的 267 公斤,只是 1952 年的水平。在军队以及军事尤其是原子工业的加速发展上的支出给国民经济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很早之前承诺的第三个五年计划至今还未公布,也未确立。没有关于中国 1966 年的预算和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信息。报纸评论道,现在还找不到国民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的新的解决方案。

想通过"拧紧螺丝"的办法来改善复杂的国家经济状况是中国紧张的内政形势采取的基本原则之一。毛泽东及其周围的人不惜任何代价要证明自己方针的正确性,并且紧握手中的权力,用独裁的手段管理国家内部,越来越趋向于用镇压措施来抑制不满情绪和可能存在的反对力量。故意制造"阶级斗争形势恶化"的局势,搜寻镇压所有的"敌人"、"反党分子"、"内部修正主义者"。同时还出现了对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宪法基本要求的忽视。将近 10 年没有召开中共代表大会,自 1962 年起不报道关于全会的消息,不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例会。

苏共二十三大之后不久,中共就开始更迭党和国家机关以及文化和教育机构的领导干部。在一个名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运动中,第一步就提出了发现和清除所有同情苏联和苏共政策的人员的要求,防止中国走苏联的道路,这条道路被中国的宣传描述为"资本主义的复辟"。朱德在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的会谈中讲到,中共最主要政治任务是"完全清除内部修正主义者,防止中国走苏联道路,消除苏联对中国的影响"。

苏联的影响被视为当前制度和政策方针的最大威胁。6 月 4 日《人民日报》在社论中说,反对形成于 10 年前的当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可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平等的、和平共处的关系"。还指出,现在"在毛泽东思想的拥护派和反对派之间"存在着斗争,《大公报》7 月 13 日宣布:"毛泽东是当代的列宁。谁反对毛泽东思想,谁就是我们

的死敌。”报纸上，广播里，会议上经常揭露“内部修正主义分子与苏联在中国国内进行犯罪活动中”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关系。

因此，在我们的代表大会之后，中国进行清洗目的是为了压制党和国家内部出现的对中共与苏共关系方针正确性的怀疑，并引发对苏联的敌意的增加。

中国领导人之所以做出拒绝参加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的决定，是因为他们明白，如果派代表团参加我们的代表大会，那么现在我党的思想和关于苏联的真相将必然更广泛地在中国传播。

同时，中国领导人拒绝参加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也显示了我们党对团结的错误估计。尽管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三大有了路线上的部分调整，中国人还是不愿停止通过讹诈和威胁、通过在意识形态上发动攻击、通过进行政治阴谋使苏联做出重大让步的妄想，哪怕是部分改变对苏共二十大到二十三大的路线的看法。

拒绝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以及拒绝的形式，显然都是在试图利用国际主义对苏联人民——他们非常关切与帝国主义斗争中的团结问题，对我党施加压力。他们显然是在打算迫使苏共二十三大在中心工作中提出中国问题，从而将大会的注意力从共产主义建设的迫切问题的讨论上转移开，引起分歧和矛盾，得以有机会将共产主义运动和反帝国主义阵线的分裂的罪名加到苏共的头上。

在共产党确定其同苏共二十三大的关系时，其对外政策上的目标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这个目标就是希望通过向西方国家展示自己反苏政策的不动摇性来换取西方与中国关系的扩大和鼓舞国外的拥护者，从而制止那些在我党推行的团结政策的影响下的“马列主义力量的分化”，拒绝参加二十三大还是对兄弟党施加压力的一种方式，企图阻止共产主义运动和那些与北京的霸权主义图谋背道而驰的进步力量实现团结。

中国拒绝派代表团参加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毫无疑问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是中国共产党为了自己的民族主义目标而开始的一个新的阶段的斗争。这个目标是党和国家最近几个月以来政治方向上的一个质的转变。

在内政方面，这一转变包括拒绝走苏联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领导的国家走过并正在走的发展道路。同时，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走的道路和之前的“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模式已经互相抵触，而原则上，就像是走向“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面经验”，因此对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利。具有代表性的是，不仅苏联1956年之后的政策遭到批评，被批评的还包括苏联共产党针对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出的口号(“干部决定一切”，“技术决定一切”等)。中国推出了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运动，这其实就是中国的反苏主义加强，就是同打着“建立全新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口号根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斗争的加强。

借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掩盖，中国领导人宣称，他们将只按照“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发展，根据这一思想，“谁战胜谁”的问题要到“一百年甚至几百年”以后才能解决。

在对外政策方面，体现在对“美国是最主要的敌人”这一口号修改以及正式宣布苏联具

有和美国一样的敌对性的方针上。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斗争和反对以苏共为“中心”的“当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被当作“两项不可分割的任务”。邓小平发出了现阶段具有代表性的口号,也就是既不和美帝国主义联合,也不和苏联联合。然而他接着又说,更不愿意的是与苏共联合,因为“当代修正主义扮演着任何帝国主义者、任何反动分子和老牌修正主义叛徒都扮演不了的角色”。

恰恰就在苏共准备召开二十三大期间,美国开始加强了美中关系的改善,采取了协调相互关系的步骤,提出了向中国出售粮食的建议。

从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角度来看,中国拒绝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是为了划清界限而走的重要一步。这一路线于 1965 年 11 月 11 日的一份文章中被提出,并在 1966 年 1 月 7 日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一封信中被证实。

中国领导人对苏共二十三大的反应,以及最近一年半以来对苏共在苏中关系正常化方面所做出的努力的否定证明,现在的中共领导人越来越将自己的命运与深化自己的方针联系在一起,与反对苏共和苏联的斗争联系在一起。

苏共二十三大之后,中国领导人虽然通过在国内发起广泛的政治运动,通过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到中国访问,通过中国领导人到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访问来加固自己的地位,但是中国并没有在内政外交上获得应有的地位。而且完全有理由说,就是在这个阶段,出现了明显的类似于“大跃进”失败时期全国经历的政治危机,它表现在为了权力而进行的内部斗争的加强。

中国领导人没能够完全向干部和人民掩盖苏联的政策和苏共二十三大决议的真相。他们不得不加强对那些表现出反对、动摇或者怀疑中共的特殊方针的人的镇压。中国在我们的二十三大之后开展的以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旗帜的大清洗说明,中国的领导者无法压制和清除党和国家内部对苏联的同情,对苏联经验以及我党二十三大之后的生活和活动所怀有的兴趣。

中共领导人拒绝团结苏联、苏共、其他兄弟国家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以及破坏对越南进行援助的分裂主义路线,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给中国带来的损害越来越明显。苏共二十三大之后,中国在与越南、朝鲜、古巴、罗马尼亚以及其他国家的相处中经历的困难越来越明显。

所有这些再一次证明了苏共(1964 年)10 月中央全会和二十三大所采取的方针的正确性。尽管现在的中国反苏民族主义分子更加嚣张,但是可以确定地说,在与中共的关系中一直保持的平稳和坚定的方针现在已经有了回报,毫无疑问将有助于我们将来团结反帝国主义力量和把中国稳固在社会主义阵地上。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

分送:伊利切夫,第二欧洲司;马立克,第四欧洲司;奥尔洛夫,第五欧洲司;谢苗诺夫,……[①];

---

① 档案复印件此处字迹不清,无法辨认。——编注

费留宾，……[1]；维诺格拉多夫，第一非洲司；格鲁比亚科夫，第二非洲司；茹科夫，第三非洲司；扎米亚京，近东司；科瓦廖夫，中东司；科尔尼延科，俄罗斯联邦外交部南亚司；诺维科夫，乌克兰外交部东南亚司；罗曼诺夫斯基，白俄罗斯外交部情报司；哈萨克斯坦外交部国际经济组织司；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司；档案室

第944－ДВ号

1966年7月25日，КЧ/ес

第915号

ЦГАРК，ф. 1955，оп. 2，д. 295，л. 1－15

№11783

外交部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朝鲜战争及停战谈判

（1966年8月9日）

绝　密

关于1950—1953年朝鲜战争及停战谈判[2]

一、战争准备及战争第一阶段

自1948年南北朝鲜分别进行选举，南方成立李承晚傀儡政府，北方建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以来，南北方之间的关系即急剧恶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汉城政权都宣称对整个朝鲜享有主权。苏军和美军于1948年从朝鲜撤出后，三八线地区的形势变得愈加紧张起来。

此时，金日成和其他朝鲜领导人已下定决心，以武力方式统一朝鲜，而未对当时存在着的和平统一的可能性——通过南朝鲜广泛发展的民主运动来达到统一的目的——给予必要的注意和考虑。

① 档案复印件此处字迹不清，无法辨认。——编注

② 该文件是美国学者凯瑟琳·威瑟斯比（Kathryn Weathersby）在俄国档案馆工作时手抄的，后以英文发表（*The Journal of American East Relations*，1993，Vol. 2，No. 4），其中部分内容威瑟斯比在抄写时省略了，但做了简要说明，并用方括号加以标示。该文件译自英文。——编注

当时朝鲜人民军在人员和装备上都大大超过南朝鲜的武装力量。至1950年1月,朝鲜人民军总数已达11万人,一批新的战斗师正在迅速组建。

由于估计美国不会介入在南朝鲜爆发的战争,金日成一再坚持要斯大林和毛泽东同意他用武力统一国家的计划。(第4-51、233号电报,1950年)

开始时,斯大林对金日成的反复要求持保留态度,认为“这样一个与南朝鲜有关的重大问题……需要做非常周密的准备”,但他原则上并不反对这个计划。对朝鲜人所拟方案的最终认可,是在1950年3月至4月金日成访问莫斯科期间。随后,金日成于5月访问了北京,并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

朝鲜政府预计分三步实现他们的目标:

(一)把部队集结在三八线附近;

(二)向南方发出和平统一的呼吁;

(三)在南方拒绝和平统一建议之后开始军事行动。

根据斯大林的命令,北朝鲜人有关提供武器装备以组建人民军新的战斗部队的一切要求,都以最快速度给予了满足。中国领导人也向北朝鲜移交了一个由朝鲜籍士兵组成的师,这些朝鲜籍士兵曾在中国军队中服役。中国还许诺提供食品援助,并调一个军驻扎在靠近朝鲜边界的地方,“以防日本人站在南朝鲜一边介入战争”。(第62号电报,1950年)

至1950年5月底,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和苏联军事顾问团共同报告,在三八线的军事集结已经完毕。在金日成的坚持下,军事行动的发起时间定为1950年6月25日。(第408号电报,1950年)

在进攻即将开始时,北朝鲜的军事力量与南朝鲜相比占有很大优势。南北朝鲜双方力量对比的情况如下:军队人数1∶2;步枪1∶2;机关枪1∶7;冲锋枪1∶13;坦克1∶6.5;作战飞机1∶6。朝鲜人民军拟定的作战计划预计,每天向南推进15—20公里,整个军事行动在22—27天内基本完成。(第468号电报,1950年)

〔此处有一段对1950年10月之前战争进程的简短叙述,从朝鲜人民军在6月、7月和8月的最初胜利直到9月美国人在仁川两栖登陆后他们几乎被彻底击败。〕

在朝鲜人民的这个最严峻关头,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政府竭尽全力组建新的部队,并利用中国边界地区来完成这一任务。被包围于南部的人民军各部队,则在山区坚持分散作战。

二、中国人参与朝鲜战争

在金日成于1950年5月访问北京期间,毛泽东同他谈话时强调指出,他确信美国不会“为像朝鲜这样的区区之地”而卷入战争。毛还提到,中国政府将在沈阳地区部署一支部队,以便在南朝鲜拉日本军人参与军事行动时,向北朝鲜提供必要的援助。中国领导人一直认为美军不会介入战争,因此没有打算以派遣大量兵员的方式帮助北朝鲜。

1950年8月,美军飞机开始对靠近鸭绿江的中国领土进行轰炸。1950年10月,也就是

在美军实施仁川登陆不久，战线很快移至接近中朝边界的地区，敌方的大炮开始轰击中国一侧。美国第七舰队进入了台湾海峡。

此时，朝鲜人民军实际上已经完全失去了作战能力。逃出包围圈的残余部队正在夺路向中国退却，以便重新整编。

在斯大林的压力下，中国政府只是在中国的安全确实受到威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真正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刻，才决定派遣志愿军进入朝鲜。1950 年 10 月的下半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始入朝作战。随后不久，中国入朝部队的总数达 100 万人，还有大约同样数量的人员被派往朝鲜做运输工作。至 1951 年底，朝鲜人民军总数约 33.7 万人。在敌人一方，约有 70 万官兵加入地面战斗，其中包括 38 万南朝鲜军和 28 万美军，而执行海上封锁任务的美国海军未计算在内。

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参战和苏联军事顾问的积极介入——他们参加了所有重要战役的组织和筹划——在军事方面造成了决定性的突破。美军和南朝鲜军被迫退回三八线，在有些地段向南后撤更远。在西线作战的中国部队于 1951 年 1 月初占领了汉城。

然而，中国军队按照中共领导人守住三八线的战略方针，放弃汉城实施北撤。他们未对人民军试图将东线美军赶过三八线的作战提供支援。

在战争的这段时间，金日成同以彭德怀为首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之间发生了尖锐矛盾。朝鲜人不同意中国人民志愿军放弃汉城的做法，并指责他们未对东线人民军部队提供支援。

在中国的志愿军驻扎朝鲜这段时间里，出现了许多中国人干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政的情况。通过对朝鲜民情的考察，他们给中共中央委员会送去的报告强调民间的贫困状况，并批评朝鲜当局的政策。中国人企图拉拢朝鲜人民军的指挥官，说明这种看法的例证之一是朴一禹事件。朴是朝鲜人民军驻中国志愿军司令部首席代表。金日成不只一次宣称朴一禹的言行俨然是毛泽东的私人代表，他试图诋毁朝鲜劳动党的领导权威，把自己凌驾于党之上。中国人煽动各种阴谋，利用朴一禹来反对金日成。彭德怀大言不惭地发表对金日成军事指挥能力低下的看法。中国指挥官明显地蔑视朝鲜人，表现出一种大国主义态度。有一次金日成到彭德怀的司令部时，曾遭到中国警卫的阻拦，并被他们扣押了很长一段时间。朝鲜地方当局抱怨说，中国志愿军经常专横地强迫老百姓修筑工事，任意砍伐森林、屠宰牲畜等。

很多朝鲜人为朝鲜人民军的败退和重大损失而责备中国，他们认为“如果中国的援助早一个月到来，一切困难都不存在了”。朝鲜领导人当时说，如果不是因为中国人的主张，很可能在 1950 年冬天中国志愿军取得进攻胜利的时候，就已经把美国人赶出朝鲜半岛并实现全国统一了。

尽管如此，但正如人们所知道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扭转战局和使战线保持在三八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志愿军在参战的第一年伤亡超过 30 万人。

中国领导人利用志愿军长期驻守在朝鲜这一情况，试图加强对北朝鲜的长期影响。

1953 年 7 月 27 日停战协定签字以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又在朝鲜驻扎了 5 年多。直到 1958 年 10 月底，在朝鲜人的压力之下，志愿军才最终撤回国内。

中国领导人甚至现在还通过各种可能的方式，利用志愿军在朝鲜参战这个历史来迫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支持他们的冒险主义立场。

三、联合国和美国对朝鲜的干涉

〔此节为一段简短的概述。〕

四、停战谈判

至 1951 年中，朝鲜的局势已清楚表明，以武力方式解决统一问题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中朝领导人都被迫承认了这一点。在同中朝方面进行初步磋商之后，苏联政府于 1951 年 7 月 23 日提出解决朝鲜军事冲突的建议。苏联代表指出："第一步，应进行停火谈判，为此双方军队应撤离三八线。"这一建议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

1951 年 6 月 27 日，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柯克拜访葛罗米柯(当时的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就有关这些建议的大量问题向他提出要求。葛罗米柯向柯克阐明了苏联政府的立场，指出停战谈判必须是在美军司令部和南朝鲜军司令部为一方代表，而朝鲜人民军司令部和中国志愿军司令部为另一方代表的情况下，才可以举行。葛罗米柯同志特别提出，谈判必须限制在军事问题方面，并且首先是停火问题。

6 月 29 日，当时在朝鲜的"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通过广播向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金日成呼吁，建议开始停战谈判。

7 月 1 日，金日成和彭德怀在电台发表联合声明，对李奇微的呼吁做出答复。答复表示他们同意与美军司令部的代表举行会议，"就停止军事行动和实现和平进行谈判"。

战争各方司令部的代表于 1951 年 7 月 10 日举行谈判，以后时续时断达两年以上，直到 1953 年 7 月底。

在整个谈判的过程中讨论了这样一些基本问题：在双方之间划定一条分界线以建立一个非军事区，作为在朝鲜停止军事行动的条件；详细制定实行停火和停战的实际措施，包括监督实现停火和停战条件的一个机构的人员、权力和职责。

到 1952 年 5 月初，除了如何对待战俘的问题外，对所有问题都达成了协议。后来，战俘问题也在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基础上得到了解决。

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政府采取多种措施促进停战协定的缔结。周恩来在莫斯科参加斯大林葬礼期间，同苏联领导人就朝鲜问题举行了一系列会谈。在这些会谈中，周恩来以中国政府的名义，急切要求苏联帮助加快停战谈判进程和签订停火协定。[①] 中国人的这一立场同我们的立场是一致的。为确保在复杂形势下各种有效措施得以实行，1953 年 3 月，莫斯科

① 原文如此。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周恩来对苏联新领导人提出的尽快结束朝鲜战争的决定感到惊讶，并认为这样的突然"转弯"令中国很难接受。周恩来回国后，向毛泽东转交苏共领导人建议接受美国条件、准备停战的信函。经商议，中国领导人接受了苏联的意见(参见沈志华：《1953 年朝鲜停战——中苏领导人的政治考虑》，《世界史》2001 年第 2 期)。——编注

派出一位特别代表，携带着关于加速和平谈判的建议前往平壤。到这时，朝鲜人也明确表示了他们以最快速度停止军事行动的愿望。

7月27日，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

停战协定划定了军事分界线并规定双方的军队从这条线后撤两公里，以建立一个非军事区，还规定停战协定生效后72小时之内，双方军队都撤出非军事区。

〔此处列举了协定的条款。〕

五、停战后的朝鲜问题

朝鲜停战为这个国家实现和平的重新统一建立了前提条件。为达到这一目标的第一步是必须召开停战协定中设想的政治会议。

由于美国的破坏，关于朝鲜问题的政治会议直到1954年4月26日才在日内瓦召开。美国代表竭尽全力阻止通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在朝鲜半岛建立单一的、真正民主的政府为目标的各项建议。会议没有通过任何对朝鲜有建设性的决议。

朝鲜问题直到现在仍然在联合国机构中被作为悬而未决的问题。这是联合国大会每一次例行会议“讨论”的一个问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明确反对在联合国讨论所谓朝鲜问题，主张撤销“重新统一和恢复朝鲜委员会”，要求美国军队撤出朝鲜。朝鲜政府的这一主张得到苏联政府的全力支持。

文件送：勃列日涅夫(2份)、柯西金(2份)、葛罗米柯、库兹涅佐夫、科瓦廖夫、科尔尼延科、苏达里科、外交部外交历史档案管理局、外交部国际问题司、外交部东南亚司、存档(2份)

ЦХСД，ф. 5，оп. 58，д. 266，л. 122－131

№10254

伊瓦舒京致苏共中央联络部报告：美国人认为越战对苏联有利

(1966年8月23日)

致苏共中央联络部：

陆军上校 Ч. Дж. 菲茨杰拉德，美国驻苏联大使馆武官，最近在与国防部外交事务局的官员们的讨论中，系统地、坚决地阐述了这一观念，作为谈判的发起人和积极的调解人，苏联在解决越南冲突中充当了重要角色。

在这方面他认为,苏联谴责这场战争持续不断这一事实是有意图的:“当两种势力冲突的时候,比如说美国和越南共产党,就需要第三方力量帮助他们达成协议。只有苏联才是这种第三方力量。”

经过思考,菲茨杰拉德上校提出了以下几点关于解决越南冲突的方法:

—越南和平能够通过美国、北越、越共成员和南越政府之间的谈判完成。组织谈判的主要的障碍是北越的政府,虽然在现在的形势下,北越是谈判的最大受益者。同时,我们认为,越南的战争对苏联有利,因为它吸引了中国的注意力,否则,苏联与中国在边境问题和其他的问题上有很多麻烦。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主要目标正像它逐渐显露的那样,维持其威望——“体面地”撤离越南。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政府不断地寻找谈判机会的原因。这是参议员曼斯菲尔德来苏联的使命,但是不幸,他没能从苏维埃代表那里找到谅解。——不久前总统任命 A. 哈里曼为他的特别助理,赋予他的任务是找到谈判的道路。他已经被指定利用所有最微小的可能性来实现这一目标。

—总统会见美军司令官威斯特摩兰后在得克萨斯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美国人民必须知道并不像他的前任断言的那样,胜利将会很快到来。这对我们来说不是新闻,对此我们已经习惯了。

菲茨杰拉德上校在美国进攻越南问题上表达他的个人的态度:“我是军人,因此必须维护我的政府的政策,服从命令,但是,作为一个人,我也许有时对美国被逐渐削弱的威望感到惭愧。”

П. 伊瓦舒京(签名)

1966 年 8 月 23 日

第 46722 号

手写批注:

归档。情报资料。已经用于苏共中央联络部的工作。

И. 波兹尼亚克

ЦХСД,ф. 5,оп. 58,д. 262,л. 237 - 238

№25716

伊利切夫与张德群会谈纪要：抗议苏联驻华使馆遭受中国人围攻[①]

（1966 年 8 月 26 日）

……

Л. 伊利切夫宣读了对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周围发生事件的抗议照会。

张德群宣称，他"坚决"反对苏联大使馆的抗议照会，它似乎在"污蔑中国的革命群众"，"干涉"中国的内政。我们这里，他声明，是在搞"伟大的文化大革命"，其宗旨是根除封建主义、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流毒等。人民群众的……任何革命行动都是合法的。

…… Л. 伊利切夫说，"干涉"中国的内政，"污蔑"中国人民，这都是没有根据的，臆造出来的。并说，不能回避那些流氓年轻人在我大使馆面前众所周知胡作非为的事实。

张德群开始纠缠不断反复地说，照会是对"伟大的文化大革命"、"革命群众"的污蔑，"干涉中国的内政"，等等。

……

АВПРФ，ф. 0100，оп. 53，п. 223，д. 5，л. 81

№10402

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关于加强对中国的科学研究

（1966 年 9 月 1 日）

为了改善对中国的科学研究和加强各有关部门的中国学干部，为在国内广泛培养具有各种专长的中国学干部，兹实施以下措施：

一、在苏联科学院内，以苏联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经济问题研究所秘密的中国问题处为基础，组建非公开的当代中国问题研究所。在公开的报刊和通信中以及进行对外联

① 该文件系摘录自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络时,称该所为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苏联科学院主席团经与苏共中央办公厅协商后,在2个月期限内,制定和审批当代中国问题内部研究所的章程、机构,确定其科学工作人员为200人。责成苏联财政部,自1966年起,相应地扩大对苏联科学院的工资基金拨款以及与组建研究所有关的其他开支拨款,以上拨款均计入苏联科学院预算的总的拨款中。

二、苏联科学院当代中国问题研究所的主要任务是研究以下各种问题:

中共党史及其与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的相互关系;中共领导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工人运动、民族解放运动以及国际社会组织中的政策;

中国的经济状况和国内政治状况,国家的建设情况;

中苏关系,中国的对外政策;

中国共产党特殊方针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中国的对内和对外宣传活动,其内容、方法和形式。

研究所还应该进行:

翻译、整理和出版有关中国当代历史、中共党史、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以及对外政策方面的重要材料;

加工整理中国中央和地方的报刊材料以及台湾、香港、日本和西方中国学的书籍;

撰写关于中国国内外政策以及中共领导人活动的详细报告。

三、责成苏联科学院当代中国问题研究所,定期向苏共中央以及中央的有关各部和各组织提交情报资料,并研究制定关于中苏关系迫切问题的建议。

四、在有苏共中央其他相关部参加的情况下经与苏共中央科学和院校部以及苏共中央办公厅协商,确定研究所的科研题目,审核其工作计划以及挑选科学工作干部。

五、当代中国问题研究所在工资待遇、物资保障以及工作条件方面与一级研究所相同。

六、苏联外交部、苏联对外贸易部、国家安全委员会、全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新闻社、塔斯社,有责任向当代中国问题研究所提供关于中国及其邻国的具有机密性质的情报资料。

七、苏联财政部每年应拨给研究所2 500外汇卢布和3 000元人民币,用于定购和购买外国书籍和期刊。

八、允许研究所的领导人吸收具有丰富工作经验和中国及其邻国方面有知识但没有学位的人员来所任高级研究员,并按照苏联部长会议1957年6月5日第660号关于高级研究员——具有10年以上科学工作工龄的科学副博士薪金的规定,确定其3年之内的职务薪金。

九、责成莫斯科委员会(普罗梅斯洛夫同志),在1966—1967年期间,为苏联科学院当代中国问题研究所建造一座考虑到其专业特点的大厦。在大厦建成之前,采取临时安置研究所的措施。

十、批准研究所自1966年起,以印刷机关的身份出版内部学术通报,每年为6期,规模为20印张,每一期都将分送给研究所的有关组织和学术机关以及各图书馆专门保管机密文件的部门。在通报上刊登研究所工作人员和相应机关的其他工作人员的关于中国现实问题的学术著作以及

对中国的和其他外国的中国学工作的评论文章。责成科学出版社，为在学术通报上刊登的文章以及由中国问题研究所出版的专著和其他学术著作支付稿酬，金额为每印张100卢布以内。

十一、根据苏共中央1965年11月18日的决议，必须广泛培养具备各种专业知识的中国学干部，更好地解决他们的工作分配问题，责成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和苏联高等中等专业教育部，查明国家、科学和社会各个重要机构对中国学干部的需求，并以中央各级组织和部门的长远利益以及深入研究现代中国问题的必要性和在苏联高等院校扩大中国学专业授课为出发点，采取措施培养具备各种专业知识的中国学干部以满足这些部门的需求。

苏联高等中等专业教育部应该采取措施，自1966—1967学年开始，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国立大学，扩大中国学学科的招生名额。

苏联外交部、苏联对外贸易部以及拥有专业学校的其他部门，应该注意广泛培养相应专业的中国学干部。

在3个月期限内，将所采取的措施报告苏共中央。

十二、委托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并吸收有关部门、组织和机关参加，研究国内东方学干部培训的现状问题，并向苏共中央提交相应的建议。

十三、责成俄罗斯联邦教育部，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伊尔库茨克、赤塔、哈巴罗夫斯克开设1—2所汉语专业学校。

十四、委托苏联高等中等专业教育部和苏联教育部协同苏联科学院，研究在高级和中级学校相应的年级开展中国历史、经济和社会政治思想课程的问题。

十五、高级党校和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学校和苏联外交部、国防部、国家安全委员会特种机密学校，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问题的教程里，应该规定专门的章节，用于研究中国的状况以及对中国领导人反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批评。

十六、苏联部长会议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和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应该系统地组织研究中国科学技术状况，简要介绍全苏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的中国科学技术书籍。委托全苏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组织出版内部刊物《中国科学技术》通报。

十七、出版委员会：

应该保证系统出版中国学书籍；允许苏联科学院现代中国问题研究所不经书刊检查而获得关于中国学的外国书籍。

十八、责成苏联外交部、苏联高等中等专业教育部和苏联科学院利用苏联驻中国大使馆的见习学校以及与中国大学生和实习生交换，加快培养中国学专业人员，以此满足有关部门和科学研究机关对中国学干部的需求。

十九、提交政治局审批。

送安德罗波夫同志、杰米切夫同志、特拉佩兹尼科夫同志、舍夫利亚金同志、库拉科夫同志、苏斯洛夫同志

ЦХСД，ф. 4，оп. 19，д. 439，л. 3－6

№25474

中国外交部的照会：关于使用北京—莫斯科航线[①]

（1966 年 9 月 21 日）

……

在 12 年内只有苏联方面在使用莫斯科—伊尔库茨克—北京航线的经营权，而当中国方面在自己完全公正合法的权利范围内提出关于使用北京—伊尔库茨克—莫斯科整条航线的问题时，苏联方面便开始加以阻挠。这再一次暴露了你们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

……

АВПРФ，ф. 0100，оп. 59，п. 525，д. 2，л. 29

№25470

外交部东南亚司的报告：越南劳动党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态度[②]

（1966 年 10 月 17 日）

……

直至今年 9 月之前，越南官方宣传机构都以缄默回避正在中国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在与苏联驻河内大使馆以及其他欧洲兄弟国家代表举行的正式会谈中，越南负责人都回避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同时在秘密会谈中有些越南同志表示困惑不解，甚至不赞成在中国开展的这场运动。因为“文化大革命”，北越的知识分子表现出特别的不安，担心在中国的影响下越南民主共和国也开始这样的“革命”……许多知识分子代表和干部们对中国“红卫兵”的行为表示愤慨，把他们形容为“真正的土匪、横行不法和无政府主义现象”，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

① 该档案系摘录自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② 该文件系摘录自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注意到越南劳动党宣传机构类似这样的情绪，今年夏天对他们进行了秘密的解释工作，着重指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的内政，不适用于越南，也不会对越南民主共和国造成任何影响。9月中旬，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向干部们传达的文件中指出，“不应支持‘文化大革命’的思潮，但也不需要大声疾呼，来表示我们不同意这些思潮。出发点必须是：这首先是中国的内政”。

越南民主共和国通讯社和越南劳动党的克制，很可能引起了北京的不满。根据某些资料，早在今年7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国政府就向越南劳动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提议，希望像中国支持越南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势力那样支持“文化大革命”。

非常值得重视的是，从今年9月份最初的几天开始，越南民主共和国内就组建了一些体验战时生活模式的青年队。正如报纸中所指出的，这些青年队的任务是，在青年中开展教育工作，在公共场合监督人们对战时生活方式原则的遵守，并向相关的单位提供帮助，维持城市的安定和秩序。

现在还没有足够的理由能指出越南的青年队与中国的“红卫兵”之间的相同之处。但是要警惕这些青年队行为方式的一些类似之处，还要警惕的是，越南青年队成员自己曾声称，他们的目的是在文化和思想领域进行革命。

……

АВПРФ，ф. 0100，оп. 59，п. 529，д. 37，л. 72－75

№25951

外交部远东司的报告：蒙古与亚非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1966年10月21日）

机　密

文本第20份

1966年10月24日

第2975/ГС号

哈萨克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部

阿拉木图市

发送，供参考。

苏联外交部秘书长

Д. 茹科夫(签名)

蒙古同亚非发展中国家关系现状及其发展前景

（情况报告）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远东的局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种变化的表现之一是蒙古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独立、主权的国家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其威望得到提高。到1940年代，蒙古人民共和国完成了民主革命，坚定地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中享有充分权利的成员。如果说1948年以前只有苏联同蒙古建立了外交关系，那么，到了1950年下半年，已经同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除外)建立了外交关系。但是，战后初期帝国主义发动的冷战和制造的紧张国际局势不利于蒙古人民共和国发展更为广泛的国际联系。

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实力和影响的增强，殖民主义体系的瓦解——急剧改变了世界形势。这一状况，以及蒙古人民共和国在发展经济方面取得的成就、坚定地奉行和平的外交政策、始终如一地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反殖民主义的斗争，极大地促进了蒙古同亚非国家的联系。一些新独立国家在寻找摆脱长期落后的道路过程中，对蒙古人民共和国非资本主义道路的发展经验表现出浓厚兴趣。从1950年代下半期起开始了亚非国家同蒙古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时期。

第一个同蒙古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非社会主义的亚洲国家是印度(1955年12月建交)。毫无疑问，这一事件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发展史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同蒙古和其他亚非国家的关系相比，蒙古印度关系最具生机和活力。这首先得益于蒙印关系建立后，在德里建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代办处。1956年12月蒙古驻印度大使馆的建立(在蒙古历史中，这是第一个在社会主义阵营之外的国家建立的大使馆)，毫无疑问，不仅促进了两国关系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使蒙古人民共和国对其他亚洲国家的外交活动活跃起来。

蒙古印尼两国领导人的互访在蒙印关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1957年9月，应蒙古大人民呼拉尔主席Ж.桑布的邀请，印度副总统С.拉达克里希南(现任总统)访问蒙古。会晤结果签署了会谈公报，在公报中可以找到双方在反帝反殖斗争中有共同利益的表述。

1959年9月，应印度总理尼赫鲁的邀请，由Ю.泽登巴尔率领的政府代表团访问印度是蒙印关系史中的重大事件。代表团组成有：部长会议副主席С.鲁布桑和外交部长П.沙格达尔苏伦。代表团在印度各地访问，先后去了加尔各答、阿格拉、班加罗尔和孟买。在访问期间同印度领导人举行了多次会晤和会谈，讨论了扩大两国往来，其中包括贸易往来的问题。

此行对于巩固蒙印友谊起到了重要作用。蒙古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处处受到欢迎，被看作是古代亚洲的代表，曾经是一个强大的国家，而今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会谈公报中强调了蒙印之间有悠久的历史往来传统。在会谈公报中指出："两国总理在会谈中都提及

两国之间悠久的历史联系，并愉快地指出，今后这种联系将会在新的基础上得到恢复和巩固。”

同印度和其他国家的居民、国务及社会活动家的会谈，泽登巴尔的新闻记者招待会，这些都有利于印度和国际社会了解蒙古人民共和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成绩，了解蒙古爱好和平的外交政策。泽登巴尔的印度之行表明蒙古领导人访问发展中国家来宣传蒙古非资本主义道路的发展经验、社会主义思想及其爱好和平的对外政策，总体来看是有益的和有效果的。

1965年夏天，先是印度通信与无线电广播部长英迪拉・甘地，随后是外交部长拉克什米・梅农对蒙古人民共和国进行了正式访问。

两国议会往来得到发展。1962年9月，由人民会议主席辛格率领的议会访问蒙古。同时，蒙古议会代表团于1962年11月访问了印度，代表团团长Б. 什兰德布院士此行受到印度领导人热情的招待和关注。代表团受到总统、总理和外交部长的接见。

作为亚洲重要国家之一的印度和蒙古两国国务活动家的互访，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蒙古在国际舞台威信的提高。

印度是第一个同蒙古签订为期5年的文化协定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印蒙和蒙印文化协会在两国文化交流过程中起到不小的作用。前者是1957年12月建立的，后者是1958年下半年建立的。在庆祝民族节日时，协会倡导组织电影播放、照片展览等活动。两国之间经常组织文艺团体、学者，以及宗教界活动家访问活动，其他社会各界人士也保持着某些联系。如不久前印度工联大会就邀请了蒙古工联代表参加。

蒙印两国关系总体上是友好的。在双边联系方面，主要是通过文化合作的形式。印度政府对扩大合作的领域没有表现出兴趣。这一情况的证据是，到目前为止在乌兰巴托没有建立印度常设办事处。印度驻莫斯科大使每年都前往乌兰巴托一两次。自然，这种情形不允许他定期解决两国关系中的一些实际问题。的确，应该说问题并不多，通过蒙古驻德里大使馆完全可以解决。因此，印度大使把自己在乌兰巴托的驻地只用于纯粹象征性的目的。

蒙古政府多次向印度人表示，希望印度从相互对等的原则出发，在蒙古建立自己的大使馆，包括去年英迪拉・甘地访问蒙古期间，也向她表达了这个愿望。今年3月，在德里召开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第二十二届会议期间，应邀参加会议的蒙古代表团在同印度活动家会谈期间也提出了这个问题。众所周知，在印度议会开会期间讨论过在乌兰巴托建立公使馆的问题，但直至现在也没有做出积极的决定。印度官方解释说是外汇不够。显然，这种解释说明，由于蒙古已在德里设立代表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没有看到在乌兰巴托建立自己的大使馆的必要性，他们的考虑是，两国总的联系不多，并且也没有扩大的趋势。

印度方面放弃了关于扩大经济，首先是贸易联系问题的讨论，现在这种联系仅具有象征性意义。蒙古人表达了自己购买印度黄麻的意愿。按照蒙古人的话说，印度也表达了对购买蒙古出口的矿石的兴趣。但是，蒙古部长会议副主席格姆博扎夫在同苏联驻蒙古商务代表会谈中在谈到向印度出售矿石问题时承认此举没有可行性，他指出："过境中国运输很困

难,而经敖德萨转运在经济上又不合适,况且印度方面还要求商品包装,而包装的价钱比矿石本身还要贵。"这样,蒙古和印度之间扩大贸易往来的现实可能性暂时还不具备。

第二个同蒙古建立外交关系的非社会主义国家是缅甸。起初关系(1956年9月)确定在公使层面,而后,在1962年9月,蒙古和缅甸政府都做出了关于本国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的决定。两国委派的大使均系兼职——蒙古大使由蒙古驻德里大使兼任,缅甸大使由缅甸驻北京大使兼任。

蒙缅关系的建立总体上是有利的,具有友好性质。目前,缅甸领导层对蒙古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表现出兴趣。但是,蒙缅关系暂时没有取得明显的发展。

1957年12月,由副总理率领的缅甸政府代表团访问了蒙古。在发表的联合公报中强调了双方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观点的一致性。公报中指出,为了进一步扩大双边友好关系,建立和发展经济与文化合作是合适的,双方商定进行贸易谈判,互派文化代表团和采取相应的措施。但是该声明到目前没有实现。

1956年9月,应蒙古人民共和国大呼拉尔主席团的邀请,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访问蒙古。在会晤期间就蒙古和印度尼西亚建立外交关系问题达成一致。印度尼西亚和蒙古大使的常设驻在地都在北京。

蒙古和印度尼西亚之间的关系暂时不会有什么进展,哪怕是互派代表团方面。甚至在庆祝蒙古人民革命40周年的活动,也只是委派印度尼西亚驻蒙古大使率领印度尼西亚政府代表团。

去年8月,在庆祝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建立20周年时,蒙古驻北京大使馆参赞萨姆丹作为代办前往雅加达。需要指出,有意思的是,在机场未受到任何人迎接,甚至没派汽车,尽管事先就接待蒙古代表问题达成了协议。印度尼西亚人的这种行为,看来可以被看作那一时期蒙古对中国持不友好态度,在国际舞台上坚定地支持苏共和苏联政府的政策的表现。同时必须强调的是,在访问期间萨姆丹向印度尼西亚外交部表达了在雅加达建立本国常设代办处的愿望。

1961年6月,应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的邀请,由艾地率领的印尼共代表团访问蒙古。谈判结束后签订了一份简短的公报,号召巩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近来蒙古同印度尼西亚的关系与蒙古同其他亚非国家的关系相比,具有友好性质。

第一个同蒙古建交的非洲国家是几内亚(1960年4月)。当年在科纳克里建立了蒙古大使馆。(从1965年起,委派蒙古驻阿尔及尔大使兼任驻几内亚大使。)自然,蒙古驻几内亚代办处在发展同该国联系方面有了更多的可能性。

确实,几内亚暂时没有,也没打算近期在乌兰巴托建立自己的代办处,委派驻莫斯科大使兼任驻蒙古大使。

1960年9月,由总统和政府首脑塞古·杜尔率领的政府代表团前往蒙古进行国事访问。这是第一位来到蒙古的非洲国家首脑。在联合公报中强调了蒙古和几内亚开展经济和文化往来的必要性。作为对这项内容的实施,蒙古和几内亚外交部长签订了文化合作的协定。从此时起,在这项协定的基础上每年在科纳克里签订关于文件合作的备忘录,据此交换文学

作品、电影、图片资料等。

在塞古·杜尔访问蒙古期间，蒙古政府决定向几内亚提供无偿经济援助。毫无疑问，蒙古政府的这一举措展现了早先处于落后状态和被压迫地位的国家在走上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后所取得的成就，现在允许它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援助，同时也吸引非洲国家对蒙古给予更多的注意，提高了蒙古在非洲国家的威信。

但是，这种援助的方式——在科纳克里建设一家医院却遭到了失败。在实施蒙古义务时遇到了一系列客观困难，被迫拖延了几年，最终是以其他形式履行的义务。决定向几内亚赠送苏联生产的汽车来代替建设医院：25 辆"莫斯科人"牌汽车，5 辆"伏尔加"牌汽车和 2 辆"嘎斯"牌汽车，总共价值 80 万图格里克。几内亚政府决定变卖这批汽车，利用获得的资金来建设医院，认为这是蒙古人民的礼物。

1960 年 11 月 30 日，柬埔寨同蒙古建立了外交关系，几天以后，西哈努克访问了蒙古。在乌兰巴托访问期间，西哈努克对蒙古所取得的成就给予高度评价。他把蒙古所取得的成就评价为"亚洲人民巨大生命力的例证"，亚洲国家取得快速的社会进步的例证。

在谈到柬埔寨同蒙古的相互关系时，西哈努克强调说，他们是亚洲团结的组成部分。在离开乌兰巴托时他表示："高棉、蒙古团结是亚洲人民团结的组成部分。"1964 年他在金边再次向蒙古大使泽沃格米德强调了这个思想。

确实，蒙古和柬埔寨之间未能保持任何形式的定期联络关系。只是在庆祝民族节日和其他一些重大事件时进行了电报交换。只是在去年 9 月在乌兰巴托签订了关于文化与科学合作的协定。据来自金边的消息，柬埔寨人现在按照自己的倡议实施去年签订的协定，制定同蒙古文化往来的计划，采取一些像交换影片、广播稿等形式的实践措施。

在 1960 年发表的蒙柬联合公报中指出，西哈努克邀请泽登巴尔访问柬埔寨。1964 年初，蒙古大使泽沃格米德在柬埔寨短暂逗留期间打探了如果蒙古领导人访问东南亚国家时造访柬埔寨的可能性。西哈努克多次向泽沃格米德答复说，柬埔寨人非常乐于随时接待泽登巴尔或其他蒙古领导人。

1961 年 1 月蒙古和尼泊尔就建立外交关系问题达成协议。是年 10 月尼泊尔国王访问了蒙古。会谈结果签订了联合公报，强调双方在一些重要的国际问题上持有一致观点，以及关于蒙尼文化交流的协定。协定中确定双方互派文化、艺术、科学和体育活动家访问。事实上协定中关于合作的内容没有实施，除了宗教联络渠道外。

在公报中指出，蒙古人民大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接受尼泊尔国王关于在其合适的时间访问尼泊尔邀请。访问暂未实现。确实，1964 年 12 月，由蒙古人民大呼拉尔主席团主席 Б. 什兰德布率领的蒙古议会代表团访问了尼泊尔。代表团受到国王接见。

蒙古和尼泊尔之间没有保持任何形式的定期文化或经济往来。两国委派的大使均为兼任——尼泊尔大使由驻北京大使兼任，蒙古大使由驻德里大使兼任。

1960 年 10 月，蒙古人民共和国发表了关于承认马里共和国的声明，表示准备与之建立外交关系。1961 年 1 月，外交关系建立。但是直至 1964 年以前这种关系仅具形式，只是局

限于互派的大使到彼此的首都访问,交换国书。1964 年春在巴马科签订了关于蒙古和马里之间文化合作的协定,以及 1964—1965 年双方文化合作计划,规定交换摄影、文学和其他材料。1956 年 5 月签订了该年文化合作计划。马里外交部文化司司长 Д. 瓦塔拉在签订这项计划后在谈到蒙马关系时指出,“双方都致力于巩固和扩大两国间的团结和友谊”。

蒙马关系和同所有非洲国家关系中的重大事件是 1964 年 10 月马里总统和政府主席莫迪博·凯塔访问蒙古。在访问期间就蒙马友好关系发展情况和其他一些相互感兴趣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双方还表示愿意进一步发展友好合作和交流经验。莫迪博·凯塔邀请蒙古人民大呼拉尔主席团主席和部长会议主席在他们合适的时候访问马里。

蒙古人民共和国坚定地奉行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政策,对阿尔及利亚人民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斗争始终不渝地持赞同立场。1958 年 9 月,亚非团结委员会蒙古委员会支持亚非团结委员会常务秘书处关于承认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的号召,几天后蒙古政府正式发表了关于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的声明。随后,蒙古方面多次采取同阿尔及利亚领导层建立直接联系的尝试。只是在经过 3 年后,1961 年 1 月蒙古和阿尔及利亚之间才建立了外交关系。起初双边关系仅限于任命驻其他国家的大使兼任。蒙古政府代表团第一次访问阿尔及利亚是 1964 年庆祝阿尔及利亚革命胜利 10 周年之际。

根据蒙古积极开展对阿拉伯国家外交活动的意愿,以及准备参加第二届亚非会议的意愿,1965 年在阿尔及尔建立了大使馆。毫无疑问,这一步骤将促进蒙古发展同马格里布①关系的发展。

1962 年 2 月 1 日,在同一天蒙古同阿富汗和锡兰建立了外交关系。蒙古同这些国家的关系停留在友好层面,在其他方面没有任何进展。实际关系仅局限于大使在相互国家递交国书进行的简短会晤。

1962 年蒙古同巴基斯坦建立了外交关系。作为第一步措施,1962 年 3 月巴基斯坦政府发表了关于正式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官方声明。这份声明在蒙古得到积极反响,紧接着巴基斯坦提出了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正式建议,1962 年 7 月实现。巴基斯坦是第一个同蒙古建立外交关系的加入了侵略集团的国家。但是,暂时巴基斯坦和蒙古之间没有任何经济和文化联系。

蒙古密切关注老挝事件的发展和老挝人民反美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势力的斗争。1960 年 11 月,蒙古发表了关于承认梭发那·富马政府为老挝第一届合法政府的声明。努力向从事反帝国主义侵略斗争的老挝进步力量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1951 年 4 月蒙古政府向老挝人民援助了 1 万米布和 30 万吨大米。

1962 年 6 月,应蒙古人民军事务部的邀请,老挝前军事委员会主席贡勒将军访问蒙古。这次会晤为建立外交关系奠定了基础,1962 年 9 月就这个问题发表了联合公报。蒙古和老挝互派大使,均为兼任。美国恢复干涉后,美国反对老挝侵略行动引起老挝内部形势复杂化,影响到了蒙老关系的发展。

---

① 马格里布,阿拉伯语意为“西方”,这里指阿拉伯西部地区。——编注

1966年3月，由冯维希率领的老挝爱国战线(Нео Лао Хак Сат)代表团访问蒙古。蒙古方面满足了代表团关于以毛毯和肉罐头的方式提供援助的请求。在会晤期间还就苏发努冯访问蒙古一事达成协议。

同阿拉伯国家发展关系中的重大事件是1963年4月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一事件促进了蒙古在国际舞台威望的提高。经济联系为这一行动奠定了基础，双方经济往来的基础是1957年签订的蒙古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贸易和支付协定，安排各种性质的代表团互访。

1965年12月，蒙古和加纳建立了大使级别关系。蒙加关系有不错的发展前景。早在正式建交之前，在第四届亚非团结大会(安卡拉)期间，蒙古代表团就同恩克鲁玛举行了会晤，并转交了邀请加纳议会人民党代表团访问蒙古的邀请信。恩克鲁玛接受了这次邀请。稍后双方重申了这个问题，恩克鲁玛预定前往乌兰巴托访问。但是，加纳政变中断了两国关系。

蒙古是第一个承认也门阿拉伯共和国的国家。1964年夏天，向阿卜杜拉·萨拉勒总统递交了访问蒙古的邀请信。阿卜杜拉·萨拉勒在复信中表示，他愉快地接受这次邀请，同时表示准备同蒙古建立外交关系。

在同摆脱殖民统治的国家，如突尼斯、摩洛哥、苏丹、中非共和国、乍得、上沃尔特、加蓬、喀麦隆、尼日尔、肯尼亚、赞比亚等国，建立外交关系方面已迈出步伐。

1962年2月，蒙古和伊拉克建立了外交关系。但是，在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在伊拉克掌权后蒙伊关系急速恶化。1963年7月，由于蒙古向联合国提出关于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政府对库尔德人执行种族灭绝政策问题，伊拉克中断了同蒙古的外交关系。

伊拉克进步力量支持尽快复交。1965年夏天，伊拉克共产党代表团访问蒙古，对蒙古支持国内民主力量的斗争表示感谢。考虑到伊拉克近来发生的事件，蒙伊关系正常化值得期待。蒙古朋友建议在这方面采取一些措施。

这样，蒙古同亚非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极个别的除外，总体上处于正常状态，甚至具有友好性质。如果考虑到10年前蒙古还没有同这些大陆上的任何一个非社会主义国家有官方关系的话，那么，现在已经同14个亚非国家保持着联系，毫无疑问，这是蒙古对外政策的重大成绩，是它在发展中国家威信提高的证明。

蒙古是亚洲前殖民地国家中最为落后的一个，它通过走非资本主义道路取得了重大成就，蒙古的榜样对亚非国家起到了促动作用。在这些国家眼中，蒙古的经验是他们通过自己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定向标。在不久前召开的蒙古人民革命党十五大会议上，一些发展中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的发言证实了这一点。在祝贺蒙古人民革命党十五大会议时，塞浦路斯劳动进步党主席表示："我们认为，你们的努力和经验对摆脱了帝国主义压迫和正在寻找告别殖民主义遗留的赤贫和落后状况的人民来说特别重要。"南非共产党代表强调说："在所有方面，蒙古的先进经验对我们的人民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蒙古参加亚非团结组织对蒙古在亚非国家威信的提高起到了不小的作用。蒙古被接纳参加亚非国家各种会议工作，参加联合国亚非组织等。蒙古在这里坚定地支持各国人民反

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支持反对非洲一些国家少数白人的种族歧视制度的斗争。在这方面,蒙古总是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共同利益出发,同苏联密切协调自己的活动。如果考虑到由于中国方面的抵制或其他原因,苏联不可能总是参加一些国际组织的会议,这一点就显得特别重要。例如,不久前蒙古代表团参加在卡萨布兰卡召开的亚非经济合作组织会议时,努力开展自己的活动,宣传自己的发展经验,消除中国代表团敌对活动的影响,支持乌兹别克斯坦加入这一组织的要求。

与此同时还需要指出,最近一些年来,蒙古同一系列亚非国家的关系不仅没有沿着上升路线发展,而且积极性也降低了。如果说最初几年只是举行一些国家和政府首脑会晤,那么,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政治接触主要是在庆祝民族节日或其他一些有纪念意义的事件时互致贺电。大使很少前往相互国家的首都,他们都是兼任的,通常具有礼节性质,在发展蒙古和亚非国家政治关系方面没有作出实质性贡献。

蒙古同大部分亚非国家的经济联系没有取得进展。在很多时候维持的这种联系实质上仅具有象征意义。这主要是因为蒙古的资源出口极为有限,今后一段时间也不会有实质性进步。同时,蒙古的大众消费品还需要从社会主义国家,首先是苏联进口。一些亚非国家对于扩大同蒙古的贸易往来缺乏兴趣:第一,是由于交通运输不便;第二,是由于发展中国家感兴趣的主要是进口工业设备,而不是成为蒙古出口重要组成部分的原料。

还有其他一些客观原因,以及一些主观因素,制约着蒙古同亚非国家关系的发展。

现在蒙古同这两个大陆的 14 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只在 3 个国家的首都(德里、阿尔及尔、科纳克里)建立了外交代办处。没有任何一个亚非国家在乌兰巴托建立常设外交代办处。

在很多时候蒙古拒绝参加沿着亚非团结路线举行的各种会议。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专业技术干部不足和外汇不够。

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成员国家,蒙古是亚洲社会主义国家中唯一一个坚定地坚持马列主义原则、坚持 1957 年和 1958 年共产党和工人党纲领文件的国家。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始终如一地支持苏联的对外政策,从社会主义国家对等发展中国家的总体的利益出发安排自己在国际舞台的活动。

在亚非国家存在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条件下,那里不仅憎恨殖民主义国家,同时对欧洲社会主义国家也不信任,把他们归为"白人"一类。因此,一些亚非国家高度关注蒙古,在他们眼中蒙古不只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亚洲"有色"国家。

这不足为怪,因为发展中国家同蒙古发展关系时看中的是"亚洲"国家,有时是同自己有共同的"佛教"信仰、共同的文化和历史。在这方面最为明显的例子是上面谈到的新加坡。

蒙古朋友明白亚非国家对自己持这种态度的优势。例如,今年 2 月,蒙古外交部长杜格尔苏伦在同葛罗米柯会谈时谈到,显然,在联合国各机构中经常把蒙古列为亚洲国家的候选人是合适的。

众所周知,近些年来,中国领导层在亚非民族解放运动、亚非团结问题上的政策是直接与苏联和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方针相对抗的,在对待亚非国家的政策上,中国拒绝推行统一

路线，总是竭力破坏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一地区的阵地。在这种条件下，作为无可争议的亚洲国家的蒙古对亚非国家积极开展为我所需的活动，毫无疑问具有重要意义。扩大蒙古对这些国家的宣传将在某种程度上揭露中国关于“中国道路”是落后国家唯一可接受的道路的宣传。

锡兰共产党领导人关于请求蒙古向科伦坡指派常驻外交代表的请求证实了这一点。他们以中国人加强对锡兰不友好的宣言为自己要求的依据。作为亚洲国家的蒙古在科伦坡建立外交代表常驻地，将有利于揭露中国方面的宣传，因为众所周知，在北京的宣言中在很大程度上利用了属于亚洲国家这个因素。此外，锡兰共产党领导人克尼曼和魏克玛沁格表示，还有这样一个极为重要的特点——锡兰和蒙古同属佛教国家，蒙古在科伦坡建立外交代表常驻地将对锡兰政府和社会施加一定的影响提供了可能。

这样，蒙古同亚非国家发展积极关系存在非常好的前景和可能性。必须扩大蒙古在这一地区的活动，这符合社会主义阵营的共同利益。而实现这一前景的可能性，毫无疑问，是存在的。

蒙古人民共和国积极开展对亚非活动需要苏联在这方面提供实际援助予以巩固。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

1966 年 10 月 21 日

Мб-5397/гс

第 1250 号

ЦГАРК，ф. 1955，оп. 2，д. 295，л. 56-64

№25717

苏达利科夫与张德群会谈纪要：苏联使馆遭到围攻和侮辱[①]

（1966 年 10 月 27 日）

……苏达利科夫宣读了照会：

苏联驻北京大使馆近日来又不断受到中国公民有组织的无端挑衅和侮辱。

……10 月 23 日起苏联大使馆的入口被堵。在大使馆附近结集的人群威胁、侮辱我使馆的工作人员和到我使馆来访的外国客人。捣乱者大耍流氓腔、骂出一些脏话、做出一些低级

① 该文件系摘录自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下流的手势和姿势、吐痰等。

……使人不得不产生一种印象,国与国之间相互公认的原则、最起码的国际法准则和外交代表机构的豁免权在中国竟遭到粗暴的破坏已经变成一种惯例。

张德群说,他"反对照会中"对中国革命群众的攻击。苏联大使馆附近……发生的事件是……由苏方的行为引起的,……苏方毫无理由地决定将中国留学生驱逐出境。

张德群继续发挥说,好像苏联报刊天天刊登一些污蔑和攻击"伟大的文化大革命"、中国人民和甚至"中国各族人民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文章,这不能不引起中国人民的愤怒。临时代办认为,"革命群众"的举动是正确的、无可指责的。

……

АВПРФ,ф. 0100,оп. 53,п. 223,д. 5,л. 110 - 112

№25475

中国外交部的答复照会:关于苏联大使馆周围的反苏骚乱[①]

(1966 年 11 月 1 日)

(对苏联外交部 1966 年 10 月 27 日照会的答复)

……最近苏联领导集团一方面与美帝国主义大肆勾结,竞相出卖全世界人民的革命利益,另一方面掀起新的反华浪潮,他们正走向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毫无理由地驱逐正在苏联学习的所有中国学生、研究生和实习人员。这必然引起广大革命的中国人民无比的愤慨。革命青年自发地聚集在通向苏联驻中国大使馆的"反修路"上,张贴大字报,对你们毫无根据的驱逐在苏联学习的中国学生、研究生和实习人员表示抗议,并谴责你们的行径……这些完全都是正义的革命行动。……如果你们有足够的勇气,就将中国广大革命群众写的所有大字报刊登在苏联的报纸上,让苏联人民评价一下这些大字报中有什么内容是针对苏联人民的。

最近这几天我们国家的广大革命群众表现得非常克制,并保持秩序井然……你们的临时代办及其夫人,以及你们大使馆的工作人员经常去"反修路"看大字报,没有受到任何阻挠。

---

① 该文件系摘录自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你们在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道路上比赫鲁晓夫走得更远。你们还有什么权利就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原则和国际法准则夸夸其谈？我们倒想建议你们最好表现得更为诚实一些，否则，你们越是拼命伪装，就越充分地暴露你们自己反华的嘴脸。

АВПРФ，ф. 0100，оп. 59，п. 525，д. 2，л. 38－39

№25482

马耶夫斯基致苏达利科夫函：关于中国中苏友协代表团的访问[①]

（1966 年 11 月 26 日）

致 Н. Г. 苏达利科夫：

……总体来说，中国认为我们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审慎态度，好像证明了“领袖”的力量和绝对正确，使得“修正主义分子”都非常怕他。

……我们一直以拒绝与中国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上论战为出发点。可问题在于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任何的论战。中国人致力于大国主义的目的，在于培养宗教式的狂热，教育青年参与任何的冒险行为，他们进行的不是论战，而是反苏反社会主义的运动。所以现在的问题在于如何反击这场反苏反社会主义的运动，在最大程度上符合国际共产主义和中国人民自己的利益。

苏中友好协会代表团在中国逗留时所碰到的困难表明，我们前往中国的代表团唯一的立场，就是进攻式的强硬立场。

……

《真理报》政治评论员

马耶夫斯基

1966 年 11 月 26 日

АВПРФ，ф. 100，оп. 53，п. 224，д. 33，л. 26－27

① 该文件系摘录自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25546

谢尔比纳致杰米切夫函：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和红卫兵组织的比较[①]

(1966 年 11 月底)

致 П. Н. 杰米切夫：

……

无论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活动家的观点和反党的中国“红卫兵”流氓行为有什么样的一致，从现代性的进程来看，这些在本质上是反历史的，是毫无根据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活动家的错误认识和“红卫兵”的行为按其起源、思想和目的来看，他们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错误的左倾看法在很多方面是对新的，尚不为人知的革命艺术的某些方面歪曲的反映，这经常会导致片面的歪曲和判断。

“红卫兵”的破坏行动已经不是什么错误认识，而是一种对社会主义的原则和精神财富的“否定和侵蚀”。

这里指的是 С. 科瓦廖夫的文章《社会主义和文化遗产》(《真理报》1966 年 9 月 16 日)；Э. 巴勒的文章《关于列宁主义对待文化革命的态度》(《苏联文化》1966 年 9 月 29 日)；Л. 阿拉尤的文章《旁注》(《法国来信》1966 年 8 月 8 日)。

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代所长

В. 谢尔比纳

РГАНИ，ф. 5，оп. 58，д. 24，л. 217－218

№25705

1966 年中国官员关于苏联和苏共的一些言论[②]

(1966 年 12 月[③])

毛泽东 1966 年 10 月 25 日给阿尔巴尼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电：

---

① 该文件系摘录自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② 该文件系摘录自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③ 该档案未标明文件的具体日期，这里是根据内容推断的。——编注

"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南斯拉夫铁托集团以及其他各色各样的叛徒和工贼集团与你们相比，充其量是一堆烂泥，而你们是直上云霄的山峰。他们是一群在帝国主义面前卑躬屈膝的走狗；而你们是敢于与帝国主义斗争的无产阶级大无畏革命者。……现代修正主义集团当权的苏联、南斯拉夫和其他国家已经改变了或正在改变颜色，实现了或正在实现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资产阶级专政。"

1965 年 12 月

摘自陈毅答日本报纸《赤旗报》问：

"……如果他(苏联)真正想援助越南人民，全面、有效地支持越南人民的反美救国斗争，那他可以在各方面采取各种方法，牵制美国力量，为了不断地揭露美国在谈判问题上的阴谋。"

1966 年 4 月

摘自刘宁一 1966 年 4 月 9 日在新西兰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苏共领导人"扮演'救火队'的角色，试图扑灭越南人民反对美帝的斗争"。

1966 年 5 月

摘自周恩来 1966 年 4 月 30 日在北京欢迎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大会上的讲话：

"铁托集团在南斯拉夫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特别是以苏联为首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走上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严重损害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同时也给所有国家的千百万群众提供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反面经验，人们可以从中吸取教训，防止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内部蜕化变质。

……为了蒙骗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苏共领导集团在不久前召开的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上继续玩弄两面手法：假反帝，真投降……；假革命，真叛变；假团结，真分裂。

……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再一次证明了苏修领导集团无论怎样设法支撑快要倒塌的门面，也无法掩饰自己各种尖锐矛盾和严重的困难。苏共领导集团正坐在火山上。"

摘自邓小平于 1966 年 5 月 6 日在上海欢迎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的群众大会上的讲话：

"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再一次证明了苏共领导集团堕落了，蜕化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敌人，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不可救药的叛徒，世界人民革命事业的阴谋破坏者和美帝国主义的帮凶。"

"我们决不能和现代修正主义团结在一起，应该彻底干净地与他们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划清界限；决不能对他们手软，而应该与他们进行原则性的斗争；我们决不能对他们妥协，而应该将与他们的斗争进行到底。"

……"我们决不能与它'统一行动'；决不能向他们提供帮助；我们决不能美化他们，不应该给他们投下任何一根救命稻草。"

1966 年 6 月

摘自陈毅 1966 年 6 月 27 日在亚非国家作家紧急会议上开幕式的讲话：

"我国进行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是一次严重的打击。他们除了失望以外，什么也得不到。我们可以向美帝国主义者和苏联现代修正主

义者：你们敢不敢在你们的国家发动像中国如此规模的‘文化大革命’？我肯定地说，不敢。”

1966年7月

摘自周恩来1966年6月27日在地拉那群众大会上的讲话：

“现代修正主义者阵营中霸权主义的地位越来越削弱了，他们的指挥棒已经失去了原先的威力。”

“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是一个原则问题。而在原则问题上不可以立场不鲜明。”

摘自周恩来1966年7月9日在亚非国家作家紧急会议闭幕后的告别宴会上的讲话：

“决不能让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和印度反动派加入统一战线，相反，他们只能作为反美国国际统一战线的对象。”

摘自刘宁一1966年7月22日在支援越南人民斗争大会上的讲话：

“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从来不忘美苏合作的轨道上的越南问题，串联地为美国帝国主义提供帮助，因此他必定成为国际反美统一战线的斗争目标！”

1966年11月

摘自康生1966年11月2日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他们妄想阻止中国的革命潮流，共同玩起了新的反共、反华的把戏。……他们在自己周围聚集了一帮帮腔的人，他们通过歪曲事实，制造各种谎言，将攻击矛头直指中国、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我们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他们跑到其他国家去，到处造谣，制造阴谋，妄图拼凑叛徒、工贼集团，达到赫鲁晓夫没有达到的孤立中国和反对中国的目的。

……在与美国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没有中间路线。必须与以苏共领导集团为核心的苏联修正主义划清界限，无情地揭露其叛徒的真面目，决不与他们‘采取联合行动’。”

АВПРФ，ф. 0100，оп. 54，п. 228，д. 11，л. 8－87

№25471

波诺马廖夫的报告：匈牙利驱逐中国留学生[1]

（1966年12月1日）

……

由于“文化大革命”，中国人驱逐了匈牙利学生。匈牙利决定让中国学生回国。

---

① 该档案系摘录自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今年11月17日在得到又一次的提醒之后，中国学生离开了在匈牙利的宿舍。正是在这一天中国外交部相关负责人召见了匈牙利大使，并向他提交了如下抗议："驱逐中国学生的现象并不是偶然的，与此有关的是，你们固执地跟在苏联修正主义者后面，与中国对立。执政的苏联修正主义集团驱逐了我们的学生。现在你们在仿效他们：发表了大量的反对社会主义的文章，内容都是猛烈攻击我们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我们的内外政策。我们要正告你们，如果你们继续这样的话，将不会有好的结果。"

……

苏联驻匈牙利大使馆一等秘书

Ю. 波诺马廖夫

АВПРФ，ф. 0100，оп. 59，п. 529，д. 37，л. 79－80

№25547

苏达利科夫与安致远会谈记录：《中国画报》发表的反苏文章[①]

(1966年12月2日)

与中国驻苏大使馆参赞安致远的会谈记录

1966年12月2日

……苏达利科夫说，《中国画报》在苏联发行已经有十二个年头了。……可是最近的事实清楚地证明，中方将这份出版物变为一种对苏联进行恶意诽谤活动的工具。……如果继续发表文章，苏方将被迫停止在本国发行这本画报。

参赞试图证明《中国画报》上没有刊登过反苏的文章。他说，办这本画报的目的是想向苏联读者介绍中国劳动人民的生活和当前中国发生的事情。现今的中国正在进行"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很自然，要在《中国画报》上谈到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

安说，驻外大使馆在所驻国家推广正式的出版物是合法的、正常的。大使馆这样的活动是履行职能的一种形式……参赞大声地说，"如果不这样做，大使馆还能做些什么？"

……强烈地反驳了安的说法，说，如果他无论在工厂或集体农庄，发表自己荒谬的言论，

① 该文件系摘录自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就会被按俄罗斯的旧俗坐上小车被撵出去,像以前对待工贼一样。

……

РГАНИ,ф. 5,оп. 58,д. 30,л. 238－240

№25668

苏联驻朝鲜大使馆的报告:中朝关系发生了实质性变化[①]

(1966年12月2日)

最近朝鲜与中国的关系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

朝鲜在与中国紧密亲近的时期没能巩固劳动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威信,中国领导无法在国际舞台上向朝鲜提供极其重要的帮助……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十月全体会议(1964年)向朝鲜领导打开了与苏联重建友好关系的远景……

朝鲜与苏联恢复联系……引起了北京的不满。中国领导人开始企图对朝鲜领导人施加压力。这不得不使朝鲜领导人修正他们与中国领导人的关系。最近的一年半里他们变得越来越冷淡。

……

从朝鲜与中国的关系来看,金日成在劳动党大会(1966年10月)上所作的报告,其特点是表明了朝鲜领导人摆脱了一些错误的亲中国的观点……和对一些诸如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在革命进程发展中的作用、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方式问题回归到更为正确立场的过程。

比较一下两个报告很有意思:"捍卫社会主义阵营"(1963年11月)这篇文章和金日成在劳动党大会(1966年10月)上的报告。同时特别明显地看出与三年以前朝鲜领导人立场的区别。

朝鲜领导人1963年11月在题为"捍卫社会主义阵营"(该文好像是金日成亲自修改的)的文章中表示支持中国领导人的立场。文章从头至尾目的在于反对苏联共产党、反对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决议,内容包含了粗鲁的诽谤和对苏联的诬蔑。

---

① 该文件系摘录自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其中，文章还说道："有些人冒充自己是共产党人，与帝国主义者一起毫无根据地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进行谴责和诬蔑，对它们进行猛烈地攻击。这是一件可耻而又十分危险的事情。"

金日成在1966年10月的劳动党大会上作的报告中批评了许多中国领导人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看法。这是第一次刊登劳动党领导人反对中国执政集团政策的发言。报告中有对苏联共产党进行批评的暗示，回避了一些重要的问题(捍卫和平、裁军、劳动党对建议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的态度)，但总体上报告带有反对中国的倾向。

有哪些主要原因促使了朝鲜领导人对自己与中国领导集团的关系做出修正?

随着越南事态的发展，劳动党领导人越来越深信，中国领导集团是在关于反帝斗争方面用一些夸夸其谈的辞藻来进行掩饰，但实际上却是在妨碍这场斗争。在这方面苏联领导人与金日成的会见和会谈、劳动党代表团参加苏联共产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①]的工作、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对越南人民的各方面援助都具有重大意义。对朝鲜领导人而言，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为了自己的大国民族主义目的而利用越南局势的意图越来越明显了。

不排除美国和韩国对朝鲜挑衅的可能性，朝鲜领导人现在怀疑中国以前做出的将始终不渝地与朝鲜人民分享他们的喜怒哀乐的保证。

朝鲜领导人担心，一旦中国领导人实现了从组织上和政治上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的计划，他们就有可能在与亲中国的分裂主义者进行的运动中单独面对中国领导人了。这将有可能动摇劳动党的威望，并将加强中国领导人对劳动党领导人的压力。

中国领导人在内外政策上的完全失败使朝鲜领导人完全清醒了。金日成在今年11月与苏联大使会谈时谈论了中国领导在中国建设共产主义问题上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确信了中国领导人的"左倾"机会主义。

……

就如劳动党大会指出的那样，朝鲜领导在有关建立亚洲反美统一战线的问题上表达了与中国领导相反的看法。随着越南局势的复杂化，劳动党领导人对中国领导人行为的看法的变化越来越明显了。1966年年初朝鲜领导人只是在秘密会谈时说，他们不同意中国领导人在越南问题上的立场。金日成在1966年10月劳动党代表会议上作的报告中明显针对的是中国领导人，说他们"只会夸夸其谈地说他们反对美帝国主义，而事实上却不采取任何具体的措施以制止侵略"。

据金日成说，劳动党领导人试图利用以宫本显治为首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团访问中国和朝鲜，使中国领导相信建立统一的反美阵线的必要性，但他们没有成功。

……

朝鲜领导人指责中国领导人的大国沙文主义、教条主义、"左倾"机会主义。根据朝鲜同志的声明，中国人不考虑已经改变了的现实，教条地重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个别原理并打着最革命的口号怂恿人们做出极端的行动。

---

① 原文如此，显然应是二十三大。——编注

朝鲜领导人认真地关注着与中国进行的所谓"文化大革命"有关的事件。在今年11月与苏联大使会谈时金日成说:"中国人想一下子实现'文化大革命'。这难道不是中国共产党和其领导人'左倾'机会主义的例子吗?"

朝鲜报刊上的文章、金日成在党代会上的发言、金一在朝鲜最高人民大会第六次会议上发言对此做出的阐述是:真正的文化革命是一个漫长的和复杂的过程,需要整体提高全民族的文化和普通教育水准。金一在今年11月的朝鲜最高人民大会第六次会议上,其中在谈到朝鲜进行文化革命的方式与形式时着重指出,劳动党"反对任何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相对立的主观急躁冒进、反对以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待民族文化遗产"。

……中国开始"文化大革命"后,很快,根据朝鲜同志主动要求,更改了转播中国朝鲜语广播的波段。转播的时间也改了,对听众不是很方便。

……

对于中国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指责,说劳动党好像在"脚踩两条船",朝鲜领导予以激烈的反驳,金日成在劳动党会议上的报告中说:"那些对我们造谣中伤的人,自己的脚踩在其中的一条破船上。"

……朝鲜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对朝鲜领导人的立场及其实行的政策产生的影响很大。

朝鲜领导人不得不考虑中国领导人有可能对他们采取的经济制裁以及由此给朝鲜带来的沉重经济后果。

……在此以前,朝鲜领导人的军事理论是以中国的所谓"人民战争"为基础的。轻视各种现代武器的意义,其中包括核武器和火箭武器,不考虑主要对手美国及其同盟者军事和经济的潜在能力。

如今在战争的战略与战术问题方面和在军队教学中朝鲜同志对自己的宗旨作了一定的修正。

在这方面苏联军事设备的供应起了很大的作用。根据苏联军事专家的观察,在掌握新技术的教学过程中,朝鲜军人开始理解新技术在现代战争中的意义。

这是派遣朝鲜军人去苏联学习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撤回所有在中国军事院校学习的朝鲜人员。有消息说,中国领导人好像不止一次地建议朝鲜人重新派遣自己的军事专家来学习,但朝鲜领导暂时没有答应。

由于派遣朝鲜志愿军去越南(现在这支部队人数达100多人),朝鲜与中国之间出现了一些摩擦。据非官方的消息,中国领导人劝说朝鲜领导人相信,朝鲜方面对越南最好的帮助就是在朝鲜半岛对美国人开展军事行动。为此中国领导人答应在各个方面向朝鲜提供援助。尽管有来自中国方面的压力,可朝鲜同志在拒绝这一方案的同时,提出了自己的相反计划——派遣志愿军去越南。

……看来,在解决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重要问题的处理方式上朝鲜领导人将竭尽全力继续展示自己的独立性。

看来朝鲜在与南斯拉夫、印度关系上的立场,可以认为是对中国人的让步。尽管朝鲜人现在也没有因为苏联与印度的合作发展而批评苏联政府,可他们还是像以前那样将印度与

中国之间的边界纠纷归罪于“印度的反动势力”。

同时，金日成在与苏联大使会谈时说：“中国人不去寻找如何正确解决这个冲突，而是相反使它复杂化了，并因此不仅阻碍了在印度，而且是整个亚洲的革命发展。”……

……对于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最近获得统一的前景，朝鲜领导人的看法是怀疑的。看来，对中国领导人很了解的朝鲜领导认为，无论什么样的批评，公开的还是隐秘的，对他们都不起作用。就如金日成与苏联大使会谈时说的那样：“别去管中国人”，到那时“他们自己相互打起来了，就会找到正确的解决方式”。朝鲜领导由此看到了如何从已形成的复杂局面中摆脱出来的办法。

苏联驻朝鲜大使馆一等秘书

A. 博鲁诺夫

АВПРФ，ф. 0102，оп. 22，п. 109，д. 22，л. 38－49

№25548

梅夏采夫致苏共中央报告：在苏联放映关于中国“文革”的纪录片

（1966 年 12 月 6 日）

机　密

致苏共中央：

苏联部长会议领导下的电影事业委员会搞到了一部关于所谓在中国进行的“文化革命”的波兰纪录短片。广播电视委员会看了这部影片，认为在中央电视台播出是适当的……

放映这部电影可以帮助苏联的社会舆论对中国发生的事件有更全面和直观的了解。

已与 A. B. 罗曼诺夫同志协商过。

恳请得到苏共中央的同意。

委员会主席

H. 梅夏采夫

1966 年 12 月 6 日

РГАНИ，ф. 5，оп. 58，д. 25，л. 123

№25472

希特罗夫的报告：罗马尼亚与中国的关系[①]

（1966 年 12 月 12 日）

……

对于与中国共产党的分歧以及克服这些分歧的途径等问题，罗马尼亚同志的看法是比较特别的。他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是，好像这些分歧主要是在苏共和中共之间产生的，并且现在主要存在于他们之间，首先涉及的是这两个政党。对于这些分歧，苏共和中共负有同样的责任……

他们的这种中立的、有时候倾向于中国的立场并不是以有原则的意识形态上的考虑为基础，而是在竭力利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已形成的分歧局面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以便更加容易地推行自己的更加注重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罗马尼亚同志试图直接调解分歧，为此，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 И. Г. 毛雷尔在 1964 年对北京进行了两次访问，并在后来采取了一些在很大程度上都具有宣传性质的措施，因为很难设想，罗马尼亚同志指望获得成功。

由于中国领导人日益激烈的反对苏联共产党和反对共产主义运动方针的言论，他们面临的孤立日益加剧，近来，罗马尼亚同志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共领导人的活动重新进行评价。

……在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会见和会谈时，其中包括，И. Г. 毛雷尔在今年年初对匈牙利和南斯拉夫进行访问、И. Б. 铁托在今年 5 月对罗马尼亚进行的访问，以及在其他各种场合进行的会谈，罗马尼亚同志都说，在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上，他们不同意中国共产党的看法，同时表达了如下看法：分歧是有可能克服的，可以取得相互谅解，为此必须忍耐，要有耐心，其他兄弟党完全不应发表任何会促使情况更为复杂的言论。

最近罗马尼亚同志开始承认，仅仅有耐心和忍耐还是不够的，并谈到了在实践中采取行动，首先就是在反对美国入侵越南的斗争中采取行动的必要性。表示……对中国消极立场的担忧，今年 5 月，以埃米尔·波德纳拉希为首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在访问越南后的回国途中在北京做了两天的停留，罗马尼亚同志主动提出，试图与越南和中国领导人就关于共同采取行动的问题召开社会主义国家会议一事进行协商，同时就政治解决越南问题可能采取的措施进行试探。他们对中国采取的消极立场感到担忧。罗马尼亚领导人真正地指望中国的立场能够缓和，但是他们的尝试遭到了中方的拒绝。今年 10 月 И. Г. 毛雷尔对河内进行了一次非正式的访问，这次访问的最后一站是北京，以便尝试着再次说服中国人，但这次访问也没有成功。

关于"文化大革命"。在秘密会谈中，罗马尼亚同志声明，罗马尼亚共产党党中央不赞成这场"革命"。……同时他们强调说，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完全是中国的国内问题。

---

① 该档案系摘录自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 —编注

……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在关于中国局势的一次谈话中说，“比如，不能对所有中国领导人的所作所为都进行‘辱骂’，因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有许多好同志，不能对他们所有人给予同样的评介。”

关于周恩来的访问(1966年6月16日至24日)：

“最初，周恩来的出访定在1966年3月，据一些资料表明，在这一问题上，中国是坚决坚持的，这是因为他们希望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做出同罗马尼亚领导人进行磋商的一种假象。罗马尼亚方面花费了许多努力才使这次访问延期，这引起了中国人一定的不满。”

……在对当今世界局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行讨论的时候，有一些看法存在的重大分歧使得这次谈判十分艰难……在巩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和社会主义国家采取共同行动、对越南人民进行支持的问题上，罗马尼亚同志十分坚决地对中国人说出了自己的看法，表示不同意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反苏活动。在关于在越南采取共同行动的问题上，进行的讨论异常紧张。罗马尼亚方面建议，召开社会主义国家特别会议来就这一问题制定共同的路线。中国人不同意这样做，并像平常一样发表了对苏联进行指责的言论，同时夸大了中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提供的援助的作用。

苏联驻罗马尼亚大使馆二等秘书

A. 希特罗夫

АВПРФ，ф. 0100，оп. 59，п. 529，д. 37，л. 90－103

№20834－1

苏共中央全会会议记录：勃列日涅夫关于苏中关系的报告

(1966年12月12日)

苏共中央全会会议速记记录

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十二月中央全会

(1966年12月12—13日)

速记手稿

会议主持人：Л. И. 勃列日涅夫、H. B. 波德戈尔内

报告："关于苏联的国际政策和苏共为争取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斗争"

报告人——Л. И. 勃列日涅夫

会议程序：

Л. И. 勃列日涅夫——会议主持，致开幕词

M. A. 苏斯洛夫——宣布由 Л. И. 勃列日涅夫作报告

Л. И. 勃列日涅夫——作报告

H. B. 波德戈尔内——会议主持，宣布会间休息

第一次会议

(1966 年 12 月 12 日)

会议主持：勃列日涅夫同志。

同志们！此次党中央全会由于正当原因——主要是疾病原因而缺席的代表包括：中央委员 15 人，中央修补委员 11 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8 人。

谁有什么意见吗？

表决：全会工作开始。

会议主持：勃列日涅夫同志。中央政治局提交全会讨论的问题有如下三项：

1. 关于苏联的国际政策和苏共争取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斗争。关于报告人，你们均已知道。

2. 关于 1967 年苏联国民经济国家发展计划。报告人 ——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和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巴伊巴科夫同志。

3. 关于 1967 年度苏联国家预算情况。报告人——财政部长加尔布佐夫同志。

这样，全会正式进入(既定)议事日程。

鉴于有人建议，我们对第一个问题的报告人没有限定具体的报告时间。我这里提前声明，让我们大家在报告中间来一个短暂的休息。有人反对吗？没有。

有人建议让我们这样来安排今天的工作：在午饭前结束报告，而午饭后便开始关于第一个问题的讨论。

有人建议，在讨论期间把给同志们的发言时间限定在 15 20 分钟之间。有人反对吗？没有。

有人建议，我们今天的工作应在晚上六点以前结束。

苏斯洛夫：还应带有中间休息时间。

会议主席勃列日涅夫同志：对会议有什么希望吗?!

还有其他建议吗？没有。

我们的会议程序和议程就这样确定。

会议主持：苏斯洛夫同志。下面由 Л. И. 勃列日涅夫同志作报告，题目为关于苏联的国际政策和苏共争取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斗争。

苏联的国际政策和苏共争取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斗争

同志们！中央政治局决定，把关于我们党的国际政策及其为争取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团结而斗争的问题提交这次全会讨论。

问题在于，国际政策诸问题在我们党的活动和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可能，中央还从来没有在对外政策事务上给予过如此高度的重视和力量。我们详细地讨论了该报告的内容。这里，我们认为有必要强调的是，该报告所反映的是全体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委员会书记们的一致观点。

由于我们这次全会，是在苏共二十三大召开几个月之后举行的，因此这里便不必再涉及我们国际政策的总方针方面的问题了。我们的国际政策总方针已在(苏共二十三大)会议文件中有相关表述，我们将坚定不移地在国际舞台上把这一方针贯彻到自己的实际活动中。

苏共二十三大诸文件说明了现代国际形势的主要特点，其中一方面是和平、民主、社会主义和进步力量的不断增长，另一方面则是世界帝国主义不断地企图以各种手段来阻碍革命的进步发展、阻挡各民族的民族和社会解放进程。

在当今世界上还没有一个重大国际问题，能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进步和反动的力量之间如此剧烈的交锋和对抗相提并论。

上述双方主力在国际舞台上的斗争采取了极其多样化的方式，从而使国际生活呈现出迅速变化的矛盾景象——当我们在某一方面获得成功的同时，就可能由于事件的意外转折而导致我们在其他方面的失败。因此，针对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我们都必须加以考虑，以便为我们在对外政策领域的日常活动制定出相应的策略。

甚至在苏共二十三大之后至今的短暂期限内，在国际发展中便已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并要求我们必须明确自己的态度。鉴此，政治局认为有必要就这方面的相关问题向中央全会做出报告。

一、当前国际形势和苏维埃国家最重大的对外政治活动

我们全会召集的时间正是50年以前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之际。正是我们的十月革命开创了一个新世界——社会主义世界，从而为自身与旧世界——资本主义世界之间开辟了一条清晰而明确的分水岭。正是十月(革命)改变了国际发展的整体进程。还在半世纪以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便曾满怀信心地说："我们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必将牢固耸立，就像是树立在全体劳苦大众面前的一把国际主义火炬和榜样。"(《列宁选集》，第26卷，第429页)

如果说，如今在世界上已存在不是一个，而是14个拥有人类1/3人口的社会主义国家，那么这一历史发展结果的基础，则是由十月革命奠定的。如果说如今在那些曾属于殖民帝

国的区域已产生了70个正建设各自生活的独立国家,那么促使世界发生这一变化的最终根源仍应归功于伟大的十月革命,应归功于世界社会主义的诞生和巩固。如果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能够为争取社会主义的进一步斗争赢得稳固的阵地,而共产主义运动也已成为当代一个有影响力的政治力量,那么所有这些最巨大成就的源头仍要追溯到1917年10月,因为这些最重大成就与赢得了社会主义的这个国家(苏联)在世界舞台上所发挥的作用以及由列宁所缔造的苏联共产党所领导的这个国家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

我们国家——国际舞台上一支巨大的力量。苏联——是一个拥有2.35亿以上人口的巨大工业国,我们的经济实力仍在不断增长。

我们在巩固苏维埃国家的强大和共产主义建设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功——这是提高苏联国际影响力的最有力手段,是我们对外政策的牢固基础。

我们完全可以满意地说,近两年间以中央在国民经济领域所制定的新政策为基础,我国的劳动者们已取得了不小的成绩。我们的工业和农业也有了长足的进步。

今年,你们都知道,我们国家的主要农作物收成都很好。这不仅使我们有可能不间断地确保居民的各种主要粮食品种供应和满足工业的需要,而且补充了我们国家的战略物资储备。而这,同志们,对于任何国家都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对于处于斗争条件的我们国家更是极其重要的。我们农村的情况无疑是有所好转了。我们认为,这首先应归功于我们落实了1965年3月中央全会、党的二十三大和今年5月中央全会所通过的关于农业发展问题的各项决议的结果。我们实施的关于振兴农业的举措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了农业的范畴。强调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些举措将会全面促使我们经济的进一步高涨。

工业方面的情况也使我们感到高兴。我国工业正稳步达到预定速度,并在采用新的、经实践证明有效的生产计划和管理方式的基础上逐步实施改组。今年首批11个月的预测结果表明,我们五年计划第一年度工业方面的任务总体完成情况不错。

我们的经济成就对外界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许多兄弟党代表在与苏共中央会谈期间均强调,国外劳动群众都看到并高度评价苏联经济的振兴,称赞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所执行的方针。他们对我们说:如今人们都在把苏联的共产主义建设与中国领导人的方针相比较。后者断言,根本没有必要建造新的工厂和创造其他物质财富,而据北京的理论家们说,因为一切都必将被世界大战所毁灭。

我们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和苏联各民族兄弟友好的发展,具有无可估价的国际意义。各民族友谊——苏维埃国家力量的最重要源泉之一。不久前,我们各民族对塔什干地震遇难者们所给予的全面救助就直观而鲜明地反映了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伟大力量以及我们这种友谊的巩固和温暖。整个苏维埃国家都在这场救援中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我们对所有联盟共和国民众对塔什干人民所表现出的这种兄弟情谊表示由衷的感谢。这些共和国中的每一个人无疑自身也是非常需要建设大量的住宅的。但由于意识到帮助遇难的乌兹别克斯坦首都是自己的首要责任,他们还是把自己最好的建筑骨干工人派往那里。在帮助发生地震的达吉斯坦以及在今年遭遇了严重自然灾害(水灾)的克拉斯诺达尔斯克和克拉斯诺亚尔斯

克诸边疆区的过程中，我们伟大祖国各共和国和城市的苏联人均在积极的、同志式的团结方面树立了榜样。同志们，这些事实均表明在苏联人的心里对自己的遇难者们，对我们国家各民族怀着多么深厚的兄弟情谊。

我们在国内建设领域取得的每一个新成就都会对我们的对外政策产生积极的作用。因为我们的经济越雄厚，人民生活越富裕，我们的武装力量越强大，那么我们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也就会越顺利，越能更轻松地向自己的朋友们提供帮助。我们不能忘记，我们国家共产主义建设的成就才是我们对其他国家民众宣传自己的共产主义思想的最有力手段。

十月革命50周年庆典将成为苏维埃政府向国际展示自己成就的舞台。我们将自豪地在全世界面前展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所取得的那些巨大成就，以便让我们的朋友们和我们的敌人们都看到，布尔什维克——正如列宁所预见的那样——不仅能够从剥削者手中夺取俄国，而且有能力使之成为一个强大而繁荣的社会主义强国，并走在社会进步的最前列。

同志们，我们外交政策的力量还表现在我们在世界舞台上并不是单打独斗。我们有许多忠实的盟友，其中既包括社会主义国家，也有从殖民压迫中获得解放的世界各民族、国际工人和共产主义运动。我们的国际地位是稳固的，并会继续得到加强。

苏联在全世界上的影响和威望从来没有如此的强大。资本主义强国小看我们的时代以及根据自己的意愿来决定承认或不承认苏联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它们都在寻找机会与我们接触，并极力与我们建立关系。如今，关于是否承认或不承认某个政府的问题已是由我们来决定。

如果说还在不久前强大的西方国家的国务活动家们仍认为自己享有威望并可以对莫斯科指手画脚的话，那么如今他们都已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如果想提高自己的声望，那他们就必须有能力保持与苏联的关系。

我们党把苏维埃国家的所有力量及其对世界不断增长的影响力都用来服务于苏联人民的根本利益，用来支援世界所有国家的劳动者。我们的斗争目标就是要为我们国家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活动提供和平的环境。与此同时，我们还将利用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实力来支持所有革命力量和民族解放力量。

与对内政策一样，我们的对外政策也需要遵循正确的工作方式。既不能忽左忽右——没有后劲，也不能犯主观主义的错误。不论是对世界发展的主要趋势还是对每一个具体事件，我们都要作全面而深入地分析。10月中央全会之后，我们在这方面倾注了更大的精力。我们极力使自己的国际政策尽量变得更加稳定、更自信、更有连续性，同时也更具有灵活性。针对所有国际问题我们国家都要有自己的独立立场并积极贯彻自己的路线。在对外政治活动方面我们展开全面活动并利用一切力量——外交工作、对外经济联系、对外政治宣传、以各种方式帮助我们的朋友们。这里我们将以广泛的民主组织方式使自己在国际共产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中的工作有机结合起来。

我们的对外政策是由党中央制定并在其直接领导下实施的。在其实际执行过程中我们将严格遵照党和国家所制定的路线。我们的对外政治活动与党和国家的路线——两者是紧

密结合，相辅相成的关系，虽然有时由于国际关系实践的特殊性它们之间也有明确的界限。但不管怎么说，我们的国际政策是列宁主义的，是统一的，反映的是我们共产党的意愿。

现在，请允许我就近期我们对外政策中的一些主要问题作一论述。

当前，我们最尖锐的国际问题是越南战争。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仅仅要面对帝国主义者针对世界上一个国家中的民族解放运动所发动的武装入侵活动。这个由于战争而引发的尖锐问题表明，美国自 1964 年起在越南对社会主义国家之一——越南民主共和国发动了公开的武装进攻。而这意味着这样一个因素将会在那里同时发生作用，即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这就是为何苏联从一开始便要支持越南人民的解放斗争并在后续年间不断地向越南，尤其是兄弟的越南民主共和国给予政治和道义以及广泛的经济和军事方面的援助。

为了使同志们更清晰地了解我们近期在这方面所给予帮助的规模，我这里将列举这方面一些具体而可靠的数据，当然我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散布这些资料。

在近两年间，我们向越南提供了威力强大的对空火箭武器，它们足以装备 7 个半团。我们向越南民主共和国发送了近 2 000 门高射炮、530 套高射机枪装备、1 500 挺高射机枪、144 架喷气式飞机、300 多辆坦克和 1 000 多辆火炮牵引车、近千门野战炮和大量其他军事装备。越南民主共和国几乎所有的汽车和燃料都是从我们国家得到的。我们向越南人发送了大量的粮食、军用(士兵)制服、装备和其他物资。苏联对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也给予了(包括军事援助在内的)实质性帮助。

我们援助越南的物资价值已达 13 亿卢布……①

……美国继续扩大自己对越南的侵略。

在苏联方面在军事和经济上大量援助坚持斗争的越南人的情况下，中国领导人显然也不希望越南战争迅速结束。不过这会进一步增加我们国家在越南和整个亚洲的声望。从许多迹象来判断，北京并不反对使苏联在越南战争中直接与美国人发生冲突，而他们自己则站在一旁渔翁得利。难怪中国领导人中非常流行这样一句俗语："坐山观虎斗。"

显然，中国领导人这样做，当然还有其在国内政治方面的考虑：越南战争将有助于中国统治集团使国家一直保持紧张状态，从而分散人民对国内混乱局势的注意力。另外这场战争，似乎正印证了所谓毛泽东理论所断言的那样——在任何情况下武装斗争都是不可避免的。

美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北京领导人所推行政策的恶劣影响，都导致越南人民不得不长期坚持斗争并忍受巨大的战争苦难。

我们大家都还记得，在 1954 年日内瓦条约签署之后，越南劳动党采取了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和平建设新社会和以和平、民主方式统一整个国家的方针。通过坚持这一方针，越南朋友取得了不少成就。在越南民主共和国社会主义建设楷模的鼓舞下，越南南方人民开展了

① 所收集的档案此处缺一页。——编注

广泛的解放斗争。而被人民运动吓坏了的西贡傀儡政权向自己在华盛顿的主子求救，随后美帝国主义开始直接干涉越南的内政。这样，美国针对热爱自由的越南人民便发动了一场肮脏的、血腥的战争。

应当说，同志们，近一段时期越南的形势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是愈加严峻。敌人从空中和海上加紧了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境内大部分设施，尤其是交通线的集中轰炸。这严重影响了我们从越南民主共和国向南越人民运送援助物资的行动。

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经济也受到了重大损失。几乎所有大型工业企业都处于停产状态，许多连接河内与中国的铁路都被摧毁，只有个别区段的铁路尚能使用。从河内到南越边境道路上的许多桥梁被毁，渡口遭到了敌人不间断的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许多城市被炸毁，近两天敌人又恢复了对河内郊区的空袭。

由于自然灾害的影响和无法及时安排农业生产，导致越南国内许多地区出现了严重的粮食紧张。在国家南部地区，正如越南同志自己所说的那样，他们在对敌斗争中不得不日益经常性地将大部队化整为零，采取小部队游击战术。而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迫于敌人的压力，另一方面可能还由于得到了大量中国顾问的建议。

通过研究，我们在多次与越南同志会谈期间所了解到的信息，加上我国驻越军事、外交人员所作的信息通报，关于越南的形势我们得出如下结论：越南人民要将自己的英勇斗争与政治斗争结合起来，目前这一点对他们很重要。为此我们已不止一次向越南同志提出建议。尤其是在今年8月份，当越南民主共和国范文同同志和国防部长武元甲同志来我国访问之时，我们曾就这一话题进行了一系列认真的会谈。在其3天访问期间，我们的3位政治局委员和几位中央委员均与越南同志就越南形势问题进行了讨论。我们公开向他们表明了我方的态度，即拒绝将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相结合的方式是不对的；必须打破美国政府所玩弄的政治把戏，从而使约翰逊无法继续扮演呼吁谈判的和平缔造者的角色。我们认为，在继续坚持自己在著名的第四点和第五点中所表述的原则性立场和南方的武装斗争的同时越南同志仍可以就某些问题与美国人举行谈判，以争取时间。即使谈判没有获得大的成功，至少也能够向世人揭露华盛顿所玩弄的欺骗伎俩。通过运用这一斗争策略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开展支持越南的国际运动，有助于进一步孤立美帝国主义。

当前的形势是有利于我们采取上述策略的。因为美国统治集团虽然现在的军事资源本身是非常雄厚的，但深陷越南战争的处境毕竟使其不论在国内还是在世界上都感到非常的尴尬。如今，已有明显迹象表明他们正试图摆脱这一困境。而约翰逊和拉斯科已多次向苏联和其他国家发出了关于协助调解越南冲突的请求，这绝不是偶然的。虽然他们的上述请求可能又是在玩弄政治把戏，但我们也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他们是真心希望寻求某种方式来解决越南问题，尤其是考虑到美国的总统大选已日益临近的现实。

关于将军事与政治手段相结合的斗争策略，除了我们向越南朋友提出了此类建议外，还有其他一些国家的同志——如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和保加利亚等以及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兄弟党的代表。对于此类建议，越南领导人每次都这样回答：原则上承认开展政治斗

争是必要的，其中不排除与美国人举行谈判。但眼下，按他们的话说，这样做的条件尚未成熟。他们认为，必须首先赢得军事上的重大胜利，然后我们举行谈判的地位才会牢固。于是，这样的谈判就被延迟到了第二年才开始举行，可这时越南的军事形势也越来越恶化了。

试问，难道越南的同志自己没有看到国内形势的复杂性吗？他们当然是看到的。而现在出现的这种情况无疑与中国领导人有关。正是他们向越南领导人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并阻止其同意举行和平谈判的。

不过，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近几个星期以来，越南同志的立场出现了一些新变化。由于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中国发生了一系列巨大的事件，现在中国领导人已暂且顾不上管越南人了。于是，在这种情况下据越南的朋友说，自己已开始进行与谈判有关的试探性活动。至于他们的这些活动究竟会产生什么结果，目前仍很难说。

同志们！我们认为有必要向中央委员们通报与越南问题相关的各方面情况。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情况是复杂的，而这种复杂的情况也使我们和其他兄弟党感到很棘手。显而易见，我们不能置陷入灾难的兄弟社会主义国家于不顾。在继续给予正在进行武装斗争的越南人以各方面援助的同时，我们也将极力帮助越南朋友通过政治途径以解决其所面临的问题。

最后，我想对我们党和政府在越南问题上所持立场的一个重要方面加以强调：我们认为自己的义务是采取如下行动——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越南冲突升级为一场世界大战。对此，我们已当面并肯定地向越南同志作过声明。他们在答复中也认为，自己理解并完全同意苏共的这一立场。

停止美国对越南的侵略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或直接通过军事方式将美国人赶出越南，或通过政治谈判来解决问题。不论是借助哪一种方式来达到上述目标，其最终结果都将是世界爱好和平和进步力量的巨大胜利，都将是帝国主义的实际失败——承认自己无力战胜捍卫自身自由和独立的人民。

同志们！我们党已多次声明，自己国际活动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全面发展与各兄弟社会主义国家的互助合作，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团结和统一而奋斗。关于上述这些问题我还会作特别的论述。

现在，让我们来转到另一个问题，即我们与美国的关系问题。我们所有的对外政治活动始终遵循了这样一个出发点——在当今世界舞台上，对抗我们的主要力量是美帝国主义。因此在确定自己在世界任一地区的政策之时，我们始终考虑的是该政策是否符合我们与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不断斗争的原则。我们从来都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利用美国与其他国家所产生的矛盾来削弱其与自己盟友的联系，帮助执行反美路线的力量，在世界各地对美国所实施的政策给予有力的打击。

美国是一个强大、有经验和狡猾的对手。他们依靠自己强大而发达的经济。它手中掌握着一个庞大的军事机器，其中包括帝国主义阵营几乎所有的核导弹储备。在反对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力量的斗争中，它使用了各种外交手腕和狡猾的阴谋诡计。鉴此，我们也要采取相应复杂、经过深思熟虑的政治和外交手段来面对。针对华盛顿的军事准备，我们时刻都

不能放松警惕，并将全力以赴地使我们的武装力量处于全面的战斗准备状态。

在目前条件下，国家、苏联人民，以及朋友和盟友的根本利益都要求我们今后在与美国的关系方面执行一条明确而持续的路线。一方面，我们必须对其一切侵略活动、美帝国主义压制革命力量和民族解放力量的企图等给予坚决的回击，阻止其在世界各地区的扩张。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在坚持既定原则的前提下不放弃与美国就一些具体问题达成妥协的机会。我们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迫使美国也坚持和平共处的立场。

全会与会者们都知道，当前我们对美关系的重心在很大程度上是服务于这样一个目的，即在侵略越南问题上对其施加压力。众所周知，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我们采取了相当强硬的立场，并相应在一系列领域冻结了我们与美国的接触。与此同时，当美国领导层表现出相应的主动性之时，我们也会倾听他们的意见。例如，你们显然都知道，在联合国二十一届大会召集期间葛罗米柯同志根据我们的委托与美国总统约翰逊和国务卿拉斯科举行了会谈。

通过这些会谈我们了解到，美国领导人对自己在世界上日益孤立的处境极其忧虑。如今，他们由于侵略越南遭到了包括其盟友在内的几十个国家的谴责。也正因为此，美国的国务活动家们才会在上述会谈期间，一再表白自己正极力谋求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与发展同苏联的关系。作为对美国领导人的答复，我方指出，只口头表达和平的意愿是不行的，还必须付诸实际行动，而美国首先应当采取的实际行动就是——停止越南战争。

同志们，下面请允许我重点谈一谈，关于(苏美之间)签署不扩散核武器国际条约的谈判情况以及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所坚持的立场。

关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所坚持的观点，大家都是非常清楚的。如果(我们)成功地签署了这样一个关于不扩散核武器的条约，就可能阻止西德复仇主义者在任何情况下通过各种可能的方式获得核武器。这当然对我们国家和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来说，都是一件极其有利的事情。

我们通过与美国人的谈判得出如下结论：近期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明显有松动的迹象，其如今似乎已准备同意我们就该条约所建议的那些内容。我们当然明白美方在这里一定隐含着一些鬼把戏。因为在谈判期间，他们甚至以使自己摆脱目前的孤立困境为条件，而不惜用一些政治上的好处来诱惑我们。至于以后，我们就要看美国人在核不扩散条约方面究竟会采取多少实际的举措，从而使该条约能够真正起到阻止联邦德国谋求核武器的企图的作用。

我们知道，美国统治集团对自己旨在分裂社会主义国家的活动是寄予了厚望的。其中包括，他们极力利用由于中国领导人的现行政策所造成的局面，企图借此来加深中国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分裂。他们通过使用各种花招和狡猾的手段，来瓦解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我们在自己的政策中已深刻洞悉了这一点，从而为自己明确了如下任务：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加强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

这里必须强调的是，我们的盟友——兄弟社会主义国家均完全支持我们在苏美关系方面所提出的路线。而在这些问题上我们与这些党派的领导人也都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这里有一个具体的例子。这也是你们大家都知道的，为了参观航天发射场各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在莫斯科聚会。会议期间，与会者们听取了我们专门就苏方代表在联合国二十一届大会上与(美国总统)约翰逊和拉斯科之间举行会谈的情况通报。我们的朋友们均表示完全理解和赞成苏联的对美政策。

在苏美关系问题上坚定贯彻自己既定路线的同时，我们当然也考虑到了如下情况，即美国的统治上层并非铁板一块。他们中间无疑有一些强大的集团极力支持继续侵略越南，甚至准备冒发生核冲突的危险，但其中毕竟也有一些影响巨大的人物，始终坚持更加现实主义的立场。关于华盛顿内部存在的这些观点上的分歧，前不久，来访问苏联的美国共产党总书记盖斯·霍尔已对我们讲过。从社会主义事业和世界和平的利益出发，我们当然一定会考虑和充分利用美国统治集团内部所存在的这些矛盾。

在苏美关系方面，我们执行的是一条坚定而灵活的路线——这是我们在解决当代主要问题——防止世界核战争方面作出的一个重大贡献。同志们，你们都知道苏共二十三大已提出了这样的论断，即防止世界核战争是有可能的。不过要真正做到这一点，还需要我们做大量的工作。我们所制定的对美政策，就是上述工作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同志们！在从苏共二十三大到现在的一段时间里，中央政治局对这样一个问题也给予了重点关注，即确保欧洲的安全。我想这是人们都完全能够理解的。

欧洲是两个世界——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巨大军事力量相互对峙的主要地区。西德复仇主义集团也在这里积极活动着。西欧的军事基地在美帝国主义的战略计划中占据着主要地位。可以肯定地说，美国已把自己核弹头的一多半都部署在了欧洲诸国的领土上。一旦欧洲爆发战争，战火就可能迅速席卷整个世界并演变成一场世界性的核战。

总之，欧洲的安全问题——也就是苏联的安全问题，就是我们的朋友们和盟友们，以及全世界人民的安全问题。

(苏共)中央政治局还考虑到了事情的另一方面。在目前条件下，西欧是我们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主要贸易伙伴，西欧国家在科学技术领域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也会对我们国家的科技工作起到实质性的辅助作用。

简要地说，苏联所制定的欧洲政策的目标在于，巩固前一场世界大战和战后发展所保留下来的那些有利于我们的成果；削弱当代帝国主义的主要力量——美国和联邦德国之间的结盟关系，瓦解北约，防止西德复仇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死灰复燃，其中首要任务是防止其获得核武器；在此基础上，稳固我们西部边界和对我们友好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边界，并为拥有不同社会制度的欧洲国家之间的广泛、互惠合作创造条件。

在为实现上述目标而斗争的过程中我们并不孤单。我们最亲密的盟友——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华沙条约诸国会与我们并肩战斗。广大人民群众会支持我们，欧洲进步力量，尤其是我们大陆上的各共产党和工人党，也会积极向我们提供帮助。我们提出的巩固欧洲安全的目标，还得到了欧洲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理解和积极响应。

1965 年 1 月，在华沙举行的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标志着社会主义国家——华沙条约成

员国以加强欧洲安全为目标的联合斗争，已步入了一个重要的阶段。在这次会议上，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们，一致以坚定且毫不妥协的方式反对北约精心杜撰的所谓建立多边核力量的计划，该计划简单地说，就是要允许联邦德国也可以拥有核武器。此次华沙会议对西欧列强所发出的警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正是它促使北约内部围绕多边核力量而发出的喧嚣明显低落下去。尽管必须承认的是，我们暂时还不能使北约彻底放弃这些计划草案。

在苏共二十三大期间，我们就欧洲事务的新步骤——关于提出广泛的、有利于加强欧洲和平的建设性纲领问题与欧洲各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进行了磋商。经过交换意见，我们决定在下一次华沙条约成员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上将通过相应的文件。

根据这一约定，我们起草了这一文件的草案，并在此基础上，于今年7月在布加勒斯特通过了著名的关于加强欧洲安全与和平的宣言。该宣言在民主和爱好和平的基础上，制定了一个广泛的、有利于解决当前那些使欧洲各国普遍感到忧虑的问题的纲领。内容涉及：从承认现有边界不可动摇直到在欧洲形成一个所有国家——不论是小国还是大国的互信、平等合作的局面。这份文件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即使帝国主义者们至今也无法对之提出异议。

布加勒斯特宣言的力量究竟何在？首先，它对当今欧洲正在发展着的那些积极(健康)趋势产生了新的推动作用。这里所谓健康的趋势指的是，西欧国家内部广泛的社会政治力量正极力摆脱美国的控制，谋求自己的独立政策，以加强自身与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关系。其特点是：不仅只有这些国家内部的在野(反对党)力量出现了上述趋势，而且一些欧洲大国的统治集团也表现了这方面的强烈意愿。而促使其这样做的原因在于：对美国冒险主义政策的日益增强的不信任感。而这种不信任感之所以产生，主要有以下因素在起作用：随着欧洲经济独立的增长，与美国垄断集团的利益发生了冲突；欧洲国家不愿意再受到美国军事冒险主义者的强制，等等。充分利用帝国主义阵营中的矛盾当然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义务，而这也始终是我们对外政策的重要内容。

在这方面，我们尤其重视发展与法国的关系。今年夏天，我和A. H. 柯西金、H. B. 波德戈尔内等同志应政治局的委托，与法国总统戴高乐举行了一系列谈判。我们当然知道，戴高乐代表了那些阶级力量。而法国总统自然也很清楚，他这次在莫斯科的谈判中将要跟谁打交道。但结果显示：我们双方在许多问题上都成功地找到了共同语言。这里并非仅仅指我们在公开发表的苏法声明中就一些问题所达成的那些共识。事实上，苏联和法国对如下一些问题也持有相似的立场，如德国的战后边界问题，不允许德国拥有核武器等。戴高乐说，法国同意维持欧洲各国边界的现状，不希望其发生改变。关于德国的统一问题，他声明，法国不认为这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不必过于着急。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戴高乐同意我们的观点，即必须让美国人离开欧洲。他说，法国不赞成美国在越南的行动，并将遵守日内瓦协议。

此次莫斯科谈判无疑增强了戴高乐的信心，并会促使他在法国脱离北约的方向上，继续实施相应的步骤。法国人已于今年7月1日之后，从北约统帅部撤出了自己所有部署在联

邦德国境内的部队,从北约司令部召回了自己的军官,不再参加北约高级军事机构——"军事委员会"的活动。在法国的坚持下部署在法国境内的外国军队、基地和司令部也都撤出了该国。

苏法关系的不断密切和法国退出北约军事组织,促使许多西欧国家的统治集团开始重新审视和思考自己与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从而使得所谓的旨在将北美和西欧转变成敌视苏联的主要力量的大西洋集团出现了分裂的迹象。

即便从纯粹的军事角度来看,我们也不难理解法国采取上述行动的重大意义。在这种新形势下,旨在反对华沙条约诸国的北约战线实际上已沿中立国——奥地利和瑞士一线和退出北约军事组织的法国被分为两半。北约西欧战场的南、北两翼如今已是首尾不能相接,其武装力量的管理体系因此而遭到削弱,后勤保障也趋于崩溃。

苏法谈判还有一个重要的成果,即扩展了我们与法国在政治、经济领域的合作和在科技、文化方面的联系。A. H. 柯西金同志刚刚结束了对法国的访问,期间受政治局的委托他与法国总统戴高乐和法国政府首脑蓬皮杜举行了一系列认真而富有成果的谈判。这些谈判不仅成功地巩固了我们在莫斯科与戴高乐会谈的成果,而且还在某些方面取得了更深入的进展。

我这里指的是,我们与戴高乐举行的第二轮谈判,将可能促使其在一些我们感兴趣的领域进一步采取行动,如在不允许联邦德国获取核武器和与德国有关的一般性问题方面。实际上,戴高乐此次不仅坚定地表明了法国反对西德拥有核武器的立场,并且他还做出了如下肯定的声明,即在必要情况下,法国将准备在这一问题上与苏联采取统一行动。虽然法国依然不承认民主德国,但在谈判期间戴高乐已明确向我们说明,法国将会根据两个德国——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并存的事实出发,来制定自己的政策。相对以前所持立场,此举对法国而言,已经是有了一定的进步。

同志们,你们都知道,法国总统戴高乐已邀请我与尼古拉·维克多罗维奇·波德戈尔内于 1967 年正式访问法国。虽然关于此次访问究竟将会产生什么结果,我现在还一概不知,但法国方面向我们发出这个邀请的事实本身已说明了一些问题。

这里还需要强调的是,法方已表示同意我们提出的,关于广泛开展两国间各种经济联系的建议。

总体上我们应当指出的是,柯西金同志此次访问法国及其在巴黎所举行的谈判,是一件非常有益的事。其谈判的结果也与我们政治局所设想的基本一致。这些活动再次表明,在与我们接近的过程中,戴高乐表现了一定的谨慎态度。例如,在法苏两国政治关系谈判的基础上,他才决定采取上述步骤。不过,总体来看,我们与法国关系的发展还是相当成功的。

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我们的对法政策从一开始便与法国共产党做了相应的沟通。法国同志认为,苏法两国关系的转折有利于促进其所进行的斗争的成功,有利于推动法国左翼民主力量的发展。

目前,我们在欧洲所执行的路线,使西德军国主义者们深陷困境。也正是由于这原因,

西德现任军事统治集团，在存在的这些年间，首次遭遇了严重的政府危机。那么，究竟有哪些外部因素致使其陷入目前的困境呢？其中包括：我们成功地制定了欧洲和平共处的政策，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巩固、法国转而与苏联建立了合作关系，联邦德国与英国以及美国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的淡化——因为继续无条件地支持波恩的过时政策已明显对英、美不利。正是由于以上原因，导致现在波恩的政治家们发生了分裂。

当然，西德军国主义者和复仇主义者们依然会继续执迷不悟。凭借美国的支持，西德统治集团正在加紧自己的军事准备。以前，他们曾发出过关于西德将成为强大的军事强国的叫嚣。而如今其联邦国防军已拥有50万人，并可能还会将70万经过培训的预备役人员再增加一倍。今年，其军事支出已达到近190亿马克，即整个国家财政预算的30%。如今，联邦德国的科技和工业潜力，已完全有能力迅速掌握核武器技术并生产出此类武器。

正如不久前在西德一些大的地区——黑森州和巴伐利亚所进行的选举情况所显示，两年以前在西德由公开的法西斯分子组建的合法的"民族—民主主义"政党的影响力正在不断增长。所有这一切都迫使我们依然要提出关于西德复仇主义的危险性问题，以便能够及时动员人民并提高他们的警惕性。

如今，在波恩已组了一个新政府。该政府成员除了以前的资产阶级右翼政党代表外，还包括有社会民主党的代表。至于这些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们代表谁的利益，我们都是非常清楚的。他们对民主德国和共产党人的态度与最保守的右翼资产阶级党派区别很小。因此对于他们我们并不抱任何幻想。即使这样，我们仍然认为有必要开展针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工作。而我们的德国朋友们也是这样做的。我们之所以要这样做，主要是考虑到以下情况：社会民主党是联邦德国内最大的党派，这都取决于它是否能得到德国工人阶级的支持，因此后者不可能不对社会民主党的政策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力。

当然，我们也不能错误地认为，在联邦德国只有复仇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近期，在各级工会、部分青年和广大知识分子中间反战和要求民主的情绪正在不断增强。关于此，来自德国共产党的同志已经对我们说了，虽然所有这些目前仍都处于非法状态，但毕竟都是实际存在，它们为我们扩大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力提供了良机。

我们当然也不能过分夸大这些新情况的现实意义。但我们在自己的政策中一定要考虑到这些因素，而一旦有机会，我们就要根据国家所制定的路线采取一定的措施，以促进西德内部政治力量的分化，孤立其中最保守的沙文主义者，削弱联邦德国与美国的联系。

可以满意地指出，在德国问题上我们所确定的目标和策略路线均与德国统一社会党和德国共产党领导层所持立场是一致的。

在实现我们针对欧洲所提出的那些目标的斗争中，我们所制定的对英政策也具有巨大的意义。你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曾多次接待了英国首相Г.威尔逊——他最后一次访问苏联是在今年夏天。我们的代表团也出访过英国。在双方所举行的谈判期间，依据我们所制定的对英政策，我们始终致力于如下目标：促使其采取更加独立的立场，削弱英国对美国的依赖，防止其与西德接近。

我们与威尔逊的会谈是在没有外交常规约束的情况下进行的。在会谈期间，我们提醒他道，虽然在以前来访时他曾说过——随着自由党掌握国家政权他们将会执行更具有独立性的政策，可实际上如今英国仍是欧洲唯一的支持美国侵略越南的国家。

当然，我们所制定的对英政策，并不仅仅只是为了批评该国政府所坚持的立场。因为我们很清楚，英国广大的劳动群众依然对我们国家怀有好感，即使是英国资产阶级，虽然现在依然需要强烈地依附于美国，但他们并不打算自愿地屈从于美国资本。所有这些都为我们对英国施加积极影响提供了良机。

针对意大利，我们也开始采取更为积极的政策，而且我们与该国的关系已获得了一定的改善。我们一些国务活动家近期对该国进行了访问。应意大利总统的邀请，波德戈尔内同志将于今年1月前往访问。我们尤其明显地注意到，意大利实业家们对发展与我们的经济合作抱有浓厚的兴趣。而在这方面，应当说，我们两国之间的发展相当顺利。美中不足的是，作为北约成员国的意大利在对外政策方面目前依然没有出现大的变化。

这里还想指出的是，当前在欧洲出现的一个重要的新情况，即我们与该大陆上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经济关系的特点。作为我们之间贸易的补充，我们还与这些国家建立了生产和科技合作方面的联系。目前业已实施的合作项目有：今年8月我们与意大利康采恩菲亚特签署了关于在苏联建设年产量为60万辆(即日产2 000辆)的汽车制造厂的协议。我们还与法国的一些汽车公司签署了相关协议。关于建设通往意大利的天然气运输管道的谈判正在进行当中，该管道的天然气运输量为每年100亿立方米，作为交换我们将从意大利方面获得对于我们国民经济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些商品。

利用这些联系来加速苏联国民经济发展——这本身当然也是极其重要的同时，我们当然不仅仅只为获得这些商业上的利益，我们的真正目的在于：借此掌握一些真正有力的杠杆，以便对西欧国家中的统治集团施加影响。

发展与中立国家的关系依然是我们欧洲政策的重要环节。在这方面，我们近期所采取的行动之一便是不久前波德戈尔内同志正式访问了奥地利。而与我们的北方邻国——芬兰保持真正友好的关系也是我们的工作重点，其具体反映在：进一步发展双边经济、文化和政治关系，扩大两国领导人之间的私人交往等方面。

关于与这些国家的联系，我们必须强调，波德戈尔内同志在奥地利和苏斯洛夫同志及其随行人员在芬兰所作的大量而富有成果的工作。

中央政治局对如何处理在东部和南部与苏联接壤国家的关系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这里我们尤其需要明确美国在亚洲所执行的侵略方针以及中国领导人所执行的敌视我们的路线。

大家都应记得，二战前夕我们国家不得不同时面对两条战线作战的危险，因为当时日本已准备随时从东面向我国发动进攻。即使如今，从战略层面上考虑，我们怎么都不能不对这个国家加以防范，再说现在那里又有了美国人，从而使日本的力量变得更为强大。中国领导人也在密切与日本的关系方面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在这方面他们借助了都属于同一种族的

有利条件，再说与日本人建立联系也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好处。

中央认为我们的如下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削弱日本与美国的军事联系，促使其不加入任何旨在反对我们国家的军事同盟。这就是我们为何特别重视发展苏日关系并制定了扩大与之互助合作的方针的原因。如今，日本已成为苏联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第三大贸易伙伴。

至于我国南部边境地区的政治变化情况，可以满意地指出，我们与土耳其的关系已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去年，我们两国达成了关于苏联在互惠基础上在土耳其境内参与一系列工业企业建设项目的协议，其中包括建设一个冶金联合体。两国领导人的互访也得以恢复。我们今后将继续坚持改善苏土关系的路线。

有理由指出，我们与伊朗的关系已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今年3月份，我们两国签署了广泛而有利于我们的关于建设从伊朗通往高加索的天然气运输管道的协议，计划年输气量为100亿立方米。随后，我们又签署了关于在伊朗境内建设大型冶金工厂和其他工程的协议。伊朗政府还请求我们向他们出售大量苏联武器，我们对此作了积极的回应。目前，我们正在考虑如下可能性，即进一步扩大苏联和欧洲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与伊朗的经济联系，其中包括通过购买伊朗石油的方式。

由于我们改善了与土耳其、伊朗和巴基斯坦等国的关系，西方刻意制造的针对我们的军事同盟巴格达条约组织实际上已经被瓦解。

同志们！中央政治局也没有放松对发展我们与年轻的民族国家之间关系问题的关注。因为这也是一个大问题，具有历史性的重要意义。这将决定着70多个从殖民压迫下获得解放的国家究竟跟谁走——是跟着社会主义走，还是跟着帝国主义走的问题，决定着人类相当一部分人口未来社会进步的前景等许多重要问题。

而我们如何处理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个国家的相互关系，也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而且其中有许多都是我们需要解决的新问题。

关于如何在世界上的这些地区内开展对外政治工作，苏共二十三大已为我们党明确制定了如下主要目标：加强我们的影响力，粉碎帝国主义已占据的阵地，全力支持各民族为争取社会和民族解放而进行的斗争，巩固年轻民族国家的独立，对其中的共产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党派提供帮助。

在此，我们当然会考虑到不同国家所拥有的不同条件以及这些国家内部各集团的特点。我们尤其会考虑其在社会、经济发展道路上的差异。我们首先把那些选择了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区分出来。这些国家具体包括：如埃及、阿尔及利亚、马里、几内亚、刚果(布拉柴维尔)和叙利亚等。我们与这些国家不仅建立了国家间关系，而且还有党际关系。

同志们，我们可以满意地说，我们针对年轻进步国家所制定的政策，一定会取得相应的成果。这里我们可以把埃及作为一个例子。我们与这个国家及其领导人的关系，尤其在近一段时期已取得显著的发展，并具有了密切而可靠的合作性质。我们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都存在共识。纳赛尔总统和其他埃及领导人已开始定期与我们就其国内、外政策的具体

问题进行磋商，并时刻准备听取苏方的观点。近来，苏联和埃及两国间的军事合作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如果没有我们的帮助，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就不会成为非洲和阿拉伯世界一个重要的先锋力量。同志们，你们都知道，这一地区在世界上所占据的巨大意义。这里濒临苏联的南部边界，是通往重要的海上交通线的咽喉，是北约军事机器所需燃料的主要供应地。

我们都能看到，近期帝国主义正采取积极的旨在反对革命—民主制度的破坏活动。总体来说，帝国主义的阴谋遭到了革命—民主国家人民的不断增强的反击。不过在个别情况下，比如在加纳，帝国主义还是取得了成功，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应当说，加纳事件使其他进步的非洲国家领导人都感到忧虑。对此，我们必须采取补救措施，以增强他们的自信心。我们还要对他们提供全面的援助，其中包括军事援助在内。

我们已对阿尔及利亚共和国给予了实质性的帮助，以便其克服由于帝国主义势力的压力所造成的困难。当该国于 1965 年 6 月实现了领导层的更迭之后，(苏共)中央政治局详细地分析了阿尔及利亚的国内、外政治发展趋势，并随即做出了支持布迈丁的决定。如今，可以肯定地说，我们所制定的路线是正确的。阿尔及利亚继续坚持反帝国主义和反对殖民主义的立场。苏阿友好合作关系也得以继续发展。

我们对自己所肩负的职责有清醒的认识，就是要全力支持那些坚持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巩固其现有体制。这些国家绝不应当再次成为帝国主义的猎物。

至于那些已赢得了独立，但暂且仍选择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我们也将极力帮助他们，以削弱其与帝国主义的联系，支持其政策中所包含的反帝国主义倾向，并向这些国家内部的进步革命力量提供帮助。这方面最直观的例子便是印度。你们大家都清楚，使印度始终坚持不结盟立场以及坚持反帝和反殖立场的重要意义。然而，当尼赫鲁死后，尤其是当夏斯特里去世之后，明显可以看出，印度的政策在相当程度上发生了一定的动摇，呈现出向右转的现实危险，印度亲美派势力不断增强。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有必要在印度总理甘地和印度国大党主席 K. 卡马拉季访问莫斯科期间公开向其说明苏方对印度政策中所出现的上述倾向的关切和担忧。我们对他们说，此类倾向将会威胁到印度国家自身的独立性，而且也会对苏-印关系造成损害。

我们也没有忽视那些已被拉入侵略集团的国家。例如，近两年来我们对巴基斯坦的政策便明显积极起来。而这种积极政策也取得了相应的结果。阿尤布-汗政府减弱了自身与巴格达条约组织和东南亚条约组织的联系。巴基斯坦拒绝参加美国侵略越南的活动。该国领导人还向我们保证，(他们)将不允许(其他国家)利用巴基斯坦领土来进攻苏联。

苏联主动参与调解印巴冲突的活动对苏巴和苏印关系的发展具有巨大意义。塔什干宣言无疑是苏联对外政策的重大胜利。正因为此，我们国家的威望得到了显著的提高。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与印度尼西亚的关系。在 1965 年 9 月 30 日的著名事件发生之后，帝国主义分子们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加强了对印度尼西亚的压力，并试图将该国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而印度尼西亚的新国家领导人，一方面开展了反对共产党的恐怖运动，另一方

面又向我们保证说，(印尼)将发展与苏联的友好关系，不会向西方列强让步。

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下，我们极力采取措施以阻止印度尼西亚彻底倒向西方强国一边。也正是基于这一目的，我们前不久在莫斯科接待了印尼外交部长马利克，并对他说苏联准备在联合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和国际安全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与印度尼西亚的关系。与此同时，我们也指出了印尼国内正在不断增强的放弃不结盟政策的危险倾向，并强调我们坚决谴责印尼国内出现的反共产主义运动，而这将成为苏联和印尼两国之间合作的巨大障碍。

近年来，我们对发展与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从而使我们有可能对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给予更多的实际帮助，并削弱美帝国主义的后方。

这里，我还想简单谈一谈关于我们对已获得解放国家的经济援助问题。此举是我们对世界上这些地区事务施加影响的有力手段。目前，苏联已与亚洲和非洲的31个发展中国家签署了经济和技术合作方面的协议。根据这些协议，苏联向这些国家提供了广泛的经济援助。为了让全会与会者们了解这方面情况，我将作如下通报：我们向亚、非洲26个国家提供了防御武器，其中军队完全或主要使用苏联武器的国家有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叙利亚、阿尔及利亚、阿富汗等；绝大部分军火供应均采取直接贸易或商品信贷支付的方式进行，也有一部分军事援助我们不得不采取无偿赠送的方式。

民族解放运动是全世界反帝斗争的重要战线。我们党不可能，也不会放弃这一领域的斗争。我们将一如既往地竭尽全力来确保民族和社会解放运动力量的胜利，以便最终彻底摧毁殖民主义。(掌声)

同志们！苏联将会始终不渝地坚持反帝斗争，坚定维护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既定方针，彻底粉碎所谓“苏联共产主义具有侵略性”的恶毒谣言，坚决揭露帝国主义的反人民政策，并为瓦解和削弱我们的阶级敌人的队伍创造条件。

我们的对外政治活动将会采取更加积极的政策。如今，我们所有的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许多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以及党的积极分子们都或多或少地在参与这方面工作。我以及柯西金、波德戈尔内和苏斯洛夫等许多同志不得不经常到国外访问和在莫斯科接待外国代表团。仅仅在最近一段时间里出国访问的同志便有：基里连科同志——前往智利，谢列平同志——越南和蒙古，波利扬斯基同志——加拿大，马祖罗夫同志——巴基斯坦，沃罗诺夫同志——蒙古人民共和国和英国，П. Е. 谢列斯特同志——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А. Я. 佩尔谢同志——罗马尼亚，等等。还有一些同志不得不在国际工作上花费大量的时间，如政治局候补委员格里申、杰米切夫和乌斯季诺夫等同志；中央委员会书记卡皮托诺夫和库拉科夫等同志，而我在这里已不用说那些长期专门负责这方面事务的同志：如苏斯洛夫、安德罗波夫和波诺马廖夫等。

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各联盟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以及州委和边疆区委员书记们也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国际工作方面。近期，根据政治局的委托出访国外的同志有：В. П. 姆扎瓦纳泽、П. М. 马谢罗夫、Б. Р. 拉希多夫、В. В. 谢尔比茨基、Д. А. 库纳耶夫、А. Е. 科奇尼扬、

Б. 奥维佐夫、Д. 拉苏洛夫、Р. 库尔巴诺夫、В. П. 鲁宾、Н. Г. 叶戈雷切夫、В. С. 托尔斯季科夫、В. Ю. 阿洪多夫、И. И. 鲍久尔、А. Ю. 斯涅奇库斯、И. Г. 凯宾、Т. 乌苏巴里耶夫、А. П. 利亚什科、Ф. А. 苏尔加诺夫、Т. Я. 基谢廖夫、А. Э. 沃斯、В. И. 科诺托普、А. В. 格奥尔基耶夫、К. Ф. 卡图谢夫、С. Д. 希特罗夫、Ф. А. 塔别耶夫和 З. Н. 努里耶夫，等等。我已很难把所有人都在这里罗列出来。我们将会增加更多的同志来参与这方面的工作。

各联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州委和边疆区委在接待来访的外国代表团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在这方面倾注了大量精力的党组织包括：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以及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高尔基、新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等州的州委。

同志们，你们所有人都可以想象，到其他国家去访问和与外国代表团举行会谈——这是一项多么重大而艰巨的工作，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不过，与此同时这项工作又是一所能够丰富我们知识和实际经验的好学校。派遣代表团去外国访问是我们一项很重要的工作——每年都有数百人出去，而每一个出访的同志，都将成为苏联共产主义建设事业的很好的宣传员，有助于为我们国家赢得新朋友。与此同时，此举也有利于培养我们的良好素质——谦逊且具有求知欲，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将有助于改进我们的对外政治活动。

谈到我们在国际政治活动方面的成绩，就必须强调，我们负责对外政治事务的那些工作人员所作出的无可争议的贡献。在这次全会上，我想特别强调这些同志所做工作的重要意义：他们正在履行的，是党所赋予的重要职责，他们的工作是繁重的，需要付出巨大的劳动，他们的劳动，都是着眼于我们国家的整体利益。

与此同时仍需要指出的是，几乎每次当在政治局讨论这样或那样的国际问题时，我们都会强调，在这一领域我们还有大量潜力没有得以充分利用。这就是说，我们对外政治活动的不同方向和部门——具体包括外交、外贸、对外经济、科技和文化联系等——并没有始终做到应有的紧密结合。要知道，所有这些对外领域均应始终把力量集中到一个方向上，都应当从属于一个统一的政治目标。我们对外宣传活动并非总是能够达到一个应有的高度。而了解这些新可能和新途径，以便把党的政策真正落实在国际舞台上——这是中央国际部、外交部、外贸部和相关委员会等工作人员，总之一句话，所有那些直接或间接参与我们对外政治活动的全体人员的首要职责。

同志们！要始终不渝地贯彻我们的巩固世界和平的路线，我们就必须保持高度的准备和高度的警惕性，以便随时回击任何针对我们国家的侵略活动。政治局一直在研究加强我们的武装力量和国防方面的问题。我们是对抗帝国主义政策的主要力量，是其他国家实施军事讹诈和恐吓的对象。但我们的阶级敌人也必须知道，他们对我们所玩弄的任何伎俩，都将遭到我们的毁灭性打击。(掌声)现在，必须要求我们的军事专家、军事工业部门的工作人员，苏联的武装力量——士兵、水兵、军官、将军和海军上将们都要一如既往地不断前进，要求他们更好地掌握军事知识，发展军事技术、科学和艺术，以便使我们的国防实力远远超过帝国主义所掌握的水平。

……①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关于波兰与苏联友谊。

众所周知，我们与华沙条约成员国和经互会成员国之间，保持着尤其紧密的政治和经济关系。我们始终关注着与这些国家的关系。保加利亚、匈牙利、民主德国、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以及蒙古等，如果出现了困难情况，便会经常就诸多经济合作问题向我们提出请求，其中包括经济援助问题在内。我们与他们，首先协调了许多对外政策方面的举措，以便在世界舞台上保持行动上的一致。

要加强与这些国家的双边关系方面，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最近，我们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蒙古等国，签署了新的友好互助条约，与保加利亚和匈牙利也已达成议项，并准备于1967年签署新条约。

我们党，也对在华沙条约国组织和经互会组织框架内加强多边合作，赋予重要意义。近期，我们主动提出了一系列大的举措，以便完善这些组织的活动。

我在前面已经指出，在华沙和布加勒斯特召集的华沙条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在维护欧洲安全斗争中所具有的意义。这些会议在加强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合作方面也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应当说，我们在军事合作领域，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华沙条约国目前已拥有了一个自己的、完整的武装力量防御体系，拥有多个统一的、在协商基础上制定的战略计划，其所有武装力量均使用的是我们苏联的武器装备。这些计划，都是通过近期在保加利亚、波兰、民主德国、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等国领土内进行的一系列大规模军事演习的检验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在华沙条约国框架内，我们经过协商，确定了各成员国获取军事装备和维持军队所需要的费用开支。其中每个国家都要承担一部分开支份额，虽然必须坦陈，在我们国家的国防开支和整个社会主义合作的费用支出方面，无疑主要都是由苏联来承担的。这也是很自然的事，因为我们国家是一个大国，其边界也极其漫长而广大。

正如你们所知道的，前不久我们向兄弟国家的朋友们，展示了我们研制的最新型飞机、火箭和其他军事技术，演示了导弹的远程目标攻击和人造卫星的发射。应当说，这次军事技术展示对各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异口同声地对苏联所拥有的军事实力表示惊奇，对我们为社会主义阵营所付出的巨大开支以及这些举措所具有的重大意义表示称赞。

华沙条约国组织，也是协调各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在国际关系最重大问题上制定各成员国统一行动路线的可靠工具，在华沙和布加勒斯特召开的该组织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上，所取得的相应成果便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在今年10月份，与各兄弟党领导人举行的一系列会谈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期间，我们讨论了对外政治问题以及当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近期所发生的事件等。

---

① 所收集的档案此处缺一页。——编注

依照传统，此次兄弟党会议有众多国外代表团前来参加，期间各党派广泛地交流了意见，从而使会议具有了越来越重大的意义。在前不久召开的保加利亚和匈牙利共产党会议上，也举行了一系列重要的会谈。在这些会议上我们亲眼看到，在各兄弟党中向往团结和以统一行动来捍卫共产主义运动的马列主义总路线的力量正在不断增长。尤其让我们感到高兴的是，看到这样一种倾向也在不断增加，即各兄弟党都向往团结和兄弟友谊，及其对我们党，对苏共和我们国家所纷纷表达的那些爱戴言辞。

我们与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也在继续发展和加强。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非常清醒地认识到，各社会主义国家正在建立的这个相互关系体系，一定要有一个可靠的经济基础。然而，许多兄弟国家由于一系列原因——过去都是落后国家、自然资源贫乏、国内市场狭小——因而在没有广泛而发达的经济关系体系，在没有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的情况下，根本就无法顺利地发展自己的民族经济。

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苏共)中央政治局才对经济问题的解决如此关注，并提出了，发展和加强我们与各兄弟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的问题。我们完全能够理解，各兄弟国家盼望扩大与我们国家的经济联系的迫切心情，我们也极力向他们展示发展这种关系的稳定前景。与筹备我们新的1966—1970年五年计划密切相关，我们在这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不论是对兄弟国家，还是对我们来说，相互协调各自的发展计划指标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在1970年以前这一段时间内，确保各自工业所需要的燃料以及各自所生产的产品的顺利销售。在落实这方面工作的过程中，我们与各兄弟国家签署了一系列长期贸易协议。

苏共中央对改善经互会的工作给予了特别的关注。针对这一组织，我们提出了其所肩负的主要职责，并要求其对自己活动的一些工作模式和方法加以变革。在召开华沙条约成员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的同时，我们还举行了一个会议，以便经互会领导人就各成员国在该组织框架内的合作问题交流意见。会议期间，大家均表示，要共同致力于进一步加强相互之间的经济联系，并认为，有必要在协商基础上采取一些举措，以加强经互会和提高该组织的工作效率。

在完善经济关系机制方面，苏联已提出了许多建议。我们始终致力于提高责任感和对那些违反协议义务者实施制裁。但遗憾的是，此类违反协议义务的情况仍是屡有发生。每当东德、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社会主义国家欺骗了我们并违反了自己所应承担的义务之时，我们都会提请这些国家的政府对此加以关注。

但在这里，在这次全会上我必须提到的是，根据经济合作相关规定，兄弟国家经常也会向我们提出一些证据确凿的索赔要求，下面我将举一些实例。

几年以前，保加利亚曾建议向我们供应微型电动起重机。我们的相关组织对此表示同意。而此后两年间，国计委也编制了生产此类起重机的计划。最终保加利亚人被告知，他们建议向我们提供的此类产品我们不再需要了。但要知道，保加利亚人为了生产我们所需要的这些产品已专门建造了一些新工厂。

这里还有另外一个例子。我们曾与匈牙利人，就汽车生产协作事宜达成了相关协议。其中，匈牙利人负责生产汽车后桥，而我们则是前桥和板簧。匈牙利同志严格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在规定的期限内修建了必要的设施，而如今根据相关协议开始向我们供应自己所生产的汽车后桥。然而，我们的相关机构却延误了自己工厂的建设工期，因而不仅无法向匈牙利提供自己已承诺的制造汽车所需要的那些关键零部件，而且还拒绝购买匈牙利方面所生产的产品。

遗憾的是，此类例子还有很多。

我们必须坚决改变这种状况。要知道，我们苏联无疑是社会主义体系中专业化生产和劳动分工的中心，因而我们自己首先得按规矩办事。在遵守协议期限和保证产品质量等方面，我们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如果我们能够处理好与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合作问题，它们将成为我们发展本国经济、建设苏联共产主义事业的重要补充。建立与这些国家的经济联系和其他方面的关系机制，也是具有国际主义意义的大事。而对于我们的工作人员而言，这项工作也是一所在实践中培养人们国际主义观念的学校。

在全面发展与这些国家的合作的同时，我们将与之形成一种真正的兄弟关系。我们党尤其重视发展，与那些在某一时期我们国家之间曾出现过这样或那样问题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

下面，我将谈谈关于中国的问题。让我们首先从阿尔巴尼亚说起。(苏共)10月中央全会以后，我们曾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以期促使苏联与阿尔巴尼亚关系的正常化，但我们的这些举措均遭到了他们的拒绝。阿尔巴尼亚领导人拒绝重新参加华沙条约组织和经互会。最近，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于11月召集的一次会议表明，该党领导人恩维尔·霍查及其亲信依然不愿放弃其既定立场，并继续追随北京的路线。

众所周知，有一个时期，越南劳动党的许多领导者也是紧跟中国领导人的。但现在已发生了变化。虽然由于大家都理解的原因，越南同志尽量不想恶化与中国人的关系，但显而易见的是，他们正逐渐转向更加独立的立场。他们现在并没有参与中国领导人所进行的反苏活动，已停止印刷中国人的那些充满诬蔑性言论的资料，忠实地坚守国际民主主义组织的相关规定。

同志们，这里我们必然要注意到，在历次不同的国际代表大会上，越南和朝鲜同志在行为上，及其对中国代表所发出的分裂性、诬蔑性言论的态度上所发生的变化。如今，越南民主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们，已不再紧跟在中国人的后面在会议上起哄，一般情况下，他们都会忠诚地与苏联和其他国家的代表一起工作。例如在刚刚于索菲亚结束的世界工联总理事会例会上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其中事实已充分而直观地说明了这一点。

对此，我们曾向中央委员会打了报告。于是在10月中央全会之后，我们便采取了实际的举措以改善我们国家与朝鲜的关系。针对朝鲜，我们制定了一条总的政治路线：支持其反对美国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给予其军事援助——为此我们得到了朝鲜同志的高度评

价;给予其经济援助——这主要是因为该国一直在这方面承受着巨大的困难,而我们的这些援助更加巩固了苏朝关系。

如今,可以说朝鲜同志脱离中国人的路线——已是既定事实。他们谴责了中共领导人在支援越南的联合行动问题上所采取的消极立场,批评了中共领导人所奉行的大国霸权主义政策和把毛泽东思想强加给全世界的做法。中国领导人的国内政策,其中包括他们所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也遭到了朝鲜国内的一致反对。朝鲜报刊刊载了批判托洛茨基的文章,这明显就是针对毛泽东及其集团所奉行的路线。近日,在与我们的秘密会谈中,金日成同志直截了当地声明,中国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以下是他的原话——"简直愚蠢得让人不可思议"。(笑声,会场气氛活跃起来。)这可能的确是无可辩驳的事实,而(金日成所作的)这一定义刚好也符合我们对这件事的理解。

不过,我们与朝鲜劳动党的关系仍需要克服一些困难。为此,仍需要我们做艰苦的工作,需要灵活性、需要讲究策略和坚持不懈的耐心。但总体来看,我们可以改善我们之间的关系,并实现其正常化。我们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合作,也变得越来越积极。朝鲜同志非常想向我们出售一些稀缺的商品,而这些商品的对苏销售近年来一度急剧缩减。我们两党间已开始进行高层谈判,期间我们均采取了公开、坦诚的态度,对此我们给予了高度评价。如今,以秘密方式来访的金日成同志正在莫斯科,今年我已与之举行了两次会谈。这些会谈证明了,我们对朝鲜所制定的路线的正确性,并表明我们加强与该国和该党的合作和友谊一定会取得一个良好的发展前景。

同志们,我还想简单说一下,关于其他一些我们之间关系中存在有政治方面问题的国家。

比如罗马尼亚,便是这些国家中的一个。在苏共10月中央全会以前,我们与这个国家,与罗马尼亚共产党的关系就一直不太好。我们这里并不想分析其中原因。问题是还在这之前,据我们所知,罗马尼亚便在全国范围内召集了积极分子和党组织会议,期间不断抨击我们党和国家。该国领导人对我们所持的不友好态度也对我们使馆人员和到罗马尼亚出差的苏联人的周围环境造成了影响。在许多问题上罗马尼亚人均逐渐背离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立场,并开始执行自己的那一套独特路线。

10月中央全会过后,苏共中央政治局,对我们与罗马尼亚的关系给予了更大的关注,并极力试图改善这一情况。我们尽力避免进一步激化矛盾,并通过耐心的工作方式,极力弱化我们之间的尖锐分歧,以期实现我们之间关系的正常化。为了恢复我们之间真正的、同志式的兄弟关系,我们无疑是尽了最大努力的。虽然不得不承认,我们目前的关系中仍存在着一些尚未克服的困难。

我们曾在华沙条约成员国于布加勒斯特举行的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上与他们进行了接触。关于这方面情况,全会与会者们想必在筹备此次会议的过程中便已有所了解,即罗马尼亚人希望我们在关于欧洲安全问题的文件中,不要对联邦德国提出口气过于强硬的批评,他们还就其他一些问题提出了让我们无法接受的条件。在与其磋商上述文件草案以及随后的

关于支持越南的文件草案的过程中，我甚至可以说，我们之间均发生了相当激烈的斗争。只是由于我们的坚定不移和全体与会者的团结一致才最终迫使罗马尼亚在上述问题上做了让步。但接着，我们又发现罗马尼亚领导人对进一步完善华沙条约的军事和政治机制也持否定态度，在经互会中他们所坚持的立场，阻碍了许多业已成熟的问题的解决。罗马尼亚人在这里利用了自己所拥有的某种类似于否决权的东西，并借此来阻碍我们解决许多与发展经济合作有关的问题，即使这些问题只是涉及其他国家。

如今，罗马尼亚领导人依然继续坚持自己的特殊立场，即使不是在所有问题上，但至少是多数情况下他都是这样做的。虽然罗马尼亚领导人所坚持的这一立场并没有得到其他兄弟国家的支持。但这也导致我们的工作变得更加复杂。

尤其令人担忧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即在罗马尼亚国内经常会爆发民族主义情绪。其中显著的例子便是：一些罗马尼亚历史学者在自己撰写的许多历史著作中均不客观地描述了过去我们两国关系中所发生的一些问题。他们贬低苏联军队在罗马尼亚解放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并对共产国际的活动作了错误的阐释。不过整体来看，我们可以指出的是，我们两国间关系的发展还是令人满意的。

今后，我们当然仍将继续执行这样的政策，既从党的层面上继续改善我们与罗马尼亚共产党的关系，又从国家层面上谋求与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关系的正常化，以便最终使我们之间的关系实现完全的正常化。

下面再谈一下我们与南斯拉夫的关系。在国际舞台上，南斯拉夫通常都会支持苏联的行动。近期，南斯拉夫方面已更多地表现出这样一种倾向——从党际层面上与我们建立联系。南斯拉夫派代表团参加了苏共二十三大。去年，他们向苏联派遣了由托多洛维奇同志率领的代表团以交流党的工作经验。今年秋，又有以卡德尔为首的南斯拉夫代表团访苏。今年夏，铁托同志曾邀请我以非正式的方式访问南斯拉夫。我们最终派安德罗波夫同志去了。我们认为，通过党的层面谋求此类接触和建立此类关系是有益的。

当然，与此同时也不能否认，我们与南斯拉夫同志在一系列问题上仍存在着分歧。我们认为，最近南斯拉夫在领导经济方面便做得有些过火——积极实行所谓的分权制度，这实际上必将导致自发的市场关系的泛滥，并为外国资本向该国的渗透打开了方便之门。另外，南斯拉夫国内明显出现的削弱党的领导作用的倾向，也不能不使我们感到担忧。

我们当然非常清楚，党的领导模式和方式以及经济政策等问题都是每个国家的党和人民的内政，即便如此，我们认为仍有必要以同志式的方式把自己的担忧向南斯拉夫同志说明。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我们于今年9月与铁托同志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了会谈。据我们了解，其他兄弟党的代表也曾向南联盟领导人表达了类似的担忧。南斯拉夫同志在答复我们时做了如下保证，他们绝不会允许贬低党和国家的作用，并将继续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他们还说，自己将会认真地思考我们所提出的问题。

目前，我们仍很难对南斯拉夫局势今后的走向做出判断，因为该国的情况相当复杂。至于我们，我们将尽一切力量促使南联盟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从而加强南斯拉夫与苏联和其

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关系。

近两天，我收到了铁托同志的来信，后者表示希望于1月份对苏联进行非正式访问，以便就一些重要的政治问题举行会谈和协商。我们将利用这次来访，以进一步推进我们针对南联盟领导人的工作。这里顺便说一句，上述来信内容表明，如今南斯拉夫共产党原则上已同意召集共产党国际会议。

请允许我简略谈一下我们与古巴共和国的关系问题。在处理与该国的关系时，我们当然会考虑该国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所面临的极其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以及一系列特殊条件，而对此，古巴同志已多次向我们提到。在国际舞台上我们给予了古巴巨大的政治支持，全力帮助古巴同志加强自己的国防，并向他们提供了广泛的经济援助。

我们两国的关系基本上是沿着正常的轨道在发展。我们在国际上积极合作，共同反对美帝国主义。不过，这里我仍要指出的是，我们古巴朋友的国际政策时常会出现一些我们无法苟同的情况。我们认为，向他们公开说明这一点是在我们作为同志的分内职责。

在与古巴领导人的会谈中，我们曾认真地讨论过，关于确保古巴社会主义建设的良好条件和加强其国际安全的问题。期间，我们强调了社会主义国家给予古巴的支持和帮助等因素的重大意义。我们对他们说，如果古巴将执行与其他拉丁美洲国家发展正常国家关系的政策，必将加强其外交地位，并使美国对古巴革命的干涉变得更加困难。我们还请古巴朋友注意加强古巴共产党与拉丁美洲其他马列主义政党的关系的必要性问题，因为这些党派过去一直都在支持古巴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

同志们！我们党的所有日常实际工作，都是为了加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从其本身意义上来说都是着眼于一个目标——建设一个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涉及各民族和国家之间关系的全新体系，它以真正的平等和独立，同时又是真正的兄弟式合作、互助和友好关系为基础。

而要建立这样一种关系——当然不是件容易的事。因此，如果我们在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一定的问题和困难，那也就没有必要大惊小怪。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这些困难中，有些都是由于我们的不成功举措和欠考虑的活动造成的。当然，导致这些困难和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世界社会主义合作的形成和发展所处的复杂而多样的客观条件。

这里我首先指的是，赢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国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条件上均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从高度发达的捷克斯洛伐克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直到这样一些，如中国、越南等——当时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水平的国家。这些差异，首先使我们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即不同的国家在客观上会产生不同的利益需求；其次问题还在于，在那些无产者人数较少的国家中，政党的政策就可能受到强大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势力的影响。如果说在新政权建立的过程中，在资本主义仍存在有复辟的现实危险的条件下，为了反对内部敌人和帝国主义的威胁而需要紧密团结，从而使这些差异暂时变得不明显(退居幕后)，那么当社会主义的胜利已成为事实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得以巩固之时，不同(社会主义)国家间所存在的这些客观差异便会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

另外我们也不应当忘记，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继承了自己国家过去的沉重历史遗产——

民族敌视、冲突和对抗，而所有这些都会使各民族之间的融合进程变得复杂化。列宁曾指出，各民族的融合问题只有通过其中每个民族的全面发展的方式来加以解决。列宁的这句话也适用于正在进行世界性社会主义合作的各民族。由此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共产党的政策应当充分考虑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感情和民族利益。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均存在于民族国家的范畴之内。因此，每个共产主义党派首先要对本国的工人阶级和本国人民负责。而随着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和政治的巩固，其独立性和主权意识也自然会不断强化。问题的关键在于，在此基础之上的这种健康发展进程不要对社会主义团结合作的国际主义整体利益造成损害，以便使每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各自取得繁荣的同时，又密切了相互之间的关系，加强了彼此的互助合作，并最终使这一合作在整体上也实现繁荣。

现实已告诉我们，民族主义倾向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威胁是多么的巨大。而领导人的民族主义倾向则会迅速地对自己国家，甚至国外民众造成重大负面影响。众所周知，帝国主义者们对民族主义寄予厚望，据他们说，在一些人民民主国家中民族主义被凌驾于社会主义之上。而帝国主义在自己的政策中对这些国家的民族主义倾向极力加以鼓励，他们寻找一切机会向这些国家渗透并在这一过程中使用了包括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等各种手段。

在处理与所有国家——不论大国还是小国——的相互关系时，苏共中央在自己的全部活动中始终遵循这样的原则，即坚持将每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利益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总体利益相结合，并追求权利上的真正平等。如今，我们可以自信地说，我们党与各兄弟马列主义政党一样，都已对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发展进程中所遇到的许多问题找到了正确的答案。虽然我们目前仍面临着一系列重大而复杂的任务。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共产主义民族未来社会的产物，是当今世界和平和进步的结晶。为了它的巩固和发展，我们应当竭尽全力。为此，我们绝不应当怜惜自己的力量。(掌声)

三、苏共为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斗争

同志们！我们党的国际活动不仅仅只依靠着苏维埃国家的强大实力和与社会主义友好国家的结盟。还在苏维埃政府建立之初，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便曾说过："我们拥有国际联盟，虽然这一联盟并不曾签署，也没有形成任何书面文件，如果从'国家权力'的角度来看似乎什么也不存在，可实际上在四分五裂的资本主义世界中的所有人都能想象得出(这个联盟的存在)。"(列宁文集，第40卷，第243页)列宁这里所言，指的是我们与全世界工人的联盟。

如今，该联盟最完整的体现可以在各种兄弟式的、相互支持关系中找到，而正是凭借这些关系使我们党与各共产党和工人党紧密地团结起来。发展与这些党派的关系，为进一步推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进步，加强其队伍的团结而共同斗争——所有这些问题均在(苏共)中央政治局的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

为了自身的反帝斗争，维护世界和平、民族独立、争取民主和实现社会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建立了牢固的思想政治基础。这一基础就是1957—1960年间历次共产党和工人党

会议所通过的决议。我们完全有理由说,从那时以来世界上所发生的事件已充分证明了这些会议的召集本身及其所通过的马列主义文件的正确性。这些文件使我们有可能从宽广的视角来了解共产主义运动中各支队伍的积极表现,及其在不同民族条件下所采取的各种不同的斗争模式和方法。与此同时,这些文件还为各兄弟党在反对同一敌人——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中的统一行动奠定了原则性基础。

各兄弟党代表国际会议的召集,使我们有可能共同讨论和解决现实生活向我们共产党人提出的、业已成熟的那些问题。会议以实际行动展示了所有国家共产党人的团结及其目标的一致性,实现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原则。今后,此类会议仍有必要继续召集。

我们党对历次莫斯科会议的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始终坚定不移地遵循共同制定的路线,坚持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各队伍中贯彻落实这一路线。我们坚决抵制任何使我党背离这一路线的企图,始终不渝地与我们运动中的分裂主义者和(左、右倾)机会主义者作斗争。在这方面,苏共的坚定不移和始终不渝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具有巨大的意义,有助于克服我们队伍中的动摇倾向,有助于各兄弟党在这一时期复杂的政治斗争条件下辨明自己的行动方向。绝大多数兄弟党均坚定地捍卫莫斯科会议所制定的行动纲领。我们通过集体努力而制定的总路线,则为推动共产主义运动的前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这一路线的指引下,一些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正以每个普通人都感到亲切和能够理解的口号从事着斗争活动。这些口号便是:为了和平和反对核战争、捍卫民主和民族独立,反对垄断资本,实现社会主义,等等。这些口号反映了最广大劳动阶层的切身利益。各共产主义党派正是以这些口号为基础赢得了群众的支持,并促成了工人阶级与所有民主力量的联盟,从而表明一个群众性政治军队业已建立。共产党人们正是带领着这支军队,在各自相应的条件下向资本主义发起进攻。

如今,正是和平和民主的口号孤立了那些最具有侵略性的、最反动的帝国主义分子们,全面地削弱了资本主义统治的整个体系。而人民群众在这些口号的激励下则更坚定地反对"战争集团",更加顽强地面对帝国主义的劫掠和专横,及其每一次侵略行径。当前,国际上兴起的大规模的声援越南的运动——便是这方面明显的证明。

如今,最广大的各阶层人民群众越来越专注地倾听共产党人发出的声音。当代共产主义运动,主要包括 14 个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居领导地位的共产党组织,另外还包括一些仍在资本主义工业中心坚持斗争的党派。这些共产党组织都是从民族解放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的,其活动主要依靠的是农民群众,其中许多党派仍在坚持武装斗争。在世界上非社会主义国家中还有一半共产党组织——37 个党派仍在从事着地下斗争,而其余党派已可以开展合法活动。后者中的一些党派已善于利用这种合法活动的机会,使自己转变为群众性政党,并在国家议会、市(镇)政府和各社会组织中拥有了大量的政治代表;有一些党派仍面临这样一个任务——探索与广大群众建立紧密联系的途径;有一些,尤其是非洲和亚洲的共产主义党派目前只是由少量职业革命家和马列主义学说的宣传家们组成的组织;还有一些党派已转变为有一定影响力的政治力量。

下面一个事实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即在西欧聚集了近900万工人和职员，而这里的绝大多数共产主义党派都能够成功地推动革命事业向前发展。

这里我们以法国共产党为例。

法国共产党在坚持马列主义原则立场方面表现得很坚定，与此同时在斗争策略上他们也不乏灵活性。大家都记得，法国共产党在近期的国内总统选举中的成功表现。尽管法国当前的政治环境相当复杂，但法国共产党仍是成功地将国内左翼力量团结起来，从而确保自己赢得了45%的选票。

法国共产党在复杂的政治形势下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在对法国总统戴高乐所采取的旨在改善法苏关系的做法给予赞扬的同时，法共方面也为加强法苏友谊进行了积极的斗争。在对内政策方面法国共产党坚定维护法国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者的利益。所有这些都有助于法共威望的提高。

今年8月份，当我与法共总书记瓦里戴克·罗歇会谈期间，我们两党不仅在苏-法关系方面，而且在其他所有问题上均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

意大利共产党在本国内赢得了重要的地位。该党是西方世界中最大的群众性政党，目前其党员数量超过150万人。意共在国内选举中经常获得25%以上的选票。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意共是在经历了十年的地下斗争之后才获得了所有这些成绩的，而当初其人数仅只有数万之众。而其之所以获得这些成就，原因主要在于该党的日常工作都集中在群众密集的地区，正是该党领导了法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劳动者罢工，从而能够确保了工人阶级与农民的联盟。

一系列共产主义党派的斗争经验表明，即使在当今没有发生尖锐的经济或政治危机的条件下，共产党同样可以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只要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在任何条件下，共产党都有可能在自己国家内部赢得稳固的地位，推动革命事业向前发展。

这里我们还必须强调芬兰共产党所取得的成绩，该党代表于今年5月成功地进入了政府。这是自1947年法国、意大利、比利时等国家的共产党退出政府以来，共产党代表首次重新进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此举是对反共产主义势力的沉重打击。

这里，我还想对正在法西斯制度下从事艰苦斗争的西班牙共产党的情况做一特别强调。在熟练地将合法和地下斗争方式密切结合的同时，该党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在国内的影响力也日益增强。在最近几年内，西班牙共产党人数增长了近3倍，已达到10万人。而该党的这些成绩，同志们要知道，都是在地下状态下，在充满恐怖和镇压的环境下获得的！

在艰苦的非法条件下坚持工作的还有希腊共产党。该党与合法的联合民主左派政党合作，从而在动员广大群众反对右翼势力的斗争中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如今，希腊之所以是北约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之一，与我们的希腊同志们在这方面所发挥的重大作用不无关系。

我们当然也非常清楚地知道，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也有这样一些党派——暂时在工人运动、工会和其他群众组织中的地位非常微弱。这其中当然涉及各方面的原因——既有客观

原因,也有主观原因。而我们从来也不隐讳这方面的情况,如美国共产党、德国共产党等。上述党派的工作环境尤其艰苦,它们必须面对(当局)强大的宣传、军事-警察机关,经常会遭到残酷的迫害。在一些国家中共产党人还必须面对势力强大的社会民主主义党派,而这些党派的领袖们均坚持强烈的反共立场。

战后,共产主义运动的特点之一就是该运动在亚非拉各个国家扎下了牢固的根基。众所周知,战前在这些地方建立的工人阶级政党是屈指可数的,而如今已达到48个。

这些大陆上的共产党工作的条件尤其复杂而艰苦。那里生活着20多亿人口,但工人阶级的数量却不多。农民构成了民族解放运动的主要力量,但他们贫困、没有文化,又大多处于宗教的影响之下。农民阶层为那里的反帝斗争运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同时也带来了许多小资本主义思想。那里的反动势力以极其残酷的手段来对待共产党人。我们不能忘记,正是在战后时期伊拉克共产党政治局的6位委员几乎全部被杀害,而南非共产党中央的几位委员也成为了当局警察恐怖政策的牺牲品。

这里特别需要说的是关于拉丁美洲共产党的情况。20年以前,该大陆许多共产党组织才刚刚建立,而如今整个拉丁美洲已没有一个国家没有共产党组织存在。虽然其中多一半党派均在非法条件下开展工作,近年来其人数已增长了两倍半。这些共产党组织的首要任务都是一个,那就是开展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后者在该大陆所扮演的角色就是赤裸裸的国际宪兵和剥削者,就是各国内部反动势力的最重要支柱。因此,拉丁美洲人民对帝国主义"美国佬"的仇恨随时可能以极其激烈的方式爆发出来。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共产党组织,如果忠诚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制定的总路线,那么就会取得成功;与此同时我们的经验也证明,如果背离了这一路线,就会遭遇失败和坎坷。

我们所有人都对印度尼西亚所发生的事件记忆犹新。那么,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以艾地为首的原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层在北京的影响下走上了冒险主义道路,脱离群众并采取了盲动策略。最终结果大家都是知道的。如此一个巨大的政党,按其领袖们的话说,党员近200万人以及工会、农民、青年、妇女和其他组织等,实际上均被彻底摧毁,成千上万名党员死于非命。而要再重新恢复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至少也得需要许多年才行。印尼共产党人之所以付出了如此高昂的代价,关键在于该党主要领导人背离了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而走上了中国领导人所指引的歧途。

……①

……在我们之间。这绝不意味着我们党只承担着观察员的角色,尤其是当涉及我们运动的普遍原则性问题之时。在当代条件下这里有一个政治艺术的问题,即如何能够将如下两方面内容紧密结合起来——既要尊重政党的独立性,不干涉其内部事务,同时又要能够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各支队伍中所发生事件的发展进程施加影响;既要善于坚定地贯彻我们自己的原则路线,同时又要表现出必要的策略和灵活性。

① 所收集的档案此处缺一页。——编注

在我们与各兄弟党领导人接触和会谈期间，我们讨论了相当广泛的问题。

苏共中央曾多次主动以同志式的方式向各党派领导人提出过一系列涉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及与这些党派的政策相关的问题。

去年，我们便曾从党的层面上与铁托同志就意大利共产党一些领导人提出的，关于在意大利建立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的思想，举行了友好而坦率的会谈。期间，我们坦诚地说，我们对上述思想持怀疑态度，因为在当代条件下实行这一思想将意味着对社会民主主义做出原则性的退让并可能导致共产党丧失自己在工人运动中所发挥的马列主义先锋队的作用。我们认为，上述会谈、我们所提出的意见和友好的建议都得到了意大利同志们的重视。

我们曾多次与各兄弟党代表讨论过一个重大的问题——在共产党人的政策中如何将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任务相结合。而就这一问题，我们所涉及的全部内容既适用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中的国家，也原则上适用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各共产主义党派。对于这些党派而言，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就是要既考虑民族特点和自己国家的传统，同时又要善于反映工人阶级的利益，从本国人民的立场——民族利益出发。因为只有这样，它们才能够赢得广大群众的拥护。

近一段时期，一些共产党表现出民族孤立的倾向。这些党派的领导人试图采用民族主义者们所使用的那些方法来扩大本党的地盘。其中有的党派已不再谈关于国际主义义务的问题，有的党派甚至走得更远——以不友好的态度对社会主义国家提出批评。在这方面表现最为突出的是荷兰共产党主席格鲁特。近来，他实质上是停止了与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接触，拒绝在国际舞台上(与我们)采取一致行动。这里，该党领导人已表现出滑向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立场的迹象。

遗憾的是，我们在瑞典和挪威共产党领导人的政策中也看到了上述民族孤立和滑向社会民主主义立场的迹象。近来，他们也减弱了与其他兄弟党派的接触，将自己封闭起来，而他们所发出的声音，坦白地说，与其他兄弟党相比，常常显得虚伪。

我们党是不可能对这种现象置若罔闻的。我们认为促使那些发生动摇的党派重新坚定马列主义立场是自己义不容辞的国际主义义务。

同志们！说到我们与各兄弟党的国际主义团结，我们绝不可以忘记这么一点，即不仅是我们帮助了它们，而且它们也给予了我们巨大的帮助和支持。正是由于非社会主义世界那些兄弟党的革命活动促使世界舞台上的力量对比发生了进一步有利于我们的变化，正是由于它们的帮助为我们国家的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各国共产党拥护苏联，向世人展示我们所取得成就的意义，解释我们爱好和平的政策以及我们党和各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上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数百万分布在世界各个角落的共产党员们，都是苏联政策和我们共同事业的自愿、坚定而热情的宣传员。他们常常冒着失去自由和生命的危险，坚定不移而勇敢地坚持十月(革命)思想，并把关于伟大列宁的政党的真理带到广大群众中间。对于我们阶级兄弟所做的这些无私而忘我的工作，我们给予高度的评价。

国际民主主义组织——世界工联、妇女、青年、拥护和平者运动等也做了大量的工作。苏联工会和其他社会组织建立了广泛的国际联系，并利用这些联系来宣传苏联和苏共政策所取得的社会主义成就。

同志们！在积极参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同时，我们党更加稳固了自己与民族解放运动各力量的联盟和合作关系。苏共二十三大决议对民族解放运动——这一当代巨大革命力量所发挥的历史作用作了明确的原则性评价。

要将马列主义运用于亚非拉各国，就必须探索一些新的、经常是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道路。在这些国家中尤其复杂的问题是如何制定相应的战略和策略以及如何使共产党转变为能被民众认可的民族力量。当前殖民地人民赢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之后，他们立刻便要面对这样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于其今后的历史发展道路问题。包括我们党在内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贡献就在于，其以莫斯科历次会议文件的形式发展了列宁提出的关于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可以适用于当代条件的思想。这样一条发展道路使各民族避免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那些痛苦和贫困。

列宁的上述思想经过了实际生活的检验并首先被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经验所证实。该国是世界上第一个走上社会主义社会建设道路，而同时又跨越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国家。

与此同时实际生活也表明，要走非资本主义道路就必须克服许多困难。因为这些国家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创造出资本主义国家在自身发展过程中需要数十年才能达到的那样高的生产力。而为了完成这样的任务，这些国家的全体人民无疑需要付出巨大的劳动并进行繁重的创造性工作。另外我们也不能忘记，在这些选择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内部还存在着得到帝国主义支持的反动势力，后者势必会尽力阻碍这一发展进程并极力把资本主义(制度)强加给这些已从殖民压迫下获得解放的民族。因此这些民族要想取得成功就只能，也只有采取斗争的方式。

针对这些选择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民族，我们可以，而且应当给予全面的支持，向它们并不轻松的斗争活动提供帮助。为达此目的，除了在国家层面上发展与它们的关系外，我们还与这些国家中的执政党保持了接触和合作的关系，这些国家具体包括：埃及、马里、几内亚、阿尔及利亚、刚果(布拉柴维尔)和叙利亚。

这些党派对外均宣称自己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当然，从意识形态上来看，我们清楚它们与马列主义的立场仍有一定差距。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错误地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政党的社会主义理论及其实际的革命行动纲领都是以反对帝国主义殖民者和本国资产阶级为目标的。这也就使得我们所开展的，针对这些革命—民主主义政党的工作，既具有了重大的意义，又是一项具有前途的事业。在这方面我们有许多工作要作，目的就是要使他们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向我们靠近。这无疑需要花费巨大的精力，而且在工作期间，我们还必须充分体谅这些经历了长期压迫的民族内心所怀有的那种激烈的民族情感。

我们正逐渐地与这些党派和国家的领导人建立互信的关系。在与他们会谈期间，我们极力强化他们对苏共和苏联政府的信任感，极力将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以下方面：必须团

结所有进步力量和所有社会主义事业的拥护者、完成建立稳固的革命党的任务，而该党则要善于利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并在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开展活动。

苏共也没有忽视与一些革命—民主派活动家建立联系的工作，如纳赛尔，即便此人当时还没有放弃反对共产主义的偏见。我们认为坚决捍卫我们的兄弟共产党人的利益是本党应肩负的义务，尤其是当这些兄弟党遭到镇压之时，如在埃及和阿尔及利亚当时便属于这一种情况。

对民族资产阶级执政的国家中那些以社会主义为发展方向的力量给予支持，也是我们一项特别重要的工作。这些国家内部的情况往往极其复杂(我们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方面，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虽然民族资产阶级时常表现出动摇和不坚定，但在解放整个国家方面他们还是发挥了相当大的领导作用，并在自己的政策中仍坚持反帝路线。因此，针对这些民族资产阶级，我们党要像对待这些国家中的马列主义者一样——对其政策中的进步方面给予支持，并在这方面发展与这些执政集团的合作关系。另一方面，我们还应当积极促使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及其马列主义先锋队，不能只局限于资产阶级民族革命的范畴，而应当领导广大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继续朝着清除资本主义关系，建立劳动人民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方向前进。我们当然要全力支持我们的阶级兄弟制定这样的斗争路线，并极力帮助其取得这一斗争的胜利。但这样的话，就难免会与那些我们正从国家层面上发展关系的民族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发生冲突。

关于此类国家的共产党组织所遇到的困难情况，我们这里以印度为例。印度共产党遇到的是一个强大而有经验的政治对手——印度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印度国内形势的复杂之处在于，该国"左"倾分子们也组建了一个所谓的、与印度共产党平行的共产党。在这方面中国人是插了手的。我们完全能够理解印度共产党人是在何等复杂的处境中开展斗争活动。近两年半以来，印度共产党领导人曾八次与苏共中央举行会谈。在表示将支持其斗争的同时，我们也公开对他们说，印度共产党方面也犯了民族改良主义的错误。

同志们，在发展与民族解放运动的兄弟关系的同时，我们也在不断加强当代三股革命力量的伟大联盟。我们可以满意地指出，这一联盟关系正在不断得到强化，而这将有助于以前各被压迫民族的民族复兴和社会进步，并对我们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新生力量产生积极的影响。

同志们！如何才能从整体上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做出评价呢？马列主义政党始终坚持正确的立场。他们积极地反对中共领导人的分裂政策，为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为基础的自己队伍的团结和统一而斗争。

5年以来，中国领导人一直在为争夺共产主义运动的霸权而展开公开的争斗，并将斗争的矛头直指苏共。为了收买人心，他们可谓是不遗余力，不惜金钱。他们在30个国家中建立了分裂集团和政党组织，而后者的积极活动都是针对各马列主义政党的，但均遭到了彻底的失败。如今，对中共领导人所执行的分裂、反马克思主义政策提出公开谴责的已有57个政党。

在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上，我们党所做的多方面、大量和耐心工作的结果，已在我们党二十三大工作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我们的二十三大标志了一个转折点，即各兄弟党为巩固自身在马列主义原则基础上的团结而展开了一场积极的斗争。

如今，许多兄弟党都更坚定地提出了，关于召集新的国际会议的条件是否成熟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在过去的6年间世界上发生了许多新现象和问题，而这些都需要各兄弟们进行集体性地讨论，以明确我们运动今后的发展前景。

为了有利于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在关于召集国际会议的问题上我们曾有意识地拖延了一段时间，目的就是希望中共领导人能够重新审视自己的立场。可是，如今我们已不对此抱有任何幻想了。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必须支持召集这次会议的想法并开始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自从中共领导人在许多原则性问题上坚持自己的特殊立场起，在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便产生了诸多分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曾极力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以便能够一起从事反对我们共同敌人的斗争。苏共中央曾提出这样的建议，即不论相互之间是否存在分歧或不同观点，各共产党可以而且应当在反帝斗争中，尤其是在当代一些特殊尖锐的问题上(如在支持越南的问题上)采取统一行动。我们的这一建议为所有共产党组织的力量的联合提供了可能，并得到了19个共产党参加的三月会议的赞许。大多数兄弟党也都对此表示支持，并认为这是当前解决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存在问题的有效手段。

今年10月中旬，当各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领导人在苏联聚集之际，我们与其协商了如下问题：是否取消我们提出的关于召集新的各共产党会议的禁令，并公开说明召集此次会议的条件业已成熟。我们的这一想法得到了大家的支持。此后所发生的情况，正如你们都知道的，在保加利亚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日夫科夫同志，在自己的报告中提出了关于召集会议的问题，而同时提出这一问题的，还有出席这次会议和在会议上发言的其他党派的许多代表。

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等兄弟党代表大会，明确展示了共产主义运动在加强国际团结、谴责中国领导人的分裂路线以及支持我们党的政策等方面，所发挥的越来越重大的作用。而从这里，我们再次明确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党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我们在革命运动中所执行的是一条正确的列宁主义的路线。

四、中国领导人反苏、分裂活动的新阶段

同志们！

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国内所发生的一切使所有共产党都感到担心和忧虑。我们的运动遇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现象。有一个大国的执政党越来越偏离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该国所确立的秩序和意识形态与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中共领导人将强烈地反对苏共和苏联、反对其他兄弟党和社会主义国家作为自己所制定政策的主要目标，并试图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确立自己的霸主地位，把自己的反列宁主义路线强加给该

运动。

如今，毛泽东及其集团，所制定的大国和反苏政策已步入了一个新阶段。而于今年8月召开的，中共中央第十一次全会决议已证明了这一点，其在中国被称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

中国所发生的事件与中共领导人近年来所执行的政策紧密相关。如今，我们已尤其明显地看到，(中共领导人的)这一政策的出台并不是偶然的。置客观条件于不顾，中国领袖们决定无论如何都要使中国在世界舞台上获得特殊的、非同一般的地位。也正是出于这一目的，他们在1958—1960年间有意加速中国经济的发展进程，试图使中国跨越式完成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也正是因此而发动了所谓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等运动。

至于这一政策的后果大家都是知道的：中国经济平衡严重失调，工农业急剧倒退，国内开始出现饥荒，并导致成千上万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自1960年代开始，中国领导人被迫采取了一系列非常措施，以期暂时阻止国民经济的不断下滑。这些官方所谓的"政策调整"性举措虽然略微起到了稳定国家经济的作用，但其经济水平依然十分低下。截至1965年底以前，中国工业品生产总额只接近于1958年相关指数，而农业——近似于1957年水平。截至目前，中国的经济依然落后，形势相当严重，然而同期国内居民人口却又增加了7 000多万。

1950年代末，中国领导人的国内、外政策都发生了急剧的转折，并从属于自己的大国目标。在与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对外政策背道而驰的同时，中国领导人日益将反帝矛头转而对准各兄弟党和社会主义国家。他们尤其强烈地反对苏共，而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毛泽东将我们党视作其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中赢得霸主地位的主要障碍。这无疑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而对此，西班牙共产党主席里斯杰尔同志在匈牙利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发言可谓一针见血，他说，"苏联、列宁的党——我们最坚不可摧的力量，我们伟大的堡垒。也正是因此，中国领导人才在自己的分裂战略中将苏联及其政党视作自己的主要攻击、恶意诬蔑的目标"。

上述话语过后，会场上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现实证明，中共领导人的冒险主义路线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遭到了一个又一个失败，并受到了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和兄弟党的谴责。而那些为数不多的、紧跟中国领导人走的人们也遭到了严重的挫折。

北京对最高领导权的觊觎，遭到了从殖民主义桎梏下解放出来的国家的拒绝。同志们，你们都应当记得，就在前不久为了招募同盟者，周恩来和陈毅曾到亚、非洲一些国家转了一圈，并许诺给予这些国家慷慨的援助。可这些最终都成了空头支票。于是，中立国家的民众，很快便识清了中国政治家这些许诺的真正价值及其丑恶目的。而中国原本就不高的国际威望也急剧下降，并实际上已在国际上陷入孤立的困境。

国内外政策的一系列重大失败实际上意味着毛泽东"特殊路线"的破产，从而引起中国内部不满情绪的不断增长，导致无产阶级民主的歪曲，而后者又成为毛泽东及其亲信所坚持

的民族主义路线的无法分割的组成部分，进而又引发大规模的镇压和不间断地清洗。中国领导人试图以此来压制国内的不满分子，而此举自然会使其国内的反对情绪进一步增长，并在中国社会更广大的阶层中间蔓延。

截至1966年初以前，关于今后国家和党发展道路的问题迅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及其集团并不是千方百计地改变自己的既定政治路线、放弃霸权主义方针，以便在马列主义原则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而是继续试图以各种压制手段来对待国内反对情绪，继续坚持自己错误的大国路线，更加起劲地鼓吹反苏论调，并进而企图以毛泽东政策来代替马列主义思想。如果说，以前他们这样干时，还会极力以马克思的美丽辞藻来遮掩遮掩的话，那么此时已是彻底地明目张胆了。

任何"革命的"口号都无法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所谓"伟大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政治运动，绝不是真正地关心劳动者的文化水平和社会主义意识的提高。

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马列主义者都应当知道，实现真正的文化革命是社会主义制度赢得胜利的必要条件。在不彻底消除愚昧、无知和文盲的情况下，要建设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我们都记得，还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我们国家的内战尚未结束之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便曾向青年人发出过"学习、学习、再学习"的号召。列宁还谆谆告诫我们道："(我们)需要吸收资本主义所遗留的所有文化，并用之来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吸收所有科学、技术，所有知识和艺术。而非此，我们就无法构建共产主义社会的生活。"(《列宁选集》，第29卷，第52页)

列宁的上述教导正契合中国的实际。该国至今仍保留着强大的封建残余和小资产阶级思想，仍有3亿多人处于文盲状态，3 000万学龄儿童没有上学的条件。

可是，中国领导人所谓的"文化革命"却是别有用心，而与(提高民众的)文化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可以这样说，这场所谓的"革命"从一开始发动便与文化背道而驰，是一场大规模的洗劫知识分子的运动。在这场运动发动以来的一年半多的时间里，国内中学和高校都停止了教学工作，戏院和电影院都被关闭，大量书籍被焚毁，报刊被严禁出版。所有当代文学和艺术著作和中国精神财富以及世界文化的优秀作品遭到批判。

在当前的中国所有文化，全部思想都被毛泽东思想所替代(均归结于毛泽东思想)，后者被宣布为人类知识的登峰造极之作，是包罗万象的学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而非此似乎人们便根本无法再生活下去。《光明日报》(甚至)直接宣称："(人们)可以不吃，可以不睡，但不能不读毛主席著作。"(笑声，会场气氛活跃起来。)

以下是中国的军事家之一林彪不久前在大庭广众之下所发表的言论。

他说，"世界上没有人能替代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的书籍太多，没有人能把它们都读完，而且离我们也有些太远……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等(站得)更高。像(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才会出一个，而在中国——则是几千年才有一个。"(会场气氛活跃。)

同志们，在此类言论的背后，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以最为稀奇古怪的方式表现出的个人崇

拜，而且还包括有公开地改变党的思想基础的企图，极力以毛泽东的民族主义、大国主义观点替代马列主义思想的图谋。而这便是“文化革命”的思想内涵。

这里并非只涉及思想问题。“文化革命”　首先是一场政治运动，并包含有一定的政治目标。照中国领导人自己的话说，这一目标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的)整个上层建筑”。于是，党的领导机构被以最快速度摧毁。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党和国家机关、共青团和各级工会组织中展开了越来越大规模的镇压和清洗。国家的军国主义化日益广泛。所谓的“红卫兵”在国家政治舞台上出现，并积极地展开活动。后者在中国被描绘为“毛主席的突击队”。在这支队伍的背后则站着军队和国家安全机关。

同志们，从那些分发给积极分子的报刊和情报资料中，你们大家都已知道“红卫兵们”在活动中所采取的那些方式。我这里只列举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前不久，曾在北京师范大学实习的苏联无党派学者罗霍夫采夫同志从中国回来。该同志从一开始便亲眼目睹了“文化革命”的发展进程。如下是他写给中央的信的内容：“6月3日，‘左派们’(‘红卫兵’最初的称谓)包围了学校党委所在的行政大楼。我亲眼看到，在大楼门口举行的群众集会最终发展成为一场赤裸裸的(真正的)浩劫。声嘶力竭地喊了一整天的演讲者们找来了一根圆木，并用它的力量撞开了行政楼巨大的、铜制的一排前门。于是，由150—200组成的人群蜂拥着进入了大楼内。不久，从楼内便拖出了被打的党委委员和行政工作人员。其中许多人都是被沿着楼梯拽着手、脚拖下来的，并一路遭到殴打，身上血迹斑斑。也有一些人从楼上自己跑下来，但立刻便遭到了楼外(红卫兵们)争先恐后的围攻。从这些受害人的脸上我看到了明显的、难以言喻的恐惧，我认出他们都是我所熟悉的校领导。当晚，无线电广播站播放的消息称，‘左派们’已夺取了学校的整个权力。”这封信比较长，其中讲述了许多恐怖的事情，我这里只给大家读了其中的一部分。

镇压的规模是巨大而广泛的。受害人涉及20个省的党委领导人，中央党和政府机关主要部门的多位部长，各部门的所有领导干部。《人民日报》编辑部和“新华社”的领导层被免职。清洗还向基层蔓延——各县党委以及企业和机关的党委。

中共中央第十一次全会之后，党的领导层发生了尤其巨大的变化。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朱德等均不再担任党中央副主席的职务。保留这一职务的目前只有林彪。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七人领导小组也进行了迅速的改组，进入这一小组的新成员包括康生、陈伯达和陶铸等——都是些众所周知的忠于毛泽东的人物。被撤销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会书记职务的还有彭真、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会书记陆定一，几乎整个书记处成员都被替换，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一半人或被禁止政治活动或遭到了公开的残酷攻击。

关于中共领导机关的现状，我们并不掌握详尽的信息，但就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中共部分领导人出于各方面考虑早就下定决心要反对毛泽东的极端政策。

我们现有的非官方资料证明，今年11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了扩大会议，期间林彪曾以毛泽东的名义，建议免除刘少奇所担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职务。刘少奇拒绝辞职。于是，林彪建议以投票表决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然而，出乎毛泽东集团的预料，

多数与会者均投票反对刘少奇辞职。这样，毛泽东和林彪便成为党内的少数派。

还有信息表明，刘少奇在这次会议上表述了自己的立场，具体包括如下三点：1. 中国需要“文化革命”，但应当由党来进行，而不是由那些孩子们来做；2. 不同意毛泽东在反对苏共和苏联的过程中所采用的那些斗争方式；3. 中国一些近来表现良好的经济并非是由于掌握了毛泽东思想，而是由于纠正了“大跃进”和成立人民公社时期所犯的那些过失和错误的结果。

当然，我们目前无法保证上述信息的完整可靠性，至于刘少奇的真正立场我们也依然不甚清楚。然而，这一信息至少可能使我们从总体上得出这样一个相当正确的印象，即中共中央领导层内部正在经历着显而易见的危机。综合各种情况来判断，支持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党和国家领导干部的力量依然相当强大。虽然这些人的立场已遭到了严重的削弱，但毛泽东至今仍无法完全败坏自己的对手们的声誉并将其逐出中国的政治舞台。

难怪陈毅在自己的一份公开发言中声称，“文化革命”的主要目的——防止国家的政变，捍卫毛主席。可如今，显而易见，毛泽东首先必须做的是——保护自己的最亲密战友们。

综上所述，我们已清楚地看到，毛泽东为什么决定要首先对党和党的干部们实施打击。因为这些经过革命锻炼的党的干部不仅了解“毛泽东思想”，而且了解马列主义，内心充满多年来养成的对苏共和苏联的友好情谊，因而毛泽东不能不把这些人看成是自己政策的阻碍。

毛泽东集团已很长时间把党组织排除在政策的积极参与和制定的范畴之外了。党的代表大会和会议已有10年没有召集了。但仅仅这样显然是不够的。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们决定继续沿着破坏党的领导作用的路线走下去，以便使党成为自己手中顺从的工具。

由于得不到人民牢固的支持，毛泽东很早便试图依靠军队把自己的冒险主义路线强加给党。与此同时，他也很清楚，军队公开地反对党组织可能在政治上引起的不良反应。也正是因此，他才策划和煽动了青年学生运动，以便造成群众普遍支持毛泽东倡议的假象。而实质上，如今的中国正再现了托洛茨基当年臭名昭著的所谓青年学生就好像“革命的晴雨表”的论断。

这里所发生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由中学和大学的青年人组成的“红卫兵”只受到毛泽东思想和好战的民族主义精神教育，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认识极其薄弱而且已被歪曲，对马列主义则完全没有认识。另外，我们也不应忘记这样一个事实，即其他一些因素——长期处于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生活环境等——对一半多的中国青年学生的负面影响。

这些就是对党组织发动猛烈冲击的主要突击力量。而如今，这些从中国这场大浩劫中脱颖而出的非党的，以小资产阶级为主的青年人竟被看作是党的骨干的主要后备力量，并被用来顶替在“文化革命”过程中被免职的那些人。(中共领导人)这样做的实质就是试图改变党的社会性质，从而使原先执行无产阶级专政职能的政治机关只留下一个外壳。

我们不能不看到，在瘫痪党和国家机关，破坏社会法制的同时，“红卫兵”的活动也动摇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基础，导致国家政局的动荡不安，败坏了社会主义思想在广大劳动群众中的威望。

由于中国领导人的现行政策，工人阶级的地位遭到了削弱。工人们的物质待遇水平持续下降，工会活动陷于瘫痪，军队纪律被引入企业，工人被迫“自愿”放弃奖金，并将自己的一部分工资交给国家。广大农民也被要求从事无偿的强制性工作，农业居民的生活也被彻底军事化。

在“文化革命”过程中，实际上只有一个阶级的地位没有发展变化，那就是资产阶级。该阶级没有遭到“红卫兵”的冲击，其特权也重新得以确立，并继续享受着国有财富的利息。

加强整个国家生活的军事化是中国“文化革命”的显著特征。中共中央八届第十一次全会决议提出的“全国学习人民解放军”和“全民皆兵”的口号，实际上就是该党所制定的行动纲领。

为了分散国民对国内困难的注意力，当局在人民中广泛进行备战宣传。城乡所有成年居民都被要求加入民兵组织。在所谓“把整个国家都变成一座兵营”的号召下，每个中国人都被变成毛泽东的“听话的好战士”，而列宁提出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及其作用、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原则等观念则被完全抛弃。

在穷尽各种手段来实现自己的大国梦想以及加速增强自己的核武潜力的同时，毛泽东及其集团根本不顾及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这里我们都记得这样一个事实，即1957年11月毛泽东在与苏联领导人的会谈中便曾宣称：“坏事——也有其相反的，积极的一面。穷苦人敢于干革命，就是因为太穷。很难想象，人们要是都富了会是什么样。这未必是个好现象。”又正如中国报刊所写的那样，毛泽东要求：“生产要追求高标准，而生活则要保持低水平。”中国还提出这样的口号：“坚定实行合理的低工资体制。”这就是中共官方当时提出的口号。

还在十一次全会前夕，毛泽东便曾要求将军队、工业企业、人民公社和国家机关转变为拥有自给能力的综合性单位，而其中每一个单位都应同时具备以下功能：军事、工业、农民和文化，等等。在全国范围内均实行“义务劳动制”，而这种劳动都是无偿的。所有这一切都确保了国家积累的高水平，及其军事工业的相应迅速增长。

中国领导人毫不隐讳地试图使自己的“文化革命”具有国际性质。林彪和康生便曾公开宣称，“文化革命”应被看作是毛主席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做出的一项“伟大创举”，必须将其在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中推广。而为此，北京甚至已组建了“红卫兵国际司令部”。

我们不能不特别关注中国“文化革命”所具有的突出的反苏倾向。毛泽东及其集团知道，如果人们了解了苏联和苏共的真实情况以及苏联人民的成就，就会更加明显地暴露中共领导人政策的失败。因此，即使民众对苏联表现出最微弱的好感，都会被中国当局扣上“民族叛徒”的帽子。而以此，当局试图在中国四周再修筑一座新长城，以严防各种中共领导人自认为危险的外来因素对民众造成影响。

为了营造一种“非常状态”，中共领导人就需要杜撰一个所谓“来自北方的威胁”——即指我们国家对中国的威胁——的故事。但要用似乎苏联对中国构成威胁，似乎“苏联与美国结盟就是为了进攻中国”等说法来说服中国人民，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于是，当局便开始向民众灌输如下思想，即苏联似乎在西伯利亚和中亚占据了中国大量领土。

中国领导人极其虚伪。他们虽然口头上声称,似乎自己“为了维护与苏联的友谊,才反对苏共和苏联政府”,而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仅从中国的报刊上我们便可坚定地得出如下结论:中国领导人正在极力蓄意侵犯的是我们整个党,整个苏联的最根本利益。

同志们,你们都读过曾于今年11月份到中国访问的苏联社团组织代表团所作的报告。因而知道,在该代表团访问期间,中国人在会谈中做出了许多挑衅性举动,说了大量挑拨离间的话。而所有这些无疑都是在进行直接的反苏破坏活动。中国代表的放肆无礼甚至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竟然肆无忌惮地宣称:“我们将与你们在红场相逢,而那时苏联将爆发第二次革命。”中共中央主要机关报《人民日报》也曾写道:“克里姆林宫上空将飘扬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而我们代表团,正如你们所知道的,对这些挑衅性的进攻均给予了应有的回击。

关于中国领导人现行政策的敌视性质,从其意图来看,我们需重视这一敌视性质在中-美关系方面所起到的重大作用。在反对苏共和我们国家的同时,毛泽东似乎在向美国人招手示意,以便后者明白,中-美之间已拥有了彼此接近的基础。来自各方面的信息使我们感到忧虑,即中国外交人员正极力寻求与美国人建立联系。例如,前不久美国国务院官方顾问在与苏联代表会谈中便承认,美国政府“除了与中国人在华沙举行了会晤外,还在与北京进行各种非正式接触”。毫无疑问的是,在这场不体面的游戏中(有人)正在积极地打反苏牌。

应当说,中国宣传机器极力将“文化革命”推向国际范围的努力并没有成功。正如我们前面所指出,绝大多数共产党和工人党、所有进步和思想健全的人们均对中国所发生的事件表示愤慨。而对“红卫兵”的胡作非为持积极支持态度的只有个别几个可怜的,得到北京援助的变节者。

朝鲜、越南和日本等共产党虽然没有公开评价“文化革命”,然而众所周知,其均对之持否定态度。甚至连毛泽东最亲密的盟友——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也只是以最一般的方式提及这场运动,更没有表示出将之运用到本国的意愿。总之一句话,被毛泽东寄予厚望的冒险事业在国际上遭到了惨败。

以上便是目前在中国国内正在发生的“文化革命”的主要发展情况(趋势)。所有情况均表明,这场政治运动并不仅仅只是中共的内部事务。中国现在所发生的一切,并不只是中国人民的悲剧——大量党和国家机关被摧毁,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工人和知识分子的人权和尊严遭到凌辱和践踏,而且败坏了科学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的威望。而从来没有任何帝国主义的反共宣传能像中国领导人目前所做的那样,对社会主义事业(理想)造成如此重大的损失。中国领导人的“文化革命”对社会主义团结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都构成了威胁。

在对中国所发生事件做出评价的同时,我们不能不提出关于该国对内政策发展的前景问题。毛泽东集团是否能够完全实现自己的既定计划,目前仍很难说。因为他们手中掌握着军队和“红卫兵”。不过,越来越多的资料表明,中国国内反对这一路线的力量也正在不断增长。尽管出现了“红卫兵”针对各级党的委员会而进行的大规模恐怖和恐吓情况,但他们的行动在一系列地方都遭到了工人和其他阶层居民的坚决反击。在中国的许多城市也发生

了工人和"红卫兵"之间的流血冲突事件。

下面，让我们看一些苏联工作人员从近期在上海街头所得到的一份新奇文件中节选出的片断。据该标题为"致世界公众"的文件称，"毛泽东完全歪曲了马列主义，结果导致他不仅与中国人民背道而驰，而且也与中央一些领导人发生了矛盾……国家经济瘫痪，民众不满情绪强烈增长，普遍发生工人罢工和大学生罢课现象，经常出现流血事件……(人们)一想到中国的未来就感到可怕。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情况刚刚有一些好转，如今又重新陷入水深火热(灾难和大混乱)之中。(民族)前途暗淡，民族处于危险之中。对于诚实的中国人而言，唯一的出路——向全世界呼吁，并发出奋起保卫中国的号召"。

该文件再次证明了当前中国国内的复杂和矛盾形势。一方面，许多人真诚信仰社会主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农业的集体劳动方式等都为中国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客观前提条件；而另一方面，我们又明显看到这样的迹象——依靠自己所掌握的军队及其大量的组织和机构，某些民族主义腐化堕落集团所制定的对外政策，又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构成了严重威胁。

中国国内政治斗争仍在继续。我们不应排除这样的可能，即整个事件的发展进程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转折以及各斗争力量的对比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如果毛泽东及其集团将长期顽固地坚持当前政治路线不变，并继续削弱社会主义的地位，那么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就将难免发生重大波折。

当然，事件的这样一种发展进程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在中国共产党内部依然存在有健康的力量，为了使党重新走上马列主义道路他们将不会停止斗争。为了维护与中国人民的友谊、揭露毛泽东及其集团的分裂活动和巩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我们将坚持斗争。而与此同时，所有那些正在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未来而斗争的人们也将得到我们的帮助。

同志们！在马列主义党派的文件中已多次指出，中国领导人所坚持的"特殊路线"具有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在对中国所发生事件进行分析的同时，我们也应当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半封建的农民国家，目前仍有80%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在小资产阶级和农民自发势力的汪洋大海之中，工人阶级(群体)曾经，即使现在依然是一座不大的孤岛。即使如今在革命成功的17年之后，在中国总人口中工人阶级的数量也没有超过1 500万人。

这些都为小资产阶级思想向中国共产党的渗透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从而导致其容易形成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些特点：动摇、不坚定、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民族利己主义和民族局限性，等等。

要正确理解当前中国领导人的政治思想纲领，还必须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数千年以来，中国的统治上层都在给人民灌输着关于中国是世界上最强大国家和世界文明中心的观念。而所有这些观念均与中国的实际地位，与20世纪初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现实相矛盾，进而导致中国人民族情绪的激化并促使其不惜一切代价以重新实现以前的辉煌。

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在相当程度上是透过古老的中国思想、已渗透到其精神深处的

大国主义和保守主义传统的棱镜来进行的。毛泽东本人及其他中共领导人曾多次说过,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学说主要看作是实现中国“民族复兴”的一把钥匙。

中国人口众多,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一因素都对许多中国领导人政治观念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领导人认为,自己的人口资源是无穷无尽的,因为传统的高人口出生率可以使损失的人口得到迅速的补充。大家都知道,毛泽东曾在1957年(莫斯科)共产党会议上得出了如下冷酷的判断:未来一旦爆发世界性核战,地球上的人口就会死1/3、一半,甚至更多。他的上述论断使当时所有的与会者都感到震惊。可是,这正体现了毛泽东及其亲信的典型思维模式。在他们的思想观念中不仅个别人的生命,即使成百上千万人的生命也都是毫无价值的。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滋生了中共领导人的民族主义观念。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必须看到和考虑到的。不过,我们还必须看到事物的另一面。虽然上述困难导致中国革命的发展进程相对复杂,可与此同时也存在着一些良好的客观条件。如果中共领导人善于利用这些条件,中国仍是能够顺利地建成社会主义的。中国革命拥有稳固而可靠的后方——苏联。我们国家不仅在物质和政治上帮助了中国共产党,而且确保了中国不受侵犯和阻止了帝国主义侵略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干涉。当中国步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之时,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已然建立。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苏联均向中国提供了全面的经济和科技援助。

总之,当时中国已拥有了顺利建设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问题的关键仅在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能否正确地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能否正确地动员和组织民众来建设社会主义。遗憾的是,中共领导人并没有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也没能以马列主义无产阶级政策抵御住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压力。

如果我们追溯一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轨迹,那么如今中国领导人的许多观点也就变得更容易理解了。众所周知,还在1920年代中国共产党中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的党的骨干便与党内其他本质上属于民族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派别发生了冲突。而上述两者之间的斗争便成为了中共整个历史的显著特征。

1925—1927年革命失败之后,国民党消灭了中共的多数领导人及其积极分子。这一情况对上述斗争的进程和结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截至1935年即毛泽东进入党的领导层之前,党的全部工作实际上都集中在军队和个别根据地,而后者均远离国家主要的无产阶级中心。在脱离无产阶级的同时,补充到中共党内的新党员几乎只有农民、小资产阶级分子、出身剥削阶级家庭者和知识分子。

中国共产党人员结构上的这一特点使共产国际感到担忧,因而曾多次向中共指出这一情况。例如,共产国际执委会于1936年给中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发出的一份特别指示中便写道:“我们尤其感到忧虑的是(中共做出的)这一决议,即不论其社会出身如何,凡有意愿者便可被吸收入党。难道党就不害怕一些只求功名地位者混入自己的队伍……我们认为让一些有产阶级代表在苏维埃各地区从事政治管理工作是错误的。”中共领导人忽视共产国际发出的这一警告,继续大量吸收非无产阶级阶层入党,从而进一步稳固了民族主义小资产阶级

分子在党内的地位。

毛泽东对民族和政治问题所持的小资产阶级观念滋生了其对工人阶级及其力量的不信任感。这种不信任感不仅在国内战争时期，即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都有显著表现。例如，1949 年 12 月，当时在中共中央工作的联共(布)中央代表 И. В. 科瓦廖夫在给斯大林的一封信中便这样写道："在革命的国家成立之后，中共领导人依然对工人阶级的作用估计不足。截至目前，工人阶级党员数量的增长仍微不足道。在吸收工人入党的问题上(中共)尚未采取任何积极举措。在党组织中大量充斥着各类地主、富农和小资产阶级分子，而且在一系列地区吸收新党员的程序执行得很笼统。"

而当时正对中国进行访问的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维里奥·斯帕诺同志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曾对我们在北京的外交人员说道，"中国的工人阶级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斯帕诺带着忧虑的口吻指出，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领袖，但却不能给本国人民，尤其是工人阶级指出明确而清晰的前途"。

如今，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断定，上述这些危险并不是没有可能的(并非空穴来风)。在登上党的领导岗位的同时，毛泽东便开始广泛地利用强暴的、反民主的方式来实现自己虚荣的图谋。苏共中央目前已掌握的材料表明，1941—1944 年间，在中国解放区所进行的所谓"整风运动"便是第一次清除国际主义思想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的大规模运动。当时，一些正在延安八路军司令部(工作的)苏联军官便曾指出："当时的中共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日常行为就跟军阀一样，而不像共产党员。权力体系是纯粹独裁式的。所有异己者实际均被消灭。当时，处理这方面事务的负责人便是康生——实际上是毛泽东的最得力助手。"这些，同志们，还不是今天的或近来以来的材料。

毛泽东及其亲信的反苏情结还反映在如下一个典型事例中。1941 年当苏德前线情况处于最危急的时刻，共产国际曾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如下一个问题，即中共军队将可能采取哪些行动以阻碍日本发动针对苏联的进攻。

那么，毛泽东当时是如何作答的呢？如下是当时执行(共产国际)这一委托的苏联军官基斯连科同志在 1941 年 9 月 3 日发出的一封电报中所写的情况：

"针对这一问题，(毛泽东)作了几个混乱的、不清楚的、不直截了当的答复，而且还不断地使用'如果'一词"。毛泽东对这位苏联军官说道，"你们不了解我们的战略和政策。在日本人发动反对苏联的战争之时，我们将采取一些小规模的作战行动，而不是大部队作战，因为要保存我们的实力。在战争过程中我们将根据(具体)情况采取行动，再说我们如今还要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即在日本人发动了反对苏联的战争以后我们将如何进行这场战争"。

基斯连科同志继续道，"当我不止一次地重复了我所提出的问题之后，(毛泽东)依然是作了几个令人费解的答复，而且依旧使用了几个'如果'：如果苏联援助我们，如果国民党不反对我们，如果目前反对我们的日本军队的兵力有所减弱。总之一句话，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才可能涉及关于向日本开战的问题。而至于他们将以什么方式来帮助我们，最终我也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答复"。

稍后，关于这一情节基斯连科将军又作了如下描述:“我说：毛泽东同志，您很了解我们目前的严峻形势。在这种情况下你们是否能够放弃如此之多的条件！我们目前显然是无力满足您所提出的那些条件的。因此，我请求您放弃那些‘如果’，就说今天，如果日本向我们发动进攻的话，你们能够做什么？而毛泽东，不是答复我提出的问题，反而指责我不懂辩证法(缺乏辩证思想)，在关于如此重大的问题的谈话中竟采取如此无礼的(提问)方式。”

从以上整个叙述可看出，中共领导人当前的民族主义和反苏方针的根源是由来已久的，该方针是在数十年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中共中央不止一次研究我们当前所面临的，与中共和中国领导人活动有关的那些问题。我们认为，系统地向党通报，我们为了整个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世界体系的局势的正常化而采取的那些实际举措以及苏共和中共关系的发展情况，是自己所肩负的义务。如今，回顾过去，已得到中央委员会肯定的那些文件和实际活动，我们可以坚定地说，我们过去(对形势)所作的评价，我们(所执行)的政策都是正确的。

我们党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所执行的原则性方针大家都是众所周知的，这就是：加强苏共和中共的团结一致，巩固苏联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友谊。自从我们与中共的关系出现了一系列困难的那一刻起，我们便密切关注着中国领导人的观点和政策的危害性，并极力阻止事件朝着(我们)不希望看到的方向发展。

(苏共)中央清醒地认识到，10月中央全会以后，我们针对中国共产党所采取的政策是极其克制的，真诚希望帮助中国同志重新走上正确的道路，以实现苏中关系的正常化。

在苏共中央的倡议下，1964年11月在莫斯科举行了与中共代表团的谈判，1965年2月又于北京举行了我们代表团与毛泽东的会谈。期间，我方提出了一系列旨在消除双方现存困难的建设性的建议。

苏共中央多次致函中共领导人，其中表达了我们为了双方共同的反帝斗争的利益，尤其是支持越南人民的英勇斗争事业而致力于与中国共产党的团结。为了我们的共同事业，苏共中央多次建议举行苏中两国最高级别的谈判。

虽然中共领导人仍在系统地实施针对苏共和苏联的敌视性运动，我们仍邀请中共代表团参加了二十三大，在会议期间(从本次会议的讲台上)我们再次确认自己随时准备与中共领导人一道研究现存分歧，以便在马列主义原则基础上寻求消除这些分歧的途径。

正如你们大家所知道的，我们所提出的所有倡议都没有得到中方的正确理解，我们的任何一条建议都没有被中方所接受。甚至于，我们每次所采取的友好举措，最终得到的都是针对我们党和苏联人民的恶毒诬蔑性攻讦、污辱和谩骂。

在拒绝接受苏共提出的旨在实现苏中关系正常化的所有建议的同时，中共领导人还中断了两国间的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方面的合作关系。由于中国方面的原因，苏中贸易比1959年的水平缩减了5倍。而与此同时，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商品流转(贸易)却增长迅速。

苏中边境的局势也不能不让人担忧。中国是我们的邻邦，我们与之的共同边界总长度达到7 500公里。从今年1月至11份，已发生了多起中国公民以集体和单独方式侵犯我国国界的事件，而且其中多数均明显带有蓄意挑衅性质。

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中方在我国东部边界地区的行动具有挑衅性质，目前正密切关注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将采取必要措施以反对任何可能发生的挑衅。这里，在此次中央全会上我们坚定地宣布，苏联国家的所有边境线都将得到我们光荣的武装力量的警惕而可靠的维护。苏联人民会继续平静的劳动，以完成自己所肩负的在我们国家建设共产主义的历史任务。(掌声)

鉴于这里涉及我们国家安全的问题，我想再谈一谈关于1950年签署的为期30年的《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严格地说，根据该条约只是在受到日本侵略的情况下(苏联和中国双方)才会在军事上履行互助的义务。不过，在1958年和1962年，在公开发表的著名声明中我们又就该条约扩展了我们的军事义务，其中规定：我们将把任何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进攻行为及其后果视作对苏联的攻击。同志们，你们请记住上述声明。

正如你们所理解的那样，在当前形势下关于苏中条约的问题仍具有特殊的意义。虽然我们不允许这样的情况发生，即由于我们所承担的条约义务而被中国领导人的冒险主义路线拖入世界性的军事冲突之中。但与此同时，即使在当前复杂的形势下我们依然认为苏中条约的存在仍具有一定的意义，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仍发挥着扼制帝国主义侵略力量的作用。这就是为何我们至今仍不提出关于废除该条约的建议的原因，虽然中国政府的行为早已破坏了我们联盟关系的基础。我们将密切关注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并会在必要情况下重新提出这一问题。

同志们！我们不能不注意到，毛泽东及其集团的大国主义路线，他们的分裂活动和反苏运动对社会主义的友好团结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所构成的巨大危害。中国领导集团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阻碍了世界革命的进程以及共产主义运动、所有反帝和爱好和平力量的团结，助长了不健康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各共产党和民族解放运动队伍中的滋生。虽然我们不应过分估计北京领导人的政策对世界事件的发展进程所发挥的作用，但如果对其负面影响持视而不见的态度也无疑是不对的。

我们党和所有依然忠诚于马列主义原则的兄弟党都面临着一系列重大的任务，那就是尽力将当今中国领导人对捍卫和平、民族和社会主义的斗争进程的负面影响缩减到最低。

我们的国家利益要求我们，一定要对中共领导人在国际舞台上所施展的阴谋诡计保持高度的警惕性。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向那些为了自身的独立而斗争的民族给予帮助。我们认为这是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但我们绝不允许，中国领导人利用我们所给予的此类帮助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恶化国际局势和挑起新的世界大战。苏共中央不论现在还是将来都会执行和平共处政策，力求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

我们并不打算在我们国家内煽动反中国情绪以及民众对中国的恶感。所有诚实的中国

人都应当清楚地看到,苏共和苏联——他们的可靠盟友,发展与我们国家和党的友谊和兄弟关系将为中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开拓广阔的前景。

在开展针对中共领导人的反苏阴谋的斗争过程中,我们的政治思想工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们当然不担心出现如下情形,即毛泽东集团会在某个时期赢得我们党和我们人民中某些阶层的支持。北京倒是想把自己的政策强加于人,但他们的这一政策就是要放弃共产主义建设和提高劳动者福利的方针,放弃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并实行兵营式制度。难道在我们国家里会有人支持这样的政策?! 显而易见,答案是否定的。

然而,我们不能忘记,中国的宣传家们并不仅仅只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辩论。针对他们对我们国家所作的恶毒宣传、教唆我们个别人的落后情绪及其在我们各民族间制造不和的企图,我们不可能置若罔闻。与北京的诬蔑性宣传作坚决的斗争,提高民众的政治警惕性——是我们所有党组织、每个共产党员和全党的必要职责。

在国内、外加强向民众解释苏共的列宁主义方针、我们党的纲领和二十三大所制定的路线政策,也是极其重要的一项工作。与其他马列主义政党一样,我们将始终不渝地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反对以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来替代之。

两年以来,我们一直在公开批判中国领导人的思想和政策,我们这样做都是对的。如今,又出现了另外一种情况,即与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一样,我们党和人民的利益均要求我们对毛泽东集团的思想理论纲领及其政策进行批判的分析。而这也是捍卫中国自身的社会主义成果的利益所提出的要求。

要使中共重新回到马列主义立场和科学社会主义立场,这一进程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而我们自己应当有充分的准备,以便继续始终不渝地坚持我们的原则路线,坚持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诸原则。这不仅是我们理论战线的工作人员,而且也是党的所有积极分子和我们全党的最重大任务。

中央政治局坚信,中央全会会赞成我们在国际政策领域和为巩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斗争中所制定的路线的。(持续不断的掌声)

同志们! 对当代国际形势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状况的分析证明了,我们党二十三大路线是正确的。在坚持这一路线的同时,为了世界社会主义和国际工人阶级的利益,为了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反对帝国主义及其侵略政策,为了摧毁新的世界大战计划,为了和平事业和各民族的安全,我们将继续展开积极的斗争。

在当前形势下,在依据1957—1960年间历次莫斯科会议的声明和宣言而制定的共产主义总路线的基础上团结马列主义各党派的任务,具有了特别重大的意义。我们党认为积极参与并完成这一任务是自己最重要的义务。在这方面我们将始终以10月中央全会之后苏共中央所确立的立场为指导——在一系列重大而迫切的反帝斗争问题上全力与各兄弟党采取共同行动,加强与其他马列主义党派的联系。

目前,一切迹象均表明,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即召集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已日益成为一个极其迫切的现实问题。已有60多个党派要求召集该会议。苏

共认为，有必要在本次全会上真正落实这一问题。就召集会议的问题我们将与其他党派进行协商并全面地对之加以研究，以最终达成统一的决定。对此，我们认为该会议并不是以将谁驱逐出共产主义运动为目的。其主要目的应当在于：研究当代国际形势和共产主义运动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为反帝斗争，为捍卫和平、民主、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制定出一条总路线。

我们坚持要求所有共产党都来参加这次会议，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但是，我们不会同意中共领导人和其他一些党派阻挠会议的召集。因此，苏共中央政治局认为，会议在经过认真的准备和与其他兄弟党进行了必要的协商之后就应当届时举行，而不应取决于中国共产党和其他一些党派参加与否。

同志们！

我们的列宁主义政党，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支柱。而决定其在全世界共产党人中拥有崇高威望的主要因素之一就在于，我们党创造性的立场和理论以及善于在解放斗争的发展过程中确定每个历史转折，并对当代一系列重大问题给出马列主义的答案。我们必须向我们的理论骨干提出如下任务，即对当代社会发展的一系列现实问题进行深刻的分析。

我们国家正在大力筹备十月革命50周年的庆祝活动。通过这一伟大的事件将使我们深入地阐明科学社会主义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并以此促进和加强我们党和苏联在全世界革命运动中的地位。

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正准备迎接自己光荣的50周年的我们国家，即便在遭到我们的所有敌人和马列主义的叛徒们反对的情况下，依然完全有可能使社会主义思想以巨大的力量造福全世界千百万劳动者，并对之产生革命的促进作用。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沿着正确的列宁主义道路前进。而沿着这一道路我们苏联人民、我们党和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必将夺取一系列新的伟大胜利。（雷鸣般的、持续不断的掌声）

会议主席波德戈尔内同志：同志们！根据我们约定的议事日程，现在应当宣布休会，然后是两个小时的午餐时间。这样，在全会工作结束之前就只剩下一个小时了。鉴此，我们建议，把此次休会时间一直持续到明天早上十点以前。

台下传来代表们的声音：正确。

会议主席：波德戈尔内同志。我想，已没有必要表决了，因为同志们的情绪已经表明，我们的上述建议已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明天，全会将讨论勃列日涅夫同志的报告。第一位发言的是Д.А.库纳耶夫同志——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

宣布休会到明天。

РГАНИ，ф.2，оп.3，д.49，л.3－18

№22988

苏共中央全会会议记录：库纳耶夫关于中国在新疆反苏活动的发言

(1966 年 12 月 13 日)

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十二月中央全会

(1966 年 12 月 12—13 日)

第二次会议记录

讨论 Л. И. 勃列日涅夫的《关于苏联的国家政策和苏共为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斗争》报告(未修改的速记记录)。

(1966 年 12 月 13 日)

会议主席：A. H. 柯西金和 A. П. 基里连科

A. H. 柯西金——会议主席，建议由 Д. A. 库纳耶夫发言

Д. A. 库纳耶夫——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

A. H. 柯西金——建议 H. Г. 叶戈雷切夫发言

H. Г. 叶戈雷切夫——苏共莫斯科市委书记

A. H. 柯西金——建议由 П. E. 谢列斯特发言

П. E. 谢列斯特——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

A. H. 柯西金——建议由 B. C. 托尔斯季科夫发言

B. C. 托尔斯季科夫——苏共列宁格勒州委书记

A. H. 柯西金——建议由 A. П. 希季科夫发言

A. П. 希季科夫——苏共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委书记

A. H. 柯西金——建议由 Ш. P. 拉希多夫发言

Ш. P. 拉希多夫——乌兹别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

A. H. 柯西金——宣布休会

A. П. 基里连科——会议主席，建议由格列奇科发言

A. A. 格列奇科——苏联国防部副部长

A. П. 基里连科——建议由 B. B. 格里申发言

B. B. 格里申——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

A. П. 基里连科——建议由 И. И. 鲍久尔发言

И. И. 鲍久尔——摩尔达维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

A. П. 基里连科——建议由 M. B. 凯尔迪什发言

M. B. 凯尔迪什——苏联科学院院长

A. П. 基里连科——宣布休会

苏共中央全会，1966 年 12 月

第二次会议

(12 月 13 日早上)

会议主席柯西金同志：同志们，让我们继续进行全会会议，我们将进行报告讨论。

第一位发言的是库纳耶夫同志，叶戈雷切夫同志作发言准备。

库纳耶夫：同志们！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的详细报告有力地证明，党的二十三大所确定的我党对外政策方针以及 10 月中央全会之后苏共中央所执行的为争取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团结而斗争的路线是唯一正确的。这是我们列宁主义的中央的重大贡献。我们中央坚定不移地为维护和巩固和平而斗争，并以灵活、深思熟虑的策略和行动原则把大多数兄弟党和世界各民族吸引到自己一边。

中央所制定的路线完全、彻底地符合列宁的遗训，促进了苏联国际声望的进一步巩固，极大地增强了苏联对世界性事件的整体进程和世界革命发展过程的作用。

在这次全会上，关于苏联外交政策和我们党为争取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斗争问题的讨论，再次证明，苏共中央始终坚决而不断地为了马列主义的纯洁，团结和社会主义友好合作以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诸原则的胜利而斗争。

这一路线的正确性也得到了生活本身的证明。我们党致力于巩固共产主义队伍的团结。其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图谋，给予英勇的越南人民以巨大而全面的支持，从而得到了各兄弟党和全世界进步舆论的拥护。

当前在和平和社会主义的命运主要取决于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和统一的形势下，人们不能不对如下事实感到深深的忧虑，即以共产党员自称的中国领导人所宣扬的特殊方针。这一与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方针的实施，意味着中国领导人与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彻底分裂，破坏了保卫越南人民和反对帝国主义的行动统一，并对中国自身赢得社会主义的胜利造成了损害。

我们完全清醒地认识到，当前中国领导人所执行的政策以及带有沙文主义狂热和公开的法西斯野蛮暴行的所谓“伟大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目的在于，从根本上镇压中国劳动者对毛泽东及其集团冒险主义方针的不满；而中国领导人的这一方针——不论是对内政策，还是对外政策，都将面临深刻的失败。

完全显而易见的是，反对现任中国领导人的斗争已是苏共最首要的当务之急。如今已到了坚决揭露中国领导人危险图谋的时候，后者就是想在全世界面前以自己的托洛茨基政策和实践破坏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以及世界的革命性变革的伟大事业。

该报告还直观地展示,北京分裂主义者们对我们党的内政、外交政策所进行的猛烈攻击。他们赤裸裸地诬蔑苏共背叛了马列主义,并对世界其他民族实行沙文主义政策。

与这一诬蔑相关,我们来看一看中国自己是如何解决民族关系问题的。不争的事实证明,正是现任的中国领导人是少数民族自由的摧残者,毫不掩饰自己压迫少数民族的大国主义种族政策。该国在许多方面均存在激化民族主义情绪的诱因。

与此同时,许多兄弟党在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中,创造性地利用并高度评价苏共在解决民族问题方面的丰富经验,这与我们在中国所看到的情景完全两样。中国领导人以自己的沙文主义政策,践踏了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伟大教导。

还是让我们来看一些具体的事实吧。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在中共中央的一份纲领性决议中便指出,“全国领土解放以后,将在新疆、西藏、内蒙古和宁夏东干地区建立联合政府,即组建民族联盟共和国”。

然而,这些慷慨的许诺最终并未实现。在中国内战结束之后不久,毛泽东在自己的《关于内部矛盾》的小册子中便宣称,“少数民族利益与中华民族利益之间存在着矛盾”。

从这一伪命题提出之日起,便意味着中共领导人已从国际主义立场转到了大国沙文主义立场之上。换言之,中国为了“清除”毛泽东所臆想的“矛盾”已采取了强制性的少数民族同化政策。在实际中,这一路线最终演化为奴役和残酷镇压非中国少数民族的种族主义政策。

我们共和国直接与中国相邻。其边界长约2 000公里,与新疆相邻的边境地区居住有许多哈萨克、维吾尔、吉尔吉斯、鞑靼和其他一些属于哈斯克斯坦居民亲属的少数民族人口。还在194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很久以前,上述少数民族便在苏联的帮助下驱逐了蒋介石分子并建立了东突厥斯坦政府。该政府实行了一系列革命性的改革。

1949年,毛泽东的军队进入新疆,并以反对“三股势力”为借口开始对1944年民族解放运动的参与者实施残酷的镇压政策。当年曾与蒋介石分子进行了英勇斗争的许多人均被逮捕,当地爱国人士遭到大量屠杀,监狱和劳改营人满为患。

尤其引人关注的是,还在那个时候,中国当局便开始在新疆追捕那些对我们国家抱有些许好感的三种人。这再次证明,毛泽东从来就不是苏联和我们党的真诚朋友。

中国当局针对土著居民所实施的沙文主义政策,不仅导致经济凋敝、贫穷和饥饿,而且还完全剥夺了中国这一广大而富饶省份中各少数民族的政治权力。

如今,新疆的情况是无法无天,各非汉族的少数民族遭受奴役,因此人们纷纷从这跟监狱一样的地方出逃。

由于担心受到中国沙文主义者的污辱和压迫,饥饿和贫穷,近年来许多中国边民越境进入哈萨克共和国,其中哈萨克族人有16万人,维吾尔族和其他民族——超过2万人。每天都有数千人从不同地区越境进入苏联,经常是整个生产队和公社在农场主席和党组织书记的带领下越境,从中国出走苏联的甚至还有军事人员。

从中国出逃的人在当地的处境令人难以忍受。他们越境后基本上都是光着脚、衣不蔽

体，甚至赤裸。难民中有许多人身患疾病，身体极度虚弱。这激起了哈萨克民众和全体劳动者的极度愤怒：自称为共产党员的中国领导人怎么能够如此不人道地对待少数民族劳动者！

根据苏共中央的指示，共和国领导人要求聚集在边境地区的数万难民返回新疆。然而，针对我们的要求人们都跪在地上，流着眼泪说，他们永远都不会再重返中国。

难民们还给苏共中央发出了许多声明书，以下便是其中一份声明的具体内容：

"我们违法越过了两国国界。中国当局压迫、污辱我们。由于饥饿，我们公社中不断有人饿死……对于越境之事我们随时准备承受任何惩罚，但只是恳求：不要把我们遣返回(中国)。"

事情很清楚，为何这些人不愿意返回中国。因为他们在公社中被强迫像奴隶一样无偿劳动，吃的是"大锅饭"，被禁止拥有个人的基本生活必需品。如果有谁试图偷着为自己单独做饭，中国监工便会立即出现并强行没收人们可怜的一点食物。在城市，所有对当局政策不满者均被剥夺领取食品票证的权利。

从中国越境来到苏联的人民解放军第五军前军长——少将 M. 伊斯卡诺夫、新疆国家安全局局长 T. 马赫穆多夫同志、喀什噶尔军区前司令员 M. 尤苏波夫等人在给苏共中央的信中写道：新疆当地民众对中国各级政府的残暴污辱抱有强烈的反抗情绪。但所有这些抗议均遭到了当局的无情镇压。1962 年 5 月 29 日，在伊宁城里，数千群众到市委大楼前游行示威，要求政府改善居民生活条件或允许其前往苏联。游行者被控犯了"反革命罪"，中国军队用机枪向集会群众开火。结果导致 100 多人死亡，其中包括老人、妇女和儿童。

我们认为，大量哈萨克、维吾尔以及中国民族人口从新疆逃跑——这是不争的事实，表明中国的劳动人民不赞成北京领导人所实行的政策，并反对这一政策。如今，关于此即使在中国领导层中也出现了严重的分裂——近期所出现的一些迹象已说明了这一点。

应当说，中国难民在哈萨克斯坦得到了跟亲兄弟一样的待遇。他们的劳动安置和物质保障以及子女的培养和教育均得到了(苏联有关方面)的全面关心。如今，他们都骄傲地宣称，自己在苏联找到了真正的祖国，并发自内心地感谢我们共产党和苏联政府所给予的慈父般的关怀。

我们还掌握着其他大量的事实，它们充分证明中国领导人已彻底背离了以民族友好态度解决民族问题的政策。

新疆的土著民族经常受到当局的歧视和污辱，被称作持亲苏观点者，并强迫中国人称之为老兄弟。针对那些反对此类做法的人，则被扣上"反中国分子"的帽子并发往所谓的劳动集中营接受"再教育"。

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在新疆还出现了强力压制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的情况，当地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即使表现出最微不足道的进步思想也会受到当局的追究。难民们说，当局以与"民族主义"作斗争为借口，把绝大多数哈萨克和维吾尔等民族的负责干部和知识分子代表均撤销了职务。

在对少数民族实施粗暴镇压的同时,当局强奸民意(对人的个性实施强制)。问题竟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中国当局强迫哈萨克、维吾尔等民族的父母只能将自己的女儿嫁给汉族人(中国人)。而不愿意把姑娘嫁给汉族人的,就被认定是地方民族主义的表现。与此同时,当局还强制向各少数民族引进自己不熟悉的、汉族人的典礼仪式:在婚礼上强迫人们向毛泽东肖像祷告。只有在举行了这样的仪式之后,婚姻才被认为是合法有效的。

当时,为了尽快振兴本民族的文化水平,新疆的进步社会人士作出了关于边疆地区各民族——哈萨克、维吾尔、吉尔吉斯等采用以俄文字母为基础的文字的决定,就像苏联许多共和国所做的那样。为了阻止新疆各土著居民与苏联哈萨克和其他已采用俄文字母的民族接近,北京沙文主义者取缔了这一决议,而且连一些已被当地居民普遍接受的族际术语也强制用汉语语汇替代。在民族教育系统中教科书只使用汉语讲授。

为了加速对土著居民的同化过程,当局以各种借口向新疆地区迁移了数百万汉语人。与此同时,土著人口将被从边境地区驱逐至人烟稀少的荒漠地带。

如今,居住在哈萨克斯坦的大量前中共党员,都对中国沙文主义者怀有无比的愤怒。他们在写给苏共中央的信中悲愤地指出,如果(中国当局的)强制同化活动继续以目前的规模进行,那么作为一个独立民族的四百万维吾尔人就可能在几年之后不复存在。

试问,这种强制各少数民族汉化(中国化)的活动与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有何共同之处!

中国各级政府的无法无天在臭名昭著的"文化革命"期间,表现得尤其明显。"红卫兵"摧毁了新疆几乎所有党委会。他们闯入居民家中,砸毁苏联生产的收音机、器皿和家具。他们甚至还砍掉了位于乌鲁木齐市的以前苏联领事馆大楼附近的树木,理由是这些树都是由苏联人栽种的。中国当局还强迫所有对自己的行动不满者每昼夜工作16—18小时。

中国领导人对苏联和苏联人民的敌视活动还表现在,经常发生中国军人和公民蓄意侵犯我国边界的事件。而且,此类侵犯还伴随有针对苏联边防军人的粗暴、污辱性行为。例如,曾有约200名中国公民在谢米帕拉金斯基州扎满旗哨卡区域侵犯我边界,并在中国军人掩护下开垦我方土地。只是当我们采取了有力措施后,中国人才狼狈撤退。

还经常发生这样的事例:中国当局向我国派遣中国公民,目的在于搜集、侦察关于苏联边境形势、防卫和军队部署等方面的情报以及在本共和国领土上实施破坏活动。

中国当局还在新疆沿苏联边界修筑防御工事、居民点、堑壕和掩体。

功率强大的中国无线电广播每昼夜平均13—14小时用哈萨克语和维吾尔语播放节目,至于俄语播音就更不用说了。其目的就是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破坏性宣传,培养中国各阶层的反苏情绪,瓦解苏联民众的信念。此类宣传,在违反了基本常识的同时,竟发展到了荒谬的程度。

例如,中国理论家们粗俗地编造本民族的过去和现在的历史。他们从数个世纪以前的尘埃中连最反对的统治者都搬了出来。吹嘘什么中国的奴隶制度似乎比欧洲的要好。他们以最严肃的腔调断言,中国封建主义曾经是世界上的"典范",而中国的资本主义也是经典,

而其发展只是“由于来自欧洲的白种人”才暂时停滞。

他们的宣传违背了历史事实，其中包括宣称哈萨克斯坦的诸多广大地区，直到阿拉木图为止，自古便属于中国。

中国当局敌视我们党和国家的狂妄活动自然激起了哈萨克斯坦共产党员和劳动者以及全体苏联人民的愤怒。大家一致认为必须采取相应措施以回击北京领导人的反马克思主义和反列宁主义路线。

正如 Л. И. 勃列日涅夫同志在报告中所强调的那样，我们方面如今正确的做法是开展进攻性的反宣传。本次全会文件将有助于我们全党了解当前世界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形势。我们当前要做的，不是大叫大嚷，而是揭露中国领导人及其走狗们的真实嘴脸。与此同时，我们每天都要告诉中国人民如下情况：关于苏共的政策、苏联人民的生活及其为实现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情况，苏联落实列宁主义民族政策的巨大成就。

在采取上述步骤的同时，我们还要展示自己与中国所有健康力量的团结意愿，而这将抗衡中国领导人的带有严重后果的政策，并以此履行我们对伟大中国人民所肩负的国际主义义务。

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我们必须开展针对中国的哈萨克语、维吾尔语和汉语广播。遗憾的是，目前我们还无法充分展开这方面工作，原因是我们在哈萨克斯坦境内还没有功率足够强大的无线电广播站。事实上自从 1960 年中国广播电台日复一日地开始进行针对苏联的诬蔑性广播起，我们各部门之间也开始就在阿拉木图地区建设广播电台的问题进行谈判。

鉴于中国领导人明显地不断加紧反苏宣传力度，我方也应采取措施，以便从根本上改善我们的整个思想宣传工作。众所周知，振兴思想宣传工作的重要条件之一便是全力改进我们的文化-教育机构、电影、广播、电视、报刊和其他能够对民众思想发挥影响的手段。然而，目前上述活动实际上均处于分离状态，因为他们隶属于各个不同的部门。这种文化机构领导职能上的分离，不但不能适应哈萨克斯坦的实际需要，而且相反只会导致宣传机构的分裂和原本就不多的创造力的充分发挥。这就正如现在新流行的一句俗语：“一位演员　　三个部长管。”今后，最好能把文化建设方面的所有问题都集中于一个机关并由它统一解决。这无疑将极大地改善我们的思想教育工作。

同志们！

我们为捍卫共产主义运动马列主义总路线，而即将采取的那些举措将具有世界性历史意义。我们即将面临的斗争是极其困难而艰巨的。但我们相信，这场斗争的胜利必将属于正义的一方，终将有一天，中国的共产党员和全体劳动人民将会与我们一道前进。

我们完全拥护苏共的对外政策方针和苏共中央政治局针对毛泽东及其集团的思想-政治纲领所采取的路线。

我们完全、彻底地拥护 Л. И. 勃列日涅夫同志在本次中央全会报告中所提出的理论原理和实际结论。

请允许我向你们保证，哈萨克斯坦共产党员将始终与全党站在一起，将在各方面积极、

坚持不懈地深入落实我党中央委员会所制定的列宁主义原则路线。

会议主席柯西金同志：下面发言的是叶戈雷切夫同志，谢列斯特同志作发言准备。

РГАНИ，ф.2，оп.3，д.43，л.1－15

№22989

苏共中央全会会议记录：乌苏巴里耶夫关于中苏边界问题的发言

(1966年12月13日)

第三次会议记录

(1966年12月13日晚上)

会议主席谢列平同志：让我们继续全会工作。下面发言的是乌苏巴里耶夫同志——吉尔吉斯共产党第一书记。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同志作发言准备。

乌苏巴里耶夫：同志们！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在报告中对当代国际形势进行了深入的马列主义分析。从该报告也可极其清晰地看出，中央委员会及其政治局在自己的各方面活动中，都毫不动摇地以党的二十三大所制定的列宁主义方针为指导，这一方针的实施必将带来显著的成果。

吉尔吉斯共产党员和全体劳动者，热烈拥护和一致支持我们党中央及其政治局以确保党的二十三大所制定的列宁主义方针，巩固各社会主义国家团结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统一为目标的政治路线和实际活动。

同志们！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曾教导说，全世界共产党人应当严格地维护自己队伍的纯洁和统一。在当前条件下，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世界反动派加紧针对越南的侵略活动，以及世界一系列国家均出现了复杂的局势之际，关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团结问题便具有了尤其重要的意义。可是，也正在这个时候中国领导人却背离了列宁主义原则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开始了前所未闻的反对苏共和苏联以及其他兄弟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斗争。

所有国家的共产党人和劳动者们，都无法不对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的荒谬决议感到无比的气愤。该决议实际上把苏共中央和苏联宣布为(自己的)头号敌人。在美国对越南

的侵略问题上，中国领导人的立场也只能称作是对各兄弟社会主义国家的背叛。

每个人都清楚，所谓“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不论是与革命、文化，还是社会主义都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毛泽东的文化革命以野蛮的精神狂热，毁灭伟大的文化遗迹，大规模地镇压知识分子和久经考验的党的骨干，并带有肆无忌惮的反苏倾向，势必对伟大的共产主义思想造成巨大的危害。

同志们！

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在自己的报告中对中国所发生的事件作了清晰的评价。我们衷心拥护苏共中央政治局在这个问题上所执行的路线。我们必须坚决揭露毛泽东及其集团的大国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反苏政策。我们这样做是必要的，我们党和人民的利益也要求我们这样做，北京领导人们正在日复一日地加紧自己的反苏运动。

尤其是，他们越来越倾向于发动针对我们国家的直接破坏活动。例如，在中国与我们共和国相邻的一些地区就发生了这方面的事件。我们共和国与中国相邻的边界长度约有一千公里。

从1962年始，中国当局开始在国家边境附近集结大量军队。他们沿边界线修建了数百个(土木质)火力点和军事设施。经常发生中国地方当局针对苏联军人和边境居民的挑衅活动，并占据了我们的一些领土。

近两年来，已发生了30多起中国公民和边防军触犯国界的事件，相当一部分此类事件均具有直接挑衅的性质。下面便是其中一个事实。

今年8月，中国边防军以奥绍基州乌兹盖斯基区西多洛夫集体农庄社员牧羊人阿萨诺夫侵入中国边界为由抓捕了他。他们把阿萨诺夫拘押了15个昼夜，讯问了关于苏联边防哨卡的数量及其分布、苏联境内公路和乡间土路的路况、通讯线和苏联人的情绪等情况。只是在苏联边防军的坚决要求下，中国当局才被迫放回了阿萨诺夫。

近年来，在苏中国界线上我们边防军拦截了大量来自中国的难民。其中许多人都带有特殊任务——搜集关于我们国家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情报。

中国当局在从事反苏活动中可谓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即使采用一些最不体面的手段也在所不惜)。如今，大量苏联公民都在从事向中国运送出口商品的活动。而在这方面中国当局便使用了各种手段，加强对苏联公民的反苏影响。在边防检查口岸中国人开设了专门的商店和食堂，并以人为压低的价格向苏联工人提供工业品、食品和酒以及免费的反苏宣传品。去年，中国向我共和国境内许多私人和机关发送了上千份载有反苏内容的出版物。

中国领导人的大国沙文主义和反苏政策在新疆表现得尤为明显。如今，该省边境居民点的维吾尔、哈萨克和吉尔吉斯等民族的当地居民均被大量迁往中国内地，其中包括荒漠地区在内——实际上就是把这些人送上了死亡之路，而把国家中部地区的中国人又迁往上述居民区。

中国当局还在这里实行了强制各少数民族——维吾尔、哈萨克、吉尔吉斯、东干等中国化的政策。正如来自中国的一些公民所言，中国领导人认为中国在目前条件下无法接受列宁的民族政策，因为据说中国少数民族的数量微不足道。

中国国家机关的主要工作用语是汉语。在东干族报刊《十月旗帜》编辑部收到的大量来

信中，有一位东干族人写道，中国政府之所以镇压了大量东干族知识分子代表人物，原因仅在于这些人要求创建东干民族文字。

一些在苏联拥有亲属或其他关系的中国公民受到严密监视，那些同情我们国家的人们均遭到了中国当局的镇压。例如以下的一些事实：据一位1963年来自中国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前中校伊斯马伊洛夫说，他与其他一些人被控为民族的叛徒，因而被开除军职并发往农村参加劳动；伊犁—哈萨克斯坦州民主青年联盟书记哈季耶夫被开除公职和党籍，理由是他有亲属在苏联；去年9月，中国红色卫队将新疆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主席[①]包尔汉·沙希迪开除公职，原因仅在于他似乎过去曾说过称赞苏联帮助中国的话。仅仅由于这方面原因，许多党和国家机关的干部被(中国当局)撤销公职并发往所谓的劳动教养集中营。

据亲历者讲述，在新疆地区的集中营和劳教所内关押着数万名对中国领导人的大国沙文主义政策不满者。从北京和乌鲁木齐市，昼夜不停地用俄语、汉语、维吾尔语和哈萨克语播放着反苏内容的广播。在我们共和国全境都能非常清晰地收听到这些节目。苏联人民极其愤怒地谴责中国领导人的诬蔑性言论。不过，我们也不能轻视这些恶毒的敌视性宣传的危害。据检查发现，一些居住在吉尔吉斯的中国公民，经常收听这些反苏广播，并在苏联人中间传播这些广播内容。

甚至个别中国公民还定期向中国驻莫斯科使馆写信，并根据其工作人员的指示搜集居住在本共和国境内的中国公民的相关信息，收取用于在我们居民中开展宣传的反苏资料。我们必须对北京的此类直接反苏活动予以重视。

吉尔吉斯党组织认为，针对北京所实施的顽固反苏活动和发出的诬蔑性言论，给予坚决的斗争，因此提高劳动者的政治觉悟是我们的最重要任务。当前，我们正在开展大量工作，以便向劳动者解释党的二十三大所制定的、苏共的列宁主义方针。我们还加强了针对共和国居民的国际主义教育工作。

与此同时，各级党组织还将采取相应举措，以进一步改善共和国边境地区居民的物质和文化日常生活服务条件。人们应当注意到，我们正在这些地区实施大规模的居民住宅和文化日常生活设施建设，扩大中学教育、医疗机构和贸易网络的分布。

共和国党组织仍将面临的任务是：依据本次中央全会所要求的标准，投入更大精力，以加强针对居民的思想特别教育工作。

我们的意识形态机构应当展开积极的工作，以揭露中国领导人的大国沙文主义图谋。正是在这几年间，中国领导人发出了所谓关于某些中国领土的挑衅性言论，似乎这些领土都是被苏联侵占的。

甚至于，一些北京出版的地图竟把新疆的边界向西远远地推进到了巴尔喀什湖沿岸。

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广大地区均被(中国当局)涂上了中国色，并宣布为暂且尚未统一的(中国领土)。中国领导人的这些赤裸裸的觊觎没有任何历史的、民族学的，以及政治方

① 原文如此。包尔汉长期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但未曾担任过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编注

面的根据。中国历代可汗和封建主，在18世纪下半叶，对吉尔吉斯和哈萨克草原的短暂掠夺式侵袭，并不足以作为这些土地已归入中国清帝国版图的依据。清朝历代政府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并多次承认这一事实。

然而，北京却伪造历史事实并极力得出相反的结论。其结果是，甚至连18世纪的中国历代可汗和封建主们对历史事实的研判，都比当代自称为共产党的中国领导人客观得多。

与全体苏联人民一样，吉尔吉斯人民以愤怒的心情谴责中国领导人赤裸裸的大国沙文主义觊觎，并宣布苏联边界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顺便要说的是，至今在我们的报纸上还没有刊登一篇揭露中国领导人在领土问题上的赤裸裸的觊觎的文章。而与此相关，还必须强调的是我们在历史书籍方面所犯的一个严重错误。

一些苏联历史学家在著作中，对于在不同时代与中国的边界问题作了错误的阐释。让我们以1957年出版的《吉尔吉斯历史》一书所刊登的地图为例。如果依据该地图来判断，那么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的大部似乎在19世纪初已属于清帝国范围。这些关于中国边界问题的错误资料在其他一些由我们苏联史学家出版的书籍中也同样存在，如《塔吉克民族史》、《世界史》第五卷等。

我们必须纠正这一严重错误。其原因在于，我们的一些历史学家没有充分地研究这一问题，没有以批判的态度来研究中国史学家所提供的资料。个别苏联作家过分夸大了中国文化对中亚各民族文化的影响力。有时，他们把纯粹属于暂时的、可能随时变化的现象当作了永恒，把最微不足道的缘由当作了吉尔吉斯和中亚其他民族与中国亲近的证据，但这些所谓证据都是虚构的。

我们共和国在纠正这些错误方面已做了许多工作，但在这方面仍有许多迫切的工作需要继续做。

为了加强揭露北京领导人的挑衅性反苏活动，我们认为，理应在吉尔吉斯和哈萨克等共和国境内，组建针对中国新疆地区的维吾尔语、哈萨克语和吉尔吉斯语广播电台。我们认为，这些广播将有利于中国劳动者们了解关于苏联、我们党和苏联人民成就的真实情况。

我们热烈拥护中央政治局在巩固我们与中国的边界和确保我们各民族安全方面所采取的一系列举措。

同志们！苏联人民正在筹备自己亲爱的苏维埃国家的50周年庆典。吉尔吉斯劳动者将跟全体苏联人民一样，紧密地团结在列宁主义的中央委员会周围，将以自己在共产主义建设中所取得的新的劳动成就，致力于迎接这一伟大的历史性节日，并将继续积极地为落实我们党的二十三大决议而奋斗。吉尔吉斯共产党员们一致拥护Л. И. 勃列日涅夫所作报告中的全部论断和结论，坚定不移地服从中央的领导和执行本次苏共中央全会的决定。

会议主席谢列平同志：下面发言的是葛罗米柯同志，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马谢罗夫同志作发言准备。

РГАНИ，ф. 2，оп. 3，д. 44，л. 1－48

№22986

苏共中央全会决议：苏联对外政策与苏中关系

（1966年12月13日）

苏共中央全会决议
关于苏联的国际政策和苏联为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斗争

（1966年12月13日）

在听取和讨论了苏共中央总书记Л. И. 勃列日涅夫同志《关于苏联的国际政策和苏联为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斗争》的报告之后，苏共中央全会作出如下决议：

完全、彻底地赞成中央政治局旨在国际政策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领域落实党的二十三大所制定的方针的政治路线和实际活动。

全会认为，在从事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循序渐进地贯彻列宁的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方针的同时，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进一步巩固了我们国家的国际地位。苏联为捍卫整个世界的和平和各民族的安全，为劳动群众争取自由、和平和社会进步的斗争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与此同时，帝国主义强国、尤其中美帝国主义以及联邦德国复仇主义集团也在国际环境正常化和加强和平的道路上制造了严重的障碍。今后，我们必须给予帝国主义好战势力及其对其他国家内部事务的政治干涉和挑拨军事冲突的活动以坚决的反击。

全会称赞了政治局和苏联政府在越南问题上的立场，认为有必要今后继续全方面地帮助越南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犯罪式侵略的英勇斗争。

在赋予加强欧洲安全事业以重大意义的同时，全会认为，我们当前的重要任务，就是要为实现各共产党和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和华沙条约国政府首脑在华沙和布加勒斯特会议文件中所表述的那些原则而斗争。

中央全会特别强调，与以往任何时候一样，在当前国际形势下巩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团结和强大，发展社会主义国家间的政治和经济合作，加强工人阶级的国际团结，支持各民族反对殖民压迫和新殖民主义的斗争，坚定不移地贯彻巩固与民族解放各力量的联盟的方针——对我们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央全会完全赞成政治局和苏联政府在苏共和中共、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相互关系领域所采取的路线和实际活动。中国最近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议均证明，毛泽东及其集团的大国主义和反苏政策已步入了一个新的危险阶段，中共领导人在当前国际舞台上所执行的方针，他们针对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反对我们党和苏联人民的敌视性运动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裂主义活动——所有这一切均与马列主义

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这样的政策，如此的行动只会给社会主义、国际工人和解放运动的利益，给中国人民自身的社会主义胜利带来损害，并在客观上帮助了帝国主义。

中央全会批准了我们党的毫不动摇地致力于与中共、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友好和国际主义团结的方针。与此同时，全会认为必须坚决揭露当前中国领导人的反列宁观点、大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方针，加强捍卫马列主义以及1957年和1960年莫斯科历次会议所制定的总路线的斗争。

在当前复杂的条件下，在马列主义原则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为团结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而斗争，便具有了更为重要的意义。苏共中央表示同意兄弟的马列主义政党的意见，即现在就着手为召集新的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国际大会创造有利条件，在各党派相互协商的过程中，这次大会的筹备工作一定会做得很好。

苏共中央全会号召各党组织、苏联全体劳动者以自己的创造性劳动进一步增强我们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成功地落实党纲和苏共二十三大所确定的共产主义建设宏伟计划，以应有的姿态迎接光荣的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50周年的到来。

（用于记录）

中央全会委托政治局研究在会议讨论期间所提出的问题，并通过必要的决议。[1]

РГАНИ，ф. 2，оп. 3，д. 41，л. 1－4

№25980

香港邮寄商品公司致外交部函：希望与苏联建立贸易关系

（1966年12月20日）

香港邮寄商品公司

环球快递订购服务

香港邮寄商品　邮政信箱：4705号

1966年12月20日

俄罗斯[2]，莫斯科

---

① 在这两行文字旁有打印的文字：不在报纸上发表。——编注

② 原文如此。——编注

外交部部长

尊敬的先生：

鉴于贵处有良好的渠道，我们很荣幸能写信给您，寻求贵方是否可向我们提供如下信息：

1. 驻在贵国的外国大使馆和领事馆的名称和地址。

2.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驻外使馆、领事馆和贸易代表处的名称和地址。

同时，我们也希望能够同贵国进行如下商品的贸易：苏联古玩，礼品和工艺品，人造珠宝，皮毛类商品以及俄罗斯民族服饰等。

我们希望能够从贵国进口这些商品，如果贵国能够给我们提供良好的供货渠道，从而使得在香港同苏联之间建立起良好的贸易关系，我们将非常感激。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贵方在用英文写作方面存在困难，我方亦可接受西班牙文的回复。

感谢您的耐心，希望尽快得到贵方的好消息，同时，再次表示我们的诚挚敬意。

香港邮寄商品公司

经理(签名[①])

АВПРФ，ф. 100，оп. 54，п. 231，д. 31，л. 16

№25554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报告：关于中国对苏广播的规模[②]

(1966 年 12 月 24 日)

关于中国"北京广播电台"

中国对苏联的广播始于 1962 年。最初广播的时间为一天 5 次，每天两个半小时，至今广播的时数达到每天 14 小时，有 22 个电台同时广播，如北京、西安、昆明、乌鲁木齐、哈尔滨、天津。一天同时广播的总输出功率 4 000 千瓦(BBC——700 千瓦，美国之音——3 700 千瓦)。

---

① 此处签名字迹潦草，无法辨认。——编注

② 该档案系摘录自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中国人不承认广播波段的国际分配，不仅利用广播波道，而且还利用短波、中波进行广播，这样就干扰了其他部门(航空部门、海事部门)。为了进行反苏宣传广播，中国动用了大量技术设备，他们的广播内容在全苏联范围内都能听到。北京电台的广播中总是可以听到击鼓声，荒谬透顶的"革命"口号声，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无休止的、接近荒谬的赞誉、对中国情况进行精心的美化，以及对反苏编造的"造谣污蔑声"……

阿尔巴尼亚"地拉那广播电台"俄语广播始于1961年11月……电台的总输出功率约100千瓦。广播内容明显是反苏的，广播被通讯部通过播放音乐节目的技术手段而覆盖。

РГАНИ，ф.5，оп.58，д.25，л.159－160

№25555

邦达连科致苏共中央报告：西方广播中的"文化大革命"与苏联[1]

(1966年12月26日)

致苏共中央

关于西方广播电台将中国文化革命与苏联历史现象作比较

……

资产阶级宣传机器在谴责并尖刻地嘲笑中国所谓的"文化革命"，嘲笑对毛泽东进行的大规模的荒谬崇拜、"红卫兵"的专横和不法行为的同时，与苏联历史上反常现象相提并论。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给共产党思想抹黑，让苏联人民相信这些过程的"规律性"和"必然性"。

……

国家安全局副局长

邦达连科

1966年12月26日

РГАНИ，ф.5，оп.58，д.25，л.133

---

① 该档案系摘录自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10403

苏共中央政治局决议：加强对中国无线电广播的措施

(1966 年 12 月 28 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 1966 年 12 月 28 日会议第 16/15г 号记录

第 15 项 关于加强对华广播采取的措施。

一、提请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苏联邮电部、苏联无线电工业部、俄罗斯联邦建设部、苏联安装工程和特殊工程部注意：在解决进一步发展苏联对华无线电广播技术基础问题的过程中，出现了缓慢的现象。

二、责成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采取措施提高苏联无线电广播的效力和作用，在以下几方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进行系统的宣传：

——揭露文化大革命的实质及其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极有害的后果；

——阐明已成为文化大革命牺牲品的党员干部、知识分子以及中国社会其他阶层的人员目前的状况；

——说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逐渐被孤立，中国领导人的冒险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对外政策对反帝斗争的危害性以及这种危害性已经表现在美国对越南的侵略行动中，揭露中国领导人已成为美帝国主义的帮凶；

——揭露中国领导人的经济政策缺乏理论根据以及该政策给劳动人民的利益所造成的损失，揭露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和党内民主的现象；

——广泛地利用以前的、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以及中共中央其他全会所做出的决议以及毛泽东以前的讲话，揭露毛泽东集团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中苏关系问题上以及世界革命运动问题上脱离了中共以前做出的决议；

——加强对中国军界的专门无线电广播宣传；

——定期吸引各类苏联人，首先是老职工对中国发表无线电广播讲话，以便更具体地揭露臆想的所谓苏联人对毛泽东及其思想抱有好感的谎言。通过代表苏联社会组织的《和平与进步》电台，转播更有说服力的材料。

三、采纳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的以下建议：

(一) 关于在委员会内成立一个对中国无线电广播的总编辑部以及一个由 6—8 人组成的编外评论员专门小组的建议；

(二) 在哈巴罗夫斯克市建立无线电监听站分部，以便收听北京电台的国内广播和资产阶级电台华语广播的主要内容；

(三) 在苏联驻中国大使馆的编制内增补一个记者名额，以便其收集和整理有关中国方

面的资料，用于对中国的广播中；

(四) 1967 年将开始对中国进行昼夜广播。

四、责成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和苏联财政部，拨给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必要数量的定员编制和相应的资金，以便实现本决议中第三条规定的内容，同时拨给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执行委员会用于建立无线电接收站的用地以及该站工作人员必需数量的住宅。

五、责成苏联部长会议全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苏联外交部以及苏联高等中等专业教育部，选派 10 名苏联中国学大学生前往新加坡高等院校学习，期限为 3—5 年，以便培养中国上海和香港方言无线电播音员和编辑人员。在 3 个月期限内，向苏共中央提交该问题的建议。

六、采纳苏联邮电部(普苏尔采夫同志)的建议，在五年计划规定的投资额限度内，压缩短波广播站，建设大功率的中波广播站，并在 1967—1969 年期间投入使用，与此同时还要注意依靠上述期限内中波电台投入使用，扩大对中国广播的中波电台的功率，至少增加一倍，在斯沃博德内市——功率是 1 000 千瓦，在新西伯利亚市——500 千瓦，在杜尚别市——500 千瓦，在伊尔库茨克市功率是 500 千瓦，并带有高效率天线。

七、责成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巴伊巴科夫同志)、苏联无线电工业部(波格丹诺夫同志)、苏联安装工程和特殊工程部(雅库鲍夫斯基同志)、苏联电力电气部(涅波罗日尼同志)、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建设部(弗拉基米罗夫同志)研究和解决以下问题：为在斯沃博德内、新西伯利亚、杜尚别和伊尔库茨克等城市建造的无线电台及时提供无线电发射机；保证必需的金属和制造成套的塔式桅；架设电力输送线路和建造变电站；进行必要的配套工程建设和专项工程建设，此处指的是 1967—1969 年指定投入使用的广播站。

八、考虑到完成本决议中规定的建设无线电广播站工程具有非同小可的重要性，责成塔吉克斯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新西伯利亚州、伊尔库茨克州和阿穆尔州州委员会，对这项工程进行特别的监督，在保证这些无线电广播站及时投入使用方面给予通信和建筑上的必要帮助。

九、对于苏联邮电部(普苏尔采夫同志)关于加强对中国无线电广播技术基础的补充措施的建议持肯定态度。责成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巴伊巴科夫同志)，与相关的各部和部门共同研究这些建议，并注意加快其他无线电广播站建设(这些无线电广播站在五年计划草案中已经作了规定)，注意保证无线电建设工程当务之急所必需的设备、机械和材料，同时还要关注在本五年计划中完成额外大功率的无线电中心的建设。

在两个月期限内，将该问题的决议草案提交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审批。

十、责成苏联邮电部(普苏尔采夫同志)和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梅夏采夫同志)，定期向苏共中央通报本决议执行的进程。

十一、提交政治局审批。

文件送：普苏尔采夫同志、苏斯洛夫同志、沃罗诺夫同志、索洛缅采夫同志、梅夏采夫同志、舍夫利亚金同志、鲁萨科夫同志、西佐夫同志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 17 卷，第 4337—4339 页

1967 年

№25718

外交部远东司的报告：关于1966年的中美关系[①]

（1967 年 1 月 10 日）

……

美国和中国都是在谨慎地试探对方的意图，寻找调解双方争论问题和今后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途径。

……中国领导人加强反苏的分裂方针是 1966 年美国对华政策中出现新动向的基本原因。

……中国领导人意识到自己在军事和经济方面的弱势，千方百计地避免与美国发生冲突，不使美国有机可乘进攻中国。

……中国领导人加强反对苏共和苏联政府的逻辑……使他们在某种程度上缓和了与美国的紧张局势，在斗争中利用美国，甚至试图挑起苏联与美国直接冲突。

腊斯克于 10 月 7 日与匈牙利的佩特尔部长举行的会谈中宣称，美国“与北京的外交接触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多”。

……“1966 年中美关系中出现的新动向并不表示两国之间关系正常化发展得很快”。存在一些重大的客观障碍，它们暂时难以克服，首先是台湾问题、越南问题等。

……中国领导在越南问题上追求自己特殊的狭隘民族主义的目的。他们想借越南人的手以及其他国家人民的手破坏美国的军事威信，将美国从东南亚排挤出去，而中国人把东南亚看作为他们传统的势力范围……

陈毅于 1966 年 8 月 23 日在与波兰大使克诺泰的会谈中直截了当地说，不相信“美国会对中国进行侵略”。

……

АВПРФ，ф. 0100，оп. 60，п. 534，д. 32，л. 1－6

---

① 该档案系摘录自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25478

国防部的报告：关于中国对社会主义国家武官的态度[①]

（1967 年 1 月 12 日）

……

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机关相比，中国的权力机构对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和越南武官公开表现出好感。比如，1966 年 9 月 30 日在中国政府举办的建国 17 周年招待会上，所有武官中仅邀请了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武官。

……1966 年 11 月底应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对外联络处的邀请，我驻华武官参观了军事博物馆。

……参观结束时，博物馆工作人员开始就现代革命问题进行“授课”。在我武官问参观是否已结束时，博物馆工作人员回答，参观博物馆已经结束，但计划中还有关于现代革命内容的会谈。

……

АВПРФ，ф. 0100，оп. 60，п. 534，д. 33，л. 3－4

№25484

外交部远东司的报告：关于大批中国驻外机构人员被召回国[②]

（1967 年 1 月 20 日）

……

可以推测，将大量外交人员和技术人员从驻外机构召回的同时，中国领导人努力清洗自己驻外机构中不合适的工作人员，即那些因某种原因得不到政府信任的人，并将毛泽东及其

① 该档案系摘录自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② 该档案系摘录自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集团的拥护者派去充实驻外机构的空缺。

……

АВПРФ,ф.0100,оп.60,п.534,д.31,л.8

№25704

中国大使馆的照会：关于中国学生在列宁墓附近的遭遇[1]

(1967年1月25日)

……

69名留学欧洲的中国大学生途经莫斯科时，向革命导师列宁和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斯大林墓敬献花圈。悼祭仪式以后，学生们朗读了毛泽东语录。苏联军人和民警推搡和殴打中国女学生。我们学生正唱着国际歌的时候，苏联一群军警和便衣警察包围了他们，并残酷地殴打了我同胞，制造了一次闻所未闻的严重流血事件。

……

АВПРФ,ф.0100,оп.54,п.228,д.11

№25721

谢米恰斯内致葛罗米柯报告：关于中国留学生在列宁墓附近的活动[2]

(1967年1月25日)

……

中国留学生得到允许(安放花圈)后……排在苏联公民的队伍后面，他们安静地走向列宁

① 该档案系摘录自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② 该档案系摘录自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墓前。在入口处将花圈安放在警察给他们指定的地方以后，他们不愿进入陵墓，拥挤在入口处，拿出毛泽东语录后，他们开始高声朗读……对要求他们别拥挤在入口处的建议，他们拒绝了，并开始唱国际歌。后来在民警队和苏联公民的积极参与下，他们离开了陵墓，被挤出了红场。

……应该指出的是，只是警察的介入才防止了苏联公民对中国人进行更多的肢体攻击。

……

АВПРФ，ф. 0100，оп. 60，п. 532，д. 12，л. 1－2

№25975

外交部远东司的报告：苏联在香港问题上的立场

(1967 年 2 月 3 日)

……①

苏联的立场。在第 16 届联大会议讨论“香港华人难民”问题时(1951 年以前和 1956 年，当时中国(内地)和香港之间的边境是开放的，随后到 1962 年有 100 多万人移居香港)。苏联代表团发言反对讨论这个问题并表示，在香港生活的华人并不是政治难民，这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部事务的干涉和对在这一地区生活的中国公民生活的干涉。

在第 16 届联大会议讨论联合国关于赋予殖民地国家和民族独立的宣言的执行情况报告时，苏联代表在发言中指出，像香港和澳门这类脱离祖国，现在仍处于殖民主义占领下的领土，毫无疑义，是另一个独立国家的组成部分，应该由后者收回，就像印度和达荷美收回其固有领土一样。还应强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权益以前，联合国的任何机构都不能研究香港和澳门问题。

在 1962 年 12 月 12 日召开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指出，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但怂恿中国采取一些其自身认为不合适的行动是不正确的。中国政府考虑到了目前形势和实现的可能性。“但是，当到了中国朋友意识到这种局面不能容忍时，他们会厉声说：‘收拾东西，滚蛋！’我们将对这一步骤表示拥护。但在做这件事时，要让中国朋友自己去做。我们不能催促他们”。

从 1948 年到 1962 年，苏联代表只是在前往日本和其他国家中途过境时到过香港。苏联驻中国商务代表在 1962 年 5 月、1964 年 2 月和 1966 年末到过香港。入境签证是从英国

---

① 所收集的档案以上缺页。——编注

那里拿的。苏联记者一直驻留在香港。在回国后他们发表过关于香港的报道。(《消息报》1964年4月29日,《真理报》1964年5月27日)

苏联对外贸易组织全苏联合公司各类商品出口公司、医疗器械出口公司等同香港一些公司有过商业接触(年贸易额达200万港元)。还要指出的是,全苏对外贸易公司“国际旅行社”、“民用航空公司”和其他一些机构同香港公司之间在空运和旅游等问题上有过接触。苏联机构在进行这类接触时所遵循的原则是,香港是被“强占”的中国领土,而不是“殖民地”,或“自治地区”。所有的接触都未超过商务问题的界限。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
1967年2月3日
第440号

文号102/дв－нс
1967年2月10日
文本10 сэ/зс,аа
1967年2月3日
第440号

АВПРФ,ф.100,оп.54,п.231,д.31,л.10－11

№25707

苏联政府的声明:抗议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受到围攻[①]

(1967年2月4日)

……从今年1月26日起,白天和夜里都在苏联大使馆附近发生了激烈反苏的集会,并组织了这样的示威游行。

……被反苏的宣传蒙骗的一群中国居民肆无忌惮地在苏联大使馆周围举行了篝火集会,焚烧苏联领导人的肖像。

2月2日,在首都的大街上挑衅者拦截了两辆汽车……汽车里的外交人员想为使馆和其他驻京苏联工作人员的妻儿购买车票……在16个小时内肆无忌惮的人群对这些外交人员

① 该档案系摘录自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采用了挖苦、污蔑、人身攻击的恐吓和其他心理恐怖手段。

……苏联临时代办十多次要求会见外交部的代表。

……对苏联临时代办的请求给予了示威性的拒绝……甚至切断了苏联大使馆试图与外交部联络的电话。

……中国当局的行为引起苏联人民的义愤。苏联政府认为必须警告中国政府，苏联人民的忍耐是有限的。

苏联将保留根据当前情况采取措施的权利，以保护自己公民的安全和合法利益。

АВПРФ，ф. 0100，оп. 54，п. 228，д. 11，л. 105－107

№25738

费留宾与越南等国驻苏代表会谈纪要：通报苏联驻华使馆被围攻情况[①]

（1967 年 2 月 4 日）

2 月 4 日，Н. П. 费留宾接见了一些驻苏的大使和临时代办，其中有越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人民共和国、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和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并向他们通报 А. Н. 柯西金给周恩来的信以及苏联政府的声明(声明已刊登在报上)。

Н. П. 费留宾(对着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大使)声称，“由于中国发生的事件，我们决定对中国的挑衅予以回击”。

……

2 月 2 日，苏联外交官乘坐两辆汽车去为自己的家属购买回苏联的机票，被红卫兵扣留了 16 个小时。

2 月 1 日，苏联大使馆附近有 4 名大使馆工作人员遭到袭击。

1 月 31 日，运载专家的苏联客机降落在北京加油，被革命群众包围。

……

АВПРФ，ф. 0100，оп. 54，д. 227，л. 9－15

① 该档案系摘录自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25710

拉兹杜霍夫发自北京的高频电报：中国外交部的重要通告[①]

(1967年2月6日)

……当地时间20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给我们发出了“重要通告”。

“现在我们通知你们，从现在开始，你们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暂时不能离开大使馆。否则他们的安全得不到保障。由此引起的后果由苏联大使馆自负。”

大使馆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保证去机场为妇女、孩子送行的大使馆工作人员安全返回使馆驻地，对乘坐21名工作人员的汽车放行，让它返回使馆。汽车已经被拦截了3个小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官员对此宣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不接受抗议，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坚决支持我国群众的革命行动，他们都对中国外交官在莫斯科遭受的迫害感到愤怒。所有离开了机场的使馆工作人员，由于不能进入使馆驻地，都待在波兰大使馆。

葛罗米柯将此电报分发给政治局的各成员。

……

АВПРФ, ф. 0100, оп. 54, п. 228, д. 11, л. 125－126

№25959

萨姆萨利耶夫致吉尔吉斯党中央函：加强中苏边境地区军事教育工作

(1967年2月15日)

致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

近年来，尤其是在苏共二十三大之后，阿特巴什、杰特-奥古兹斯克、丘普斯克、乌兹根和阿赖等地区的军事爱国主义和国防工作已得到很大改善。在适龄入伍和入伍前年龄青年

① 该档案系摘录自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中，这方面的工作开展得更有制度性。但对于其他人口，这项工作进行得不系统、并不总能满足相关要求。

应党的二十三大决议、苏共中央12月中央全会和这些边境地区当前形势之要求，各区党委、共青团、区执委、区军事委员会、社会组织在军事-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防工作等方面下了不少功夫，但仍无法完全胜任他们所面临的任务。

究其原因，当然很多：这些地区所占面积大，道路网络薄弱、交通工具不足，区党委、共青团、区军事委员会在编人数少，懂行、善于从事国防工作的骨干匮乏，全苏支持陆海空志愿协会组织缺少必要的物质基础，以及这些地区距离共和国中心大城市太远，等等。

为了强化这些边境地区的军事-爱国主义教育和整个国防工作，在短期内提高人们的军事素养，我们应在国防动员和防御能力方面采取如下举措：

1. 最近，召集党和共青团会议，通过说明中国事件的本质，动员各居民点集体农庄、国营农场、企业和机关积极分子，提高上述地区全体居民的警惕性。

在所有居民点人口中开展解释工作，尤其注意提高人们的警惕性。

为开展这项工作，应重视素质较高的党员积极分子，提前对其作相应指导。

责成党和共青团基层组织，通过定期召集座谈会、报告会和讲座等方式，宣讲党和政府决议以及苏维埃国家的成就，揭露毛泽东分子的反苏宣传，加强民众的政治-军事警惕性，教育人们与间谍、特务和各种破坏分子作斗争。

及时、准确地向党和苏维埃上级机关通报边境各居民点形势、居民情绪及其政治思想动态。

在所有地区建立印刷所和区报编辑部。

2. 把军事教员列入固定编制，强化上述地区区党委班子。在位于边境的奥什州党委中设立军事部。

3. 把军外训练处列入区兵役局固定编制(配置军官2—3名，士兵2—3名)，责成其负责兵役适龄青年和兵役前青年的军事训练，以及当地居民的军事培训工作。

4. 组建丘普斯克区军事委员会，以便杰特-奥古兹斯克区军事委员会能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到本区工作上。

5. 为提高征兵纪律，兵役人员登记的真实性及其动员准备，应在各边境地区村苏维埃设立兵役办公室，并安排固定兵役登记人员。

6. 在所有中学、技校和职业学校设立军事教导员。确保边境地区学员军训教学课程的必要物资供给。

7. 用经验丰富的干部充实到边境地区的全苏支援陆海军志愿协会组织。在各地区中心设立全苏支持陆海空志愿协会组织教学点，并配备必要的技术装备和武器。在边境各地区集体农庄和企业建立射击武器研究、汽车修理、无线电技术基础等小组。

对当地居民进行必要的普及性军事训练。

8. 为提高各地区的动员准备能力，应给各村苏维埃部门开设动员集训班，培养其完成

信息通报和物资供应等工作的能力;给汽车运输企业、集体农庄和国家农场负责人开设集训班,培养其为军队提供技术保障的能力。

9. 确保各居民点与区中心的电话联络,区中心与伏龙芝市,以及阿赖和乌兹根等区中心与奥什市的无线电通讯联系。

加速建设丘普斯克区的通讯枢纽。建立边境附近所有居民点的二十四小时通讯值班制度。

所有区兵役局都要建立能与伏龙芝和奥什市保持联系的无线电站。

10. 体育协会和组织应采取针对所有——尤其是边境各地区——青年的体育训练,并授予综合素质达标者"时刻准备保卫祖国"的徽章。

共青团组织要在青年中积极开展军事-爱国主义素质教育。举办运动会、军事游戏和组织青年到军事名胜地行军。

11. 要使位于雷巴奇耶、普热瓦利斯基、纳伦、乌兹根等城市和阿赖地区的民用机场能用于军用飞机起降。为这些机场装备必要的导航和防空设备。

12. 改善道路网络,尤其是那些能够通往边境的居民点线路。扩大桥梁的载重及其通过能力。

13. 扩大客车停车场,确保各居民点与区中心之间乘客能够更宽松、稳定的通行。

14. 实现所有居民点的无线电化,确保与外界联系通畅,以便必要时立即向居民发布相关信息。

15. 组建地方自卫队。由预备役军人和适龄入伍青年组成。从部队军官和军士中选拔经验丰富者作自卫队的指挥官。

在遭到进攻的情况下,由区党委和区军事委员会与边防军指挥员一起共同制定自卫队行动计划,以便与边防部队的行动相互协调。

16. 在区军事委员会或边防警备队储备用以武装自卫队的武器和装甲布雷车弹药。

17. 事先研究,当遭受进攻情形下在可通往国土腹地的山路、山道上设置鹿砦的可能性。为此,须预先勘察当地地形。在边防部队储存必要炸药和其他引爆装置。

18. 应建立预案利用直升机和其他飞机快速向遭到进攻威胁的自卫部队空投武器和爆炸装置。

19. 责成医疗机构严密监视水源,尤其是源自边境的河流和小溪的卫生状况,检测其污染状况。

20. 每个居民点都要有由当地人组成的志愿卫生队。

建立能够提供基本救助的药品"应急储备"。预案撤退方式。

21. 在区中心储备充足粮食和其他基本生活必需品。

22. 各地区都要预备把儿童和妇女撤往国家腹地的计划。为此,应事先预备必要的交通工具。

23. 边境居民点义勇队保卫通讯枢纽,以便在通讯线路故障情况下仍能以其他方式确

保与区中心的联系。

24. 加固主要的，尤其是那些最容易抵达我国边界的边境居民点的工事。

25. 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和部长会议应成立一个领导小组，负责指挥各边境地区国防工作的组织和实施等所有行动。

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军事委员

萨姆萨利耶夫少将（签名）

1967 年 2 月 15 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 20 卷，第 1071—1076 页

№25962

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决议：加强对华无线电宣传的措施

（1967 年 2 月 16 日）

特别卷宗（手写）

绝　密

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 1967 年 2 月 16 日第 3 次会议第 38 号决议记录

关于落实苏共中央“关于加强对华无线电宣传”决议的措施

1. 接受苏共中央今年 2 月 10 日“关于加强对华无线电宣传”的决议，并责成相关领导予以落实。

2. 责成吉尔吉斯共和国部长会议附属电视广播委员会确保无线电宣传工作的切实有效开展，具体涉及以下方面：

——揭露“文化革命”的本质及其对中国人民的严重危害；

——对成为“文化革命”牺牲品的党的干部、知识分子和中国社会其他集团的现状进行报道；

——展示中国在国际舞台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日益孤立，中国领导人推行的冒险主义和民族主义外交政策对反帝斗争和反击美国侵略越南诸事业的危害，中国领导人成为

美帝国主义的帮凶；

——揭露中国经济政策的不切实际、违背社会主义规律和党内民主，以及对劳动者利益造成的损失；

广泛利用以前的，尤其是中共中央第八次、第十次及其他全会决议，以及毛泽东发表的言论，以揭示毛泽东集团背离了中共以前就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所做出的那些符合中国实际和国际革命运动的决议；

——强化专门针对中国各军区的广播宣传；

——通过广播定期播放各行业苏联人，尤其是劳动英雄的言论，以具体事实揭露所谓苏联人对毛泽东及其事业抱以同情的谣言。

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书记

T.乌苏巴利耶夫(签名)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20卷，第1077—1078页

№25723

苏联驻中国大使馆整理的材料：1967年1—2月中国的反苏运动[①]

(1967年2月25日)

……

中国领导集团把反对苏共和与苏联政府进行政治斗争作为对外政策方面的主要目的，并把它们作为实现霸权与大国主义目标最主要的阻碍，在很长的时间段内进行大规模的反苏运动。与苏联作斗争的思想基础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会的决定，该决定巩固了反苏为党和国家的官方政策。就是这些决定成为对苏联驻北京大使馆组织的挑衅以及1966年8月20日开始的其他反苏活动的基础。中国方面在1967年1月底在北京对苏联和苏联大使馆的挑衅和敌对行为……是中国发动的民族主义及大国沙文主义逻辑的延续，为加强该民族主义以及大国沙文主义，去年12月底以及今年1月它们指责苏联"军队在中苏边界进行集结"以及"准备对中国发动战争"。

新的反苏运动的开展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部的政治危机日益加深，是毛泽东与其

---

① 该档案系摘录自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集团之间为了争夺权力而在文化大革命的旗帜下进行的斗争。反苏挑衅组织者的一个目的是为了削弱中国人民对领导人在内外政策中的失败和错误产生的不良情绪，为了表明冒险的反苏方针得到全面的支持，以便在反苏的基础上团结全国人民，把意志不坚定分子吸引到自己方面来。

……中国领导人试图通过在中国国内加强反苏尽快建立起一堵中苏人民之间的“万里长城”，使之完全消除苏联的影响和马克思列宁思想和世界社会主义经验在中国的影响。按毛泽东及其一伙的设想，这样可以减轻对敌人的斗争，以便掌控权力和证明军事官僚独裁手段的正确性。

中国领导集团燃起中国人民的民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火焰，目的是完全置两国之间的关系于不顾，甚至与苏联彻底决裂。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谈到过与苏联分裂，甚至打仗的可能性。今年2月5日，陈毅在接见西安高等院校联合兵团和红卫兵革命造反派司令部的代表时说，“苏联问题可能有所发展，可能断绝与苏联的外交关系，也可能打仗。你们这里(西安)以及东北和内蒙古会成为前哨”。

……可见中国在实行分裂方针的同时，也担心走这一步棋所引起的后果，试图让苏联首先在这方面采取行动。可以认为，这就是他们在这一时期使中苏关系极端恶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这次反苏的举动也是有预谋的，它们得到政府和当局的鼓励。众所周知，新的反苏浪潮的起因是今年1月25日在莫斯科红场上中国挑起“痛打”中国留学生的事件。第二天傍晚时分，市中心和通往我们大使馆的街道贴满反苏的传单、招贴画和大字报，在这次挑衅性运动过程中，这些宣传品的数量越来越多，内容越来越恶毒。

从1月26日傍晚到2月13日无数人群拥堵了大使馆的大门，有时候也阻止大使馆的交通工具。人群中装在宣传车和装在大使馆工作人员住所对面的每隔40米的电线杆上的高音扬声器日夜不停地传出俄文和中文的叫骂声、对苏联及其领导人的诽谤声、对苏联使馆及其工作人员的威胁声……他们要求苏联人出来向中国人“低头认罪”。类似的威胁和要求在中国官方人员的声明中随处可见。例如，今年1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务委员会副主任声称：“中国人民绝不会任人欺侮，在修正主义没有承认错误之前，我们决不罢休。”……

……大使馆遭受了物质损失……大门里面挂着苏联领导人形象肮脏的肖像、各种模型、标语等。大使馆驻地满是燃烧的物品和反苏传单。使馆工作人员……靠近大门的时候，中国人就往他们身上扔石头和其他杂物，洒涂料……

……为了使反苏的歇斯底里更加高涨，与1966年8月对围绕大使馆的胡作非为者的态度不同，他们对待这次事件更加正式，中国政府为“受害者”派两架专机去莫斯科……

……让陈毅代表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向“反修战士”表示“深切的同情”。今年1月26日周恩来和陈毅代表毛泽东和他的“战友”林彪给参加莫斯科挑衅的留学生发去了一份电

报,把学生的行为看作“一次国际阶级斗争的严峻考验”。

为期17天的狂热反苏活动刚一结束,今年2月11日在北京体育场组织了一场10万人的大会,大会的名义为“反对苏修统治集团血腥镇压中国留学生、反对苏联修正主义匪徒冲进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馆并毒打中国外交官的法西斯罪行”。在群众大会上,周恩来说,中国人民“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并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接着他无视明摆的事实,说:“我们不应该采取他们采取的暴力手段。我们没有冲击过他们的大使馆,也没有殴打过他们的人。我们允许他们进行正常的外交活动。”

……只有苏联人民的英勇精神和坚毅精神才使我们在机场发生的拥堵和殴斗中避免了牺牲。此时我们可以认为,中国曾想挑起一桩血腥事件。

……在机场,流氓胡闹了三天三夜,用俄文和中文广播了命令:“这里正进行反苏修的斗争。谁不是现代修正主义者,就走,否则我们不负责任。”

……波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大使声明,流氓不放走被扣的苏联工作人员,他们决不回去。

……社会主义国家的大使馆工作人员确保我们大使馆的生活需要(食品供应等)。

……他们给我们提供情报。

……法国、英国、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瑞典、丹麦机构的领导和工作人员给我们一定的援助。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立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在2月6日声明,“革命群众的反抗是完全合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务委员会一位副主任断言,“革命群众的行动是正义的”。

……对我们的抗议以及保证2月6日护送妇女、孩子去机场的苏联工作人员安全进使馆的要求,外交部代表说,“绝不接受你们的抗议,我们坚决支持我国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他们对中国外交官员受到法西斯镇压义愤填膺”。

……在三周规模巨大的反苏运动期间,毛泽东及其一伙人使苏中关系更加尖锐,几乎达到断交的边缘。为何他们在此悬崖勒马了呢?

我们认为,其中一个原因是领导层中对这个问题意见不一。看来,里面有一股势力认为保持与苏联的关系在现阶段对中国有利。毛泽东及其一伙为掌控权力的尖锐斗争,其结局尚不明朗,以及他们在其他国家采取的行动所引起的不良反应可能也影响了这个。中国人没能使苏中关系破裂的重要原因是苏方坚定的原则立场,即1967年2月4日苏联政府的声明、部长会议主席A.H.柯西金的发言以及他今年2月2日给周恩来的信件,苏联外交部的声明以及苏联没有受中国进行的挑拨而表现出的极大的耐心。

……

АВПРФ,ф.0100,оп.60,п.532,д.12,л.20-35

№25483

外交部远东司的报告：关于中国的“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①]

(1967年3月1日)

……

“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是由毛泽东集团建立的，在中国共产党的党组织、中国的国家机关和民众各阶层出现强烈反对毛泽东领导的反对派的时候，作为对付自己政敌的斗争工具。

……在与反对派势力的斗争中利用了在政治上不成熟的青年人，按毛泽东派的打算，本应制造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幌子以针对他们的反对派，假借斗争以“捍卫毛泽东思想”，“反对资产阶级蜕变”，反对“修正主义”，反对在中国“搞资本主义复辟”等等。

……自1966年年底开始，当时毛泽东派与反对派的斗争更为尖锐，毛泽东集团给自己提出的直接任务是“彻底夺取党、国家和经济的所有权力”，中国到处出现了新的所谓“造反派”组织，意为“造反”……毛泽东派的用意是，“造反派”应该是来自各阶层更为广泛的毛泽东派拥护者，是一个更为“成熟”——与“红卫兵”相比——更有力量的组织，它的任务很明确，就是“夺取政权”并摧毁反对派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机关。

“造反派”组织听命于毛泽东及其集团，是对国内实施“军事恐怖”专政的幌子，其主要依靠的则是军队。

……

手写批注：

该报告分送给中央政治局各委员。

葛罗米柯

АВПРФ，ф. 100，оп. 54，п. 229，д. 23，л. 198

---

① 该档案系摘录自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25961

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决议：加强中苏边境地区的群众性保卫工作

(1967 年 3 月 2 日)

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 1967 年 3 月 2 日第 17 次会议第 40 号决议记录

苏联国防部致函吉尔吉斯奥什州党委，吉尔吉斯阿尔泰、乌兹根、阿特巴希、杰特-奥古兹斯克和丘普斯克等区党委、区执委和其他清单上的组织，以及丘巴罗夫、图尔古诺夫和加尔金等同志

关于落实苏共中央政治局 1967 年 2 月 4 日决议

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决议如下：

1. 兹批准，加强附录所列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交界地区居民和义勇纠察队的群众性保卫工作的举措。

2. 责成奥什州党委和州执委，阿尔泰、乌兹根、阿特巴希、杰特-奥古兹斯克和丘普斯克区党委和区执委，以及吉尔吉斯共和国各部委和部门，制定和采取具体举措，以强化本决议所列边境地区的群众性国防工作。

3. 责成吉尔吉斯共和国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共和国社会秩序保卫部，认真研究边境地区的居民构成情况，必要时可建议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迁移那些不愿在边境地区居住的人口。

4. 责成吉尔吉斯共和国财政部和共和国国民保卫部，研究关于将国民保卫后补单位列入边境地区区执委固定编制。

5. 就在丘普斯克区组建兵役局，以及把由 2 3 名军官和 2 -3 名公务员组成的军外训练处列入边境地区兵役局固定编制等问题，请求苏联国防部批准。

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书记

T. 乌苏巴利耶夫(签名)

附件：

关于加强与中国交界边境各地区居民和志愿义勇队的群众性国防工作的措施

编号	所采取的措施	实行期限	执行者
1	依据苏共二十三大和苏共中央12月中央全会决定，以及苏共中央政治局1967年2月4日“关于加强与中国交界边境各地区居民和志愿义勇队的群众性国防工作的决议”，将在阿特巴申斯克、阿赖、杰特-奥古兹斯克、丘普斯克和乌兹根诸地区有计划地坚定地开展政治教育工作。	长期	州党委、区党委
2	无条件地落实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和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1966年7月7日“关于改善边境地区居民日常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的决议，以及1966年7月21日“关于落实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1966年5月7日‘关于全苏支援陆海空志愿协会(ДОСААФ СССР)现状及其改进措施’的第349号决议”。	长期	州、区党委，执委，区苏维埃，共和国各部委及部门
3	在居民中经常举办军事-爱国主义题材的报告、讲座和座谈会，与战争老战士、苏联英雄、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生产先进者和科学-文化活动家的见面会。	经常	州、区党委，党的基层组织
4	尤其关注针对青年的群众性国防组织工作，开展军事化游戏、突击工作接力赛和提高警惕性突击检查，在战争阵亡者纪念碑旁举行群众集会，紧急集合，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共青团基层组织与边防军战士的联合会议，给那些在保卫祖国战斗中牺牲的将士扫墓。	经常	吉尔吉斯共青团中央，共青团州、区委，党的基层组织
5	在5—6月为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团体和机关的共青团基层组织书记，以及边防哨所共青团委员会书记举办进修班。长期就群众性国防工作问题在青年报刊上开设有效专栏。通过广播和电视经常报道国防军的生活情况。解决关于夏季为高年级中学生举办军事化夏令营的问题。在1967年夏天，就“关于促进青年和边防军少年之友成员参与保卫国境”问题召集共和国边境地区青年义勇队和边防军少年之友(ЮДП)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准备参加为纪念苏维埃政府成立50周年而举行的第五届全苏边境各区共青团青年突击接力赛。	1967年	吉尔吉斯共青团中央，人民教育部，边防军政治部，吉尔吉斯工会理事会，共青团区委
6	在与中国交界地区举办军事-爱国主义题材的故事片和纪录片电影节。	1967年3—7月	州、区党委，电影艺术委员会，文化部
	组织话剧、戏剧和芭蕾，共和国首都和奥什市高校、企业和机关的业余优秀艺术团体的演员到这些地区慰问演出，在边境地区的居民点举办军乐演奏会。	经常	

续 表

编号	所采取的措施	实行期限	执行者
7	采取措施,加强全苏支援陆海空军志愿协会组织在促进针对居民,尤其是青年的群众性国防工作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为此,应充分利用集体农庄、国营农场、机关、学校和教学单位的俱乐部和文化宫。为使每位青年人都能掌握一项军事专业技术,颁布了"随时准备保卫祖国"徽章奖励标准。定期举行摩托车赛和根据全苏支援陆海空军志愿协会区委员会计划而举办的各种体育类军事-技术比赛。区、村劳动代表苏维埃执委会和区军事委员会应研究和解决关于向全苏支援陆海空军志愿协会各委员会和基层组织提供实际帮助的问题,确保其必要的物资-技术装备和活动处所。	长期	州、区党委,区苏维埃执委、全苏支援陆海空军志愿协会区委员会,吉尔吉斯共青团中央,吉尔吉斯军事委员会,吉尔吉斯工会理事会,体育协会联盟理事会
8	为所有中学和职业教育学校提供必要条件,确保广泛吸收学生参与模型制作、射击武器研究、汽车修理、无线电基础和其他军事技术专业类小组。	1967 年	人民教育部,国家职业技术教育委员会,全苏支援陆海空军志愿协会区委员会
9	抽调苏共和共青团精干积极分子加强志愿义勇队。在区党委机关会议和基层党组织会议上讨论义勇队的工作问题。召集区义勇队大会。人民志愿纠察队和警察机关共同制定切实措施,加强维护社会秩序。采取相应措施,确保义勇队必要的活动处所、值勤期间的电话通讯和交通工具。改进义勇队的思想教育,培养其与犯罪活动、扰乱社会秩序和违反边境规定的行为作斗争。	3—7 月	区党委,各行业工会联合会,边防军司令部
10	确保电话联络,针对所有居民点的无线电广播,以及区中心与伏龙芝市和奥什市的稳定无线联系。在边境附近所有居民点设立固定的昼夜通讯值班,以及此类对外无线电广播,确保稳定、可靠的通讯联系。	3 -7 月	通讯部,州、区、村苏维埃执委
11	为提高各区动员准备能力,将召集区、村劳动代表苏维埃执委会工作人员,承担着通报和物资技术供给工作的汽车运输公司、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负责人会议,举行由国民经济民防项目相应机关和组织参加的公民国防指挥演练。	4 5 月	区苏维埃执委、民防指挥部和吉尔吉斯军事委员会
12	加强卫生防疫工作和居民医疗知识宣传。监控水源,尤其是源自边境的河流。系统监控污染状况。在每个居民点组建义务卫生队并对其进行培训。确保放射性和细菌监控主体网络的必要设备供给。	长期	地方苏维埃执委、民防指挥部卫生部、农业部、水文测量局
13	依照 35 点指针纲要,完成民政国防的筹备组建工作,在各地区国民经济所有工程进行首长指挥培训。重新审议共和国居民分散撤退计划,划定"特殊时期"从与中国交界地区"居民撤退"的界限。	1967 年 3 月	区苏维埃执委、民防指挥部、共和国撤离委员会

续 表

编号	所采取的措施	实行期限	执行者
14	出版用吉尔吉斯语和俄语编写的民政国防手册《每人都知道》10万册，并在边境各地区散发。为此，向民防指挥部调拨10吨纸张。在边境地区举行国防题材的电影放映月活动。	3—6月	民防指挥部、国计委、电影艺术委员会、邮政委员会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20卷，第1079—1084页

№25677

外交部远东司的报告：朝鲜与中国关系开始疏远[①]

(1967年3月7日)

……

现在朝鲜和中国之间关系的特点是“朝鲜领导人在逐渐脱离以前单方面地跟随中国”。

在1958年到1963年这一时期，朝鲜与中国之间相互比较亲近。

……朝鲜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在这个阶段如下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贸易、经济和军事合作方面。

……

……中国领导为了加强自己对朝鲜的影响，竭力扩大朝鲜与中国之间的军事合作。自1962年年底起中国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之间在军事方面的关系特别积极活跃，当时苏联没能满足朝鲜人要求增加无偿军事援助的请求。1963年3月，中国的一个军事代表团非正式地访问了平壤，签署了关于向朝鲜提供军事援助的协议。据某些资料称，中国人承诺一俟朝鲜发生军事冲突，将派遣100多万名自己的战士去那里。

可是很快朝鲜的立场发生了变化：

……越南事件对朝鲜领导起到了很大的觉醒作用，越南的例子使朝鲜人深信，毛泽东及其集团为了自己的大国沙文主义、民族主义目的不仅会牺牲越南人民的利益，而且还会牺牲朝鲜人民的利益。中国方面不止一次地企图推动朝鲜人以“援助越南的方式”加剧南朝鲜的紧张局势，而不考虑现实状况及后果。

---

① 该档案系摘录自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苏联与朝鲜关系的改善引起了北京领导人的不满,他们试图阻挠朝鲜脱离亲中国的方针这一令他们不愿看到的过程。在1966年4月6日谢胡访问北京之际,中国人对参加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工作的各党提出了"修正主义、宗派主义"的指责,金日成将中国人的这些攻击看作是对劳动党内部事务的干涉。

……苏联与朝鲜的经济协议签订后(1966年6月)很快作为回应,中国人开始使中朝关系发生困难,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对朝鲜施加压力。中国的对外贸易机构开始对朝鲜商品的质量提出各种投诉,要求供应稀缺产品并拒绝提供部分生活上对朝鲜十分重要的商品。1966年中国急剧削减了对朝鲜供应的植物油、大豆,1967年1月削减了硫黄和几种工业原料的供应。中国当局禁止朝鲜渔民在中国沿岸捕鱼。

……劳动党领导人不满意中国人反对从社会主义国家向越南派遣志愿者,不顾因北京阻挠带来的困难,以专家的形式向民主越南派遣了将近100名朝鲜飞行员参加军事行动……

……平壤对中国的所谓"文化大革命"相关的事件进行了谴责。朝鲜的报刊不直接说中国人,却发表反对托洛茨基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文章。金日成在劳动党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中指出,共产党员不应容许有"左"倾过火行为,人为地展开猛烈的阶级斗争……

……金日成在秘密会谈中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难以置信的发傻"。金一在莫斯科逗留期间大致也是这样消极地谈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据获得的消息称,在劳动党的党组织内部会议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遭到了激烈的批评。[看来也是同样目的,朝鲜领导人在1966年罢免了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金昌满、政治局候补委员何安权(Ха Ан Чен)以及其他一些朝鲜领导人,这些人是中国思想对劳动党影响的主要传播者。]

最近中国出现了一系列红卫兵报纸的报道,对朝鲜和劳动党领导的对内政策方面散布了诬蔑性的言论。开始使用"朝鲜的修正主义"这一术语。中国领导人在会见红卫兵时表示,"朝鲜也很快要滑向修正主义",中国的东北部是"面对三个国家的前沿阵地,即苏修、蒙古和朝鲜修正主义"。

报纸和红卫兵的传单上散发的关于朝鲜似乎发生了军事政变的消息引起了朝鲜领导人的激愤。今年1月26日刊登的朝鲜中央通讯社官方声明中,红卫兵企图"将世界公众舆论引入歧途"等诬蔑之词遭到了朝鲜的强烈谴责。朝鲜公共安全机构在1966年12月和1967年2月先后两次禁止中国大使馆准备的让中国学生在苏联驻平壤大使馆周围举行反对苏联的游行。

劳动党偏离北京立场的行为使中国领导人很气愤,他们已经开始采取极端措施。根据苏联驻平壤大使馆的消息,中国人开始加强自己与朝鲜的边界,人为地制造边境事件,破坏有关和平解决叛逃者问题的协议,重又开始对白头山(即长白山)上朝鲜和中国的边界问题进行争论等。

与此同时，劳动党领导人放弃对北京分裂主义冒险行为方针的支持并不意味着他们完全彻底地站到了大多数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立场一边。在一系列重要问题上，劳动党的观点并不与苏联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的路线相一致。朝鲜领导人对待苏联共产党十分警觉，毫无根据地放肆地批评它的政策，又常常是虚伪的。在秘密会议上金日成和其他劳动党领导人基本上支持我们党的所有对内和对外政策，包括他们积极响应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2月(1966年)的全体会议。但是没有向劳动党的广大党员群众通报这次会议，朝鲜的报刊对苏联共产党全体会议只字不提。

劳动党10月(1966年)会议正式宣布作为党的主要任务就是开展两条战线斗争的方针：既反对"当代修正主义"，又要反对"左倾机会主义"。金日成在党代会上着重指出，劳动党永远不会"随着别人的笛声跳舞"，与所有的兄弟党"建议"实行严格独立政策。强烈地强调自己立场独立性的同时，朝鲜领导人以此表现出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存在分歧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没关系，竭力与不管是中国还是苏联都保持正常关系。

АВПРФ，ф. 0102，оп. 23，п. 112，д. 24，л. 5－12

№25974

丘季诺夫的报告：香港的政治经济状况

(1967年3月14日)

苏联驻英国大使馆
第391号文

关于香港的报告

香港是英国在中国东南海岸的殖民地，坐落在九龙半岛、香港岛和其他几个小岛上。香港由殖民地和"租借地"构成。

1. 概述

领土——398.25平方英里(九龙——3.75平方英里，香港岛——29平方英里，新界——365.5平方英里)。

居民——382.3万人(1965年末)；98%的居民是华人。

行政中心和主要港口——维多利亚(居民——约100万住户)。

语言——英语和汉语。

2. 政治发展和领土管理

香港从1842年起就是英国的殖民地。所谓的“新界”是位于中国沿海的一块土地，根据1898年协定，中国把这块土地和一系列小岛及其附近水域租给英国，租期99年。1941年12月，英国殖民地被日本军队占领，日本军队在那里占领了三年半。在日本占领期间香港人口减少到60万人。赶走日本人后，恢复了文官统治，殖民地人口快速增长，到1947年时已达180万人。1950年，香港政府开始限制华人进入殖民地，但是，秘密移民仍在持续，人口过于稠密一直是香港的重要问题。

殖民地由英国总督管理，在总督之下有司法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

司法委员会在1964年7月扩大，现在由4名当局代表、8名官方指派代表和13名非官方代表组成，其中华人9名，印度人1名。法律由总督颁布。司法委员会履行总督治下的咨询职责，对殖民地的财政和开支实施监督。

执行委员会由5名殖民当局代表，1名官方指派代表和5名非指派代表组成，其中华人3名，葡萄牙人1名。执行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就各类管理问题向总督提供咨询。总督既是司法委员会主席，也是执行委员会主席。

政府通过香港殖民地行政长官总的领导下的各司来实现其行政职能，香港殖民地的行政长官要协调约30个司的工作。

就连英国资产阶级报刊也多次承认，香港当地居民被完全排除在领土管理之外，尽管在类似的非洲国家居民参与某种程度的管理已有20年时间。英国议员詹姆斯·琼森去年到过香港，不久前他在下议院表示，香港是少数白人统治百万华人的典型例子。他说：香港同南罗得西亚之间有某种可比性。

联邦国务大臣哈尔特在答复琼森时说道，她同意这个意见，但是，香港在其他各殖民地中占有特殊地位，“由于它同中国存在的关系，所以不能考虑香港自治和司法委员会选举的问题”。(《每日电讯报》1967年1月)

英国政府在香港拥有大量武装力量：海军、志愿兵兵团和空中辅助力量，军费主要靠殖民地。负责殖民地事务的书记官李告知，未来4年香港每年需为英国军队缴纳军费452.25万英镑。香港还承担防务工程加固的责任，香港每年防务开支总额达500万英镑。(《每日电讯报》1966年12月21日)

3. 经济和贸易

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香港是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集散中心，地理位置奠定了香港经济的基础。战后时期香港建设了一系列各类工业企业，但和以前一样，由于自然资源有限，必须进口粮食和本地工业所需的原料及设备，其经济继续依靠港口。服装和纺织品生产在香港经济中占主导地位，产品的一半以上供出口。铁矿、铅矿、钨矿、石墨和陶土开采量不大。1965年企业工人数量有60万人。旅游业是殖民地的主要收入来源。有40万人从事服务业。

捕鱼业发达。拥有联邦国家各港口中最大的渔业船队，渔船的数量共有 9 400 艘。

农产品在经济中的份额不大。几乎所有的可耕地都集中在新界。主要的农产品有：大米和蔬菜。养殖牛、猪和家禽。大部分农产品用于内部需求。1965 年从事捕鱼业和农业的工人数量有 11.26 万人。

对外贸易额(亿港币)(1 港币＝1 先令 3 便士)

	1951	1961	1964	1965
进口	48.64	59.69	85.5	89.64
本地商品出口、转出口	44.32	99	13.55	15.02

主要进口种类：工业品(占进口总额的 31%)、粮食(23%)、机器和交通设备(13%)、原料、化工业品等。主要出口种类(不包括再出口)：服装(35%)、纺织品、鞋子、电工器材、金属制品、水果罐头等。

1965 年香港商品的主要出口国有：美国(34%)、英国(17%)、新加坡(3%)、日本(3%)、加拿大(3%)、澳大利亚(3%)。商品再出口的主要对象国是：日本(17%)、新加坡(14%)和印度尼西亚(10%)。

1966 年香港政府和美国签订了贸易协定，按照该协定，美国进口香港纺织品的限额是英国的两倍以上。

4. 教育和医疗卫生

1965 年殖民地共有 2 281 所学校，91.4 万名学生和 3.07 万名教师。一半以上的学生在小学学习(62.76 万)。大部分小学都是为华人居民设立的，中学英国人的孩子占多数。香港还有技术专科学校(全日制学生 1 270 人，半脱产学生 10 288 人)和两所大学。香港大学建立于 1911 年，系别：艺术学系、科学系、医学系、建筑工程系和东方学研究所。1965 年有 2 203名学生在大学学习。香港中文大学建立于 1963 年，有 3 个系：艺术系、商务系和社会科学系，1965 年有 1 871 名学生。还有 3 个师范学院(2 170 名学生)。1965 年 9 月，有 2 319 名学生从香港前往英国留学，981 人——美国，383 人——加拿大，213 人——澳大利亚。[《联邦实况》(Fact Sheets on the Commonwealth)，香港，第 4 页]

殖民地有 39 家医院 13 000 张病床。将近 2%的成年人患有肺病。每 10 万居民中有 3 359人死于各种形式的肺病。霍乱定期爆发。

5. 劳动人民状况

同其艰难的生活水平相适应，香港华人在政治上也处于无权地位。英国议员琼森在发言时表示："香港工人的状况与目前掌权的自由党所标榜的原则不相适应。"妇女和儿童每周工作 60 小时，每年加班量达到 100 小时。琼森说："对于总督治理下的殖民地和最终向议会负责的当地政权来讲，这是极其令人气愤的事。"(《每日电讯报》1967 年 1 月)英国政府暂时只是希望在调整妇女和儿童的工作时间方面，近期会有进一步的举措。

《卫报》刊登了议员 Л. 耶格尔从香港发回来的信件，他讲述了香港居民简陋的居住条

件,近400万人居住在面积不足400平方英尺的住宅内。通常家庭成员都居住在同一间房里,尽管有2万间私有住宅处于空置状态。学校常常设在住宅的顶楼,供孩子们从早上8点到晚上6点学习,而晚间则又是供成年人学习的夜校。(《卫报》1967年1月6日)

英国资本家威廉·戈登在《星期日电讯报》刊登的文章《我们是怎样守住香港的》中写道:如果英国不向居住在香港的华人提供帮助,那么,他确信他们将会成为共产党人,香港将不再是英国的殖民地。(《星期日电讯报》1966年4月17日)

6. 英中关系中的香港问题

1966年,中国政府两次抗议美国利用英国的殖民地香港作为军事基地。在最后一份抗议书(1966年12月末)中指出,英国允许美国第七舰队把香港作为一个辅助的基地,就意味着允许对河内和位于越南民主共和国首都的中国大使馆进行空袭。在照会中,中国政府暗示,英国此举可能招致香港华人的"反感"。

在中国政府的声明中指出:"中国人民及其在香港和澳门的同胞强烈谴责美国和英国之间卑鄙的帝国主义合作。他们对英国自由党政府听从美国的要求把香港变成美国的军事基地表示严重的不满和强烈抗议。如果英国继续一意孤行,必将招致严重的后果。"(《每日快报》1966年12月30日)

英国政府在回应中国的抗议照会时狡辩说,香港永远不会被用来充当美国海军的军事基地,美国远东部队只是利用香港来"休息和给养"。

同时,1966年在葡萄牙殖民地澳门发生的事件令英国非常紧张,它开始对自己的殖民地香港感到不安。《每日电讯报》在评论中国事件时指出,英国密切关注着任何一个信号,距离中国海岸40英里的英国殖民地香港很有可能成为"红卫兵"清单里的下一个目标。

但是,看来中国政府并不希望同英国的关系严重恶化,剥夺英国对香港的占领权,因为香港位于东南亚海空交通线上,是最大的货运中心。香港是中国获取大量外汇的来源地,也是中国同其他国家进行贸易的基地。

苏联驻英国大使馆三等秘书

Б. 丘季诺夫(签名)

发送4份,送:欧洲司(2份)、军事情报局,归档

1967年3月11日

АВПРФ,ф. 69,оп. 59,п. 239,д. 29,л. 222-227

№25976

纳西诺夫斯基致苏达利科夫函：在澳门的华人难民问题

(1967年3月22日)

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处

1967年3月22日

第539号文

致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

H. Г. 苏达利科夫同志：

现把葡萄牙驻联合国代表团在今年3月4日及蒋介石政府要员在今年2月15日分别就在澳门的华人难民问题致秘书长的信件的副本发送给您，以便加以利用。

附件：上述文本。

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处顾问

E. 纳西诺夫斯基(签名)

文本2份：发送，归档

1967年3月__日

附件一：

纽约

1967年3月4日

第9号

尊敬的阁下：

根据我国政府的指示，我谨代表我方做出如下告知：关于中华民国常驻代表在1967年2月15日信函中(参见第56-168号)所提及的问题，我方所采取的措施，对任何政府而言，都是完全符合其职责范围的；实施这些举措，旨在有效抑制和阻止非法活动以及违背相关法律法规的机构和组织。大量自称为"难民"的人员并不具备良好的信用，并且隐瞒了他们的真实目的，这无疑将危及澳门当地人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毫无疑问，葡萄牙政府既没有违背任何人道主义原则，也没有无视于任何国际公约，并且……①

① 原文如此。——编注

致联合国秘书长，
尊敬的吴丹阁下
纽约

附件二：

中华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

纽约东42街201号，邮编：10017

参见56-168号

1967年2月15日

尊敬的阁下：

根据我国政府的指示，我谨代表我方告知阁下：1966年12月23日，葡萄牙政府澳门殖民当局强行关闭了澳门的华人难民救援机构及学校。随后，澳门当局还在违背当事人意愿的情况下，强行将7名华人难民驱逐至中国大陆。近日，另外两批华人难民——其中一批为14人、另一批为5人——也同样被强行遣返给中共当局。

葡萄牙当局的这些行为，明显违背了国际公约和惯例，并且完全无视人权原则。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作为缔约国之一的葡萄牙，其举措显然是对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中"不推回"原则的公然挑战。根据公约的第33条规定，任何缔约国都不得以任何方式将难民驱逐或遣返至可能对其人身安全和自由构成潜在危险的领土境内。

由于在澳门的华人难民问题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我请求将该议题传达至所有联合国会员国。

尊敬的阁下，我再次重申对该问题的高度关注。

中华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刘锴(签名)

致联合国秘书长
尊敬的吴丹阁下
纽约，10017

附件三：

中华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①]

纽约东42街201号，邮编：10017

参见56-368号

1967年4月10日

尊敬的阁下：

关于在澳门的中国难民问题，其中涉及1967年2月15日我方信函(56-168号)以及葡萄牙常驻代表团临时代办在1967年3月4日递交阁下的信件(9号)，根据指示，我谨代表我国政府做出如下声明：

1. 根据1967年1月29日同中共当局签署的协议，葡萄牙澳门殖民当局已经承诺，将任何试图在澳门寻求避难或政治庇护的中国人驱逐或遣返至中国大陆。截至目前，总计36人的7批难民已被驱逐或遣返。

2. 这些难民中，绝大部分为妇女和儿童，仅仅是为了逃避共产主义当局的压迫，然而，在葡萄牙代表团的信函中，指控他们试图在澳门从事任何可能"危及当地人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的活动，这显然是毫无根据的。我国政府明确否认了相关指控。

3. 葡萄牙政府是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的缔约国，曾庄严承诺将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关国际义务。驱逐和遣返这些难民的行为，明显违背了这一公约，而葡萄牙代表团在其信函中将其行为称作"对任何政府而言，都是其正常职责范围内"的举措，实在令人难以苟同。

4. 根据澳门当局同中共签署的双边协定，驱逐和遣返中国难民并非是偶然事件，已然演变成为葡萄牙当局的一项既定政策。这一政策是对1951年公约中关于对难民的"不推回原则"的公然蔑视，应该引起国际社会的足够重视和广泛关注。

我请求将该信函传达至所有联合国会员国。

尊敬的阁下，我再次重申对该事件的高度关注。

中华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刘锴(签名)

致联合国秘书长

尊敬的吴丹阁下

纽约，10017

АВПРФ，ф. 100，оп. 54，п. 231，д. 31，л. 12-15、23-24

---

① 该档案是一份单独文件，未发现其主件，但显然与№25976文件所述事件有关，故作为附件安置于此，以便读者了解难民问题的结果。——编注

№25726

外交部远东司的报告：现阶段中国的对外政策及领导人的对外活动[①]

(1967 年 3 月 28 日)

……

1966 年上半年中国政策的特点是坚持执行政策的灵活性，积极地在世界舞台上开展活动，这一特点体现在刘少奇、陈毅访问巴基斯坦、阿富汗和缅甸方面以及周恩来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和巴基斯坦方面。

但是，战略上的改变并不能掩盖中国领导人在对外政策上的行动……只是他们过去推行的强硬方针的继续和证明。中国领导人在国际事务中从“强权政治”的立场来谈论问题的企图反映在 1966 年的三次核武器试验中。这种情况，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威信扫地，削弱了它的国际地位。

中国文化大革命和不断的核武器试验使东南亚国家闻风丧胆，这“证实”西方人士说的关于中国人为了达到目的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言论。

……至今尚不清楚，对外政策问题在什么程度上被纳入中国现今的斗争，文化大革命如何影响中国领导人的国际活动。

……现阶段中国领导人的主要目的依然是：与苏联公开斗争、破坏苏联的国际地位、阻挠苏联政府一些重要的国际行动；进一步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在不发达国家特别是在亚洲、非洲，获取领导人的地位；与美国接触为了避免与美国军事冲突，中美关系正常化……

АВПРФ，ф. 0100，оп. 60，п. 534，д. 31，л. 52－85

№25977

别谢金致利哈切夫函：与香港国泰航空公司进行商业合作

(1967 年 5 月)

民航部

---

① 该档案系摘录自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国际航空局
莫斯科，A－167，列宁格勒大街，37号
电话：K 4－18－31

1967年5月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
B. И. 利哈切夫同志：

苏联民航局收到香港国泰航空公司关于签订商务合作协定和在中转站向旅客提供地面服务的协定的建议。

民航局认为，同上述航空公司签订这样的协定是适宜的，因为该公司可以飞往18个国际航空港，其中包括民航局飞机可以飞抵的雅加达、仰光和东京。

请告知您对同国泰航空公司签订上述协定的意见。

苏联民航部国际民航局局长
A. 别谢金

АВПРФ，ф. 100，оп. 54，п. 231，д. 31，л. 17

№25978

利哈切夫复别谢金函：同意与香港航空公司进行商业合作

（1967年5月29日）

1967年5月28日
第454/дв－нс号文
苏联民用航空部国际航空交通管理局局长
A. B. 别谢金同志：

对您第24/4－52号信件的复函。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原则上认为，同香港国泰航空公司签订关于商务合作和向旅客提供地面服务的协定是可行的，其条件是，在条约文本中不能含有可能被解释为我们承认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或香港是一个独立国家的术语。

同时，考虑到香港的现今政治状况，同公司签订协定的时间应当稍后确定。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
B. 利哈切夫（签名）

2 ов/АД
1967 年 5 月 27 日

АВПРФ,ф. 100,оп. 54,п. 231,д. 31,л. 18

№25979

阿扎鲁什金的报告:关于香港骚乱事件

(1967 年 6 月 10 日)

苏联驻泰国大使馆
1967 年 6 月 10 日
第 317 号文

关于香港骚乱事件

(报告)

最近在英国殖民地香港出现了骚乱,形势严峻。按照当地(香港)消息灵通的华人和著名中国事务专家的看法,香港骚乱是由北京方面的教唆引起的,他们利用九龙地区两个工厂突发的罢工,试图在香港制造"第二个澳门"。在这一事件中,中国所追求的政治目的,首先是宣传目的,即因英国支持美国在越南的政策,向英国施加压力,转移中国居民对国内政治危机的注意力,在某种程度上回应苏联在香港问题上对中国的指责,提醒英国人,中国在这一殖民地的影响力是很强的,并在适当的时候向英国提出自己的打算。

事件表明,英国当局并没有像葡萄牙在澳门的政权那样满足北京的要求(立即满足工人的要求;停止法西斯式的迫害;释放被捕游行示威人士;向受害者道歉,补偿他们的损失;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中国人没有实现预期的计划,他们对此的解释是:英国在香港的势力要比葡萄牙人在澳门的势力更强,英国人还得到香港大多数倾向台湾或持反共和亲英观点居民的支持。

在遇到挫折后,北京开始寻找有利的解释,以便挽回面子。有这样一个传闻,说香港骚乱的组织者是从中国和澳门派到那里的,事后组织者被召回北京,好像是根据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指示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在探讨这次行动"失败"的原因时,组织者将其归罪于"群众

动员”方面。从广州派往香港的代表，他们严厉批评在香港的共产党领导人，因他们没能争取到居民的支持，在动员居民时首先不是使用政治观念，而是用钱(参加游行示威和罢工的人，每天发放10—15港元)。此外，在香港的领导人还向北京许诺，他们在行动中将会得到当地华人的广泛支持。只是根据这一许诺，北京就发表了致英国政府的声明，在声明中提出了上述五条要求。

根据香港亲北京人士提供的消息判断，现在香港各企业和机关中的亲北京分子都在秘密集会。他们向华人解释说，目前的局势不利于开展反对港英当局的积极活动。据此提出了新的方针：停止冲突；使用秘密手段制造令英国人不安的局势(其中包括小规模的罢工和抗议)；全力揭露英国当局的残酷手段；培养香港华人对英国人的憎恨情绪；全力支持和赞美中国；在组织方面采取措施团结力量。

可以把这些行动看作是中国放弃了最初的打算，策略变更为：在较长的时间内北京将坚持“制造小麻烦”，对英国人进行口头威胁(在中国组织抗议集会、发表声明等)，但考虑到香港对中国的重要性，中国不会采取坚决行动。香港是最重要的港口之一，中国可以在这里通过出口自己的商品换取外汇。1964年中国对香港出口额为5.16亿美元，1965年——6.08亿美元，1966年——7.3亿美元。(《星暹日报》1967年5月21日)境外华人(在亚洲有1700万人)每年向自己的亲属和朋友汇款约2亿美元。(《曼谷邮报》1967年5月28日)

中国和外国的评论家的共同观点是，香港局势现在已经恢复正常，近几年内北京不打算对香港采取激进的行动，不会为追求政治目的而给经济造成重大损失。

这些评论家确定，在葡萄牙殖民地澳门是另外一种情况：北京事实上在那里确立了自己的控制，葡萄牙当局满足了他们的全部要求，这些要求现在没有不得到解决的，暂时不会再听到北京的意见了。香港和澳门联系紧密，澳门的大部分生意都掌握在香港人手里。按照《纽约时报》的评价，澳门每年给北京带来4亿美元的收入。实际上，澳门和中国(内地)的边界形同虚设。在去年12月澳门事件期间，这条边境线上没有一名警察存在。中国可以在任何时候清除中国土地上的这个葡萄牙殖民地(事实上是广州的郊区)，但是，在短期内中国将保持克制，不会采取这一措施。

苏联驻泰国大使馆二秘

B. 阿扎鲁什金(签名)

发送4份，送：东南亚司、远东司、军事情报局，归档

АВПРФ，ф. 100，оп. 54，п. 231，д. 31，л. 19－21

№25982

丘季诺夫的报告：香港事件的发展态势及英中关系

(1967 年 8 月 3 日)

苏联驻英国大使馆
1967 年 8 月 3 日
第 1415 号文

香港事件发展态势和英中关系

(参见报告《香港事件与英中关系恶化》,№1127/A,1967 年 6 月 17 日)

今年 6 7 月,注意到在香港涌现的反英行动加剧了,这一行动始于今年 5 月,是由于工人和企业主之间的劳工矛盾造成的。在各企业工人和雇员举行罢工的同时,出现了群众性反抗英当局的行动,罢工人员同警察和军队之间的冲突经常转变为对抗。

香港骚乱初期已现冲突形态,香港官方和报纸 ·致把它定性为政治性质的事件,与中国文化大革命有直接的关系。根据英国人的资料,骚乱是由"香港红卫兵"和各组织(包括工会联合会)的亲中领导人领导的。随后,北京积极支持香港的行动,导致英中关系进一步恶化。

在确定自己对香港反英行动的态度时,英国人既要考虑自己对保存这一殖民地的关切,还要考虑北京方面的打算。无论是在政府,还是在一系列各类会议上,都讨论了这个问题。为了了解事件的态势,派遣英国外交部代表率工作组前往香港本地;香港总督和香港警察署署长被召回伦敦;在香港本地,英国远东部队司令同地方当局进行协商,等等。

因一系列众所周知的原因,英国人不想放弃香港,对它来说,香港在很多方面都具有重要价值。这个殖民地作为英国在东南亚和远东的金融和银行业务中心起到重要作用(香港有 75 家银行和 325 家支行;其中大部分都是英国的)。英国对香港的投资约 5 000 万英镑,英国银行中的香港资产达 1.2 亿英镑以上,极大地"巩固"了英镑的地位。英国在香港购买了大量廉价纺织品。香港还是一个大型交通中心。香港拥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作为一个站点,英(美)可以从那里得到关于中国情况的完整情报。按照《星期日电讯报》的说法,香港是中国的"窗户",从那里"可以观察和听取"在这个极度疯狂的国家里发生了什么。(《星期日电讯报》1967 年 7 月 17 日)

英国人意识到,他们保存香港主要取决于中国对这个英国殖民地的意图。这种意图在什么时候会明确一直是他们关注的中心,而香港事件的发展态势是引起日常不安的对象。在会谈中英国官方人士公开表达了意见,"占领"香港对中国没有好处,也是不可思议的。这

种观点在报纸中居于主导地位。主要论据是：香港是中国获取所谓“硬通货”的主要来源，是中国购买资本主义国家的设备和粮食的保障(例如，从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购买粮食)。一般认为，香港向中国提供的“硬通货”不少于中国得到的“硬通货”总额的一半(仅贸易就提供了约2亿英镑)。

基于对中国意图的这种判断，英国人打算眼前不仅要“留”在香港，而且不能把这种变化写入香港法律，因为这可能导致“华人对殖民地当局影响力的增强”(仅打算采取某些改善劳动条件和提高工资等的措施)。5月末，时任联邦事务部副部长的贝兹维克在下议院直言，香港“不适合”类似于其他殖民地那样具有自治形式。

关于中国现在不会去占领香港的判断，显然，成为英国对反英行动采取“强硬路线”的基础(7月20日，宣布“免去”香港警务处处长戴磊华的职务。报纸的看法是，他是因为反对“强硬路线”才被免职的)。

至于6—7月香港事件的态势(比5月更为猛烈)和与此相关的英中关系情况，按时间先后顺序有如下表现：

6月12日，殖民地政府和私人公司管理机关解雇了数百名罢工工人，其中包括112名邮政雇员。

6月13日，中国中断粮食供应支持香港商贩为期1天的罢工。中华全国总工会汇款62.5万英镑，“支持左派工人”，号召他们在殖民地继续开展反英国压迫的斗争。

英国报纸已经指出过，香港6月“突发的暴乱具有政治性质，并非工人不满的结果”。

香港还出现了示威游行和集会，有时会与警察部队(共有11 000人)发生冲突。由于借助警察行动对游行示威参加者执行“强硬路线”，6月27日，英国驻北京临时代办霍布森被中国外交部召见，并向他宣读例行的中国政府抗议照会，指责英国对香港华人工人实施新的“法西斯式挑衅”。照会中指出，港英当局应该立即接受华人的“正义要求”，执行中国政府在今年5月15日抗议照会中阐述的5点内容。因其“粗鲁的非外交语言”，霍布森拒绝接受抗议照会。

6月27日，中国减少了对殖民地淡水的供应。

从6月27日到7月2日，食品工业企业工人宣布举行为期4天的罢工。但是，根据英国报纸评论，罢工组织者试图阻断交通，并把罢工变成总罢工，但未获成功。报纸报道说，在这次罢工期间，中国的出口单位损失了100万英镑。

鉴于街头反英行动的加强，英国当局把廓尔喀雇佣兵(800人)从马来西亚调到香港，外加驻扎在殖民地的9 000人部队。英国人明显准备同反英行动的参加者进行“决战”，期待着反英行动的规模因北京的“革命性声明”而进一步扩大。这样的声明(7月5日)后的一个表现是香港的一些中学生和大学生被捕，他们响应号召“作为反英斗争的先锋部队开始行动”。

当时，《泰晤士报》在评价香港局势时写道：“北京期待制造出类似澳门的形势，到那时这一块领土同中国之间的财政大门将会被打开，而管理机关也将处于共产主义的有效控制之下”。(《泰晤士报》1967年7月6日)

由于今年7月8日的事件英中关系紧张到了极点。英国报纸报道说,这一天约有3 000名来自中国的武装华人袭击沙头角边境检查站的警察哨所。在冲突中有5名英国警察被杀害,14人受伤。驻香港英军司令紧急向沙头角派遣了600名廓尔喀雇佣兵,占领了那里的阵地,尽管有报道指出,他们没有参与同"红色华人"的冲突。

在中国关于沙头角事件的官方声明中说,7月8日,沙头角和九龙新界边境村镇的中国居民举行群众集会,声援"港澳同胞"开展反对英国当局在香港犯下的血腥罪行的正义斗争。报道说,集会后中国居民返回九龙新界时遇到了港英当局的武装警察,他们实施"早有预谋的血腥镇压",使用了催泪弹,既向集会人员射击,也向中国边境领土方向射击。声明接着说,中国边防军人进行了警告射击,但是香港警察继续向集会人员开枪。结果1人被打死,8人受伤。随后,中国边防军人对香港警察进行了公开还击。(中国驻伦敦办事处新闻稿,1967年7月13日,№67048)

今年7月9日,联邦事务部部长鲍登在下议院说,香港边境的游行示威人员起初得到了中国警察的支持,事实上并不是中国军队。鲍登还说,英国政府完全支持港英当局针对游行示威人员的行动和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保障香港的和平与稳定"。

从英国官方和反动报刊的言论中可以看出,英国对这次边境事件感到不安。从英国外交事务办公室官员在私下会谈中表达的意见来看,他们对中国不会"占领"香港这个结论再次进行了"检查"。

但是,边境形势并没有继续恶化。关于中国把自己一个师的兵力调到香港边境的消息没有引起英国的特别紧张。看来,是掌握了关于这种意图的某种情报。一些英国记者报道说,调动这个师所追求的目的不只是向英国进行军事示威,还为了防止边境形势失去控制。报道说,例如,这个师接到命令"防止边境地带出现骚乱",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会(《星期日泰晤士报》1967年7月23日),禁止武装的共产党农民越过边境(《星期日电讯报》1967年7月14日),即切断中国与香港的边界。

所有这些事件都伴随着双方大量的抗议与反抗议,既针对香港事件和英国驻中国办事处的言论,也针对双方互扣各方记者。例如,7月9日,中国外交部向霍布森递交了反对英国在香港"制造新的武装挑衅"的抗议照会,在照会中,中国政府要求英国政府:

1. 对7月3日在沙头角的武装挑衅进行公开道歉;

2. 立即惩罚罪犯,赔偿沙头角居民以及被害和受伤人员的一切损失,释放24日在沙头角所有被捕人员;

3. 保证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中国驻伦敦办事处新闻稿,1967年7月13日,№67048)

当天(7月9日),英国临时代办就数百名中国游行示威人员进入香港领土,致使5名警察遇害和12名警察受伤一事向中国外交部提出抗议……霍布森驳斥了中国关于香港警察制造事件的论据,拒绝接受中国的抗议照会。

中国外交部(7月11日)和新华社(7月16日)就2名新华社记者(其中1名被判处2年

监禁）和5名香港“爱国报纸”的记者被捕一事向英国当局和香港当局提出抗议。

7月12日，在英国驻北京代办处组织了抗议逮捕中国记者的示威活动。据报道说，当时代办处的一秘和二秘从小门出来接收示威人员的请愿书，但后者向他们投掷石头和西红柿。

作为对逮捕香港华人记者的报复措施，北京当局逮捕了路透社驻北京记者格雷，当时格雷正在家里。报道说，格雷被带到中国外交部，告诉他逮捕他是因为英国政府拒绝将“注意力转向中国多次就其在香港实施的法西斯式镇压提出的警告”。

7月21日，英国外交部向中国驻英国临时代办沈平抗议格雷在北京家中被捕，要求立即予以释放。但是，格雷暂时仍被羁押。

根据对英国人采取的另一项措施，中国当局中断了对香港的淡水供应，导致这个城市对水实行严格的定量供应。

至于示威人员和香港警察之间的对抗仍在继续，从7月13日起当局增派军队援助警察。英国报刊报道了关于几名华人警察被害、英国士兵被从中国边境方向投过来的手榴弹炸伤、“亲北京的华人”攻击在香港的英美海员的消息。殖民地警察局加大了对罢工工会和游行示威人员的镇压力度。反英行动参加者陆续被捕，行动领导中心（党组织和工会）受到攻击。

同时，7月15日，香港街头再次出现示威游行。英国报刊写道：示威人群号召交通运输业举行总罢工，共产党报纸号召进行反英国“法西斯主义政权”的“人民战争”，暗示人民夺取警察的武器，并用它来反击警察。警察和军队对这次大规模的反英行动进行了镇压，而在7月16日，他们尝试捣毁反英运动领导中心、进行了大规模袭击和逮捕。仅这一天就有600人被捕（从5月起到现在，总共逮捕了2 000人，其中似乎约有650人获释）。

随后香港的消息证实，英国当局努力巩固自己在殖民地的地位。7月20日，香港政府宣布了“非常措施”，根据这些措施，“任何散布虚假消息和言论，以此号召制造恐慌和骚乱，都被看作是犯罪行为”。香港政府的新措施赋予警察和军队利用武器镇压“制造骚乱分子”的权力，居民有义务向警察出示自己的居住地址和姓名，禁止集会，无论是在私人场所，还是在公共场所，等等。

英国针对香港事件采取各种措施时，尽管进行了强烈抗议和交涉，仍努力不要走上同中国关系恶化的道路，关系恶化可能会促使后者对香港采取“坚决”行动。他们努力强调，他们所采取的措施不存在任何反对中国的倾向，都是通过“正常程序”进行的，这些措施可能会被中国人解释为挑衅（例如，把军舰调往香港）。英国暂时不打算同中国关系破裂。7月17日，在下议院答复保守党人道格拉斯·休姆的提问——英国政府是否曾考虑到出现针对英国驻中国官方代表的反英行动的可能性？议员、英国外交部政务次官罗杰斯回答说：“有一些因素和可能性，其中之一便是所谓的机会。但是，在一些方面我们应当尽力以我们的代表为榜样，表示坚决的反对，但与此同时，在困难的形势下我们要尽一切努力，如果我们认为这符合我们的长远利益的话。”

英国人，包括官方人士，对香港局势“正常化”没表现出更多的担心。官方公开承认，当

时随时可能再次出现反英活动。在他们看来,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北京对香港的路线。总体上仍从中国不打算占领香港的这个前提条件出发,英国人在这方面始终感觉不安,对此的解释是:中国自身的局势都非常不确定,很难讲毛泽东周围的哪一个集团在什么时候得势。同时,这也牵扯出了对北京在香港问题上的打算进行"检查"的必要性。

苏联驻英国大使馆三秘

Б. 丘季诺夫(签名)

文件共4份,送:欧洲司(2份)、远东司,归档

1967年8月1日

АВПРФ,ф. 69,оп. 59,п. 239,д. 31,л. 115－123

№25620

诺维科夫与李周渊会谈纪要:中国对朝鲜的供应急剧减少[①]

(1967年9月25日)

……

李周渊说,在我们的代表团工作期间,朝方想与您商谈煤和盐的问题。就像我们不止一次地告诉过您一样,因为中国的情况,我国煤的供应发生了困难。至今我国每年从中国进口200万吨煤。但中国煤的供应急剧减少。因此我国的冶金工业、生产烧碱的企业发生了困难。

我们建议像在哈巴罗夫斯克区组织木材生产那样组织煤炭生产。朝方提供劳动力,苏方提供设备和物质。生产出来的产品按比例分配。

……朝方认为,煤是讨论中最为重要的问题。

当然,可能中国方面的情况会有所好转,我们又可从中国进口煤。但目前没有人能预言中国的混乱状态要持续多久。

……

我想告诉您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品上存在的困难。过去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如硫黄、石膏、锰、矿和石棉(目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从苏联进口锰、矿和石棉)、石油、煤炭(石炭砂)、锡、硝酸钾、棉花纤维、糖、大豆等的数量能满足我们

① 该档案系摘录自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的需求。可是现在从中国进口的这些商品数量很有限。

目前很难完全说明中国事件对我国的影响。它所产生的后果对我国来说简直是灾难性的。朝鲜方面恳请你们认真考虑我们的困难，给我们援助，以免我国工业遭受更大的损失。

您知道，“大国”的局势使我们产生了巨大困难。没有必要讲些每天在边界地区发生的不愉快的事情。没有必要谈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北京进行的不友好的宣传。我们现在与中国的关系对我们的贸易产生了消极影响。

……朝方希望苏联购买下列商品：车床、拖拉机(目前中国拒绝购买朝鲜的拖拉机。我们和中国把拖拉机交换为四吨货车)……

……有一个问题我们想公开地同志式地与您交换意见。现在中国有困难，我们不能直接声明不准备与他们进行贸易。要进行贸易。但是目前的情况是这样的，没有可以与之进行贸易谈判的对象。中国的外贸部里坐着的不是工作人员，而是那些不懂贸易的中学生、红卫兵。我们不能直接说，我们不相信中国能履行自己贸易方面的义务。说实话，我们真的不相信中国能给我们供应商品。但是我们还是必须准备与中国做生意。

……B. H. 诺维科夫问，中国供应你们多少盐，李周渊回答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每年从中国进口 20 万吨盐。但现在供应不正常。他们不想，而且也没有东西供应。

……我们现在灾难性的局面是因“大国”而造成的。

……

АВПРФ, ф. 0102, оп. 27, п. 53, д. 2, л. 75－91

№25729

外交部远东司的报告：中国的对外关系陷入困境[①]

(1967 年 11 月 5 日)

……

在与许多国家关系尖锐化的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地位的削弱是一种因在国内进行的文化大革命而引起的客观的过程，是中国人民被迫为毛泽东一伙的冒险、大国沙文主义的方针付出的巨大代价。毛泽东一伙内部无原则的斗争以及他们沙文主义的对外政策深刻地反映在中

① 该档案系摘录自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国在全世界的地位上，以至中华人民共和国丧失了有效影响和操纵亚非拉国家的能力和机会。

……

АВПРФ，ф. 0100，оп. 60，п. 534，д. 31，л. 241

№25719

利哈乔夫致费德林函：驻华使馆收集中国情报遇到困难[①]

(1967年11月20日)

……

……由于目前驻北京大使馆收集关于中国国内政治和经济状况情报的可能越来越受到限制，希望外交代表机构利用外交关系及当地在纽约的机会，进行收集和分析中国国内局势的工作。

远东司请求给他们寄关于中国的英文和中文的参考资料、个人传记手册、有关中国政治人物的报刊、中国经济手册等。

……

АВПРФ，ф. 0100，оп. 60，п. 534，д. 32，л. 55

№25720

利哈乔夫致多勃雷宁函：加强对中国情报的收集和分析[②]

(1967年11月20日)

……

---

① 该档案系摘录自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② 该档案系摘录自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外交部部务委员会指出，(收集中国情报)这项工作应该由驻美国大使馆以及驻日本、法国、英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以及驻在与中国邻近国家的大使馆负责。目前由于驻北京大使馆和其他机关对中国国内政治和经济情况资料收集的可能性受到很大的限制，大使馆需要做的是对于他们所拥有的关于中国政治的情报(主要来自美国的)、美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对中国内外政策、中国的核试验以及中美关系和中苏关系的评估进行系统的分析，并将这些材料寄过来。

……

АВПРФ，ф. 0100，оп. 60，п. 534，д. 32，л. 92

№25728

外交部远东司的报告：加强对中国情报收集和反宣传工作[①]

(1967 年 11 月 28 日)

苏共中央于 1966 年 8 月 16 日作出了“关于加强对中国宣传并反击中国领导人在第三国家进行的反苏宣传”的决议。委托苏联外交部驻河内、平壤、东京、雅加达、拉瓦尔品第、曼谷、仰光、巴黎、伯尔尼、布鲁塞尔、开罗、阿尔及尔、达累斯萨拉姆、哈瓦那以及苏联驻联合国办事处的 15 个机构拥有汉学专业并在该领域具有丰富工作经验的外交官，建议让他们在所在国家系统地研究中国领导人的分裂和破坏活动，并提出抵制毛泽东分子影响的具体建议。

目前在上述这些大使馆和联合国办事处都有以研究中国问题为工作范围的工作人员。我们向 16 个国家中的 12 个国家派去有中国工作经验和熟悉当前中国问题的外交官……

在所有苏联大使馆(除北京大使馆)里今年 10 月已经有了 40 名在不同程度上懂得中文的外交工作人员。

……

驻 16 个国家的大使馆送来的情报资料证明，各大使馆在加强工作，对所驻国家中国人的行为以及这些国家与中国的关系进行研究和解释，制订反对毛泽东分子积极活动的措施。在许多国家还吸收其他苏联外国机构(在开罗的苏联亚非委员会的代表、在东京的苏联记者等)参加这方面的工作。

① 该档案系摘录自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

大部分大使馆(苏联驻美国、日本、越南民主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等国家的大使馆)提供的情报资料中有益的方面是,对中国代表的行为方法和手段,以及中国领导人对所在国政界和社会各界进行影响的方式进行了分析。

通常,大使馆工作人员的会谈记录都表明,与所在国的代表以及外国人的接触都被积极利用,以便获得关于中国问题的情报以及为了揭露中国领导人的政策。

……

今年9月,在苏联外交部部务委员会大会上执行决定的部门作了关于自己的一些想法的报告,当时听取了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关于中国的情况以及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工作情况的报告。其中也指出,除了在决定中提到过的大使馆以外,还有苏联驻英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以及驻中国一些邻国的大使馆都应当特别注意对中国问题进行研究和解释。建议苏联大使馆加强关于中国问题的情报工作。会后,远东司委员会准备了关于自己对研究和解释中国问题的一些建议的报告,并把其发送给了决定中提到的苏联驻美国大使馆。

……

АВПРФ,ф. 0100,оп. 60,п. 534,д. 31,л. 211 - 214

1968 年

№10686

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关于针对中国问题的宣传措施

（1968 年 2 月 28 日）

苏共中央书记处 1968 年 2 月 28 日会议第 45/10г 号记录

第 10 项　关于针对中国问题的宣传措施。

（基里连科同志、罗满宁同志、库拉科夫同志、索洛缅采夫同志、卡皮托诺夫同志、乌斯季诺夫同志）

一、在《共产党人》杂志上发表根据“关于中国事件”的论题而撰写的 3 组编辑部文章。近期，在《真理报》、《消息报》、《共产党人》、《党内生活》、《哲学问题》、《历史问题》、《经济问题》杂志上，以“关于中国事件”的论题为基础，按照附上的题目刊登一组理论性文章。在中央各报上转载各兄弟党报刊的关于中国问题的文章。

二、责成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无论是在进行对内广播还是对外广播中，定期播送有关中国问题的材料，并在转播时系统地使用各兄弟党的有关资料。

三、塔斯社、新闻社以及其他进行对外政治宣传的部门和机关，必须保证在国外广泛传播苏联公布的以“关于中国事件”论题为基础的材料。

四、苏共中央宣传部、各加盟共和国党的中央委员会、党的边疆区委员会和州委员会、全苏知识协会，以“关于中国事件”的论题为基础，在居民中开展政治教育工作，揭露反苏维埃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实践的毛泽东集团。为实现以上目的可以广泛使用口头宣传的方式。

五、苏共中央宣传部和苏共中央办公厅负责通告报刊、广播和其他宣传机关的工作人员，在进行中国问题的宣传时要以“关于在中国发生的事件”的论题精神为依据。

ЦХСД，ф. 4，оп. 19，д. 490，л. 7

№10404

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与兄弟党协调关于中国问题的宣传和研究

(1968 年 3 月 12 日)

苏共中央书记处 1968 年 3 月 12 日会议第 47/1r 号记录

第 1 项 关于与兄弟党协调中国问题宣传和研究的决议。

批准就中国问题前往柏林与兄弟党中央委员会国际部代表举行会晤的苏共中央国际部代表团所提交的备忘录(附录)。

附件：

第 47/1r 号记录

前往柏林就中国问题与兄弟党中央委员会国际部代表举行会晤的苏共中央国际部代表团所提交的备忘录

一、向与会者通报，苏共中央关于在我们党的实践活动中使用共同的资料——《关于中国事件》的决议。

二、建议在会晤时，讨论以下附件—兄弟党在中国问题上开展宣传和科学研究的具体措施。

(一) 组织措施：

——为交流加强与协调反毛宣传活动方面的意见，1968 年 4—5 月间，在莫斯科会晤参加国其中一个国家的首都，举行报刊、广播、电视、新闻机构以及出版社代表会议。

(二) 在广播和电视领域：

——交换广播电视材料，以便在对内和对外广播宣传时使用；

——组织共同广播，其中包括对最重要和最迫切问题的有力的反宣传讲话；

——近期制作出关于中国事件的电视纪录片；

——在国际广播电视组织和国际电视组织中，协调我们各国的力量；

——互派专家，以便交流中国问题宣传的经验；

——就中国问题广播宣传中的主要方向互通信息；交换参考资料，特殊情报资料等。

(三) 对第三国报刊宣传领域：

——在向第三国发放关于中国问题的材料中，协调兄弟各国新闻机关和其他对外政策宣传机关的力量；

——共同整理编制"关于中国事件"的文件汇编手册。这本手册应译成各种文字(英文、法文、西班牙文和阿拉伯文)并在第三国发行；

——共同出版关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照片文献，并在第三国发行；

——协调关于反毛宣传方面的前景计划；

——定期交换有关中国问题的业务材料和情报信息；

——在收集和交换有关中国的情报资料方面，加强我们各国驻外新闻代表的合作。

(四) 在科学研究领域：

——1968年底举行题为《当代中国主要社会问题》的学术讨论会，并出版这次讨论会的材料；

——协调即将参加1968年8月在布拉格举行的第二十次中国学专家代表大会的兄弟国家各位中国学学者们的立场；

——互派专门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学者，交换科学工作者、实习生和大学生；

——在今年的春夏之际，举行我国各个科研机关领导人会议，交流信息以及协调出版、学术研究计划。

三、在与兄弟党代表会谈时，在与中国有关的宣传和科研活动协调的具体问题上，除多方接触外，还要指出双方接触的适宜性；指明兄弟国在上述领域里进行合作，一切实际问题都在非外汇等价交换的条件下解决。

ЦХСД，ф. 4，оп. 19，д. 504，л. 115-117

№10257

苏共中央给驻外使馆的指示：加强援越反美的舆论宣传工作

(1968年4月5日)

机　密

特急
优先拍发

维也纳(致莫洛佐夫同志)
布拉格(致波泽尔科、列别杰夫、叶罗费耶夫同志)
柏林(致拉希姆巴巴耶娃同志)
布加勒斯特(致格拉乔夫同志)
开罗(致阿卜杜拉扎科夫同志)
苏联大使:

兹委托您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进一步开展和强化为争取完全彻底停止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轰炸及其他军事行动而斗争的世界性运动。

在这个运动中,就采取共同行动问题与各种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扩大接触时,应该指出,约翰逊的声明只是个迫不得已的步骤。这是越南人民英勇抗击美国侵略的结果,是苏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友好国家对越南卓有成效支援的结果,是美国国内反战情绪空前高涨、美国政府碰到的社会困难和经济困难增长的结果,是世界各国进步的社会舆论和爱好和平力量对美国政府压力日益增大的结果。

同时必须强调,约翰逊宣布的措施,还远不符合越南人民和国际舆论希望达到的目标,即完全、彻底停止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轰炸及其他军事行动,并在此基础上开始谈判。在各种国际社会舆论范围内不容许出现幻想,即似乎可以放松国际舆论对美国政府进一步施加日益增长的压力的必要性。这种群众性压力的目的仍然是:停止美国侵略并在此基础上按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提出的条件,政治解决越南问题。

从当前局势出发,全世界的和平拥护者运动、工会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学生运动、亚非团结运动、所有的国际民族、民主主义组织,都应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今年4月3日发表的声明以及可能采取的其他行动。

在当前条件下,可以而且应该以更大力量、更大强度开展要求完全、彻底停止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轰炸及其他军事行动的世界性运动,以此造成开始就解决越南问题进行谈判的有利条件。鉴于美国空军不顾约翰逊的许诺,继续对非军事区以北200—300公里的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土进行狂轰滥炸,在全世界面前充分暴露了美国政府"爱好和平"保证的虚伪性,这样做显得尤其必要。

鉴于这种情况,各国际民主主义组织的任务是要对美国新的战争行动保持警惕,进一步发展支持越南人民的活动,实现早先通过的决议。今年3月23—24日,为协调各爱好和平的组织和运动支持越南人民、制止美国对越南的侵略行动,召开了斯德哥尔摩协商会议,要千方百计努力发展这次会议取得的积极成果。斯德哥尔摩会议上通过的文件,特别是号召书,是各种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采取共同行动的很好的基础,是把国际社会新的、更广泛的阶层吸引到这些行动中来的很好的基础。

您应采取措施,使您所在的国际组织从自己方面,对斯德哥尔摩协商会议通过的关于进一步开展支持越南的行动之决议和建议表示支持(首要的是以号召书为基础),并对自己国内的组织发出相应的呼吁。要注意必须使这个运动对社会产生最大的动员影响,要利用所

有渠道和手段使这些文件得到广泛传播，做到家喻户晓。在准备这些文件时请以上述意见为指针。

在实施这些措施时，要尽可能使赞成停止美国对越南侵略的各种组织和运动广泛参加进来。请将执行情况电告。

中央委员会书记

送：葛罗米柯同志、波诺马廖夫同志

附件：

第71号记录第50项

机　密

第00139号

第2处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

现将为进一步开展和加强为完全彻底停止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轰炸及其他军事行动斗争的世界性运动，所拟订的对苏联驻各国际民主主义组织的代表所发指示的草案提请你们审议。

附苏共中央决议草案。①

苏共中央国际部副部长

A. 别利亚科夫

1968年4月5日

第25-c-536号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7卷，第4345—4349页

① 在所收集的档案中未发现该附件。——编注

№22993

苏共中央全会会议记录:勃列日涅夫关于中国问题的发言

(1968 年 4 月 9 日)

绝密,不得复印

在 3 个月期限内必须返还
苏共中央(总务部一处)
苏共中央全会速记记录

苏共中央全体会议第一次会议

(1968 年 4 月 9 日上午)

会议主席勃列日涅夫同志:因正当原因——生病和到国外出差等未参加本次中央全会的党中央委员 8 人,中央候补委员 ——6 人,监察委员会委员——6 人。还有什么建议吗?

会场上有人道:开始开会吧。

会议主席勃列日涅夫同志:那么,请允许我宣布此次中央全会开幕。

会议主席勃列日涅夫同志:中央委员们都已知道了会议的议事日程,有人对此有意见吗?

会场上有人道:没有。

会议主席勃列日涅夫同志:我们打算对会议程序作如下安排……①

个别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的一些问题

同志们!

当我们面对不断变换的外部形势解决自己所面临的复杂问题的同时,苏共中央政治局认为,世界社会主义的友好团结在促进整个反帝阵线方面发挥着最为重要的作用。在 12 月中央全会之后的一段时期内,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定期与各兄弟国家和党派领导人会面,与其讨论世界政治的现实问题以及我们国家间关系和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友好团结的问题。这些也是政治局会议上经常讨论的问题。各兄弟共产党和工人党在动员劳动者解决社会主义

① 所收集的档案复印件此处字迹不清,无法翻译。——编注

建设问题方面所做的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果。在解决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问题上各社会主义走在了世界各国的前列，并对世界发展进程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

政治局这里并非指的是所有与发展和加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相关的那些问题。我们认为有必要向全会汇报关于一些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尖锐的问题……①

首先，请允许我谈一下关于中国的情况。这不是个新问题。我们曾在12月(1966年)中央全会上详细讨论过这个问题，1967年6月中央全会也涉及它。前不久，向党的积极分子都发放了"关于中国事件"的详细资料。因此，这里我们不再涉及细节问题，而只想简短地谈谈，如今我们所看到的所谓"文化大革命"的最严重的后果以及当前中国形势的最重要的特点。

在经济领域"文化大革命"导致生产大幅下降；1967年的工业品总值与1966年相比下降了15%—20%。中国各地区间的国民经济联系遭到了严重破坏。劳动者，尤其是工人的物质状况继续恶化。

在政治领域，"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结果是政府和管理的宪法机关被摧毁，各级党组织和党委被解散。作为社会领导力量的党实际上已不存在。

如今在经历了两年的"文化大革命"之后，可以完全肯定地说，这场运动已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本身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在指出这一事实的同时，我们也不能不看到，毛泽东及其集团至今仍没能够完整地落实自己的路线，彻底消灭反马克思主义和反社会主义方针的反对派。

应当说，虽然毛主义者们作了绝望的努力——在所有省份和自治区以所谓"革委会"替代政权宪法机关和党委，但时至今日此举并不成功。目前只在3个大城市以及26个省和自治区中的15个建立了"革委会"。

必须指出的是，正如我们所看到，"革委会"的建立绝不会导致毛主义者们所期望的结果——终止对毛集团政策的反抗以及内讧和冲突。如今，首都的北京"革委会"已发生了分裂，而上海和其他一系列省份的"革委会"也面临分裂的威胁。虽然当局实施了空前规模的镇压，但对抗依然在继续。国家许多地区在毛的拥护者及其反对者之间仍在不断发生着公开的、经常带有流血性质的冲突。

"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引发了无政府主义情绪的增长。例如，1968年3月1日广州的《南方日报》对公社内部的情况便做了如下描写："在春播工作前夕，农民中出现了大量不遵守纪律、拒不服从领导的情况。所有人都只想参加会议，而不愿意参加集体劳动。到处存在着这样一种情绪：没心情工作——只愿四处闲逛，即所谓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会议厅响起一片笑声)在青年学生中这种情绪更加强烈。此时，多数高校的课程实际上都未恢复，虽然大学生们基本上都已被从大街上召回并借助军队的力量被约束在各学院的高墙内。

由于面临对事件发展失去控制的现实威胁，又担心成为自己所发动的社会大混乱的

① 所收集的档案复印件此处字迹不清，无法翻译。——编注

牺牲品，毛泽东的拥护者们近期开始改变策略。从前，他们号召造反，那么现在则威胁性地宣称要对“无政府和宗派集团”采取“惩罚性态度”。从前他们呼吁“对各司令部开火”，那么如今则开始劝说干部们“要忘记自己所遭受的委屈和污辱”。根据现有资料，当局在坚定地开展联合所有所谓的“革命团体”的运动的同时，各企业和机关已得到指令——要求停止向相互敌对的集团成员发放工资，如果他们在今年5月以前不结束斗争和实现联合的话。在一些仍继续保持混乱状态的组织中，作为过渡举措，其成员工资数额已被削减了一半多。

为了试图稳定局势，毛泽东集团采取了各种可能的举措。这期间，他们越来越公开地把这一期望寄托在进一步加强军队对党和国家的监督方面。然而，显而易见的是，即使在军队和军队领导层内部也存在着尖锐的分歧。而针对军队干部的不间断的攻击便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还在前不久，即今年3月25日在北京便出现了有组织的群众游行，其口号是：“打倒军队中从事破坏活动的上层!”这一次成为毛主义者迫害对象的有：被撤销总参谋长职务的杨成武、北京军区司令员傅崇碧、空军政委余立金，以及其他一些中国军队的军事和政治活动家。

近期，中国制定了所谓党的“整顿和改组”方针，其实际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中共的构成，让数百万红卫和造反派加入进来。可能，毛主义者们是打算在维持原有名称的同时，而实际上要建立一个新的党，从而使党在组织和政治思想方面都完全成为毛泽东及其亲信实施军事-官僚主义专政的工具。完全可能，也正是因此才确定了要召开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的任务。据一些资料表明，中共计划于今年秋季召开这次大会(虽然也有消息说，这次大会不在今年举行)。

关于毛泽东集团对外政策活动的结果，可以确定地说，其提出的使中国成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所谓“第三世界”领导者的计划是完全落空了。如今，中共领导者和中国倒是享受了“大中华”沙文主义思想首脑的殊荣，其在自己的对外政策中放弃了阶级斗争观点，依然极力试图挑拨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冲突，利用各国家民族解放斗争发展中的困难和社会主义合作过程中的复杂问题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每当我们遇到某个巨大的国际冲突——如越南问题，印-巴冲突和近东问题等——都会出现毛泽东集团的身影。他们极力激化矛盾，加剧紧张局势。但他们所做的这一切，只会导致毛泽东集团在国际舞台上的进一步孤立。

中国的政治危机仍在继续。目前，我们还很难说，这一切需要经过哪些阶段才会告一段落。在这种条件下政治局认为，我们必须继续坚定不移地贯彻中央以前已批准的、并经过实践检验的政治路线。在不给中国领导人的挑拨以可乘之机和揭露毛泽东集团的反列宁观点、大国沙文主义方针的同时，我们将继续采取措施以维护与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员的友谊。与此同时，同志们，我们也必须看到毛泽东集团仍在继续其肆无忌惮的反苏运动。北京正在发动一场真正的反对我们社会制度和苏联共产党的宣传战，试图败坏我们对外政策的声誉。针对这些敌视性的活动，我们的路线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我们将始终给予其有

力而坚定的回击。(掌声)

同志们！在12月中央全会上，我们已提请大家关注这样一个情况，即在古巴领导人的国际政策中，有一些观点是我们不能同意的。政治局认为，有必要向全会通报如下情况，即最近古巴领导人的一些行动使苏-古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化。应当说，如今古巴领导人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和世界革命进程的发展道路等方面所提出的一些特殊观念，日益与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观点和政策相矛盾。事实上，上述特殊观念还在几年以前便开始由菲德尔·卡斯特罗提出。例如，他提出关于通过加快发展速度的方式、仅仅依靠革命热情便可建成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社会。

……①

РГАНИ，ф. 2，оп. 3，д. 101，л. 1－2、56－61

№22994

苏共中央全会记录：格里申关于勃列日涅夫报告的发言

(1968年4月9日)

苏共中央全体会议第二次会议

(1968年4月9日晚)

会议主席波德戈尔内同志：同志们，全会工作继续进行。由格里申同志发言，谢列斯特同志做发言准备。

格里申：同志们！在党的二十三大之后的短暂时间内，我们已是第三次在苏共中央全会上讨论关于对外政策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了。这些问题对我们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并始终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关注的重心。

Л. И. 勃列日涅夫同志在自己的报告中深刻而全面地阐明了国际形势的一系列现实问题，展示了苏共中央在团结各社会主义国家和加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统一方面所作的大量工作。苏共中央所做的上述工作受到了党和苏联人民的高度评价。

共产党和工人党协商会议在布达佩斯的召开，是苏共中央和各兄弟党领导层所作出的

---

① 以下内容略去未译。——编注

巨大努力的结果。在此次会议上所达成的,关于召集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约定,是苏共和其他兄弟党在巩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方面所取得的巨大胜利。

苏联积极帮助英勇的越南赢得了全国人民的一致赞扬。在大会和群众集会上工人、集体农庄社员和知识分子均表示,要与越南人民团结一心,完全支持政治协商会议对所有国家和政府所发出的号召,坚决要求美国立刻停止侵略越南;完全彻底地支持苏联政府就以色列军事集团不断的军事挑衅活动所发出的声明,表示随时准备为了公正的胜利而贡献出自己的一切。

与此同时,我们如今仍需要指出的是,中共领导人和毛泽东集团的分裂、反苏和民族主义活动给革命团结事业所造成的严重损失和巨大危害。

毛泽东集团的政策对全世界社会主义和革命事业所带来的巨大危害首先在于,他导致中国脱离了社会主义体系,使中国演变为敌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这一危害还体现在,毛泽东集团在国际舞台的活动日益成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帮凶。其所执行的分裂革命力量和激化国际紧张局势的方针更便利了帝国主义实施自己的侵略和战争政策。

在践踏国际团结原则的同时,中共领导人拒绝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道采取共同行动,他们的这一做法只会有助于国际帝国主义。中国领导人无耻的反苏活动甚至让美国统治集团都感到意外。美国反动集团的代表们为此而不断地发出欢呼之声。例如,前不久美国著名政治家乔治·凯南便写道:“我们方面曾一度摊着手傻坐着,竟完全忽略了中国和苏联之间的冲突,而没有充分利用这种冲突可能产生的积极结果。”

苏联人民和所有国家的马列主义者们均坚决谴责蛊惑人心的所谓“文化大革命”运动。它导致党、共青团和工会的骨干遭到污辱和被毁灭,侵犯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并贬低了其作用,以敌视态度对待知识分子,所有这一切均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危害,败坏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并只会有利于共产主义的敌人去反对共产主义运动。

由于将苏联共产党和苏联视作实现自己霸权目标的主要障碍,毛泽东集团集中力量以巨大的规模向我们党和我们国家发起了攻击。与以前一样,他们动用数十部广播电台开展针对我们国家的工作。可以说,他们以粗鲁的、很不体面的、有辱苏联人民尊严的方式播放了大量反苏材料,恶毒诬蔑苏联的实际,极力试图促使苏联人民反对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

与从前一样,与苏联的领土争议问题在中共领导人的反苏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近期,在一系列边境问题上他们又对我们发起了新的积极进攻。他们所做的这一切,目的就是想对两国现有边境进行重新界定。大量事实证明,中国公民违反边境规定,已进入我方位于阿穆尔和乌苏里等河流上的诸岛屿。

我们,作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边境相邻边疆区的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的居民们,是这场由中共领导人目前正在发动的赤裸裸的、反苏运动的亲历者和证明人。

经常会有人数不等的红卫兵组织在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等河流上的我方岛屿上出现,并挥舞着毛泽东语录,高喊反苏口号。

仅在1967年和1968年的三个月间，在由远东荣获红旗勋章的边防军区所保卫的区域内便发生了112起由中国人发起的粗暴挑衅性行动，参与者达到4 000人以上，其中既有平民，也包括军人在内。

在这一期间，中国人违反边界制度共计1 665起，参与者近9 500人。1967年渔汛期，在乌苏里河上中方共计1 800多艘快艇和渔船侵入我方水域。

近期，在乌苏里和阿穆尔河边境地区沿岸中国人正大量修筑防御工事、掩蔽部、公路、通讯线，露天观察哨，重建了日本人当年的所有防御工事，新建了一些村落并从中国南方诸省向这里移民。

据中国叛逃者证实：中国国内目前粮食不足，人们经常挨饿，燃料匮乏，许多省份和城市都出现了完全失控的状态，办公大楼、商店和铁路站被毁，火车运行不按时刻表，许多城市中匪患横行。

中国劳动者谋取更好生活的合法意愿，被当作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受到严厉谴责和严肃追究。毛泽东集团顽固地断言，"人民越贫穷，就越革命"，并以此口号作为处理一切事情的依据。

作为对经济困难的解释，中国宣传媒介说，本来就应当这样，"为了中华民族就必须准备打一场大战，准备克服空前的自然灾害"。

"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家们也一直在宣称，毛泽东思想得到了苏联人民的拥护。

同志们，在这个讲台上我必须说的是，这些关于我们苏联人民的话都是赤裸裸的谎话，不论是在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还是整个远东，反正都不可能找到一位苏联人会对毛泽东集团的大国沙文主义、反苏和分裂主义政策抱有即使一丁点儿的好感。

边疆区的党员积极分子和所有共产党员们坚定而彻底地揭露毛泽东集团的反列宁和民族主义方针，系统地向全体居民解释中国所发生事件的实质和我们党中央所采取的巩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措施。

边疆区的共产党员和全体劳动者清醒地认识到，苏联人民不付出巨大的劳动和不加速积累我们国家的经济潜力，要巩固我们祖国的国际地位是不可能实现的。

与整个国家一样，为了提前完成五年计划任务，边疆区也正在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以便能够以应有的姿态来迎接卡尔·马克思150周年诞辰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100周年诞辰。

……①

РГАНИ, ф. 2, оп. 3, д. 96, л. 1－74

① 以下内容略去未译。——编注

№22991

苏共中央全会决议：国际局势与国际共运的团结问题

（1968 年 4 月 10 日）

苏共中央全会决议
关于国际形势中的现实问题和苏共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团结而斗争

（1968 年 4 月 10 日通过）

在听取和讨论了苏共中央总书记 Л. И. 勃列日涅夫同志所作的"关于国际形势中的现实问题和苏共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斗争"的报告之后，苏共中央全会做出如下决议：

完全、彻底地赞成中央政治局在国际政策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所采取的政治路线及其实际活动。

全会认为，由于坚定不移地落实苏共二十三大所定的方针和进一步发展了中央(1966年)12 月中央全会、(1967 年)6 月中央全会的决议，整个国家的国际地位更加稳固，苏维埃国家更加强大，威望不断增长，世界和平和社会主义的利益得到了更加积极的维护，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斗争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通过与各兄弟党的密切合作在争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斗争中取得了重大的成果。

全会完全赞成布达佩斯共产党会议的结果。这次会议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重大事件……[1]。苏共中央全会认为，近期，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所面临的重要任务，就是筹备计划于 1968 年 11—12 月间举行的各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全会委托政治局在布达佩斯会议联合公报所达成的既定立场的基础上与各兄弟党进行密切的接触，全力争取新的国际会议的胜利。

全会高度评价和赞成苏联代表团在索菲亚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上的活动，并对此次会议所通过的决议——"由于美国对越南侵略的扩大化而导致世界和平受到威胁的宣言"表示欢迎。该宣言是对美帝侵略者发出的、新的严正警告。它再次展示了社会主义国家与战斗的越南人民的国际团结。为了正在遭受帝国主义进攻的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尽快恢复越南的和平，我们将全力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人民给予援助。

中央全会一致赞成六个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针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采取的共同立场。全会特别强调六个社会主义国家党和政府领导人所举行的德累斯顿会议的意义。全会再次批准我们党准备做出一切必要的努力以加强社会主义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和国防领域的合作。

在指出由于以色列右翼集团和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动导致近东局势依然严峻的同时，

---

① 所收集的档案复印件此处字迹不清，无法翻译。——编注

全会赞扬政治局和苏联政府所采取的举措——消除以色列侵略后果，解放阿拉伯被占领土，全力支持阿拉伯国家中的进步力量。

中央全会肯定了中央旨在揭露西德复仇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政治的正确性，强调苏共与兄弟党所采取的团结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爱好和平国家以及所有反帝力量，从事反对西德帝国主义斗争的联合行动的重要性。

全会指出，现阶段历史发展的特点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思想斗争极其尖锐。整个反共产主义的庞大宣传机构的目的，就是要削弱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瓦解当代进步力量，并试图从内部颠覆社会主义社会。在自己的内、外政策都遭到了严重动摇和失败的同时，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帝国主义，除了在军事-政治领域实施冒险外，还将更大精力投入到反对社会主义国家、共产主义和自身民主运动的具有一定破坏作用的政治、思想斗争方面。

在这种条件下与敌对思想进行不妥协的斗争，坚决揭露帝国主义的阴谋，对苏共党员和全体劳动者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全面加强党的思想教育工作便具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也是我们所有党组织的主要责任之一。其职能就在于，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积极反对个别文学、艺术作品的腐朽思想和其他错误观点以及与苏联社会主义社会格格不入的异己思想。各级党组织一定要充分运用一切思想教育手段坚定人们的共产主义信念，使每个共产党员和苏联人民具有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情感，从而使人们能够从思想上抵御任何形式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

我们为庆祝卡尔·马克思 150 周年诞辰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 100 周年诞辰而采取的举措，理应成为促进我们政治思想工作和广泛开展马列主义思想宣传的有力因素。

各级党组织的思想活动应当与提高全体劳动者的劳动和社会积极性，与每个苏联人在顺利完成国家五年计划生产任务中的实际贡献紧密联系起来。

党和全体苏联人民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进一步加强祖国的政治、经济和国防，促进整个社会的更全面发展，在自己的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下去赢得共产主义的胜利。

全会委托政治局制定和落实一系列举措以改善共产党员和全体苏联人民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①

中央全会认为，当前国际形势要求所有社会主义、民主和民族解放力量更积极地行动起来。苏共自身也将继续执行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和防止世界战争的政策，巩固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合作、共产主义运动和所有反帝力量的团结的政策。

РГАНИ，ф. 2，оп. 3，д. 89，л. 1－12

---

① 这段话旁有一行打印文字："不发表"。——编注

№25772

外交部致中国大使馆照会：在越南的苏联专家受到中国军人迫害[①]

（1968 年 5 月 12 日）

……

1968 年 4 月 25 日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

驻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中国军人在奠边府地区残酷迫害苏联地质专家 И. В. 瓦西里耶夫。他们将他从汽车里拖出来，采用暴力手段折磨他两个小时：他们要求苏联专家低头，亲吻毛泽东语录，用脚踢他，用拳头、铲子打他，并用武器威胁他，甚至朝他头顶上开枪。虐待狂将失去知觉的瓦西里耶夫抛到带刺的铁丝上……类似的事件以前也发生过。

……

苏联外交部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的照会

1968 年 5 月 12 日

АВПРФ，ф. 0100，оп. 52，п. 220，д. 3，л. 26

№25771

李强给拉兹杜霍夫的通报：苏联援越物资转运任务全部完成

（1968 年 7 月 22 日）

尊敬的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代办

Ю. И. 拉兹杜霍夫：

兹向您通知：

根据 1967 年 3 月 28 日的中苏意向书和 1967 年 6 月 20 日、8 月 8 日和 9 月 6 日互换的信件，中方已于 1967 年至 1968 年 1 月全部完成了运送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苏联专用物资的

① 该档案系摘录自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铁路运输任务。中国政府为此支付了984.8822万卢布40戈比。

上面提到的经费全部由中国政府承担。

此致

敬礼！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副主任

李强

1968年7月22日

于北京

АВПРФ, ф. 0100, оп. 55, п. 232, л. 47

№10405

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关于出版和发行王明的著作

（1968年12月4日）

苏共中央书记处1968年12月4日会议第62号记录

关于责成新闻出版社出版并在国外发行王明同志题为《毛泽东进行的不是"文化大革命"，而是反革命政变》的文章的决议。

（基里连科同志、波诺马廖夫同志、佩尔谢同志、杰米切夫同志、卡皮托诺夫同志、乌斯季诺夫同志、索洛缅采夫同志、罗满宁同志）

决定交政治局协商。

……①

ЦХСД, ф. 4, оп. 19, д. 522, л. 10

① 以下内容与中国无关，略去未译。——编注

1969 年

№10406

苏共中央政治局决议：七国兄弟党中央国际部代表讨论中国问题

（1969 年 1 月 21 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 1969 年 1 月 21 日会议第 65/84г 号记录

第 84 项　关于七国兄弟党中央代表就中国问题进行的会谈。

1. 同意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苏共中央国际部 1969 年 1 月 17 日报告中提出的建议（见附件）。

2. 批准以 А. М. 鲁缅采夫、О. Б. 罗满宁、Б. Т. 库利克、В. И. 拉扎列夫、Б. М. 佩什科夫、М. И. 斯拉德科夫斯基、Л. П. 杰柳辛等同志组成的代表团出席苏联共产党、保加利亚共产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德国统一社会党、波兰统一工人党、蒙古人民革命党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国际部代表的会议。

3. 批准关于代表团出席各共产党和工人党中央国际部代表讨论中国问题会议的指示。

4. 有关代表团赴民主德国的有关一切开支在党的预算中支付。

1969 年 1 月 21 日

附件：

关于出席保加利亚共产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德国统一社会党、蒙古人民革命党、波兰统一工人党、苏联共产党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国际部代表讨论中国问题会议给苏联代表团的指示

不准公布

1. 在同各兄弟党代表讨论材料过程中，代表团应遵循苏共中央 1968 年 4 月和 7 月中央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原则评价以及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决议（1968 年 11 月 22 日，第 П 108/18 号）；并运用苏共中央办公厅和苏共中央国际部拟定的“现阶段的中国局势和毛泽东集团

的政策”提纲。

2. 利用这次会议协同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局势和毛泽东集团的国际及国内政策等问题的观点和评价，交流各兄弟党协调对中国问题宣传和科研活动的意见。

3. 如同1967年12月莫斯科会议一样，尽可能争取在苏共中央国际部门拟定的草案基础上，以提纲的形式，制定出协同一致的材料。如各兄弟党代表团不认为可能制定出共同的材料，在这样的情况下，不要坚持己见，则限于对讨论主题的原则问题进行协商，达到一致的思想和评价。

4. 力求同其他与会者达成协议(像在莫斯科会议一样)，在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工作时，运用共同提纲作为正式发言、党的文件、本党信息的工作材料。

5. 向与会者通报，苏共如何运用在莫斯科会议制定的关于“中国事件”提纲，苏共在反对毛泽东集团的反马克思反人民政策、在实行同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员的团结和友谊的政策所作的努力中，达成了相互一致的协议。

6. 提出关于协调各兄弟党的宣传和科研活动的意见(具体措施清单见附件)。

7. 在同各兄弟党谈话时着重指出，协调有关中国具体问题的宣传和科研活动的多边和双边接触同样具有合理性；并提示，各兄弟国家在指定范围内合作的一切具体问题，希望在对等、非外汇的条件下解决。

附件：

协调对中国问题的宣传和科研活动内容

不准公布

1. 组织措施

——1969年6—7月，在这次与会的某一国首都举行报刊、电台、电视、通讯社及图书出版业的代表会议，交流关于加强和协调反毛宣传的意见。

2. 在广播和电视方面

——交流可能利用的对内和对外的广播电视材料；

——组织共同播放，尤其是针对最重要和迫切问题的干练的、反宣传的讲话；

——在近期内制作关于中国事件的电视新闻片；

——协调我们的国家在国际无线电通讯和国际电视组织中的努力；

——互派专家交流在宣传中国问题方面的经验；

——相互通报关于无线电宣传中国问题的基本方向；交流咨询材料、独家新闻等。

3. 关于报刊对第三国进行宣传方面

——协调各兄弟国家通讯社和对外宣传机构推进宣传中国材料的努力；

——用共同力量准备出版“关于中国事件”的材料汇编。把这本汇编译成外语(英语、法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并在第三国散发;

——在反毛宣传方面协调远景规划;

——定期交流关于中国问题的精干材料及情报;

——组织我们国家报刊的外国代表对搜集和交流中国情报进行合作。

4. 在学术研究方面

——1969 年底举办研讨会,主题是“现代中国的主要社会问题”,随后出版这次研讨会的材料;

——互派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交换科学工作者、见习人员和大学生;

——1969 年夏,组织我们国家科研机构的领导人会议,交流情报并协调出版和学术计划。

ЦХСД,ф. 4,оп. 19,д. 525,л. 29,107-110

№01843

切谢夫与巴杜拉谈话记录:越南局势和中国对柬埔寨的帮助

(1969 年 1 月 23 日)

摘自 Г. В. 切谢夫的工作日记
1969 年 1 月 31 日
第 38 号

机　密
文本第 2 份

与波兰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一等秘书巴杜拉的谈话记录

(1969 年 1 月 23 日)

本人应邀访问了巴杜拉。

从驻西贡大使多布罗沃利斯基那里得到的由其说明的消息是有关政治解决越南问题,北京与越南南方的相互关系问题,越南南方的内部政治形势问题。

一、据1月22日的消息说，"法新社"西贡分社副社长在与多布罗沃利斯基的谈话中说，1月21日阮文绍与在西贡访问的美国助理国务卿阿列克西斯·约翰逊进行了会晤，据说达成了有四项内容的美国-西贡计划，该项计划应在巴黎会议首先进行讨论。

1. 西贡当局释放战俘。

2. 对渗透地区进行监督。

3. 对不设防的地区恢复原状。

4. 停火。

据说，美国人在释放战俘问题上对西贡施加压力，而阮文绍在这个计划中遇到很多困难，因为宣传的数字与在越南南方实际存在的越共战俘有极大的出入。

美国新闻记者罗斯和贝姆证实了这个法国人的消息，他们强调说，在巴黎最先提出的将是关于不设防地区和停火问题。

根据多布罗沃利斯基的资料，约翰逊向新闻记者们证实，到目前为止美国在越南执行的政策是正确的，并说，他约翰逊不会建议尼克松去改变政策。

二、据1月22日消息说，多布罗沃利斯基从与一位不久前访问过柬埔寨的美国新闻记者的谈话中了解到，在这个国家的中国侨民起着中间人作用，他们用中国武器和粮食供给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部队。观察到居住在柬埔寨的中国人有参加阵线武装力量队伍的情况。

驻金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与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层领导人员保持着经常的接触，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在柬埔寨购买大米并将它运送到阵线去，在这些活动中他们充当了中间人的作用。

根据波兰大使的报道说，他也掌握中国大使馆与解放阵线部队联系消息的其他资料。

三、据1月21日报道，1月19日迟到一星期的消息说，举行了一次所谓的"全国民族大会"，召开这次大会的倡议者是越南南方天主教教会的主教黄琼(Хоанг Кунь)和从北方逃走的天主教的领导人。按照组织者的意图，这个大会应该在"和平"的口号下，在得到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广泛的民族支持下，和建立在佛教徒达成协议的基础上来进行。但是事件说明，越南南方绝大多数政治和宗教团体无论是对天主教最高层想达到和平的想法以及对政府在这个问题的政策上都持否定的态度。"大会"遭到了惨败：预计有1 500个参加，结果仅有200人；有战斗力的佛教徒团体、越南国民党、大越党、越南劳动会议都拒绝参加。

据观察家意见，"大会"的失败同时也是政府的失败，它打算把这次大会的召开作为表面上给人看看的措施，这一措施似乎想证明越南南方人民对现有制度的广泛支持。佛教徒们有自己在越南达到和平的计划，但是仅在政府的"和平计划"公布以后他们才打算公布自己的计划，当时西贡的领导人关于这项计划曾有过声明。

苏联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一等秘书

Г. 切谢夫

ЦХСД，ф. 89，оп. 54，д. 22，л. 23－25

№10256

佐林与春水、陈宝剑谈话纪要：越美和谈的进展和前景

(1969 年 2 月 21 日)

摘自 B. A. 佐林的工作日记
1969 年 2 月 28 日
第 203 号

今天拜访了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官邸，在那里与春水①同志和陈宝剑②同志举行了会谈。

一、我简要地向越南同志通报了今年 2 月 15 日美国代表万斯在与苏联大使馆公使衔参赞奥别列姆科同志谈话时表达的最新意见以及法国外交部亚洲司代司长德拉伊今年 2 月 18 日与大使馆参赞乌特金同志谈话中，就越南的调解问题阐述的法国人的看法(没有直接引用他的话)。越南同志以极大的兴趣听取了介绍并对通报表示感谢。

二、我借口说，我最近将对参加巴黎谈判的美国代表团团长洛奇进行回访，询问越南同志，在尼克松来巴黎之前，有没有越南同志感兴趣的问题需要我们向洛奇提出来，以便我们在政治解决方面对美国施加影响。我还问，考虑到戴高乐很可能与尼克松讨论越南问题，越南同志有没有希望向法国人提出的问题。

越南同志在回答这些问题时谈了以下意见。

(一) 陈宝剑同志指出，现在美国不愿意在谈判中讨论实质性问题，他说尼克松正努力加强西贡政权及其军队，然后才解决实际问题。然而，南越的局势将会发生变化，美国不可能实现这些目标。现在美国正采取措施以保证自己在城市中的安全。美国人现在不得不面对由于城市各阶层居民运动的发展而产生的新困难。城市居民的运动不仅具有民族主义的性质，而且更加广泛，它指出的基本要求是在国内恢复和平，让阮文绍、阮高其和陈文香等所有人一起下台并组建“和平内阁”。

他继续说，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已经提出了要政治解决问题，就必须予以讨论的一些建议，并且明确阐述了自己关于解决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的立场。但美国却试图首先解决军事问题，努力改善自己在南越的地位，以便以实力地位进行谈判。

(二) 春水同志同意陈宝剑同志的看法，他强调，尼克松和约翰逊一样，都想从实力地位出发解决越南问题，所以美国继续加强傀儡政权，打算即使自己的军队撤出之后也继续留在

①　春水，越南出席巴黎谈判代表团团长。
②　陈宝剑，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团长。

南越，以便利用傀儡继续自己的新殖民主义政策。

美国人暂时还没有解决越南问题的具体计划。他们在头几次会议上提出的那些具体建议(指洛奇建议开始讨论关于非军事区的问题、关于撤出外国军队的问题和交换战俘的问题)，不过是为了进行对话，而不是为了从实质上解决问题，是在拖延解决问题。美国人明白，如果他们提出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就将给他们提供加强西贡傀儡的机会。美国之所以硬要讨论军事问题，其目的就是要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施加压力。

至于法国在越南问题上所持的立场，据春水同志说，法国人希望美国从南越离开，而法国返回那里，但不是像他们以前那样。很显然，法国人在与尼克松谈判时将在这个方面对他施加影响。

往后，春水同志说，如果我与洛奇谈话，让我转告他以下情况：

—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希望在达到真正独立的基础上，解决越南问题，而不是在美国希望的基础上。

如果美国想继续从实力地位行事，那么越南人民不会同意这样做并将继续反对美国的侵略斗争。

——如果美国想解决越南问题，它就应该开始与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对话。如果不与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对话，越南问题将得不到解决。暂时美国和西贡在谈判中还只与越南民主共和国谈，而不愿与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谈。

——如果美国不同意完全和无条件地从南越撤出自己的军队，那么他们就将遭到更大的军事失败。

至于具体问题及解决它们的立场，春水同志和陈宝剑同志认为，现在还不到与美国人讨论它们的时候。

三、在就越南问题的某些方面交换意见时根据我们主动(为了弄清越南同志的立场)谈到了“和平内阁”的问题、分阶段撤出美军的问题、消灭美军基地和停止军事行动的问题。

在这些方面越南同志谈了以下自己的意见：

(一)陈宝剑同志解释说，反对政府的西贡政权只是一个战争政府，它只能为战争服务。反对派运动及它提出的要求承认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关于建立“和平内阁”的思想，所以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支持这个运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也支持反对派运动作为“和平内阁”候选人提出的人士。被推举的候选人都是些值得尊敬的人，他们中间有的人过去与美国人有联系，但现在已站在进步的立场。

(二)春水同志补充说，西贡当前的政府不希望和平并继续奉行支持美国侵略战争的政策。所以西贡、其他城市和美国人占领地区的居民都要求推翻阮文绍、阮高其和陈文香。这个要求不是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要求，而是人民群众的要求，是从下面提出的要求，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也支持这个要求。

他继续说，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当前对建立“和平内阁”没有什么具体建议，但我们欢迎将进入新政府，并愿意与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所有人进行对话。

如果越南南方居民方面提出要求，让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代表也参加政府，那这是件好事。如果不提出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代表参加“和平内阁”的希望，而只是表示准备与其谈判，那这也将是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可以接受的。主要的任务在于，在这个“和平内阁”中，应当实现各阶层居民的民族大联盟，并在内阁成员中包括进“民族、民主和爱好和平力量联盟”的代表。当这样的“和平内阁”建立起来之后，有可能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政治纲领基础上组建临时政府。

（三）当我提出，为了解决军事问题，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方面是否应该提出某些具体建议，比如，关于缩小某些地区军事行动的范围或者关于分阶段撤出美国军队和在一定期限内消灭美军基地的建议，春水同志说，还不到讨论军事问题的时间。美国人想从实力地位进行谈判并想使用这种实力。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要求迅速、完全(而不是分阶段地)、无条件地撤出美国军队。美国人现在认为，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力量已经耗尽，他们已没有能力进行有效的行动。所以，如果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现在提出某种具体建议，比如说关于缩减军事行动的建议，那就会被美国人视为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软弱的表现。

陈宝剑同志对此补充道：“我们要狠狠教训一下美国人，并且我们相信自己的力量。”

春水同志要我在与美国人谈话时暂时不要涉及这个问题，他说，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将讨论这个问题，并在稍晚些时候与(苏联)大使馆交换意见。

（四）我以探讨的方式向越南同志提出，为了迫使美国人与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对话，是否应由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依据 4 点和 5 点提出一个巴黎会谈的具体纲领，而越南民主共和国则对此表示支持。

越南同志对此想法表示感兴趣，而且春水同志说，两个代表团将研究这个建议。

参加该次谈话的有：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成员何文楼同志、梅文蒲同志，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成员阮文进，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工作人员阮玉蓉同志，我大使馆参赞泽连佐夫同志，大使馆二等秘书戈里茨基同志。

参赞 B. A. 泽连佐夫同志为谈话担任翻译，二等秘书 B. A. 戈里茨基担任记录。

苏联驻法国大使

B. 佐林

共打印 6 份：科济列夫同志、苏共中央、第一欧洲司、东南亚司、沃姆普(УОМП)[①]、存档

1969 年 2 月 24 日

第 256 号

ЦХСД，ф. 5，оп. 61，д. 460，л. 56－60

---

① 查不到该缩略语所表示的内容，这里是音译，可能是内务部的一个下属机构。——编注

№10282

苏联政府致兄弟党政府的情况通报：中国在珍宝岛的军事挑衅

（1969年3月8日）

1969年3月2日，当地时间11点整，中国在达曼斯基岛上组织了一次挑衅行动。该岛位于比金和伊曼之间（普里莫尔斯基地区），哈巴罗夫斯克以南的乌苏里江上。

据已查明的事实情况来看，这次行动是中国政府经过长时间的准备后发起的。在1968年12月和1969年1—2月间，成批武装的中国士兵从虎林方向出动，几次入侵达曼斯基岛。遭到苏联边防军的抗议后，中国军队返回他们的边防哨所，或沿中苏之间指定的边界线行进。

在1969年3月2日事件中，驻虎林地区的边防部队仅扮演了一个次要角色。一支200多人的经过特殊训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队伍，被用来发动这次挑衅行动。这支队伍于3月2日天明前秘密进入达曼斯基岛，其成员均配有特殊装备，并身着伪装服。从中国一侧岸上还架设了一条通往该部队的电话线路。在此之前，炮兵部队以及后备队、军备物资和地雷、自动火炮、重机枪等军火都已汇集于中国一侧江岸附近。事后找到的那些稳定器、炮弹、地雷和手榴弹碎片以及遗弃在被击毁坦克中的木板箱等物，证明这些武器确曾被使用过。

莫斯科时间约2点钟左右（当地时间9点），我们的观察哨所发现，达曼斯基岛上有30名中国军人在前进。为此，我边防站派出一支队伍前往中方越界地。我方指挥员带领一支小分队向侵界地点靠近，打算如以往反复做的那样向中方提出抗议，要求（未使用武力）他们从苏联领土上退出去。但是，在双方交涉的最初几分钟内，我边防军就处于对方的交叉火力之下，中方未提出任何警告便在暗中开了火。与此同时，中方还从岛上的灌木丛中和中国一侧江岸上向我边防军余部开火。我边防部队接到战斗命令，并获边防站附近留守部队的增援，阻击中方的突然袭击，并采取果断行动，将入侵之敌驱逐出苏联领土。

双方均有伤亡。

当对岛上事件发生的现场进行检查时，发现了军事装备、电话和通向中国大陆的电话线以及大量散在的空酒瓶（这些酒显然是中方奸细及这次冒险活动的参加者在鼓足勇气开始行动之前所饮用的）。

达曼斯基岛既无居民，也毫无经济上的重要性；其附近方圆几十里没有村庄。人们显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该岛之所以被选为入侵的地点，是由于在那里可以秘而不宣地暗中为此次行动做准备，然后在世界上造成一种有利于该行动组织者的舆论倾向。

在挑衅行动中，中国军队对苏联边防军伤员施加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野蛮、残忍的暴行。根据对事发现场的检查和医学委员会对阵亡苏边防军人尸体检验的鉴定报告，表明这些伤

员都是被中国人用刺刀和匕首从近距离(或较近距离)击中的。一些伤亡人员的面部被毁得几乎难以辨认,还有一些阵亡者的军服和靴子被中国人扒走。中国人对苏边防军人犯下的暴行只能与 20—30 年代中国军阀和蒋介石部队的极其残忍的暴行相比肩。

毛主义新的危险的挑衅行径暴露出,北京意欲加强同帝国主义国家,首先是美国和西德的机会主义政治调情。正当波恩在西柏林举行的联邦总统选举中挑起事端时,中国军队发动了对苏边防分队的伏击,这并不是偶然的。

达曼斯基岛地区的挑衅行动是毛主义政策的一部分,其目的在于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内对外政策发生根本性转变,并使其国家转化成为一个与社会主义国家相敌对的政权。毛泽东集团很久以来就准备组织对苏中边界地区的武装侵犯。1960 年以来,中国当局人为地制造了苏中边界地区的紧张局势。从那以来,中国已制造了几千起带有挑衅目的的边界入侵事件。

1967 年初,中国当局的边界入侵次数急剧增加。在一些地区,他们试图在属于苏联的岛屿和那部分河流上进行边境巡逻。1967 年 12 月和 1968 年 1 月,中国方面在乌苏里江上的七里沁岛和卡萨克维奇运河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挑衅行动。1969 年 1 月 23 日,中国发动了一次对达曼斯基岛的武装攻击。

达曼斯基岛地区的边界是根据 1860 年的《北京条约》和 1863 年 6 月俄中双方代表签署的附件地图确定的。根据这些文件所划定的分界线,达曼斯基岛位于苏联的国土上。这条线一直处于苏联边防军的警戒内。

与中国的边界挑衅行动相反,多年来,苏联方面一直在采取步骤使局势正常化。

1964 年 8 月 22 日,(苏中边界)磋商中断。尽管我们一再提出会谈的建议,中国也不恢复会谈,甚至当 1967 年 8 月 31 日苏联外交部备忘录提出这一问题时,中国方面依旧毫无反应。

与此同时,中国当局继续严重违犯 1951 年苏中边境河流航行联合委员会会议所达成的协议。在 1967 年和 1968 年,他们还造成苏中边境河流航行联合委员会所举行的会谈破裂。该委员会是根据 1951 年达成的协议成立的。

中国在边界地区进行大规模军事备战(修建机场、通道、营房和仓库,训练民兵等)。中国当局在边界地区进行挑衅活动,有意识地造成边界冲突局面的形成。而在我们方面,则是采取一切措施防止边界冲突事件的发生,避免冲突局势逐步升级。苏联边防部队接到命令,不得使用武力,如果可能,要避免武装冲突。尽管中国人在许多情况下,玩弄骗人的鬼把戏,找碴儿斗殴,用刺刀一类武器、铁棍和其他类似器械攻击我们的边防战士,行为极具挑衅性,但不使用武力的命令仍被我方严格地执行着。

达曼斯基岛地区的武装挑衅行动是中国当局的路线、方针所致的逻辑性结果,是北京旨在加强反苏运动的长远计划的一部分。

1969 年 3 月 3 日以来,驻北京的苏联大使馆再次遭到经过特殊训练的毛主义团体的有组织的围攻。反对苏联驻华机构代表的野蛮、残酷的暴行在全中国每天都有发生。中国全

国上下燃起了激烈的反苏运动的烈火，其特点在于，整个运动蒙上一层军事色彩，整个国家笼罩在一种狂热的大国沙文主义气氛中。

苏共中央政治局和苏联政府鉴于所面临的这种局势，采取了必要的步骤，以防止边界入侵行动的进一步发展。为了挫败毛泽东集团制造苏联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敌对情绪的罪恶计划，苏共中央政治局和苏联政府将去做一切必要做的事情。

苏联政府通过表示友好的感情来引导其与中国人民的关系，并打算在将来继续实施这种政策。中国当局这种恶意的挑衅行为将遭到我方的断然回击，同时，我方决心结束这种局面。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 17 卷，第 4361—4364 页

№22892

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中苏边界冲突及越南和谈问题

(1969 年 3 月 11 日)

3 月 11 日。

午餐的时候，我与基辛格两个人在我们的大使馆举行了会谈。

1. 基辛格说，由于美苏即将就近东问题相互交换意见，尼克松总统希望能够找到稳定近东局势、和平解决问题的途径。

基辛格接着说，美国方面将由美国助理国务卿西斯科参与这次会谈，同苏联方面交换意见。但是，如果下一阶段双方进行交换意见的会谈需要转到莫斯科举行时，将由美国驻苏联大使比姆参与会谈。第一次会谈于星期五或者星期一在这里举行。为了同美国领导人交换意见，今天，以色列外交部长埃班到了美国，当他离开华盛顿的日期比较明确的时候，西斯科将会立刻另行向我通报这件事情。

基辛格接着说，他受委托向我转告，如果在同西斯科进行交换意见的过程中，“由于美国助理国务卿过于外交化的辞令”而产生了“一些不明确的问题”，并且需要确定“美国方面更为真实、更具权威的意见的时候，或需要就某一微妙的问题进行开诚布公的会谈的时候”，我可以秘密地向他基辛格——尼克松总统的助理寻求帮助。关于这一点基辛格又说，尼克松总统真诚地希望在一系列复杂的问题上能够取得进展，解决近东问题。

我对基辛格说，在必要的时候我们将采纳这一提议。

2. 基辛格推心置腹地说，尼克松总统已经决定建造有限的导弹防御体系，尽管下周才

会宣告这一决定。

3. 基辛格想了解苏中边界事件,我根据现有指示的精神向他做了说明。

基辛格指出,美国人做出的评价是,只要毛泽东还活着,苏中关系将不能实现正常化,但是,用基辛格的话来说,使他们没有料到的是,北京领导人现在就直接同苏联发生了边界武装冲突。

在谈到关于他们现在对苏中边界冲突这一事件的评价时,基辛格说,对这一事件可以从两方面进行评价:短期性方面的评价和长期性方面的评价。

如果从短期性方面进行评价,那么他们没有看到中国对苏联有什么真正重大的军事威胁,"无论中国人会挑起什么样的事端"(他没有明确说出这种事端可能具有的性质,只是说"中国人的行动总的来说很难预料")。

如果从长期性方面进行评价,那么在他们看来:如果中国成为敌对国家,中国的长期威胁将会成为一个重大的因素,这是苏联未必能够忽视的,尽管考虑到现代化武器,从军事的角度来说,这种因素将不会像在常规武器时代和军队的数量起作用的时代那样具有决定性。

基辛格自己主动保证说,尼克松政府"不打算利用"中苏关系所造成的紧张局势。

基辛格说,在此之前,他们就准备在一定程度上同中国改善关系;关于改善关系下一步应该由他们(中国方面)提出意见("但是我们不能满足他们现在提出的关于台湾问题的要求")。

基辛格继续说,尼克松新政府确信,只有通过同苏联进行合作,苏美双方在一定程度上取得相互理解,他们才有可能在如下三个方面取得成功:调解近东冲突,调解越南问题以及保持欧洲的稳定(关于保持欧洲的稳定这一点,基辛格指出,他们完全支持苏联提出的关于维持欧洲现状、增多西方大国进入柏林的通道的提议,关于这一点"可以另行交换意见,并考虑到苏联方面在1959—1963年提出的关于解决德国问题的一揽子建议")。

基辛格接着说,现在美国政府的领导人都是"现实主义者,他们都明白,无论是在现在或是在将来(至少在尼克松政府的这届任期内),中国都不会在解决上述问题中起到主要的作用"。用他的话来说,美国政府将努力改善同苏联的关系,也将努力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同时将避免介入他们有争议的问题和矛盾,因为那样做将会反过来损害美国自身的利益。

根据基辛格的上述言论以及其他的迹象判断,对于中国人近来采取的行动,尼克松政府愿意向我们保证美国的"中立",甚至愿意表示对中国人某些行为的"不赞成"。同时,从各方面来看,美国政府非常关注苏中关系的发展,并在他们的对外政策中尽力考虑到苏中关系,在一些对外政策问题上持谨慎的态度。

在同基辛格进行谈话的过程中(以及在同美国国务卿罗杰斯进行的谈话中)我们都在努力增加美国人对中国人行为的谨慎和警惕,向美国人显示,中国在达曼斯基岛的军事挑衅行为是北京对外政策计划中的一部分,是现在的中国领导人推行的大国沙文主义路线的一种表现,中国现在的领导人希望培养中国人民对邻国人民的仇恨(并且还不仅仅是对邻国人民的仇恨),为他们新的、更具冒险性的对外政策、其中包括对亚洲国家更具冒险性的对外政策

创造一种氛围，并以此来证明这种政策的正确性。

4. 基辛格在这次会谈中也提出了关于就越南问题举行巴黎谈判的问题。

基辛格援引前不久，我同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就越南问题进行的会谈(这次会谈是根据罗杰斯的提议于 1969 年 3 月 8 日举行的)说，我在同罗杰斯举行的会谈中没有对美国政府的立场产生完全正确的印象，他对此表示"担心"(当时罗杰斯对我说，洛奇正在准备新的指示，以便对美国、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和西贡四方将要在巴黎举行的秘密会谈提出建议，美国打算在这次会谈中不仅仅讨论军事问题，而且还打算讨论关于解决越南问题的政治问题，并且，他们美国人根本就不愿意把军事问题同政治问题严格地区分开来，至今他们仍然持这样的观点)。

基辛格说，美国政府在巴黎谈判中的立场可以被归结为如下几点：

再过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准备向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提议举行一次秘密会谈或一系列的会谈(基辛格说的"再过一段时间"的意思是要有足够长的时间，以便确定今后南越军事局势的发展：游击队是否继续对南越的城市展开猛烈的攻击，如果继续攻击的话，他们美国人就会一直反对提出关于举行秘密会谈的建议)。

在这些会谈中，美国方面将会"务实地"提出相互撤军的问题：美国从越南撤军，越南民主共和国从南越撤军。基辛格说，他们认为这个问题特别重要，而且他们甚至愿意提出关于他们准备撤出的军队的数量、撤军的日程和日期等问题。

基辛格说，他们希望，在此之前能够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代表和西贡代表同时进行秘密会谈，讨论关于通过政治途径解决问题的方法。基辛格说，他们有材料显示，对于同西贡进行接触，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方面不会坚决反对，而西贡方面也不反对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方面进行建设性的对话，无论这种接触和对话是否公开进行。

在谈话就要结束的时候，基辛格说，这些双边会谈可以被纳入四方秘密会谈中同时进行，以便就各个问题进行讨论。

基辛格关于这两场双边谈判的计划和构想以及他为这两场谈判确定的任务是：在尼克松政府看来，这一构想以及美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将讨论撤军问题这一事实本身就可以对参与会谈的双方(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和西贡)施加压力，这可以"很好地提醒越南人，他们应该抛开个人的情绪，现实地寻找相互妥协的途径"。基辛格说，这指的是，美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之间的谈判，除了具有其直接的意义之外，还将对越南双方的代表施加压力。

基辛格说，美国新政府和尼克松总统本人，都很关切关于从越南撤出美军这个问题。"我们是非常开诚布公地谈论这个问题的，但是，我们不能也将不会使这一问题的解决看起来好像是美国的失败，看起来好像是由于没有达成任何协议，美国单方面从越南撤出了自己的军队。""这样做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这样做的话尼克松就得不到白宫的支持。"

至于政治解决越南问题，基辛格又重述了早先对我说过的话。他们的意思是，他们不能

容忍在刚刚签署协议之后,就立刻使南越政权发生变更,或立刻就在南越实行急剧的政治变革。这将为人们指责尼克松政府提供口实,人们会指责他同敌人进行了"密谋",背叛了"盟友"等。

另一方面,如果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或是在"正常的政治发展过程中"逐渐推行了某些政治变革,并且这种变革是由越南人自己推行的,那么美国将会认可这样的变革,不管到时候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或取代它的其他组织在这一变革中产生了什么样的作用。

基辛格也指出,他们很清楚河内关切的是什么,很清楚莫斯科很关心越南干部今后的命运,也很清楚谁会支持他们和平解决越南问题。基辛格说,"我们不仅仅清楚这些,而且还准备讨论所要采取的相关措施,以便撤换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危险的领导人,以便不发生类似最近几年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身上发生的那些事情,我们不希望,支持我们(美国)的人都被屠杀殆尽"。

基辛格和其他美国的官方代表一样,他们都表示,非常希望苏联在解决越南问题上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

关于这一点我又向基辛格阐述了苏联的立场:如果美国想使巴黎会谈取得成果,那么,就不能忽视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不能再把解决军事问题同解决政治问题区分开来,在考虑西贡政权的时候,不能忽视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在事实上起到的作用。基辛格试图掩盖自己的图谋,他说,尼克松政府和尼克松本人都"热爱和平,但是不得不焦急地等待着越南的另一方开始进行建设性的对话",他企图通过说这样的话对我施加压力,我也果断地引开了他提出的这个话题。

应该说,基辛格事实上是在尼克松总统的许可下宣布取消罗杰斯的代表资格,这显然证明,尼克松政府内部在对外政策的选择问题上存在着斗争,持不同意见的各派相互进行着斗争,试图对总统施加影响。

正如我们所了解的,基辛格在很早(这指的是,其中包括,1月份他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出的建议)以前就提出了上述计划,即进行两个阶段的会谈,或者美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和西贡同时进行会谈。正如从他的言论中可以得出的结论一样,他至今仍然确信,他的这个计划事实上使得对于美国来说比较重要的撤军问题的解决成为可能,同时这个计划还可以使美国人最低程度地卷入这场就政治解决南越问题进行的谈判中,而现在看来,这场谈判是毫无前景的(正如他暗自想的一样)。

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发表了强硬的声明,他们声明说,不应该完全不让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参与谈判,如果不能满足他们提出的这个要求,那么,越南民主共和国将不会同美国在巴黎进行秘密谈判,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也不会同西贡的代表进行谈判。我们对这些声明表示了支持。看起来,这对罗杰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A. 多勃雷宁

АВПРФ, Ф. 0129, оп. 53, п. 399, д. 5, л. 143–149

№25956

梅尔库洛夫致吉尔吉斯党中央报告：加强边防军战斗准备的问题

(1969年3月24日)

绝 密
文本第1份

苏联部长会议克格勃东部边境军区军队管理局
1969年3月24日
第14/059号
阿拉木图市

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苏联部长会议克格勃东方边防军区部队司令部和政治部，鉴于苏-中边境局势继续恶化和联盟部长会议克格勃主席关于加强边防军战备的指示，拟研究和积极解决如下问题：

——在边防区党委例行全会上讨论“关于通过揭露毛泽东集团的反苏分裂活动和培养劳动者警惕性来强化党组织工作的问题”；

——在边区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就“共产党员在培养劳动者警惕性和揭露中国反苏宣传本质方面的任务”问题召集党的会议；

——就苏中边境军事-政治挑衅的本质和提高警惕性的任务等问题对边区劳动者开展解释工作；

——在中央机关、州委和共青团区委全会上讨论关于吸引青年保卫边界和在边境地区展开共青团-青年警惕性突击检查等问题；

——今年5月，以边防工程技术装备为主题举办共和国共青团-青年宣传月活动；

——派遣演讲-报告团、音乐队和艺术家团体前往边防部队、工厂和边境居民点，给予部队政治组织和地方党组织实际帮助，加强当地居民和边防军的党-政思想工作。

——指示区党委、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志愿纠察队指挥部根据道德思想品质、业务能力和健康状况在各边境居民点选拔纠察队员，培训其使用武器，以便在局势复杂情况下武装和吸收其执行作战任务(附录居民点和战斗小组人员清单)。

每个此类人民志愿纠察队战斗小组均固定配备必要数量的交通工具。

边境地区各医院须配备医疗救护车辆、药品储备和通讯工具，以便在边境局势恶化时能在第一时间提供医疗救助。

各战斗组要进行日常学习、培训和作战射击训练。鉴于此,应指示各区委、区招委和人民志愿纠察队指挥部对于此类活动积极予以协助。

附录:1页。[1]

苏联部长会议克格勃东方边防军区司令
梅尔库洛夫中将(签名)
苏联部长会议克格勃东方边防军区政委
拉斯波平上校(签名)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20卷,第1085—1086页

№10463

苏联政府致中国政府照会:关于苏联援越物资过境问题[2]

(1969年4月[3])

苏联政府责成苏外交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做出如下声明。

3月6日,苏联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驻京代表打算预先通知中国方面,大约10天后的3月16日,苏联军列将抵达满洲里火车站。这次军列是根据1968年2月10日中苏双方就通过中国国土运送苏联军备物资问题所达成的协议发出的。

苏方代表曾三次要求中国政府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一处会见他,以使他能就此事通报情况。但是对方以该机构官员"忙"为借口,拒绝见他。

这次会见直到3月8日才举行。会见中,中国政府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的代表詹勤泽(Jan Cin-dse)断然拒绝接受此通知,并争辩说这个消息传递得"迟"了。为答复此种说法,苏联代表指出,他曾几次要求获得接见,以便能通报关于这批货物符合1968年2月10日中苏协议提出的最后期限的情况,而中方两天来却一直回避与他会见。对此,詹勤泽解释说,"任何时候他都愿意接见苏联代表团"。这次会谈是在中国代表粗暴的腔调声和可恶的反苏激情中进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代表的这种行为,其目的在于为将苏联的武器和军需物资运送给

---

① 在所收集的档案中没有该附录。——编注
② 该档案系在美国刊物上发表的俄国档案的节录英译本。——编注
③ 该档案未标明文件的具体日期。——编注

战斗中的越南人民制造障碍，并构成对中苏2月10日协议的违犯。

苏联政府再次提请中国政府关注这样一个事实，即它对中断将苏联物资运送给正在抗击美帝国主义侵略的英雄的越南人民，负有重大责任。

……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7卷，第4365—4366页

№10277

苏联政府致中国政府照会：中国为苏联援越物资过境设置障碍[1]

(1969年4月[2])

……

最近，中国当局重又开始为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援助的武器及军需物资经中国境内运往越南民主共和国设置障碍。

越南朋友对越南和中国就1969年将援助物资从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运送至越南问题进行磋商的结果，极为关注。他们强调说，"中国要使越南脱离苏联，因此为物资的运输制造困难，这样，军援物资的问题也将变得非常困难"。越南同志完全没有考虑到会出现这种可能，即苏联军备物资经中国运往越南的货物运输活动将会完全终止。

自1969年1月以来，中国人拒绝运送苏联交付越南使用的军用车辆。由于中国的这种做法，迫使苏联在1至3月期间几次推迟发出援越导弹技术物资列车。

……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7卷，第4366—4367页

---

① 该档案系在美国刊物上发表的俄国档案的节录英译本。——编注
② 该档案未标明文件的具体日期。——编注

№22894

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巴黎会谈及中美关系

(1969 年 4 月 2 日)

4 月 2 日。

同基辛格举行了会谈，在这次会谈中谈到了以下问题：

1. 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对所有欧洲国家发出的呼吁。我依据我国对驻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使们所下达的指示向基辛格详细地解释了社会主义国家采取的这一行动的原因。

基辛格仔细地听取了我的解释，然后问道，(苏联)期望美国在全欧会议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用基辛格的话来说，因为这对尼克松政府对上述呼吁做出评价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

我回答基辛格说，大使馆得到的指示的精神是，因为谈及的是关于欧洲的安全问题，因此应当由欧洲国家自身来讨论关于美国参加这次会议的问题，他们应当好好想一想，作为非欧洲大国的美国应当参与这次会议中关于哪些问题的讨论，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参与这次会议。(在解释我们的指示时也应当指出，不应留下一种印象，好像我们反对美国以任何形式参与全欧会议。)

基辛格说，总的来说，这一解释非常重要，他今天就将同尼克松(他已经去了佛罗里达过复活节)联系，并告知他这一点。

基辛格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他说，他们已经对华沙条约国发出的呼吁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并且事先认为，这一呼吁是非常克制而郑重的，白宫认为这份呼吁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然后，基辛格解释说，或许，一周后在华盛顿召开的北约委员会会议将会审议这一呼吁。

根据得到的指示，我在会谈中指出，欧洲局势在很多方面都取决于整个国际局势，应尽快采取行动，消除世界其他地区(近东、越南)的紧张局势和危险的根源，为缓和和巩固欧洲安全创造条件，并协调相关国家的行动，达到这些目的。基辛格说，至于近东问题，他认为最好是在过一段时间后能够同我另外进行详细的会谈。

2. 越南问题。关于越南问题，其中包括巴黎谈判问题，基辛格说，美国代表团已经同北越人进行了几次秘密会谈(基辛格说，“也许，你们对这些会谈都很清楚”)，但是这些会谈都没有取得任何成果。

我问道，目前美国的实际立场是什么。基辛格回答我说，他们仍然认为，应该同时举行两场会谈，美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就军事问题举行会谈，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和西贡政权之间就政治问题举行会谈。在经过一定的阶段之后，再把这两场会谈合二为一。

基辛格说，他们现在还不准备让达成的军事协议生效，直到就政治问题的主要框架达

成协议，尽管看起来，不需要等到把所有的问题都完全确定下来。基辛格继续说，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方面愿意最终和平解决问题，这是具有一定的保障的，他们不必担心类似发生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身上的那种事情，但是另一方面(西贡方面)毕竟还是希望他们得到一定的保障(关于这一点，基辛格抱怨说，对于“说服”阮文绍、阮高其等人，他是多么困难)。

关于军事行动，基辛格说，美国不打算在进行巴黎会谈期间扩大对越南采取军事行动的规模，但是这不意味着“如果另一方(北越)加强了自己的军事行动，美国有不采取相应的军事措施的义务”。

基辛格补充说，他们目前还没有任何扩大军事行动的计划。

基辛格说，“我们也非常清楚，加剧军事行动会不可避免地损害我们同苏联的关系。因此，如果局势的发展迫使我们不得不采取一些重大的反击措施的话，那么，看起来，我们将不会再通知苏联我们所采取的这些措施的动机，这些措施不是特别地针对苏联的。在任何情况下，莫斯科都不要把我们在越南采取的某一行动，看作是华盛顿忽视了从苏美在越南冲突的角度看待问题，或进一步把这看作是华盛顿不重视美国同苏联发生关系，而尼克松政府认为，美苏关系具有最为重大的意义。这一点非常重要”。基辛格补充说，然而，他们不希望事态发展到这个地步。

基辛格也顺便提到，并且略带强调的口吻多次强调说，在对待和平解决越南问题的条件上，尼克松总统“不能完全不考虑1972年的总统选举”。基辛格说，“美国政治生活的逻辑就是这样”。

关于这个问题我对基辛格说，在公正的条件下把美军完全从越南撤出，尽快结束越南战争，比起固守和拖延战争，将会给执政党及其总统候选人带来更多的选票。这在上一届政府身上就表现得非常明显。

总的来说，从基辛格的谈话中可以明显看出，他们暂时还不愿意抛弃西贡的阮文绍和阮高其政权，并且仍然指望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在同他们在巴黎或其他地方进行的接触中会最终作出让步。关于这一点应该指出我同基辛格进行的一段简短的谈话。基辛格说，在巴黎进行接触或许对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是不合适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另找地点进行接触，取代在巴黎进行的会谈。

对此我答复他说，问题不在进行接触的地点，而在于西贡政权本身，他们仍然不愿考虑南越的现实状况，仍然像以前一样指望借助美国的军事力量，通过武力来解决问题。

基辛格在最后说，他们将继续研究关于越南问题的各个方面，看起来，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他们会同意我就这些问题提出的这些想法。

3. 中国问题。有消息说，白宫成立了一个以基辛格为主席的专门委员会，研究美国同中国最近的关系，基辛格确认了这一消息，尽管他补充说，这“没有什么不同寻常的”，因为这样的委员会他已经领导了大约六个，而且都是为解决最为重要的问题而设立的。

基辛格接着说，他同尼克松总统就中国问题交换了几次意见，因此，他知道，在同B. B.

库兹涅佐夫举行的会谈中[①],尼克松总统已经非常开诚布公地说出了他个人的一些想法,这些想法就是:现在世界上有美苏两大强国,两国都拥有巨大的经济能力和军事潜力,但是二十或二十五年之后形势就会发生变化,因为可能会出现另一个强国,这就是中国;因此,苏联和美国要利用一切可能对国际事务产生影响,制定和作出一些决议,使国际事务向良好的方向发展,维护世界和平。

基辛格接着说,他们现在正在考虑,在现在正在召开的这次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之后,中国会实行什么样的政策,美国和中国是否存在改善关系的某种可能。

基辛格说,他还利用他们的一些欧洲朋友的帮助,对北京的意图进行试探,确定在哪些领域可以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在贸易方面、互换报刊代表方面、文化联系方面等)。

基辛格补充说,同时,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不会把台湾交给中国。除此之外,他们在处理有关美中关系事务的时候,"都是非常灵活而没有成见的"。

基辛格继续说,总的来说,大部分美国专家都认为,只要毛泽东还活着,美中关系就未必能得到发展。但是,如果可能的话,他们仍然要尽力为双方今后关系的发展打好基础,他们仍然认为,这样做是不无裨益的。无论怎样,中国都是一个拥有七亿人口的大国,这一点不能不考虑到。

基辛格继续说,尽管他们的专家还不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的关系具体会怎样发展,因为这将取决于谁来接管北京政权。但是,他们认为,在毛泽东死后,美国仍然比苏联更容易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因为到那个时候,莫斯科和北京之间仍将存在严重的意识形态分歧(为争夺共产主义世界的领导权)和领土分歧。中国同苏联接壤,并且拥有漫长的边界线,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因素。

基辛格补充说,美国方面,当然也会面临一定的困难,因此华盛顿方面目前还不会抱太大的幻想,因为任何一届美国政府都不能忽视:中国位于亚洲大陆的中央,美国在这一地区拥有重大的生存利益,美国完全不会在这些利益上向北京让步,尽管"我们不希望北京无事生非"。基辛格说,因此,位于亚洲大陆中央的中国,其政治如何发展,绝不是美国可以漠然置之的。

基辛格说,因此,他们正在密切关注着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因此,华盛顿组建了一个拥有大批中国问题专家的小组,对北京现在发出的"每一点声音"进行仔细的研究,以便确定中国领导人现在想的是什么。白宫认为,中国共产党召开的这次代表大会将对中国今后的发展产生直接而重大的影响,尽管美国目前还没有多少关于这次代表大会的可靠资料。

在会谈过程中,当谈到美国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改善同中国关系的意图的时候,基辛格援引了尼克松本人的意见,他强调说,美国现政府不打算打中苏关系牌,并且认为,第一,改善

---

① 库兹涅佐夫带领苏联代表团参加了艾森豪威尔的葬礼。尼克松总统同苏联代表团在1969年3月31日举行了会谈。——原注

同苏联的关系是美国现政府最为重要的任务，第二，企图利用中苏矛盾将不利于美国，会使苏联和中国都更加疏远美国，特别是，在目前北京的政策还不是非常明确的情况下。

顺便说一下，基辛格也指出，华盛顿"也有一些人倾向于打苏联和中国牌，这些人认为，美国同中国接近首先可以加强美国在全球的地位"。

基辛格接着说，美国的一些自由主义者，特别是民主党内的一些自由主义者，例如小肯尼迪、索伦森等人现在在谈论美国对中国政策的时候都持这种观点。看起来，这种观点可能会引起莫斯科的警觉。

基辛格确信地说，然而，尼克松政府不同意所有这些观点。(基辛格的这些话显示，美国两大政党出于选举斗争的考虑，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开始对政府的对外政策施加影响，看起来，同他们的竞争对手民主党相比，自由党在对这个问题上显示了他们更加有利的地位。)

总的来说，从基辛格关于中国问题的这些谈话中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尼克松政府现在非常关注中国局势的发展，在盘算着，在不使美国同苏联这个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复杂化的情况下，同时找到同北京改善关系的途径，并且不排除将来在某种程度上利用中苏矛盾的可能。但是，现在感觉他们采取的是一种观望政策，这是因为，第一，对于中国能否现在就急剧地改善同美国的关系，他们明显还没有信心，第二，他们的考虑是，在尼克松执政期间(4年甚至8年)，苏联在军事上将比中国占据明显的优势，因此，相对于同北京的关系而言，同莫斯科的关系对美国来说仍然是最为重要的。

当然，这并不能说明不存在美国不可避免地会利用苏中分歧这个问题，尽管目前事态只是渐渐地在朝这个方向发展。他们已经向我们谈论了关于美苏关系优先于美国和中国关系的重要意义，尼克松政府对我们强调说，他们的行为是"慎重的"，希望莫斯科在对外政策方面能够对此予以正确的评价。

应当指出，在谈到美国寻求同中国改善关系的意图的时候，基辛格说，他们不希望把这看作是企图同中国建立关系的举动。因为远远还没有走到这一步，而且这种看法本身也显示，他们同我们的关系的发展"还不完全顺利"。基辛格再次说，这所涉及的利益众所周知。他再次向我强调了尼克松总统早先就美国对东欧政策相关问题委托他转告给我的话：他关于这个问题所说的话仍然完全有效(在会谈过程中，基辛格完全没有提及最近发生的捷克斯洛伐克事件)。

4. 在就越南问题进行的会谈中，我问基辛格，美国社会研究所的一名领导人哈里斯是否有全权代表基辛格同苏联代表在纽约就越南问题进行接触。

基辛格非常肯定地说，他没有给哈里斯任何权限就这个问题进行会谈。诚然，哈里斯曾说，他同苏联在纽约的代表进行了很好的接触，并答应，保证把他从苏联代表那里得到的信息马上就发送给基辛格。基辛格说，他当然没有反对哈里斯这样做：如果这些信息是有用的，为什么不得到它们呢？

基辛格说，但是，哈里斯对苏联代表所说的话完全不代表白宫的意见，而是纯属个人看

法。对此莫斯科方面应当明白。

基辛格强调说，尼克松总统给他有明确的指示：只通过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同苏联代表进行非正式的接触。他基辛格只执行这一指示。

在会谈的最后基辛格表示，希望在4月10—11日，北约理事会会议在华盛顿召开之后，能够同我进行非正式的会见，两人能够共进晚餐，就如下问题进行略谈：欧洲事务问题、近东问题、裁军问题以及关于苏美关系的其他问题。

我的答复是同意进行这次会谈。

A. 多勃雷宁

АВПРФ，Ф. 0129，оп. 53，п. 399，д. 5，л. 177－184

№25955

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决议：加强中苏边境地区的政治教育

（1969年4月3日）

绝密，特别重要
“特别卷宗”

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1969年4月3日第12次会议第106号记录

关于在吉尔吉斯边疆地区加强政治教育工作

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指出，共和国的劳动者们对苏联政府就中国政府在苏中边界地区的挑衅发表的声明高度一致地予以欢迎，他们热烈地赞同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列宁主义对外政策，赞同为保障我们祖国的神圣边界的不可侵犯和完整而采取的一切措施。

鉴于毛泽东集团的危险行动，党组织应当在广大的居民中加强教育工作，保持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和警惕性。

为了加强边疆地区党组织的工作，揭露中国反苏政策的实质和北京领导人的挑衅行动，使居民对苏中边界局势的加剧保持警惕，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决定：

1. 责成奥什州、阿赖斯基、乌兹根州、阿特巴希、天山、贾特-奥古兹和杰特-奥古兹斯克、丘普斯克地区的党委：

在1969年4—5月的地区党委全体会议上审议这一问题；

在边界地区的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基层党组织中就提高劳动者的警惕性和揭露中国领导人的反苏分裂活动问题召开会议；

在边界地区的所有居民中开展大规模的解释工作，解释在苏中边界地区的政治军事挑衅的本质，以及提高劳动者的警惕性的任务。

2. 责成吉尔吉斯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在中央局、奥什州委和边境地区的共青团全会上研究关于吸收青年保卫国家边界、就青年共青团员的警惕性开展突击检查的问题。

今年5月，就边界地区的工程技术装备在加盟共和国开展青年共青团员月活动。

3. 应向边境的一些队、哨所，以及边境的居民点派遣一些作报告的小组、举办音乐会的工作队、艺术家小组对部队的政治机关及当地党组织提供实践上的帮助，在居民和边防战士中加强党的政治工作。

4. 各区党委应依据思想政治品质、业务素质和健康状况在边境居民点内挑选义勇队员，并训练其使用射击武器，以便在形势恶化情况下武装和吸收其参与作战任务(附录居民点和战斗队人数清单①)。

每个此类战斗队应配备固定的、随时待命的必要数量交通工具。

这些战斗队应协同军队开展日常学习、训练和射击。

5. 责成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卫生部确保边境地区各医院和医疗所拥有救护交通工具、药品储备和包扎手段，并由专门人员负责卫生业务培训，以便在边境形势恶化情况下提供基本的医疗求助。

6. 为激励那些在保卫苏联国家边境、单兵作战和政治素质等方面取得优异成绩的边防军，决议认为，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和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应设立先进红旗奖项，每年授予部署在吉尔吉斯境内的最优秀边防部队。

委托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宣传部、行政和贸易机关对该决议的执行进行监督。

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书记

T. 乌苏巴利耶夫(签名)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20卷，第1087—1089页

① 在所收集的档案中没有该附录。——编注

№25957

吉尔吉斯奥什州委决议：落实在中苏边境地区加强政治教育的决议

（1969 年 4 月 16 日）

绝密，特别重要
“特别卷宗”

吉尔吉斯共产党奥什州委 1969 年 4 月 16 日第 2 次会议第 34 号记录

关于落实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 1969 年 4 月 3 日“关于在吉尔吉斯共和国边疆地区加强政治教育工作”的决议

吉尔吉斯共产党奥什州委会指出，本州劳动者一致赞成苏联政府就中国当局在苏中边境地区的挑衅活动所发声明，热烈拥护和支持苏联政府和共产党所执行的列宁主义外交政策，及其为确保我们祖国神圣边界的安全和不受侵犯而采取的所有措施。

鉴于毛泽东集团所采取的危险行动，各级党组织有责任加强各阶层广大人民的思想教育工作，确保其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和警惕性。

鉴于中苏边境局势恶化，为加强边境地区党组织工作、揭露中国反苏政策和北京领导人挑衅活动的本质、提高民众的警惕性，吉尔吉斯共产党（奥什）州执委机关做出如下决议：

1. 责成阿尔泰和乌兹根区党委：

——在 1969 年 4—5 月举行的区执委全会上研究这个问题；

——在边境地区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基层党组织中就共产党员在提高劳动者警惕性和揭露中国领导人反苏分裂活动的本质等问题召集党的会议；

——就苏中边境军事、政治挑衅的实质和提高劳动者警惕性的任务等问题，在各区全体居民中开展广泛解释性工作。

2. 责成吉尔吉斯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奥什）州执委，在州执委机关和边境各共青团区委全会上研究关于吸收青年参与捍卫国境和开展加强警惕性的共青团—青年突击检查活动。

本年 5 月，在全州范围内举办边防工程技术装备共青团—青年月活动。

3. 责成奥什州执委，通过空中交通管理局采取措施，加强州边境地区的交通制度，确保应有的通关秩序，以便夏季从乌兹别克共和国的安迪让斯克和费尔干纳诸州，塔吉克共和国各地区和奥什州因公来访的畜牧专家的旅途顺利。

整顿通往国境附近各居民点的道路和专线，在本年5月份建成直达乌兹根区克孜勒-扎尔村的电话线路。

4. 责成州文化局(马杜马罗夫同志)向各边防部队、哨所，以及边境居民点派遣演讲——报告组、音乐队和艺术团体，以实际行动帮助部队党机关和地方党组织加强居民和边防军的党政思想工作。

5. 区党委应依据思想政治品质、业务素质和健康状况在边境居民点内挑选义勇队员，并训练其使用射击武器，以便在形势恶化情况下武装和吸收其参与作战任务(附录居民点和战斗队人数清单①)。

每个此类战斗队应配备固定的、随时待命的必要数量交通工具。

这些战斗队应协同军队开展日常学习、训练和射击。

6. 责成州卫生部，确保边境地区各医院和医疗所拥有救护交通工具、药品储备和包扎手段，并由专门人员负责卫生业务培训，以便在边境形势恶化情况下提供基本的医疗求助。

7. 据悉，为激励那些在保卫苏联国家边境、单兵作战和政治素质等方面取得优异成绩的边防军，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设立了吉尔吉斯党中央和吉尔吉斯共和国部长会议先进红旗奖项，并将每年向部署在吉尔吉斯境内的最优秀边防部队颁发。

责成吉尔吉斯共产党州执委宣传、行政和财政-贸易机关等部委负责监督上述决议的落实情况。

吉尔吉斯共产党州委书记
С. ИБРАИМОВ(签名)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20卷，第1089—1092页

№10407

苏共中央政治局决议：加强中国学的研究队伍和科研工作

(1969年4月28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1969年4月28日会议第71/1г号记录

第1项　关于加强中国学研究队伍的培养和改善中国学科学研究工作。

① 在所收集的档案中没有该附录。——编注

(基里连科同志、苏斯洛夫同志、杰米切夫同志、乌斯季诺夫同志、卡图谢夫同志、索洛缅采夫同志、卡皮托诺夫同志、H.米哈伊洛夫同志、梅夏采夫同志、斯拉德科夫斯基同志、罗满宁同志、特拉佩兹尼科夫同志)

1. 赞同关于扩大培养中国学干部和加强对中国的科学研究工作的措施(附件)。

2. 责成苏共中央科学和院校部以及苏共中央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部对该措施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

附件:

第71/1r号记录

关于扩大培养中国学干部和加强对中国的科学研究工作的措施

一、苏联部长会议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基里林同志)应该在培训科学教育干部的年度计划中,规定高等院校和苏联科学院中国问题研究生部,每年招收研究生达50人。

二、批准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每年招收5—7名中国学研究生。

将中国经济和政治问题专题课纳入苏共中央、各加盟共和国高级党校以及州际的高级党校教学计划中。

三、苏联部长会议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和苏联高等中等专业教育部协同苏联外交部(葛罗米柯同志)在科学文化联系年度计划中规定派研究生和科学教育工作者前往日本、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大学实习(每年派出人员20名,期限6—12个月)。

四、苏联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部以及苏联教育部,应该组织提高专业水平以及中国学教师的进修活动,保证专门住宿学校汉语学习的完善。

五、为了协调和完善中国问题的科学研究工作计划,苏联科学院(克尔德什同志)、苏联高等中等专业教育部(叶留金同志)与苏联部长会议出版委员会(米哈伊洛夫同志),在一个月期限内,制定苏联科学院科研所和国家高等院校1970—1975年期间中国问题研究和出版的综合协调计划并将其提交苏共中央。

整个科学研究活动的协调工作由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负责。

六、1969—1970年期间准备完成以下出版工作:

(一)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斯拉德科夫斯基同志)、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加富罗夫同志),负责出版面向广大读者的科普读物《中国历史》;

(二)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同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费多谢耶夫同志)和国际工人运动研究所(季莫费耶夫同志),负责出版《中共党史概述》;

苏联部长会议出版委员会保证以上著作的出版。

七、苏联部长会议出版委员会同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经与苏共中央办公厅协商，在一个月期限内研究并作出决定，公开出版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信息公报的资料。

八、委托苏联科学院，在苏联科学院远东分院设立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分支机构。

九、苏联科学院在今年的6月1日前，应该向苏共中央提交关于加强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物质基础和改善该所研究人员物质保障的提案。

ЦХСД，ф. 4，оп. 19，д. 543，л. 2，37－38

№10408

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关于巩固苏联在香港阵地的一些措施

（1969年5月13日）

苏共中央书记处1969年5月13日会议第72/111г号记录

第111项　关于加强苏联在香港的地位的一些措施。

责成苏联外交部、苏联对外贸易部、苏联海军部、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与其他有关组织一起，共同研究苏共中央办公厅关于这一问题的报告，并在一个月期限内向苏共中央提出建议。

ЦХСД，ф. 4，оп. 19，д. 544，л. 33

№22347

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宣传措施计划

（1969年5月28日）

苏共中央书记处1969年5月28日会议第73/185г号记录

中央书记处1969年5月28日表决通过的决议

第185项 关于针对中国问题宣传措施的计划。

一、同意关于针对中国问题宣传措施的计划(见附件)。

二、责成苏共中央宣传部、苏共中央组织部以及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对该计划的完成情况进行监督。

三、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和苏联财政部同有关组织一起,在两周期限内提出关于与实现本计划有关的一切开支(包括外汇)的资金来源的建议。

四、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应与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国际部,就其代表例外会晤问题进行磋商,以对"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总结报告作出一致评价,并为此准备关于中国问题的共同资料。

附件:

第73/185r号记录

关于针对中国问题宣传措施的计划

在党的教育工作和群众政治工作领域:

一、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各级教育组织中,加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问题的研究,加强苏共反对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者的斗争,加大力度揭露在"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文件中固定下来的中国领导人反社会主义的方针。

规定进一步扩大初级政治学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学校、党的骨干分子学校、马克思列宁主义大学和理论知识进修班的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同时考虑将一些补充课程和专题课列入其中,举办座谈会、理论性代表会议以及其他形式的学习,使学员能够更深入地学习和分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及同中共领导人政治方针和立场作斗争的迫切问题。

二、为提高培养在各级组织中从事党的学习和群众政治鼓动工作宣传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在共产党和工人党协商会议召开之后,开办地区的、加盟共和国的和州的进修班和学习班,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迫切问题的宣传组织及其内容,并特别注意毛分子的反苏反社会主义破坏活动的危险性。

三、责成苏共中央宣传部、苏共中央组织部、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同苏联陆海军总政治部一起,在今年的6—7月份,在哈巴罗夫斯克和塔什干举办报刊编辑人员和各加盟共和国、边疆区以及与中国相邻的州的广播电视委员会代表会议,讨论反宣传和对居民进行军事爱国教育问题。

责成苏联陆海军总政治部在10天期限内,制定关于在边境地区的中国军队中开展工作

以防备出现武装冲突的建议并提交苏共中央。

四、《真理报》和《红星报》报刊总局，应该系统地保证向地方报纸的编辑部提供关于中国问题的材料。

五、各加盟共和国党的中央宣传部、边疆区委员会和与中国接壤的边境地区州委员会，应对中国越境人员进行经常的解释和教育工作。

考虑到应在从中国越境到苏联的维吾尔族人之中加强政治教育工作，研究在《共产主义旗帜》报纸中增添阿拉伯文插页的问题，该报是用维吾尔语在阿拉木图市出版的，请于1969年6月30日前提出本问题的提案。

在报刊宣传领域：

一、《真理报》和《共产党人》杂志编辑部，在5月份和今年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应该发表编辑部文章，分析"中共九大"决议、揭露"毛泽东思想"的反动性质以及毛分子对内对外政策的冒险主义。

在关于"中共九大"的材料中，主要注意力应集中在揭露林彪报告以及中共"新"党章中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观点(试图提出毛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将加强反苏主义作为毛集团的正式方针；修正列宁关于党、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放弃根据事实制定的经济建设纲领；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有组织地建立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对立的毛分子中心的方针，等等)。

二、委托政治书籍出版社、思想出版社和进步出版社，在1969年第四季度出版苏联国内和国外共产主义报刊重要文章的专题汇编，揭露毛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并同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和苏联科学院，共同出版关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问题以及同毛主义集团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方针进行斗争的学习材料。

政治书籍出版社同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在今年的第四季度出版以"毛泽东——中国人民的敌人"为题目的文件汇编手册。思想出版社、知识出版社和科学出版社应该系统地出版关于中国当前的形势、中苏关系、中共党史、毛分子在一切革命队伍中的破坏活动等内容的书籍。

在关于当代中国问题的一切出版物里，应该揭露"中共九大"方针的反马克思主义反民主性质，及其反苏倾向。

三、责成新闻社同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共同撰写准备在国外散发的系列小册子，揭露毛泽东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民族主义的实质以及它对于和平和国际安全的危害性(宣传手册的题目——附件一)。

四、责成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同新闻社，共同准备在中国及其邻国散发的、揭露毛泽东集团反人民性质和揭示中国人民愿与苏联真诚友好的宣传小册子(宣传手册的题目——附件二)。

五、责成新闻社出版社同苏联外交部和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共同准备并在1969年第三季度用俄语、主要欧洲国家语言、汉语、朝鲜语和越南语出版关于中国当局在中苏边界进行挑衅的"白皮书"。

六、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出版委员会，保证有效地出版并大批发行由《科学出版社》东方

文学编辑部编辑的题为《今日中国》的书籍。

七、新闻社应在1969年第四季度出版并大批发行关于"文化大革命"和毛分子反人民犯罪活动的照片集,并配上俄文、主要欧洲国家语言、汉语、朝鲜语和越南语的文字说明;从每周一期的《今日中国》电讯上摘录资料翻译成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在国外报界更加广泛地传播这些材料。

八、为了扩大出版和印刷基地,用汉语进行系统的出版宣传活动(出版书籍、宣传册子和传单),责成:

(一)新闻社(布尔科夫同志)扩大和加强国际情报总编辑部专门小组,增配中国学专业干部——记者和编辑人员在现有的定员范围内达到8—10人。专门小组的任务如下:整理出版业务材料(文章、宣传手册和传单)以及书籍和随后翻译成汉语的反宣传材料。

新闻社出版社保证将指定的材料翻译成汉语。在必要的情况下,允许新闻社出版社成立汉语翻译编辑部,并根据工作量确定其人员数量。

(二)《真理报》出版社和印刷厂(费尔德曼同志)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使汉语的排版能力达到每月50印张。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出版委员会(米哈伊洛夫同志),应该扩大第7号印刷厂排版车间能力,使其汉语排版每月达20印张;设立中文打字组,采用轮转印刷的方式,扩大印刷能力,达到每月20—25印张。

为保证实现上述工作量,规定购买相应的设备、培训排字工人和打字员。在必要的情况下,允许补充吸收工作人员参加工作。批准《真理报》出版社和苏联部长会议出版委员会购买铅字、纸板和必需的生产设备,并用超计划积累支付以上开支。

(三)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新闻社应该在中国、与其相邻的且有大量中国居民居住的国家以及在苏联境内居住的中国人中间,组织提供并散发汉语宣传书籍。

九、责成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新闻社研究,在某第三国家以中国健康力量的名义(或者是反毛的进步组织)用汉语出版报纸或者周刊的可能性,目的是把他们散发到有中国居民的国家和中国。1969年6月10日前提交该问题的建议。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新闻社应该采取措施,在反对毛集团的斗争(对中国进行反宣传等类似活动)中利用从中国迁出居住在苏联的侨民,尤其应考虑成立这些侨民的相应组织(同乡会、学校等)。关于所采取的措施应于1969年7月1日前报告苏共中央。

十、为了提高杂志编辑部和中央出版社编辑出版委员会对中国问题出版内容和方向的责任心,在一系列杂志编辑部里成立由科学院远东研究所、苏联外交部和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国问题著名专家组成的出版委员会。苏共中央宣传部和苏共中央联络部于1969年6月15日前将该问题的建议提交苏共中央委员会。

在影视宣传领域:

一、责成苏联部长会议国家电影艺术委员会,拍摄制作揭露毛主义、展示自十月革命之后直至今日苏联对于中国的真正的国际主义立场的大型纪录片。

二、责成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在今年的8月1日前夕,筹备制作关于中苏

边界形成历史、中国当局在边界地区的挑衅活动以及中国现代领导人觊觎邻国领土等内容的电视纪录片，并采取措施在国外广泛宣传这部影片。

苏联外交部、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应该向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提供必要的资料和文件。

附件一：

国外宣传文章和小册子的选题

一、为什么毛分子诽谤苏联以及苏联的现实?

当前的中国领导人选中苏联作为自己攻击的主要目标是因为，苏联是世界革命、社会主义、民族解放运动以及反帝阵线的最强大的可靠支柱。十月革命的思想、苏联人民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中取得的成就，对于世界人民，尤其是对于中国人民来说，都是一种诱人的力量。毛分子猛烈地造谣诽谤苏联的现实，是因为他们很清楚地意识到，如果中国人民认识到事物的真实面目，中国人民就会坚决地批驳毛泽东集团冒险的、反人民的方针。

二、苏联给予中国人民的大公无私的援助

在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苏联给予了坚定的支持和援助。在将中国从日本的占领下解放出来的斗争中，苏联军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建立中国的现代工业，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奠定经济基础的过程中，苏联给予了兄弟般的援助。在粉碎帝国主义集团对中国人民的侵略阴谋的斗争中，苏联的立场具有决定性意义。毛泽东及其集团一笔勾销了两国兄弟人民和党的关系历史中所有这些光辉的篇章，用忘恩负义回报苏联。

三、毛分子手中的核武器——威胁人民的和平与安全

扩张主义——是毛分子对外政策的组成部分之一。加紧建成核导弹部队的目的，正是极力追求扩张。中国的核潜力不是一块盾牌，而是一柄悬在世界人民头上的利剑。

四、毛分子在一系列民族解放运动中所进行的破坏活动

毛泽东及其集团在一系列民族解放运动中，连续不断地进行着破坏活动，力图使其与兄弟力量——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工人运动脱离。毛分子拒绝参加制止美国对越南侵略的共同行动，对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给予越南的援助加以阻挠。试图使古巴陷入孤立，使其脱离社会主义国家，让它单独对付美帝国主义。拒绝参加给阿拉伯国家援助的共同行动。拒绝对南非共和国采取经济制裁。

五、毛分子正在走上与世界资本主义结盟的道路

中国重新确定对外贸易的方针是面向资本主义国家(目前中国的对外贸易额有57%是同帝国主义国家的)。中国的主要对外贸易伙伴是：英国、德国、日本和美国。给予帝国主

义继续在中国境内开采矿藏的权利(台湾、香港、澳门)。

与波恩复仇主义(臭名昭著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日本帝国主义集团进行政治调情。给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提供特权。

六、毛分子的反苏挑衅活动是对那些直接遭到帝国主义进攻的国家的打击

毛分子在中苏边境上的武装挑衅行动,削弱了反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使和平、进步和社会主义力量遭到了打击,使那些直接遭到帝国主义进攻的国家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西方国家的反动军事集团利用中国对苏联的武装挑衅活动,号召加强帝国主义列强及其在欧洲、印度尼西亚和近东的仆从国的进攻。中国的武装挑衅行动可能会给一些国家,如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越南、古巴、老挝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造成极其有害的后果。

七、目前中国领导人在越南问题上的叛卖角色

毛分子拒绝参加社会主义国家支持越南人民的共同行动——实际上是在鼓励美帝国主义侵略越南的行动。毛泽东集团挑拨苏联与越南人民之间的关系——表现出极力孤立正在进行斗争的越南的企图,使它单独对付美帝国主义侵略者。由于中国当局百般阻挠苏联以及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援助物质的运送,给越南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对于政治调解越南问题毛泽东集团持捣乱立场。

八、毛分子在东南亚共产党和民族、民主政党队伍中活动的有害后果

现今的中国领导人视东南亚为自己的世袭领地。毛分子以牺牲东南亚人民的民族利益来换取自己世界大国的地位。这些国家的中国侨民都是为毛泽东服务的。北京领导人在东南亚政策的实质是——加剧紧张局势、忽视现实情况、推动共产党和民族、民主政党过早地进行没有准备的武装进攻。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缅甸共产党、菲律宾共产党、马来西亚共产党的毁灭——应归罪于毛分子。

九、毛分子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裂活动

毛分子企图在批驳毛泽东反列宁主义的方针的大多数共产党内,建立反党集团和反党宗派,从内部分裂共产党。对一些国家的共产党进行肆无忌惮的诽谤中伤,而这些党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立场并在自己国家的人民中享有威信。毛泽东集团实际上脱离了集体制定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纲领性文件——1957 年宣言和 1960 年声明。毛泽东主义与帝国主义反动派狂妄的反共产主义行为非常吻合(鼓励捷克斯洛伐克的反社会主义力量)。拒绝参加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国际协商会议,阴险地攻击参加筹备和举行会议的绝大多数党。

十、毛主义——反帝力量团结的敌人

毛分子竭力使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与社会主义的团结、国际工人运动对立起来。毛分子在国际社会组织里进行破坏和分裂活动。毛泽东及其集团一贯否定整个爱好和平力量为制止帝国主义侵略分子所进行的共同行动。毛分子的反苏挑衅活动——是它的霸权主义方针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旨在削弱世界反帝国主义力量的地位。

附件二：

对中国进行宣传的文章和小册子的选题

一、苏联——中国人民的朋友和兄弟

苏联——开辟了东方人民解放道路的十月革命的国家。在将中国从日本的占领下解放出来的斗争中，苏联军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夺取人民革命胜利的斗争中，苏联给予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以广泛的和多方面的支持。在建立现代化工业基础过程中，在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奠定经济基础的过程中，苏联给予了兄弟般的援助。在粉碎帝国主义集团对中国人民的侵略阴谋的斗争中，苏联的立场具有决定性意义。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为争取中苏关系正常化以及恢复中苏之间的友谊所进行的斗争。

二、世界帝国主义——中国人民的敌人

各个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中国人民的长期剥削者和压迫者。帝国主义分子掌握着中国领土上的矿产资源(台湾、香港、澳门)。帝国主义者反人民中国的阴险意图。美帝国主义——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中国处于美国的军事基地以及亲美的军事集团包围之中。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扩张主义阴谋。当今中国领导人与西德帝国主义分子亲昵的危险性。

当今中国领导人造谣诽谤，说苏联是中国的敌人，这对中国人民的利益具有极大的危害性。

三、毛泽东及其集团鼓吹的军国主义和扩张主义思想是否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

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现阶段战争的性质。热核军事冲突对于中国人民的命运具有极大的危险性。武装方式解决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分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土的觊觎——这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体系相违背的。毛泽东集团利用军国主义化和对军事行动的狂热追求来替代对群众的共产主义教育。毛泽东集团对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扩张主义意向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巨大的危害。中国人民需要的不是战争，而是和平的创造性劳动。

四、中国的劳动人民是否需要占领新的领土?

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世界上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之一。在中国本身就有很多新的土地还没有条件进行开发。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为发展生产力、科学、技术和人民的文化水平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这是提高中国人民的福利事业，满足其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需要的唯一正确的途径。另一条道路——觊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土——将对中国人民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是与其根本的民族利益相抵触的。

五、消除中苏之间的分歧是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的

中苏之间的分歧严重地削弱了社会主义体系、共同的反对帝国主义的人民阵线以及世界革命力量的地位。煽起对苏联人民的敌对情绪，疯狂地反苏联的行动，给中国本身的社会主义

建设事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牵扯了中国人民解决迫切的经济任务的力量。所有这一切都被世界帝国主义,首先是美帝国主义巧妙地利用以加强对社会主义、民主和和平力量的进攻。

中苏之间的分歧不带有对抗的性质,因此是能够也应该是在平静的状况下,通过谈判的途径解决。这也是中苏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要求的。

六、造谣诽谤苏联的现实——这是迷惑中国人民的方法

毛泽东分子对中国的劳动人民宣传说,在苏联已经"复辟资本主义",苏联共产党已经变成了"修正主义的党",苏联"已经同美帝国主义勾结在一起了"。所有这些阴险的谣言都具有故意诽谤的性质。苏联已经成功地建设了社会主义,正在为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和技术基础。苏联共产党——苏联人民一切胜利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将自始至终地与一切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行为、与修正主义的"左"右派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为纯洁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而奋斗。苏联永远站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最前列。全世界都知道:正是苏联的全面援助是越南人民取得反帝国主义侵略斗争胜利的决定性因素。

对苏联的现实以及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政策进行造谣诬蔑,毛和他的集团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使中国人民反对十月革命的国家,并借此压制国内日益增长的反对派。

七、中苏边界关系的真相

目前的中苏边界,是俄国和中国在两国边界地区历史性划分的结果。苏联政府永远是根据中俄两国关于边界条约的实际情况出发的。

根据友好同盟和互助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承担的责任是:尊重苏联领土的完整。

中国领导人对于边界问题立场的改变证明,他们已转入奉行大国沙文主义和反苏的方针。在北京1964年的协商会议上,苏联就边界问题表现出了良好的意愿,力求达成相互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毛泽东集团自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就加强在中苏边界的挑衅活动。珍宝岛的挑衅事件就表现了当今中国领导人竭力激化中苏关系,在中国加强反对苏联的行动。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7卷,第4395—4409页

№22895

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越南问题及中苏冲突

(1969年6月11日)

在我6月12日返回莫斯科的前一天,美国总统助理基辛格先生给我打了电话。基辛格

表示，希望在我离开之前同我进行一场会面。我同意了这次会面。我们的这次会谈是在白宫基辛格的办公室内进行的(像以前同他进行的各次会谈一样，这次会谈也是秘密举行的)。

在会谈开始的时候基辛格说，尼克松总统知道我将返回苏联，我们的这次会谈就是他安排的。以便我返回莫斯科向苏联政府进行报告的时候，在必要的情况下能够把美国总统在各个国际问题、特别是苏美关系问题上的观点亲自报告给苏联政府。

基辛格说，他可以完全负责任地说，在对外政策方面，除了越南问题，尼克松总统认为他应该关注的另外一个重要领域就是苏美关系。他认为他在苏美关系领域的主要目的是：必须避免出现会导致美苏发生直接冲突这样的局势。总统认为，这一目的是完全可以达到的。基辛格受尼克松总统的委托说，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尼克松总统都不允许在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出现危险的局势，导致我们两国之间发生直接的冲突。关于这一点尼克松总统希望，并且他认为，苏联政府也会这样认为。

基辛格接着说，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尼克松总统希望，在他的总统任期内(1972 年之前，或许是 1976 年之前，如果他再次当选总统的话)苏美关系能够进入建设性的阶段，使苏美关系有别于"冷战时期"的关系。遗憾的是，冷战时期的这种关系仍然存在，并影响着两国现在的关系。我们在意识形态上存在分歧，并且这些分歧仍将存在，因为这些分歧太深刻了。尽管如此，尼克松总统仍然认为，我们两国关系完全会向我们所希望的方向转变，尽管这需要时间，需要双方都考虑到对方的利益，耐心地工作。

基辛格继续说，尼克松总统认为同苏联领导人举行会谈在各方面都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他对这一最为重要的问题还要有一定的谨慎，这主要是由于要考虑到美国国内的政治因素和全世界的反应。因为同苏联领导人举行会谈，将不可避免地引起一些噪音，引起各种各样的轰动效应，一些人会仓促地做出预测，更主要的是一些人会对会谈产生所谓的"巨大期待"，但是随后将是非常大的"失望"，尽管在 2—3 天的高层会谈之后很难预测到马上就取得重大的成果，何况重大的国际问题未必就是一下子能解决了的，因为日积月累的障碍和阻力需要一步一步地清除。遗憾的是，大众舆论期待这些高层会晤"创造奇迹"，因为这些"奇迹"是很难实现的，因此就评论这些会晤是"不成功的"、"失败的"会晤。这无助于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反而会给参与会谈的领导人施加心理上的压力，这些领导人在会谈之初就不由自主地在考虑，在会谈结束的时候，他们应该向报刊发表什么样的声明。

基辛格接着说，因此，尼克松总统确信，在他的总统任期内同苏联领导人不应该只是组织一次会晤(肯尼迪和约翰逊总统任期内都是组织了一次会晤)，应当在一定的时期内举行一系列的会晤，他们的意思是，一年举行一次。那时这些会晤将不再那样具有轰动效应，将会更加具有务实的性质。在这些会谈中不必一定要寻求对外做出一些圆滑的说法，而应在实质上推动事情缓慢地向前发展。应该定期举行务实性的会谈，对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进行讨论，寻求相互都可接受的途径，而不必担心报刊随后对这些会晤扣上的帽子：苏美领导人没有"达成协议"，或他们的会谈"没有成功"，因为所有人都将知道，过一段时间之后将举行新的会谈，继续讨论问题，而在这些会谈的间隔期内双方应通过外交渠道做出相应的

努力。

基辛格接着说，在这些会谈中，不仅仅应该寻求途径，解决那些比较困难的问题(这些问题远远不是一下子总能够解决的)，而且还要就潜在的危险局势进行磋商，相互交换意见。这些潜在的危险局势会把美苏两国卷入冲突中。双方即使没有就这些潜在的危险局势达成一致看法，还可以理解彼此的动机，不使自己的行为越过危险的底线。当然，这些高层会晤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预先进行精心的准备，这指的是，在某些具体的条件下这些会谈必须取得最大的效果。

基辛格想知道我对关于定期举行会谈这个想法的看法。我回答说，根据我自己的意见，从原则上来说这个想法应予以重视。

然后我们的话题转到了具体问题和关于一些地区的局势问题上。基辛格说，在欧洲问题上，不应该企图改变欧洲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的局势，尼克松同意这种看法。众所周知，美国在原则上赞成德国的统一，但是如果现实地谈论这个问题，那么，从各方面来看，这将是非常非常遥远的事情。尼克松政府不打算重提德国统一问题或加剧局势向这一方向发展。相反，尼克松政府感兴趣的是使西德能够得到一定的稳定，以便苏美关系不因德国局势而发生动荡。基辛格补充说，他们期待苏联方面就这个问题提出更加具体的建议，这是由于考虑到今年2月份苏联政府对尼克松总统的第一次呼吁已经提到了这个问题。

我反问道，美国方面能否就这个问题提出具体的建议。基辛格对此回答说，他们仍然首先想得到苏联关于这个问题的想法。同时，从他的话中也可以看出，他们会考虑采取一些措施，使联邦德国在西柏林的行动“中立化”，以换取通往西柏林的道路，这个问题是民主德国及其盟国(首先是苏联)同联邦德国及其盟国(首先是美国)之间发生摩擦的原因。然而，同时也可以看出，华盛顿现在还不准备使西柏林获得“自由市”的地位。

在就欧洲事务进行会谈的过程中，基辛格再次说道，尼克松总统考虑到苏联在东欧地区的特别利益，美国不打算在这些地区采取任何被莫斯科看作是对其在这一地区的地位进行“挑战”的行动。基辛格确信地说，这就是尼克松总统对这一问题的原则立场，因此不应该特别在意“尼克松总统对东欧某国公开发表的批评性言论，因为这只是为了安抚美国一些阶层的情绪，但这些情绪会对美国的选举产生影响”。

基辛格又提出了罗杰斯在此之前提出的关于双方都批准核不扩散条约的问题，这正如几个月之前尼克松总统向我们建议的那样。基辛格强调说，尼克松总统认为，苏联和美国同时批准这一条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有两个原因。首先这是自他担任总统以来苏美共同采取的第一项重大行动，在他看来这些行动的意义超出了这一行动本身。

第二，在尼克松看来，苏美共同批准这一条约，会对那些现在仍然没有签署这一条约的国家施加压力。

我也阐述了我们就这一问题的立场。我提醒基辛格说，正如我们向美方通报的那样，最高苏维埃外交委员会正在审议这个条约，根据苏联法律这是批准这一条约所必要的法律程序。接下来我谈了自己的看法：美国至今仍然没有对联邦德国政府施加必要的影响和压

力，联邦德国政府公开反对签署这一条约，这在很大程度上就使这项条约显得很空洞。然后我表示，希望尼克松政府对波恩采取更加积极的行动，使他们尽快签署这一条约。

基辛格实际上也没有否认，在这个问题上现在他们还没有对波恩施加什么大的压力。他尽力对此进行辩护，其理由是“我们拖延”答复尼克松提出的关于苏美同时批准核不扩散条约的建议。用基辛格的话来说，波恩领导人除了援引联邦德国选举前的运动之外，似乎还对他们说，如果苏联都不急于批准这一条约，那么他们也不必着急。

总之，关于这个话题的会谈给我的印象是，对于我们拒绝尼克松提出的关于尽快批准核不扩散条约的建议，尼克松把这看作是：我们不愿现在（党的代表大会正在召开，苏中分歧加剧）就采取这一共同行动，以显示我们和他采取了共同的行动，尼克松比较确信地认为，我们没有批准这一条约会对联邦德国施加一定的压力。（基辛格千方百计地要说服我，他说，苏联和美国没有批准这一条约刚好帮了联邦德国那些反对签署这一条约的势力。）

总之，根据我们的观察，可以看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确信，美国近期不打算最终批准核不扩散条约或者向联邦德国施加强大的压力，直到我们同意尼克松的上述建议，或者对他的建议做出更加具体的反应。（根据大使馆的意见，最高苏维埃对外政策委员会不应该拖延对这一条约的审查。在万不得已的时候可以在批准条约的同时保留特别的条款：联邦德国也必须批准这一条约。）

在谈及其他领域的关系时，尼克松的意思是苏美应该加强接触，相互交换意见，基辛格指出了调解近东问题、限制战略核武器问题、今后逐渐发展贸易关系问题。

在谈及近东问题时，基辛格说，尼克松总统认为，如果现在可以做一些工作、有助于解决这个极其复杂的问题的话，那么美苏双方只能秘密地相互交换意见，美苏都知道，他们的“当事人”想的是什么，在多大程度上同意他们的观点，但都不应该以自己的当事人为借口行事。

用基辛格的话来说，尼克松打算在不远的将来——他在前不久就越南问题制定出自己的“行动纲领”，并希望尽快审议和批准关于苏美即将就限制战略武器问题举行的谈判而下达的指示之后，他本人能够对关于具体调解近东问题的可能性这个问题进行更加仔细的研究。除了同约旦国王举行了会谈之外，他还打算在最近的几个月内同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举行会谈。美国政府打算同果尔达·梅厄举行会谈，其中包括就目前形成的局势问题、特别是就苏美双方相互交换的意见举行会谈，有鉴于此，华盛顿非常期待得到莫斯科的答复，也许，在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访问开罗并返回莫斯科后不久他们将会得到答复（同基辛格举行的这次会谈刚好是在葛罗米柯访问开罗期间）。

在接下来就近东问题进行的会谈中，基辛格拒绝就我所提出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会谈，他说，由于他忙于越南问题，暂时还没有对这些具体的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但是，在必要的情况下，大约过一个月或一个半月，他将“亲自介入”苏美就这些问题进行的会谈。但是他介入这些会谈的条件是，他不会在所有的细小事情上都替代西斯科。他（基辛格）可以同我进行秘密会晤，就调解近东问题的一些关键问题（这些关键性的问题可以由我们提出）进行全面的会谈，同时也将提出自己的报告以及尼克松总统对这些报告的意见。用基辛格的话来

说，根据事态的发展和其他的一些状况，这份报告将会成为尼克松总统的特别指示，成为国务院今后同苏联就此问题交换意见的基础。基辛格补充说，在他看来，为了取得成功，双方(阿拉伯和以色列)都必须“吞下苦果，做出一定的让步”，然而，基辛格没有再详细地谈下去。

基辛格还说，尼克松总统希望，在联合国大会期间，葛罗米柯和罗杰斯国务卿能够就调解近东的所有问题进行会谈。

在说完这些话之后基辛格转入了越南问题。从各方面来看，尼克松总统及其顾问们现在考虑的主要问题就是越南问题。

在会谈中基辛格详细阐述了他们在越南问题上的立场，他所阐述的主要思想和论据实质上都是在重复今年 5 月尼克松在白宫同我最近举行的一次会谈中所说的内容，也是早先基辛格受尼克松总统的委托向苏联领导人转告的那些话。

然而，基辛格说的一些新的内容就是更加直接地号召我们帮助他们走出巴黎会谈的死胡同。

基辛格说，美国政府一如既往地高度评价苏联政府为保证巴黎会谈的举行所做的一切工作。基辛格接着说，如果开诚布公地说，那么，他们现在产生的印象是，最近几个月莫斯科对谈判进行的干预减少了，这看起来是为了让河内领导人完全任其所为；苏联对谈判的影响明显减少，这与苏联对河内和对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影响是不相称的，毕竟苏联是对他们进行武器援助和经济援助的主要国家。我们当然知道莫斯科在越南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是：不引导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进行谈判。但是他仍然顺便提出说，他所说的上述情况使尼克松总统的一些顾问们产生了一个问题。在白宫召开的会议上这些顾问们越来越经常地问他：“莫斯科现在是否认为，由于一些原因，越南战争的持续最终是有利于他们，因此他们就应不急于调解这场冲突?”

用基辛格的话来说，他本人和尼克松总统是不同意这样的观点的。他们认为，莫斯科对结束越南战争是感兴趣的，因为这场战争花费了他们大量的金钱，这也是考虑到越南冲突是一块巨大的绊脚石，不清除这块绊脚石就谈不上真正地改善苏美关系。

在这种背景下基辛格立刻又提到了中国问题。他提请我们注意尼克松总统早先提出的一个观点：他们不打算介入现在苏中发生的冲突，并再次确认这一原则。基辛格说，他们当然愿意改善同中国的关系，愿意为此采取一些理智的措施，但是这一过程应该具有双边的性质。用基辛格的话来说，但是，在对中国共产党最近召开的这次代表大会和最近发生的事件进行分析之后，他们还没有证据来证明北京领导人准备对美国实行比较和解的路线。

基辛格用半带讽刺的口吻说道：“诚然，现在苏联已经取代了我们成为中国攻击的主要对象，而我们也感觉到好像也处于被攻击的第二位，但是北京对我们的态度没有发生任何明显的变化。北京一如既往地坚持要把台湾转交给他们。但是美国是不会做出这样的让步的，尽管我们不反对他们自己同台湾就这个问题进行某种程度的会谈，但是台湾方面暂时还没有表达这样的意愿，而尼克松政府将不会在这件事上施加什么压力。在遏制北京扩张的意图方面台湾仍然是防御链中的重要一环。”

基辛格确信地说："但是，这些还都不是重要的问题。我们是现实主义者。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是苏联，而不是中国拥有主要的军事力量和工业能力。不仅仅现在是这样，而且在尼克松的总统任期内都将这样。从这一意义上开诚布公地说，如果谈到全球范围、特别是在爆发核战争给美国可能带来的后果来说，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是苏联。因此，尼克松总统认为，同苏联保持良好的、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正常的、适当的关系，不使这种关系激化而处于危险的边缘具有首要的意义。"

基辛格继续说："我们知道，看起来，在莫斯科有一些人认为，美国和中国可以在反苏的基础上达成谅解。从世界历史的角度、从各国以往经验的角度来说这种说法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基辛格确信地说，但是，在现在这种具体的情况下，如果从美国政府的角度来说，那么这种想法首先不符合美国自身的利益。"

基辛格继续说："当然，如果说你们同中国日益加剧的分歧使我们非常难过，你们会认为这是假仁假义，而无论怎样你们都是不会相信我们的。但是存在一种实质性的情况，尼克松总统认为这一情况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尼克松总统相信，对他来说比较好的政策是：既不倾向于苏联，也不倾向于中国，要特别注意不使苏联政府认为美国支持中国的反苏政策或寻求在这一政策的基础上同中国达成协议。尼克松是一位现实主义者，他的逻辑非常简单：相对中国而言，苏联有更大的机会在世界各地与美国对抗，这种对抗会造成冲突和危险的局势，一旦爆发战争，就是在拿美国的国家安全作赌注。而中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就其军事和经济潜力而言还不会对美国造成这样的威胁，但是苏联就会。"

基辛格接着说："此外，毛泽东的行为不合逻辑。对他还要观察一下，尽管迄今为止他显然在避免中国和美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指的不是在第三国的冲突）。而苏联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苏联的领导人都是现实主义者，他们关切的是本国人民的福利。同苏联领导人可以达成符合两国利益的具体协议，而且这些利益不仅仅符合两国的利益。因此尼克松总统曾对苏联领导人表达了如下思想：如果我们两国在今后的10—15年能够共同努力，至少两国的政策不发生冲突的话，那么就可以避免把世界卷入冲突和战争，直到中国'成熟起来'，比较负责任的人掌握了北京政权。"

用基辛格的话来说，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尽快结束越南战争，并且苏联在调解越南问题上就应该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不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委托给河内，因为河内对国际局势的看法只是从自身狭隘的角度出发的，他们的这些看法在客观上符合的首先是中国的利益"。

基辛格接下来的所有发言几乎都是围绕这一论题展开的。给人的感觉是，他向我们所说的这些话都是受尼克松的委托而说的，尽管基辛格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就好像是他自己的看法一样。

我又向基辛格重述了我们对解决越南冲突问题的原则立场。我强调说，我们确实希望尽快结束越南战争，但必须考虑到整个越南人民的法律地位和利益。我还说，美国对越南的政策是不现实的，这种政策正符合毛泽东及其团伙的心意，在事实上妨碍了建立一个独立、

中立的南越,这正如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在他们的十项条款中阐述的一样。这十项条款众所周知。华盛顿尽快接受这些条款,不仅会使越南得到更多的好处,而且对美国自身,对我们两国的关系来说都是非常有益的。

但是,基辛格仍然在重复尼克松提出的关于"调解"越南冲突的计划,他多次强调说,如果河内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最终开始进行谈判,并不再是"只是重复他们的最后通牒"的话,他们愿意讨论"任何建议并寻求妥协"。当谈及"妥协"的时候,基辛格指出,可以"秘密讨论各种不同的方案",但他补充说,"他们现在还不能抛弃阮文绍,因为这将意味着向越南投降"。

在讨论的过程中,基辛格又放话说(像尼克松之前说的一样),如果河内再没完没了地在谈判问题上进行"捣乱",那么几个月后尼克松政府将不得不考虑"采取其他的措施来说服越南"。

基辛格坚定地告诉我说,如果不是现在的尼克松政府不想重蹈上届政府的覆辙,那么就没有也不可能会有和平谈判与和平调解问题的选择。但是,上届政府造成了什么后果呢?前任总统的例子就让人足够明白了。

基辛格明显是不想让会谈的气氛紧张起来,就把谈话转入了另一个话题。但是,不能不指出尼克松和基辛格在会谈中坚定地提出的关于"采取其他选择"的问题。这意味着在经过一定时期之后,尼克松会恢复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轰炸或者采取其他的军事行动,尽管看起来,他们所说的这些话在更大程度上具有试图对越南和苏联进行讹诈的性质,但是,总的来说,如果在尼克松看来局势的发展有利于他采取这些行动的话,不能完全排除美国政府采取这种行动的可能性。

对于局势的这种发展仍然要作好准备,特别是如果北京针对苏联的挑衅政策加剧的话,华盛顿将不再会认为,局势的发展会对河内产生不利的影响。看起来,在这一点上基辛格放出那些话也不是偶然的,基辛格的意思是,如果他们不得不采取"其他的选择",那么他们希望,这不会使苏美关系降到"危险的底线",因为他们将不会采取任何措施给苏联造成损失或损害苏联的威信。我对基辛格说,美国用军事手段解决越南问题的图谋是注定要失败的,美国的这种政策无疑会加剧国际紧张局势,不可能不影响到我们同美国的关系。

总的来说,从这些会谈中可以得出的一些看法是,尼克松政府对外政策中的首要问题是:在美国可以接受的条件下找到退出越南战争的方法,确保他再次当选美国总统。从各方面来看,基辛格今后还会试图"说服"苏联帮助他们调解越南冲突,在我们今后同尼克松政府就其他的国际问题进行的谈判中要理解这一点,如果他们不直接提出这个问题,那么众所周知,他们采取的方式就是延缓谈判或延缓解决其他问题的速度。

基辛格表示,希望在我回去之后,他还能同我就我们两国关系中的一系列问题和总的国际局势问题进行会谈。我对此表示了同意。

关于对基辛格本人的几点看法。通过对尼克松及其主要的对外政策顾问(而我现在实际上已经都认识了他们)的活动进行的观察,可以确信地说,现在基辛格对总统的对外政策

事实上起着决定性的影响作用。总统个人的和发给白宫的关于对外政策的所有报告(包括侦察部门的报告)基辛格都可以得到。他同其他25个各方面的专家一起组成一个小组，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会议日程及其需要讨论的材料，总统就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代表(尼克松上台后，国家安全委员会开始定期工作，每星期至少召开1—2次会议)。正如尼克松本人最近在同我进行的一次会谈中所承认的，相比他的任何一名助手，基辛格每天都更会让他感到“厌烦”(也就是说他经常使尼克松感到“厌烦”)。

根据我个人的观察和比较，相比约翰逊和他的助理罗斯托的关系，可以说，在总统面前，基辛格要比他的前任自由得多，他已经有了一定的自信，已经在白宫获得了牢固的地位(国务院就直接说，如果亨利反对某一项建议，那么尼克松就一定会否决这一建议)。

基辛格是一个聪明博学的人，同时也是一个虚荣心很强的人。他喜欢在和我进行会谈(我已经同他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的时候，特别是在吃饭时进行两个人单独会谈的时候夸耀自己的影响力。比如，在最近的一次谈话中他毫不谦虚地说，整个华盛顿“现在只有两个人能够对美国对某一问题的立场做出准确的答复，这两个人就是尼克松总统和他基辛格”。因此他对我说，如果(我们)确实需要搞清楚某些重要的问题，“以便莫斯科可以正确地理解尼克松在某一具体问题上的政策”的时候，那么，就可以秘密地直接找他。

应该说，在我方提出相应的建议之后，他总是愿意在自己的办公室会见苏联大使，或者到苏联大使馆进行单独的会谈。他自己也经常主动提议进行这样的会谈。可以看出，他在利用一切类似的机会来巩固自己在尼克松政府中的地位，来加强自己在同苏联进行秘密接触中的作用。关于这一点应当指出，对于尼克松政府中的工作人员同我们大使馆进行的所有联系，基辛格都予以严密的监视，并密切关注，使这些会谈能够向他个人汇报，如果他认为必要的话，就会亲自再向总统报告。最近很明显的一个趋势是，他限制了这种联系的范围，把这种联系转入他个人同苏联大使进行联系的轨道上。

可以看出，今后应该积极发展和利用基辛格这个渠道，同他进行会谈，以便对尼克松施加影响，或者通过基辛格把我们在各个重要问题上的相关观点传达给尼克松，特别是在众所周知的微妙的情况下，在不愿意公开的情况下，在通过国务院远远不是总能够解决问题的情况下。当然，现在，所有通过官方渠道进行的事务，特别是那些反映我们立场的事务，应该像往常一样通过通常的外交渠道进行。罗杰斯国务卿的作用明显在不断增强，他依靠国务院各部分和各驻外机构，在美国外交政策领域开展了更加积极的活动。但是仍然应当注意，根据我们的观察和得到的资料，可以断定，目前基辛格对尼克松对外政策的制定仍然产生着最为重要的影响。

A. 多勃雷宁

分送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69年7月12日，A. 葛罗米柯

АВПРФ, ф. 0129, оп. 53, п. 399, д. 6, л. 98－111

№20841

苏共中央全会会议速记：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报告和决议

(1969年6月26日)

1969年6月26日会议。

会议主持：勃列日涅夫同志。

同志们，由于正当原因(因为生病、或出差、休假和出国等)来参加全会的人有：中央委员13人，中央候补委员10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3人。有什么意见吗?

表决：没有。

表决：会议开幕。

会议主持：勃列日涅夫同志。

正如已通知的那样，今天全会的议事日程只有一个问题："关于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总结"。有人对今天会议的议事日程有意见吗?

表决：没有。

会议主持：波德戈尔内同志。

下面由Л.И.勃列日涅夫同志作报告。

关于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总结

勃列日涅夫：

同志们!

6月5—17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是60年代最重大的政治事件之一。这次会议充分显示共产党人在当今世界上的作用在不断增长。会议再次表明，共产党人是领导广大群众反对帝国主义、为了争取和平、民主、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先锋队。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弗拉基米尔·列宁已全面揭示了，在为了人类美好的未来而斗争的过程中，所有国家无产者的国际团结和共产党的团结的意义。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党和其他马列主义政党要始终坚持高举国际主义旗帜。可以相信一点，前不久闭幕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将成为全世界共产党人进一步团结起来的强大动力。我们有充分理由说，在历经了严峻考验之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将步入一个新的高潮期。

正如你们所知道的，召集此次会议的过程是复杂的。如果说其间我们遇到的许多困难最终被克服，会议得以召集并顺利举行，那么在其中作出最大贡献者，正如许多代表团在会

议中所强调的，应当是我们的党(掌声)，应当是我们的中央委员会。须知，正是苏共是现在这个会议的倡议者，正是苏共是确保各共产党和工人党以会议宗旨为指导并团结起来的主要力量。这就是为什么，同志们，这次会议的召集及其工作成果——是我们的重大成功，是我们的政治路线的成功，同时也是所有始终不渝地坚持马列主义原则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兄弟党的成功。(掌声)

鉴于这次会议本身及其所通过文件，对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其中包括我们党在内的巨大意义，(苏共中央)政治局认为有必要，就此次会议的工作总结问题向中央全会报告。

政治局已经多次就这次会议召集的各个阶段及其筹备工作情况向全会作过通报。关于会议本身的详细经过我们已在报刊上披露，因此这里请允许我只对几个与会议有关的原则性问题——会议的筹备、经过和总结(结果)等来作讲述。

一、苏共在会议筹备方面的活动

为了能够以正确的态度对新的共产党会议做出评价，我们就必须让自己的思绪返回到几年以前，回想一下在1960年代前半期共产党运动的形势。当时的情况，正如你们所知道的，的确是相当复杂的。

1960年会议以后，中共领导人的大国沙文主义的、反列宁主义路线越来越明显地成为我们运动的主要危险。在针对多数共产主义党派开展了公开的思想-政治斗争之后，为了传播自己的冒险主义思想，北京不惜采用一切手段分裂共产党、破坏反帝国主义统一战线的团结和诋毁苏共的政策。

尽管北京的分裂活动未达到目的，但这却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众所周知的分歧和动乱，"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开始活跃起来。一些党派在决定自己的政治立场时逐渐失去了明确的阶级标准；开始怀疑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民族主义自我封闭倾向开始潜滋暗长。其对政党的独立性和互不干涉内部事务诸原则所作的解释，实际上就意味着轻视自身所肩负的国际主义责任，从而严重危害了无产阶级的团结事业，为共产主义运动在国际舞台上的协调行动制造了困难。一些党派的活动表现消极，对自己的力量不自信。

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和各类背离马列主义政党的出现，自然使帝国主义分子们感到高兴。后者开始加紧活动，试图利用这一情况来削弱社会主义、整个工人和解放运动的力量。

所有这一切，引起了我党中央和全世界马列主义者的严重忧虑。而当前最迫切的任务，就是要清除在共产主义发展道路上阻碍我们凝聚力的绊脚石，实现使共产党和工人党团结起来这一转折。正是基于此，我们在所有路线和最广泛战线上展开了实现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的斗争。

正如你们所知道的，在苏共10月中央全会(1964年)之后不久，我们便采取了措施，并在莫斯科举行了与中国领导人的谈判，试图调解与其分歧。在此期间，我们提出了关于共同筹备新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问题。然而，中共领导人并没有与苏共合作的打算。中国代表无论如何都要求我们放弃苏共二十大至二十二大期间所通过的各项决议和我们的党

纲，换言之，中共就是要让我们脱离马列主义立场并接受中国领袖们所制定的思想和政治方针。针对这些要求，我们自然予以坚决拒绝。

当自己的企图遭到回击，中国领导人便开始试图对我们党施加压力并加紧从事反苏、分裂活动。

与此相对，为了在实现共同目标的斗争中，尤其是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能够统一行动，即使当苏中双方在各种不同问题上均存在分歧的情况下，苏共中央依然从维护团结的大局出发。关于此我们曾作过强调，即共同行动——这是消除分歧的最好办法。我们的这一路线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尽管当时的形势依然复杂，但这一思想的提出是必要的，因为它不仅符合当前各共产党开展直接斗争的需要，而且为各共产党的团结及其国际主义统一战线的胜利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而这一思想也是我们党中央提出并召集此次新的国际会议的初衷。

会议的筹备过程中存在一系列的问题，要求付出大量而繁重的劳动，克服各种相当大的困难。更不用说中共领导人已对此采取了公开敌视的立场。还有一些——如罗马尼亚、英国、意大利、日本等国家的共产党组织对会议持消极态度。其中一些党派竟提出关于是否召集此次会议取决于中共领导人是否参与的问题。至于我们党，则坚决反对给中国领导人对召集此次会议说“不”的机会。

根据不断变化的形势并依靠许多兄弟党的支持，我们坚决贯彻了筹备此次会议的方针。召集这次国际会议的问题还与我们党的第二十三大有关。1966 年 10 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各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会议上，我们提出了关于到了该采取具体举措以筹备新的国际会议的问题。我们的上述建议得到了朋友们的响应。这样就到了公开谈关于召集这次国际会议的必要性的时候了。1966 年 11 月，该问题再次在保加利亚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被提出。苏共代表团在自己的发言中宣布，召集新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条件已日益成熟。

整个事件的进程表明，我们正确地估计了形势。越来越多的党派宣布了自己准备开始进行会议的筹备工作。苏共中央 12 月中央全会(1966 年)指出，“举办新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已具备了良好的条件，在各党派之间相互协商的过程中，此次会议一定会得到很好的筹备”。

依据我们党中央全会的上述决议，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就未来会议的相关问题与 60 多个党派的代表举行了 100 多次双边协商，与一些政党的代表团也多次讨论。在此期间，还举办了几次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领导人会谈，在这些会谈过程中，我们集体性地讨论了与会议筹备有关的最重大问题。

在这些问题中，我们认为，在如何正确选择会议的议事日程和确定会议的筹备方式的问题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我们主张，会议的议事日程应当这样来安排，目的就是要为与会者的团结创造最良好的条件。在斟酌各种情况并与朋友们协商后，我们提出了这样的议事日程，其目的就是要将加强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任务与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任务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的这一观点得到了各兄弟党的支持，我们提出的关于在集体主义和平等诸原则基

础开展会议的整个筹备工作的一系列建议也受到了积极的响应。最终我们成功地清除了许多反对召集会议的思想，说服了犹豫不定者，从而确保苏共的立场得到了几乎所有赞成召集会议的共产主义党派的支持。

于是，通往新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道路就这样被开辟出来了。

当然，在这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的还有这样一个情况，即我们党在国际舞台上执行的总路线总体上是正确的，因而得到了各兄弟党的广泛支持。后者对我们的一贯做法——维护和平、国际安全和援助反抗帝国主义侵略诸民族等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苏共在捍卫和发展我们的革命理论方面所开展的积极的意识形态活动，对一些政党的立场产生了正面的促进作用。

我们在苏共中央4月中央全会(1968年)上，曾详细地提到关于在布达佩斯举行的协商会议。苏共中央全会支持苏共提出的关于会议的议事日程及其筹备方式的建议。从这时起，便进入了会议筹备的最后阶段——集体实际工作阶段。4月中央全会以充分的论据在自己的决议中指出，"近期，筹备和举办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是为共产主义运动团结而斗争的中心环节"。

正如你们所知道的，筹备会议是一项极其繁重的工作。仅在制定会议文件的过程中便提出了约上千次不同的修改和建议，而所有这些修改和建议都需要经过最细致的研究。对此我们已说得够多了。

这里可以说的是，未来会议的基本思想和结论性文件的主要方向，都是由苏共中央制定的。在坚持了所有原则性条款的基础上，我们在协调了自己与兄弟党代表的行动的同时，完全有能力带领他们经过各种争论，经过所有的讨论阶段。为了消除文件中所混杂的各种容易令人产生疑虑的内容和模棱两可的表达方式，我们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在会议筹备工作的每个阶段，政治局都要讨论事情的进展状况并对苏共代表团发出明确的指示。这里应当指出的是，我们的代表们都很好地完成了自己所承担的任务。

在会议筹备的过程中，我们党曾提出了一个建议，要求会议专门通过一个文件以纪念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100周年诞辰。我们认为，该文件应当被确认为共产主义运动的原则性思想基础。筹备委员会的最后一次例会一致同意将这一问题列入会议的议事日程。

正如你们所知道的，同志们，最初我们将会议召开的时间是定在去年11月份的。但是，形势迫使我们对此作了修改。问题是一些政党的代表，试图利用兄弟国家在捷克斯洛伐克所采取的捍卫社会主义的集体行动来干扰会议的召集。由此便发生了相当激烈的争论。顺便说一句，当时有不少预言家，其中不仅只包括那些断言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可能召集这次会议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们，他们甚至预计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思想本身也会走向崩溃。

我们当然对自己路线的正确性，对各兄弟国家及时采取的果断措施的正确性充满了信心。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在11月前夕关于是否召集会议的问题的争论正处于最激烈的时刻，如果我们继续按原定计划行事，就可能在会议期间使形势严重复杂化。于是，我们便考虑把会议召集的时间挪到现在，此时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已被人们所接受，而这

为我们举办会议创造了更为良好的条件。这就是事情的经过。

如果要从整体上对会议筹备工作的结果加以评价,就不能不谈我们的匈牙利朋友在这方面所作出的重大贡献,这尤其体现在当会议的筹备机构在布达佩斯开展工作之时。另外,在会议的筹备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的还有如下国家的兄弟党:民主德国、波兰、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蒙古、苏丹等,而与这些党派我们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会议筹备工作的具体积极成果之一,便是扩大了与会者的范围。如果说在布达佩斯协商会议召集时共有 66 个党派的代表参加,那么到了莫斯科会议之时已有 75 个党派的代表出席。

这里,我还想就 14 个未派代表参加此次会议的党派说几句。

我们对其中的两个党派(柬埔寨人民革命党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没有发与会邀请。关于第一个党派——是因为我们与之关系遭到了破坏,至于第二个政党——是因为该党目前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境外委员会请求允许其代表来参加会议。我们满足了他们的这一请求,于是印度尼西亚同志们便以嘉宾的身份被邀请与会,虽然根据一些同志的建议我们决定不论是在报刊上还是在会议文件中均不提及他们与会的情况。

从一开始,中国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便对此次会议持敌视态度,而与其相勾结的有叙利亚、马来西亚、泰国等国的共产党领袖们——这些人一直居住在中国,另外还有亲中国的新西兰共产党领导人。

拒绝参加此次会议的有南斯拉夫共产党联盟、日本和荷兰共产党。而这主要与这些党派领导人政策中所包含的修正主义、民族主义倾向,与其不愿意承担任何因签署共产主义运动的集体性文件而产生的相应义务有关。

越南劳动党和朝鲜劳动党中央均对我们发出的与会邀请表示感谢,但由于他们害怕恶化与中国的关系,因而要求我们理解他们无法派代表与会的苦衷。但与此同时,上述两党同志均强调,他们总体上并不反对会议的指导思想。持上述类似立场的还有老挝人民党。

正如你们所看到的,上述党派不来参加会议的原因都是很不一样的,由此说明他们绝不是某个反对此次会议的统一的集团。

同志们!极其繁重的筹备工作的主要结果——当然是召开会议。

与此同时,此次会议的筹备工作也具有独立的政治意义。在不到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里,经常举行集体性的会谈,在此期间讨论我们运动中相对重大的现实性理论和实践问题,从事思想方面的斗争。这一切必须促成这样的结果:苏共和其他兄弟党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对当前形势评价方面所坚持的马列主义立场为自己赢得了更多的支持者,而那些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动摇分子们,即使在表面上仍保留自己的意见,但实际上已是被迫放弃了原有立场。

在会议筹备的所有阶段始终充满着民主和平等的精神。这促进了各党派之间的信任,增强了兄弟党对会议的兴趣。总之,整个筹备工作为会议的成功举行创造了必要的前提。

二、会议的工作进程

同志们！此次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工作的主要方向和政治内容是由其议事日程和提交给会议审议的文件题目所确定的。

这次与会者关注的重心是我们时代的关键问题——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而帝国主义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世界和平、自由和民族独立的主要敌人。这个问题与共产党和工人党以及所有反帝国主义力量的统一行动——这一最重大问题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会议一致认为，上述统一行动，是我们赢得反帝斗争和共产主义终极目标的胜利的必要条件。

在会议讨论期间，我们极其广泛地涉及了一系列具有原则性意义的重大问题。当然，与会者在发言中主要谈的还是本党的经验及其活动，同时他们还对与整个共产主义运动有关的理论和纲领性一般问题给予了很大的关注。这是可以理解的。集体性地分析一般问题并制定共同的政治纲领——这即是我们赢得反帝国主义斗争胜利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条件，也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不可分离的特点。

不论是会议期间对一般性政治问题的讨论还是会议各个机构的工作，苏共代表团都积极参与。例如你们——同志们读过的我们党代表团的所有发言稿，这便是集体工作的结晶，其中凝结了(苏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心血。

我们在发言中，分析了当今世界的形势和最近十年来世界发展中所出现的一些新进展，评价了现代帝国主义及其政策的一些主要特点以及反帝国主义力量的斗争和活动中的主要问题。我们对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发展及其团结的巩固等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尖锐而有原则地提出了关于与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与任何歪曲马列主义理论和政策的活动作斗争的问题，并就在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为加强共产主义运动团结而斗争的道路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总之，从苏共中央全会所讨论和制定的那些立场出发，我们以坦诚的方式向会议展示了苏共在所有主要问题上所坚持的政治路线。

苏共代表团的发言受到了会议的热烈欢迎。各兄弟党代表们纷纷指出，苏共表明自己立场的举动，对会议的整体工作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许多代表团均强调了我们在发言中所指出的，苏维埃国家的各方面外交政治活动对整个革命事业的意义，如进一步发展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合作，支持各民族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的斗争，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确保欧洲安全、消除世界各地区的战争和侵略的方针，为避免人类遭受新的世界大战的威胁而积极斗争，等等。

关于这次共产党国际会议的整个讨论过程，应当毫不犹豫地指出，总体而言这是一次有意义、有内容的交流意见的大会。

发言的多数同志深刻地分析了当今世界上所出现的新问题，并依据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给出了正确的答案。这里必须指出的是，针对一系列主要的我们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绝大多数党派在会议上所提出的观点均与苏共的立场相一致。

显而易见，我在这里是不可能对各兄弟党代表发言的所有内容都进行详细的分析的，而

只能对他们在会议讨论期间所提出的主要议题作一简要的论述。

从丰富马列主义理论的角度来看，这次会议期间围绕帝国主义诸问题而进行的讨论具有重大意义。根据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在坚持和发展会议文件草案中所提出的思想的同时，同志们从总体上广泛而全面地描绘了现代帝国主义的景象，并对之进行了批判。在一些同志——如法国、民主德国、联邦德国、美国和意大利等的发言中，就现代帝国主义的本质特点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有意义的观点。其强调，在两种社会制度的斗争日益尖锐的条件下，不断发展的形势的重要性，指出在这种条件下，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的活动特点就是导致该社会的总危机不断深化。在分析当代社会发展进程的基础上，进而依此揭示了本次会议的主要议题——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表明从事这场斗争的全部意义就是着眼于各民族的未来。

仍想要指出的，是乌拉圭、巴西、智利、阿根廷、哥伦比亚和圭亚那等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发言中，对资本主义各种矛盾的发展和拉丁美洲各国劳动群众的斗争所作的分析。从这些发言中可看出，近年来在各拉丁美洲国家中发生了重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进步。南美大陆已转变为一个巨大而紧张的社会-政治斗争的策源地。

通过分析科技革命对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影响，一些党派代表提出了不少重要的问题。在这方面所提出的一些有重要意义的内容包括：关于居民社会构成的变化、工人阶级人数的增长及其同盟者队伍的扩展——这不仅体现在反对垄断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而且还反映在为了赢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和社会变革成功的斗争中。

在很多发言中，都包含关于青年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作用的内容。兄弟党们正确地估计了青年在未来革命战斗中即将发挥的积极作用，并极力在青年中开展工作，以便尽可能完整而迅速地把青年们引导到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轨道上来，使之接受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

那些研究现代社会主义——帝国主义的主要敌人和革命斗争的主要力量等问题的发言也引起了与会者的热切关注。

在我们代表团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代表团的发言中，都对现阶段社会主义发展的主要特点及其继续成长的前景作了广泛的分析。会议还提出并分析了这样一些问题：如何在利用科技革命成果的基础上提高社会生产效率的问题，如何完善社会主义国家的全面合作问题以及如何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活的民主基础等，所有这一切无疑将会丰富我们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结构的经验宝库。

代表们在发言中，着力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革命进程中的决定性作用。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许多兄弟党代表团的团长均指出，苏联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政治、经济建设和科技-文化发展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对所有革命者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士起到了无法估量的帮助。他们认为，如果不考虑社会主义友好团结对整个落后世界的影响和深刻促进作用，就无法正确地了解国际舞台上和个别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广泛的社会运动进程。

例如阿根廷共产党代表团代表便宣称，"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是每一个解放运动的指

路明灯”。苏丹共产党代表宣布，“捍卫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是最重大的国际主义义务，因为这一体系的命运不仅事关该体系内的所有国家，而且涉及全世界工人和地球上所有国家的利益”。葡萄牙共产党总书记说，“每一个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从事斗争活动的共产党的成就，均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成功和支持，及其成功对国际社会所造成的影响密切相关”。

来自亚洲和非洲国家的同志们，在会议发言中提出的，涉及当代民族解放斗争的问题也具有重要意义。印度、锡兰等国的共产党和其他党派代表团在发言中，重点关注了如下问题：发展中国家内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深化，这些国家兄弟党针对农民群众而开展的工作，有必要将民族解放斗争与争取社会进步的斗争相结合，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可能性及其前景，等等。

此次会议，还就如何评价现代共产主义运动的现状和前途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

一些发言揭示了近年来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各种困难的客观原因：一些带有各种特殊心理和政治观念的非无产者社会阶层加入到了反帝斗争行列；由于处于不同的斗争条件之下，各共产党首先需要面对的是不同的斗争任务；资产阶级思想的积极作用，有时导致一些政党的政治立场发生动摇。与此同时，会议发言还着力指出某些党派领导人的政治错误也是导致诸多困难的原因。一些发言强调，共产党人开展斗争的可能性是极其巨大的，只有在善于执行正确的马列主义路线、完善党的策略和全面拓展与群众联系的条件下，才能够充分地利用这些可能性。

几乎所有发言，都对在当今我们这个时代实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问题的巨大意义，表现出深刻的理解。而事实上关于团结的议题和各兄弟党紧密联合起来的强烈呼吁也一直贯串了整个会议工作的始终。

我还想在这里强调的是，就如会议讨论进程所显示的那样，共产主义运动正是借助于我们党很久以来就坚持的、为了团结而斗争的思想才保证了自身的步调一致。至于一些由于个别问题所导致的分歧，绝不应妨碍我们反对帝国主义的整体斗争，而共同积极参与斗争自然会有助于我们观点的接近，并最终在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诸原则的基础上克服已有分歧。

如同其他所有问题的讨论一样，在这次会议上关于团结问题的讨论带有公开的、同志式的性质。可能，在共产主义运动中这种直接地、把各种观点进行广泛对照的讨论问题方式已很久没有采用过了。会议期间，我们并没有回避那些存在争议并引起分歧的问题。相反，我们把这些问题都摆在了桌面上。就结果来看，我们认为总体上这些问题都得到了正确的回答。这样做不仅使会议本身充满了同志式的良好氛围，而且无疑促进了与会者在马列主义立场上的团结。公开性质的讨论使我们能够更明确地揭示个别党派与多数兄弟党之间在观点上存在的那些分歧。应当强调的是，总体而言在讨论过程中并没有发生任何我们意料之外的事情。虽然也有个别代表在会议上提出了一些错误的观点，但并未获得与会者明显的支持。整个讨论过程再次表明，有原则地对一些错误观点给予反击，再加上在坚持正确观点的基础上更多一点耐心、更多一点坚持不懈，就会取得好的效果，就会使我们成功地影响那

些与我们运动中的多数在观点上存在分歧的党派。

那么,究竟是哪些党派在会议发言中表明了自己特殊的立场呢?

确定与会者立场的重要标准,就是看其如何对待关于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任务的文件。

众所周知,只有多米尼加党的代表拒绝签署这个文件。其在会议上发表了极其杂乱无章的"左"倾言论,让人明显感觉是受到了中国思想的影响。该发言贬低为和平而斗争和防止新的世界战争政策的作用,否定将各种——和平的和非和平的斗争方式相结合的必要性。针对多米尼加代表的"左"倾论调,许多同志均在发言中给予了坚决的回击,其中包括来自拉丁美洲国家的同志在内。这表明各兄弟党已清醒地认识到,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坚持反对"左"倾斗争的必要性。

同志们知道,有四个兄弟党只同意会议总结文件的第三部分,即表述反帝斗争具体纲领的那部分内容。这四个党派就是意大利、澳大利亚共产党、圣马力诺和(非洲法属)留尼汪共产党。

还有两个代表团——英国共产党和挪威共产党——还在讨论关于反帝斗争任务的会议文件之前,便在本党中央全会上提出对该文件持保留意见。

还有几个签署了该文件的代表团对其中一些问题提出了与会议多数观点不同的保留意见。这样的共产党代表团包括:罗马尼亚、西班牙、比利时、瑞士劳动党。

必须坦诚地说,同志们,上述党派所持立场某种程度上是中了右倾机会主义、民族主义观点和思想的流毒。

以意大利共产党的代表们为例,其所持立场就比较典型。其主要原因在于,该党领导人时常会犯众所周知的脱离马列主义原则的错误,极力迎合意大利居民中小资产阶级阶层的观点和立场,从而希望增加自己对此类人口的影响力。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本身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很大程度上带有资产阶级自由派观点的烙印。其主张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应同时存在政治在野党,并提出"教授自治"、"文化自治"等口号。他们这样做实际是混淆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以资产阶级民主来暗地取代社会主义民主。也正是因此,在国际上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才绝非偶然地发出如下呼吁,实质上就是要求以由民族—民主政党、左派社会主义党派、各种民主组织和运动等组成的更为广泛的联合,来替代以马列主义原则为基础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持上述类似立场的共产党领导人的国家还有:英国、澳大利亚、挪威、瑞典、瑞士等。

其所持立场的特点都在于:对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成就估计不足,只片面强调其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困难和矛盾。

不过,我们也要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除了意大利共产党外以上所列各党派在人数上都不多,与群众的联系微弱,在本国并不具有太大的影响力。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出现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遭到了多数与会者的批判。B.哥穆尔卡、Г.胡萨克、T.日夫科夫、B.罗歇、Г.霍尔等同志均严厉地指出,与此类倾向作斗争是各党派健康发展的条件,是现代革命进程最主要的要求。

如果要对会议所有发言作一总结的话，可以说，关于国际主义、关于在当代条件下国际主义所包含的内容、关于国际主义与我们运动中每支队伍的民族任务之间的关系等议题在会议上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

应当强调的是，绝大多数兄弟党针对这一问题均采取了完全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列宁主义的态度。例如美国共产党总书记霍尔同志便说："我们认为国际主义在我们的无产阶级观念中具有最重要的意义，不认为它是一种负担、一种让步或一具自己不得不背负的十字架。它是我们阶级斗争中的一种主要成分，是我们革命的必要内容。"

在揭示了我们当代国际主义原则的内容和本质的同时，多数同志，还把与各社会主义国家一起采取联合行动，作为自己重点论述的主要方面。例如，叙利亚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巴哥达什便宣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就意味着要支持和维护任何一个国家所取得的社会主义成果——这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义务。我们党认为，无限忠于与苏联和列宁的党的友谊是拥有共产党员称号的主要标准之一"。巴哥达什同志继续道："可能有人会对我们说，——你们这样做就是依附。我们答：否，这才是完全的独立性，这才是完整的共产主义的独立性，是独立于所有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宣传，独立于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独立于社会民主主义思想。"

与此同时，正如我们前面曾提到，在会议讨论期间，也有一些代表在发言中对国际主义问题作了歪曲的阐释。

对此我们不能不提到罗马尼亚代表团所坚持的立场。该代表团的发言——同时也可以看作是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人的基本立场，极力限制国际主义诸原则的适用范围并以自己所理解的狭隘民族利益与之相对，他们针对一系列问题所坚持的立场均背离了社会主义友好团结的根本利益，具体表现为：过分强调自身的独立性、主权、权利平等，同时否认把世界社会主义的利益和集体保卫社会主义的实际成果等作为我们的首要任务的必要性。

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诸原则的错误解释，还首先体现在一些党派代表在会议发言中对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认识方面。

鉴于整个该问题，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已被事件的过程所解决。因此这里，我们只在自己的发言中提出一点，即针对这方面的社会舆论我们要保持必要的警惕性，要坚持阶级斗争的立场，要深刻洞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积极活动和民族主义情绪的泛滥对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巨大危害性。我们强调，帝国主义分子们正在积极地利用所有这些因素，以企图迫使社会主义从自己已占领的阵地上退却。

共产主义运动的敌人们和反对社会主义的各种势力认为并早就预言说，所谓的"捷克斯洛伐克问题"的争论，必将使这次共产党国际会议变成一个谴责苏共及其保加利亚、匈牙利、民主德国和波兰等国兄弟共产党的讲台。

可是，他们的这些如意算盘并没有实现。只有澳大利亚、意大利、瑞典等党的代表团以及比利时、西班牙、瑞士和英国等党派的代表以间接的方式对所谓的"捷克斯洛伐克问题"提出了批评性的意见。但他们的做法均遭到了应有的回击。许多党派的代表在会议上就此作

了坚决、坚持原则的和进攻性的发言。他们指出了在捷克斯洛伐克所发生的一切对社会主义的危害。他们强调,为了帮助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党员们和捍卫全世界社会主义的整体利益,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只是做了自己分内的事。

针对那些批评,各社会主义国家的行动的言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代表团团长——该党中央总书记胡萨克同志也作了权威性的驳斥。他在自己的发言中呼吁广大共产党员们要对帝国主义分子所采取的破坏活动的新方式给予清醒的认识。在提请人们注意捷克斯洛伐克事件是反社会主义和反革命力量对社会主义的威胁之后,胡萨克同志对这样一个事实表示了惊讶,即一些兄弟党派只是在对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事态和形势发展有了肤浅认识的情况下,便就所谓"捷克斯洛伐克问题"做出了草率的结论,尽管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已请求他们不要在这方面表现得过于仓促。胡萨克同志对一些坚持类似上述路线的党派作了评价,即这都是由于这些党派受到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宣传压力所致。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代表团所表现出的坚定而坚持原则的立场,充分反映了近几个月以来,兄弟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在社会政治方面的一个重要和积极的发展进程。而对于这一进程,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国际主义立场和我们对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员们的友好帮助,均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同志们,你们知道,苏共中央政治局针对捷克斯洛伐克事件而制定的所有政策,都是出于我们对自身所肩负的国际主义义务的始终不渝的高度责任感,都是基于4月、7月和10月等苏共中央全会所出台的相关决议——强调必须为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主义事业而进行坚决的斗争。

如今,所有那些不对事实持先验臆断态度的人们,都已逐渐了解了近几个月以来所发生事件的真相,人们已完全清楚地认识到,正是由于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所采取的行动,才挫败了颠覆该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图谋,才使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有可能重整旗鼓并组织针对反社会主义分子们的反击(热烈的掌声)。

这一事件的过程最终使捷克斯洛伐克的同志们坚信,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内部的右派们与党外那些得到境外帝国主义分子资助的反社会主义势力联合起来之后会造成多么巨大的危害,而在捷克斯洛伐克果断采取摧毁社会主义的敌人及其帮凶的举措又是多么的必要,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员们由此得出如下结论,必须采取切实举措,以改变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层的人员组成。

近两个月以来,捷共中央主席团和书记处的人员组成、党的领导层得到加强,对各部门党机关的领导工作得以健全,通过采取一定举措清理了反苏的社会主义的最凶恶敌人所使用的各种大众性宣传手段。这些措施,加强了捷共新领导层的威望和共产党在捷克斯洛伐克整个社会生活中的领导作用。

如今,我党领导层与新的捷共领导人之间,已建立了良好的、事务性的、同志关系。两党和两国的关系在各方面都活跃起来。我们对此给予高度评价,因为,我们始终认为加强与社会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友谊和合作,是我们党和国家国际政策的最重要方面之一。

当然，要说全面地实现苏联与捷克斯洛伐克双边关系的正常化，现在还有些为时尚早。因为在该国内部右倾势力、社会主义和捷苏友好的敌人们的力量依然相当强大。他们绝不会停止自己的活动，虽然现在他们的活动被迫是以各种经过更巧妙伪装的方式在进行。这就要求捷共领导人仍需花费不少精力，果断而坚定不移地贯彻上述路线，从而使国家转到正常的社会主义的发展轨道上来。至于我们，我们将会一直支持捷克斯洛伐克同志在这条道路上前进。

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经验清楚地表明，在现代条件下与右倾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作斗争，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作斗争是多么的重要。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人都由此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从这次会议公开讨论的资料中你们已知道，多数代表团在发言中，均对目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反马克思主义立场及其分裂活动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并对之持批判态度。

同志们，你们都已了解了一系列事件的经过。前不久，在北京召开了中共九大。会议期间，中共正式确定了公开反对苏联、苏共、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兄弟党的方针。中国人在苏联边境上组织了武装挑衅，在全中国范围内展开了敌视苏联的运动并号召准备反对苏联的战争。北京正加紧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从事分裂活动。

中国领导人在国际事务中所执行的类似路线也是极其危险的，而在该国内部出现并日益发展的迹象，就如我党中央在 1966 年 12 月的全会上曾指出的那样——已对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成果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鉴此，我们得出如下结论：在此次国际会议，如果要我们对毛等人所执行的政策采取回避态度不仅不合适，而且也根本不可能。北京领导人所执行的政策已成为共产主义者在反帝斗争中团结各方面力量的主要障碍之一。因此对此我们必须大声疾呼。经过与保加利亚、匈牙利、蒙古、波兰、捷克斯洛伐克诸党派以及德国统一社会党和法国共产党协商，我们决定，在此次会议上自己的发言中明确地对中共领导人的路线提出批评，虽然我们已预见到，我们针对北京的批评一定会引起某些人的反对。

事实上，齐奥塞斯库同志在会议上自己的两次发言(一次是在依照会议程度回答相关问题的过程中，另一次是在主题发言中)均坚决要求不要对中国领导人的政策提出批评。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出于对加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的关心。

不过，会议的进程充分表明，毛等人政策的反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主义性质，其分裂活动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威胁及其对反帝斗争事业的危害，已几乎被所有兄弟党很好地接受了。而罗马尼亚人在会议上试图使毛泽东一伙免遭火焰式批评的努力，只是公开得到了以观察员身份列席会议的“左翼党派-瑞典共产党”代表团的响应。实际上，罗马尼亚代表团由于这个问题已在会议上处于被孤立的状态。

多数代表团积极支持我们提出的意见，列举了大量北京针对个别兄弟党而实施的有害的分裂破坏活动，愤怒地谴责了北京对苏共和苏联的诬蔑，强调中国领导人实际上是放弃了一切反帝斗争。可以这样说，同志们，除苏共代表团外，在此次会议上几乎 60 个兄弟党代表

均对北京的政治方针作了批判。

包括罗马尼亚和瑞典共产党代表团在内，出席此次会议的所有党团没有一个试图在某种程度上为毛泽东的政策进行辩护。因而，可以肯定地说，此次莫斯科会议已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毛等人所执行政策进行威严地、公开谴责的大会。(掌声)

同志们，问题在于，关于抨击北京领导人的背叛式路线的问题，实际上也是能够使大家在本次会议上团结起来的重要因素之一。

兄弟党也对苏共代表团在发言中和苏联政府在相关文件中所表述的我们党在处理国家间相互关系(包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方面所执行的路线给予了积极的支持。

在这里，我们显然已没有必要详细论述如下问题，即关于近几个月来中国人在我国边境进行军事挑衅以及中国领导人对苏联提出领土要求，等等。你们对这些问题都是知道的。我们对这些问题所持立场已在苏联政府的相关声明和会议发言中作了表述。该立场在涉及捍卫国家利益和苏联安全的问题上是果断而坚决的，但与此同时又是沉稳而克制的，因为我们并不打算使苏联陷入某种欠考虑的挑衅行动之中。针对北京方面的谩骂和污辱，我们依然从苏联和中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出发以坚持原则的、建设性的政治路线作为回应。我们依然真诚地而非作秀式地准备与其进行谈判，因为我们坚信只有这种方式才能够解决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所存在的问题。

针对苏联的上述立场，不仅是出席此次莫斯科会议的兄弟党，而且连全世界的社会舆论都表示赞许。

这里涉及我们与中国的关系。而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们无疑会对这个问题感兴趣。那就不妨就此问题再多谈一点。

在当前中国领导人的反苏路线急剧尖锐的情况下，苏共中央政治局一直关注着我们与中国之间的关系问题。

我们认为，对于中国领导人旨在侵犯我国利益的敌视性政治活动，苏维埃国家首先应当在世界各地区实施积极的外交政策。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采取一系列措施以进一步加强我们东部的边防工作。中央政治局和苏联政府将一如既往地在这方面落实一系列切实举措。远东地区的同志们可能对此了解得更多一些。我们认为，如果我们的边防越牢固，那么在我国东部边境上爆发真正的、严重军事冲突的危险性就会越小。

当然，我们制定的对华关系的政策路线的根本性基础，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依然是恢复和继续发展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苏联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正如苏共代表团在各兄弟党会议上以及苏联政府在相关声明中所强调的那样，我们的政策是建立在长期前景的基础之上的，我们始终牢记一点，即苏联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而这些利益的一致，终究会使中国返回到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加强友谊和合作的道路上来，同时也要求我们必须为此竭尽全力。

同志们！在评价此次会议的整个过程之时，可以不打任何折扣地说，会议进行得很好，

很有成果。就像共产党应当做的那样，会议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讨论问题。各党派公开表述各种观点的做法不但没有恶化会议气氛，反而更促进了相互间的了解。几乎所有代表团都极力使会议工作富有建设性的性质。

就我们这方面而言，应当直言不讳地讲，参与这项巨大而不轻松工作的不仅有苏共代表团成员，而且实际上连所有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成员也包括在内了。

我们认为这样做是有益的，即尽可能地让我们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都出席这次国际会议。

应当说，这次会议所做的一切工作对我们大家都是有好处的。我们从中学会了许多东西，比以前更清楚地了解了各党派的立场。而这些为我们进一步成功地促进共产党人之间的团结和实现我们共同的伟大目标，提供了更多的有益手段和可能性。

三、会议的结果和我们的任务

同志们！请允许我对这次会议的结果及其意义做出评价。

正如我们曾经指出的那样，此次大会的重大任务之一，是根据十年来世界上所发生的各种变化对我们革命斗争中所积累的经验做出概括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制定经过协商的反帝斗争纲领，从而有助于取得我们反帝和革命运动的新高潮。

会议的另一个任务是，在中共领导人积极从事分裂活动和我们运动的离心倾向日益加剧的条件下，在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实现向共产党和工人党团结一致的局面的转折。

今天，我们已有充分的根据说这样的话，即会议已圆满地解决了上述任务。这不仅指我们在克里姆林宫召集的这次为期 11 天的会议所取得的成果，而且还包括此前为召集会议我们所作的长期准备、多次的讨论、多方接触、思想斗争以及这次在莫斯科所通过的各种文件的政治影响，等等。

事实上，所有这次与会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们都对会议持有类似上述的评价，具体如下："历史性的会议"，"巨大的成功"，"是为了工人阶级的事业、为了实现和平和社会主义的反帝斗争的新阶段"，"是恢复我们运动团结的重要转折点"，"是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史上的著名事件"。(掌声)

具有同样典型意义的是，我们的敌人对这次会议做出的评价。大家都还记得，他们最初是预言会议根本就不可能成功召集。之后，资产阶级报刊又胡说什么，会议可能会召集，但其最终唯一的结果便是分歧的加剧。如今，在用尽了各种方式以贬低会议的意义之后，资产阶级报纸不得不承认共产党所取得的毫无疑问的胜利，首先是苏共的胜利。例如，在拥有影响力的英国周刊《观察家》上关于会议写有如下内容："全世界共产党会议是苏联在外交和政治上取得的显著成就。通过分析与会者的立场表明，在共产主义运动所面临的一系列主要问题上，就本质而言与会者之间的分歧并不太大。"又据最大的美国通讯社——美联社报道，"各种建议将成为这次会议的满意成果"。《纽约时报》指出，"苏联希望并获得了多数对自己普遍立场的支持"。总之，近期此类五花八门的评价逐渐出现在资产阶级报刊上。

根据我们所掌握的资料来看，美国、联邦德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政界领导人对此次会议的评价是：这是共产主义运动的胜利，是苏共和苏联的胜利。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些具体的会议成果。

首先，我想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与会的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有能力制定出经过协商的政治立场和能够将所有反帝国主义力量联合起来的总的行动纲领。我们所做工作的成果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是这次会议通过的各种文件。

正如你们所知道的，同志们，其中有这样一些文件："现阶段反帝斗争的任务，共产党和工人党以及所有反帝国主义力量的联合行动"，关于越南问题，保卫和平呼吁书，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100周年诞辰致辞。另外，根据各代表团的建议我们又通过了一系列文件以表述会议对当前一些现实问题的态度。

我们认为，正是由于几乎所有与会者在立场和观点上的统一，我们才成功地就如此广泛的问题达成一致，这本身就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尤其是当回想到，我们是在如此复杂的条件下，在分歧如此尖锐的情况下开始会议的筹备工作的。

这里，我们首先必须指出的是上述所列文件中的第一份文件的意义。关于该文件的内容，你们——同志们想必已是非常了解了。我这里想强调的是这份文件的特殊价值，这主要体现在内容方面：在各兄弟党的集体努力下该文件对世界形势作了具体的分析，得出了关于共产主义运动的策略和战略的重要结论，指出了革命力量在反帝斗争中所拥有的新的后备军和可能性。文件还把对世界发展问题的分析与反帝行动的具体纲领紧密结合了起来。

这份实际上已获得了几乎所有与会者赞同的行动纲领，囊括了共产党人为了实现自己的直接、最终目标而奋斗的主要战略和策略方针。这是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方针。它们将有助于共产党员们与那些试图把毛泽东路线和其他各种"左"倾、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强加给各兄弟党的做法作斗争。该文件还包含了许多适用于所有反帝国主义力量的内容，从而使其成为共产党人与其他反帝国主义战士们结成广泛团结的行动纲领。

可能认为，该文件最大的价值在于其中表述了马列主义对一系列理论问题的立场，也正是由于一些党派对这些理论问题阐释上的错误成为导致共产主义运动发生分歧的原因之一。我们之所以赋予该文件以重大意义，是因为它包含了这样一个论题，并由此得出"捍卫社会主义——共产党员的国际主义义务"的结论。尤其重要的是，该论题阐明了这样一个观点，即一些党派在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上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相关问题作了错误的解释。

总之，此次会议的总结性文件已远远超出了就(各党派)在反帝斗争中联合行动的有关问题进行简单协调的范围。我们完全有理由说，该文件为我们克服在个别思想和理论问题上的分歧，为我们以马列主义为基础，进一步顺利进行加强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斗争奠定了根基。

我们认为，本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对列宁100周年诞辰的致辞的文件也具有重要意义。实际上，这是本次会议出台的一份最重要的思想文件。它极其坚定地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即马列主义就是共产党的思想纲领。这是对毛泽东主义的回击，是对中国试图以"毛泽东思

想"替代列宁主义的觊觎的回击，是对"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回击。尤其重要的是，在本次会议上没有一个代表团表示反对通过这份文件——该文件在会议闭幕式上在所有与会者的掌声中获得一致通过。(掌声)

另一个也相当重要的会议成果是：会议强化了各兄弟党要求团结的意愿。

会议期间，一些代表团在发言中发出的个别不和谐声音并没有改变整个会议的和谐氛围。马列主义者们从会议讲台上发出了坚决反对机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呐喊。这充分表明了多数兄弟党政治上的成熟。

忆往昔，我们坚信，本次会议将从思想和政治上促使那些尚处于迷茫状态，倾向于错误立场的人们清醒过来，并为这些人提供了新的多种可能性，以帮助其返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而如今，对我们而言，关键是如何充分利用这些可能性。

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应当说我们还提到了一项重要的会议成果，而这对所有苏联共产党员都很重要，这就是：作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力量——苏联共产党再次在本次会议上令人信服地发挥了自己的作用。(掌声)

这里我想指出的是，关于苏共和苏联的作用问题，关于如何看待我们党和国家在几乎所有代表团发言中所占据的显著地位的问题。我们可以以哥穆尔卡同志的发言为例。后者宣称："任何事和任何人，都无法否认苏联在世界反帝战线中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苏联的这一作用——便是头号社会主义国家的作用，正是这个头号社会主义国家开辟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预定了整个人类的历史。苏联人民巩固了这个国家，又以巨大牺牲和努力建立了一个新的社会制度。正是这个头号社会主义国家在二战期间赢得了对法西斯暴君的伟大胜利，而这场胜利改变了世界力量的对比，为中欧、中国、朝鲜和越南等国家开辟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

……苏联是当今帝国主义侵略道路上的主要障碍，保卫人类免遭帝国主义的核恐吓，支持和帮助了民族解放运动，成为所有为获得自由和独立而斗争的民族的坚强支柱……"

卡达尔在会议发言中说："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与我们都拥有平等的权利，他们在这方面并没有提出更多的要求，但他们在自己身上却肩负了无法估量的、比我们任何人都重大责任。为了共产主义事业、各民族的自由和防止世界战争，以及未来人类的福祉，在以共产主义精神指导自己行动的同时，他们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无私地承担了比其他任何人都大的牺牲。"关于此发表了诚挚和热情讲话的还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以及美国、加拿大、智利、乌拉圭、葡萄牙、丹麦、以色列、印度等国共产党领导人，古巴共产党代表和许多其他著名的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

苏共和苏联人民所取得的伟大历史性胜利，成为整个地球发生巨大变化的源泉，我们党和国家在当今反帝、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胜利的斗争中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苏联给予革命和解放运动的巨大支持，——所有这一切都在各兄弟党代表的发言中得到了应有的反映。而关于上述事实，甚至连那些在一系列问题上与会议多数持不同立场的代表们也不否认。这里之所以强调这一点，并不仅仅是由于我们为自己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工作和斗争得到

人们的高度评价而感到自豪。加强各兄弟党与苏共和苏联的友好、合作关系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将是我们整个运动和全部反帝斗争的重要力量保证。

这里还想特别指出的是,苏共对共产主义运动其他队伍的工作环境、斗争条件和所面临问题所表现出的深刻理解,给各兄弟党同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此,各兄弟党均给予了如下评价:苏共在会议上始终致力于民主的工作方式。

还有这样一个事实,即与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报刊相比,苏联报刊对会议工作情况所作报道都更为全面和客观。这再次证明我们对各方面问题所持的严肃和现实主义的态度,证明了我们对自己立场正确无误的自信,而我们之所以会这样,都是由于我们依靠的是马列主义真理的力量。

通过总结我们所做的各方面工作,可以罗列出如下主要成果:

——会议认为,虽然在自身发展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困难,但共产主义运动依然是当代最强大的政治力量,是反帝斗争的先锋队,这一运动将有助于我们创造性地解决一系列复杂的政治和理论性任务;

——在制定了经过协商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以及反帝斗争力量的统一行动纲领之后,会议便为赢得现阶段反对反动派和战争的斗争,为争取和平、民主、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的胜利而奋斗的明确目标和任务,武装了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

——会议称自己为以马列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为基础的共产主义运动团结道路上的重要阶段。而会议顺利召集的事实本身及其成果便是对帝国主义宣传机器发出的所谓"世界共产主义危机"的诽谤的毁灭性打击;

——会议再次表明,苏共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公认的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力量(掌声);

——在积极主动地与其他党派一起做了大量的政治、理论和组织工作,克服了所有会议召集过程中出现的困难之后,苏共表现了真正的马列主义原则性并充分意识到自己对世界工人阶级和共产主义运动所肩负的责任。也正是因此我们列宁主义的党才履行了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持续不断的掌声)

同志们!会议本身自然是无法解决所有问题的。无论这次会议以多么完满的方式结束,它都不是我们争取共产主义运动和反帝阵线团结的斗争的终点,而仅仅是这一斗争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会议帮助我们登上了一个新的基点,而我们在加强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同时,即将从这一基点出发开始向帝国主义发起更加广泛和积极的进攻。

与此相关,我想强调一些从会议工作中引申出来的、我们需要完成的任务。我这里指的是会议期间通过的一些决议,如关于召集各民族反帝国主义国际大会,关于召集维护欧洲安全的各民族国际会议等。我们将与其他党派一道共同完成这些任务。

一些党派拥护我们提出的,关于就我们运动中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理论和政治问题(包括那些引起尖锐争议的问题在内)组织创造性的讨论和理论性国际会议的建议。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落实这一建议。

还有人提出了关于定期召集共产党国际会议的建议，其中既包括世界性的，也包括区域性的。而提出这些建议的事实本身就是具有相当大的意义的。这说明大家正极力倾向于集体式的工作模式，倾向于将各兄弟党的努力联合起来。我们必须在以后认真对待这些建议，并采取相应的方式以促其落实。

我们当前所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制定一个具体的措施性计划，以便能够更有效率地利用和发展会议所得出的那些成果。而当我们在这里，在这次全会上商议之后，便将由政治局负责这个计划的编制工作。我希望在此次会议的预备程序中关于我们未来工作的主要方向问题谈几点想法。

会议及其成果完全印证了我们党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方针，我们旨在团结社会主义力量、世界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的政策的正确性。我们将继续积极贯彻这一政策。

该政策的最重要环节依然是必须坚持以下措施：在坚定维护马列主义立场的基础上，加强与社会主义国家各兄弟党和其他共产党、工人党的联系。我们认为自己的首要任务是进一步加强我们运动核心的团结，增强其对其他共产党和工人党，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力。

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到，总体情况表明此次与会的各兄弟都积极倾向于团结起来。当然与此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对这些成果过于陶醉，无论它们的意义有多么的重大。因为目前共产主义运动的形势依然相当复杂，而团结的进程将不会是自然而然式的自己成为现实。关于这一点，即便从会议上表现出的一些事实便看得出——这次依然有一些党派没有与会，依然有几个与会的党派对会议文件提出了保留意见，最后还包括一些党派在会议上所作的(异类)发言，等等。

而且近几个月来的情况发展也印证了我们的判断，即针对个别尚处于动摇状态的党派，及其背离马列主义路线的做法我们绝不应听之任之，并被迫与之妥协。所肩负的国际主义责任要求我们，必须加强自身对这些发生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进程施加政治和思想上的影响。这无疑是一项困难而复杂的工作，而且遗憾的是，这项工作并非总能在短期内得到预想的结果。但是，只有我们在今后更顽强、更善于和更策略地落实这项工作，它才会取得更有效的结果。

这样的工作在我们与罗马尼亚同志的关系上已取得了一些成果。你们知道，罗马尼亚代表团一度示威性地退出了协商会议的会场，而如今它也签署了会议文件。我们还可以举出这样一个事实。近期，罗马尼亚领导人已开始在华沙条约和经济互助会范围内更加积极地与其他国家合作了。在关于与苏联友好互助的新条约文本的问题上，当我们拒绝了罗方建议的我们无法接受的文字表述之后，罗方做了一定的让步——实际上是接受了我们提出的条约草案。最近我们就要签署该条约。所有这一切当然并不表明，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人已然放弃了自己在关于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体系的许多重大问题上所持的错误立场，但正说明我们针对他们的工作必须更顽强地继续开展下去。

我们必须继续顽强地开展针对意大利、英国同志以及其他党派代表的工作，因为他们在

一系列重要问题上的立场都是错误的。

同样也可以谈一下关于我们与那些拒绝参加此次会议的党派的关系问题。就拿越南和朝鲜同志为例吧。显而易见，我们不能说减弱我们党和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与他们的联系的话的。即使在存在这样一个事实的情况下，即越南民主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报刊，对于会议工作及其所通过的文件上都持实际上的沉默态度，也不能使我们的上述立场发生任何改变。相反，由于我们根本利益上的一致，势必要求我们加强与这些党派的关系并发展与他们的友谊和合作。

我们认为，有理由发展(苏共)与日本共产党的关系。众所周知，近年来该党在活动中起初表现出的是强烈的"左"倾、亲中国思想，然而又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例如，日本共产党领导人明显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危险估计不足。其实际上是加入了关于要求将千岛群岛归还日本的反苏复仇主义运动。日本共产党领导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及其丧失阶级立场的举动在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中明显表现出来。然而近期，尤其是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内形势已趋于正常化的情况下，日本共产党领导人开始声称，尽管与兄弟党之间仍存在分歧，但它已准备在反对帝国主义的问题上与各党派采取一致行动。我们认为，应当引导日本共产党的活动朝着这一方向发展。这样做将有助于逐渐克服该党与我们运动的多数之间所存在的分歧。

我们过去所做的停止开展针对南斯拉夫共产党联盟的政治工作的做法，现在看来是个错误。我们认为，在从原则上批判南联盟错误的理论和思想方针的同时，我们今后还应当从国家层面上坚持正常发展(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关系的方针，也可从党的层面保持与南斯拉夫同志的接触并利用这种接触对南联盟施加影响。

我们对加强共产主义运动团结诸问题的态度是：将耐心开展工作与必要的灵活性相结合，其中包括在处理我党与那些出现动摇和犯了错误的党派的关系方面。我们之所以采取这种态度是为了坚定地捍卫马列主义的政治原则，循序渐进地与各种错误观点、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以及民族主义等进行思想上的斗争。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未来我们仍将面临与共产主义运动中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影响的尖锐的思想政治斗争。在本次会议结束之后，根据会议所制定的路线，我们将强化这方面的斗争。我们的方针是：进一步广泛展开马列主义反对其所有敌人的进攻。

与此同时，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必须有区别地进行。当我们从事反对阶级敌人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时，是一种情况；而当涉及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思想斗争，涉及与那些有时提出了错误的观点，但依然是我们的盟友，或者我们想使其成为自己的盟友的人们的斗争之时，则是另一种情况。在第二种情况下，这种斗争不仅仅是"反对"——反对错误和有害的观点，而且斗争的首要目的——在于说服、在于引导，即通过斗争的方式把那些暂时迷失了方向的同志引导到正确的立场上来。这里既经常会进行有益的、同志式的、友好的争论，而有时则要表现得相当克制。列宁曾教导我们说，共产党各党派之间所存在的许多分歧都可以通过实践经验、事件的过程本身、对站不住脚的错误方针的揭露等方式来加以解决。

因此，关于意识形态斗争的方式、方法的问题便具有了极其重要的意义。这次会议的成

功便是这方面明显的例子。会议期间，我们在推动并开展了尖锐而公开的争论的同时，也获得了多么巨大的收获。总之，正如我已经说过的，这样做就能够加强我们的立场，因为要回应一个错误的发言，就会有几十个正确的发言紧跟其后。

这里还有必要从政治方面来考虑这一问题。在对我们采取敌视态度之后，北京领导人便会极力把所有那些被我们赶走的、受了委屈的人们拉拢到自己身边，并可能利用这些人的不满来反对苏共和其他马列主义政党。显而易见，我们不能做有助于其实现此类伎俩的事，因为这不符合我们的利益。

同志们！截至目前，我们谈了关于我们活动的方向和任务等问题，而这些均与会议的工作及其决议直接相关。不过，全会的与会者们都很了解本次会议的中心问题——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加强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挫败中国领导人的敌视阴谋。这也是我们党所面临的更为广泛的任务，它实际上涉及了我们党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所有活动。

我们大家首先都认识到，目前积极开展和完善思想教育工作是多么的重要。

要了解共产主义运动及其加强团结斗争过程中所发生事件的进展情况，以马列主义、国际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精神为指导，来培养教育所有苏联人民就具有了更为重大的意义。为自己的党和国家而自豪的情感、深刻理解我们所做的所有事情的国际主义意义、尊重兄弟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所有这些都成为有觉悟的共产党员、有觉悟的苏联公民的特征，这在当前条件下显得尤为重要。我们正是这样来加强本国各民族的友好和兄弟情谊的。而如今这方面内容，正如这次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所显示的那样，也具有了巨大的国际意义。我们是在持续不断地与资产阶级思想和民族主义影响的斗争过程中，在以马列主义学说武装群众的进程中培养教育所有人，以使之获得这些(优良)品质的。今后，我们仍需将所有这方面工作提升到更高的水平。

会议为我们展开这方面工作奠定了极其有价值的基础。如今，相关会议资料理应成为我们从事思想-教育活动和我们党的宣传工作的核心内容。这次会议工作的成果使我们发展马列主义理论的事业获得了新的进步。会议文件中所包含的思想——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是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巨大财富。如今，我们的思想战线应当遵照会议文件所确定的方向开展广泛的思想教育和理论工作并从中得出必要的结论。这将有助于我们的理论干部的积极创新，有成效地解决我们当前所面临的各种政治问题。

众所周知，我们党的积极分子直接参与了苏共在国际许多领域的活动。这就意味着，这些人尤其应当认真地学习会议资料并用之来指导自己的工作。

对于(国内)各报刊、全军所有的宣传员和鼓动员而言，与以往任何时间的不同在于，其目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搞清楚苏共的根本路线，尤其是与中国问题，与中共领导人所执行政策有关的内容。因为正是在这里，如同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的，出现了一个严峻的斗争战线，而从各方面情况来判断，这条战线将会长期存在。而我们党在国防和外交领域所采取的那些预防性措施应当采用各种思想-教育手段来强化，在坚信我们事业正确无误的基础上以全体苏联人民的新团结来强化，从而掀起一场强大的爱国主义高潮。(掌声)

我们党和人民的利益、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要求，不仅要以我们的宣传机器来揭露毛泽东及其集团的反苏阴谋，更重要的是还要揭露中国领导人整个国内、外政策的反马克思主义和反社会主义的本质，整个揭露过程要深刻、论据充分和全面。这已是我们所有参与反对北京的敌视政策的同志们的责任。

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我们理论工作的意义正变得更加重大。会议再次向整个运动表明，苏共——是一个在理论领域拥有巨大力量的政党，有能力在各种复杂的情况下在高举马列主义理论旗帜的同时对世界形势进行创造性的分析。毫无疑问的是，未来我们在兄弟党中的威望，将更多取决于我们的理论工作水平如何。

我们的外交政策面临着重大的任务。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们的对外政策都在整个反帝国主义斗争力量中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是打破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维护和平、捍卫和平共处原则、支援解放斗争的有力武器。最近，党和苏维埃国家外交政治活动的相关问题，将要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例会上进行讨论。届时，我们会向民众详细解读这次例会的相关资料。

我还想简要涉及这样一些重要且复杂的任务，即我们将如何来解决与加强社会主义友好团结相关的问题。这里我主要指的是这样一个任务，即在发展一体化的同时，(苏联)如何与经互会成员国在经济上进一步拉近距离以确保这些国家的民族经济能够更紧密地互动。

我们这里所涉及的问题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主义体系的未来，这就是要为社会主义体系的政治团结建立牢固的经济基础。我们必须牢记这样一个事实，如果不把与首先包括苏联在内的兄弟国家的经济合作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那么我们盟友中的任何一个国家在自身国土规模有限、市场狭小和原料基础薄弱的条件下都是不可能顺利发展现代经济的。而如果我们做到了这一点，那自然就会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稳定并促进社会主义体系牢固的政治团结。帝国主义针对个别社会主义国家所实施的破坏活动计划就是想要把这些国家纳入到在经济上依附于西方的范围之内。

今年4月在莫斯科召开了经互会第23次特别例会，各兄弟国家政府和共产党代表均参加了会议。会议讨论了社会主义一体化发展的问题并通过了相关重要决议。而要实现这些决议内容则仍需要所有兄弟国家，当然也包括我们在内，付出相当大的努力。我之所以把所有这一切在本次全会上提出，就是想让我们所有从事与兄弟国家经济联系方面工作的同志们更好地了解这个问题的政治意义，从而在兼顾苏联和各兄弟国家相互利益的基础上正确地解决这一问题。

还有一点，希望能引起大家的特别关注。这就是我们自身的经济成功和科技成就，苏联国防力量的加强对反帝斗争和发展革命进程，以及我们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威望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你们，同志们完全可以在会议资料中找到许多与该问题有关的明确表述。这些内容激发了我们情不自禁的自豪感并再次向我们证明，我们日常所从事的与国家经济建设，科技、文化发展和提高人民福利等相关事务所具有的国际意义。

但与此同时，这也提醒我们自己所肩负的这方面工作的责任有多么的重大。应当让各

经济部门的领导干部——不论高级还是低级的——以及各级党组织和成百万的苏联劳动者们都更好地认识到这一点。他们的精力应当首先投入到全面提高劳动生产力和社会生产的效率方面，投入到加快我们国民经济各领域的科技进步速度方面。

如果说到我们目前最紧迫的国民经济任务，那首先必须说的是：顺利地完成当前所面临的五年计划。各企业集体、各部门和共和国都要很好地履行自己所承担的义务，从而能够以提前完成五年计划来庆祝即将到来的列宁诞辰。而是否能够无条件地完成五年计划和自身所承担的义务，使1969年成为真正列宁式的突击工作之年——这是一个关系到所有党组织，所有国民经济工作人员的荣誉的问题。

今年，我们在农业领域仍需要解决一系列重要而复杂的任务。在国家一些地区气候条件不利于农业和畜牧业生产。这就需要我们更紧张地投入到工作之中，如有组织地进行农作物的播种和收割、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加工等。我们必须在短时间内迅速提高畜牧产品，尤其是肉类的生产速度。

各级党委和所有党组织的责任，就是要动员共产党们和所有劳动者来完成这些任务。这不仅是我们对自己国家所肩负的责任，而且是我们对全世界革命者所肩负的义务。我们必须使国际主义责任感转化为新的鼓舞我们人民完成共产主义建设任务的忘我劳动。

简要说来，以上便是从第三次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成果中所得出的，今后我们活动的主要方向和我们党的主要任务的相关内容。

同志们！苏联人民始终密切关注着本次国际会议的工作情况。会议收到了数千封我国劳动者发来的信件和电报，他们在其中表达了自己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忠诚，为反帝斗争事业做出新贡献的不可动摇的决心，及其对苏共政策的一致拥护。共产党员们和所有苏联人民以极其满意的心情接受了会议的成果。

在这一段时间里，会议文件和资料正在民众中间进行广泛的讨论，并已成为人们的主要议题。在众多发言和声明中劳动者们均对会议成果及其所通过的文件给予了高度评价，并指出，此次会议本身标志着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各民族的反帝、争取和平和社会进步的斗争已步入了一个重要阶段。

会议的顺利举行，在国家内部掀起了一个巨大的政治和劳动高潮。这就是——对会议成果的良好评价。同志们，这就是对我们在巩固共产党和工人党团结方面所进行的全部活动的最好支持。这种支持对我们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其中表达了我们多民族国家全体人民的意愿。（掌声）

同志们！我们党对所有国家共产党生活中的这一重大事件——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结果是满意的。

会议的成功必然会对我们在各条战线和各个方面——开展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不过，我们满意已完成的工作与盲目乐观完全不是一回事。我们坚信，会议的成果将会更加激励我们全党和全体苏联人民去解决我们当前所面临的任务，鼓舞我们党为了共产主

义的新胜利而争取新的伟大成就。(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

中场休息之后

会议主持：佩尔谢同志。

同志们,全会继续进行。下面发言的是П.Е.谢列斯特同志——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格里申同志作发言准备。

谢列斯特：同志们！如今,整个世界都密切关注着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巨大成果。地球上所有进步的人们都受到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和促进。

我们在思想领域的阶级敌人——帝国主义分子以及马列主义的变节者和叛徒们——事先采取了一系列疯狂的举动,企图干扰各兄弟党会议的召集。他们近乎疯狂地夸大个别党内部以及他们之间所存在的和不存在的分歧,挑拨共产党人之间的冲突。

这其中便有美国国务院。其曾发表了一篇名为"关于全世界范围内共产主义党派"的报告。在反对此次会议的过程中他们把各类叛徒们联合了起来。他们唾沫四溅地诬蔑马列主义政党,高喊什么不必维护共产主义的兄弟情谊,似乎各党派的存在只是个形式,而其心灵都是死的。

当会议召开之后,共产主义的敌人们又开始不遗余力地试图抹杀和贬低其历史意义。他们指责说,会议尖锐地激化了分歧,甚至将发生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而其最终结果似乎必将削弱苏联的对外政策立场。

不过,所有上述企图都在共产党人不可遏制的、追求反帝斗争团结的压力下被瓦解,化成了过眼烟云。现实使所有这些虚伪的预言家们成了人们的笑柄。如今,许多资产阶级报刊和广播机构不得不承认,破坏和抵制会议的思想破产了。

众所周知,曾几何时在个别党派领导人中存在有一些怀疑论者和信念不坚者。他们对举办此次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适时性、可能性和迫切性均怀有疑虑。只是在苏共中央和其他兄弟党做了大量而耐心的工作之后,他们中的许多党派才改变了看法并参加了会议。

有一些党派拒绝参加会议。但如今这些党派的领导人,可以说,已处于来去两难的困境。因为他们现在很难向广大党员们解释,自己当初为什么要那样做和为什么要对履行国际主义义务采取那样的态度。

Л.И.勃列日涅夫同志在会议上的发言,在进一步加强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团结的斗争中起到了极其重大的作用。作为与会者,我们亲眼见证了该发言在所有参加共产党国际大会的党派代表中间引起了多么巨大的关注和多么由衷的赞叹。

该发言论述深刻而具说服力,内容详尽而务实。其中对帝国主义的强大和薄弱等两方面都作了客观的评价,坦诚地叙述了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存在的困难,对毛泽东集团的分裂活动作了清晰而明确的评论。共产党员们都将勃列日涅夫同志的发言称作我们党和各兄弟党的纲领性文件。事实也的确是这样。在听取这一发言的同时,我们为我们党及其光荣事业而感到无比的自豪。

勃列夫涅夫同志在此次全会的报告中，深刻而全面地分析了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筹备、会议工作、所通过决议及其所确定的我们党要实现的具体任务。

让我们——苏联共产党员们感到高兴和鼓舞的是，我们党成了会议的倡导者。尽管存在有大家都知道的困难和政治分歧，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仍是通过进行大量的政治和组织工作，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的基础上，确保了共产党人们的团结。而在这次会议上，众多党代表团在发言中，给予我们党所做工作的高度评价也让我们感到欢欣鼓舞。

会议工作及其所通过的文件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胜利，是我们党的列宁主义政策、中央委员会及其政治局正确路线的胜利。

近两天召开了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全会。全会一致、完整、全面地赞同各兄弟党国际会议所通过的文件。

同志们！与会议的举办及其所通过的文件相关，乌克兰共产党明确了自己未来的任务：广泛开展学习和宣传各兄弟党会议成果以及本次中央全会的决议和资料的工作。乌克兰共产党将更好地利用自己的一切可能，来加强世界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斗争团结，显著提高自身以马列主义教育广大党员、共青团员和所有劳动者的水平。

乌克兰已在以国际主义、民族友好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精神教育共和国劳动者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是今后，我们能够而且应当，以对我们共产党和苏联祖国的自豪感，对各兄弟党、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和所有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战士们的尊重等内容，把我们教育所有劳动者的工作做得更好。

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目前正在制定相关措施，而这些必将极大地促进在人民中积极开展宣传和各种思想教育工作。我们必须加紧揭露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以及民族主义的观点和观念，以保护我们的人民免受敌视共产主义的宣传的毒害。大家都知道，资产阶级宣传家、中国和其他分裂主义者、修正主义者们均用已破产的托洛茨基主义来作为自己的武器。在一些国家中托派集团实际上已成为了工人运动中的第五纵队，并给各兄弟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托洛茨基主义都是列宁主义的敌人。

毛主义者们——当代的假革命者。他们以托洛茨基主义来武装自己，是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利益的投降变节者和叛徒。难怪帝国主义们会认为他们是自己在反对共产主义运动斗争中的后备力量。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维护马列主义的斗争中一定要加紧揭露所谓毛泽东思想的工作，目的就是要我们的人民知道和认识到他们的反列宁主义本质。

近期，反共产主义和反苏宣传开始将矛头集中到所谓民族主义问题上，并试图以此来对抗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光辉思想。他们竭尽全力的目的，就是要在个别人的思想意识中激起和挑动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残渣余孽。美国报纸《芝加哥每日新闻》不久前曾写道，"'民族主义的复兴'，当在捷克斯洛伐克取得胜利之后，就可能跨向乌克兰，然后再向其他14个苏联共和国扩展"。

在某些地方也出现了一些初露头角的民族问题"理论家们"，他们就像盗窃粪球的屎克

螂一样，竟试图把马列主义按自己的方式来加以阐释，并极力对之进行肆无忌惮的篡改和伪造。

境外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们，积极从事反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活动。他们在世界各地都设立了分支网络，拥有巨大的物力和财力，利用报刊、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手段，以及国际旅游等，大规模从事反苏宣传活动。但是，无论资产阶级宣传机器采取何种方式，其终将难逃失败的命运，关键是我们——共产党人要能够深刻地领会马列主义学说，始终保持(高度的)政治警惕性，并善于一针见血地揭露我们的阶级敌人的阴谋诡计。马列主义——共产党员最强大的武器，而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当学会使用它。

在西德，法西斯和复仇主义黑社会势力的活动越来越猖獗。他们要求修正二战之后所确定的国界，并执行着一项危险而不明智的政策，而该政策正得到国际反动派，首先是美帝国主义者们的支持。

西德一些担任领导职务的活动家竟公开声称，一切有害于苏联的东西都对他们有益。因此他们愿意与所有人作任何交易，其中包括中国分裂者在内。以此为目的，他们极力建立某个欧洲国家集团，以对抗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友好团结。

所有这一切，自然会引起那些在反对法西斯奴役者斗争中遭受了巨大损失的苏联人民的忧虑。

乌克兰共产党和所有劳动者，完全赞成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所执行的列宁主义国内政策、外交政策。他们非常清楚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和安全将取决于苏联的力量和强大。为了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经济和国防更加稳固，乌克兰人民将不惜付出任何代价。

兄弟党会议一致通过的，关于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100周年诞辰的致辞的文件，具有极其重大的政治意义。该文件再次确认，只有马列主义是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基础。它是揭露包括毛集团在内的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者们以各种疯狂思想取代伟大的马列主义革命学说的企图的最重要文件。

该文件鲜明地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列宁与全世界劳动者们是多么的亲近，我们的同志是如此之多，同志们对列宁学说给予了多么高的评价。

乌克兰正在为庆祝列宁100周年诞辰纪念日进行大量的工作。各级党组织极大地提高了自己的政治和组织工作，以动员劳动者们把苏共二十三大相关决议付诸实现。在各工厂、矿山、建设工地、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正更广泛地开展社会主义竞赛，以提前完成国家五年计划第四年度的任务和所承担的相关义务。

同志们！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意味着，在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已开始了一次新的强劲的发展高潮。

乌克兰共产党和乌克兰人民将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实现共产主义宏伟计划的建设之中，并将以应有的姿态迎接和纪念我们伟大领袖和导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100周年诞辰。(掌声)

主持：佩尔谢同志。

下面发言是 В. В. 格里申同志——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库纳耶夫同志作发言准备。

格里申：同志们，Л. И. 勃列日涅夫同志在报告中，全面而深刻地揭示了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历史意义，展示了苏共中央和中央政治局以马列主义为基础在会议筹备和团结共产党、工人党方面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莫斯科的共产党员们和劳动者们一直密切关注着会议的进程。与我们全党一样，莫斯科市党组织完整而全部地支持会议结果、苏共代表团的活动、我们党中央所坚持的旨在巩固共产主义运动和所有反帝力量的团结和统一的路线。

近期，在莫斯科的各企业和组织中都举行了群众性集会和会议，莫斯科人对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成果一致表示称赞。

各兄弟党国际会议是当代历史上最重大的政治事件，如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发展道路上的一个重要标志。会议令人信服地表明，以马列主义学说武装起来的、在阶级斗争中久经考验的共产党人正走在反帝斗争的最前列。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们在同志式的、民主和平等的氛围中讨论了当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表明了不同国家和大陆的共产党人谋求行动上的团结统一的意愿，并得出了关于目前世界形势和共产主义运动的任务的一致性结论。

关于反帝斗争的任务，关于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 100 周年诞辰的纪念性致辞的，支持越南人民的呼吁书和维护和平的倡议书等——所有这些文件均具有重要的原则性意义。其中包含了共产党和工人党以及——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动派和战争，维护和平、各国家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的——所有进步力量的联合行动纲领。

会议结果表明，各共产主义党派已深刻了解了自身对工人阶级的事业、对社会主义的命运、以及世界和平所肩负的崇高责任。会议必将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推进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促进反帝战士们更积极的活动及其国际团结。

在经历了前一次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之后，世界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一些重大的新情况。所有这些都要求我们召集一次(新的)共产党国际会议，以制定一个向帝国主义进攻的以及反对修正主义、民族主义、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的共同纲领。

如今当全世界共产党代表大会圆满结束了自己的工作之后，我们可以完全有理由说，这次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工作成果——是我们党的路线在共产主义运动团结道路上所取得的一个真正重大的胜利。这也是那些始终坚持维护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所有兄弟党所取得的一个巨大胜利。

我们党中央倡议和召集了此次会议，并尽一切可能使这次有各兄弟党代表参加的世界性会议得以成功举行并圆满结束。自 1966 年苏共中央 12 月中央全会以来，我们一直坚持要求召集这次会议。在会议的筹备、吸引多数兄弟党来参会和制定会议文件等方面政治局

做了大量的、并不轻松的工作。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尔内和苏斯洛夫等同志和其他苏共领导人与各兄弟党领导人，尤其是那些持有错误或动摇立场的党派的领导人举行了多次的会面和谈话。正是在这些会面和谈话过程中，我们一步步地清除了过去与一些党派在双边关系上所积累的隔阂，克服了由于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和中共领导集团的破坏活动而导致的种种困难。

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召集和成功举办，相当程度上是在我们党中央、中央政治局和苏联政府的积极促成下才得以实现的。在落实苏共二十三大相关决议的同时，我党始终执行了正确的政策路线，其目的就是要：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确保良好的和平环境，加强共产主义运动和所有反帝力量的团结。在国际政策方面，我们党始终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劳动者的阶级团结诸原则为指导。

近年来，苏共中央政治局和苏联政府在巩固社会主义友好团结和华沙条约组织，扩展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方面付出了重大努力。我们党对越南人民反抗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斗争给予了巨大的帮助，全力支援阿拉伯国家反对以色列侵略的斗争，始终执行反对殖民压迫和全面与已获解放国家合作的方针。

在处理与兄弟党的关系方面，我们党严格遵守团结和相互支持、尊重(各自)独立和平等的原则，这对此次会议的成功举办也具有相当大的意义。为了提高共产党在革命运动中的作用和捍卫马列主义的纯洁，我们党一直在进行顽强的斗争。

正如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与会者们对苏联及其共产党所发挥的卓越作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其是和平和社会主义的基石，是反帝斗争中的决定性力量。诸多兄弟党领导人对苏共和苏联发出的热情赞誉言辞，使我们由衷地为我们的党、我们的中央而感到自豪。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苏共代表团坚定而始终不渝地捍卫马列主义诸原则。勃列日涅夫同志在其深刻的发言中，所阐述的我们党的立场，对会议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苏共代表团团长在发言中，科学地分析了国际形势、当代一系列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状况，明确了我们反帝斗争的主要任务。苏共代表团发言中所包含的评价和结论，是我们党在革命理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策略和战略的制定方面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勃列日涅夫同志在发言中，对中国所发生的事件、中共领导人的政治方针，以及毛泽东集团坚持的大国沙文主义和分裂路线的危险性等所作出的原则性评价，对维护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团结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反对各共产主义党派、具有霸权主义和大国主义倾向、觊觎他国的领土、史无前例地诬蔑苏共和苏联，及至最后在边境上向苏联发起武装挑衅——所有这一切均说明，毛主义者们与马列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的差距已是多么的巨大。

在中共领袖们以自己的主要路线反对苏共和苏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情况下，坚定地揭露毛主义者们的冒险主义政策，便成了我们的当务之急和各国共产党员们的国际主义义务。

多数兄弟党代表们，把中共现任领导人所执行的反列宁、反苏和大国主义方针，看成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异类并给予了坚决的谴责，这一事实使我们感到莫大的欣慰。

会议对毛泽东集团的危险方针所作的原则性批判，必将有助于动员各共产党和工人党全力投入与中国领导人的敌视性政治活动的斗争之中，必将有助于加强中共内部那些依然坚持马列主义立场的人们的力量。

勃列日涅夫同志在报告中指出，多数共产党和工人党都对所谓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作出了正确的评价。我们大家都知道，为了改变捷克斯洛伐克国内的政治形势、帮助捷共的稳定和使捷共中央返回到与国内右倾修正主义和反革命势力坚决斗争的轨道上来，需要付出多么大的努力。正是由于苏共中央的大力帮助和我们党履行了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才使得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内局势得以向好的方向转变。

近几个月来的情况充分证明，苏共中央政治局和其他兄弟党所采取的与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相关的举措，是唯一正确的选择。而多数共产党代表团，在会议上对上述举措的坚定支持和赞同，也足以说明这一点。他们都着力强调，捍卫社会主义既得成果以使之免遭其敌人的蓄意侵犯——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主义义务。

会议制定了共产党员的统一行动纲领，这是加强共产党和工人党团结道路上的重要一步。如今，各兄弟党所面临的主要工作就是落实会议所通过的相关决议。而与会议结果相关，关于我们党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勃列日涅夫同志已在自己的报告中作了详细的说明。

当前，莫斯科党组织正在会议资料的解释宣传方面开展大量工作。从事这方面工作的有宣传家、鼓动员、政治时事宣传员和广大党员积极分子。

在研究和学习会议资料的过程中，共产党员和劳动者们均热烈称赞会议结果及其所通过的文件，同时表示根本不赞同澳大利亚、瑞典和意大利等党派代表的发言，及其对社会主义国际主义问题所作的解释。他们还表示，不同意罗马尼亚共产党代表团领导人发言中的一系列观点，并要求会议坚决批判中国领导人的分裂政策。

莫斯科共产党员们表示对如下情况感到非常满意，即近年来在我党中央全会上除了一系列国内生活问题外，还讨论了对外政策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而苏共中央会定期向党内通报这些问题。这表明，我党中央始终坚定不移地遵守列宁主义的党内生活模式，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在工作中的民主作风。定期向广大党员通报国际政治方面的问题，将使其能够更好地了解世界形势、共产主义运动相关问题，进而正确地认识这些问题，从而能够更有目的性地在群众中开展政治思想工作。

莫斯科党组织从事所有与宣传和解释会议资料有关的工作的目的，就是想以此来提高广大党员和全体劳动者的政治和劳动积极性，完成各项经济任务。莫斯科工业和城市经济部门的工作者们，以提前结束五年计划的干劲，正在顺利地完成自己所肩负的生产计划和义务。当前，莫斯科人正处于即将完成上半年产品销售额和主要工业品生产的阶段。城市建筑工人们，根据首都的设计规划，正在完成大量的住宅、文化-生活和工业设施建设项目。科技工作者们也在加紧工作。而为纪念列宁诞辰所做的准备工作，越来越广泛地一天天开展起来。

莫斯科的广大共产党员和所有劳动者们，紧密地团结在我们党和党中央周围，一致支持

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内政、外交政策。为了顺利实现党的二十三大和苏共中央历次全会所提出的任务，为了完成国家的五年计划并以应有的姿态来庆祝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100周年诞辰，他们将不遗余力。

这里，我以莫斯科市党组织的名义提出建议，让我们完整而全面地赞同苏共中央政治局在筹备和举办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方面所做的工作以及会议所通过的文件，赞同苏共代表团在此次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所执行的路线及其实际活动。(掌声)

会议主持：佩尔谢同志。

下面发言的是库纳耶夫同志——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费多谢耶夫同志作发言准备。

库纳耶夫：同志们！Л. И. 勃列日涅夫同志在报告中详尽而明确地向我们展示了莫斯科会议工作的主要政治成果，向我们党提出了，关于在现阶段进一步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具体任务。

此次会议的召集及其举办过程，充分展示了全世界共产主义队伍以苏共为核心而形成的巨大团结，展示了我们党列宁主义路线的重大胜利。尤其需要强调的是，这次会议完全证明了，我党二十三大相关决议中对当今时代的性质及其主要发展趋势所作的马列主义分析的正确性。

莫斯科会议及其所通过的纲领性文件，无疑是对帝国主义分子的沉重打击，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它也是对形形色色反列宁主义者的沉重打击。显而易见的是，正如与会者在发言中所显示的那样，此次会议，必将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不可动摇的纲领的基础上，促进共产主义运动队伍的团结。

莫斯科会议的意义还在于，它以新的深刻而富有建设性的思想丰富了马列主义宝库，研究了世界历史现阶段社会主义发展及其增长前景的一系列最重大问题，并将之提上了我们的议事日程。

苏共代表团团长勃列日涅夫同志在会议上的发言，明显已被会议普遍公认为——是对进一步发展马列主义理论和革命实践的重大贡献。哈萨克斯坦广大共产党员和全体劳动者们，接受了我们伟大的高举光荣的列宁主义旗帜的党，并为之感到由衷的自豪。该发言以深邃的现实主义态度来对待所研究的一系列问题，从而被所有进步的舆论评价为进一步强化共产主义队伍行动一致的战斗纲领。

这里仍需要再次指出的是，众所周知，甚至连最广泛的资产阶级们也不得不承认这次会议的成功，而这一成功的原因，在相当程度上主要在于：一方面由于苏共中央政治局做了大量的会议筹备方面的工作，另一方面是由于我党代表团在会议过程中开展了积极的、富有成果的实际活动。正因为这样，如今我们才可以勇敢地说，正是由于苏共采取了既灵活多变而又固守原则的立场，才使会议有了一个好的结果。这也再次印证了列宁曾提出的一个论题的正确性，即“原则性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

我们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方面的活动和贡献以及在各民族反对帝国主义斗争中所作出的伟大贡献，在此次会议上受到了与会者们高度的评价，这使我们感到由衷的高兴。这些对我们党的领导作用的高度评价表明，苏共是公认的全世界共产党人的先锋队，而我们党和苏维埃国家的政策——包括对内和对外政策，都是唯一正确的，是符合全世界共产党人和劳动者的根本利益的。

同志们！正如你们大家都能够看到的，此次会议的重要特点在于，其对当代民族解放运动给予了巨大的关注。与该运动相关问题，在勃列日涅夫同志和许多兄弟党代表的发言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并在会议所通过的文件中得到了详尽的分析。借此，会议以应有的方式对民族解放运动在世界革命发展进程中所发挥的巨大的、不断增长的作用作了评价。而这与苏共中央及其政治局始终执行的路线是完全相符的。

苏共和苏维埃国家，全面支持年轻的民族国家和所有遭受奴役民族的解放斗争。正是由于苏共的活动，才使得帝国主义者和毛主义者们，在社会主义体系和各民族解放力量之间制造分裂的计划以及毛泽东集团在各民族解放运动之上建立自己霸权的企图屡屡受挫。苏共所进行的这些需要智慧和远见、原则性和策略性、灵活性和坚定性的活动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得到了人们正确的理解，这使我们感到莫大的欣慰。也正因为此，难怪来自亚、非、拉美和世界其他地区各兄弟党的代表，在会议发言中要强调苏联和苏共在被奴役国家各民族解放斗争发展事业中的巨大作用。

会议表明，我们在从事共同事业的道路上，有许多忠实的战友和可依赖的朋友，我们永远能够与他们一起同甘共苦。与此同时，正如列昂尼德·伊里奇在今天的报告中所坚定揭示的那样，在我们的运动中依然存在严重的分歧，而要克服这些分歧仍必须作大量的工作。一些党派，尤其是他们的领导者们，正在修正科学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的理论条款；而另一些——就像列宁所说的那样，则极力依照“本民族的住宅”模式来“肢解”社会主义。

在这方面，勃列日涅夫同志在报告中所作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即在为了马列主义的纯洁和为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更紧密团结的斗争中，我们党仍需无条件地付出新的更大的努力。

同志们！哈萨克斯坦共产党员和全体劳动者们，完全同意政治局在报告中对我们与中国关系的现状所表达的忧虑。

毛泽东分子们的奇谈怪论竟说什么，无产阶级不可能避免战争，他们公开而赤裸裸地觊觎苏联领土，中共九大也制定了向苏联开战的方针，如今所有这一切都已是世人皆知的。目前，仅在属于哈萨克斯坦的苏联边境地区，中国领导人便集中了大量的军队。中国的战争贩子们已经多次在谢米巴拉金斯克、东哈萨克斯坦和阿尔泰等地区侵犯我国边界，并不断挑起一个又一个新的武装冲突。只是由于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谨慎做法，他们才暂且没有成功实现将我们拖入其挑衅圈套的计划，即使这样，中国人仍无耻地把自己的入侵活动说成是苏联军队侵犯中国领土。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在周恩来前不久访问新疆之后，中国人在我们边境上的挑衅活动更

加猖獗。在该地区的领导干部会议上,周恩来号召采取积极措施以准备对苏联采取军事行动。随后,新疆伊宁、乌鲁木齐等城市的地方领导人也发出了类似指示。

在新疆,目前(中国人)正在集中进行所谓消除各敌视集团之间分歧的运动。问题在于,在这些地区仍然存在有毛主义者与其敌人之间的冲突,因而导致其至今仍无法在个别地区成功建立革命委员会。

在极力禁止哈萨克人和维吾尔人与苏联接触的同时,中国加紧了将土著居民从边境地区迁往国家腹地、贫瘠的草原和沙漠地区的行动。他们在通往苏联边境方向地区铺设了具有纯军事目的的道路。尤其是近期,中国人用一批新部队——已证明"忠诚于"毛泽东的军队替换了原先在边境驻防的老部队。

在新疆居民中也正在进行一场明确的、关于中国必然而且不可避免地要与苏联开战的宣传活动,其借口是:似乎是要解放被苏联侵占的中国领土和进行那个在我们国内已然是臭名昭著的"无产阶级革命"。

中国人为所有当地居民组织放映了含有诬蔑性的反苏内容的电影,以煽动民众对我们国家的仇恨,混淆数百万民众的思想意识。

当然,我们不应当过分夸大那里的情况。但鉴于当前形势,我们仍必须为应付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准备。我们认为,我们当前应制定和实施这样一条与中国叛徒们斗争的路线,即最终促使中国内部健康的力量赢得胜利,从而使这个伟大国家和伟大民族重新返回到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友好团结的轨道上来——就像列昂尼德·伊里奇在自己报告中所强调的那样。

我们很清楚,在我们实现上述目的的过程中,中国人民事业的顽固叛徒——毛泽东及其集团绝不会善罢甘休,而后者的活动已日益成为和平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严重威胁。不过,我们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不能把毛泽东集团与中国劳动群众混为一谈,我们认为完全有必要这样来提出问题:即中国分裂主义者很早便已丧失了被称作共产党员的权利;他们既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列宁主义者,而是伪社会主义者,而从本质上说,就是彻头彻尾的民族-沙文主义者,他们在国内所建立的秩序实际上就是在(从肉体上)消灭数百万现存制度的敌人,而少量的部族和民族也难逃灭绝的命运,所有这一切与社会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我们应当现在就把这一切向全世界公开,我们完全有充足而严谨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结论。即使在国际会议上,绝大多数兄弟党也极其坚定地揭露了北京叛徒们的活动对我们共同的反帝斗争事业的深刻危害。

在此次全会上很适宜宣布这样一个消息,即前不久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中央收到了维吾尔民族代表大团体的来信。后者带着惶恐的心情,在信中通报了关于居住在中国的维吾尔、哈萨克和其他少数民族所经受的苦难。他们还报告说,当地居民已对饥饿和毛主义者的嘲笑绝望到了极限,并准备发起针对毛泽东集团的解放斗争,以便在民族自决的基础上,最终实现脱离中华人民共和国,并组建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

显然,所有上述情况仍需要我们做深入的研究。

同志们！(勃列日涅夫同志)在报告中，及时强调了进一步完善思想政治工作和提高理论研究水平的必要性问题，尤其是在社会-经济关系方面。的确，我们在这方面仍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我们认为，在我们的政治思想机构的活动中仍有一个主要缺陷需要克服，那就是在遭到包括中国在内的敌视思想的疯狂压制的情况下，我们往往总是过于强调防御和固守已有阵地，而不是在各条思想斗争战线上发起全面进攻。在进攻的过程中，我们应当更有效地揭露，毛泽东分子们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尤其是对苏共和我们国家所作的恬不知耻的诬蔑、所施展的阴谋诡计和各种攻讦，与此同时我们还可利用各种可能的手段对我们的以及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人民展开宣传工作。

同志们！这些天，哈萨克党组织正普遍开展学习会议资料的活动。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中央，打算以实际行动来改进自身在所有阶层居民中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共和国党组织正采取必要措施，以便以牢不可破的民族友谊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来深化我们对劳动者的培育教育工作。

苏联哈萨克斯坦的共产党员和全体劳动者宣布，他们将一致、彻底和完全地赞同我们党的明确、始终如一和深刻的原则性立场，赞成中央政治局旨在加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政治路线和实际活动以及苏共代表团在国际会议上的卓有成效的工作。

哈萨克斯坦劳动者们，将与所有苏联人民一道竭尽全力，以全面加强我们祖国的经济和国防事业。在消除由于上一个严冬所导致的些许落后的同时，共和国各企业、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劳动者们正在弥补损失，加快生产速度，以便以在共产主义建设所有领域所取得的优良成绩来庆祝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100周年诞辰。(掌声)

会议主持：佩尔谢同志。

下面发言的是П. Н. 费多谢耶夫同志——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院长。奇里亚耶夫同志作发言准备。

费多谢耶夫：同志们！中央委员会完全有理由对这次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所取得的成果感到十分满意。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巨大成功，当然也是我们党在为共产党的国际团结而斗争的过程中所取得的一个重大成就。

会议充分证明了，我们党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发挥的政治思想领导作用。虽然在近几年以来的国际会议中已经强调，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领导党和被领导党之分，所有党派都是平等的，但与此同时，根据普遍的观点，苏共仍被公认为兄弟党中的首位和居领导地位的党派。

我们国家的共产党员们和所有苏联人民，都可以为苏共代表团在这次会议上成功地完成了一个困难、崇高和责任重大的使命而感到自豪。所有代表团都是知道的，即我们党及其中央委员会在坚持共产主义运动的马列主义立场的同时，积极参与了会议文件的准备工作。苏共代表团团长勃列日涅夫同志，在会议发言中从马列主义高度分析了当代世界发展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根本任务，从而使苏共的政治思想威望不仅得到了加强，而且被提升到了

一个新的高度。

我们党就一系列根本性问题所表述的观点对其他许多代表团的发言都产生了影响。可以这么说，正是我们党所表述的观点促使了会议文件的产生及其被采纳，正是它把问题具体化并在一系列问题上对反帝斗争文件的主要条款作了更为详尽的论证。因此，要从事对会议所通过文件的解释工作，就一定要充分利用我们代表团在这次国际会议上的发言。

我们代表团，对现代帝国主义所作的理论性分析，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是否了解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进程，将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各共产党的战略和策略的制定。

个别党派的代表，其中包括澳大利亚和意大利的代表在内，并没有充分借鉴这次国际会议文件草案中关于帝国主义分析的内容。他们以帝国主义问题和新现象的复杂性为理由拒绝签署会议文件的相应章节。但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没有尝试去对这些新现象作马克思主义的解释。

这里，我将不过多论述毛主义者们的谬论式论题“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目前，关于现代资本主义诸问题存在两种表面上相互对立的观点。一方面，在一些党派中广泛流行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似乎资本主义及其意识形态的危机，已排除了其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思想和政治渗透的可能性和危险性，而且它也已经完全没有力量加紧从事自己的侵略活动。于是，这种观点的拥护者们便认为，关于在现代世界中意识形态和政治斗争尖锐化的论题是错误的。另一方面，一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们”竟被个别资本主义国家的科技成就和生产增长所迷惑，以至于他们对社会主义体制优越于资本主义的论断丧失了信心，就其实质，他们实际上更倾向于趋同论的拥护者们的立场，即主张两种社会-政治体制的进化和融合。

在评价帝国主义的问题上，我们党并没有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科技进步条件下获得的那些成就和可能性视而不见，但与此同时我们的代表团也明确揭示了帝国主义最深刻的矛盾和缺陷，并强调只是在一些国家中而非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在技术-经济发展方面出现了进步的情形；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并没有减弱，而是在加强；在个别高度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资本主义世界的大部分国家仍被经济落后、物质上的贫穷和精神上的贫乏所笼罩。

必须指出，那些认真从事帝国主义问题研究的党派代表们，都是完全赞同我们党代表团对现代帝国主义所作的上述评价的。而美国、法国和联邦德国等共产党代表团的发言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必须承认，我们代表团在本次会议上所持立场的强大之处在于，始终不渝地、令人信服地运用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去认识当代社会发展进程——在世界范围内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

列宁根据我们国家的经验，揭示了阶级斗争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规律。他的主要结论是：剥削阶级不会自动地退出历史舞台，面对社会主义力量的进攻他们将进行绝望的抵抗，而阶级斗争将按照“谁战胜谁”的原则展开。我们国家已经历了这种尖锐的阶级斗争过渡期，而其他已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也曾经历或正在经历这样的时期。如

今，在两大体系对抗的条件下，我们正亲眼目睹这一规律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

从整个世界历史的范围来看，"谁战胜谁"的问题一定是社会主义占据上风。但这个问题只有在两个世界体系的激烈交锋中，在社会主义和进步力量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斗争中才能够得以解决。

在两大阵营的阶级斗争过程中，不论是在个别国家内部还是在国际舞台上都必然会出现一些在这个阵营之间动摇不定的成分。列宁指出，"我们知道那些处于帝国主义和民主之间的人们通常总是会转向这个或其他方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曾预计，在整个世界分裂为两个体系的情况下，那些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之间的动摇不定者们，可能不仅仅只是个别人群、个别社会集团和政治党派，而且还可能有个别的国家。如今，我们看到，比如南斯拉夫领导人便以自己的"不结盟"政策或"非集团"政策及其自己的社会主义模式，游离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间，游离于社会主义阵营和所谓的"自由世界"之间。

在对那些没有原则的领袖们进行抨击的同时，列宁教导我们在对待这些动摇的社会阶层和政治集团方面要表现出克制和灵活性，以便消除他们的动摇并最后与之结为盟友。列宁说，"我们现在给自己所设定的任务是：战胜剥削者并将动摇者吸引到我们一边来　　这是整个世界的任务"。

如今，列昂尼德·伊里奇刚刚在中央全会上所作的发言与列宁的上述指示是完全相吻合的。其论题要求我们：对待那些动摇者和迷失方向者，我们的斗争应当遵循"不但不反对，反而要支持"的原则，我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消除这些人的迷茫和动摇，并把他们争取和吸引到我们一边来。

帝国主义是历史进步道路上的主要阻碍，是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只有依据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我们才能够明白，解放运动所要克服的困难有多么的巨大，我们才能够对资产阶级的压力和以各种方式与民族主义共同成长起来的小资产阶级世界观在现阶段对共产主义运动的严重危害作出全面的评价。

以各种变种方式存在的修正主义，不论是其右的还是"左"的派别，过去和现在都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异化现象。

世界范围内解放运动队伍的扩大，出身于非无产阶级群众的一系列新阶层的加入，都为各种关于社会主义及其实现方式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观念的传播提供了营养丰富的土壤。

这些观念并不是新事物。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还在他们那个时代便曾遇到过类似的社会主义变种。还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便揭露了这些变种的社会根源和阶级本质，其中包括——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封建社会主义和基督教-僧侣社会主义，等等。

由此便产生了一个，关于所谓社会主义各种"类型"的问题。我们党对这个问题已搞得非常清楚。科学社会主义只有一个，而且是绝无仅有的一个，而对它的曲解是各种各样的，

从而出现了多种多样的非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模式。各种社会主义“模式”——就是与科学社会主义相对立的各种阶级派别。如今,他们已不仅只是一些理论观念。在个别国家中新露头角的社会主义预言家们,都在极力把这些与劳动者利益对立的观念付诸实践。

于是,便出现了一个关于此类冒险家政权的社会基础从何而来的问题。在对此类问题的认识上,我们时常会犯简单化的错误。例如,直到最近,以前在国外和我们一些著作中仍认为,毛主义的出现是由于数百万农民在中国人口中占多数。如此来解释毛主义的社会根源必定不能被认为是科学的。一方面,其认为毛主义反映了农民的观点——这无疑是对中国广大农民群众的诽谤。我们应当把农民的小资产阶级和原始-无政府主义偏见与农民的最终根本利益区分开来。另一方面,如果毛主义果真是反映了数亿中国和所有东方国家农民的思想和利益,那么亚、非洲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不会有太大的前途可言。

我们知道,任何政权都是反映了一定阶级的利益并依靠后者来维持自身的存在。列宁主义揭示了国家政治发展的这样一个特点,即在转折时代社会出现危机的条件下,政权可能落到军人或政治集团的手中,而后者会利用工人阶级的软弱和无组织性,以便时常在各不同阶级之间寻求平衡。这里,列宁曾以克伦斯基政府为例,来比喻经过伪装的反革命势力。列宁称这种社会现象为波拿马主义并明确了他的如下特征:依靠黩武主义,随机应变于各阶级之间,毫无节制地从事社会蛊惑。难道毛主义者们的国内、外政策不正体现了这些特征吗?难道“文化大革命”不正是独特的波拿巴类型的反革命政变吗?

如今,所有人都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毛主义者们运用波拿巴主义的方式,依靠黩武主义,或利用青年学生,或利用一部分工人,保护和供养资产阶级,不是诉诸理性,而是诉诸农民和各类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偏见,即诉诸民族主义的冒险主义倾向。

共产党人们从理论和实践出发得出如下结论,即我们面临着反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的歪曲的长期而艰巨的斗争。这样一来,绝大多数共产党代表在会议上,积极支持苏共提出的积极展开反对“左”、右倾修正主义和民族主义歪曲的斗争路线,便有了极其重要的意义。

我们认为,在理论和思想工作中,应尤其重视我们代表团提出的关于修正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联系的思想。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当年已很好地揭示了这种联系,而目前的现实也再次证明,机会主义滋养了民族主义,而本身又从民族主义中吸取营养。究其本质,就是放弃阶级观点,而代之以民族主义观点来处理国内、外各种问题。

近期,在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中,民族主义越来越多地采用了反苏主义的模式。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我们应当在自己的宣传中对这一问题给出明确的答复。况且,民族主义者们也在加紧宣传自己执行反苏主义政策的原因。例如,南斯拉夫和其他民族主义者们便断言,似乎反苏主义是对苏共和苏联所执行的霸权主义政策的反作用。而对于上述说法,意大利、澳大利亚和其他一些国家共产党中的“绝对自治”拥护者们均持默认态度。

实际上民族主义转变为反苏主义的原因非常简单,就是因为苏联一直坚定不移地高举

国际主义旗帜，苏联始终真正地将列宁主义的国际主义原则落实到本国建设和对外政策之中。因而苏共和苏联才成为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者们敌视的主要堡垒及其主要攻击目标。而那些苏共和苏联的最忠实朋友们——自然也就成了坚定不移的国际主义者。这尤其体现在此次国际会议上，一些著名的国际主义者——如哥穆尔卡、卡达尔、日夫科夫、乌布利希、盖斯·霍尔[1]、阿里斯门迪[2]及其他国际主义的积极贯彻者们，都极其坚定地公开反对反苏主义。而与此相反，我们并没有听到那些狂热地钟情于"自治"和"独立"的活动家们，即使以搪塞的、支支吾吾的方式提到"国际主义"一个字。

作为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旗帜的旗手，我们党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时刻准备着向修正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们发起一次又一次新的冲锋。正如列宁所说的，这就是我们的命运，我们将不会与举止庸俗的人们以及社会民主派和其他机会主义者们的见风使舵做法相妥协。

在这次会议上，我们代表团完全胜任地代表了苏联共产党，始终不渝地坚持了马列主义原则。当前，我们政治思想和理论工作的任务，就是要巩固和加强我们党在世界解放运动中所取得的政治思想威望。我们应当考虑到这样一种情况，即各兄弟党的理论骨干正在迅速地成长起来，思想水平也在不断提高，而我们在这方面存在着可能落后的危险。

如果说通过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努力，能够高水平地对当代一些现实问题作出理论性的总结和概括，再加上我们各科研机构的工作，就一定能够促进这些问题的解决。这里尤其需要强调的是那些与党的国内、外政策，与党和国家的建设，与思想工作和斗争需要等直接联系的理论问题的研究工作，其中具体包括：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和社会进展情况，关于右倾和"左"倾修正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社会根源和阶级本质，关于在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民族关系，关于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中民主发展方向上的原则性区别，关于对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的各种评价，关于对党内生活规范和原则的不同理解，关于对青年运动的领导，等等。针对这些问题，正如在这次国际会议上许多代表指出的那样，我们的所有科研机构都应当与各兄弟党的理论干部一起以系统性而非间歇性的方式来共同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

我们党和所有苏联人民，都高度评价这次国际会议所通过的关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100周年诞辰纪念的文件。在当前修正主义者们加紧攻击列宁主义并指责其已经过时或是纯粹的俄罗斯现象之时，当中国大汗的拥护者们试图徒劳地将其拖上当代理论思想的顶峰之际，列宁主义——这一国际主义学说无疑反映了当今时代的根本需要。

在最后结束时，同志们，请允许我，向苏共中央政治局和我们的代表团顺利完成会议筹备工作并成功举办了这次会议表示祝贺。这次会议，完全称得上是现代社会主义运动的伟大奠基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所开创事业的继往开来。（掌声）

---

① 霍尔，美国共产党主席。——编注

② 阿里斯门迪，乌拉圭共产党第一书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编注

会议主持：佩尔谢同志。

下面发言的是Г.И.奇里亚耶夫同志——苏共雅库茨克州委第一书记。准备发言的是库里贾诺夫同志。

奇里亚耶夫：同志们，我们所有人都对此次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结果感到非常满意，会议上讨论了当代一系列最重大的现实问题。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在今天中央全会的报告中，全面、明确而深刻地说明了这次共产党大会对未来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对积极开展与帝国主义的斗争，对团结为了和平、民主、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全世界统一战线力量具有重大历史意义。这次会议是世界解放运动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展示了当代革命力量阵容的强大。其成果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巨大成就，是世界进步力量的重大胜利。会议显示了为了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在与共同敌人——帝国主义斗争中共产党队伍团结的不断增强和巩固。

引人注目的是，这次会议是在我们国家，是在世界上第一个开辟了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故乡召开的。整个会议进程以创造性的列宁主义精神为指导，以纪念伊里奇的百年诞辰为标志。与会者一致通过了"关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100周年诞辰"致辞的文件。这更直观地证明，共产主义运动有一个不可动摇的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

上述致辞热烈地号召所有共产党员、所有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建成而奋斗的战士、进步和和平事业的所有拥护者，都要以应有的姿态来庆祝伟大列宁的百年诞辰。

会议所通过的文件《现阶段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任务，共产党和工人党，以及所有反帝力量的统一行动》，对我们所在的时代和加强针对帝国主义的进攻的前景作了马列主义的分析。该文件是我们为争取人类的根本利益，为实现和平和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强大武器和战斗纲领。它将对我们动员世界上千百万人民投入反帝斗争发挥巨大作用。这就是各兄弟共产党和工人党，成千万共产党军队和世界上所有进步力量对会议主要文件的评价。

我们，所有此次中央全会的与会者都很了解政治局在会议之前及其举办过程中所作的大量工作，而这些都是会议成功举办并通过那些完全符合我们预定目标的文件的决定性因素。

勃列日涅夫同志的报告对全体与会者、共产党员们和世界公众舆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以深刻的科学性极其坚定地陈述了我们党的立场。勃列日涅夫同志的发言对当代世界的发展作了详尽的马列主义分析，揭示了帝国主义的反人民本质，为所有反帝革命力量指引了团结的道路，及其为争取和平、民主、民族独立，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斗争的行动方式和方法。

国际会议的与会者评价勃列日涅夫同志的发言是对革命理论发展的重要贡献，是分析当前世界形势的样板，从而为我们制定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和策略性任务奠定了基础。

关于雅库茨克劳动者们如何看待勃列日涅夫同志的讲话，正如"阿尔丹佐罗托"联合企业工人在发言中所道："Л.И.勃列日涅夫同志的讲话代表了所有苏联人民的心声。我们对

此期待已久了。我们时时刻刻都能感受到我们党中央与我们，与全体苏联人民的密切联系。中央非常了解我们的思想和情绪，因而能够完全正确地表达我们的意愿。”

我同意前面的发言者们所提出的建议，即完全彻底地赞同以苏共中央总书记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代表团的活动。

这里，我想报告一下雅库茨克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一致意见：与全体苏联人民和国家的所有共产党员们一样，我们始终抱着极大的兴趣密切关注着我党代表团在此次国际会议、在多次群众性宣传集会和其他会议上的工作，并在自己的回应中热烈称赞了会议的成果及其所通过的决议。

雅库茨克全体共产党员说了许多支持、热烈称赞和感谢苏共中央政治局和我们党代表团的话，感谢他们在这次国际会议为了马列主义思想的胜利和全世界共产党队伍的团结、统一所进行的积极而坚持原则的斗争，感谢他们在提出和解决一系列涉及反帝斗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等重大问题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远见卓识和聪明才智。

同志们！

这次刚刚结束的国际会议所提出问题的涉及面是相当广泛的。其中有一个问题贯穿了整个会议工作及其所通过的文件，这就是必须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整个共产主义运动队伍的团结。会议鲜明地表达了所有反帝斗争力量的团结愿望，而也只有团结一致——才能充分体现我们运动的力量，才是我们未来赢得胜利的保证。

苏共代表团把此次国际会议与会者的注意力集中到解决当前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存在的迫切需要克服的分歧上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这些分歧之所以产生，主要是由于各种右的和“左”的修正主义思想的渗透所致。苏共代表团的上述做法也赢得了所有与会者的支持。

这里，我们不得不愤怒地指出，中共领导人所进行的反马克思和反社会主义的分裂活动，及其对共产主义运动和反帝斗争所造成的严重危害。毛泽东的大国沙文主义方针及其公开的反社会主义目的，实际上是帮了帝国主义的忙，只能使我们的阶级敌人们感到高兴，并终将在危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而所谓的中共九大，在将毛泽东集团的现行方针合法化之后，又在中国的国内、外政策中增加了新的内容。

勃列日涅夫同志在会议发言和此次全会的报告中以及许多代表团领导人在发言中都针对所有上述内容提出了尖锐的原则性评价。揭露毛泽东集团政策和实践活动的本质对在当前条件下加强所有革命力量的团结和反击帝国主义具有重大意义。

只有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人试图维护毛泽东集团，反对揭露其活动的反社会主义性质。罗马尼亚领导人的徒劳努力非但没有得到响应，反而遭到了许多代表团的善意谴责。

会议表示，今后将继续坚定地寻求各种可能，从而为消除现存分歧和加强各兄弟党的团结、统一打下良好的基础。

我们完全赞成，苏共中央政治局在坚持马列主义原则的基础上，为消除与一些兄弟党的分歧，而制定的路线和所进行的实际活动。

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在国际会议自己的发言中宣布：“共产党拥有争取团结

斗争的久经考验的武器。该武器曾在光荣的为了工人阶级的事业的战斗中使我们赢得了胜利,它就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关于这一点,我们的阶级敌人们是非常了解的。为了隔离和分裂共产主义运动,他们寄希望于民族主义并极力败坏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声望。

这次国际会议特别强调了,每个与民族主义倾向做不妥协斗争的共产党在自身活动中,遵守列宁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诸原则,正确地将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任务紧密结合的重要性问题。会议讨论期间,一些政党所表现出的强烈民族主义情绪不能不使我们感到担忧,从而再次证明了上述问题的现实意义。

我们党坚定不移地以列宁遗训为指导,其所制定的政策是国际主义的样板。在处理与其他党派和国家的关系上,苏共真正地贯彻着国际主义政策,坚持以这一精神来教育全体苏联人民并在这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这些成功对革命运动和被压迫民族的觉醒具有重大的意义。

我们认为,当前自己的重要任务,就是要进一步促进各民族和部族的密切联系,进一步搞好以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反对民族主义毫不妥协的精神,培养教育苏联人民有关的工作。

同志们!

这次中央全会着重强调了进一步加强党组织的思想工作的必要性。而这样做的原因源于,我们在会议主要文件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100周年诞辰"致辞基础上所制定的反帝斗争,以及为了和平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共同任务。

在当前条件下,我们的重要任务,就是要积极向资产阶级思想发起进攻,全力揭露那些旨在欺骗广大群众,瓦解其警惕性和麻醉其意识的思想神话。

马列主义思想,是我们与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斗争的强大武器。用马列主义思想宣传、武装全体劳动者是我们的最重要任务,因此我们将对中央的上述决定给予高度重视。

这一段时期,我们州党组织在向广大劳动者解释会议资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将努力使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位劳动者都能够深刻地意识到自己每天的劳动并不仅仅是在完成地方上的任务,而且是在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是在为已成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主要堡垒的强大祖国的经济和国防稳固作贡献。这是我们从此次国际会议成果中所得出的结论之一。

雅库茨克自治共和国的劳动者们,正在为国家的经济发展作出自己的巨大贡献。他们决心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钻石、黄金和其他自然资源的采掘以及农产品和毛皮的生产方面,以确保其产量的不断增长。如今,共和国工业部门的劳动者们正在加紧完成产品销售的半年计划。正是在我们会议召集的这些天里,雅库茨克的地质学家们又在和平山附近发现了一个新的储量丰富的钻石矿,并将之命名为"国际主义矿"。"雅库茨克钻石"采掘第五联合企业选矿厂的工人们又发现了一块精致而巨大的金刚钻石晶体,并称之为"团结"。

共和国工业企业、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工人和建筑工人们正在为高质量地完成自己

所肩负的社会主义义务而奋斗，准备以此来纪念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100周年诞辰。他们一定会以高度的荣誉感完成自己的任务，并以应有的姿态来迎接伟大领袖的周年纪念。

共和国的党组织也将根据勃列日涅夫同志在会议发言和今天报告中的内容得出如下具体结论：在今年必须坚定地为提高生产效率、加速科技进步、改进投资建设和取得农产品生产的增长而奋斗。

同志们，在发言最后请允许我再次表示：完全赞成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的成果以及苏共中央政治局和我们党代表团在这次会议上的活动；请中央相信，雅库茨克党组织一定会采取一切措施以圆满落实此次全会的相关指示。(掌声)

会议主持：佩尔谢同志。

下面发言的是Л. А. 库里贾诺夫同志——苏联电影工作者协会管理局第一书记。叶皮谢夫同志作发言准备。

库里贾诺夫：同志们！现在，在这些日子里，我们国家的银幕上正放映着为我们为纪念一个重大的历史性事件而摄制的纪录片——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们挤满了我们的电影院，亲眼目睹了这次大会的工作进程。这次大会，是人类马列主义先锋队的伟大军队的一次盛大集会，会议的举办地是莫斯科——这个列宁曾工作过的城市，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人和农民的国家的首都。

苏联人民满怀激动的心情亲眼看着这些骨干们——地球上最先进和革命运动的代表、领导人通过红场前往列宁墓，并再次将自己的尊重和敬爱献给自己的伟大领袖。这一事实充分表明，即使我们看不到列宁，但他依然是这次会议的与会者，因为正是列宁的思想确定了整个会议的工作进程及其所通过的历史性决议，而后者无疑将对全世界劳动人民解放斗争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

苏联文化界的活动家和所有我们从事创作工作的知识分子们，以极其关切和激动的心情关注了会议的进程及其相关资料，而这是尤其需要强调和广泛宣传的。

会议工作及其所通过的文件，标志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反帝斗争、加强共产党和工人党团结，以及联合所有反帝国主义力量等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功。

会议以新的历史经验丰富了共产主义运动并对革命理论、战略和策略的发展作出了最重大的贡献。

而我们，对于我们党及其列宁主义的中央的积极活动在各共产党队伍的团结和联合革命斗争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感到无比的自豪和满意。

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党中央领导人在此次会议的筹备过程中作了多少大量、缜密而细致的工作。通过始终关注会议的讨论过程，我们所有人想必都能够就苏联共产党代表团在会议期间各共产党队伍的团结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

在这次会议上关于在反帝斗争中肩负着主攻责任的苏联和我们党，与会者们采用不同

语言都说了同样的非常有分量的话：所有国家真正的革命者们都很清楚，只有苏联，只有苏联共产党是当前反帝斗争以及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斗争的最主要决定性力量。这些话让我们感到无比的自豪。

苏联知识界以热烈赞扬和满意的态度接受了苏共中央总书记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的纲领性发言。该发言极其清晰而直率地就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一系列最重大问题表明了苏共的立场。

其中，对于我们——从事创作的知识界代表而言，尤其重要的是那个涉及当今世界思想斗争的段落中的内容。

勃列日涅夫同志在该段落中说："马列主义思想——是我们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强大斗争武器。我们非常了解这一武器的威力。我们看到，我们的思想正在群众中越来越广泛地传播。如今，马列主义正处于进攻的状态，我们应当把这一攻势开展得更加广泛。勃列日涅夫同志警告道，无论现在还是其他任何时候，如果我们共产党在思想工作方面有任何的放松都会导致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增强。"

我们——苏联的艺术家们已把这些话看作是直接对我们说的，因为我们始终认为自己就是思想战线上的工作者，就是党在谋求世界和平，在培养新人和新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事业上的忠诚助手。

苏联艺术文化是在革命中成长起来的，充满了革命的精神。而服务于伟大的目标——在我们国家建设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为实现共产主义而斗争——才是苏联艺术家的生活意义和幸福。

革命性的目标，是苏联艺术家创作活动的无可争辩的规律。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文化和艺术就是要展现那些，在当年曾沦为战场的土地上，正从事共产主义建设事业的人民的生活，揭示几代人民之间存在的政治和道德关系——从当年冬宫的猛烈进攻，直到今天西伯利亚电站建设者们、宇宙的征服者们、新型现代机器和企业的创建者们所创造的劳动功绩，而后者则直观地体现了我们在科技方面的进步精神，体现了苏联科学和技术思想的发展。

对于我们来说，会议资料不仅是激发创作灵感的源泉，也是我们从事实际工作的指导性纲领。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很清楚在培养新人和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过程中向党提供帮助的重要意义，具体来说就是要求我们的艺术思想要反映现代人的思考及其所关心的问题，适应我们党在政治、组织和教育工作方面的需要。

我们认识到，自己在那些为了自由和独立而斗争的人们面前所肩负的国际主义义务是多么的重大。如今，在拥有了会议的经验和榜样的同时，我们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即进一步弘扬始终存在于我们艺术之中的国际主义革命传统，以便我们的艺术能够更积极地参与到当前的思想斗争之中。

我们需要各种艺术类型的关于人民反帝斗争和反映马列主义者自身团结、战斗友谊内容的新书籍、电影、戏剧和作品，以便全面地反击帝国主义及其表现、反击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我们需要新的带有共产主义激情的作品以展现苏联人民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民众的

劳动和斗争的国际主义意义。

请允许我向中央委员会及其政治局保证，苏联艺术家和所有从事创作的知识分子都非常清楚自己所肩负的这些最重大任务，并将会尽一切可能来完成它们。

请允许我在这个崇高的讲台上宣布，苏联知识界热烈赞成和支持我们党及其列宁主义的中央委员会所奉行的马列主义路线，而这就是苏共代表团在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工作中所非常清楚地表现出的那一路线。(掌声)

会议主持：佩尔谢同志。

同志们，下一个发言的是叶皮谢夫同志、托尔斯季科夫同志作发言准备。我想提个建议，我们是否将继续进行讨论？

表决：不要。所有问题都清楚了。

会议主持：佩尔谢同志。

有没有持反对意见？

表决：没有。

会议主持：佩尔谢同志。

那么在托尔斯季科夫同志发言后我们将结束讨论，现在由叶皮谢夫同志发言。

叶皮谢夫：同志们！

在苏共二十三大之后，我们还没有一次在自己的全会上详细分析过国际形势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现状等问题。现在，我们又重新回顾这些与刚刚结束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结果相关的问题。

我们很难对我们党旨在坚决制止帝国主义的侵略图谋，在全面加强反帝斗争力量，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方面所付出的巨大努力，进行重新评价。

随后时期所发生的事件已特别明显地证明，在解决对外政策问题的过程中，其中包括与世界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相联系的问题，无论他们有时是多么的尖锐和复杂、在解决的过程中存在多么巨大的困难和阻碍，我们的党中央和政治局总是能够表现出最大限度的谨慎和深思熟虑，总是能够从列宁主义的原则出发，分析世界上所发生的各种变化和世界工人运动中所出现的各种进程及其趋势，总是能够对自己所采取的每一项举措的现实可能性作出清醒的估计，从而极大地提高了我们对外政治活动的效率。而正是在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努力下才决定性地确保了这次刚刚结束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成功。

我党中央所采取的举措完全符合马列主义的精神和本质，具有深远的国际主义意义并与我们为共产主义而斗争的目标相适应。正是因此，我们陆军和海军中的共产党员、所有苏联军人与所有苏联人民一样都热烈地、发自内心地一致赞成和支持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政策。毫无疑问，现在正在进行的全会的决议也将会对之表示深刻的理解和赞同。

Л. И. 勃列日涅夫同志在报告中明确且论据充分地表述了我们党在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筹备工作期间所坚持的立场。其中不仅包括对当代国际生活中各种复杂进程和现象

所作的全面的马列主义分析,明确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性质,而且还依据共产党国际会议的成果清晰地制定了我们今后所要实现的目标,明确了一系列具体的政治步骤。

这使我们不仅能够对我们的政策、在国际舞台上的斗争前景和力量部署等问题进行深刻地思考,而且可以在这场斗争中清楚地确定自己的立场和适当的地位,并为落实党的政策承担自己应有的职责。莫斯科会议的工作过程及其所通过的文件已成为世界公众关注的焦点。与所引起的国际反响一样,我们认为此次会议成果的意义在于,它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其战斗先锋队——苏共为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已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动势力斗争中占据了显著的地位。

当从会议的讲台上听到与会者们对苏共和苏联政府在加强各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团结和给予社会主义国家、各民族解放运动全面援助等方面的作用所作出的高度评价之时,我们全体苏联人民——共产党员、非党派人士都为我们党和我们伟大的祖国感到无比的自豪。

会议成果以及勃列日涅夫同志在发言中就我们党对一系列原则性问题所坚持的明确而毫不妥协的立场在国家武装力量全体人员中引起了积极的反响。与全国人民一样,我们对此表示最热烈的拥护和一致的赞成。

国家武装力量和陆、海军的各军事委员会、指挥员和政治机关、党和共青团组织将尽一切力量努力把共产党国际会议的结论和此次全会的各项决议落实到实际。

同志们! 目前所出现的一系列活生生的事实说明,帝国主义分子们的军事图谋正在愈演愈烈,反对派们正在全面地积极展开活动。西方列强正在进行疯狂的军事竞赛和策划反革命政变。

图谋世界霸权的美帝国主义者们,每年用于侵略目的的资金动辄近千亿美元,并在其他33个国家拥有自己的军事基地。

以侵略目的为指针的西德复仇主义者和纳粹分子,得到了美帝国主义的全面支持和援助。在近东,以色列侵略者在美国的帮助下试图摧毁各阿拉伯国家的先进制度,点燃新的战争之火。美国发动的针对亚非拉许多国家的挑拨离间活动,对世界和平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为了在这方面谋取自己的狭隘阶级目的,美帝国主义不仅指望自己所拥有的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而且寄希望于社会主义国家自身的分裂以及利用世界共产主义和革命运动中所出现的各种困难。

在帝国主义试图转入进攻,其中包括借助于武力的情况下,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加强自身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并将各自的国防力量联合成一个更加完整的模式便有了极其重要的意义。

正如会议所公正地指出的那样,华沙条约诸国的国防力量不仅是条约成员国民族独立和主权的可靠保障,而且也符合共产主义和国际主义运动的利益,符合整个人类进步发展的利益。

当前军事-政治形势具有复杂的性质,由于西方强国的侵略活动导致世界紧张局势不断加剧,这就要求我们要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和强大的国防力量,坚决地为争取所有反帝国主义

力量，尤其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而斗争。

苏联陆、海军中的共产党员们，对当前帝国主义战略和策略的危险性及其阴谋诡计有非常清醒的认识，后者一直在利用各种手段来遏制社会主义——从企图采用直接的武装侵略到使用构思最为缜密的意识形态牵制活动，等等。国际上的反动派更广泛地利用机会主义的头脑发昏的社会残渣余孽们，如右倾和“左”倾集团来从事破坏活动。我们知道机会主义不仅在“纯粹的”理论领域，而且还直接地对反帝斗争的实际活动造成了损害。因此，我们一直在对全体陆、海军指战员进行教育，以使其充分认识到坚决与各种歪曲马列主义和背离革命理论基本原则的行为作斗争的重要性以及为了实现革命队伍的团结和统一而奋斗的重要意义。

通过教育我们要使他们明白，每一个马列主义者都要信仰这样一个真理，即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共产主义运动各队伍赖以生存的共同阶级基础，他们拥有共同的改造社会的任务。不论是在个别国家里还是在国际范围内，这都是社会主义力量赢得胜利的主要条件之一。这样一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的利益必然就要求我们不折不扣地遵守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一个最重要原则——忠诚于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

不过，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个别环节上所出现的事实和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的严重忧虑。在一些党派的领导人中出现了这样一些人，他们口口声声地说要忠诚于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打着为谋求“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为了独立、民族主权和平等各类幌子，可实际上却越来越背离阶级立场，滑入小资产阶级和民族主义局限、社会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改革的泥淖，脱离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主要原则，蔑视各兄弟党在争取劳动者阶级利益的斗争过程中所长期积累的经验。

在这方面我们不能不提及在会议前夕及其进行过程中，意大利、罗马尼亚、澳大利亚和其他一些共产党所坚持的立场。后者所持立场之所以引起我们的极其痛心和愤怒，是因为他们已严重脱离了列宁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无产阶级阶级利益的理解。不难看到，所有这些党派代表“深思熟虑的论断”，就是关于所谓的“社会主义发展新道路”，与保守主义和教条主义作斗争，为了争取社会生活的“民主化和自由化”，关于“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平等关系”，反对一党“独霸”，等等。所有这些实际上将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削弱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领导作用及其党内的纪律性；导致小资产阶级的污泥浊水表面化并四处泛滥，其中包括致使这些党派脱离无产阶级的斗争利益，并在口号和行动上均背离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诸原则。

更为遗憾的是，上述类似现象也存在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中。这些国家的注意力和精力都脱离了共产主义运动所面临的迫切任务，无助于当代反帝斗争力量的团结。看来，要清除工人运动中的小资产阶级破坏分子仍需要我们花费更多的时间，保持更大的克制和耐心。而在这方面，刚刚召集的共产党国际会议无疑曾经而且必将发挥巨大的作用。

同志们，我们自己得出了如下结论，即阶级敌人正越来越频繁地将自己的暗中偷袭与我们整个革命事业的叛徒们、各类沙文主义者和政治冒险家们的破坏活动结合起来。敌人是善于从事各种挑拨离间活动的。但更为危险的是，我们没有看到各类妥协主义分子、伪革命

家和修正主义者们在客观行动上已与帝国主义同流合污,并在实际上借此来直接或间接地实现其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

这方面一个显著的例子,便是中共领导人所坚持的,脱离马列主义和与国际主义分裂的立场,及其所带来的巨大危害和严重后果。尤其令人担心的还在于,毛主义者们不单单要修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根本路线并将自己所谓的"特别方针"与之形成对立,而且还要公然展开反对各兄弟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斗争。众所周知,这一斗争所采取的方式是极其激烈和尖锐的。

毛主义者们在苏中边境地区赤裸裸地实施武装挑衅,这必然引起了苏联人民的愤怒和不满。而与此同时,美国和联邦德国的反动集团却对此大加称赞。他们极力挑动苏中关系的激化,利用当前形势积极从事各种破坏活动并制造新的紧张策源地。

毛主义者们不论是在会议召集前夕,还是在会议工作进行过程中,都一直在企图挑起严重的边境冲突事件。

作为国家的武装力量,我们非常清楚,自己应当从由于毛泽东集团进行的分裂破坏活动而导致的目前新形势中得出怎样的结论,而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不考虑帝国主义武装侵略对我们国家东部边境所构成的实际威胁。

不断地在边境地区进行挑衅,在所谓中共九大之后加紧歇斯底里的反苏活动,极力把苏联和美帝国主义纳入同一类型,公开号召准备与"苏联修正主义者"进行一场战争,所有这一切都让人们怀疑北京领导人如此行为的真实动机。党要求我们作好随时应付突发事件的准备,时刻准备反击毛主义者们更大规模的挑衅性举动。不过,正如会议所强调的那样,苏联完全拥有足够的力量来保卫自己,而拥有坚强意志的苏联人民也是不会被任何叫嚣所吓倒的。任何人如果试图使用武力方式来与我们对话,必将遭到我们坚决的回击。

海军中的共产党员们,与我们全国人民一样,都对近几年以来党和政府在巩固远东边防方面所采取的各项举措持完全赞同态度。我们在完善边防和提高远东军区部队的战备方面已做了许多工作。太平洋舰队保卫国家海疆的能力有了相当大的提高。后贝加尔军区时刻严阵以待。我们在土耳其斯坦地区也采取了严格的组织措施。

就在这两天,一些大规模的训练课目已经结束。其目的就是要制定出必要的举措,以成功解决我们南部和远东边境地区的防卫问题。在这些战术训练过程中,在参考了军事行动所在战场的各方面特点和具体的军事-政治形势的同时,我们实施了大规模的军事调动,研究了在大规模作战情况下如何开展部队和集团军的动员,从事后勤物资保障工作和预备队的使用等问题。

训练表明,我军战备和军事素养的不断增强,已能够满足当前军事的需要和有能力完成确保祖国安全的军事任务。尽管情况依然复杂,但我们全体指战员仍在这种情况下顺利地完成了战术训练任务且表现了自己最优秀的品质。我们的战士和军官都非常了解当前形势、共产主义思想并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在这里,我们可以再次坚定地说,在坚持搞好战备训练和时刻保持警惕性的同时,苏联军人将以高度的责任感和荣誉感履行自己巩固国防

的爱国主义义务和职责。

在这方面，我们来自预备役的士兵和军官也有良好表现。这反映了党和苏维埃各机关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训练使我们再次坚信一点，即我们在国防方面对苏联人民所进行的军事-爱国主义教育和训练工作产生了多么大的积极成果。现代国际形势要求我们进一步积极完善这方面的工作。

同志们！勃列日涅夫同志在共产党国际会议发言中，公正地强调了广泛开展向资产阶级思想发起进攻的问题。而与这些对劳动者思想产生着消极影响的思想作斗争，无疑是我们各级党组织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极力阻碍历史的规律性进程的同时，帝国主义思想家们一直试图对我们的队伍实施思想渗透，腐化我们青年一代的思想意识，破坏其对共产主义理想的信仰。由于自身精神准则的薄弱，他们便广泛采用了意识形态影响和精心设计的阴谋诡计等各种手段。而我们的军事历史领域、国家的道德—政治潜力和苏联武装力量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攻击的主要对象之一。

在准备以自己的方式庆祝即将来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25周年纪念日的同时，帝国主义思想家们在篡改历史方面表现得尤为积极。关于他们所编写的这段历史的全部内容的阶级意义，我们认为，首先应当基于这样一种最起码的认识，即承认苏联在摧毁法西斯方面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

当然，资产阶级思想家这样做的目的是想从内部颠覆社会主义制度，促使年轻一代对苏联的力量和强大产生疑虑，从而削弱苏联国家对世界性事件发展进程的影响力。他们的上述如意算盘无疑必将以失败而告终。不过，我们这方面对于敌视性宣传的影响也存在一种错误的观点，即对其可能造成的危害估计不足。如果我们不坚决地与之进行斗争，这些敌视性宣传便会对我们中的一些不成熟人群，其中包括军队中的一些人在内，造成消极危害。虽然我们在揭露资产阶级思想和帝国主义的阶级本质等方面已做了不少工作，但事实上这种敌视性思想的影响仍然在我们中间有所反映。

如今在举国上下正越来越广泛地筹备庆祝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100周年诞辰纪念之际，我们更应当关心我们整个宣传工作、英雄主义与爱国主义和艺术创作的思想性、方向性、纯洁性和战斗性，从而确保我们时刻保持革命的警惕性。这一任务具有全国意义，要求我们以全部的责任感和极其严肃的党的原则性来对待它，从而使任何敌视我们的阴谋诡计都没有可乘之机。

同志们！请允许我向中央全会报告如下内容，即苏联武装力量全体指战员完全认识到自己对祖国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命运所肩负的重大负责，而这与国际形势的尖锐以及毛主义者们所进行的反苏主义和冒险主义活动的不断加剧等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苏联军队将尽一切可能来巩固我们军事力量的强大。

现在，在各部队和舰艇上都在进行紧张的战备训练。鉴于准备庆祝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100周年诞辰纪念，我们人民在共产主义建设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党对加强国防

事业的不断关怀,国家为进一步完善军队的作战技术、强化军队纪律和秩序、提高军队的战备水平而创造的各方面良好条件,等等,从而激起了我军广大士兵、水兵、军士、尉官、军官、将军和海军上将等的高涨的爱国主义热情和高度的政治积极性。

在为纪念列宁诞辰而广泛开展的社会主义竞赛过程中,我军陆、海军中都在战备和政治宣传工作方面涌现出一批真正称得上是和平时期的英雄的优秀分子,与此同时先进连队、部队和舰艇的数量也在增加。

请允许我以苏联军人,陆、海军中所有共产党员的名义向党中央作出如下保证:苏联武装力量将一如既往地有效保卫我们祖国的神圣边境,无论威胁来自何方,我们都随时准备予以坚决的回击。

会议主持佩尔谢同志:下面发言的是B.C.托尔斯季科夫同志——苏共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

托尔斯季科夫:同志们!列宁格勒和列宁格勒州全体劳动者一直密切地关注着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工作进程。我们都非常了解,我们代表团在召集这次会议的过程中克服了多么大的困难,在编制会议主要文件方面付出了多么巨大的努力。

当时,政治局曾面临着一个最复杂的任务——从一系列尖锐的问题着手,对现实生活本身向我们提出的那些关于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和实践的活动做出恰当的分析,举行坦诚的对话,反对那些由于故意或缺乏理智而以响亮的语句粉饰自己的民族主义错误的不可救药的理论家和头脑不清者,反对机会主义的动摇,并与那些在关于如何以辩证唯物方式来解决社会发展中的普遍、特殊和统一相互比例关系的问题上已完全丧失了具体概念的人们作斗争。

会议成果鼓舞并使所有苏联人民感到高兴,使他们充满了对我们党的自豪感。它们也鼓舞了我们的朋友们,使共产党员们掌握了强大的理论和宣传武器,并以共同的目标为反帝战线的战士们确定了统一的战斗立场。

请允许我以列宁格勒党组织的名义对整个会议工作的成果以及苏共代表团团长Л.И.勃列日涅夫同志在会议发言中所明确的我们党的立场表达最热烈的赞同。

通过学习会议资料,我们可以再次确认一点,即列宁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是多么的伟大和巨大。

列宁的遗训及其学说——他毕业所追求的事业——不仅没有丧失自身的现实意义,而且也在此次国际会议工作和文件中得到了具体的落实。

正如列昂尼德·伊里奇在这次全会报告中所完全公正地指出的那样,我们所有党组织都面临一个任务,即深刻学习会议所有文件,学习苏共中央总书记Л.И.勃列日涅夫同志的讲话。

同志们!党中央最近作出的关于改善党的政策通报的决议已经收到应有的成效。精练而客观地报道会议进程使广大共产党员和全体苏联人民都能够对一系列共产主义党派的立

场有一个清晰的概念，并再次坚信苏共总路线的正确性。我们的整个政治思想工作在这些天里已变得更加灵活、富有创造性、更讲究效率。

如今，我们州党委已制定并开始实施关于深入学习和解释莫斯科会议资料的实际工作计划。

我们的工作重心主要集中在宣传干部、讲师和政治通信员的培养方面。我们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偶然的，因为这些人首先必须面对并答复劳动者们提出的大量问题，向群众解释阶级斗争和与当代修正主义斗争相关的许多复杂问题。

我们大家都还记得，罗马尼亚、意大利、瑞典、澳大利亚和其他一些代表团在国际会议发言中所发出的那些不和谐的声音。此类发言并不太多。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会议中已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增长势头——广大共产党员都要求团结，倾向于国际主义。对于我们而言，更重要的是要向我们的人民解释这样一些问题：意大利代表别尔林古埃尔同志在会议发言中所说的关于“国际主义危机”的话是从何而来的；而一些党派的代表们又为何要试图使毛集团以及“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者们避免遭到会议的严厉批判，其这样做的本质何在，等等。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是第一个搞清楚了这种病的本质的马克思主义者，并精确地作出了自己的诊断：它们是机会主义的主要根源之一，——不论是右的还是“左”的——都是民族主义。而一些共产党和工人党——更准确地说就是其领导人，堕入机会主义泥淖的事实本身也不能不使我们感到忧虑。

会议正确地指出了，这种在最广泛且多种多样的革命斗争中出现，并往往被掩饰的堕落的客观原因，即它们的滋生时常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迅猛胜利进程相伴。事实上，在当今的共产主义运动中不仅融入了工人阶级，而且还包括有大量的知识分子、农民、大学生、革命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等阶层的代表。所有这些数量众多的人群都会对共产主义运动施加影响。作为一些党派的新加入成分，一旦该政党的思想和组织工作效率低下，这些人便必然会在理论和策略方面发生动摇，滋生犹豫不定、怀疑、立场不坚定、政治近视等不良情绪。他们时而一厢情愿地极其热衷于议会活动和阶级斗争的和平方式，与此同时却对包括革命斗争在内的其他斗争方式估计不足或甚至抱以轻视的态度。这方面的例子包括：英国共产党及其“英国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纲领；还有其他一些党派的领导人，如意大利共产党，这些人也钟情于议会斗争方式并大力宣传反对资本家政府的改良主义斗争道路。

每当涉及这方面的话题时，我们便会不由自主地回想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在1919年3月末就第三共产国际问题所作的讲话，他说：“……多数党派的工人领袖们已习惯了和平时期，从而丧失了从事革命斗争活动的能力。”

当然，他的这些话当时是针对第二国际中的社会民主主义党派领袖们而言的。但是，事实上目前的情况与当时存在着某种类似：都处于和平状态、(领袖们)都钟情于已习惯了的、不危险的斗争方式——所有这一切便滋生了温情脉脉、无忧无虑、庸俗市侩的感伤主义情绪。

我们的共产党员们，对一些党派遵循社会主义的和平斗争方式的正确性问题，一直存在许多疑虑。由此可见，我们的科研干部和共产主义运动部门的工作人员，必须深入分析所积累的经验，以便能够把这一问题说清楚，并进而以此来帮助其他兄弟党的共产党员们。

受苏共中央的委托，我不得不经常了解芬兰、挪威和丹麦等国共产党的活动情况。

那么，我们能从他们——如挪威共产党——的实践活动中得出一条怎么样的结论呢，该党领导人非常热衷于研究全球性问题，而忽视内部问题。其这样做的结果便是：该国共产党逐渐停止领导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放弃了自己的思想立场，从而丧失了自身在本国劳动群众中的威望和信誉。

这里，我们尤其需要强调勃列日涅夫同志在报告中提出的这样一个思想，即必须创造性地研究会议提出的所有问题并进一步加强我们与兄弟党的联系，从而增强我们对他们的影响力。

我们一各级党委所面临的任务是：系统地组织深入而广泛研究莫斯科会议资料，研究我们党就国际和内部，尤其是青年问题所作出的所有最重大决议。

这里，我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关于青年问题的决议？因为首先，青年们没有生活经验、不掌握系统的理论知识，是资产阶级宣传的主要对象，并非总是能够对复杂的社会生活现象和国际政治问题进行透彻的分析。

如今，我们已拥有了成规模的政治教育体系，它既拥有自己的教学大纲和明确的教学进度，同时也具有一定的教育连续性。不过，该体系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它无法对共产主义建设和世界革命的发展进步过程中产生的现实问题进行充分深入而系统性的研究。看来，我们现在应当在不影响现行教学大纲的前提下再补充一些能够深入研究这些现实问题的课程。在学习我们党的文件过程中，我们还应当利用其他一些学习方式。与此同时，我们仍需要苏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国际部制定并向各级党组织下发相应的教学计划和大纲。这将使我们的政治教育体系更具有灵活性，对当前所发生的事件做出迅速反应并将这些事件创造性地与学习党的基本纲领活动紧密结合起来。

显而易见的是，我们必须在我们的高校、技校、职业-技术教育体系和高级中学中也开展类似的工作。我们也可能把这一想法落实大学生升学考试和中学生的一般性考查当中，其内容会涉及在共产主义建设过程中产生的党的主要文件以及国内、外最重大问题。这就要求我们的社会学教研室以及社会学和历史学的大学教师们更加关注这些文件，并从苏共中央近期的一系列全会要求出发更有力地加强针对青年的整个思想教育工作。

同志们！勃列日涅夫同志在自己的全会报告中相当公正地指出，会议再次证明我们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威望是多么迅速、多少坚定地增长了。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中央政治局，因为正是他们才使我们得到了参加此次会议的机会并有幸亲眼看到我们的列宁主义政党的旗帜如何重新被高高举起。而这一切均得益于苏共中央在共产主义运动一系列最重大问题上，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其中包括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在内——所采取的坚定、讲究原则和始终不渝的路线。如今，我们可以自信地说，苏共中央政治局在捷克斯洛伐克问

题上所采取的路线已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正是由于我们的帮助和各兄弟社会主义国家的扶持，捷克斯洛伐克内部的健康力量和捷共才重新以自己的力量恢复了国家的秩序。

我们针对毛泽东集团所采取的立场无疑也是正确的。尽管罗马尼亚人和一些其他与会者试图使执行冒险主义、民族主义和大汉族主义路线的北京分裂主义者们免遭会议的批判，但他们均受到了绝大多数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谴责。这再次证明苏共立场的正确性，证明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成熟性。

我们一致拥护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为和平解决(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所存在的争议性问题和加强我们远东边境地区的国防而采取的举措。在不激化矛盾的同时，我们应当继续揭露毛集团，全力促使中国人民返回到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来。

同志们！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将激励我们继续在建设共产主义的道路上赢取新的更大胜利。我们对前途充满信心，不畏惧任何艰难险阻。我们将全力发展经济和完善各级党组织的政治思想工作。

我应当向中央全会宣布，列宁格勒工业企业明天将完成自己的上半年生产计划。

共产党国际会议为我们转向第二阶段——共产党和工人党思想上的团结创造了良好的前提。列宁格勒人与全党一道，在列宁主义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准备尽一切可能以争取共产主义建设事业的更大胜利。(掌声)

会议主持佩尔谢同志：同志们，讨论到此结束。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拒绝作总结性发言。

与通常的做法一样，下面我们应当通过决议。由政治局制定的(决议)草案已分发给了全会的全体成员。同志们，你们都已经看完了没有？

表决：是的。

会议主持佩尔谢同志：有人有意见吗？

表决：没有。

会议主持佩尔谢同志：那么，请大家表决吧。赞成将所分发草案作为决议文本的，请举手。请放下手。有人反对吗？没有。

有什么意见吗？

表决：全体通过。

会议主持佩尔谢同志：没有意见吗？那么，(该草案)就可能是全体通过，责成中央政治局最后(对草案)进行编辑。

表决：正确。

会议主持佩尔谢同志：没有反对意见吗？没有。(那么，)决议通过。

表决：(决议)将于明天公开见报。

会议主持佩尔谢同志：建议明天(将决议)公开见报。有人反对吗？

表决：没有。

会议主持佩尔谢同志：那么，全会工作就到此结束了。在会议日程之外，Л. И. 勃列日涅夫同志还有些话要说。

勃列日涅夫：同志们，首先我想强调一点，这对我们所有人，中央委员、各共和国共产党中央、边疆区委和州委，以及区委——这里所有的与会者都很重要，那就是我们一定要努力以应有的方式，用此次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资料来武装我们党、全体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工人阶级和农民、国家全体劳动者。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既然我们的人民如此关心会议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那么我们就应把从事这方面的相关工作看作自己的首要职责。政治局已讨论了这一问题并通过了如下决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会书记们都有几天时间可以下到基层，以便亲自与当地的积极分子们见面。我们准备这样做：从星期一开始，政治局委员及其候补委员、中央委员会书记将按照事先的约定前往国家各地区并就莫斯科会议成果问题作相关报告。

明天将举行莫斯科市和州(一起)的积极分子会议，其间我将作报告。这将作为我们广泛工作的开始。我们必须把这项工作落实到基层党组织，然后再落实到工人和公务员会议。

以上是第一个问题。

接下来，我想建议的是，在今天全会闭幕之后，我们这里所有到会的，包括中央委员会书记、各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州委书记、州执委会主席、边疆区委书记和边疆区执委会主席等，最好能再留一下，以便主要就农业状况相关问题交换一下意见。

当然，有一些问题仍需要在作了相应准备后才能够作出决定，就是说，应首先由国家上层来决断，因此我们现在可以这样来做：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例会召开前夕让我们(这里多数同志都是最高苏维埃代表，而那些目前仍不是最高苏维埃代表的，我们届时将向其发出邀请)开个会，以讨论所有这些问题，其中包括关于粮食收割的准备工作问题。

我们开会期间，要讨论的主要问题是畜牧业生产和此类经济产品在国内的供应情况。近期，我们在这方面遇到了一些困难。而造成这些困难的原因可以从如下方面来探寻：我们的计划数据有误，我们工作上的失误，地方上相关部门检查力度不够和歪曲事实以及个别部门牲畜大量损失，等等。集体农庄社员的劳动报酬转为有保障的支付，也导致该部门情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显而易见，这里所出现的情况是我们以前没有充分考虑到的。当然在这方面，还存在其他一系列原因，而关于此我们将在会议上作细致的交流。

因此，我们请求各联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和州党委书记、各联盟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各边疆区执委和州执委主席、各土地机关，以及所有与此相关同志，就所有这一系列问题认真准备并将进行严肃讨论。不应认为这次会议只是作作发言而已，而是要让同志们在进行了深刻思考后再对我们在这一部门应采取哪些必要的措施提出建议，而关于这些举措，显然我们能想出的一定不会少。我们一定会纠正所存在的问题，我对这一点是毫不怀疑的。

不过，我想现在预先声明的是：我们有一些同志表现出这样一些情绪，即所有事情都是按计划进行的，而 1970 年畜牧业的生产情况将会更糟糕。对于这种情绪，我敢说，完全是一

种机会主义的言论。作为共产党员，是怎么都不应当说这样的话的。因为我们还远远没有充分利用现有的一切可能手段来改善这方面的情况。

你们可以只列出这样一些数据：一年我们能繁殖多少畜仔，有多少能够存活，又有多少可以出栏(以生猪业为例)。假如我们每年生猪的出栏率即使只有50%—60%，那么我们的生猪供应情况就会比我们1至1年半以前所估计的情况要好，甚至还会好得多。因此我们绝不应当再发我上面所提到的那些牢骚话。我们家禽业的情况与此类似——而这一经营行业也对我们有很大帮助。总之一句话，我们在会议上一定有实实在在的话题可以说。

我们目前正处于极其关键的时刻。如果我们无法保证居民的正常生活供应，我们的政策就可能遭到人们的质疑。人们就可能将我们的现行政策与实际中的失误混为一谈。我认为，我们在农村的政策是正确的，尽管遗憾的是其中也存在着一些实际的错误。我们应当对这方面问题给予关注。

总之，我们决定今天暂不举行关于农业问题的会议，而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例会召开前夕我们将再邀请你们，以便就这些问题来交换意见。

如果没有其他意见，那么此次中央全会便宣布闭幕了。

苏共中央全会关于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成果所通过的决议

(1969年6月28日)

在倾听和讨论了苏共中央总书记Л. И. 勃列日涅夫同志“关于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成果”的报告之后，苏共中央全会完全彻底地赞同苏共中央政治局旨在加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政治路线和实际活动以及苏共代表团于1969年6月5—17日期间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上的工作。

苏共中央全会认为，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是共产党、工人党和整个解放运动的巨大胜利。会议将对世界上所有民主、进步力量在最广泛团结行动的基础上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产生巨大的影响。会议标志着以马列主义诸原则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为基础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步入了一个重要的阶段。

有如此多与会者参加的这次会议召开的事实本身就已经充分证明，各共产党和工人党已意识到自己对我们的与人类未来紧密联系的运动的命运所肩负的崇高责任。会议整个过程也反映了各共产党和工人党为了整个运动的利益而急切要求加强团结和统一的倾向，因为大家都知道，各个党派的利益是与我们整个运动的利益密不可分的。上述倾向的发展和加强均得益于我们在会议筹备和举办过程中采用了如下一些工作方式：以广泛、公开、真正同志式的平等合作态度自由、民主地讨论问题和集体式地制定文件，等等。

会议所通过的文件，反映了现阶段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目标和要求，反映了加强反帝斗争、争取各民族的民族和社会解放、实现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等各项任务。

会议文件和与会者的发言，总结了共产主义运动的丰富经验，深入分析了当代世界的发

展,是对马列主义理论的重要贡献。

会议所通过的文件《现阶段反帝斗争的任务以及共产党、工人党和所有反帝国主义力量的联合行动》的意义最为重大。该文件强调了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即世界发展的主要路线依然是由革命、社会主义、和平和民族解放运动诸力量决定的。文件为所有反帝斗争在新的、更高水平上的兴起开辟了道路,为全世界广大人民群众的步调一致在实际组织方面指明了方向。

文件内容把对世界发展、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本质及其可能造成的后果的马列主义分析与统一行动的反帝斗争具体纲领紧密结合起来。这使我们将当代三股主要革命力量——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国际工人阶级和民族解放运动——团结起来的斗争有了更为明确的目标。

会议再次确认,社会主义体系是全世界反帝革命运动的成果。新世界在与旧世界的对决中是否能够赢得胜利,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社会主义体系是否能够团结一致并继续不断取得成就,取决于执政党是否能够充分利用自身新社会制度中所拥有的各种有利条件。由此也就相应地向我们提出了如下要求,在关心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巩固的同时,也要关心世界革命进程的发展,关心反帝斗争的实际活动。

会议坚定地认为,社会主义体系团结事业的主要方向,就是要坚定不移地落实社会主义国际主义诸原则,正确地将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任务相结合,发展兄弟式的相互帮助和相互支持。会议竭力宣称,捍卫社会主义——共产党人的国际主义义务。

会议强调工人阶级在现阶段革命斗争中的作用,认为其是我们运动和可以动员的主要力量。会议指出,劳动农民、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具有参加革命的巨大可能性,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种民主和反帝运动的意义,亚非拉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在世界革命进程中的作用也在不断增长。

会议尤其强调,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反帝和争取和平的斗争,与其为实现工人阶级的最终目的斗争和为赢得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本国的胜利而进行的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斗争都是密不可分的。

会议通过的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100周年诞辰"的致辞具有重大的意义。该文件确认了共产党人对列宁主义的始终不渝的忠诚,并强调了自身普遍的国际主义意义。文件以简明扼要的形式表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思想基础。致辞的目的就是要促使各共产党和工人党以纪念列宁诞辰为契机广泛宣传列宁主义思想,加强共产党在群众中的思想教育工作。

苏共中央全会也指出了其他会议文件的现实意义和重要性。会议通过的"争取越南独立、自由与和平"的呼吁书向世界显示了共产党人的无产阶级战斗团结,及其今后将在支持越南人民的斗争中采取共同行动的决心。

"保卫和平的呼吁书"继承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反帝战斗传统。该文件就当代最重大的问题之一表明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般性立场。该立场旨在团结广大的民主和爱好和平力量以投入到防止世界核战争的斗争之中。

全会对会议文件和与会者发言都对苏共和苏联政府的政策——巩固社会主义阵地，全力支援那些坚持反帝斗争、为争取自身的社会和民族解放、确保和平和国家安全、防止热核战争，遵守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给予广泛支持的情况感到满意。

会议肯定了党的克服已有分歧和加强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马列主义路线的正确性。该路线所追求的目标——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全面拓展各兄弟党之间的联系和关系，总结党的理论工作，捍卫和创造性地发展马列主义理论。

苏共中央全会认为会议结论具有重大意义，即坚持不懈地为纯洁马列主义而斗争，反对修正主义、教条主义和民族主义是巩固共产党队伍、共产党国际主义团结和加强共产党在整个革命运动中先锋模范作用的必要条件。

苏共中央指出，会议期间广泛的意见交流坚定地表明，中共领导人的现行外交方针及其分裂政策遭到了绝大多数兄弟党的坚决反击。

全会一致赞成苏共代表团在会议发言中所表述的立场。苏共将与中国领导人所奉行的反列宁主义思想、分裂政策和大国沙文主义外交方针作毫不妥协地斗争，并会竭尽全力保卫苏联人民的利益和击退任何蓄意侵犯。与此同时，从苏联和中国人民根本利益一致的角度出发，苏共今后将会继续极力维护和支持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所怀有的友好感情，而中国人民心中无疑也会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怀有同样的情感。

全会指出，苏联广大共产党员和劳动者们，均表达了自己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结成国际主义团结的意愿，完全支持我们党的政策。

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再次显示，共产主义运动尽管在自身的发展中仍存在一些困难，但它依然是整个反帝斗争力量的战斗先锋，是当代最强大的政治力量。

苏共中央全会决议内容，具体如下：

1. 批准会议所通过的文件：《现阶段反帝斗争任务以及共产党、工人党和所有反帝斗争力量的联合行动》、《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100周年诞辰”的致辞》、《“给予越南独立、民主与和平”的呼吁书》、《捍卫和平倡议书》。

2. 遵照会议成果，继续坚持苏共的一贯路线：在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诸原则基础上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在各方面全力发展与各共产党的关系，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反对右倾、“左”倾修正主义和民族主义，为纯洁马列主义学说而斗争。

3. 苏共中央全会赞成苏共和苏联政府的外交政治路线。苏联对外政策，不论现在还是将来都会在各反帝力量的共同斗争中，在巩固社会主义国家的强大和友好团结方面发挥最重要的作用；都将是粉碎帝国主义侵略企图，维护和平，捍卫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诸原则以及支持各民族解放斗争的有力手段(真正工具)。

4. 鉴于，经济成就、科技成就和巩固国防对苏联共产主义建设、反帝斗争和革命进程发展所具有的极其重要的意义，苏共中央全会特别提请苏联党、苏维埃和经济机关一定要保证完成国家五年计划和任务，争取在科技、文化和艺术各领域的新胜利；集体企业、建筑、集体农庄、国营农场等要集中力量提高生产效率，加速科技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尽快实现

生产能力的转化和更好利用以及现有资源储备向生产领域的投入。

5. 与会议成果相关,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是我们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各级党组织必须积极开展关于会议成果及其所通过文件的宣传工作,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充分利用报刊、广播、电视、讲座等各种宣传手段。

6. 中央全会肯定了苏共的路线,即坚定不移地以苏联爱国主义精神,以与各社会主义国家、与所有为了本国的社会和民族解放、民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事业而斗争的国家的友好、兄弟互助和团结的精神,来培养教育我们的人民,从而激发人民对自己的党和国家的自豪感、时刻准备为了党和国家的繁荣而奉献出自己的所有力量并深刻认识到苏联共产主义建设的国际主义意义——所有这些,作为有觉悟的苏联公民在现代条件下应具备的特征,均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7. 由会议成果中可以得出一系列重要结论,而其中之一便是要大力发展科研工作,具体包括:从理论高度深刻总结当代诸问题,以及世界革命运动的普遍规律和特点;研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中最重大理论问题,以及世界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反帝斗争;并以此为目的广泛而经常地举办国际理论会议和讲座。

8. 应在各共和国、边疆区、州、民族区、市和区党组织积极分子会议和基层党组织会议上讨论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成果,并组织共产党员深入学习会议资料。

鉴于苏联在建设新社会过程中所取得各项胜利的巨大意义,苏共中央号召所有党组织、共产党员和全体苏联人民,以更加积极的忘我精神投入到实现共产主义建设宏伟蓝图的斗争之中,从而以应有的姿态来庆祝我们党和苏维埃国家的奠基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100周年诞辰。

РГАНИ,ф. 2,оп. 3,д. 161,л. 3-20об